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二　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译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于 1955 年开始出版的。在中文版的译校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

目　　录

——

插　　图

第 二 卷 说 明

第二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收集了他们在1844年9月至1846年2月这一时期的著作。

1844年8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会见；这次会见奠定了他们在理论工作和实际革命活动的各个方面进行创造性合作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到这时已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收入本卷的著作反映了他们革命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进一步形成的过程。

本卷开头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在这部论战性的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战斗的唯物主义者的姿态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主义观点进行了致命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也批判了黑格尔本人的唯心主义哲学。他们对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的东西做了公正的评价，同时也批判了它的神秘部分。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重要原理都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得到了阐述。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已经接触到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驳斥过去占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点时证明：先进的思想本身只能使社会超出旧制度的思想范围，“为了实

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见本卷第152页）。在“神圣家族”中所提出的关于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的原理有巨大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社会中发生的变革愈深入愈广泛，完成这一变革的群众也就愈众多。列宁特别强调这个思想的意义，他认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深刻最重要的原理之一。

在“神圣家族”中还包含着几乎已经形成的关于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的观点；无产阶级由于自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处的地位，它“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并且消灭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惨无人道的生活条件，因为无产阶级“不是白白地经受了**劳动**那种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的。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第45页）。

“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一节有着巨大的意义；马克思在这一节中概述了西欧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的发展，同时指出，共产主义是唯物主义哲学的逻辑结论。

“神圣家族”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受了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的影响，费尔巴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过渡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同时这部著作中已经含有1845年春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提纲”中批判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的、直观的唯物主义时所持的某些论点。后来恩格斯在确定“神圣家族”一书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所占的地位时写道：“人们应该以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对抽象的人的崇拜，代替费尔巴哈新宗教的核心。越出费尔巴哈哲学的范围，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的观点，这一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开始

的。”（弗·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原理在“神圣家族”一书中也得到了表述。马克思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他根据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这一点论证了共产主义胜利的客观必然性。

弗·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也收在本卷中；列宁认为这部著作是世界社会主义文献中最优秀的著作之一。正如本书作者后来指出的，这是一部早期的作品，它反映着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初期的一个阶段。恩格斯研究了英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并以这个当时最发达的国家为例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系列的规律。他揭明了引起工厂无产阶级出现的产业革命的全部奥秘，并且强调指出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恩格斯证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失业者的产业后备军的形成，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不断重复以及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而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剥削的日益加强等都是不可避免的。用列宁的话来说，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是“对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一份义正辞严的控诉书”。恩格斯一方面描写了英国工人的难以忍受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同时指出无产阶级所处的这种地位必然会推动它去为自身的解放，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他批判了英国欧文派社会主义者鼓吹博爱，宣扬友好的做法。恩格斯在总结英国工人运动的经验时得出结论说：诚然进行罢工和成立工会是组织和教育工人阶级的有效手段，但是二者毕竟无力把他们从雇佣奴隶制中解放出来。恩格斯对宪章运动有很高的评价，说它是无产阶级的第一次独立的政治运动，但是同时又批评宪章主义者目标狭隘，并

且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原理：宪章运动必须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

载入本卷的弗·恩格斯的两篇文章“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和“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也是很有意义的，虽然在这两篇文章中还有费尔巴哈哲学伦理学观点的影响的痕迹。这两篇文章包含着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事迹的一些重要资料，并且反映出恩格斯在1844年至1845年的冬天在莱茵省所进行的巨大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列宁在描述恩格斯这时进行活动的环境时写道，同情共产主义思想是当时德国反政府情绪的表现方式，因此，在参加运动的人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实际上都是好心善意的资产者。“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在无数的似是而非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派别当中，恩格斯终于能够为自己打通一条走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道路……”（“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十九卷第505页）

1845年4月恩格斯迁居布鲁塞尔以后，马克思主义的这两位创始人继续共同探讨他们的新的观点，同时设法在报刊上宣传这些观点，并同国际的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的代表建立联系。1845年9月弗·恩格斯写“最近发生的莱比锡大屠杀。——德国工人运动”一文；恩格斯从这篇文章起开始系统地为英国宪章派的机关报“北极星报”撰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夏天旅居英国期间和宪章派中的革命派建立了巩固的联系。

弗·恩格斯为这家报纸写了一系列题为“德国状况”的论文，在这些文章中他分析了德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指出了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德国发展的影响。恩格斯在这里作为一个为争取统一民主的德国而奋斗的坚定战士，抨击德意志各邦的、首先是普鲁士的反动制度，痛斥军阀官僚的飞扬跋扈，大小王公的专

横暴戾。同时恩格斯还揭露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阶级本质，尖锐地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恩格斯在给“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写的前言和结束语中，对傅立叶做了评价，认为他是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弗·恩格斯在他的文章“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中宣布各国无产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并且揭穿了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这两篇文章以及卡·马克思1846年1月18日的“声明”都很重要，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创始人在报刊上初次发表的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言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庸俗的冒牌的社会主义观点是德国革命无产阶级民主运动发展的严重障碍。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给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奠定基础，于1846年1月在布鲁塞尔成立了共产主义联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来团结德国的和其他国家的革命的共产主义者以及先进工人，并且同工人运动中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流派作斗争。

收入全集第二卷的是马克思主义尚未最后形成时期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用的术语也说明了这一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是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逐渐制定逐渐精确化的。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卡·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44年9月—1846年2月

卡·马克思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著

神圣家族*，
或
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44年9月—11月

1845年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
以单行本出版。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　合著

按1845年版原文刊印

原文是德文

* “神圣家族”一书的书名，本来是意大利著名画家安得列阿·曼泰尼雅（Andrea Mantegna，1431—1506）一幅名画的题目，画中的人物是圣母马利亚抱着圣婴耶稣，旁边有马利亚的丈夫圣约瑟，有圣以利沙伯、圣约翰、圣亚拿以及一些天使和神甫。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借用这个题名来讽喻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一伙的。他们把布·鲍威尔比作天父的独生子耶稣，把其他几个伙伴比作他的门徒。这些人妄自尊大，自以为超乎群众之上，以为他们的话就是天经地义，不容争辩，正像耶稣在人们中传道一样。这幅画的名称本来应该译为“圣家族”或“圣家”，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本著作过去一向译为“神圣家族”，已经通用，所以，我们也就沿用了这个译名。——译者注

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

d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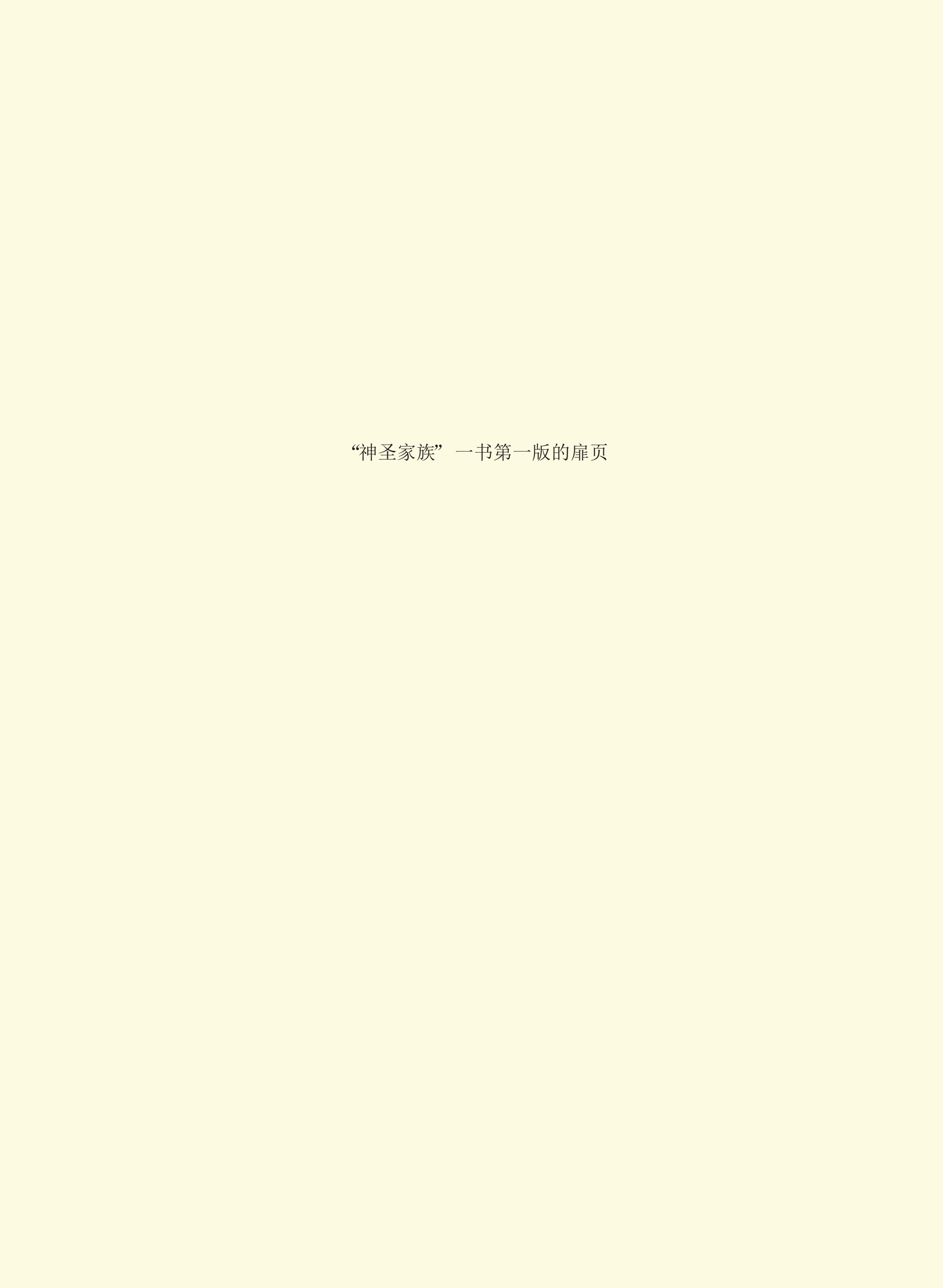
kritischen Kritik.

Gegen Bruno Bauer & Consorten.

Von

Friedrich Engels und Karl Marx.

Frankfurt a. M.
Literarische Anstalt.
(J. Rütten.)
1845.



“神圣家族”一书第一版的扉页

序　　言

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说来，没有比**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它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并且同福音传播者一道教诲说：“精神创造众生，肉体则软弱无能。”显而易见，这种超脱肉体的精神只是在自己的想像中才具有精神力量。**鲍威尔**的批判中为我们所驳斥的东西，正是以**漫画的形式**再现出来的**思辨**。我们认为这种思辨是**基督教德意志**原则的最完备的表现，这种原则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变“**批判**”本身为某种超经验的力量的办法使自己得以确立。

我们的叙述主要是针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文学总汇报”[2]（我们手边有该杂志的前八期），因为在该报中鲍威尔的批判以及**整个德国思辨**的全部谰言达到了顶点。批判的批判（即“文学报”的批判）愈是用哲学把现实歪曲得令人捧腹，那就对我们愈有教益。**法赫尔**和**施里加**二人便是例子。对“文学报”所暴露的材料加以考察，就能帮助广大读者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这也就是我们写作本书的目的。

我们的叙述方法自然要取决于**对象本身的性质**。批判的批判在各方面都**低于**德国的理论发展水平。因此，假如我们**在这里**没有进而对这一发展本身**加以探讨**，那是由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的本质所致。

同时，批判的批判使我们不得不用现在所达到的成果**本身**来同它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因此，我们先发表这部论战性的著作，再各自分头在自己的著作里叙述自己的肯定的观点，以及对现代哲学和社会学的肯定的见解。

恩格斯、马克思

1844年9月于巴黎

第 一 章
以订书匠的姿态出现的批判的批判或赖哈特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批判的批判虽然认为自己是多么地超出群众，但它仍然万分怜悯群众。所以批判爱群众，甚至将它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批判的永生。批判本身变成了群众，置身于我们中间，于是我们也看到了它的伟大——像天父的独生子一样的伟大。这就是说，批判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批判，并且谈起“关于赤贫化的论文”[3]来了。它丝毫不觉得将自己比做上帝有什么亵渎的地方：它已经下凡，变成了订书匠，并且竟然降低自己的身分去胡言乱语，用外国话批判地胡言乱语。它纯洁得犹如蓝天，犹如处女，一看到罪孽深重的害麻疯病的群众就吓得心惊肉跳，但它还是克制住自己，研究了“**波特兹**”㊀的著作和“关于赤贫化的**一切**原著”，而且“多年来一直密切注视着时代的弊病”。它不愿意为博学的专家们写作，而要为广大的读者习作，并且要清除一切古怪的语句、所有的“天书词句和所有的行话”——它是要从**别人**的著作里清除所有这一切，因为假如希望批判本身服从“这种行政的规定”，那这要求未免太过分了。但是就在这一点上它还是做了一些的。它极其轻巧地摈弃了这些字的内容，虽然并没有

㊀ 为赖哈特所歪曲的查理·狄更斯的笔名“波兹”的拼法。——编者注

摈弃这些字本身。这样，谁还敢指责它搬用“一大堆不可理解的外国字”呢？即使它已经用它的一贯的表现宣告这些字对它自己来说也是不可理解的。

下面就是这种一贯表现的若干例子：

“因此，**贫困制度**①是他们恐惧的对象。”

“**人类思想**②的每个活动在其中**都成为洛特太太的形象**③的责任感学说。”

“在这个真正**充满信心的艺术建筑**④的拱顶石上。”

“这就是施泰因这位伟大的国家要人早在引退之前就交给了政府**和它的一切著作**⑤的政治遗嘱的主要内容。”

“当时这一民族对如此广泛的自由**还没有任何测定**⑥。”

“在他的政论文章的结尾几行中确有把握地**谈判道**⑦：所缺乏的只是信任。”

“对最高国家的、不愧为真正男子汉的、超绝于成规和怯懦的、在历史中受到教育的和用他国的公众政治生活的活生生的直观培养起来的理智。”

“全民福利的教育。”

“在当局的监督下，自由长眠**在各族人民的普鲁士使命的胸堂里**⑧。”

“**人民机体的**⑨政论文章。”

“对人民，甚至勃律盖曼先生也要把**他的成年洗礼证书**⑩交给他们。”

---

① 原文是 Institutionen des Bettlertums。——译者注

② 原文是 Menschengedankens。——译者注

③ 原文是 zum Abbild von Lots Weib wird。——译者注

④ 原文是 gesinnungsreichen Kunstgebäudes。——译者注

⑤ 原文是 und allen ihren Abhandlungen。——译者注

⑥ 原文是 noch keine Dimensionen。——译者注

⑦ 原文是 parlamentiert。——译者注

⑧ 原文是 in der Brust des preußischen Völkerberufs。——译者注

⑨ 原文是 Volksorganische。——译者注

⑩ 原文是 Taufzeugnis seiner Mündigkeit。——译者注

“和专门研究人民特殊使命的著作中所陈述的其他**规定性**①所发生的矛盾是相当尖锐的。”

“丑恶的贪婪心会很快打破一切**民族意志的幻想**②。”

“渴望暴富等等的心情就是那种始终贯串在复辟时期中的精神，这种精神带着**相当数量的漠不关心归附于**③新的时代。”

“**农业的普鲁士民族**④对政治意义所固有的糊涂观念是**基于对伟大历史的回忆**⑤。”

“反感消失了并转入了十分兴奋的状态。”

“在这种惊人的转变中，每个人都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远景中的特殊**愿望**⑥。”

“使用涂了圣油的所罗门语言的教义问答，它的话语像鸽子一样，噗喳！噗喳！慢慢地飞上感染力和**雷鸣般的外貌**⑦的境界。”

“**三十五年的忽视的整个艺术涉猎**⑧。”

“假如宾达对1808年的城市章程的看法没有关于城市章程的本质和实施的**概念的穆斯林倾向**的⑨缺点，那末就能够用我们的代表所特有的那种心平气和的精神去接受以前的一个城市统治者加于市民头上的过分**刺耳的怒喝**⑩。”

处处和赖哈特先生的文风上的勇敢相吻合的，是思路本身的勇敢。他的思路是这样的：

---

① 原文是 Bestimmtheiten。——译者注

② 原文是 Schimären des Nationalwillens。——译者注

③ 原文是 einer ziemlichen Quantität Indifferens… anschloβ。——译者注

④ 原文是 landmannschaftlichen preuβischen Nationalität。——译者注

⑤ 原文是 ruht auf dem Gedächtnis einer groβen Geschichte。——译者注

⑥ 原文是 stellte… Wunsch in Aussicht。——译者注

⑦ 原文是 donnerähnlicher Aspekten。——译者注

⑧ 原文是 Dilettantismus einer fünfunddreiβigjährigen Vernachlässigung。——译者注

⑨ 原文是 moslemitischen Begriffs-Affektion。——译者注

⑩ 原文是 grelle Verdonnern。——译者注

“勃律盖曼先生……1843年……国家学说……每个正直的人……我们的社会主义者的伟大的谦逊……自然的奇迹……应该向德国提出的要求……超自然的奇迹……亚伯拉罕①……费拉得尔菲亚……甘露……面包师……但是**因为**我们谈到**奇迹**，**所以拿破仑**就会拿来……”等等。

看完上面这些例子，我们就不会再觉得奇怪，为什么批判的批判还要向我们“解释”它自认为是“通俗化的表现方法”的那种说法。因为它“用能够透视混乱的有机力量来武装自己的双眼”。而在这里应当提醒一句，这样一来，甚至“通俗化的表现方法”对批判的批判说来也不能是不可理解的了。它懂得，假如踏上文学家道路的主体没有足够的力量把这条路弄直，那这条路就必然还是弯曲的；所以它也就很自然地把“数学演算”强加在作家的头上了。

不言而喻，批判的批判之所以变成群众，并不是为了本身要成为群众，而是为了使群众摆脱自己的群众的群众性，也就是说，要把群众的通俗化的表现方法提升为批判的批判所使用的批判的语言。历史证实一切不言而喻的事情，同样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批判掌握通俗化的群众语言，并把这种粗野的俚语改造成批判的批判的辩证法所具有的莫测高深的词句，那末这正说明批判把自己的身分降低到了极点。

---

① 亚伯拉罕原名是亚伯兰，参看旧约全书创世记第17章。——译者注

第 二 章

体现为《MÜHLEIGNER》[4]的批判的批判或茹尔·法赫尔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批判在前面不顾自己的身分用外国话胡言乱语，从而给自我意识大效其劳，同时用这种行动把世界从贫困中解救了出来；现在，它又打算不顾自己的身分在**实践**和**历史**中**胡言乱语**了。它通晓“**英国的迫切问题**”并给我们提供了真正**批判的英国工业史概要**[5]。

自满自足、自圆其说和自成一家的批判当然不会承认历史的真实的发展，因为这无异于承认卑贱的群众的全部群众的群众性，而事实上这里所涉及的正是要使群众摆脱这种群众性。因此历史将从它的群众性中解脱出来，而**自由地**处理自己的对象的批判又向历史吆喝道：“**你知道吗，你应当如此这般地产生！**”批判的一切法律都有**溯及既往的**力量，在批判的判决**以前**，历史完全不是**遵照批判的判决**产生的。因此，群众的，即所谓**真正**的历史是和“文学报”第 7 期第 4 页上开始发表的**批判的**历史大不相同的。

在群众的历史中，**工厂**出现以前是没有**任何工厂城市**的，可是在儿子生父亲（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的批判的历史中，**曼彻斯特、波尔顿**和**普累斯顿**在谁都还没有想到工厂以前就已经是繁荣的工厂城市了。在真正的历史中，**棉纺织业**的发展主要是从**哈格里沃斯**的珍妮纺纱机和**阿克莱的纺纱机**（水力纺纱机）运用到

生产上以后才开始的，而**克伦普顿的骡机**只不过是运用了阿克莱发明的新原理来改进珍妮纺纱机而成的。但是批判的历史善于辨别：它轻蔑地否认了珍妮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的片面性，并把骡机誉为这两个极端的思辨的同一。实际上，随着水力纺纱机和骡机的发明，立即有了在这些机器上**运用水力**的可能，但是批判的批判却把那些被历史的粗笨的手撮合在一起的原则互相分割开来，并把水力的这种运用当做一种完全特殊的东西归于较晚的时代。实际上，蒸汽机的发明**早于**上述的一切发明，而在批判中，蒸汽机被当成整个建筑物的顶点，因而在时间上是**最晚的**。

实际上，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的现代意义上的**商务联系**是英国商品出口的结果，在批判中，商务联系却成了这种出口的**原因**，而商务联系和出口这二者则是这两个城市成为近邻的结果。实际上，从曼彻斯特运往大陆的所有的商品几乎都经过**赫尔**，在批判中却认为是经过**利物浦**。

实际上，英国的工厂里存在着所有的**工资等级**，从 1$^1/_2$ 先令到 40 先令，甚至更多一些，在批判中却只有**一种**工资—— 11 先令。实际上，**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而在批判中却是机器代替了**思维**。实际上，工人为了提高工资而实行的**联合**在**英国**是允许的，在批判中，这种联合却是被禁止的，因为群众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必须请求批判的允许。实际上，**工厂劳动**是极端**折磨人**的，并且引起各种特殊的疾病（甚至有专门研究这些疾病的医学著作），在批判中却说“过分的紧张不会妨碍劳动，因为出力的是机器”。实际上，机器就是机器，在批判中，机器却有**意志**：机器不休息，工人也不能休息，所以工人是受外来意志支配的。

但是这些还算不了什么。批判不满意英国的**群众的政党**；它

创造了新的政党，创造了“**工厂党**”，为此，历史应对它表示感谢。可是它把厂主和工厂工人混为群众的**一团**，——这点区区小事又何足为怪呢！——并且武断地说，工厂工人不给反谷物法同盟[6]捐献基金，并不像愚蠢的厂主所说的那样是出于恶意或是由于对宪章主义的拥护，而只是由于贫穷。批判接着武断地说，一旦英国的谷物法被废除，农业短工就一定会同意降低工资，但是，我们敢于冒昧地指出，这个一贫如洗的阶级再也不会同意减少一文钱，否则他们就会饿死。虽然愚蠢的非批判的英国法律注意到不使工作超过十二小时，批判却武断地说，英国工厂里一天工作**十六小时**。虽然非批判的群众的美国人、德国人和比利时人通过竞争渐渐地一个又一个地夺去了英国人的市场，批判却武断地说，英国仍旧应当成为全世界的大作坊。最后，批判武断地说，**财产的集中**及其对劳动阶级所造成的后果，在英国无论是有产阶级或是无产阶级都没有看出来，可是愚蠢的宪章派就认为他们对财产集中的现象了解得非常透澈，**社会主义者**也认为他们早已详尽地描述了这种后果，而且连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如**卡莱尔**、**艾利生**和**盖斯克尔**）都可以用自己的著作来证明他们是了解这种现象的。

批判武断地说，**艾释黎**勋爵的**十小时法案**[7]是肤浅的中庸的措施，而艾释黎勋爵本人则是“立宪活动的忠实的反映”，可是到现在为止，厂主、宪章派、土地占有者（一句话，整个群众的英国）都把这种措施看成彻底激进的原则的一种表现（诚然是极微弱的表现），因为这种措施会破坏对外贸易的根基，并且会随之而破坏工厂制度的根基，——更确切些说，不仅会破坏，而且会挖它的老根。这一点批判的批判比谁都了解。批判知道，十小时工作日的问题是在下院的一个什么“委员会”上讨论过，而非批判

的报纸还竭力要使我们相信这一“委员会”就是**下院本身**，即“**全院委员会**”，但是批判却非取消英国宪法的这种荒诞性不可。

批判的批判自己**制造**出自己的**对立物**即**群众的愚蠢**，同时也制造出詹姆斯·格莱安爵士的愚蠢，它用批判地解释英语的方法把非批判的内务大臣从来没有说过的话归之于这位大臣，而它之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借格莱安的愚蠢来更加鲜明地衬托出自己的聪明。批判宣称，格莱安曾说过不管工厂的机器每天工作十小时或十二小时，工厂的机器大约可用十二年，所以十小时法案使资本家不可能通过机器的工作在十二年里再生产出投入这些机器的资本。批判接着就证明它替格莱安爵士捏造出来的结论是错误的，因为机器每天少工作$^1/_6$的时间，它的使用年限自然会延长。

尽管批判的批判对它自己的错误结论的这种指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应当为詹姆斯·格莱安爵士主持公道，实际上他是这样讲的：实行了十小时法案，机器就必然会按工作时间缩短的比例加快速度（批判本身在第8期第32页上也引证过这段话），在这样的情况下机器的磨损时间仍然正好是十二年。这一点是不能不承认的，更何况这种承认只是对“**批判**”的赞扬和歌颂，因为正是**批判**本身不仅做出了错误的结论，并且接着又把它驳倒。批判对待**约翰·罗素**勋爵却非常宽宏大量，它硬说这位勋爵有改变国家制度的形式和选举制度的意图。由此我们必须做出结论：不是批判生来就特别醉心于制造蠢事，就是约翰·罗素勋爵在最近一周变成了批判的批判家。

批判发现：虽然有迹象表明“英国工人也注意工作时间的立法限制”，但是他们对这一问题只表现了“**部分的**关心”，而实际上工人为了要求实行十小时法案，在四、五月间曾一次又一次地

举行集会，一次又一次地请愿，工厂区的每一个角落都笼罩着一种两年来从来没有过的激愤；批判还作出了一个伟大的、卓越的、前所未闻的发现："乍看起来，废除谷物法会给工人带来更多的直接的好处，所以在工人的大部分愿望得到满足从而实际证明废除谷物法对工人毫无好处以前，工人一直都会把这些愿望寄托在废除谷物法上面"，而实际上，工人在一切公众的集会中坚决地把主张废除谷物法的人从讲坛上轰走，使反谷物法同盟不敢在英国的任何一个工厂城市举行公众的集会，他们把反谷物法同盟看做唯一的敌人，他们在讨论十小时工作日时，像在讨论类似的问题时几乎经常有的现象一样得到托利党人的支持。批判正是在作出这些发现的时候，它在制造蠢事方面才真正变得伟大起来。批判发现："工人仍被**宪章运动**的广泛的允诺所迷住"，而实际上宪章运动正是工人的舆论的政治表现；批判在自己的绝对精神的深处看出"两个集团即政治集团与土地和工厂所有者集团**已经**互**不**融合和互不掩护"，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听到过，土地和工厂所有者集团这两个私有者阶级虽然人数不多，政治权利也完全一样（少数贵族除外），却具有这样广泛的性质，我们还没有听到过，实际上作为政党的最彻底的表现和顶点的这一集团又是和政党集团绝对同一的。批判能有这些发现真是妙不可言。批判硬说主张废除谷物法的人不知道下面这个事实：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谷物价格降低，工资也必然会降低，结果一切都仍旧和过去一样，而事实上这些先生们是指望借助工资的这种显著降低和由此而来的生产费用的减少来相应地扩大市场，可是这样一来就减少了工人之间的竞争，因而工资和谷物的价格比较起来多少总比现在要高一些。批判硬这样说算是妙极了。

在艺术家式的陶醉中任意创造自己的对立物——胡言乱语——的批判，也就是两年前叫喊“批判讲德语，神学讲拉丁语”[8]的那个批判，现在它又学会了**英语**，把土地占有者叫做《Landeigner》(landowners)，把厂主叫做《Mühleigner》(mill-owners；英语中的《mill》指的是一切用蒸气或水力发动机器的工厂)，把工人叫做“**手**”(hands)，用“干扰”(interference)来代替“干涉”，并且基于对渗透了罪恶的群众性的英语的无比同情，竟然降低自己的身分来改造英语和废除学究式的规则，按照这一规则，英国人总是把勋爵士和从男爵的称号“爵士”冠在**名**的前面，而不冠在姓的前面。群众说“爵士詹姆斯·格莱安”；而批判却说“爵士格莱安”。

批判着手改造**英国的**历史和**英国的**语言是从**原则**出发，而不是**轻率**从事，关于这一点，读者现在可以从它对待**瑙威尔克先生的历史时所具有的那种彻底性**中得到证明。

第 三 章
“批判的批判的彻底性”或
荣（荣格尼茨?）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9]

瑙威尔克先生和柏林大学哲学系的无比重要的争论，批判不能置若罔闻。它本来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并且必然会把瑙威尔克先生的命运拿来当做背景，以便把**波恩的撤职事件**[10]衬托得更能引人注意。因为批判已经惯于把波恩的这段历史看做当代的突出事件，甚至写成了“批判的解职的哲学”，所以可以预料，它一定会以同样的方式把柏林的“冲突”构成详细的哲学大纲。它 a priori〔先验地〕证明：这一切都必然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地发生。就是说，它表明：

(1) 为什么哲学系一定要和国家哲学家发生“冲突”，而不和逻辑学家或形而上学者发生“冲突”；

(2) 为什么这次冲突不可能像批判和神学在波恩的争斗那样激烈和彻底；

(3) 为什么这次冲突实际上是一件蠢事，既然批判在波恩的冲突中已经穷尽了一切可能的原则和一切可能的内容，而且从那时起，世界史只好变成批判的抄袭者了；

(4) 为什么哲学系把对瑙威尔克先生的著作的攻击看成对自己的攻击；

(5) 为什么瑙威尔克先生除了自动离职就别无出路；

(6)为什么哲学系不想背弃自己就一定得维护瑙威尔克先生;

(7) 为什么“哲学系内部的纷争必然要表现在”哲学系同时认为瑙威尔克和政府都对又都不对这一点上;

(8) 为什么哲学系在瑙威尔克的著作中找不出他被撤职的根据;

(9) 什么东西使得整个判断都不明确;

(10) 为什么“作为科学机关(!)的”哲学系“认为自己(!)有权利(!)观察事件的根源”;最后,

(11)为什么哲学系仍然不愿意用瑙威尔克先生那样的方式从事写作。

批判用四页的篇幅以罕有的彻底性分析了这些重要问题,同时它运用黑格尔的逻辑来证明:为什么这一切正是这样发生,为什么无论什么神都无法反对这一点。批判在另一个地方说,还没有一个历史时代已经被认识;由于谦逊,它不便说它至少已经充分认识了即使本身并不就是时代但是在它看来终归还是**构成了**时代的它自己的冲突和瑙威尔克的冲突。

“扬弃了”自己的**彻底性**“因素”的批判的批判又变成了“**认识的宁静**”。

第四章
体现为认识的宁静的批判的批判或埃德加尔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1) 弗洛拉·特莉斯坦的“工人联合会”[11]

法国社会主义者肯定地说：工人制造一切，生产一切，但是他们既没有权利，又没有财产，简单地说，一无所有。关于这一点，批判通过体现了**认识的宁静的埃德加尔**先生的嘴作了如下的回答：

“为了创造一切，就需要某种比工人的意识更强有力的意识。上述论点只有像下面这样倒过来讲才是正确的：工人什么东西也没有制造，所以他们也就一无所有；他们之所以什么都没有制造，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始终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的某种单一的东西，是平凡的工作。”

在这里，批判达到了如此高度的抽象，以致于在它看来，只有它自己的思想创造以及和任何现实都相矛盾的普遍性才是“某种东西”，甚至就是“**一切**”。工人之所以什么都没有创造，是因为他们所创造的仅仅是“单一的东西”，即可以感触到的、非精神的和非批判的对象，这些对象中的任何一种都会使纯批判深恶痛绝。凡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东西都是非批判的、群众的，因此，它是“无”，只有批判的批判的理想的、虚幻的创造才是“**一切**”。

工人之所以什么都没有创造，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仅仅是为了满足他们个人的需要的某种单一的东西，也就是因为在现代的世界秩序下，各个单个的、互有内在联系的劳动部门是分隔开来的，

甚至是互相对立的，一句话，就是因为劳动没有**组织起来**。批判本身所提出的论点，如果从唯一可能的合理的意义上来加以说明，就是要求劳动有组织。弗洛拉·特莉斯坦（分析她的著作就可以发现这种伟大的论点）也有同样的要求，而且由于她竟敢走在批判的批判的前头，遭到了后者的极端的鄙视。“工人什么都没有创造。”要是撇开**单个**工人不能生产任何**完整的东西**这一事实（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谈的话，这种论点简直就是疯话。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英国和法国的工人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工人甚至创造了**人**，批判家却永远是不通人性的人〔Unmensch〕，然而，他的确对于自己是一个批判的批判家这一点感到一种内心的满足。

“弗洛拉·特莉斯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妇女的教条主义的例子，这种教条主义离开公式就寸步难行，并且还用现存事物的范畴来制定公式。”

批判所做的，仅仅是“用现存事物的范畴来制定公式”，也就是用现存的**黑格尔**哲学和现存的社会意向来制定公式。公式除了公式便什么也没有。而且尽管批判在竭力抨击教条主义，但是它还是宣告自己是教条主义，而且是**妇女**的教条主义。它是一个老太婆，而且将来仍然是一个老太婆；它是年老色衰、孀居无靠的**黑格尔**哲学。这个哲学搽胭抹粉，把她那干瘪得令人厌恶的抽象的身体打扮起来，在德国的各个角落如饥似渴地物色求婚者。

（2）贝罗论娼妓问题

埃德加尔先生曾一度降低身分来过问社会问题，他认为自己

也有责任干预**“淫乱的关系”**。（第5斯第26页）

他批评巴黎的一位警官贝罗所著的关于娼妓制度的书，因为“贝罗在考察娼妓对社会的关系时”所持的**“观点”**使他感到不安。“认识的宁静”对于警察正是从警察的观点来考察问题这一点感到惊讶，而且它要使群众了解这一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可是它却不让人了解它自己的观点。十分明显！当批判跟娼妓在一起鬼混的时候，是不能要求它在公众面前做到这一点的。

（3）爱　　情

为了达到完美的“认识的宁静”，批判的批判首先必须竭力摆脱**爱情**。爱情是一种情欲，而对认识的宁静说来，再没有比情欲更危险的东西了。所以，埃德加尔先生正在借冯·帕尔佐夫夫人的小说（他保证说：这些小说“他已彻底**研究过**”）来克服**“被称为爱情的那种幼稚行为”**。爱情是灾祸，是妖魔，它激起批判的批判的仇恨、愤怒以至癫疯。

> “爱情……是一个凶神。她像所有的神一样，要支配整个的人，直到人不仅将自己的灵魂、而且将自己的肉体的‘自我’交给她时，她才感到满足。对爱情的崇拜便是苦恼，这种崇拜的顶峰就是使自己成为牺牲品，就是自杀。”

为了把爱情变为“摩洛赫”[①]，变为魔鬼的化身，埃德加尔先生先把它变成神。在变成神即神学的对象之后，爱情自然就会受到**神学的批判**了；何况大家都知道，神和魔鬼也相差无几。埃德加尔先生把爱情变成“神”，而且是变成“凶神”，所用的办法是

①　古腓尼基人所奉的火神，以人，特别是儿童做祭品。——译者注

把**爱人者**、把**人**的爱情变成**爱情**的人，把“**爱情**”作为特殊的本质和人分割开来，并使它本身成为独立存在的东西。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过程，通过谓语到主体的这一转变，就可以把人所固有的一切规定和表现都批判地改造成**怪物**和**人类本质的自我异化**。例如，批判的批判把作为谓语和人的活动的批判变成特殊的主体，变成针对自身的批判，因而也就变成**批判的批判**，即变成一个“摩洛赫”；对它的崇拜就是使自己成为牺牲品，就是人本身特别是人的**思考能力**的自杀。

“**对象**”，——认识的宁静叫道——“对象是一个非常确切的词，因为，对爱者说来，被爱者（没有女的）①只有作为他所**迷恋的这一外在客体**，即作为他希望用来满足自己的私欲的客体时，才是重要的。”

对象！可怕得很！没有比**对象**更可憎、更鄙俗、更群众的了，——a bas〔打倒〕对象！绝对的主观性、actus purus〔纯粹的活动〕、“纯”批判怎么能不把爱情看做 bête noire㊀，看做撒但②的现身呢！因为爱情第一次真正地教人相信自己身外的实物世界，它不仅把人变成对象，甚至把对象变成了人！

认识的宁静激愤地继续说道：爱情把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的“**客体**”这样一个**范畴**还不放心，它甚至把他变成**一定的**、**现实的**客体，变成**这个**卑贱个人的（见黑格尔关于“这个”和“那个”两范畴的“现象学”[12]，这里面也在进行反对卑贱的“**这个**”的论争）、**外在的**、

① 德文“被爱者”（Geliebte）在这里应该是个阴性词，但埃德加尔却把它当做阳性词来使用，因而在这里“爱者”和“被爱者”两词都属于阳性，指的都是男人，所以马克思讥讽地加了一句：“没有女的”。——译者注

㊀ 直译是黑兽，意即鬼魅、非常讨厌的东西。——编者注

② 撒但是恶魔的别名。参看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4章。——译者注

不仅是内在的、隐藏在脑子里面的、而且是可以感触得到的客体。

“爱情
不只是幽禁在脑子里。”

不，被爱者是**感性的对象**，而批判的批判（如果它不得不屈节承认某种对象的话）最低限度也会要求对象成为一个**非感性**的对象。然而爱情却是**非批判的、非基督教的唯物主义者**。

最后，爱情竟把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所“**迷恋的这一外在客体**”，变成满足另一个人的**私欲**的客体，——这种欲望之所以是**自私的**，是因为它**企图**在别人身上**寻求自己的本质**，但这是不应该的。批判的批判是**这样地清心寡欲**，以至于在**自己的“自我”身上**可以充分**找到**人类本质的全部内容。

埃德加尔先生自然没有告诉我们，被爱者和所有其他“用来满足人们的私欲的、令人迷恋的外在客体”有什么不同。诱人的、多情的、内容丰富的爱情这个对象，对认识的宁静说来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模型：“令人迷恋的这一外在客体”，这正像彗星对思辨的自然哲学家说来只不过是“负”这个范畴一样。一个人在把另一个人变成自己迷恋的外在客体时，的确（根据批判的批判的承认）是在赋予他以“重要性”，但这是所谓的**对象的重要性**，然而批判所赋予对象的重要性无非就是批判自己赋予自己的那种重要性。因此，这种批判的“重要性”表明自己不是“卑贱的**外在的有**”，而是批判的重要对象的“**无**”。

如果认识的宁静在现实的人身上得不到**对象**，那末，相反地它就会在**人类**中间获得**事业**。批判的爱情“最**担心**的是由于个人而忘记**事业**，这就是人类的事业”。而非批判的爱情却没有把人类和单个的人、和个人分割开来。

“爱情本身是一种不知来自何处也不知走向何方的抽象的情欲，它对于内在的发展不感兴趣。”

因为在思辨的用语中，具体的叫做抽象的，而抽象的却叫做具体的，所以在认识的宁静的眼里爱情是抽象的情欲。

“她不是降生在山谷里，
谁都不知道她来自何方；
她匆匆地辞别而去，
连踪影也随之消失。”[13]

在抽象的眼里，爱情是“来自异乡的少女”，她没有携带辩证的护照，因而被批判的警察驱逐出境。

爱情的情欲对于**内在**的发展不感兴趣，因为它不可能被 a priori〔先验地〕构造出来，因为它的发展是发生于感性世界中和现实的个人当中的现实的发展。而思辨结构的主要兴趣则是“来自何处”和“走向何方”。“来自何处”正是“概念的**必然性**、它的证明和演绎”（黑格尔）。“走向何方”则是这样的一个规定，“由于它，思辨的圆环上的每一环，像方法的生气蓬勃的内容一样，同时又是新的一环的发端”（黑格尔）。这样，只有在爱情的“来自何处”和“走向何方”可以被 a priori〔先验地〕构造出来的时候，爱情才会使思辨的批判感到“兴趣”。

在这里，批判的批判不仅反对爱情，而且也反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切直接的东西、一切感性的经验，反对所有一切**实际**的经验，而关于这种经验，我们是决不会预先**知道**它“来自何处”和“走向何方”的。

埃德加尔先生通过对爱情的克服，完全**肯定了**自己是“认识的宁静”。接着他又立刻通过**蒲鲁东**显示了他在认识（对这种认识

说来，**“对象”**不再是**“这一外在客体”**了）上的高深的造诣，同时也表现了他对法语的更深的**不爱**。

（4）蒲鲁东

按照批判的批判的说法，“什么是财产？”[14]这部著作不是**蒲鲁东**本人写的，而是“蒲鲁东的**观点**”写的：

“我对蒲鲁东的观点的阐述，从评定它（观点）①的著作‘什么是财产？’开始。”

因为只有批判的观点的著作本身才具有特征，所以批判的评定必然从赋予蒲鲁东的著作以一种特征开始。埃德加尔先生赋予这部著作以特征的方法是**翻译**。当然，他赋予它的是**丑恶**的特征，因为他把它变成了**“批判”的对象**。

于是，蒲鲁东的著作就遭到了埃德加尔先生的双重攻击，即通过赋予特征的翻译的**暗中**攻击和通过批判的评注的**公开**攻击。我们将看到，埃德加尔先生在翻译时比他在做评注时更为毒辣。

赋予特征的翻译 1

“我不想（这是被批判地翻译过的蒲鲁东在说话）②提供任何新东西的体系，除了废除特权、消灭奴役以外，我别无其他愿望…… 公平，除了公平而外别无其他，——这就是我的主张。”

被赋予特征的蒲鲁东仅限于有愿望和主张，因为，善良的愿望”和非科学的“主张”是非批判的群众的特性。被赋予特征的

①②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蒲鲁东的特点，就是他具有与群众的身分相称的驯顺的性格，他使自己所希求的东西服从于自己所不希求的东西。他不敢奢望提供新东西的体系，他的愿望很低，他甚至除了废除特权等等之外就**别无其他**愿望。除了这样把自己已有的愿望批判地从属于自己所没有的愿望以外，他的第一句话还立即暴露了特有的逻辑缺点。一个作家既然在自己的书中一开始就声明自己不想提供新东西的体系，那末他当然应该告诉我们，他到底想提供什么？是想提供系统化的旧东西呢，还是非系统化的新东西？但是，被赋予特征的蒲鲁东既然不想**提供**任何新东西的体系，那末，他是否想提供特权的废除呢？不，他只是**希望**废除特权。

真正的蒲鲁东说：《Je ne fais pas de système; je demande la fin du privilège》etc.（“我不创立任何体系，我要求废除特权”等等）。这就是说，真正的蒲鲁东声明：他不追求任何抽象的科学的目的，而只是向社会提出一些直接实践的要求。而且他的要求决不是任意提出的。这个要求由于他对论题的全部发挥而成为有根据和有理由的要求，它就是这种发挥的要领，因为，“公平，并且仅仅是公平，这就是我的**立论**的要领”。被赋予特征的蒲鲁东说过：“公平，除了公平而外别无其他，——这就是我的主张”，这种说法使他陷入了更加狼狈的境地，因为他还“主张”其他许多事情，例如，照埃德加尔先生的说法，他“**主张**”哲学在过去是不够实际的，“**主张**”驳倒沙尔·孔德，如此等等。

批判的蒲鲁东自问道：“难道**人**有责任永远是不幸的吗？”换句话说，他问的是：不幸是不是人的道德本份？而真正的蒲鲁东是个轻佻的法国人，所以他提的问题是这样：不幸是不是一种物质的必然性，是不是某种**不可避免**的东西？（“难道人**不可避免地**

永远不幸吗?”)

群众的蒲鲁东说:

《Et, sans m’arrêter aux explications à toute fin des entrepreneurs de réformes, accusant de la détresse générale, ceux-ci la lâcheté et l’impéritie du pouvoir, ceux-là les conspirateurs et les émeutes, d’autres l’ignorance et la corruption générale》, etc.〔“我不谈改良办法的杜撰者的那些毋庸辩驳的解释,他们中的一些人把普遍的贫困归咎于政府的胆怯和无能,另一些人归咎于阴谋家和叛乱,还有一些人则归咎于无知和普遍的堕落腐化”,等等。〕

因为《à toute fin》是群众的德文字典中所找不到的下流的群众用语,所以批判的蒲鲁东自然就摈弃了这个把“解释”〔explications〕一词规定得比较确切的用语。这个术语是从群众的法国法学中借来的,在法国法学中,《explications à toute fin》的含义是“毋庸辩驳的解释”。批判的蒲鲁东抨击**“改良主义者”**,即法国的一个社会主义政党[15],而群众的蒲鲁东所抨击的则是“改良办法的杜撰者”。群众的蒲鲁东把各种类型的“改良办法的杜撰者”加以区别:这一类(ceuxci)说些**什么**,那一类(ceux-là)说些**什么**,另一类(d’autres)又说些**什么**。批判的蒲鲁东却让**同样的一些改良主义者**“时而谴责这个,时而谴责那个,时而又谴责另一个”,这无论如何证明他们是反复无常的。真正的蒲鲁东根据群众的法国实践来谈《les conspirateurs et les émeutes》〔“阴谋家和叛乱”〕,也就是说,先指出阴谋家,然后再指出他们的行动——叛乱。相反地,把各种类型的改良主义者混为一谈的批判的蒲鲁东却把暴徒加以分类,所以他说“阴谋家和**叛乱者**”。群众的蒲鲁东说的是**无知和“普遍的堕落腐化”**。批判的蒲鲁东则把无知变为愚蠢,把“堕落腐化”变为“下流无耻”,最后又以批判的批判家的身分把愚蠢变为**普遍的**。于是他自己就在这里现身说法

地做了一个愚蠢的榜样，因为他用《générale》这个字时写的不是复数，而是单数。他写的是：《l' igno— rance et la corruption générale》，而想说的却是："普遍的愚蠢和普遍的下流无耻"。按照非批判的法文文法，这里应该写成这样：《l' ignorance et la corruption générales》①。

被赋予特征的蒲鲁东在说话方面和思考问题方面都跟群众的蒲鲁东不同，当然他也经历过完全不同的**教育过程**。他"请教过科学大师，读完了数百卷哲学和法学等等方面的著作，**最后**还确信：我们从来没有正确地了解'公平、正义、自由'这几个词的含义"。而真正的蒲鲁东则认为，他**一开始**就理解了（je crus d' abord re— connaître）批判的蒲鲁东只是在："**最后**"才领悟的东西。这里之所以必须把 d' abord〔一开始〕批判地改变为 enfin〔最后〕，是因为群众不敢相信他们"一开始"就理解了什么东西。群众的蒲鲁东用最明快的语言叙述他怎样为自己的研究工作的这种意外成果感到惊讶，叙述他怎样不相信这个成果。因此他决定进行"**反证**"，他向自己问道："人类是否可能在道德运用的原则方面这样长期地受骗呢？人类是怎样和为什么受骗的呢？"等等。他认为，自己的观察正确与否，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他得出结论说，在道德方面，也像在其他一切知识领域中一样，谬误"**构成科学的阶梯**"。相反地，批判的蒲鲁东却立刻就相信了他在政治经济学、法学等等方面的研究所给予他的第一个印象。这个

① 法文中形容词有单数和多数之分。在这里，在蒲鲁东的原文中《générale》〔普遍的〕是单数，它所形容的名词仅仅是它紧前面的《corruption》〔堕落腐化〕一词，但是埃·鲍威尔却把它当做多数来翻译，因而成了它前面的两个名词的形容词。—— 译者注

印象显然是这样：群众不敢**认真地**行动，他们一定要把自己研究的初步成果奉为无可辩驳的真理。他们“在和自己的反对方面较量之前，一开始就有了现成的见解”，因此后来“发现，当他们自以为已经到达终点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到达起点呢”。

于是，批判的蒲鲁东继续毫无根据地语无伦次地大发议论：

“我们关于道德规则的知识不是一开始就很充分的，**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它可能足够社会进步之用，但是到后来它就会把我们引入歧途。”

批判的蒲鲁东没有解释，关于道德规则的不充分的知识为什么可能足够社会进步之用（哪怕是只在一天之内）。而真正的蒲鲁东却先向自己提出问题：人类是否可能和为什么可能这样普遍、这样长期地迷误不醒？他认为这个问题的解答是：一切谬误都构成科学的阶梯，甚至我们的最不完善的判断也包含着一些真理，这些真理对于某些归纳推论和对于实际生活的某一特定领域是完全够用的；超出这些推论和这个领域，这些真理就会在理论上产生谬误，在实践上导致失败。蒲鲁东在做了这样的解释以后，他就能够说，甚至关于道德规则的不完备的知识在一定的时间内也可能足够社会进步之用。

批判的蒲鲁东说：

“但是，对新知识的需要一经出现，旧偏见和新思想之间立即就会爆发残酷的斗争。”

但是，怎么可以跟**还不**存在的敌人进行斗争呢？要知道，尽管批判的蒲鲁东也告诉我们对新思想的需要产生了，但是他还并没有说这个新思想本身已经**产生了**。

群众的蒲鲁东说的则是：

“对更高的知识的需要一经出现，这种知识就**决不会让自己等待下去**。”

可见，它已经存在着。“于是斗争就开始了。”

批判的蒲鲁东断言，“人的使命就在于一步一步地进行自我教育”，好像人就没有与此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使命，即成为人，好像“一步一步”的自我教育必然会把我们推向前进似的。我可以一步接一步地走，并仍旧回到我出发的地点。而非批判的蒲鲁东所谈的则不是人的“使命”，而是人进行自我教育所必备的**条件**（condi－tion)，不是**一步一步地**（pas à pas)，而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par degrés)。批判的蒲鲁东自言自语地说道：

“在作为社会基础的诸原则中有这样一个原则，它为社会所不理解，它被社会的无知所败坏，它也是一切祸害的根由。虽然如此，人们仍然尊重**这个**原则，希求这个原则，如不然，这个原则就不会有任何影响了。这个原则按其**实质**来说是真实的，但按我们对它的观念来说则是虚妄的……它究竟是什么呢？”

在第一句话中批判的蒲鲁东说，原则被社会所败坏、所不理解；可见这个原则本身是正确的。在第二句话中他再一次承认这个原则就其实质而言是真实的，虽然如此，他仍然责难社会不该尊重和希求“这个原则”。相反地，群众的蒲鲁东之所以谴责社会，并不是因为社会尊重这个原则本身，而是因为社会尊重这个由于我们无知而伪造出来的原则（《ce principe… tel que notre ignor－ance l’a fait，est honoré》)。批判的蒲鲁东认为不真实的原则的**实质是真实的**。群众的蒲鲁东则认为，伪造的原则的实质是我们的虚妄观念的结果，而这个原则的**对象**（objet）却是真实的，这正像炼金术和占星术的实质是我们臆想的结果，而它们的对象（天体运行和物体的化学属性）却是真实的一样。

批判的蒲鲁东继续说他的独白，他说：

“我们研究的对象是法律，即社会原则的规定。政治家，也就是社会科学界人士，为一些极不明确的观念所拘泥；但既然每一种谬误都有某种现实的东西做基础，那末我们也就能在他们的书中找到他们在不知不觉间创造给人世的真理。”

批判的蒲鲁东的议论是极其古怪的。他先断定政治家是不学无术和观念不清的，然后又十分武断地转口说每一种谬误都有某种现实的东西做基础，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因为陷入谬误的人本身就是作为每一种谬误的基础的某种现实的东西。其次，他又从每一种谬误都有某种现实的东西做**基础**这一事实得出结论说，在政治家的**书中**可以找到真理。最后，他甚至使政治家把这个真理创造给**人世**。假如他们已经把真理创造给**人世**，那我们就用不着再到他们的**书**中去寻找真理了。

群众的蒲鲁东说：

“政治家们互不了解（ne s’entendent pas）；因此他们的谬误是主观的，谬误的根源就在他们自己身上（donc c’est en eux qu’est l’erreur）。”他们的互不了解证明了他们的片面性。他们把“自己的个人见解和健全的理智”混为一谈，而“既然”——根据先前的推论——“每一种谬误都有某种真正现实的东西作为自己的**对象**，那末在政治家的书中就必定能找到他们不自觉地放在里面（即自己书中）①的真理”，——他们是把真理“不自觉地放在里面”，而并没有把真理创造给人世（dans leurs livres doit se trouver la vérité，qu’à leur insu ils y auront mise）。

批判的蒲鲁东向自己问道：“何谓公平，它的实质、它的性质、它的意义怎样？”好像公平还有某种不同于其实质和性质的特殊的意义似的。非批判的蒲鲁东所问的是：“它的原则、它的性质和它的公式（formule）怎样？”公式所表明的原则是经过科学证明的原则。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在群众的法语中，《formule》和《signification》〔“意义”〕是根本不同的。在批判的法语中这两个词的意思却完全一样。

在结束自己这番毫无用处的议论之后，批判的蒲鲁东提起精神，大声疾呼：

“让我们试着稍微接近一些我们的对象吧！”

其实，非批判的蒲鲁东早就紧紧地靠近了自己的对象，并且正在试着对自己的对象做出更确切更中肯的规定（d’arriver à quelque chose de plus précis et de plus positif）。

在批判的蒲鲁东看来，“法律是公平的事物的**规定**”，在非批判的蒲鲁东看来，法律则是公平的事物的**“宣告”**（déclaration）。非批判的蒲鲁东驳斥了认为法律创造公理的见解。而“法律的规定”这种说法既可以表示法律被某种其他的东西所规定，又可以表示法律本身规定某种其他的东西；批判的蒲鲁东本人在上面就是从后一种含义来谈论社会原则的规定的。不过，做这样细微的区分对群众的蒲鲁东说来确实是不适当的。

既然被批判地赋予特征的蒲鲁东和真正的蒲鲁东之间有这样一些分歧，那末，蒲鲁东第一所企图证明的东西跟蒲鲁东第二所要证明的东西完全不同，就丝毫也不值得奇怪了。

批判的蒲鲁东

“**企图**用**历史的经验证明**”，“如果我们关于公平的事物和合法的事物的观念是虚妄的，那末**显而易见**（尽管这样显而易见，但他仍然认为必须加以证明）①，这种观念在法律上的一切运用就必定是不好的，我们的一切设施也必定是有缺陷的”。

---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群众的蒲鲁东却远不是要证明显而易见的东西。相反地，他所说的是：

“如果我们关于公平的事物和合法的事物的观念不够明确、不完全或者甚至是虚妄的，那末**显而易见**，这种观念在我们的立法上的一切运用也是不好的”，等等。

那末，非批判的蒲鲁东到底想要证明什么呢？

他继续写道：“假如人们对于公平这个概念以及对于这个概念的运用的见解不是固定不变的，假如这类见解在各个不同的时代起了各种不同的变化，总之，假如思想有了进步，那末，关于公平在我们的观念中、从而也在我们的行动中受到歪曲的这种假说，就得到了事实的证明。”

而问题也就在于，正是这种不固定性、这种变易性、这种进步，“由**历史**所光辉地证实了”。非批判的蒲鲁东也就援引了这些光辉的历史证据。他那批判的影像先前根据历史经验证明了完全不同的原理，现在又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这种经验本身。

在真正的蒲鲁东看来，罗马帝国的衰亡是“贤者（les sages）”所预料到的，而在批判的蒲鲁东看来，则是“哲学家”所预料到的。批判的蒲鲁东看来，则是“哲学家”所预料到的。批判的蒲鲁东当然认为只有哲学家才是贤者。照真正的蒲鲁东的看法，罗马“法经过千年来的法律实践或司法活动而神圣化了（ces droits consacrés par une justice dix fois séculaire）”；照批判的蒲鲁东的看法，在罗马存在着“被千年来的**公平**所神圣化了的法”。

根据这个蒲鲁东第一的判断，在罗马，人们是像下面这样发表议论的：

“罗马……是靠它的政治和它的众神而获胜的；宗教信仰和公众精神的任何一种改革都是愚蠢的事情和亵渎的行为（在批判的蒲鲁东那里，《sacri—

lége》这个词的意思不像在群众的法语中那样是亵渎圣物或冒犯神灵，而只是平常的亵渎行为）①；如果罗马决心解放各族人民，那它就会因此而背弃自己的法。”蒲鲁东第一补充道：“可见，罗马既有为自己打算的事实，也有为自己打算的法。”

根据非批判的蒲鲁东的看法，在罗马，人们的议论更加彻底些。他们确切地叙述了**事实**：

“奴隶是罗马的最大富源；因此各族人民的解放就等于**罗马财政的破产**。”

在谈到**法**时，群众的蒲鲁东还说出下面这样一种想法：“罗马的野心通过万民法（droit des gens）而合法化了。”证明奴役法的这种方式完全符合罗马人的法律观点。在群众的罗马法全书上载明：《jure gentium servitus invasit》（Fr.4.D.I.I.）〔“**奴隶制**通过**万民法**而巩固下来了”（“学说汇纂”②第一卷第一题第四节）〕。

在批判的蒲鲁东看来，“偶像崇拜、奴隶制和软弱无能构成了罗马各种制度的基础”——任何制度都不例外。而真正的蒲鲁东却说：“罗马在宗教方面的各种制度的基础是偶像崇拜，在国家生活方面，是奴隶制，在私人生活方面，是享乐主义”（在普通的法语中，《épicurisme》〔“享乐主义”〕这个词和《mollesse》即软弱无能的意思是不同的）。在罗马的这种情况下，神秘的蒲鲁东说“出现了”“上帝的旨谕”，而真正的唯理论的蒲鲁东说的是出现了“自称为上帝的旨谕的伟人”。在真正的蒲鲁东那里，这个伟人称僧侣为“蝮蛇”（vipères），而在批判的蒲鲁东那里，这个伟人的言谈却比较温和，他称僧侣为“蛇”。在前者那里，他以罗马的方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② 罗马法全书共分三部分，“学说汇纂”是第二部分。——译者注

式谈论“律师”〔《Advokaten》〕，在后者那里，他以德国的方式谈论“法学家”〔《Rechtsgelehrte》〕。

批判的蒲鲁东称法国革命的精神为矛盾的精神，接着又补充道：

“这足以使人相信，代替了旧事物的新事物**在**本身上没有任何方法严整、思虑成熟的东西。”

他似乎非机械地重复“新”和“旧”这两个批判的批判所惯用的范畴不可似的。他好像非得提出这种毫无意义的要求，即“新事物”**在**本身**上**〔an sich〕应包含有方法严整、思虑成熟的东西，这就像要求人们在本身上〔an sich〕都要有些污点一样。而真正的蒲鲁东却是这样说的：

“这足以证明，代替了旧事物秩序的那个事物秩序，**在本身中**〔in sich〕已丧失了方法和反省。”

沉醉在法国革命的回忆中的批判的蒲鲁东，竟把法语**革命化**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把《un fait physique》〔“物质界的事实”〕译作“物理学的事实”，而把《un fait intellectuel》〔“精神生活的事实”〕译作“智慧的事实”。由于把法语这样一革命化，批判的蒲鲁东就得以使物理学拥有了自然界中所出现的一切事实。如果说，他这样一方面把自然科学捧到九天之上，那末另一方面，由于他否认自然科学中有智慧，由于他把智慧的事实同物理学的事实截然分开，也就把自然科学贬到九地之下了。同时，由于他把精神生活的事实直接提升为智慧的事实，他也就使心理学和逻辑学的一切进一步的探讨成了多余的事情。

既然批判的蒲鲁东（即蒲鲁东第一）甚至不去猜测真正的蒲鲁东（即蒲鲁东第二）究竟想用他的历史的演绎来证明什么东西，那

末对于他来说，当然也就不存在这种演绎的实在内容，即通过**否定**历史上的实在法来证明法的观念的演变，证明公平的不断**实现**。

"社会通过自己的原则的**否定**……和最神圣的法的**破坏**而得救。"

真正的蒲鲁东就这样证明，罗马法的否定导致了法的概念在基督教的法的**观念**中的扩大，征服者的法的否定导致了自治团体法的确立，法国革命对全部封建制法的否定导致了更广泛的现代法律秩序的建立。

批判的批判死不承认，原则通过自身的否定而实现的规律是蒲鲁东发现的，这个光荣应该属于他。具有如此自觉的形式的这种思想，对法国人确是一个真正的启示。

批判性的评注 1

对任何科学的最初的批判必然要拘泥于这个批判所反对的科学本身的种种前提，同样，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这部著作也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对**政治经济学**所做的批判。——至于该书有关法律的部分，即根据法的观点来批判法的这一部分，我们在这里没有做深入研究的必要，因为该书的主旨是批判政治经济学。——因此，通过对**政治经济学**，其中包括对蒲鲁东所了解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蒲鲁东的著作被科学地越过了。这一工作之成为可能，正是依靠了蒲鲁东本人曾经做过的一切，这正如同蒲鲁东所做的批判是以重农学派对重商主义学说的批判、亚当·斯密对重农学派的批判、李嘉图对亚当·斯密的批判以及傅立叶和圣西门的著作为前提一样。

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论断都以**私有制**为前提。这个基本前提被政治经济学到做确定不移的事实，而不加以任何进一步的研究，并

且正如**萨伊**所坦率承认的，甚至被当做只是“偶然”为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事实。蒲鲁东则对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制**做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带有决定性的、严峻而又科学的考察。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所完成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使政治经济学革命化了，并且第一次使政治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这部著作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正如同**西哀士**的著作“什么是第三等级？”对现代政治学的意义一样。

如果说蒲鲁东本人还没有把私有制的各种进一步的形式，如工资、商业、价值、价格、货币等等，像“德法年鉴”[16]那样看做私有制的形式（见弗·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而是用这些政治经济学的前提来反驳经济学家，那末这就完全符合他那从历史上说来可以原宥的上述观点。

把私有制关系当做合乎人性的和合理的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不断地和自己的基本前提——私有制——发生矛盾，这种矛盾正像神学家所碰到的矛盾一样：神学家经常按人的方式来解释宗教观念，因而不断地违背自己的基本前提——宗教的超人性。例如在政治经济学中，工资最初看来是同消耗在产品上的劳动相称的份额。工资和资本的利润彼此处在最友好的、互惠的、好像是最合乎人性的关系中。后来却发现，这二者是处在最敌对的、**相反**的关系中的。最初，价值看起来确定得很合理：它是由物品的生产费用和物品的社会效用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价值纯粹是偶然确定的，它无论和生产费用或者和社会效用都没有任何关系。工资的数额起初是由自由的工人和自由的资本家**自由**协商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工人是被迫同意资本家所规定的工资，而资本家则是被迫把工资压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强制**代替了立约双方的**自由**。在商业

和其他一切经济关系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有时经济学家们自己也感觉到这些矛盾，而且揭露这些矛盾成了他们之间的斗争的主要内容。但是，在经济学家们意识到这些矛盾的情况下，**他们自己**也攻击表现在某种**个别**形式中的**私有制**，把私有制的某些个别形式斥责为本来合理的（即他们认为合理的）工资、本来合理的价值、本来合理的商业的伪造者。例如，亚当·斯密有时攻击资本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攻击银行家，西蒙·德·西斯蒙第攻击工厂制度，李嘉图攻击土地所有制，而几乎所有近代的经济学家都攻击**非产业**资本家，即仅仅作为**消费者**来体现私有制的资本家。

所以经济学家们有时候，特别是在他们攻击某种特殊的损人利己的犯罪行为的时候，例外地维护经济关系上的合乎人性的外观，但在大多数场合下，他们恰恰是从这些关系同人性显然有**区别**的方面，从严格的经济意义上来把握这些关系的。他们总是不自觉地在这个矛盾中徘徊不已。

蒲鲁东永远结束了这种不自觉的状态。他认真地对待经济关系的**合乎人性的**外观，并把它和经济关系的**违反人性的现实**尖锐地对立起来。他迫使这些关系真正符合于它们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或者更确切些说，他迫使这些关系抛弃关于自身的这种看法而承认自己是真正违反人性的。因此，蒲鲁东不同于其余的经济学家，他不是把私有制的这种或那种个别形式、而是把整个私有制十分透澈地描述为经济关系的伪造者。从政治经济学观点出发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时所能做的一切，他都已经做了。

想**说明**“什么是财产？”这部著作的**观点的特征**的埃德加尔先生，当然是既丝毫没有谈到政治经济学，也丝毫没有谈到蒲鲁东的著作所具有的特点，而这种特点正是在于把**私有制的实质**问题

看做政治经济学和法学的根本问题。对于批判的批判说来，所有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蒲鲁东并未因他否定私有制而有了任何新的发现。他不过是泄露了批判的批判所讳莫如深的秘密罢了。

埃德加尔先生在他那赋予特征的翻译之后马上接着说道："于是，蒲鲁东发现了历史上的一个绝对者，一个永恒的基础，一个引导人类的神。这个神就是公平。"

蒲鲁东在1840年用法文写的著作并不是从1844年德国发展的观点出发的。这也就是蒲鲁东跟许多和他恰相对立的法国作家所共有的观点，它给批判的批判以方便，使后者可以笼统地一下说明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的特征。此外，只要彻底遵循蒲鲁东自己所提出的规律，即公平通过对自身的否定而实现的规律，就足以摆脱这个历史上的绝对者。如果说蒲鲁东没有得出这种彻底的结论，那末这应当归咎于他生为法国人而不是德国人的这种可悲的情况。

对埃德加尔先生说来，由于蒲鲁东提出了历史上的绝对者，由于他相信公平，所以他就成了**神学的**对象；而 ex professo〔职业的〕批判神学的批判的批判现在就可以抓住蒲鲁东，以便能在"宗教观念"上大作文章。

"每一种宗教观念的特点都是把这样一种情况奉为信条：两个对立面中最后总有一个要成为胜利的和唯一真实的。"

我们将看到，宗教的批判的批判是把这样一种情况奉为信条：两个对立面中最后有一个——"**批判**"——要作为唯一的真理战胜另一个对立面——"群众"。可是蒲鲁东却把群众的公平当做绝对者，奉为历史上的神，从而就犯下了更不公平的过错，因为公平的批判已经**非常明确地**为自己保留了这个绝对者、这个历史上

的神的地位。

批判性的评注 2

“贫穷困苦的事实使蒲鲁东得出了一些片面的论断；他认为这个事实是同平等和公平相**抵触**的；他把这个事实当做自己的武器。于是，对于他，这个事实就成了绝对的合理的，而私有制存在的事实则成为不合理的了。”

认识的宁静告诉我们说，蒲鲁东认为贫困的事实是和公平相抵触的，——可见，他认为这个事实是不合理的；可是认识的宁静连口气都顾不得喘就赶忙声明说，对于蒲鲁东，这个事实成了绝对的合理的。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从私有制的运动似乎使**人民富有**这个事实出发，得出了替私有制辩护的结论。蒲鲁东从政治经济学中被诡辩所掩盖的相反的事实出发，即从私有制的运动造成贫穷这个事实出发，得出了否定私有制的结论。对私有制的最初的批判，当然是从充满矛盾的私有制本质表现得最触目、最突出、最令人激愤的事实出发，即从贫穷困苦的事实出发。

“相反地，批判则把贫穷和财产这两个事实合而为一；〗它发现了二者的内在联系，使它们成为一个整体，并且向这个整体本身询问其存在的前提是什么。”

批判直到现在还丝毫不了解财产和贫穷的事实，“相反地”，它却用仅仅在自己想像中所做到的事情来反驳蒲鲁东的真实的事情。它把**两个**事实合而为**一**，并且在把**两个**事实变为一个**唯一**的事实之后，又发现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批判不能否认，连蒲鲁东也承认贫穷和财产这两个事实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并且正是由于这种内在联系的存在，他才要求废除财产，以便消灭贫

困。蒲鲁东甚至还做得更多。他详尽地表明了资本的运动**怎样**造成贫困。相反地，批判的批判却不屑于做这类鸡毛蒜皮的琐事。它发现贫穷和私有财产是**两种对立的东西**，——这可真是一个相当时髦的发现。它使贫穷和富有**成为一个整体**，并且“向这个整体**本身**询问其存在的前提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多余的，因为批判自己刚刚**创造了**这个“整体本身”，可见它的这种**创造**本身就是这个整体存在的前提。

批判的批判既然向“整体本身”去探询其存在的前提，那就等于是用真正神学的方式在这个“整体”**之外**寻求这些前提。批判的思辨在它似乎正在研究的那个对象以外运动着。贫富之间的这一**全部对立正是对立的两个方面的运动，**整体存在的前提正是包含在这两个方面的本性中，可是批判的思辨却避不研究这个形成整体的真正的运动，以便给自己留一个机会，说批判的批判作为认识的宁静是高居于两个对立方面之上的，只有它那创造“整体本身”的活动才能消灭它所创造的抽象。

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们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

私有制，作为私有制来说，作为富有来说，不能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就不能不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这是对立的**肯定**方面，是得到自我满足的私有制。

相反地，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来说，不能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能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制。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是对立内部的不安，是已被消灭

的并且正在消灭自身的私有制。

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这个阶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被唾弃的状况下对这种状况的**愤慨，**这个阶级之所以必然产生这种愤慨，是由于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

由此可见，在整个对立的范围内，私有者是**保守的**方面、无产者是**破坏的**方面。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

的确，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但是它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客观事物的本性所制约的发展，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这种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贫困、这种意识到自己的非人性从而把自己消灭的非人性——的产生，才能做到这点。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因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地，它也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之后，无论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趋于消灭。

如果社会主义的著作家们把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归之于无产阶级，那末这决不像批判的批判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是

由于他们把无产者看做**神**的缘故。倒是相反。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不是白白地经受了**劳动**那种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的。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识达到完全明显的地步，关于这点在这里没有必要多谈了。

"批判的批判"之所以认为自己不应当承认这一点，是因为它已宣告自己是历史的唯一创造因素。历史上的各种对立从它那里产生，消灭这些对立的行动也从它那里产生。因此它借它的化身埃德加尔的口发布了如下的**宣言**：

"有教养和没有教养、有财产和没有财产，这些**对立面**应该**受到完全而充分的**批判，只要不蓄意**亵渎**它们就行。"

有财产和没有财产被当做批判的思辨的两个对立面而受到了形而上学式的尊崇。因此只有批判的批判的手才能触动它们而又不犯亵渎圣物的过错。资本家和工人则不应该过问他们自己的相互关系。

埃德加尔先生甚至根本没有想到，可能会有人抨击他的关于对立面的批判的观点，可能会有人来亵渎这些圣物，结果他就把只有他自己才能对自己提出的异议硬塞在他的论敌口中。

批判的批判所臆造的论敌问道："除了自由、平等这一类已有的概念而外，难道还可能运用什么其他的概念吗？我的回答是（注意埃德加尔先生的回答）①，倘若以希腊语和拉丁语为表达手段的思想一旦穷尽，这两种语言也就立刻死亡了。"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为什么批判的批判没有用德语给我们提出任何一种完整的思想。表达它的思想的语言还没有产生，所以怪不得赖哈特先生批判地处理一些外国字，法赫尔先生批判地处理英语，埃德加尔先生批判地处理法语，从而为创造一种**新的批判的**语言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赋予特征的翻译 2

批判的蒲鲁东说：

"土地耕作者彼此间分割土地。平等只是把占有神圣化；趁此机会，它把财产也神圣化了。"

在批判的蒲鲁东那里，地产是在分割土地的那一瞬间出现的。在他那里，靠"趁此机会"这样一句话就实现了从占有到财产的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过渡。

真正的蒲鲁东说：

“土地耕作为**土地占有**奠定了基础……　光保证劳动者得到他的劳动果实而不同时保证他有生产工具是不够的。为了使弱者免受强者的侵害……人们认为必须在占有者之间划下固定的分界线。”

可见，“趁此机会”，平等首先是把**占有**神圣化了。

“随着人口的增长，移民们的贪婪和私欲也一年比一年强烈。看来必须造成一些新的不可克服的障碍，以限制他们的野心。于是，由于需要平等，土地就成了财产……　毫无疑问，土地的划分在地理上从来就不是均等的……虽然如此，但原则仍然是这一个。平等以前把占有神圣化，现在则把财产神圣化了。”

在批判的蒲鲁东那里，

“古代的财产创建人由于过分关心自身的需要而忽略了这样一个情况：转让、出卖、赠送、获得与丧失的权利也就相当于所有权，这就消灭了他们所赖以产生的平等。”

在真正的蒲鲁东那里，财产的创建人并不是由于关心自身的需要而忽略了财产的这种发展进程。他们只不过是没有预见到这一点。但是即使他们能够预见到这一点，在这种场合下也还是眼前的需要占上风。其次，真正的蒲鲁东太群众化了，所以他没有把转让、出卖等权利和“所有权”对立起来，也就是说，他没有把种和类对立起来。他是把“遗产的**保存**权”和“遗产的**转让**等权”对立起来，这才是真正的对立和真正的进步。

批判性的评注 3

“蒲鲁东根据什么来证明财产是不可能的？还不是根据那个平等的原则，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要相信这一点，埃德加尔先生只要稍微思索一下就够了。埃德加尔先生应当知道，布鲁诺·鲍威尔先生把“**无限**的自我意识”作为自己的一切论断的基础，甚至把这一原则看成福音的创造原则，而福音则由于其无限的无意识性似乎是和无限的自我意识直接矛盾的。同样，蒲鲁东把平等看成和平等直接矛盾的私有制的创造原则。如果埃德加尔先生把法国的平**等**和德国的“自我意识”稍微比较一下，他就会发现，后一个原则**按德国的方式**即用抽象思维的形式所表达的东西，就是前一个原则**按法国的方式**即用政治和思维直观的语言所表达的东西。自我意识是人在纯思维中和自身的平等。平等是人在实践领域中对自身的意识，也就是人意识到别人是和自己平等的人，人把别人当做和自己平等的人来对待。平等是法国的用语，它表明人的本质的统一、人的类意识和类行为、人和人的实际的同一，也就是说，它表明人对人的社会的关系或人的关系。因此，德国的破坏性的批判，在以**费尔巴哈**为代表对**现实的人**进行考察以前，力图用**自我意识**的原则来铲除一切确定的和现存的东西，而法国的破坏性的批判则力图用**平等**的原则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蒲鲁东对哲学很愤慨，这件事本身不能怪他。但他为什么愤慨呢？他认为，哲学到现在为止一直是不够实际的，它昂然骑在**思辨**的高头大马上，因此**人们**在它的面前显得过分渺小。但我认为，哲学是超实际的，也就是说，它到现在为止一直不外乎是事物现状的抽象表现；它总是受事物现状的前提所支配，并且总是把这些前提当做某种绝对的东西。”

哲学是事物现状的抽象表现这样一种看法，就其来源而言，则不是埃德加尔先生提出的，而是**费尔巴哈**提出的；费尔巴哈最先把哲学规定为思辨的和神秘的经验，并证明了这一点。可是埃德

加尔先生却能够赋予这种看法以一种独创的、批判的表现方式。这就是：费尔巴哈得出结论说，哲学应该从思辨的天国下降到人类贫困的深渊，而埃德加尔先生却相反，他教导我们说，哲学是超实际的。实际上倒不如说是这样：正因为哲学过去只是事物现状的超验的、抽象的表现，正由于它自己的这种超验性和抽象性，由于它**在想像中独立于**世界之外，所以它一定要幻想它高高地超越于事物的现状和现实的人之上；另一方面，因为哲学过去并没有**真正**独立于世界之外，所以它也就未能对世界做出任何**真正的判决**，未能对世界使用任何真正的鉴别力，也就是说，未能**实际地**干预事物的进程，而至多只是不得不满足于 in abstracto〔抽象形式的〕实践。所谓哲学是超实际的，这只是说它高高地君临于实践之上。批判的批判把全人类统统归之为一群没有创造精神的群众，这样它就最清楚不过地证明了，思辨的思维把现实的人看得无限渺小。旧思辨哲学在这一点上完全和批判不谋而合。例如，请大家看看黑格尔“法哲学”中的下面这一段话：

“从需要的观点看来，观念的具体对象就是我们称之为**人**的那种东西；因此，在这里——**实际上**也**只**在这里——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谈论人的。”[17]

思辨哲学家在其他一切场合谈到人的时候，指的都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是**抽象的东西**，即**理念**、**精神**等等。至于哲学应该怎样表现事物现状，这已由法赫尔先生对英国事物现状的描述和埃德加尔先生对法语的现状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绝妙的范例。

“可见，蒲鲁东也是很实际的：他发现了平等这个概念是证明财产的根据以后，就从这个概念出发来反对财产。”

蒲鲁东在这里的做法和德国批判家的做法是一样的，因为德国的批判家从关于人的观念——他们发现这种观念是证明神的存

在的根据—— 出发正是要反驳神的存在。

"如果平等的原则所造成的结果比平等本身更强有力，那末蒲鲁东怎么还要帮助这个原则获得这么意外的强力呢？"

按照布鲁诺・鲍威尔先生的意见，自我意识是一切宗教观念的基础；它构成福音的创造原则。但是为什么自我意识的原则所造成的结果在这里比自我意识本身更强有力呢？人们用纯粹德国的精神回答我们说，这是因为：自我意识固然是宗教观念的创造原则，但是它只有作为脱出自身、自相矛盾、自我外化和异化的自我意识，才能成为这种创造原则。因此，达到了自身、理解了自身、认识了自己本质的自我意识就支配着它的自我异化的各种产物。蒲鲁东的情形也完全是这样，当然还有所区别，这就是：他讲法语而我们讲德语，因此他用法国的方式表达我们用德国的方式所表达的东西。

蒲鲁东自己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平等作为理性的创造原则是财产赖以构成的基础，而作为这种理性的根据，它又是证明财产的一切论据的基础，既然如此，那末为什么不存在平等，反而存在对平等的否定—— 私有财产呢？所以蒲鲁东就对财产的事实本身进行考察。他证明，"事实上，财产作为一种制度和原则是**不可能**的"（第 34 页），也就是说，**它本身是自相矛盾的**，而且正在各方面消灭着自身；用德国的方式来说，它是自我外化、自相矛盾和自我异化的平等的定在。和对这种异化的认识一样，法国的事物现状也以充分的理由向蒲鲁东指明了真正消灭异化的必然性。

蒲鲁东在否定私有财产的同时，也感觉到需要对私有财产的存在作**历史**的辩解。像所有这一类最初的尝试一样，蒲鲁东的论断也带有实用的性质，这就是说，他假定过去的各代人都是完全

自觉地和深思熟虑地努力把他认为真正代表人类本质的平等思想体现在自己的各种制度中。

"我们一再地提起这一点……蒲鲁东是为了无产者的利益而写作的。"

是的,激励蒲鲁东去写作的不是自满自足的批判的利益,不是抽象的,人为的利益,而是群众的、现实的、历史的利益,是超过简单的**批判**的利益,也就是导致**危机**的利益。蒲鲁东不单是为了无产者的利益而写作,他本人就是无产者,ouvrier〔工人〕。他的著作是法国无产阶级的科学宣言,因而比起任何一个批判的批判家的拙劣的作品来,它都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意义。

"蒲鲁东是为了那些一无所有的人的利益而写作的。拥有和一无所有,在他看来是两个绝对的范畴。拥有在他看来之所以是最重要的东西,就因为在他的眼中不拥有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思考对象。蒲鲁东认为,每一个人都应当拥有,但是只应当和别人一样多。我必须说,在我所拥有的一切东西中,我感到兴趣的只是唯我独有的东西,我比别人多的东西。如果实行平等,那末,无论是拥有的事实,或者是平等本身,对于我都将是无关紧要的了。"

要是相信埃德加尔先生的话,那末**拥有**和**不拥有**对于蒲鲁东就真是两个绝对的**范畴**了。批判的批判到处都只看到一些范畴。例如,对埃德加尔先生说来,拥有和不拥有、工资、奖金、匮乏和需要、为满足需要而进行的劳动,所有这一切都无非是一些范畴而已。

如果社会所必须摆脱的只是**拥有**和不拥有这两个**范畴**,那末为社会"克服"和"扬弃"这两个范畴,对任何一个甚至比埃德加尔先生更低能的辩证论者说来,都该是一件多么轻而易举的事呵!埃德加尔先生也把这种"克服"看做微不足道的小事,甚至把仅仅针对蒲鲁东来稍微**说明**一下拥有和不拥有这两个范畴,都看做不值

得做的事情。但是，既然不拥有不只是一个范畴，而是最悲惨的现实，既然在我们这个时代一无所有的人也就是无，既然他连一般生存的必需资料都被剥夺（人类生存的资料则更是如此），既然不拥有就等于人完全脱离了他的实物性，那末，蒲鲁东把不拥有看做最重要的思考对象，就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正因为在蒲鲁东和所有的社会主义著作家以前很少有人考虑这个对象，所以这样做就更加正确。不拥有是最令人绝望的**唯灵论**，是人的最完全的非现实，人的非人生活的最完全的现实，是极其实际的拥有，即饥饿、寒冷、疾病、罪恶、屈辱、愚钝以及种种违反人性的和违反自然的现象的拥有。任何事物，凡是因人们初次充分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从而成为思索的对象，在一个研究者看来，它就是**最值得思考的对象**。

蒲鲁东想消灭不拥有和拥有的旧形式的愿望，和他想消灭人对自己的**实物本质**的实际异化关系、想消灭人的自我异化的**政治经济**表现的愿望是完全同一的。但是，由于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受着政治经济学的前提的支配，因此，蒲鲁东仍以政治经济学的**占有**形式来表现实物世界的重新争得。

批判的批判硬要蒲鲁东以拥有来反对不拥有：而蒲鲁东则相反，他以**占有**来反对**拥有**的旧形式——**私有制**。他宣称占有是“**社会的职能**”。在这种职能中“利益”不是要“排斥”别人，而是要把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本质力量使用出来和发挥出来。

蒲鲁东未能用恰当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思想。“**平等**占有”是政治经济的观念，因而还是下面这个事实的异化表现：**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在**政治经济的异化**范围内**来克服政治经济的异化。

赋予特征的翻译 3

批判的蒲鲁东也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批判的所有者**，

“这个所有者自己承认，那些为他工作的人所丧失的东西就是他所攫为己有的东西。”

群众的蒲鲁东对群众的所有者说：

“你工作过！你难道从来没有强迫别人为你工作？他们为你工作，你不为他们工作，但他们为你工作而丧失了的东西，你却能够攫为己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批判的蒲鲁东硬要萨伊把“自然的**占有物**”理解为《richesse naturelle》〔“自然的财富”〕，虽然萨伊为了消除任何的误解，曾在他那本“论政治经济学”的“概论”中十分明确地宣称，他所理解的财富既不是财产，也不是占有物，而是“价值的总和”。当然，批判的蒲鲁东也像埃德加尔先生改造他那样改造了萨伊。在批判的蒲鲁东看来，萨伊从土地比空气和水易于占有这个事实，“立即引伸出把田野变为财产的权**利**”。可是萨伊根本没有从土地比较容易占有这个事实引伸出土地所有**权**，相反地，他毫不含糊地说：《Les droits des propriétaires de terres—remontent à une spoliation》〔“土地所有者的**权利**是由**掠夺**而来的”〕（“论政治经济学”第三版第一卷第136页注释[18]）。所以，根据萨伊的看法，土地所有**权**的确立需要《concours de la législation》和《droit positif》〔“立法”和“实在法”的“促成”〕。真正的蒲鲁东并没有强迫萨伊从土地比较容易占有这个事实“立即”**引伸出**土地所有权来。他之责难萨伊，是因为萨伊用可能性来**代替**权**利**，把可能性的问题和权利的问题**混为一谈**：

“萨伊把可能性当做权利。人们并不是问为什么土地比海洋和空气容易占有，人们想知道的是，人根据什么**权利**把这种财富攫为己有。”

批判的蒲鲁东继续说道：

“对此**只**补充说明一点：人们在占有一块土地的同时还占有了一些其他的要素——空气、水、火：terra，aqua，aäre et igne interdicti sumus.〔我们被禁止获得土地、水、空气和火〕㊀。”

真正的蒲鲁东根本没有“**只**”补充说明这一点，相反地，他说他顺便（en passant）要读者“注意”空气和水的占有。在批判的蒲鲁东那里，罗马放逐命令格式是莫名其妙地硬凑在他的议论中的。他忘了说明禁令所指的“**我们**”是谁。真正的蒲鲁东则是向非所有者讲话：

“无产者们！……财产**把我们同社会隔绝起来**：terra etc interdicti sumus.〔我们被禁止获得土地等等〕。”

批判的蒲鲁东以下述方式对沙尔·孔德进行辩驳：

“沙尔·孔德认为，人要生活就必须有空气、食物和衣服。这些东西中的某几种，例如空气和水，据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此它们始终都是公有财产，而其他几种则为数有限，据说因此就成了私有财产。可见，沙尔·孔德是从有限和无限这两个概念出发来进行论证的。如果他把不必需和必需这两个概念当做主要范畴的话，他就可能会得出另一些结论。”

批判的蒲鲁东的这种辩驳是多么的幼稚！他建议沙尔·孔德抛弃他作为论证的出发点的那些范畴，而突然转而采用另一些范畴，为的是不得出他自己的结论，而是“**可能**”得出批判的蒲鲁东的结论。

㊀　这是古罗马放逐出国命令格式的释义。——编者注

真正的蒲鲁东并没有向沙尔·孔德提出这类建议。他不想用什么“可能”之类的字眼来同沙尔·孔德妥协，他是用沙尔·孔德自己的范畴来抨击沙尔·孔德。

蒲鲁东说，沙尔·孔德以空气、食物和衣服（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的必要性为出发点，这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不停止生活。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人因此（按照沙尔·孔德的看法）就需要经常不断地占有各种各样的物品。这些物品的数量是各不相同的。

“天体的光、空气和水的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致人不能使它们有显著的增减；所以每个人需要多少，就可以占有多少，同时**决不妨害别人去利用这些物品。**”[19]

蒲鲁东把沙尔·孔德自己的规定当做出发点。首先，他向孔德证明：土地也正好是第一必需品，因此它应该让每个人都有可能利用，但必须在孔德所指出的限度内——“**决不妨害别人去利用它**”。既然如此，那末土地究竟为什么成了私有财产呢？沙尔·孔德回答说：因为土地的数量**不是无限的**。可是他好像倒应该做出相反的结论：正因为土地的数量**有限**，所以它不能被占有。占有空气和水之所以不会妨害任何人，是因为它们在任何时候都是绰绰有余的，它们的数量是无限的。相反地，随意占有土地之所以妨害别人去利用土地，正是因为土地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土地的利用应该根据**大家**的利益来调整。沙尔·孔德的论证方式恰恰证明了和他的论点相反的东西。

“蒲鲁东（即批判的蒲鲁东）①推断：沙尔·孔德是从民族可以成为土地所有者这种观点出发的；可是，即使财产本身就产生使用和滥用的权利——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jus utendi et abutendi re sua〔使用和滥用自己财物的权利〕，那也不能承认民族有使用和滥用土地的权利。”

真正的蒲鲁东没有说所有权**“产生”**jus utendi et abutendi〔使用和滥用的权利〕。他是过于群众化了，所以不谈什么产生所有权的所有权。Jus utendi et abutendi re sua〔使用和滥用自己财物的权利〕也就是所有权本身。因此，蒲鲁东直截了当地否认人民对自己领土的所有权。他反驳那些认为这是夸大其词的人们说，在各个时代，人们都从这个臆造的民族所有权中引出了诸如宗主权、贡税、王侯的专卖权、徭役等等一类的东西。

真正的蒲鲁东发挥了下述的见解来反对沙尔·孔德：孔德想表明财产是怎样产生的，但他一开始就把民族是所有者当做一个前提提出来，也就是说，他陷入了 petitio principii㊀。他要国家出卖土地，要企业家购买这些土地，也就是说，他预先就把他想证明的那种**财产**关系本身当做前提肯定下来了。

批判的蒲鲁东推翻了法国的**十进制**。他保留了**法郎**，但是却用**“三分尼”**来代替**生丁**。

“蒲鲁东（批判的蒲鲁东）①补充道：如果我出让一块土地，那末，我就不仅使我自己丧失了本年的收获，而且还剥夺了我的儿孙的一种永恒的福利。土地有价值不仅仅是在今天，它还具有一种潜在的、未来的价值。”

真正的蒲鲁东谈的不是土地不仅今天有价值，而且明天也有价值；他是把完满的、现有的价值跟潜在的、未来的价值（这种价值取决于自己利用土地的本领）加以对比。他说：

㊀ 一种逻辑上的错误，即在证明某个论点时使用这样的论据，该论据本身只有在假定待证明的论点正确的条件下方才有效。——编者注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把你们这块地毁坏或者卖掉（这反正对你们是一样的），结果你们不仅会丧失一次、两次或许多次收获，而且还会失去你们——你们和你们的儿孙——从这块地里所能获得的全部产物。”

对蒲鲁东说来，重要的不是把一次的收获和永恒的福利（靠一块地所获得的金钱也能像资本一样变为“永恒的福利”）做对比，而是把现有的价值和土地由于继续耕作所能获得的价值做对比。

“沙尔·孔德说：我用我自己的劳动赋予物品的新价值是我的财产。蒲鲁东（批判的蒲鲁东）①却想以下述的说法来推翻他的这个论点：**在这种情况下**，一停止劳动，人也就应该不再是所有者了。产品所有权无论如何决不能产生对构成产品基础的材料的所有权。”

真正的蒲鲁东说：

“就算劳动者能占有他自己劳动的产品吧；可是我不懂为什么产品所有权必须产生对物质的所有权。在同一岸边捕鱼的渔夫中，捕鱼最多的渔夫难道就会因他捕鱼的本领高明而成为他捕鱼的那一地段的所有者吗？难道有猎人曾经因他猎术高明而获得对整个地区的野兽的所有权吗？农夫的情形也是如此。要把**占有**变为**财产**，除了要花费劳动外，**还**必须有**另外一个条件**；否则，只要人不再是一个劳动者，他也就立刻不再是一个所有者了。”

Cessante causa，cessat effectus〔原因一消逝，结果也随之消逝〕。如果一个所有者之为所有者，**只**由于他是一个劳动者，那末只要他不再是劳动者，他也就立刻不再成其为所有者了。

“因此，按照**法律**，财产是由**时效**造成的；**劳动**不过是占有赖以**表现**的一种显著的标志、一种物质的行为而已。”

蒲鲁东继续说道：“可见，通过劳动来占有物品的制度**是和法律相抵触的**。如果这种制度的拥护者硬说他们是用这种制度来解释法律，那末他们就会**自相矛盾**。”

---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其次，按照这种看法，如果说对土地的开垦“创造充分的土地所有权”，那末这种论断就正是 petitio principii[①]。其实，这里只创造了物质的新的生产能力。至于说因此也创造了对物质本身的所有权，那还需要加以证明。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

批判的蒲鲁东把格拉古·巴贝夫变成了争取自由的战士，而在群众的蒲鲁东那里，巴贝夫是作为争取**平等**的战士（partisan de l'égalité）出现的。

批判的蒲鲁东自告奋勇地给**荷马**的“伊利亚特”一诗规定了应付的稿酬，他说：

“我付给荷马的稿酬应当和他所**给予我**的东西相等。可是怎样确定荷马所给予我们的东西的价值呢？”

批判的蒲鲁东的确是过于鄙视政治经济学上的琐事了，所以他不知道物品的**价值**和该物品所**给予**别人的东西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物。真正的蒲鲁东说：

“诗人的稿酬应当和他的**产品**相等；可是这种产品的价值究竟是怎样的呢？”

真正的蒲鲁东认定“伊利亚特”具有无限大的**价格**（或交换价值，prix）；批判的蒲鲁东则断定它有无限大的价值。真正的蒲鲁东把“伊利亚特”的价值，即**它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下的**价值**（valeur intrinsèque），同它的交换价值（valeur échangeable）加以对比；而批判的蒲鲁东则把“伊利亚特”的“内在价值”，即它作

① 见本卷第56页编者注。——译者注

为一首史诗的价值，同它的“为交换的价值”加以对比。

真正的蒲鲁东说：

“物质报酬和才能没有共同的量度。在这方面一切生产者的状况都是相同的。因此，对他们做任何的比较和在按能力给报酬上做任何的分等都是不可能的。”（《Entre une récompense matérielle et le talent il n’existe pas de commune mesure; sous ce rapport la condition de tous les producteurs est égale; conséquemment toute compar— aison entre eux et toute distinction de fortunes est impossible.》）

批判的蒲鲁东则说：

“生产者的状况之相同**是相立的**。才能不能用物质来衡量…… 对生产者进行任何的比较和任何的**外部划分**都是不可能的。”

在批判的蒲鲁东那里，

“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应该**感觉到**自己在社会中是同其他一切人**平等**的，因为他的才能和他的洞察力都**只是**社会的洞察力的产物。”

真正的蒲鲁东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谈到有才能的人的感觉。他说，有才能的人应该降到社会的水平。他决没有断言有才能的人**只是**社会的产物。相反地，他说：

“有才能的人使自己锻炼成一个有用之材…… 在他身上隐藏着自由的劳动者和积累起来的社会资本。”

批判的蒲鲁东继续说道：

“此外，他应当感谢社会使他摆脱了其他各种工作，使他有可能致力于科学。”

真正的蒲鲁东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祈求有才能的人的感谢。他说：

“社会让艺术家、学者、诗人专心致志于科学和艺术，仅就这一点而言，他就已经获得了公平的报酬。”

最后，批判的蒲鲁东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奇迹：他硬要社会在150个劳动者当中保有一个“**元帅**”，因而也就要保有一支**军队**。在真正的蒲鲁东那里，这个“元帅”却大不了是一个“**铁匠**”（muréchal）罢了。

批判性的评注[4]

“如果他（蒲鲁东）①想保留工资的概念，如果他想把社会看做一个给我们工作并支付我们工作报酬的组织，那末，他就更没有理由把时间当做报酬的量度，因为他不久前曾跟着**胡果·格劳修斯**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在事物的**重要性**方面，时间是无关紧要的。”

唯有在这个地方批判的批判才企图解决自己的任务并企图向蒲鲁东证明：他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来反对政治经济学是不对的。但也正是在这里，批判真正以批判的形式**大出其丑**。

跟胡果·格劳修斯一样，蒲鲁东也发挥了这样的思想：**时效**不能作为变**占有**为**财产**、变一种“**法律原则**”为另一种“**法律原则**”的根据，这就像时间不能把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二直角这样一个真理变为另一个真理，即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三直角一样。

蒲鲁东大声疾呼地说：“你们决不可能使那本身什么都不能创造、什么都不能改变、什么都不能革新的时间把**使用**某物品的人**变为**该物品的**所有者**。”

于是埃德加尔先生就推而言之：因为蒲鲁东说，单是时间不能把一种法律原则**变为**另一种法律原则，而且时间本身又根本不能改变成革新任何东西，所以他把**劳动时间**当做劳动产品的政治经济学上的**价值**的量度，就表明他不是始终如一的。埃德加尔先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生之得以想出这个批判的批判的见解，是由于他把《valeur》〔“价值”〕译作《Geltung》〔“重要性”〕，因而有可能把这个词以同一种含义到处乱用，在谈到法律原则的意义时这样用，在谈到劳动产品的商业价值时也这样用。他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由于他把时间的空洞的延续和充实的劳动时间看成同样的东西。假使蒲鲁东说时间不能把苍蝇变为大象，那末批判的批判也同样可以推而言之：既然如此，他就没有理由把劳动时间当做工资的量度。

生产某个物品所必须**花费**的**劳动时间**属于这个物品的**生产费用**，某个物品的生产费用也就是它**值**多少，即它能卖多少钱（如果撇开竞争的影响），这一点甚至连批判的批判也不会不了解。除劳动时间和劳动材料外，经济学家还把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以及资本家的利息和利润也算入生产费用。在蒲鲁东那里，地租、利息和利润都消失了，因为在他那里私有财产消失了。于是剩下的只有劳动时间和预支费用。蒲鲁东既把劳动时间，即人类活动本身的直接定在，当做工资和规定产品价值的量度，因而就使人成了决定性的因素；而在旧政治经济学中决定性的因素则是资本和地产的物质力量，这就是说，蒲鲁东恢复了人的权利，虽然还是以政治经济学的、因而也是矛盾的形式来恢复的。他从政治经济学观点出发的这种做法正确到何种程度，可以从下述事实看出来：新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原富”[20]的头几页中发挥了这样的见解：在私有制确立以前，也就是在**不存在私有财产**的条件下，**劳动时间**曾经是**工资**以及与工资尚无区别的**劳动产品的价值**的量度。

然而就算批判的批判暂时假定蒲鲁东没有从工资的前提出发吧。难道它认为生产某件物品的必要时间将来总有一天会不成为

这件物品的“**重要性**”的本质因素吗？难道它认为时间在丧失着自己的**价值**吗？

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中，某物品是否应当生产的问题即物品的价值问题的解决，本质上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因为社会是否有时间来实现真正人类的发展，就是以这种时间的多寡为转移的。

甚至**精神**生产的领域也是如此。如果想合理地行动，难道在确定精神作品的规模、结构和布局时就不需要考虑生产该作品所必需的时间吗？否则，我至少会冒这样的危险：我思想中存在的事物永远不会变为现实中的事物，因而它也就只能具有想像中的事物的价值，也就是只有**想像的价值**。

以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对政治经济学所进行的批判，承认人类活动的一切本质规定，但只是在异化、外化的形式中来承认。例如，在这里它们时间对**人的劳动**的意义变为时间对**工资**、对雇佣劳动的意义。

埃德加尔先生继续写道：

“为了强迫有才能的人接受上述的量度，蒲鲁东竟**滥用自由交易**这个概念，并断言社会和社会的个别成员本来就有否弃有才能的人的作品的权利。”

在**傅立叶主义者**和**圣西门主义者**那里，两只脚继续站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有才能的人，提出了**对稿酬**的过高**要求**，并把他关于自己是无价之宝的幻想提出来作为确定其作品的**交换价值**的标准。蒲鲁东对有才能的人的这些奢望所做的回答，跟政治经济学对任何企图使价格大大超过所谓自然价格（即物品的生产费用）的野心所做的回答一样，这就是说，他指出自由交易来作为回答。同时，蒲鲁东并没有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滥用**这种关系，

相反地，他把被经济学家看做只是有名无实虚无缥缈的东西，即立约双方的自由，肯定为现实的东西。

赋予特征的翻译 4

批判的蒲鲁东彻底改造了法国的资产阶级，也同样彻底改造了法国的无产者，从而终于改造了**法国社会**。

他否认法国的无产者有“**力量**”，而真正的蒲鲁东却是责备法国无产者没有**德行**（vertu）。他把他们在工作中的**熟练**变成了靠不住的熟练——“你们在工作中**可能**是敏捷的”，——而真正的蒲鲁东却无条件地承认他们在工作中的敏捷（《prompts au travail vous têes》etc.〔“你们在工作中是敏捷的”等等〕）。他把法国的资产者变成了**愚蠢的**市民，而真正的蒲鲁东则是把卑下的资产者（bourgeois ignobles）跟声名狼藉的“高贵的”（nobles flétris）资产者加以对比。他把资产者从代表中庸之道的市民（bourgeois juste－milieu）变成了“我们的**善良的**市民们”，为此法国资产阶级可能会向他称谢不止的。在真正的蒲鲁东谈到法国资产者的“**邪恶**意志”（《la malveillan－ce de nos bourgeois》）日益滋长的地方，批判的蒲鲁东却偏偏老是说“我们的市民们的**无忧无虑**”在与日俱增。真正的蒲鲁东的资产者远不是无忧无虑的，他向自己喊道：《N’ayons pas peur！N’a－yons pas peur！》〔“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只有那种想靠大喊大叫来驱散恐惧和忧虑的人才会这样说话。

批判的批判通过翻译真正的蒲鲁东的著作创造了一个批判的蒲鲁东，从而向群众表明，什么是批判地完成的译文。它向我们表明了什么是“恰如其分的翻译”。因此他有充分的权利攻击那些拙劣的、群众的译品：

“德国公众想以极低廉的价格获得出版物，因此出版商就想有廉价的译品，译者不愿在工作中饿死；他甚至不能以深思熟虑的态度（以完全是认识的宁静的态度）①来进行自己的工作，因为出版商必须使译品迅速出版问世，以赶过竞争者。此外，甚至译者也得担心竞争：他得担心有别的译者索价更低并且更快地完成工作。于是他立刻匆匆忙忙地把自己的手稿口授给某个穷缮写员，同时尽可能念得快些，免得按小时拿工钱的缮写员占了便宜。如果第二天他能把稿子交给不断催促他的排字工，那他就算万幸了。何况，在我们的书市上泛滥的各种译品只不过是德国文坛目前**萎靡不振**的一种表现罢了。”如此等等（“文学总汇报”第 8 期第 54 页）。

批判性的评注[5]

“蒲鲁东根据人类因利息和利润制度以及消费和生产的不平衡而特别遭到损害这一点，得出了财产不可能的证明；这个证明缺少一个能补其不足的反面，即证明私有财产在历史上是可能的。”

希图侥幸的本能使批判的批判决定不去深究蒲鲁东关于利息和利润制度等等的论断，也就是说，不去深究蒲鲁东的一些最重要的论断。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关于私有制运动问题的十分实际的知识，要想在这一点上批判蒲鲁东，哪怕只是做个批判的样子，也完全是不可能的。于是批判的批判指出蒲鲁东没有提供私有财产的历史可能性的证明，企图以此弥补自己的无能为力。可是，除了空话就什么也没有提供的批判为什么偏要求别人给它提供**一切**呢？

“蒲鲁东用来证明财产不可能的论据是：工人不能用自己劳动所得的钱买回自己的产品。蒲鲁东在证明这个论点时探究了资本的实质，但却没有提出详尽透澈的论据。工人之所以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就因为产品总是社会的产品，而工人本身则不外乎是单个的被雇用的人罢了。”

---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为了再详尽透澈一些，埃德加尔先生也许应该一反蒲鲁东的推论说，工人之所以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是因为他怎么也不得不去把它**买回来**。在购买的定义中就已经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工人把自己的产品当做脱离了他自身的、异化了的对象来对待。顺便说一句，埃德加尔先生的详尽透澈的论据并没有详尽透澈地说明，为什么资本家（他自己也**不外乎是单个的**人，而且还是**被**利润和利息**所雇用的**人）不仅能买到劳动产品，而且还能买到比劳动产品更多的东西，要说明这一点，埃德加尔先生就必须说明劳动和资本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必须去探究资本的实质。

从批判的著作中摘引出的这几段话再明显不过地表明，批判的批判怎样利用它刚从某个作家那里学来的东西，并在改成批判的说法以后立刻把它当做自己的天才发明，拿来反对那个作家。要知道，批判的批判正是从蒲鲁东那里汲取了这个似乎未曾被蒲鲁东引用过而现在正被埃德加尔先生使用着的论据。蒲鲁东说：

> “Divide et impera…〔分而治之……〕，如果把工人分离开，那末，付给每一个单个的人的日工资就很可能超过每一单个人的产品的价值；但问题不在这里……　你们给一切个人力量支付了报酬，但这并不就等于给集体的力量支付了报酬。”

蒲鲁东**最先**注意到：付给单个工人的工资的总和，即使在每一单个人的劳动都完全得到了报酬的情况下，也还是不足以偿付物化在大家的产品中的集体力量；因此，工人不是作为**集体劳动力的一部分**而被雇用的。埃德加尔先生歪曲了这个思想，他硬说工人不外乎是单个的被雇用的人。这样，批判的批判就利用了蒲鲁东的**总的**思想，并用它去反对同一个蒲鲁东的同一种思想的进一步的**具体**发挥。它用批判的方式掌握这个思想，并在下面这几

句话中暴露了**批判的社会主义**的秘密：

“现在的工人只**考虑**自己，也就是说，他以为他只是作为一个人而得到报酬的。不是别人，正是**工人自己**不考虑他在同别的力量合作中所产生的那种巨大的、不可比拟的力量。”

照批判的批判的意见，一切祸害都只在工人们的“**思维**”中。的确，英国和法国的工人组织了各种团体，在这些团体中，工人们所议论的话题不仅有他们作为**工人**所应有的直接需要，而且也有他们作为**人**所应有的各种需要。工人们组织这些团体，就表明他们非常彻底而广泛地理解从他们的合作中所产生的那种“豆大的”、“不可比拟的”力量。但是这些**群众**的共产主义的工人，例如在曼彻斯特和里昂的工场中做工的人，并不认为用“**纯粹的思维**”即单靠一些议论就可以摆脱自己的主人和自己实际上所处的屈辱地位。他们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远不是想像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而批判的批判却相反，它教导工人们说，只要他们在思想中消除了雇佣劳动的想法，只要他们在思想上不再认为自己是雇佣工人，并且按照这种过于丰富的想像，不再设想自己是作为单个的人来支取工钱的，那末他们就会真的不再是雇佣工人了。从这以后，作为绝对的唯心主义者，作为以太的生物，他们自然就可以靠纯思维的以太来生活了。批判的批判教导工人们说，只要他们在思想上产除了资本这个范畴，他们也就消除了真正的资本；只要他们在自己的意识中改变自己这个“**抽象的**

我”，并把**真正**改变自己的现实的生存、改变自己生存的现实条件、即改变自己这个**现实的“我”**的任何行动当做非批判的行为加以鄙弃，他们就会**真正**发生变化并转化为现实的人。把实在的现实只看做一些范畴的**“精神”**，当然要把人的一切活动和实践统统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辩证思维过程。**它的**社会主义同**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也就在这里。

埃德加尔先生发表了自己的这番宏论之后，当然是应该“否认”蒲鲁东的批判具有“意识”了。

> “**但是**蒲鲁东**也**想成为**讲求实际**的人。”“他认为他已经有了认识”“虽然如此”，认识的宁静得意洋洋地大声叫道，“但我们现在也还是应该否认他有**认识的宁静**。”“我们从他的著作中摘引几处，以表明他怎样很少考虑自己对社会的态度。”

在后面我们还要从批判的批判的著作中摘引几处（见“贫民银行”和“模范农场”），以表明它怎样连最基本的经济关系都还未能认识，更谈不到加以考虑，因而就以它所特有的批判的机敏，感到自己有责任对蒲鲁东进行批判的分析。

在批判的批判作为认识的宁静**“制服了”一切群众的“对立面”**之后，在它用范畴的形式掌握了整个现实并把人的一切活动消融在思辨的辩证法中之后，我们将看到，它又在用思辨的辩证法重新创造世界。不言而喻，以批判的思辨形式来创造世界的这种奇迹，为了不致遭到“亵渎”，只能用**神秘剧**的形式晓诸未入圣门的群众。于是，维什努—施里加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就以**贩卖秘密的商人**[21]的姿态出现了。

第五章
贩卖秘密的商人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或施里加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施里加—维什努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把“巴黎的秘密”①崇奉为神。欧仁·苏被誉为“批判的批判家”。要是他知道这件事，一定会像莫里哀的醉心贵族的小市民一样惊叫起来：

“天哪！我原来说了四十多年的散文，自己一点还不知道呢，您今天把这个告诉我，我对您真是万分的感激。”[22]

施里加先生在批判之前，先来一个**美学的**小引。

“美学的小引”对“批判的”史诗的普遍意义，特别是对“巴黎的秘密”的普遍意义，作了如下的阐述：

“史诗创造这样一种思想：现在本身是无，它甚至不仅是（是**无**，甚至不仅是！）②**过去**和**未来**的永恒的**分界线**，而且还是（是无，甚至不仅是，而且还是！）③**应该**经常加以**填充**的、把**永生**和**无常**分隔开来的**裂口**……　**这就是**‘巴黎的秘密’的**普遍意义**。”

接着，“美学的小引”又断定说：“如果**批判家**有这样的愿望，那末，他也可能成为**诗人**。”

---

① “巴黎的秘密”是法国作家欧仁·苏写的小说，该书宣扬了社会改良的思想。——译者注

②③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施里加先生的整个批判都将证明这种论断的正确性。这一批判的一切组成部分都是**“诗作”**。

同时，这一批判又是“美学的小引”所规定的“自由艺术”的产物，也就是说，它“发现了**绝对是从来还没有过的、崭新的东西**”。

最后，这一批判又是“应该经常加以填充的、把永生（施里加先生的批判的批判）[①]和无常（欧仁·苏先生的小说）[②]分隔开来的裂口”，所以它甚至还是**批判的史诗**。

（1）“文明中的野蛮的秘密”和“国家中的无法纪的秘密”

谁都知道，**费尔巴哈**把基督教关于投胎降世、三位一体、永生不灭等等的观念看做投胎降世的秘密、三位一体的秘密、永生不灭的秘密。施里加先生则把现今人世的一切关系都看做秘密。如果说**费尔巴哈**揭露了**现实的秘密**，那末**施里加**先生却反而把现实的**平凡的东西**变成了**秘密**。他的本领不是要揭露被掩盖的东西，而是要掩盖已经被揭露的东西。

于是，他把文明中的野蛮（罪犯的存在）和国家中的无法纪与不平等都说成**秘密**。二者必居其一：不是施里加先生把揭露了这些秘密的社会主义文学依旧看做一种秘密，就是他想把这种文学的最著名的结论变成“批判的批判”的私人的秘密。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深入探讨施里加先生关于这些秘密的论断，而只指出最精彩的几点。

“在法律和法官面前，所有的人不论富贵贫贱都**一律平等**。这一原理在**国**

---

①　②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家的信条中占着首要的地位。”

是国家的吗？恰恰相反，大多数国家的信条都一开始就规定富贵贫贱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

“宝石匠莫莱尔①十分诚实而清楚地说出了秘密（即贫富对立的秘密）②的本质。他说：但愿富人也知道这一点！但愿富人也知道这一点！可是不幸得很，他们不知道贫穷是什么。”

施里加先生不知道：欧仁·苏由于要对法国资产阶级礼貌一些而把**时代弄错了**，他把路易十四时代市民阶级常说的“呵！但愿皇上也知道这一点！”改成“呵！但愿富人也知道这一点！”，再借“宪章真理”[23]时代的工人莫莱尔之口说了出来。这种贫富间的**质朴**关系至少在英国和法国已解不再存在了。富人手下的学者即经济学家们就在这里传播关于贫穷这种肉体贫困和精神贫困的非常详细的见解。他们用安慰的口吻证明说，因为要保持事物的现状，所以这种贫困似乎也应保存下来。甚至他们很细心地计算出，穷人为了富人和自己本身的福利应该按什么**比例**通过各种死亡事件来缩减自己的人数。

欧仁·苏描写的是罪犯的酒吧间、巢穴和言谈，而施里加先生却发现了一个“**秘密**”，即“作者”的目的并不是要描写罪犯的言谈和巢穴，而是要

“研究作恶的动机的秘密…… 因为正是在这些交往最活跃的地方……罪犯们才是**无拘无束的**”。

假使有人向自然科学家论证，蜂房并不是作为蜂房而引起自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 译者注
②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 译者注

然科学家的兴趣，这些蜂房就是对于没有研究过它的人来说也不会成为秘密，因为只有在新鲜空气中和花朵上蜜蜂“才是无拘无束的”，那末，自然科学家将何言以对呢？罪犯的巢穴和他们的言谈反映罪犯的性格，这些巢穴和言谈是罪犯日常生活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所以描写罪犯必然要描写到这些方面，正如描写 femme galante〔情妇〕必然要描写到 petite maison〔幽会密室〕一样。

罪犯的巢穴不仅对一般的巴黎人，就是对巴黎的警察都是“秘密”，所以，为了使警察能到这些偏僻的角落里去，现在正在巴黎最古老的地方铺设具有照明设备的宽广的马路。

最后，欧仁·苏自己宣布，他描写上述一切是为了投合读者“又害怕又好奇的心理”。欧仁·苏先生所有的小说都是为了投合读者又害怕又好奇的心理。只要举出“阿达尔·居尔”，“火蛇”，“普利克和普洛克”等等小说，就足够说明这一点了。

(2) 思辨结构的秘密

对“巴黎的秘密”所做的批判的叙述的秘密，就是**思辨的黑格尔结构**的秘密。施里加先生把“文明中的野蛮”和“国家中的无法纪”说成秘密，也就是把它们消溶在**“秘密”**这个范畴之中，接着就迫使“秘密”开始自己的**思辨的生命历程**。要指出这种思辨结构的**总的**特点，只要几句话就够了。施里加先生对“巴黎的秘密”的论述就是对思辨结构的**各个细节**方面的运用。

如果我从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中得出**“果实”**这个一般的观念，如果再进一步**想像**我从现实的果实中得到的**“果实”**〔《die Frucht》〕这个抽象观念就是存在于我身外的一种本质，而且是梨、

苹果等等的**真正**的本质，那末我就宣布（用**思辨的话**说）“**果实**”是梨、苹果、扁桃等等的“**实体**”，所以我说：对梨说来，决定梨成为梨的那些方面是非本质的，对苹果说来，决定苹果成为苹果的那些方面也是非本质的。作为它们的本质的并不是它们那种可以感触得到的实际的定在，而是我从它们中抽象出来又硬给它们塞进去的本质，即我的观念中的本质——“**果实**”。于是我就宣布：苹果、梨、扁桃等等是“**果实**”的简单的存在形式，是它的**样态**。诚然，我的有限的、基于感觉的理智**辨别出**苹果不同于梨，梨不同于扁桃，但是我的思辨的理性却说这些感性的差别是非本质的、无关重要的。思辨的理性在苹果和梨中看出了**共同的东西**，在梨和扁桃中看出共同的东西，这就是“**果实**”。具有不同特点的现实的果实从此就只是**虚幻**果实，而它们的真正的本质则是“**果实**”这个“实体”。

用这种方法是得不到内容特别**丰富的规定**的。如果有一位矿物学家，他的全部学问仅限于说一切矿物实际上都是“矿物”，那末，这位矿物学家不过是**他自己想像中**的矿物学家而已。这位思辨的矿物学家看到任何一种矿物都说，这是“**矿物**”，而他的学问就是天下有多少种矿物就说多少遍“矿物”这个词。

思辨的思维从各种不同的现实的果实中得出**一个**抽象的“果实”——“一般果实”，所以为了要达到某种现实内容的假象，它就不得不用这种或那种方法从“**果实**”、从**实体**返回到现实的**千差万别**的平常的果实，返回到梨、苹果、扁桃等等上去。但是，要从现实的果实得出“**果实**”这个抽象的观念是很容易的，而要从“**果实**”这个抽象的观念得出各种现实的果实就很困难了。不但如此，要从抽象转到抽象的**直接对立面**，不**抛弃**抽象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此，思辨哲学家抛弃了“**果实**”这个抽象，但是，他是用

一种**思辨的、神秘的**方法来抛弃的，就是说，使人看来好像他并**没有**抛弃抽象似的。因此他事实上也只是在表面上越出了抽象的圈子而已。他的议论大抵是这样：

如果说苹果、梨、扁桃、草莓实际上不外是“一般实体”、“一般果实”，那末，试问，这个“一般果实”又怎么会忽而表现为苹果，忽而表现为梨，忽而又表现为扁桃呢？和我关于**统一体**、关于“一般实体”、关于“一般果实”的思辨观念显然相矛盾的**多种多样的外观**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思辨哲学家答道：这是因为“一般果实”并不是僵死的、无差别的、静止的本质，而是活生生的、自相区别的、能动的本质。普通果实的千差万别，不仅对我的感性的理智，而且对“一般果实”本身，对思辨的理性都是有意义的。通常的千差万别的果实是“**统一的**果实”的生命的不同表现，它们是“一般果实”本身所形成的一些结晶。因此，比如说，在苹果中“一般果实”让自己像苹果一般存在，在梨中就让自己像梨一般存在。因此，我们就不能根据我们从实体观念得出的看法再说梨是“**果实**”，苹果是“**果实**”，扁桃是“**果实**”；相反地应该说“**果实**”确定自己为梨，“**果实**”确定自己为苹果，“**果实**”确定自己为扁桃；苹果、梨、扁桃相互之间的差别，正是“**果实**”的自我差别，这些差别使各种特殊的果实正好成为“一般果实”生活过程中的千差万别的环节。这样，“**果实**”就不再是无内容、无差别的统一体，而是作为**总和**、作为各种果实的“**总体**”的统一体，这些果实构成一个“**被有机地划分为各个环节的系列**”。在这个系列的每一个环节中“**果实**”都使自己得到一种更为发展、更为显著的定在，直到它最后作为一切果实的“概括”，同时成为活生生的**统一体**。这统一体把单个的果实都消溶于自身中，又从自身生出各种果实，正

如人体的各部分不断消溶于血液，又不断从血液中生出一样。

可见，基督教认为只有**一个**上帝的化身，而思辨哲学却认为有多少事物就有多少化身，譬如在现在这个例子里，在思辨哲学看来，每一个单个的果实就都是实体的，即绝对果实的特殊化身。所以思辨哲学家最感兴趣的就是把现实的、普通的果实的**存在**制造出来，然后故弄玄虚地说：苹果、梨、扁桃、葡萄存在着。但是我们在思辨的世界里重新得到的这些苹果、梨、扁桃和葡萄却最多不过是**虚幻**的苹果、梨、扁桃和葡萄，因为它们是“一般果实”的生命的各个环节，是**理智所创造的**抽象**本质**的生命的各个环节，因而本身就是**理智的**抽象**产物**。我们在思辨中感到高兴的，就是重新获得了各种现实的果实，但这些果实已经是具有更高的神秘意义的果实，它们不是从物质的土地中，而是从我们脑子的以太中生长出来的，它们是“一般果实”的化身，是绝对主体的化身。因此，我们从抽象，从“一般的果实”这一**超自然的**理智的本质回复到现实的**天然的**果实，却反而使这些天然的果实具有了一种超自然的意义，把它们变成了纯粹的抽象。所以，现在我们应该注意的主要正是证明“一般果实”在它的一切生活表现中—— 在苹果、梨、扁桃等等中的**统一性**，也就是证明这些果实的**神秘的相互联系**，证明“一般果实”怎样在这些果实的每一种中**渐次地**实现自身，并怎样**必然地**从自己的一种存在形式转到另一种形式，例如，从葡萄转到扁桃。因此，通常的果实的意义现在**已经不**在于它们的**天然**属性，**而**在于使它们在**“绝对果实”**的生命过程中取得一定地位的**思辨**属性。

一个普通人说苹果和梨存在着的时候，他并不认为自己说出了什么特殊的东西。但是，如果哲学家用思辨的术语说出这些存在的东西，那他就是说出了**不平凡的东西**。他完成了一个**奇迹**：他

从“一般果实”这个非现实的、**理智的本质**造出了现实的**自然的实物**——苹果、梨等等，就是说，他从他**自己的抽象的理智**（即他以为在他身外的一种绝对主体，在我们的例子中就是“一般果实”）中**创造出**这些果实。每当思辨哲学家宣布这些或那些实物存在时，他就是进行了一次创造。

显而易见，思辨哲学家之所以能完成这种不断的创造，只是因为他把苹果、梨等等东西中为大家所知道的、实际上是有目共睹的属性当做他自己**发现**的规定，因为他把现实事物的**名称**加在只有抽象的理智才能创造出来的东西上，即加在抽象的理智的公式上，最后，因为**他**把自己从苹果的观念**推移**到梨的观念这种他**本人**的活动，说成“一般果实”这个绝对主体的**自我活动**。

这种办法，用思辨的话来说，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施里加先生，先作这些论述是必要的。如果说施里加先生过去一直把现实的关系（例如法纪和文明）消溶在秘密这个范畴中，并且用同样的方法把**“秘密”**变为实体，那末，现在他才第一次登上了真正思辨的、**黑格尔的**高峰，并把**“秘密”**变成了**体现**为现实的关系和人的独立主体。于是，伯爵夫人、侯爵夫人、浪漫女子、看门人、公正人、江湖医生、桃色事件、舞会、木门等等就成了这种主体的生活表现。起初他从现实世界造出**“秘密”**这一范畴，而现在又从这一范畴造出现实世界。

施里加先生笔下的**思辨结构**的秘密**很清楚地**显示出他比之**黑格尔**无疑具有**两大**优点。第一、黑格尔善于用巧妙的诡辩把哲学家利用感性直观和表象从一实物推移到另一实物时所经历的过

程，说成想像的理智本质本身即绝对主体本身所完成的过程。第二、黑格尔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住事物本身的、**真实的**叙述。这种思辨发展**之中**的现实的发展会使读者把思辨的发展当做现实的发展，而把现实的发展当做思辨的发展。

在施里加先生那里就没有这两种困难。他的辩证法丝毫没有故作玄虚。他以极其诚实而坦白的态度来表演他的技巧。而且他不在**任何地方**渗入**现实的内容**，所以他的思辨结构没有任何碍手碍脚的附属物，它给我们看到的不是任何模棱两可的外表，而是赤裸裸地表露出来的美。此外，在施里加先生那里出色地表明思辨怎样一方面看起来好像是自由地从自身中 a priori〔先验地〕造出自己的对象，另一方面，由于想用诡辩来摆脱对**对象**的合理的、自然的依存性，又怎样正好陷入对对象的最不合理的、非自然的**从属性**，而不得不把对象的最偶然的和最独特的规定说成绝对必然的和普遍的规定。

（3）“有教养的社会的秘密”

欧仁·苏带着我们看了社会的最下层，拜访了罪犯的酒吧间等等，然后又把我们引到了上流社会，引到了圣热尔门区的**舞会**上。

施里加先生关于这种**推移**做了如下的解释：

> “**秘密**总力图用新的转变来逃避考察。它以前一直作为一种绝对猜不透的、完全不可捉摸的、否定的东西同真实的、实在的、肯定的东西相对立；而现在它又作为后者的**不可觉察的内容**而渗入了后者。但是这样一来秘密也就消除了被认识的绝对不可能性。”

“秘密”过去一直同“真实的”、“实在的”、“肯定的”东西，

即同法纪和教养相对立，“而现在它又……渗入了后者”，即渗入了教养的领域。至于只有上流社会才能代表教养的领域这一点，则是一个秘密，即使**不是巴黎本身的**秘密，也是巴黎**所不了解**的秘密。施里加先生没有从罪犯世界的秘密推移到贵族社会的秘密，而是使“秘密”成了有教养的社会的“不可觉察的内容”，成了它的**真正的本质**。这**并不**是施里加先生为了要开辟进一步考察的道路而作的“**新的转变**”，而是“**秘密**”本身为了要使**自己**能逃避考察而作的“新的转变”。

施里加先生在真正跟着欧仁·苏到他一心向往的地方，即到贵族的舞会以前，又采取了 a priori〔**先验地**〕构成的思辨的**虚伪**转变。

“**显然**，秘密总**力图躲藏**在非常坚固的外壳中，这是可以**预见**的。**而在事实上也好像是**我们面临着**无法克服的不可人性**……**因此**，可以**预料**，**大体**说来，……寻根究底的新尝试**在这里毕竟**还是**不可缺少的**。”

够了！施里加先生在这件事情上获得这样多的成就，以至

“**秘密**这一**形而上学的**主体就显得轻浮佻达，无拘无束，卖弄风情了”。

为了要把贵族社会变成“秘密”，施里加先生企图通过几次思考来弄清“**教养**”的含意。他总是先给贵族社会全面地加上一些谁也不会到它里面去寻找的性质，以便后来再去发现贵族社会并不具备这些性质这一“秘密”。然后他就把这一发现当做有教养的社会的“秘密”。施里加先生给自己提出了如下的一些问题：“**普遍**理性”（大概是思辨的逻辑吧？）是不是有教养的社会中“**社交谈话**’的话题？“是不是**只有**对人的爱的**韵律**和**拍节**才使”这个社会“成为和谐的整体”？“我们称之为**一般教养**的东西是否就是**普遍的、永恒的、理想的东西的**形式”，也就是说，我们称之为教养

的东西是否就是形而上学的想像的结果?施里加先生不难 a priori〔先验地〕预言他自己的问题的答案:

“**但是**,可以**逆料**……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在欧仁·苏的小说中,从平民社会转到贵族社会的过程是通过写作小说的一般手法来完成的。盖罗尔施坦公爵**鲁道夫**①**的乔装**使他得以深入社会的下层,正如他的身分使他得以接近社会的上层一样。在赴贵族舞会的路上,他所考虑的决不是周围的各种生活的对照,他感到**最够味**的只是他**自己的**各种乔装的对照。他告诉他最顺从的同伴,他怎样在各种不同的境遇中感到极其有趣。

他说:“我觉得这些对照真够味。昨天我是一个画家,呆在费维街的一间小房子里画扇面;今天早上我以店伙的身分,用黑醋栗酒招待皮普勒太太;而今晚呢,我又是靠神的恩惠支配这个世界的一个特权者。”

被请到舞会上去的批判的批判唱道:

“我在地上的诸神中逍遥,
我的神识几乎已经缥缈!”[24]

批判的批判在下面的**颂歌**中吐露了心曲:

“这里出现了魔术般的奇迹,在黑夜里阳光普照,在寒冬里显出春天的葱绿和夏天的繁茂。我们立即产生了这样一种心情:我们相信人们心中有神明存在的奇迹,尤其是当美妙和优雅使我们完互相信理想已经近在咫尺的时候。”(!!!)②

批判的乡村牧师,你多没有经验,多轻信呵!只有你那批判的纯朴才能从雅致的巴黎舞厅立即转入这样一种迷信的心情,以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② 括弧里的惊叹号是马克思加的。——译者注

致相信“人们心中有神明存在的奇迹”，从巴黎的迷人的女人中看出“近在咫尺的理想”，天使的化身。

批判的牧师因为天真**得极其可爱**，决定偷听两个“绝代佳人”克雷门斯·达尔维尔[1]和萨拉·麦克格莱哥尔伯爵夫人[2]的谈话。你们猜猜他想从这两位美人那里**“偷听”**些什么？他想听

“我们怎样才能为可爱的孩子们**祝福**，怎样才能使丈夫得到**最大的**幸福……　我们听着……我们惊奇……我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当这位偷听私话的牧师大失所望的时候，我们却不觉暗自幸灾乐祸。两位太太谈的既不是“祝福”，又不是“最大的幸福”，也不是“普遍的理性”，相反地，“却是从恿达尔维尔夫人不忠于她的丈夫。

关于这两位太太中间的另一位，麦克格莱哥尔伯爵夫人，我们却得到下面的纯朴的说明：

她“**真够有进取心**，居然在秘密结婚**以后**生下了**孩子**”。

伯爵夫人的这种**进取精神**使施里加先生大为不满，以致对她加以严厉的训诫：

“我们发现，伯爵夫人一心只想获得个人的私利。”

她能如愿以偿，嫁给盖罗尔施坦公爵，这在施里加先生看来并不见得有什么好处。

“我们**绝不**能指望她的出嫁会给盖罗尔施坦公爵的**臣民**带来**幸福**。”

我们的这位清教徒在结束自己的训诫时“郑重其事地”指出：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鲁道夫的情妇。——译者注

②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鲁道夫的第一个情妇。——译者注

“萨拉（**有进取心的**太太）①虽然是这个光彩夺目的圈子中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但是，她在这个圈子中未必是一个例外。”

虽然！但是，未必！难道说这个圈子中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不是例外吗？

关于另外两位理想人物——达尔维尔侯爵夫人②和德·吕逊纳公爵夫人③的性格，我们听到下面的话：

她们“得不到内心的满足。她们没有从婚姻生活中找到爱的对象，因此就到婚姻生活以外去寻找爱的对象。婚姻生活中的爱情对她们说来依然是一个**秘密**，她们为内心的强烈的冲动所驱使，力图把这秘密揭穿。**因此**，她们就沉醉于**秘密的爱情**。这些没有爱情的结婚的牺牲品，会不自主地把爱情本身降低为一种外表的东西，降低为一种所谓的男女关系，而把浪漫的因素，即**秘密**，当做爱情中的内在的、令人振奋的、本质的东西”。

这种辩证的阐述愈适用于生活的一切场合，我们对它的功绩的评价也就应该愈高。

例如，不敢在自己家里**饮酒**而又想痛饮的人，就到家庭**“以外”**去寻找饮酒的“对象”，“因此”，就沉醉于**秘密的饮酒**。而且有一种无法克制的力量促使他把秘密当做饮酒的本质的要素，然而他不会把饮酒降低为纯“外表的东西”，可有可无的东西，就像上述的几位太太不会把爱情降低到这种程度一样。因为根据施里加先生本人的说明，她们并不是把爱情，而是把没有爱情的结婚降低到它的本来面目，就是说降低到一种外表的东西，降低到一种所谓的男女关系。

施里加先生接着问：“爱情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②③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

把“秘密”说成这种爱情的“**本质**”这一说法我们刚才领教过了。那末，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才能找出秘密之秘密，本质之本质呢？

牧师先生朗诵道：“不是万绿丛中的林荫小道，不是月明之夜的**自然的**蒙胧，也不是华贵的窗帘和帷幔造成的人工的蒙胧。不是那竖琴和风琴的柔和而又令人着迷的乐声，不是禁物的诱惑力……”

窗帘**和帷幔**！柔和**而又**令人着迷的乐声！还有**风琴**！牧师先生，你还是把**教堂**忘了吧！谁会抬着风琴去幽会呢？

“所有这一切（窗帘、帷幔和风琴）①不过是一种**秘密的东西**。”

那末难道这种**秘密的东西**不就是秘密的爱情的“秘密”吗？决不可能：

“爱情中的秘密是令人激动、陶醉、着迷的那种东西，是**情欲的威力**。”

在“柔和而又**令人着迷的**”乐声中，牧师先生就已经拥有能使人着迷的东西了。如果他不是带着窗帘和风琴，而是带着鼈羹和香槟酒去幽会，那他也不会缺少“**令人激动**和**陶醉**”的东西。

圣者教训说：“诚然，我们不想承认情欲的威力，但是正因为我们要把它从自身清除出去，正因为我们不承认它是我们自己的本性，它对于我们才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假如我们承认它是我们自己的本性，那末当它力图牺牲理性、真正的爱情和意志力以表现自己时，我们立刻就可以克制它。”

依照思辨的神学的精神，牧师劝我们**承认**情欲是我们**自己的**本性，说这样才能在以后去**克制**它，即撤回这种承认。如果情欲想牺牲**理性**（同情欲**相对立**的意志力和爱情是属于**理性**的领域的）以表现自己，他诚然是要立刻加以克制的。但是只要情欲不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力图牺牲真正的理性，即信仰，牺牲真正的爱情，即对上帝的爱，牺牲真正的意志力，即基督的意志，以表现自己，那末，就是非思辨的基督徒也是会承认情欲的。

牧师再说下去就立刻向我们泄露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真正的见解：

“因此，只要爱情不再是结婚的本质、一般伦理的本质，**情欲**就成为爱情、道德和有教养的社会的秘密。这里的情欲不应该仅作**狭**义的理解，即理解为**神经的颤动**、血管中的**热流**，而且还要作更广义的理解，即理解为它提高到精神力量的**外观**，提高到支配欲、虚荣心、求名欲……　麦克格莱哥尔伯爵夫人是（广义的）①情欲的代表，而这种情欲就是有教养的社会的秘密。”

牧师说得一针见血：要克制**情欲**，他首先得克制**神经传达**和快速的**血液循环**。——在说到“狭”义的情欲时，施里加先生认为高度的体温是由血管里血液的沸腾而来。他不知道**温血动物**之所以称为温血动物，是因为他们血液的温度尽管有若干细小的变化，但始终保持在同一的高度上。——只要神经传达一中止，血管里的血液一冷却，这**罪恶的肉体**，这情欲的栖息之所，就成了一具**尸首**，而魂灵们也就能顺利无阻地彼此谈论“普遍理性”、“真正的爱情”和“纯正的道德”。牧师大大地贬低了情欲，竟致勾消了刺激性爱的那些因素，即快速的血液循环（它证明人要是迟钝得没有情欲也就不会有爱）和神经的传达（它把作为情欲的主要栖息之所的器官和大脑连接起来）。他把真正的性爱归结为**机械的** secretio semi- nis〔泄精〕，并和一个臭名远扬的德国神学家一起嗫嚅着：

“不是为了性爱，不是为了肉欲，只因上帝曾经吩咐：你们要生养众多。”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现在，让我们把思辨的结构和欧仁·苏的小说比较一下吧。这些被当做爱情的秘密的并不是情欲，而是神秘、猎奇、挫折、恐惧、危险，尤其是被禁止的事物的诱惑力。

这里谈到："为什么许多女人偏要找不配做自己丈夫的男人做情人呢？这是因为**爱情的最大的魔力**就在于它像**禁果**一样地诱人……　你们会同意：爱情要是去掉了担心、苦恼、困难、秘密、危险，那就什么东西也没有，或者几乎什么东西也没有了。那就是说，只剩下了情人的躯壳……　总而言之，这多多少少好像这样一件事情：有这样一个人，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和你那个寡居的情妇结婚呢？那个人回答说，唉，这一点我当然也想过，不过结婚后，我不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过夜。"

施里加先生强调说，爱情的秘密不在于**被禁止的事物的诱惑力**，而欧仁·苏却强调说，被禁止的事物的诱惑力构成爱情的"最大的魔力"和各种 extra muros〔屋外的〕爱情猎奇的根据。

"在爱情中正如在商业中一样，禁令和走私是形影不离的。"[25]

欧仁·苏和自己的思辨的解释者相反，他还作出了这样的论断：

"矫柔造作和玩弄手腕的僻性，故弄玄虚和诡计多端的倾向，是女人的本质特点、天生的僻性和主要的本能。"

使欧仁·苏感到烦恼的只是这种反对**结婚**的僻性和倾向。他真想使女人的这种本能运用得比较无害、比较有益。

施里加先生把麦克格莱哥尔伯爵夫人变成了"提高到精神力量的外观"的那种情欲的代表者，但是她在欧仁·苏的笔下却纯粹是个**抽象理智的人**。她的"虚荣心"和她的"骄傲"远不能成为情欲的形式，而是一种和情欲毫不相干的抽象理智的产物。因而欧仁·苏强调说：

“爱情的火样的冲动从没有打动她那**冷若冰霜**的心；任何动人心弦的事件也不能改变这狡猾、自私而虚荣的女人的刻薄打算。”

抽象、无情而冷酷的**理智**所造成的利己主义构成了这个女人的根本特征。所以，她的灵魂在小说中被描写成“枯燥而冷酷的”，她的意向被描写成“恶毒透顶的”，她的性格被描写成“狡猾的”和“绝对的”（这是抽象理智的人所特有的性格），她的矫柔造作被描写成“高明的”。我们顺便提一句，欧仁·苏小说中伯爵夫人的生活道路，同小说中大多数人物的生活道路一样，是描写得很不合理的。老奶妈要她相信她日后将“戴王冠”。她对此竟深信不疑，于是出发旅行，想借出嫁来取得王冠。结果弄得不伦不类，竟把一个德国的小“诸侯”当做了“戴王冠的人物”。

我们这位批判的圣徒痛斥了情欲以后，认为还必须表明：为什么欧仁·苏一写到上流社会就要描写舞会（这几乎是所有的法国小说家都喜欢采用的一种手法），而**英国**小说家一写到上流社会往往是描写打猎或乡间别墅。

“欧仁·苏一写到上流社会就要描写舞会，这件事，对这种理解事物的方法（施里加先生的观点） 说来，不可能是无关紧要的，而且从这方面（从施里加的结构方面）②来看也不可能是纯粹偶然的。”

于是批判家放开缰绳，马就沿着按归天的老沃尔弗的精神对这种必然性所做的一连串的证明飞步狂奔起来。

“**跳舞**是**作为秘密的情欲**的最普遍的表现。只有结成配偶才能得到的两性（?）①的直接**接触**即拥抱，在跳舞中是容许的。因为跳舞虽然从外表看起

②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 译者注

① 括弧里的问号是马克思加的。—— 译者注

来能够得到快感，而且实际上（是实际上吗？牧师先生！）①也是这样，但终究不能看做**情欲的**（难道应看做普遍理性的吗？）②接触和拥抱。”

于是最后得出了一个最多是踮着脚跟跳舞的结论：

“**因为，如果真的**把跳舞看做情欲的接触和情欲的拥抱，**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社会单单对跳舞表示宽容，**而一切类似的现象——如果这些现象在其他地方**同样无所顾忌地表现出来——**社会反而会**给加上一个严重的罪名，认为这是不可原谅地伤风败俗和不识廉耻的行为，而冠以恶名并无情地加以取缔。”

牧师先生所说的不是**康康舞**，也不是**波尔卡舞**；他说的是一般的**舞蹈**，是只有在他那批判的脑盖骨下面才能跳的舞蹈这一**范畴**。如果有机会让他到巴黎的“雪蜜卢”去看一看跳舞，那见的泼辣大胆、毫无隐讳的作风、轻浮放荡的动作、刺激情欲的音乐定会使他的基督教德意志的情感激动起来。他自己的那种“产际上能够得到的甜蜜之感”使他有可能“觉得”：“确实不可理解，为什么跳舞的人自己反而”给观众造成赤裸裸的人类情欲这样一种激动人的印象（“这种情形要是在其他地方”，即在德国，“以同样的方式表现出来，便是不可原谅的罪过”……），而同时，当跳舞的人不仅能够而且必然要成为情欲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的人的时候，为什么他们又不应而且不敢——至少可以这样说——自视为这样的人！！

出于对**跳舞的本质**的崇敬，批判家把我们引入了**舞会**。但是他遇到了重大的困难。在这个舞会上虽然有人在跳舞，但只是在想像中跳舞。欧仁·苏根本没有对跳舞作任何描写。他没有混在跳舞的人群中间。他之所以要利用舞会，只是为了便于把上层的

①②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贵族圈子里的人汇集在一起。在绝望之余“批判”迫不及待地**补充**作者，用自己的“幻想”把舞会等等轻松地描写了一番。如果说，按照批判的规定，欧仁·苏在描写罪犯们的巢穴和言谈的时候，绝不是他对这些巢穴和言谈的描写本身发生兴趣，那末，相反地，他必然会对跳舞发生无限的兴趣，尽管描写跳舞的并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富于幻想”的批判家。

再看！

“**事实上**，社交的声调和节奏的秘密，即这种极不自然的事物的秘密，是一种回复到自然的热烈的渴望。因此，像**塞西莉**[①]身上所发生的这种情形给有教养的社会一种像电一样的影响，并获得极不平常的成就。对她这样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只受自己的本性支配的、在奴隶中生长起来的女奴说来，这种本性是生命的唯一泉源。她突然被送入宫廷，在那里的风俗习贯的强制下，她很快就识破了这些风俗习贯的秘密……　她是绝对有力量驾驭这个环境的，因为她的力量，她的本性的力量像不可思议的魅力一样影响着周围的人，而在这个环境中塞西莉必然会走入歧途而放纵起来，但是在以前，当她还是奴隶的时候，正是这种本性使她拒绝了主人的一切卑鄙的要求，始终忠实于自己的爱情。**塞西莉是有教养的社会的被揭露了的秘密**。被压抑的感情最后终于冲破障碍而不可抑制地奔放出来……”

不知道欧仁·苏的小说的内容而只读过施里加先生的文章的读者，一定认为塞西莉是这个舞会上的一个迷人的女人。然而在小说中，当巴黎在跳舞的时候，塞西莉正坐在德国的监狱里。

塞西莉作为一个女奴始终是忠实于黑人医生大卫[②]的，因为她“狂热地”爱着他，也因为她的所有者维里斯[③]先生正“**粗暴地**”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

②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鲁道夫的侍医。——译者注

③ 同①。——译者注

争取她的温存。在小说中，使她生活放荡的动因是很简单的。她一被带到“欧洲人的世界”中，就“耻于同黑人结婚”。她刚到德国，一种败坏了的主体就**“立即”**腐化了她。这是她血管里的“印地安人的血液”在起作用。为了迎合“可爱的道德”和“可爱的交易”，伪善的欧仁·苏先生不得不把她的行为说成“天生的堕落”。

塞西莉的秘密就在于她是一个**混血姑娘**。她的情欲的秘密是**热带的**炽热。帕尔尼在他致爱琳娜的美丽的诗篇中赞美过混血姑娘。在成百篇的游记中都可以看到混血姑娘对法国水手是多么危险。

“塞西莉本来是那种只有在热带的炽热下才能激起的强烈的情欲的化身…… 每一个人都听人谈到过这些所谓能使欧洲人丧命的有色人种的姑娘，这些迷人的吸血鬼，她们以可怕的诱惑力来迷醉她们的牺牲者……使他们像当地有力的俗话所说的那样，渴饮自己泪，饥食自己的心。”①

塞西莉对那些有贵族教养的萎靡不振的人正好丝毫没有施展这样的魔力……

“塞西莉这一类型的女人，往往对**雅克·弗兰**②之类的**粗鲁的情欲**的代表者产生一种突如其来的影响，使他受到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③

像雅克·弗兰之类的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代表起高尚的社会来呢？可是批判的批判却非把**塞西莉**说成绝对秘密的生命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不可。

① 引自“巴黎的秘密”。——译者注
②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
③ 同①。——译者注

(4)“正直和虔敬的秘密”

“**秘密**作为有教养的社会的秘密，**固然**是从**对立**躲藏到**内部**去了。**然而**上流社会**还**有**它**可以用来保护圣地的特殊集团。上流社会对这种至圣所说来**好像**是小礼拜堂。**但是**对于在门庭前逗留的人说来，小礼拜堂本身就是**秘密**。**因此**，这种特殊的教养之于人民……正如粗野之于有教养的人一样。”

“**固然……然而……还……好像……但是……因此**”，正是这些魔术般的钩子把**思辨的论述之链**的各个环节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在上文中我们看到，施里加先生如何使**秘密**离开罪犯世界而藏到上流社会里去。现在他必须构造另一个秘密，即上流社会有它的**特殊的**集团，这些集团的秘密对人民说来是一种秘密。除了上述魔术般的钩子以外，这种结构还需要把**集团**转化为**小礼拜堂**，把非贵族世界转化为这种小礼拜堂的**门庭**。而且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领域只形成上流社会的小礼拜堂的一个门庭这一件事，对巴黎说**来**又是秘密。

施里加先生追求两个目的。第一、必须把体现在上流社会的特殊集团中的**秘密**变成“**整个世界的公共财产**”。第二、必须把**公证人雅克·弗兰**构造成**秘密**的有生环节。批判家发表了如下的议论：

“教养还不能而且也不想把所有的等级和所有的差别都拉到自己的圈子里面来。只有**基督教**和**道德**才能在地球上建立包罗万象的王国。”

在施里加先生看来，教养、文明就等于**贵族的**教养。因此，他看不到，**工业**和**商业**正在建立另一种包罗万象的王国，根本不同于基督教和道德、家庭幸福和小市民福利所建立的包罗万象的王国。但是我们怎样到**公证人雅克·弗兰**那里去呢？这太简单了！

施里加先生把**基督教**变成**个人**的特质，即“**虔敬**”，而把**道德**变成另一种**个人**的特质，即“**正直**”。他把这两种特质结合在**一个**人身上，并把这个人命名为**雅克·弗兰**，因为雅克·弗兰并没有这两种特质，而只是假装出这种样子。于是，雅克·弗兰就成了“正直和虔敬的秘密”。然而，弗兰的“遗嘱”是“**表面上的**正直和虔敬的秘密”，可见已经不是正直和虔敬本身的秘密。批判的批判想把这个遗嘱构造成秘密，所以它必须把表面上的正直和虔敬说成这个遗嘱的秘密，而不反过来把这个遗嘱说成表面上的正直和虔敬的秘密。

巴黎公证人事务所认为雅克·弗兰是对自己的一种恶意诬蔑，并通过戏剧检查，坚持要从已经搬上舞台的“巴黎的秘密”中删去这个人物，正在这个时候，批判的批判却一面**“和概念的空中王国争论”**，一面把巴黎的公证人看做宗教和道德、正直和虔敬，而不看做巴黎的公证人。公证人莱昂的审判过程应该是对批判的批判的一个启发。**公证人**在欧仁·苏的小说中所处的地位是和他的职位密切相关的。

“公证人在世俗事务中，就如僧侣在宗教事务中一样，他们都是**我们的秘密的守护者**。”（蒙泰“法兰西各等级……的历史”第九卷第37页[26]）

公证人是世俗的神甫。按职业说他是**清教徒**，但“诚实”——莎士比亚说——并“不是清教徒”[27]。他同时是达到各种各样目的的中间人，是市民的倾轧和纠纷的主使者。

对于以伪善和公证职务为自己的全部秘密的公证人弗兰，我们似乎还没有作更深入一步的了解。但是不要性急！

“如果说，伪善对公证人说来完全是有意的，而对罗兰①夫人说来是**一种**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

类似本能的东西，那末，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群人，这些人不可能深入秘密，但总是下意识地竭力在这样做。同时把这个世界的上等人和下等人引到江湖医生布拉达曼蒂（波利多里①神甫）的阴森森的住所中去的，也并不是迷信。不，他们是到那里去寻找**秘密**，以便向世界证明自己无罪。”

“上等人和下等人”涌向波利多里那里，并不是为了要找到能向全世界证明自己无罪的某种秘密。不，“上等人和下等人”是到波利多里那里去寻找“一般的秘密”，寻找那作为绝对主体的**秘密**，来向世界证明自己无罪。这就像我们不找斧子，而找“一般的工具”，找 in abstracto〔抽象的〕工具来劈柴一样。

波利多里所有的一切秘密无非是堕胎的方法和杀人的毒药而已。——施里加先生在思辨的极度兴奋中让“**谋杀者**”求助于波利多里的毒药，“因为他并不想做谋杀者，而是要做一个受人尊重、爱戴、敬仰的人”。好像在谋害人命的时候，问题是在于得到尊重、爱戴和敬仰，而不在于人的**脑袋**！但是**批判**的谋杀者并不为自己的脑袋操心，而为“秘密本身”奔忙。——既然并非所有的人都在谋杀人，也并非所有的孕妇都是违犯警章怀孕的，那末这个波利多里怎么可以**使每一个人**都能拥有他所期望的秘密呢？施里加先生大概是把江湖医生波利多里和16世纪的学者**波利多罗·味吉里奥**搅混了；这位学者虽然没有发现任何秘密，但力图使揭露秘密的人即**发明家**的历史成为“全世界的公共财产”（见波利多罗·味吉里奥“发明家手册”1706年里昂版[28]）。

可见，秘密本身，即终于变成“全世界的公共财产”的绝对的秘密，就是堕胎和下毒的秘密。秘密本身转化为对任何人也不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

能说是秘密的秘密，这的确是使它自己变成“全世界的公共财产”的最巧妙的办法。

(5)“秘密—讥讽”

“**秘密本身现在**已经成了公共财产，成了全世界和每个人的秘密。或者它是我的艺术或我的本能，或者我能够在市场上像买商品一样地买到它。”

现在成了全世界公共财产的是**什么样**的秘密呢？是国家中的无法纪的秘密吗？是有教养的社会的秘密吗？是伪造商品的秘密吗？是制造香水的秘密吗？还是“批判的批判”的秘密？都不是！这里说的是 in abstracto〔抽象的〕秘密，是秘密这个范畴！

施里加先生想把**仆人**和**看门人皮普勒及其妻子**[1]描写为绝对的秘密的体现。他企图构造出“**秘密**本身”的**佣人**和**看门人**！他是怎样从纯**范畴**的高峰跳到“**在闭锁的门前当暗探**”的“**仆人**”的脚下，从高踞于抽象云雾**顶**上的宝座中的**秘密**这一绝**对主体**的高峰跳到看门人所住的地下室呢？

他先使秘密这个范畴完成思辨的过程。而在秘密借堕胎和下毒的办法成为全世界的公共财产以后，它

“**也就绝对不会再是被掩盖的**和**不可捉摸的**，而是**一种自己掩盖自己的东西**，或者更好一些（真是愈来愈好了！）[2]，是被我掩盖、**被我弄得不可捉摸的东西**”。

绝对的秘密这样从**本质**转化为**概念**，从它本身是被掩盖着的东西的**客体**阶段转化为它自己掩盖自己的**主体**阶段，或者更好一

---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

②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些，转化为“**我**”掩盖“**它**”的阶段，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获得任何进展。相反地，困难却似乎增加了，因为人们头脑中和人们心中的秘密比海底的秘密更不可捉摸，更不易揭露。因此，为了挽救自己的**思辨的**论断，施里加先生**立即**提出了**经验的**论断。

“在**关着的门**后面（注意听，注意听！）①**今后**（今后！）②将孕育、酿造并形成**秘密**。”

“**今后**”施里加先生把秘密本身的思辨的“**我**”转化为一种完全经验的纯粹**木制的的**现实，即转化为**门**。

“**但是随着**（也就是说，随着关闭着的门的出现，而不是随着从故步自封的本质到概念的推移）③**也就**有了偷听、看穿和探索秘密的**可能性**。”

可以挨着关着的门偷听，这个“秘密”并不是**施里加先生**发现的。大众的俗话就说“隔墙有耳”。相反地，成为完全批判的思辨的秘密的，倒是这样一件事：只有“**今后**”，也就是在去罪犯巢穴中作地狱之行以后，在我们高升到有教养的社会的天上以后，在波利多里的所有的奇迹发生以后，秘密才能在关着的门后孕育，才能被人**挨着**关着的门偷听。构成同样伟大的批判的秘密的还有一件事，这就是关着的门不论对于孕育、酿造、形成秘密（在丛林后面不知孕育、酿造、形成了多少秘密！），或者对于探索秘密都是**绝对必要的**。

完成这一出色的辩证的功绩后，施里加先生自然要从探索本身谈到**探索的原因**。在这里他向我们揭露了一个秘密：**幸灾乐祸**是探索的原因。他从幸灾乐祸又进一步谈到**幸灾乐祸的原因**。

他说：“每一个人都希望比别人好，因为他不仅在掩盖自己行善的动机，而且极力想把自己作恶的事实用重重的浓雾包藏起来。”

---

①②③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这句话要倒过来说才对：每一个人不仅在掩盖自己行善的动机，而且极力想把自己作恶的事实用重重的浓雾包藏起来，因为他希望比别人好。

这样，我们终于从**自己掩盖自己的秘密**达到掩盖秘密的**“我”**，从这个**“我”**达到**关着的门**，从**关着的门**达到**探索**，从**探索**达到**探索的原因**，达到幸灾乐祸，从**幸灾乐祸**达到**幸灾乐祸的原因**，达到**要比别人好的愿望**。现在，我们马上就有眼福看到站在在关着的门前的**仆人**。要比别人好的这种普遍的愿望使我们一下就知道“任何人都好探询别人的秘密”，在这里批判家又从容不迫地加上了下面这一精辟的见解：

“在这方面，**仆人**的地位是**最有利的**了。”

如果施里加先生读过巴黎警察局的档案库中的档案、维多克档案、法国的“黑皮书”和类似的东西，他就会知道，在这一方面，**警察**所处的地位要比仆人所处的“最有利的地位”还更有利些，警察只在最简单的事情上才利用仆人，而自己则不仅不停在门外，不仅看着主人脱衣服，而且还变成他的 femme galants〔情妇〕，甚至变成妻子，钻进被窝，碰到他赤裸裸的肉体。在欧仁·苏的小说中，警探“红手”[①]是情节发展的主要体现者之一。

“今后”施里加先生对于仆人不能完全**“不顾私人利益”**这一点感到烦恼。这种**批判的怀疑**为批判家铺设了通往**看门人皮普勒及其妻子**的道路。

“可是，看门人的处境使他能比较独立，使他有可能把屋内的秘密变成自由的、没有利害关系的（虽然是严酷而辛辣的）、讥讽的对象。”

---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 译者注

看门人的这种思辨的结构所遇到的第一个大困难，就是在巴黎的很多房屋中至少有一部分住户的仆人常常就是看门人。

批判的幻想以为看门人的地位比较独立和没有利害关系，这是否正确，可以从下面的事实来判断。巴黎的看门人是房东的代表和密探。在大多数场合下，他们的工钱不是由房东，而是由房客出的。由于自己的收入很不可靠，看门人除了自己的正式职业以外，还常常要弄点外快。在恐怖统治时期，在帝国时期和复辟时期，看门人是秘密警察的主要代理人。例如富瓦将军就处于自己的看门人的暗中监视之下，寄给将军的信件都要被他先转给附近的警察代理人审阅（见弗罗芒"警察内幕"[29]）。因此：《portier》〔"看门人"〕和《épicier》〔"小店主"〕这两个词是骂人的话，连《portier》〔"看门人"〕自己也希望别人称他《concierge》〔"看房人"〕。

欧仁·苏根本就没有把皮普勒太太描写成"不计利害的"和心地善良的人，他一开始就描写她在兑钱时欺骗鲁道夫，她为鲁道夫介绍了和他住在一幢房子里的奸猾的放高利贷的女人，她向鲁道夫担保他利丽果莱特①相识一定会有许多乐事，她讥刺少校给她的钱太少，同她讨价还价（她一肚子火地称他为"吝啬的少校"，并说："给你料理家务，你每月只给12法郎，总有一天你会从这里得到教训的"），"小气"得连柴米都要管，等等。她自己说出了她"独立"行动的原因是少校每月只给她12法郎。

在施里加先生那里，"阿娜斯塔西娅·皮普勒用**某种方式**开始了反**秘密**的游击战"。

在欧仁·苏的小说里，阿娜斯塔西娅·皮普勒是**巴黎看门女**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是一个浪漫女子，又称"斑鸠"。——译者注

人的典型。欧仁·苏想把“被昂利·蒙尼埃先生描写得非常出色的看门女人加以戏剧化”。而施里加先生认为必需把皮普勒太太**“嘴上刻薄”**的特点转化为特殊的本质，然后再把皮普勒太太转化为这种本质的代表。

施里加先生接着说：“她的丈夫看门人阿尔弗勒德·皮普勒和她是同行，但是运气不佳。”

为了安慰他的失败，施里加先生把他也转化为一种**讥讽**。他是秘密的**“客观”**方面的代表，是**“作为讥讽的秘密”**的代表。

“使他遭到失败的秘密就是人家对他的讥讽和嘲笑。”

此外，神灵似的辩证法怀着无限的同情把“不幸的老糊涂”变成**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强健的人’**，分配他担任绝对秘密生命过程中的一个很可敬、很幸运又很有决定意义的环节的角色。对皮普勒的胜利就是

“秘密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失败”。“稍为机灵和勇敢一些的人就不会上**嘲笑**的圈套。”

（6）“斑鸠”（丽果莱特）

“还有一件事情要做。从皮普勒和卡布里昂①的例子中，我们已经看到，秘密在**它自己的渐次的发展**中必然会被迫降到纯滑稽戏的地步。现在所要做的**只不过是**使个人不再演出这种愚蠢的喜剧。**‘斑鸠’**在这一步上做得不能再纯朴了。”

任何人都可以在两分钟内看穿这种思辨的滑稽戏的秘密，并

---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

学会独立地应用它。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稍为指明一下。

题目： 试说明人是怎样成为动物的主宰的。

思辨的解答： 假定我们有六种动物，譬如说有狮子、鲨鱼、蛇、牛、马和哈巴狗。我们从这六种动物中抽象出“一般动物”这个范畴。把“一般动物”想像为独立的存在物。把狮子、鲨鱼、蛇等等看做“一般动物”的化装或体现。我们既可以把我们的想像的东西，即我们抽象的“**动物**”变成某种现实的存在物，同样也就可以把现实的动物变成我们抽象的创造物，即我们想像的创造物。我们看见“一般动物”体现为**狮子**，就会把人撕得粉碎；体现为**鲨鱼**，就会把人吞下去；体现为**蛇**，就会用毒液伤人；体现为牛，就会用角觝人；体现为**马**，就会用蹄子踢人；但是，如果“一般动物”体现为**哈巴狗**，就只会对人吠叫，并把和人的搏斗完全变成**搏斗的外观**。从**哈巴狗**的例子中，我们已经看到：“一般动物”在它**自己的渐次的发展**中必然会被迫降到表演**纯滑稽戏**的地步。如果小孩或孩子气的人看见哈巴狗就逃跑，那末现在所要做的只不过是使个人不再演出这种愚蠢的喜剧。某**甲**在这一步做得不能再纯朴了，他向哈巴狗挥动了自己的竹杖。从这里，你可以看出“一般的人”如何通过某**甲**和哈巴狗而成为“一般动物”的主宰，从而也就成了现实的各种动物的主宰；这个人如何制服了**体现为哈巴狗的动物**，从而也就制服了**作为动物的狮子**。

同样，施里加先生的“斑鸠”通过皮普勒和卡布里昂而战胜了现存的世界秩序的秘密。不但如此！“斑鸠”本身就是“**秘密**”这个范畴的实现。

“她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崇高的伦理价值，因此她对自己说来，也还是个秘密。”

欧仁·苏通过穆尔弗[1]的口向我们揭露了非思辨的丽果莱特的秘密。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浪漫女子**”。在她身上，欧仁·苏描写了巴黎浪漫女子的亲切的、富于人情的性格。可是又由于对资产阶级恭顺，而生性又好夸大，他就一定要在**道德上**把浪漫女子理想化。他一定要把她的生活状况和性格的尖锐的棱角磨掉，也就是消除她对结婚的形式的轻视、她和大学生或工人的纯朴的关系。正是在这种关系中，她和那些虚伪、冷酷、自私自利的资产者的太太、和整个资产阶级的圈子即整个官方社会形成了一个真正人性的对比。

（7）“巴黎的秘密”的世界秩序

“这一秘密的世界**也就是**‘巴黎的秘密’的个人活动得以进行的普遍世界秩序。”

“但是”在“转过话题来谈史诗事件在**哲学上的再现**”以前，施里加先生还得“把上面所做的零零碎碎的构图合成一幅完整的图画”。

如果施里加先生说，他想转过话题来谈史诗事件“在哲学上的再现”，那末，我们应该认为这是真正的自白，是他的批判的秘密的暴露。直到现在，他总是使世界秩序“在哲学上再现”。

施里加先生继续他的自白说：

“从我们的叙述中可以得出结论：前面研究过的一些单个的秘密，并不是与其他秘密无关而本身就有价值的，它们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闲谈中的珍

[1]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鲁道夫的仆人。——译者注

闻。这些秘密的价值就在于它们自身组成**许多环节的有机的连贯性**，而这些环节的**总和**就是**秘密**。”

由于他那坦率的脾气，施里加先生谈得更远了。他承认“**思辨的连贯性**”并不是“巴黎的秘密”的**真正**的连贯性。

“是的，在我们的史诗中，秘密并不表现为这种**自知的连贯性**（按成本吗？）①，**但是**我们在这里碰到的问题并不是**逻辑的**、任何人都看得见的、**自由的批判机体**，而是一种**神秘的植物的存在**。”

我们不去研究施里加先生的完整的图画而直接来考察构成“推移”的这一点吧。通过皮普勒的例子，我们已经熟悉了“秘密本身的自嘲”。

“秘密本身用自嘲来判决自己。秘密在自己的发展结束时消灭自己，**从而**促使任何坚强的人进行独立的检查。”

盖罗尔施坦公爵**鲁道夫**这位“**纯批判**”**的伟人**的使命就是实行这种检查和“**揭露秘密**”。

如果我们在一个时候中看不到施里加先生，然后才来研究鲁道夫和他的功绩，那就可以预言，而读者就会在一定程度上猜想，或者宁可说是预测，我们将把鲁道夫从“**神秘的植物的存在**”（他在批判的“文学报”中就是这样的）转化为“**批判的批判的机体**”中的“**逻辑的**、任何人都看得见的、**自由**的环节”。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第六章
绝对的批判的批判或
布鲁诺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1) 绝对批判的第一次征讨

(a) **“精神”和“群众”**

过去，批判的批判似乎对各种各样的**群众**的事物多少进行过一番批判的研究。现在我们却发现它是在研究绝对批判的对象，即**它自己**。到目前为止，它一直是靠批判地贬低、否定和改变**某些**群众的事物和人物来取得自己的相对荣誉。现在它却靠批判地贬低、否定和改变全体群众来取得自己的**绝对**荣誉。同相对的批判对立的有相对的界限。同绝对的批判对立的有绝对的界限、群众的界限，即作为界限的群众。和一定的界限相比，相对的批判本身必然是**有限**的个体。和**普遍**的界限相比，和界限本身相比，绝对的批判必然是绝对的个体。正像各种各样的群众的事物和人物汇合在**“群众”**这一锅**不纯的**稀粥里一样，似乎还是事物的和人物的批判也一变而为**“纯批判”**了。过去，批判似乎多少是赖哈特、埃德加尔、法赫尔等等这些批判的个人的**特性**。现在它却是**主体**，而布鲁诺先生则是它的化身。

过去，**群众性**似乎多少是被批判的事物和人物的特性；现在事物和人物却变成了“群众”，而**“群众”**则变成了事物和人物。

以前的一切批判的关系现在都在绝对批判的英明和绝对群众的愚蠢的关系中消灾了。这个**基本的关系**是过去的批判的行动和战斗的**意图**、**趋向**、**解答**。

和自己的绝对的身分相适应，“纯”批判已经在初次上场时就道出了自己的独特的“**箴言**”，但是尽管如此，作为绝对的精神，它必将完成某种辩证的过程。它的原初概念，只有在它的天体运行的终点上才会真正被实现（见黑格尔“哲学全书”[30]）。

绝对的批判宣告说：“还在几个月以前群众就以为自己是强大有力的，是法定要统治世界的，他们早就在搬着指头计算这一天的到来。”[31]

正是**布鲁诺·鲍威尔**先生自己在“自由的正义事业”（自然是在“他**自己的**”事业里）、“犹太人问题”[32]等等里面搬着指头计算统治世界的日子的到来。虽然他也曾意识到他不能够指出确切的日子。他竟把他自己的一大堆罪过转记在群众的罪行录上。

“群众以为自己占有许多不言而喻的真理”。“但是，只有……当人们通过对**真理**的一系列的论证而尾随**真理**之后的时候，才算整个地**占有了真理**。”

真理，对鲍威尔先生来说也像对黑格尔一样，是一具自己论证自己的**自动机器**。人始终都要**尾随**其后。现实发展的结果，也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不外是**被证明了的**即**被意识到了的真理**。因此，绝对的批判就会和鼠目寸光的神学家同声问道：

“如果历史的任务并不是要**证明**这些最简单的真理（例如，地球绕日运行），那末还要**历史干什么**呢？”

从前的目的论者认为，植物所以存在，是为了给动物充饥，动物所以存在，是为了给人类充饥，同样，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给理论的充饥（即**证明**）这种消费行为服务。人为了历史而存在，而历史则为了**证明真理**而存在。在这种**批判**的庸俗化的形式中重复了思

辨的高见：人和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使**真理**达到**自我意识**。

因此，**历史**也和**真理**一样变成了特殊的个性，即形而上学的主体，而现实的人类个体反倒仅仅变成了这一形而上学的主体的体现者。所以绝对的批判利用了下面这些话：

"**历史**不容许别人嘲弄自己……**历史**尽了最大的努力，以便人们……研究**历史**……为什么需要历史呢？……**历史**向我们提供明确的证明……**历史**揭开真理"云云。

如果照绝对的批判的说法，到现在为止，历史上只有这样**两三个**最简单的、终于是不言而喻的真理，那末被批判硬加在人类过去全部经验之上的这种贫乏，首先只是证明了绝对的批判**自己的**贫乏。相反地，从非批判的观点看来，历史的结果就是：最复杂的真理、一切真理的精华（**人们**）最终会自己了解自己。

绝对的批判继续表明："真理，它们对群众说来**似乎**是这样一目了然，以至它们**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是无需证明的，不值得让历史特地去证明它们的重要性；它们根本就不属于由历史来解决的任务这个范围之内。"

绝对的批判在对群众大发神圣的雷霆之余，又向群众巧言奉承了一番。的确，如果说真理**一目了然**是因为群众**觉得**它就是这样，如果说历史是根据群众的**意见**来**决定自己**对真理的**态度**，那末在这种场合下，群众的判断就是绝对正确的、无可争辩的，它对于历史就具有**法律**效力，而历史只证明群众**不能**一目了然因而群众需要证明的东西。所以说，群众给历史规定了它的"任务"和它的"业务"。

绝对的批判谈的是"**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它凭着自己的批判的天真发明了绝对的"**一开始**"和抽象的不变的"**群众**"。在绝对的批判的心目中，16世纪群众的"一开始"和19世纪群众

的“一开始”，就像这两个世纪的群众本身一样，是很少有什么差别的。这种**真实**的、**一目了然**的、不言而喻的真理，其特点正在于它“**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绝对的批判对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真理的攻击，也就是对本来就“不言而喻”的真理的攻击。

对绝对的批判以及对上帝的**辩证法**说来，不言而喻的真理已丧失了它全部的精华、意义和**价值**。它像一潭死水一样，成了淡而无味的东西。所以，绝对的批判一方面**证明**一切不言而喻的东西，此外，还证明许多幸而难于理解因而永远不会不言而喻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宣布凡是要引伸和证明的东西都是不言而喻的。为什么呢？因为**不言而喻，实际的任务不是**某种不言而喻的东西。

既然“**真理**”和历史一样，是以太的、脱离物质群众的主体，所以，它不是面向经验的人，而是面向“**心灵的深处**”，它为了成为“**真正被认识了的**”真理，不去影响居住在英国的地下室中或是法国库房的阁楼里的人的**粗糙的躯体**，而是通过他的整个唯心主义的肠道“徐徐伸展”。不错，绝对的批判向“群众”证明：到现在为止，群众曾按自己的方式即在表面上被那些由历史仁慈地“揭开”的真理所触及；但同时批判又预言道：

“**群众对历史进步的态度将根本改变。**”

这一批判预言的神秘含义对我们说来却是“明如白昼”。

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的，正是因为它们**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唤起了**群众的热情。换句话说，这些活动之所以必然得到悲惨的结局，是因为作为它们的基础的思想是这样一种观念：它必须满足于对自己的表面了解，因而也就是指望博得群众的喝采。”

好像只有满足思想、符合思想的那种理解才不再是表面的理

解。布鲁诺先生只是**为了摆摆样子**才把思想和对它的**理解**之间的**关系**搬出来，正像他只是**为了摆摆样子**才把不成功的历史**活动**对**群众的关系**搬出来一样。因此，如果绝对的批判真的谴责什么东西是"表面的"，那就是谴责过去的全部历史，因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绝对的批判推翻**群众的**历史并打算用**批判的**历史取而代之（见茹尔·法赫尔先生的论英国的迫切问题的文章）。根据过去的、**非批判**的历史，即根据和绝对批判的意旨相违背的历史，应该更严格地区分下述两点：**群众**对这样或那样的目的究竟"**关怀**"到什么程度，这些目的"**唤起了**"群众多少"**热情**"。"**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另一方面，不难了解，任何得到历史承认的群众的"利益"，当它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总是在"**思想**"或"**观念**"中远远地超出自己的实际界限，很容易使自己和全**人类的**利益混淆起来。这种**错觉**构成**傅立叶**所谓的每个历史时代的**色调**。资产阶级在1789年革命中的**利益**决不是"**不成功的**"，它"**压倒了**"一切，并获得了"**实际成效**"，尽管"**激情**"已经消失，尽管这种利益用来装饰自己的摇篮的"**热情**"之花也已经枯萎。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只有对那样的群众来说革命才是"不成功的"，这种群众的**政治**"观念"并不是关于自己的实际"**利益**"的观念，所以他们的真正的主导原则和革命的主导原则并不是一致的，他们获得解放的现实条件和资产阶级借以解放自身和社会的那些条件是根本不同的。所以，如果说能够代表一切伟大的历史"活动"的革命是不成功的，那末，其所以不成功，是因为革命在本质上不超出其生活条件的范围的那部分群众，是并不包括全体居民在内的**特殊的、有限的**群

众。如果说革命是不成功的，那末，并不是因为革命**“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并不是因为它引起了群众的**“关怀”**，而是因为对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群众来说，革命的原则并不代表他们的**实际**利益，不是**他们自己**的革命原则，而**仅仅**是一种**“观念”**，因而也仅仅是暂时的**热情**和表面的**热潮**之类的东西。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在批判的历史中，一切事情自然都完全不是这样报道的，批判的历史认为，在历史活动中重要的不是行动着的群众，不是经验的活动，也不是这一活动的经验的**利益**，而仅仅是寓于**“这些东西里面”**的**“观念”**。

批判教导我们说：**“精神的真正敌人应该到群众中去寻找，而不是**像以前的自由主义的群众捍卫者所想像的那样**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

在群众**之外**的进步的敌人恰恰是独立存在的、被赋予**自己**的生命的、**群众的自卑自贱、自我排斥和自我异化的产物**。所以，群众用反对他们的**自卑自贱**的独立存在的**产物**的办法来反对他们**本身的**缺点，就像一个人用反对上帝存在的办法来反对他**自己的宗教心理**一样。但是，群众的这种自我异化的**实际**后果既然以外在的方式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所以群众也就不得不以**外在的**方式和这种后果进行斗争。群众绝不会把自己的自我异化的这些后果仅仅看做观念的幻影，看做**自我意识**的单纯的**异化**，同时也不想通过纯粹**内在**的唯**灵论**的活动来消灭**物质**的异化。早在 1789 年路斯达洛编辑的报纸[33]上就有过这样的警句：

“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
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
站起来吧！”

但是，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现实的、感性的**、用任何观念都不能解脱的那种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那是不行的。可是绝**对的批判**从黑格尔的**“现象学”**中至少学会了一种技艺，这就是把**现实的、客观的、在我身外**存在着的链条变成**只是观念的**、只是**主观的**、只是**在我身内**存在着的链条，因而也就把一切**外部**的感性的斗争都变成了纯粹观念的斗争。

这种批判的转变给**批判的批判**和**书报检查机关之间的先定的谐和奠定了基础**。从批判的观点看来，作家和书报检查官之间的斗争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相反地，书报检查官正是**我自己的**、被深谋远虑的警察为我**人格化了的机智**，也就是我自己的、与我的不机智和非批判性进行斗争的那种机智。从外表看来，在卑劣的感性看来，作家和书报检查官的斗争只不过是与作家**内心的自相斗争**不同的一种东西。**如果**我把书报检查官当做**真正的、单个的、不同于**我的存在物，当做用外部的极不相称的标准来丑化我的精神创造物的**警察刽子手**，那末，这样的书报检查官正是**群众**想像的结果，是**非批判的幻想**。如果说费尔巴哈的“哲学改革提纲”[34]曾遭到书报检查机关的查禁，那末罪过并不在于书报检查机关的官方的野蛮，而在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不文明。没有被任何群众和物质所沾污的“纯”批判认为书报检查官也是脱离一切群众的现实的、纯“以太的”形象。

绝对的批判宣布**“群众”**是**精神的真正敌人**。它在发挥自己的这种思想时说道：

“现在精神已经知道它应该到哪里去**寻找自己的**唯一的对头，——就是要到群众的自我欺骗和萎靡不振中去寻找。”

绝对批判的出发点是**“精神”**的绝对权限的**信条**。其次，它的出

发点是精神存在于**世界以外**即精神存在于群众以外的**信条**，最后，它同时把“**精神**”、“**进步**”这个方面和“**群众**”这个方面变成**凝固不动**的本质，即变成概念，然后又把双方当做一种永久不变的极端相互对立起来。绝对的批判并不想去研究“**精神**”本身，并不想去研究精神自己的唯灵论的本性和它的轻率的奢望是否就是“空话”、“自我欺骗”、“萎靡不振”的根源。相反地，精神是绝对的，然而不幸的是，它同时不断地变为**精神的空虚**，因为它总是失算。所以，它必需有一个对它施以奸计的对头。这个对头就是群众。

讲到“**进步**”，情形也是这样。与“**进步**”的奢望相反，经常可以发现**退步**和**循环**的情况。绝对的批判决没有想到“**进步**”这个范畴是没有任何内容的、抽象的，可是它竟如此深谋远虑，以致为了能够抬出进步的“**个人的对头**”即**群众**来说明退步而承认“**进步**”是绝对的。既然“**群众**”不外是“**精神**”即进步、“**批判**”的“**对立物**”，所以也只能用他们的这一想像的对立物来给他们下定义。如果把这一对立物撇开不谈，那末，关于群众的**意义**和存在，批判所能说的只不过是某种极不明确的、因而也是**荒诞无稽的**东西：

“群众这个‘**词**’的**意思也**包含**所谓**有教养的人士。”

对批判的定义来说，一个“也”或一个“所谓”就已经足够了。这样一来，“**群众**”也就不同于**实际的**群众了，它只是为了“**批判**”才作为“**群众**”而存在。

一切共产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著作家都从这样的观察出发：一方面，甚至安排得最顺利的出色的行动显然都没有出色的结果，并且还蜕化为平庸的事情；另一方面，**精神的一切进步**到现在为止都是**损害群众的进步**，使群众陷入每况愈下的**非人**境遇。因此，他们宣称“进步”（见**傅立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抽象**词句**；他们

猜到了（见**欧文**及其他人）文明世界的根本缺陷的存在；因此，他们对现代社会的**现实**基础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在实践中，一开始就和这种共产主义批判相适应的，是迄今仍遭到历史发展的损害的**广大群众**的运动。要理解这个运动中**人的**高尚性，就必须知道英法两国工人对科学的向往、对知识的渴望、他们的道德力量和他们对自己发展的不倦的要求。

“绝对的批判”能够在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这些事实面前看出事情的**一个**方面即精神的不断破灭，同时为了这点还沮丧地寻找一个**“精神”的对头**（它在**“群众”**中找到了这个对头），请看，绝对的批判具有多么非凡的聪明呵！所有这些伟大的批判的**发现**到底还是**同义反复**。照批判的意见，**精神**到现在为止总是受到限制，碰到障碍，换句话说，它总是有一个**对头**。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个**对头**。谁是**精神**的对头呢？**精神的空虚**。批判本来把群众规定为只是精神的“对立物”、**精神的空虚**和精神空虚的更详细的定义，即“思想懒惰”、“表面性”、“自满”。绝对的批判不去研究精神的空虚、思想懒惰、表面性和自满的来源，而在这些品质中**寻出**精神、进步的对立物，并从**道德上**去加以侮辱。——这种做法比起共产主义的著作家来具有多么大的优越性呵！如果这些品质被说成**群众**的，即与这些品质还有所不同的某种**主体**的品质，那末这种区分只不过是“批判的”区分的**外观**而已。仅仅就**外观**来说，绝对的批判除精神的空虚、思想懒惰等抽象的品质外，还有一个**特定的**具体主体，因为批判心目中的**“群众”**，**无非就是**这些抽象的品质，是这些品质的另一种**称呼**，这些品质的**虚幻的人格化**。

然而“精神和群众”的关系还有一层**隐蔽的**含义。这个含义在以后的论述过程中将完全揭露出来，这里我们只大略地谈一谈。

布鲁诺先生**所发现**的“精神”和“群众”的关系，事实上不过是**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的、漫画式的完成**，而黑格尔的历史观又不过是关于**精神**和**物质**、**上帝**和**世界**相对立的**基督教德意志**教条的**思辨**表现。在历史的范围内，在人类本身的范围内，这种对立表现为：代表**积极**精神的少数杰出**人物**与代表**精神空虚的群众**、代表**物质**的人类其余部分相对立。

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以下面这种方式发展着：人类仅仅是这种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因此，**思辨的**、奥秘的历史在**经验的**、明显的历史中的发生是黑格尔一手促成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说来，也就是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

同黑格尔的这种学说同时发展的，在法国有**空论派**[35]的学说，他们宣布**理性的独立自主**是和**人民的独立自主**对立的，其目的是为了排斥群众而**单独地**实行统治。这是十分彻底的做法。如果说现实的人类的活动也就是一**群**单个的人的活动，那末**抽象的普遍性**即**理性**、**精神**反而应该仅仅在少数单个的人身上得到抽象的表现。每一个单个的人是否愿意去冒充这样的“**精神**”代表者，这要取决于他的地位和想像力。

早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绝对精神**就在**群众中**拥有它所需要的材料，并且首先在**哲学**中得到它相应的表现。但是，**哲学家**只不过是创造历史的绝对精神在运动完成之后用来**回顾既往**以求意识到自身的一种工具。哲学家参与历史只限于他这种回顾既往的意识，因为真正的运动已被绝对精神**无意地**完成了。所以哲学家是 post festum〔事后〕才上场的。

黑格尔的过错在于双重的不彻底性：(1) 他宣布哲学是绝对精神的定在，同时又不肯宣布**现实的哲学家**就是绝对精神；(2) 他仅仅**在表面上**把作为绝对精神的绝对精神变成历史的创造者。既然绝对精神只是 post festum〔**事后**〕才通过哲学家**意识**到自身这个具有创造力的世界精神，所以它的捏造历史的行动也只是发生在哲学家的意识中、见解中、观念中，只是发生在思辨的想像中。布鲁诺先生取消了黑格尔的这种不彻底性。

首先、他宣布**批判**是绝对精神，而**他自己**是**批判**。批判的因素被排斥于群众之外，同样，群众的因素也被排斥于批判之外。所以**批判**认为自己并不是通过**群众**体现出来，而仅仅是通过一小撮杰出人物即**鲍威尔**先生及其门徒体现出来的。

接着布鲁诺先生又取消了黑格尔的另一种不彻底性：如果说黑格尔精神只是 post festum〔事后〕在幻想中创造历史，那末，鲍威尔先生则和他以外的其他群众相反，他是**有意识地**在扮演**世界精神**的角色；他现在就已经**戏剧性地**对待这批群众，而且在深思熟虑之后却故意发明历史和实现历史。

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历史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他们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

不仅如此！批判、已经体现出来的批判即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对待群众的态度，实际上就是现代的**唯一**的历史态度。现代的全部历史都归结为这两个方面在相互关系上的运动。所有的对立面都消溶在这一**批判的**对立面中了。

既然批判的批判只有在同群众，即同**愚蠢**的对立中才能**具体**

地存在，所以它就不得不经常为自己**制造**这种对立面，法赫尔、埃德加尔和施里加三位先生就足以证明批判在它的专长方面，也就是在它对人和物进行**群众的愚化**方面所特有的高深造诣。

现在，我们跟着绝对的批判去看看它对**群众的征讨**。

(b)犹太人问题，第一号。问题的提法

同群众相对立的"精神"为了立刻显示自己的**批判性**，就把他自己的肤浅的著作即布鲁诺·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看做绝对的东西，而把反对这一著作的人看做罪人。它在对这一著作受到的攻击所作的第一号答辩[36]中，不但丝毫没有表示这一著作有什么缺点，反而肯定它发现了犹太人问题的"真正的"和"**普遍的**"(!)意义。我们将会看到，它在以后的几次答辩中就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策**"。

"我的著作所受到的待遇**开始**表明：正是那些过去和现在一直都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比任何人都更应该起来反对精神。我现在对这一著作所进行的辩护，进一步证明了那些由于自己拥护解放和'**人权**'信条而自以为是不知有多么伟大的**群众的辩护人**，在思想方面是何等贫乏。"

绝对批判的著作的问世必然要激起"群众"来**开始**表明自己对精神的敌对态度，因为"群众"的**存在**这件事本来是由"群众"和绝对批判之间的对立的实际存在来**决定**和**证实**的。

某些自由主义的和唯理论的犹太人对布鲁诺先生的"犹太人问题"的攻击，较之自由主义者对哲学和唯理论者对施特劳斯的群众的攻击，自然具有完全不同的批判的用意。上面所引证的评语究竟新颖到什么程度，可以根据**黑格尔**的下面这段话来判断：

"这里应该指出那种肮脏的良心的特殊形式：它的表现就是这些浅薄的

先生们（自由主义者）①引以自傲的辩才；而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在它最**缺少精神内容**的地方，它最经常地谈论**精神**；在它表现出最无生气的地方，它却总是唠叨着**生命**这个词”等等。[37]

至于说到**“人权”**，那我们已经向布鲁诺先生证明过（“德法年鉴”上的“论犹太人问题”[38]）：不是**群众的辩护人**，而是**“他自己”**不了解这些“权利”的实质，并且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它们。同布鲁诺关于人权不是**“天赋的”**这种发现相比较（这种发现近四十多年来在英国有过无数次），傅立叶关于捕鱼、打猎等等是天赋人权的论断，就应该说是天才的论断了。

我们只从布鲁诺先生和**菲力浦逊**、**希尔施**等人的争论中举出几个例子。连这些可怜的对手也不是绝对的批判所能征服得了的。不管绝对的批判怎么说，**菲力浦逊**先生用以下的话来责备它时，决没有说出什么不尽情理的话：

“鲍威尔在思索的是一个特殊类型的国家……**国家的哲学理想**。”

布鲁诺先生把国家和人类、人权和人本身、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混为一谈，就必然会思索或者至少是想像一个特殊类型的国家即国家的哲学理想。

“我曾经证明：**基督教国家**……不可能使其他某一宗教的信徒和基督教阶层在权利上完全平等，因为这种国家的主要原则是一种特定的宗教。假若朗诵者（希尔施先生）②不是极具令人厌倦地阐述自己的思想，而是来推翻我的上述论证，那就会更好一些。”

如果朗诵者**希尔施**像“德法年鉴”所做的那样，真的推翻了布鲁诺先生的论证，并且表明了等级的和排他的基督教的国家不仅

①②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编者注

是不完备的国家，而且也是不完备的**基督教**国家，那末，布鲁诺先生也会像回答“德法年鉴”上对他的驳斥那样回答道：

“在这件事情上的责难是毫无意义的。”

布鲁诺先生说：

“犹太人对历史弹簧的压力，引起了反压力。”

和他的这一论断相反，希尔施先生完全正确地指出：

“所以说，犹太人对于历史的形成必然起了某种作用，而如果鲍威尔自己也肯定了这一点的话，那末，另一方面，他就没有权利断言犹太人对于现代的形成是毫无贡献的。”

布鲁诺先生回答道：

“眼中的刺也起了某种作用。是否由此可以说它对我的视觉发展作了什么贡献呢？”

刺，就像犹太精神在基督教世界中一样，从我生下来那天起就在我的眼中，现在仍然在我的眼中，并且跟眼睛一同成长和发展。这样的刺并不是普普通通的刺，而是和我的眼睛分不开的一根罕有的刺，它必然会对我的视觉的高度非凡的发展有所贡献。所以，批判的“**刺**”并没有制痛正在朗诵的“**希尔施**”[一]。此外，上面提到的那篇批评文章已经向布鲁诺先生表明犹太精神对“现代的**形成**”的意义了。

莱茵省议会的一位议员说道：“犹太人**显得古里古怪**是由于他们犹太人的习惯，而不是由于我们的所谓基督教的习惯。”这个意见使绝对批判的神学家的心灵深深地受到了凌辱，以至它现在还

[一] 双关语：德语中 Hirsch（希尔施）是姓，但同时有“鹿”的意思——编者注

没有忘记“命令这个议员**规规矩矩地**使用这样的论据”。

另一位议员断定说，“犹太人的**市民**平权，只有在犹太本身已经不再存在的地方，才有可能实现”，布鲁诺先生就针对这种说法指出：

“这是对的，而且正是在注意到我那本小册子中提到的另一批判见解的时候是对的。”这个见解就是：基督教也应当不再存在。

由此可见，绝对的批判在对“犹太人问题”这本小册子受到的攻击所做的第一号答辩中，仍旧把取消宗教、把无神论看做**市民的**平等的必要条件。所以，绝对的批判在考察犹太人问题的最初阶段上**还**没有进一步领悟到国家的本质和他的“**著作**”中的“**失策**”。

当有人证明绝对的批判所**杜撰的**“最新的”科学发现只不过是重复早已是人所共知的观点的时候，它就感到很恼怒。有一位莱茵省议员指出：

“还没有人想断定说，法国和比利时在组织它们的政治机构时显示出它们对原则的认识是特别明确的。”

绝对的批判满可以反驳说，这种说法就是把现在已变得陈腐了的关于法国的政治原则不能令人满意的见解拿来冒充传统的见解，从而把现在的东西搬到过去。这是就事论事的反驳，然而绝对的批判并不能从这种反驳中得到好处。相反地，绝对的批判必然会把过时的见解说成目前的主导见解，而把目前的主导见解说成批判的秘密，即绝对的批判还得通过**自己的**研究才能使群众了然的那种秘密。所以它才不得不说道：

“**大多数人**（也就是群众）①都已肯定了这一点（即过时的偏见）②**但是**对

①②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 译者注

历史的**认真的研究证明，即使**是在法国完成了巨大的工作之后，**也还要做许多事情**才能达到认识原则。”

可见，对历史的认真研究本身并没有“**达到**”认识原则。它靠自己的认真态度仅仅**证明了“还要做许多事情才能达到**”。真是伟大的成就！尤其显得伟大的是这个成就在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之后。但是，在认识现存的社会制度方面，布鲁诺先生**已经**以自己的下述意见做了**许多事情**：

“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规定性就是非规定性**。”

如果黑格尔说，**中国**占主导地位的规定性是“有”，**印度**占主导地位的规定性是“无”等等，那末，绝对的批判就会“十足地”附和黑格尔，并把现时代的特性归结为“**非规定性**”这个逻辑范畴，并且会更加十足地把“非规定性”同“有”和“无”一样列入思辨逻辑的第一章，即列入关于“质”的一章。

现在，我们如果不发表一个总的意见，就不能丢开“**犹太人问题**”第一号。

绝对批判的主要任务之一，首先就是给当代的一切问题以**正确的提法**。它恰好没有回答现实的问题，却提出一些**毫不相干的**问题。既然它可以制造一切，那末它必然也会预先制**造出**“当代的问题”，就是说，它必然会把这些问题制造成**自己的**、批判的批判的问题。如果谈到拿破仑法典，那它就会证明：这**实际上**是谈“**摩西五经**”①。它对“当代的问题”的**提法**就是对这些问题的批判的**曲解**和**歪曲**。例如，它这样歪曲“犹太人问题”，以致它自己竟用不着去研究作为这一问题内容的**政治解放**，反而可以满足于批

① “摩西五经”——指旧约全书前五篇：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译者注

判犹太宗教和描写基督教德意志国家。

和绝对批判的其他一切新颖的表现一样，这种方法也是思辨戏法的重演。**思辨**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认为：一切问题，要能够给以回答，就必须把它们从正常的人类理智的形式变为思辨理性的形式，并把现实的问题变为**思辨的**问题。思辨哲学歪曲**我的**问题，并且像教义问答那样，借我的嘴来说**它**自己的问题，它当然也能够像教义问答那样，对我的每一问题都准备好现成的答案。

(c) 辛利克斯，第一号。关于政治、社会主义和哲学的神秘暗示

"政治的！"这个词在**辛利克斯**教授讲义里的出现，简直使得绝对的批判大发起雷霆来了[39]。

"凡是注视现代的社会发展和熟悉历史的人，他**也**必定知道目前发生的政治运动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但这种意义无论如何都不会是**政治的**：这些运动本来（本来！……紧接着就是彻底的英明）①具有**社会的**（！）意义，大家知道（！），在这类（！）意义面前，**所有的**政治利益都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

大家知道（！），在批判的"文学报"问世以前几个月，就出现了布鲁诺先生的空想的政治性著作**"国家、宗教和政党"**[40]。

如果，**政治**运动**具有社会的意义**，那末，政治利益怎么会在自己的社会意义面前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呢？

"辛利克斯先生无论是在自己家里，或是在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是什么见闻广博的人物……他什么东西都不可能理解，**因为**……**因为**，他对于近四年来开始并从事自己的**决非'政治的'**、而是**社会的**（！）工作的批判，**一无**（！）所知。"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在群众看来，**批判**从事了“决**非政治的**”、而是“**纯粹神学的**”工作，它不仅在这四年当中，而是在它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那天就使用了“**社会的**”这个词，而现在还是满足于这个词！

社会主义的著作曾在德国传播这样的观点，说人的**一切**志向和事业都毫无例外地具有**社会**的意义；自从那时以来，布鲁诺先生也可以把自己的神学工作叫做**社会的**工作了。在辛利克斯的讲义发表以前出现的布·鲍威尔的文章，凡是做出实际结论的，也统统做出了**政治的**结论，尽管如此，批判却要求辛利克斯教授从**熟读鲍威尔**的著作中来领会社会主义，这算是什么**批判的**要求！非批判地说，辛利克斯教授无论如何不可能用布鲁诺先生的尚未发表的文章来补充他已发表过的文章。从批判的观点看来，群众对于绝对批判的“政治的”和一切群众的“运动”，当然应该从未来的角度，从绝对进步的意义上来加以解释。但是，为了使辛利克斯先生在认识了“文学报”之后永远不再忘却“**社会的**”这个词，不再否认**批判**的“**社会的**”性质，批判在全世界面前第三次**诅咒**“**政治的**”这个词，并且第三次郑重地重复“**社会的**”这个词：

“如果注意到现代历史的**真正的**趋向，就**不会**再**提政治的**意义了，**然而**……然而**社会的**意义”云云。

辛利克斯教授既然做了绝对批判先前那种“政治的”运动的替罪羊，所以，他现在也是绝对批判在“文学报”问世之前有意运用“**黑格尔派的**”运动和说法以及后来又在该报中无意地运用这些东西的替罪羊。

有一次，批判硬给辛利克斯安上了一个“**真正的黑格尔派**”的头衔，又有两次则给他安上了一个“**黑格尔派哲学家**”的头衔。不仅如此，布鲁诺先生甚至“**希望**”，“那些通过**黑格尔**学派的所有

著作（特别是通过布鲁诺本人的著作）[①]令人厌倦地转了这么一圈的陈旧说法”，**既已**在辛利克斯教授的演讲里发觉了**“疲惫”**不堪，下一步很快就会到达它们的终点。布鲁诺先生指望借助**辛利克斯教授的‘疲惫’**使**黑格尔哲学**遭到毁灭，从而使**自己摆脱**这种哲学的束缚。

这样一来，绝对的批判在**第一次征讨**中就推翻了它自己长期以来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上帝——**“政治”**和**“哲学”**，把它们说成是辛利克斯教授的偶像。

光荣的第一次征讨！

（2）绝对批判的第二次征讨

（a）辛利克斯，第二号。‘批判’和“费尔巴哈”。对哲学的谴责

第一次征讨结束以后，**绝对的批判**可能认为**“哲学”**已被消灭，并且直截了当地把它看做**“群众”**的同盟者。

> “**哲学家**的使命就是要实现**群众的**衷心愿望。”这就是说，“群众**要求**简单的概念以便同事物本身不发生任何关系，要求千篇一律的做法以便预先解决一切问题，要求空话以便用它们消灭**批判**。”

而“哲学”正在满足“群众”的这个欲望！

被自己的胜利事迹弄得醉熏熏的绝对批判以**女巫**般的狂暴痛斥哲学。**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41]是一个隐藏的汽锅[㊀]，它的蒸气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㊀ 双关话：《Feuerbach》——“火流”，《Feuerkessel》——“汽锅”（直译：“火锅”）。——编者注

把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绝对批判的魁首熏得兴奋若狂。批判在三月里读完了费尔巴哈的这篇文章。这次阅读的成绩和认真阅读的标志，就是写成了驳斥辛利克斯教授的第二号论文。

一贯作为黑格尔思想方式俘虏的绝对批判，正在这里猛烈地冲击它的监狱的铁槛和围墙。“简单的概念”、术语、哲学的全部思维方式、甚至整个哲学在这里都遭到嫌弃。马上代之而起的是**“人类关系的真正丰富性”**、**“历史的无穷尽的内容”**、**“人的意义”**等等。**“体系的秘密”**宣告**“已被揭露”**。

然而，到底是谁揭露了“体系”的秘密呢？是**费尔巴哈**。是谁摧毁了概念的辩证法即仅仅为哲学家们所熟悉的诸神的战争呢？是**费尔巴哈**。是谁不是用**“人的意义”**（好像人除了是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似的！）而是用**“人”**本身来代替包括“无限的自我意识”在内的破烂货呢？是**费尔巴哈**，而且仅仅是**费尔巴哈**。他所做的事情比这还要多。他早已摧毁了现今正被**“批判”**乱用的那些范畴：“人类关系的真正丰富性、历史的无穷尽的内容、历史的斗争、群众和精神的斗争”等等。

在认识到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之后，唯有**“批判”**才能够发明出**新的范畴**来，并像它正在做的那样，重新把**人**本身变成某种范畴，变成一系列范畴的原则。当然，这样“批判”就走上了唯一的生路，但这条路仍然处在惊惶不安和遭受迫害的**神学的**非人性的控制之下。**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

的活动而已。在**费尔巴哈**的一切天才发现之后，**绝对的**批判还竟敢用新的形式来为我们恢复一切陈腐的废物。而且正是这时它把这种陈腐的废物痛骂为“**群众的**”废物，——它没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因为它对摧毁哲学并没有出过一点力。仅仅这一个事实就足以揭露**批判的‘秘密’**，就足以公正地评定促使它对辛利克斯教授（他的“**疲惫**”已给它帮了很大的忙）说出下面这些话是幼稚的：

> “凡是没有完成任何发展过程的东西都受到了**损失**，因此，**即使它们想要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假若扯得远一些，那它们就是企图改变**新的**原则……不！新东西**不可能**被曲解为**空谈**，**从新东西那里剽窃个别的思想方法是不可能的**。”

绝对的批判在辛利克斯教授面前夸耀自己揭露了“**系科学科的秘密**’。难道批判没有揭露哲学、法学、政治学、医学、政治经济学等等的“秘密”吗？绝对不是。批判曾指出（请注意！），它在“自由的正义事业”中曾指出作为生财之道的科学和自由的科学之间、教学自由和系科章程之间是互相矛盾的。

尽管“绝对的批判”并没有像它对待别人那样，硬要**费尔巴哈**说出这种胡说八道的话来（例如它从这位哲学家那里剽窃来的、它所不理解而又被它歪曲了的那些原理），这当然是好的，不过，如果它诚实，它就该供认出它所谓的关于“哲学秘密”的揭明是来自何处。“绝对批判”的**神学**观点的最大特点就在于，现在德国庸人们都开始理解**费尔巴哈**和领会他的结论，可是批判却不能正确地理解和成功地运用费尔巴哈的任何一个原理。

批判的第一次征讨的功绩跟它在同一条道路上取得的新成就相比，真是黯然失色。现在它把“**群众**”和“**精神**”之间的斗争“规定”为过去全部历史的“**目的**”；它宣称“**群众**”是“卑贱”的

“**纯粹的无**”，直截了当地把群众称为“**物质**”，并把“**精神**”当做真理性的东西和“物质”对立起来。这样一来，难道绝对的批判不就是**真正基督教德意志的批判吗**？唯灵论和唯物主义过去在各方面的对立已经在斗争中消除，并为**费尔巴哈**永远克服，但在这以后“**批判**”又重新以最可恶的形式把这种对立变成基本教条，并促使“**基督教德意志的精神**”获得胜利。

最后，批判现在把**精神**和**群众**的对立跟“**批判**”和群众的对立等同起来，这一点应当看做是批判在第一次征讨中还隐蔽着的秘密的进一步发展。以后它会更进一步，把自身和“一般批判”等同起来，把自己说成是“**精神**”、是绝对者、是无限的，相反地把群众说成是有限的、粗野的、卤莽的、僵死的和无机的，因为“**批判**”就是这样理解物质的。

单就人类和**鲍威尔先生**的关系来看，历史的财富是多么无穷尽呵！

(b) 犹太人问题，第二号。关于社会主义、法学和政治学（民族性）的批判的发现

有人在向群众的、物质的犹太人宣扬**基督教**关于**精神自由**、**理论自由**和这样一种**唯灵论**自由的教义，——这种自由**认为**自己即使在束缚中也是自由的，这种自由觉得自己很幸福，即使这种幸福仅仅存在于“**观念中**”，而且这种自由只会受到一切群众存在的排挤。

“犹太人现在在**理论**领域内有什么程度的进展，他们就真正获得什么程度的**解放**；他们有什么程度的**自由愿望**，他们就获得什么程度的**自由**。”[42]

这个论点使我们有可能立即去测量那条把**群众的**世俗的共产

主义和社会主义同**绝对的**社会主义分隔开来的批判的深渊。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就否认**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认为这是幻想，为了**真正的**自由它除了要求唯心的“**意志**”外，还要求完全能感触得到的物质的条件。“群众”认为，甚至为了争得一些只是用来从事“**理论**”研究的时间和经费，也必须进行物质的、实际的变革；这样的“**群众**”在神圣的批判面前显得多么低下呵！

我们暂且放下纯精神的社会主义来看看**政治学**。

里谢尔先生和布·鲍威尔相反，他指出他的国家（即**批判的**国家）必须驱逐“犹太人”和“基督徒”。里谢尔先生说得完全正确。既然鲍威尔先生把**政治**解放同**人类**解放混淆起来，既然国家对于敌对分子（基督徒和犹太人在“犹太人问题”中已经被评定为变节分子）的反抗只有采取暴力驱除这些分子的代表**人物**的办法（比如，恐怖统治企图用砍掉包买主脑袋的办法来消除收购谷物的行为），所以鲍威尔先生在他的“批判的国家”中也就必然把犹太人和基督徒送上绞架了。既然鲍威尔把政治解放同人类解放混淆起来，所以，为了彻底起见，他也就必然把解放的**政治手段**同解放的**人类手段**混淆起来。但只要有人向绝对的批判指出其结论的**真实**含义，它也就会像**谢林**曾经回答那些用**真实**含义来代替谢林的空谈的反对者那样，来回答他：

> “**批判的**反对者之所以成为批判的反对者，因为他们不仅用自己的**教条主义**的尺度来衡量批判，甚至认为批判也是**教条主义的**；换句话说，他们拚命反对批判的原因，就是因为批判否认他们的教条主义的划分、说明和托词。”

对待绝对的批判和**谢林**先生的教条主义态度实际上是在人们把**特定的**真实含义、思想和观点加在绝对批判的身上时产生的。然而为了迁就并且向里谢尔先生证明自己的博爱之忱，“**批判**”打算

使用教条主义的划分、说明、特别是**“托词”**。

比如我们读到这样一段话：

“如果我在那本书里（在“犹太人问题”中）①**希望**越出或者**有权**越出批判的**范围**，我**应当**（!）**谈的**（!）不是**国家**，而是**‘社会’**，因为‘社会’并不排除任何人，只有那些不愿意参与社会发展的人才自己把自己从社会中排除出去。”

在这里，绝对的批判在它应当做的事（如果它没有做出相反的事的话）和它实际做的事之间进行了**教条主义的划分**。它用禁止它越出**“批判的范围”的愿望和权限的‘教条主义的托词’**来解释自己的小册子“犹太人问题”的局限性。怎么？**“批判”**应当越出**“批判”的范围**吗？绝对的批判由于教条主义的必然性采取了这条道地的**群众的**托词，一方面肯定自己对犹太人问题的理解的绝对性，肯定这种理解的“批判性”；另一方面也承认有更广泛的理解的可能性。

批判的**“不希望”**和**“不应该”的秘密**最终会在批判的**教条**中找到解答。根据这种教条，“批判”的局限性的一切表现只不过是**适合**群众理解力的必然形式而已。

批判不**希望**！批判**不应该**越出自己对犹太人问题的狭隘理解的范围！但是，如果它**希望**或者**应该**的话，那它会做出些什么呢？它会做出**教条主义的说明**。它会不谈“国家”而谈**“社会”**，所以它绝不会去研究犹太人对待**现代市民**社会的**真实**态度！它**教条主义地解释**与“国家”不同的**“社会”**，意思是说它从国家中排除**国家**的时候，**那些**不愿参与社会发展的人反而把自己从社会中**排除**出去。

在从自身中排除的问题上，社会的做法跟国家的做法实质上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 译者注

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社会做得比较斯文一些。譬如，社会不是把你一脚踢出门外，而是创造一些条件，使你在这个社会里难以生存下去，结果，你会心甘情愿地离开它。

实际上，国家也是这样做的，因为国家并不排除那些遵命守法和不阻碍**它的**发展的人。**完备**的国家甚至对许多事情都熟视无睹，它把**真正的**对立说成是**非政治的**、对它毫不妨碍的对立。此外，绝对的批判本身发展了这样一种思想：国家仅仅是由于犹太人排除国家，也就是说**犹太人自己**把**自己**从国家中排除出去，所以它才排除犹太人。如果这种相互关系在**批判的**"社会"中表现得更温存、更虚伪、更狡诈，那末这只能表明**"批判的"** **"社会"**的莫大虚伪和发育不全。

我们再来看看绝对批判的"教条主义的划分"、"说明"、特别是**"托词"**。

例如，里谢尔先生要求批判家"**把**法的范围以内的东西和法的范围以外的东西**区分开来**"。

批判家对于**法律上**的这种蛮横无理的要求表示愤慨。

他反驳说："**可是**直到目前，情感和良心都干涉了法，常常补充它，由于法的**教条主义形式**（因而不是法的教条主义**本质**？）①所决定的法的性质，就必须常常补充它。"

另一方面，**批判家**只是忘了**法本身**非常明确地**把**自身同"情感和良心"**区分开来**；他忘了这种划分可以由**法**的片面**本质**和教条主义**形式**来说明，这种划分甚至成了法的**主要教条之一**；最后，他忘了这种划分一旦实现就构成**法的发展的**最高阶段，正像宗教从各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种世俗内容中摆脱出来就使宗教成了**抽象的**、**绝对的**宗教一样。"情感和良心"干涉法这个事实使"**批判家**"有足够的根据在谈法的地方谈情感和良心，在谈**法律**教义的地方谈**神学**教义。

绝对批判的"说明和划分"使我们有可能充分地领会它的关于"**社会**"和"**法**"的最新"**发现**"。

"**批判**准备了世界形式，**甚至是第一次**开始准备世界形式的**观念**。这种世界形式不**单单是法的**形式，而且是（读者，请你提起精神来！）①**社会的**形式，关于这种形式**至少**（如此少吗？）②**可以**说，谁对它的建立毫无贡献，谁在它那里不凭自己的良心和情感来生活，他就不会感到在它那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也不可能参与它的历史。"

"批判"所准备的世界形式被确定为**不单单是**法的形式，**而且是**社会的形式。这个定义可以有两种解释。或者这种说法应解释为世界形式"**不是**法的，**而是**社会的"形式；或者世界形式"不单单是法的，而且**也是**社会的形式"。我们考察一下这两种说法的内容，现在先谈第一种解释。绝对的批判把上述这个不同于"**国家的**"新"世界形式"说成是"社会"。现在它却把名词"**社会**"说成是形容词"**社会的**"。如果说辛利克斯先生和他的"**政治的**"一词相反，从批判那里三度获得了"**社会的'这个词**，那末里谢尔先生则和他的"**法的**"一词相反，而获得"**社会的社会**"**这个词**。如果对辛利克斯先生来说，**批判的**解释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公式："社会的"＋"社会的"＋"社会的"＝3a，那末，绝对的批判在其第二次征讨中就是从**加法**转到**乘法**，而里谢尔先生则委身于自我相乘的社会，委身于社会的**平方**，即社会的社会＝a^2。绝

①②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对的批判为了做出它的关于社会的结论，它只得转到分数上去，开始求社会的**平方根**，如此等等。

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二种解释："**不单单是**法的，**而且也是**社会的"世界形式。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双重的世界形式无非是**现存**的**世界形式**，即**现今社会的**世界形式。"**批判**"在其世界前的思维中还只是为着**现存**世界形式的**未来**存在**准备条件**，这个事实是伟大的令人崇敬的**批判奇迹**。但是不管"不单单是法的，而且是社会的社会"怎样，**批判**除了自己的《fabula docet》〔"寓言的教导"〕，除了自己的**训诫**以外，关于这种社会暂时还说不出什么名堂来。谁在这个社会里不凭自己的情感和良心来生活，"他就不会**感到**自己在它那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归根到底，除了"纯情感"和"纯良心"即"精神"、"**批判**"及其**心腹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能在这个社会里生活下去。**群众**将要被这种或那种方法从社会中排除出去，其结果，"群众的社会"将停留在"社会的社会"之外。

总而言之，这个社会就是**批判的天堂**，而真正的世界却被作为**非批判的地狱**从那里驱逐出来。绝对的批判在其纯思维中正在准备这个"**群众**"和"**精神**"对立的被改头换面了的**世界形式**。

就**民族**命运问题向里谢尔先生所作的解释如同就"**社会**"问题所作的解释一样，其特点是**批判的**深刻性。

犹太人渴望解放和基督教国家渴望"把犹太人列入自己的政府方案的一定部位里"（好像犹太人很久已不被列入基督教政府方案的一定部位里似的！）这件事，使得绝对的批判有理由预言**各民族的衰亡**。我们看到，绝对的批判是通过多么迂回曲折的道路，也就是通过**曲折的神学道路**才走向现代的历史运动的。我们可以从下面这句意味深长的神论般的箴言来判断通过这条道路所获得的

成果的重要性:

> “各民族的**未来**……**非常**……**黑暗**!”

看在批判的面上,就姑且让各民族的未来随便怎么黑暗吧!然而,有一点而且最主要的一点是清楚的:**未来是由批判决定的**。

> 批判大声疾呼地说:“命运可以任意决定一切;我们现在知道,命运是**由我们决定的**。”

正如上帝把自己的意志赋予**自己**的创造物——人一样,**批判**也把**自己的意志**赋予**自己的创造物**——命运。所以创造命运的**批判**也像上帝一样**神通广大**。甚至它所**“遭遇到的”**外来“反抗”也是由它决定的。**“批判创造了**自己的对头”。所以,**“群众对它的愤慨”**只是“威胁着”“群众”自己的“安全”。

如果批判像上帝一样**神通广大**,那末它也像上帝一样**无所不知**,并能把它的神通广大的本领同个人的**自由**、**意志**和**天性**结合起来:

> “如果批判不能使**每个人跳出**批判的掌握而成为他**想**成为的那个样子,而且也不能预先向每个人严格指出**适合其本性**和**意志的**那种观点,它就不能成为**创造时代的**力量。”

莱布尼茨本人也没有能够在上帝的神通广大同人的自由和天性之间确定先定的谐和。

显然,如果**“批判”**同心理学(它**把**成为某种东西的**意志**和成为某种东西的**能力区分开来**)发生了矛盾,那末就必须注意到,它是有确凿的根据来宣告这种“**区分**”是“**教条主义的**”。

我们要重整旗鼓进行第三次征讨!我们再一次想起**批判“创造了自己的**对头”!但是,如果批判不说空话,它怎么能创造自己

的对头——“空话”呢？

(3) 绝对批判的第三次征讨

(a) 绝对批判的自我辩护。它的‘政治的’过去

绝对的批判对“**群众**”的第三次征讨是从下面的问题开始的：

“**目前什么是批判的对象**？[43]

我们在同一期“文学报”上领教过了：

“**批判**除了认识**事物**之外，别无**他**图。”

这样说来，一切事物都该是批判的**对象**了，而某种特殊的专供批判的对象的问题也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注意到一切事物都“化为”批判的事物，而批判的事物又“化为”**群众**，即**绝对批判**的“**对象**”，那末这个矛盾就会迎刃而解。

布鲁诺先生首先叙述了他对“**群众**”的**无限同情**。他把“他和**人群**之间的**鸿沟**”作为“**不断研究**”的对象。他很想“**认识这个鸿沟对未来的意义**”（这一点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认识“**一切**”事物），也很想“**消除它**”。可见，实际上他已经了解了这个鸿沟的**意义**。鸿沟的意义就在于被他**消除**。

因为，对任何一个人来说，最近的存在物就是他自己，所以“**批判**”首先就得清除它**本身的群众性**，正像基督教禁欲者在开始精神对肉体的征讨之前首先要抑制**自己的**肉欲一样。绝对批判的“**肉体**”是它的**真正群众的**（包括20卷至30卷的）著作生涯的**过去**。因此，鲍威尔先生必须使“**批判**”的著作生涯的历史（这和鲍威尔本身的著作生涯的历史一模一样）摆脱其**群众的外观**，然

后再把这种历史加以**润色**和**解释**并通过这种**辩护的**评注来“**巩固批判以前的著作**”。

他一开始就说明**群众**在“德国年鉴”[44]和“莱茵报”[45]封闭以前把鲍威尔先生看成是**自己人**的这种错误有两重原因。第一、群众**不**认为著作活动**是“纯粹的著作活动**”，因而是错误的。同时，群众认为著作活动是“唯一的”或“纯粹的”**著作活动**，因而犯了相反的错误。毫无疑问，不管怎样“群众”都是不对的，因为它**同时**犯了两个互相排斥的错误。

绝对的批判趁此机会向那些嘲笑“德意志民族”是“**下流作家**”的人大声喝道：

> “请给我说一说看，哪一个历史时代不是由威严的‘**笔**’**预先规定了**的，不是应当由笔来解决其存在问题的！”

布鲁诺先生以批判的天真把“**笔**”**跟书写的主体**，并把作为“抽象的**书写者**”的书写的主体跟从事过书写的活生生的**历史的人**分了家。这样，他就有可能被“**笔**”的**神奇**力量弄得如醉如狂。他同样可以要求人家给他指出，那种不是由“家禽”和“养鹅女”预先规定了的历史运动。

后来，我们从这位布鲁诺先生那里得知，迄今还没有一个，根本没有一个历史时代是被认识了的。话又说回来，迄今未能**规定“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笔**”，又如何能够**预先规定所有的时代呢**？

尽管如此，布鲁诺先生**事实上**还是证明了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因为他以**辩护的“笔迹”“预先规定**”了他自己的“过去”。

批判在各个方面不仅带有世界和某一时代的**普遍的**局限性，而且还带有完全特殊的个人的局限性，但是，它有史以来就在自己的所有著作中自命为“**绝对的、完善的、纯粹的**”批判，很明

显，这种批判只是**一味迁就**群众的**偏见**和**理解力**，正像神启示世人时所常做的那样。

绝对的批判断言："这必然会导致理论和它的**臆想的同盟者**之间的分裂。"

但是，因为**批判**——这里可以把它改称为**理论**——不能变成**任何东西**，相反地，它是一切事物的起源；因为它不是在世界内部，而是在世界**之外**发展的，并以它那始终如一的神的意识预先规定了一切事物，所以，在它看来，跟它以前的同盟者**分裂**是一个"**新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内在的，不是为了它自己，而只是为了**摆摆样子**，只是为了别人。

"可是**说老实话**，这种转变也并不是新的。**理论**经常进行**自我批判**（大家知道，为了迫使理论进行自我批判而痛斥这种**理论**该是多么必要）①，它从来不奉承群众（但更奉承自己）②，它始终**谨慎从事**，以免陷入敌人的前提。"

"基督教神学家必须**谨慎从事**"（布鲁诺·鲍威尔"基督教真相"[46]第99页）。那末为什么"谨慎从事的"批判还是陷入了敌人的前提呢？它当时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真正的"见解清清楚楚地谈出来呢？它为什么不直说出来呢？它为什么不打消关于它跟群众和睦相处的幻想呢？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法老②在把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还给他时问亚伯拉罕。——你为什么告诉我她是你的妹妹呢③？"（布鲁诺·鲍威尔"基督教真相"第100页）

"打倒理性和语言！——神学家说：在这种情况下，亚伯拉罕明明是在撒

---

①②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② 古埃及的国王，圣经中的人物。——译者注

③ 参看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0章。——译者注

谎。启示会招致致命的侮辱。”（同前）

打倒理性和语言！——批判家说：如果鲍威尔先生不只是摆摆样子，而是**真正地**跟群众打成一片，那末绝对的批判在其启示中就不再是绝对的，因而它会招致致命的侮辱。

绝对的批判继续说道：“它的努力（即绝对批判的努力）①**简直不被人重视，况且**，批判还**有个时期**曾**不得不诚恳地**考虑敌人的前提并暂时认真地接受它们，简言之，批判当时**还没有**能力**完全**打破群众的这种信念：它跟批判有着共同的事业和利益。”

“**批判**”的努力简直不被人重视；可见，罪过是在群众身上。而另一方面，批判承认它的努力不可能被人重视，因为它自己还没有**“能力”使这种努力被人重视**。这样，罪过**似乎**是在批判身上。

绝非如此！**批判**曾“不得不（有一种压力加在它头上）②诚恳地考虑敌人的前提并暂时认真地接受它们”。了不起的诚恳，真正神学的诚恳！但是这种诚恳实际上对待事物并不认真，而只是**“暂时认真地接受它”**；它始终，就是说，**时时刻刻**谨慎从事，以免陷入敌人的前提，但是它却“**暂时**”“诚恳地”考虑这些前提。“诚恳”一词在上面所引证的最后一句话里太言过其实了。批判“诚恳地考虑了群众的前提”，但这时“它还没有**能力**完全”打消关于**批判**的事业和**群众**的事业的一致性的幻想。它**还没有**具备这种**能力**，但是却已经有了**希望**和**念头**。它还不**能**在**外部**跟群众分裂，但是这种分裂却已经在**它的内部**，即在它的**灵魂**中形成了，而且是在它**诚恳地**同情群众的时候形成了！

虽然批判完全和群众的偏见纠缠在一起，但是**实际上**并没有

①②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和这些偏见纠缠在一起；**老实**说，它反而摆脱了自己的局限性，而只不过是“**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向群众证明这一点。因此“批判”的整个局限性纯粹是一种**假象**，——如果没有群众的局限性，这种假象也就成为多余的了，因而也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了。可见，罪过**又**是在群众身上。

但是，**既然**这种**假象**是由于批判“没有能力”和“没有力量”吐露真情造成的，那就说明批判本身还是**不完善的**。它用自己所固有的那种与其说是诚恳不如说是辩护的方式承认了这一点。

“尽管它（批判）①对自由主义进行了致命的批判，但是它还可以被认为是这种自由主义的特殊形式，——**或许**，是这种自由主义的极端表现；**尽管**它的真实而具有决定性的结论已经超出了政治范围，但是它**还**必然在别人的心目中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它在从事政治，而这种**不完善的错觉**使它有可能获得上述绝大部分的朋友。”

批判依靠它似乎是在从事政治这一**不完善的错觉**而获得了朋友。假如这种**错觉**是**完善的**，那末批判就必然会失掉自己的**政治**朋友。它**雄辩地而又胆怯地力图**洗清自己的一切罪恶，它抱怨**错觉**是**不完善的错觉**，而不是**完善的错觉**。“批判”这样用一种错觉代替另一种错觉，就可以对下面的一点感到自慰了：如果它掌握了希望从事政治的“完善的错觉”，那末它就反而不能掌握随时随地消灭政治的“不完善的错觉”。

对“不完善的错觉”不太满足的绝对批判再一次问自己：

“批判当时被卷入‘群众的政治的’利害关系之中，**它……甚至**（!）……**必须**（!）……**从事政治**（!），这是怎么回事呢？”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在**神学家**鲍威尔看来，**批判**必须永世地研究**思辨神学**，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即人格化了的“批判”原本就是一个 ex professo〔职业的〕神学家。至于为什么要**从事政治**？这就必须用完全特殊的、政治的、个人的情况来加以解释。

为什么**“批判”**甚至必须**从事政治**呢？“它被控告了——**这就是问题的答案**。”至少**“鲍威尔政治”**的“秘密”的底细就在这里，至少那种在布鲁诺·鲍威尔的**“自由的正义事业和我自己的事业”**中用连接词**“和”**把**群众**的“自由事业”跟他**“自己的**事业”连在一起的**错觉**不能被说成是**非政治的**。但是，如果批判所从事的不是**服务于政治**的“自己的**事业**”，而是**服务于自己的事业的政治**，那就应当承认，不是政治欺骗了批判，而相反地，是批判欺骗了政治。

这样，布鲁诺·鲍威尔就应该被赶下神学讲台了，因为它**被控告了**。**“批判”**曾不得不从事政治，就是说，它必须**进行“自己的”**诉讼，即布鲁诺·鲍威尔的诉讼。不是鲍威尔先生进行了批判的诉讼，而是**“批判”**进行了鲍威尔先生的诉讼。“批判”为什么**必须**要进行自己的诉讼呢？

“替自己辩护吗？”**或许就是这样**。但是**“批判”**远不限于这种个人的、世俗的动机。就算是这样。但**不仅**是为了这一点，**“主要是**为了揭发它的敌人的矛盾”，而且——批判可以补充说——还为了把它驳斥形形色色的神学家的旧文章（如像它跟**普兰克**的长篇的对骂，神学家“鲍威尔”与神学家“施特劳斯”的兄弟之争）编成一本**书**。

绝对的批判由于承认了它的**“政治”**的真实利益而感到心安理得，一回想到它的**“诉讼”**，就又重新咀嚼起它曾在“自由的正义事业”中以种种方式反复咀嚼过的老**黑格尔的**东西：“与新事物

相对立的旧事物实际上已经不是旧事物了”（见“现象学”中的启蒙与信仰的斗争；见**全部**“现象学”）。批判的批判是反刍动物。批判经常把黑格尔的残羹剩饭（如像上述关于“新事物”和“旧事物”或“一个极端是从与之对立的另一极端发展起来的”等等论点）再回一回锅；除了求助于辛利克斯教授的“疲惫”之外，它从来没有感到需要用任何其他方法来清算“**思辨的辩证法**”。而且，它不断以重复黑格尔的办法“批判地”超过了黑格尔，例如：

“批判一出场就赋予探讨以新的形式，即**已经**不致于**变为外部限制**的形式”等等。

如果我要使某物发生一种**变化**，那我就要使它在本质上变为另外的东西。因为每一种形式同时也就是“**外部限制**”，所以**任何**一种形式都不“致于”**变为**“外部限制”，正像苹果不致于“变为”苹果一样。但是，“批判”赋予探讨的形式，由于完全**不同的**原因，也不致变为“外部限制”，因为批判一超出一切“外部限制”的范围，就会消失在荒谬的灰蓝色的迷雾中。

“**但是**，如果旧事物……**从理论上**探讨过共存或非共存的问题，那末它（新旧之间的斗争）①**当时**（即批判“赋予”探讨以“新的形式”的时候）②是**不可能发生的**。”

旧事物为什么不从理论上探讨这个问题呢？因为，“它绝不能一开始就做到这一点，**因为在突然间**”，即一开头，它“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新事物”，就是说，它既没有**从理论上**探讨自己，也没有探讨新事物。这样一来，新旧之间的斗争就不可能发生了，假如不幸连这种“不可能性”也不是不可能有的话！

---

①②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如果神学院的"**批判家**"进而"承认"他是"**明知**故犯",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依然随心所欲地犯了错误"(批判所经受,所体验或所做的一切,对它来说已**变为**它所故意创造的、自由的、纯粹的反省产物),那末批判家承认这点只具有真理的"不完善的错觉"。因为"**复类福音作者批判**"[47]完全是建筑在**神学**基础上的,因为它完全是**神学**的批判,所以神学讲师鲍威尔先生可以"既不犯罪也不犯错"地编写和教授神学。相反地,犯罪和犯错的却是神学院,因为神学院不了解鲍威尔先生是怎样严肃地实现了他在"复类福音作者批判"的前言(第一卷第23页)中所提出的诺言:

"如果**否定**在这第一卷中可以表现得特别大胆和过火,那末我们就会联想到,真正**肯定的东西**只能产生于郑重的普遍的否定之后…… **最后**将会看清:只有世界上最富有毁灭性的批判才能使我们认识**耶稣**及其**原则**的创造**力**。"

鲍威尔先生为了消除他的诺言的**积极**意义的模棱两可的外观,故把主"耶稣"跟他的"原则"分开。鲍威尔先生实际上把主耶稣及其原则的"**创造**"力描述得十分有声有色,以致于他的"**无限的自我意识**"和"**精神**"竟成了基督教的**创造物**。

即使批判的批判与波恩神学院之间的争论足以说明当时批判的"政治",那末,它为什么在这次争论结束之后还继续从事政治呢?请听下面的回答:

"达到这一点时,批判**本应该**或者**停留下来**,或者立即**前进**,探讨政治的本质并把它当做自己的敌人,——只要批判有可能停留在当时的斗争中,**同时**,只要不存在过分严格的历史规律;因为依据这种历史规律,在同自己的对立面的斗争中初次体验到本身力量的原则必然要使它的对立面压倒自己……"

好漂亮的辩护词！“批判**应该**停留下来”，只要可能……“有可能停留下来”！谁“**应该**”停留下来呢？谁必须做那种“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呢?同时!批判必须前进，“同时，**只要不**存在**过分**严格的历史规律”等等。历史规律对绝对的批判也“**过分严格**”了！如果这种规律**不**站在**相反的**方面，批判的批判向前迈进该是多么耀武扬威！然而，œ à la guerre comme œ à la guerre〔打仗就应当像个打仗的样子〕！批判在历史上必将使自己成为可悲的“历史”！

“如果批判（仍然是那位鲍威尔先生）①必须……那末还是不能不**同时承认**，当它响应这一类（即政治的）②的要求时，它总觉得自己没有**把握**，同时由于这些要求，它跟它的**真正的因素**发生了矛盾，——这种矛盾恰恰在这些**因素**中**已经**得到了**解决**。”

过分严格的历史规律造成了批判的政治上的弱点，但是——它恳求说——**不能不同时承认**，它虽不是在实际当中，但至少是**在本身之内**超出了这些弱点。第一、它“**在感情上**”克服了这些弱点，因为“它总觉得自己对这些要求没有把握”，它觉得自己在政治上**很糟糕**，连它自己也不知道政治是怎么一回事。此外！它跟它的**真正的因素**发生了矛盾。最后（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跟它的真正的**因素**所发生的矛盾不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解决，而是“已经”在它那独立存在于矛盾之外的真正的**因素**中“**得到了**”解决!这些批判的因素可以大言不惭地说，亚伯拉罕还没有降生，我们就已经在世了。当发展还没有产生我们的对立面的时候，它，这个**尚未产生**的对立面就已经在我们的混沌期中被解决了，死去了，灭亡了。既然批判与其真正的因素的矛盾“**已经**”在批判的真正的因素

①②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中“得到了解决”，既然**被解决了的**矛盾**不**是矛盾，那末，确切地说，批判**根本没有**跟它的真正的因素发生过矛盾，没有跟自己发生过矛盾。——这样，它的自我辩护的总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了。

绝对批判的自我辩护有成套的辩护语汇：

“本来也并不”，“只是不被重视”，“况且，还有”，“还没有完全”，“尽管——但是”，“不仅，而且主要是”，“其实，同样也只是”，“批判本应该，只要这是可能的，同时，只要……”，“**如果**……那末还是不能不**同时**承认”、“难道这不是很自然的，难道这不是不可避免的”，“同样也不”……诸如此类等等。

绝对的批判在不久之前还用下面这些话表达了类似的辩护的言词：

“‘虽然’和‘但是’，‘诚然’和‘然而’，天上的‘不’和地上的‘是’——这就是最新神学的支柱，就是它昂然阔步所用的高跷，是它的整个智慧所仅有的把戏，是它在其一切言谈中所惯用的说法，是它的始与终。”（“基督教真相”第102页）

(b) 犹太人问题，第三号

“绝对的批判”并不满足于以自己的自传来证实它固有的神通广大，“**正像创造新东西那样首次来创造旧东西**”。它也不满足于**亲自出马**来为自己的过去作辩护。现在，它给第三者、其余的世俗界提出了一项绝对的“任务”，而且是“**目前**的**主要**任务”，这就是为鲍威尔的行为和“大作”**辩护**。

“德法年鉴”刊载了一篇对鲍威尔先生的小册子“**犹太人问题**”[48]的评论。这篇文章揭露了鲍威尔把“**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混为一谈的这个基本错误。固然，在该文中“首先”没有对旧的犹太人问题提供“**正确的提法**”；但是，“犹太人问题”能够得到考察和解

决是依据了现代对全部**旧问题**的那种提法，也正是由于这种提法，旧的问题才由过去的“问题”变成了现代的“问题”。

看来，绝对的批判认为在**第三次**征讨中有必要给“德法年鉴”一个答复。在这里，绝对的批判首先**承认**：

“在‘犹太人问题’中犯了同样的‘**过失**’——把**政治**本质和**人类**本质混为一谈。”

批判指出：

“现在来指责批判还在**两**年前部分地所持的立场，未免太迟了。”“反之，**任务不外是对批判**甚至曾不得不……研究政治这一点加以说明。”

“**两**年前”？现在，我们就按**绝对的**日历，从批判的救世主即鲍威尔主办的“文学报”**诞生的那一年**算起吧。批判的救世主诞生于 1843 年。同年，“犹太人问题”增订第二版问世。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张”[49]这一文集中对“犹太人问题”进行“批判的”研究，也是在旧历 1843 年，不过日期更晚一点。就在这重要的旧历 1843 年，或在批判的日历元年“德国年鉴”和“莱茵报”相继**查封之后**，出现了鲍威尔先生的荒唐的政治大作“**国家、宗教和政党**”。这本书原封不动地重犯了鲍威尔在“**政治**本质”这一问题上的老毛病。辩护者被迫假造了一份**年代表**。

对于鲍威尔先生为什么“**甚至**”“**不得不**”研究政治这一点的“**说明**”，只是在某些条件下才具有普遍意义。这也就是说，既然绝对的批判的无辜、纯洁和绝对早被奉为**基本的信条**，那末，与这种信条相矛盾的一切事实当然会变成这样一些难解的、引人入胜的和玄妙莫测的谜，而这些谜在神学家看来显然是一种神的非神的行动。

相反地，如果把“**批判家**”看做有限的单个人，如果不把他

和他所处的时代的**界限**分离开来，那末，回答**为什么“批判家”甚至**不得不在世界范围以内发展起来这一问题，将是多余的，因为**问题**本身已经不复存在了。

不过，如果绝对的批判要坚持自己的要求，那我们就准备写一篇烦琐的短论来阐明下面的**“现代问题”**：

“为什么正是必须由布鲁诺·鲍威尔先生来证明圣母马利亚是从圣灵怀了孕这个事实呢？”“为什么鲍威尔先生必须证明，显现在亚伯拉罕面前的天使是神的**真正的**流出体呢？即尚未达到**消化食物**所必要的浓度的流出体？”“为什么鲍威尔先生要为普鲁士王室作辩护并且把普鲁士国家奉为**绝对**的国家呢？”“为什么鲍威尔先生在自己的‘复类福音作者批判’里要用**‘无限的自我意识’**来代替人呢？”“为什么鲍威尔先生在**‘基督教真相’**中要用**黑格尔**的形式来重谈**基督教的创世**说呢？”“为什么鲍威尔先生要要求自己和别人来**‘说明’**他应该犯错误这种怪事呢？”

我们在证明所有这些“批判的”、同样也是“绝对的”必然性之前，还是先来看一看**“批判的”**辩护伎俩。

“犹太人问题……应该……首先获得一个**正确的**提法，它既是**宗教的**、**神学的**问题，也是**政治的**问题。”“在考察和解决这两个问题时，**批判既**不抱着**宗教的**观点，**也**不抱着**政治的**观点。”

问题在于：在“德法年鉴”里，鲍威尔把“犹太人问题”解释成是真神学和**假**政治的。

首先，**“批判”**回答了对**神学**局限性的“责备”：

“犹太人问题是**宗教**问题。**启蒙**认为，只要把**宗教的对抗**说成**无关紧要的东西**或者甚至全盘予以否定，就可以解决犹太人问题。可是，**批判**却必须把这一对抗表述得一清二楚。”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犹太人问题的**政治**方面，那我们就会发现神学家鲍威尔先生甚至在政治上所研究的也不是政治，而是神学。

“德法年鉴”反对鲍威尔把犹太人问题解释成“**纯宗教**”问题，而这里特别指的是布鲁诺·鲍威尔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张”这本文集里的一篇文章，标题是：

“现在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

这篇文章和旧的“启蒙”毫无关联。该文包含着鲍威尔先生对现代犹太人获得解放的能力，即获得解放的可能性的**肯定**见解。

“批判”说道：

“犹太人问题是**宗教**问题。”

试问：**什么**是**宗教**问题，特别是，**什么**是当前的宗教问题？

这位**神学家**却根据**外表**作出判断，把**宗教**问题就看成**宗教**问题。但是，请“批判”回想一下它对**辛利克斯**教授所做的那番解释：当前的**政治**利益具有**社会**意义，关于**政治**利益——批判说——“**没有什么可多谈的**”。

根据同样理由，“德法年鉴”就对批判说道：**宗教**的当前问题如今有着**社会**意义。关于**宗教**利益**本身**却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只有这位**神学家**才能认为：谈宗教就是谈宗教。的确，“德法年鉴”在这里也犯了个“**错误**”，它并没有想停留在“**社会的**”**这个词**上，而是进一步描述了犹太人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真实**处境。只要剥掉掩盖着犹太精神实质的**宗教**外壳，掏出犹太精神的经验的、世俗的、实际的内核，就能够规划一个消溶这种内核的**真正的社会形式**。而鲍威尔先生却以“宗教问题”就是“宗教问题”为满足。

鲍威尔先生造成这样一种**假象**，似乎在“德法年鉴”中否定了

犹太人问题也是**宗教**问题。决非如此。相反地，在该杂志中曾经指出，鲍威尔先生**只**了解犹太精神的**宗教**本质，但不了解这一宗教本质的**世俗的现实的基础**。他把**宗教意识**当做某种独立的实质来反对。所以，鲍威尔先生不是用**现实的犹太人**去解释犹太教的秘密，而是用**犹太教**去解释**现实的犹太人**。因此，鲍威尔先生对犹太人的理解仅限于犹太人是**神学**的直接对象或犹太人是**神学家**。

因此，鲍威尔先生就没有发觉，现实的世俗的犹太精神，因而**宗教的**犹太精神，是由**现今的市民生活**所不断地产生出来的，并且在**货币制度中**获得了高度的发展。他之所以不能发觉这一点，是因为他不知道犹太精神是现实世界的一环，而只把它当做是**他的**世界即**神学**的一环；是因为他作为一个上帝的虔诚信徒，把**现实的**犹太人不是看做进行**日常**活动的犹太人，而是看做**安息日**里的伪善的**犹太人**。在这位**笃信基督**的神学家鲍威尔先生看来，犹太精神的**世界历史**意义必须在基督教**诞生的那一时刻**而告终。所以，他必须得重复那种认为保存犹太精神就是**违反**历史的陈旧的正统观点；而诸如似乎犹太精神的存在仅仅是上帝咒骂的**确证**，是基督启示的**明证**等等陈旧的神学偏见，则应该在鲍威尔那里以**批判的神学**的形式复活起来。根据这种形式，犹太精神现在和过去的存在，只不过是对基督教的非世俗起源的**粗暴的宗教的怀疑**，也就是说，是反抗基督启示的**明证**。

和所有这一切相反，在“德法年鉴”中曾经证明犹太精神是**依靠**历史、**通过**历史并且**同**历史**一起**保存下来和发展起来的，然而，这种发展不是神学家的眼睛，也不是在**宗教学**说中所能看到的，而只有世俗人的眼睛，只有在**工商业的实践**中才能看到。在“德法年鉴”中曾经说明，**为什么**实践中的犹太精神只有在完备的

基督教世界里才能达到完备的程度；不但如此，那里还指出，它只不过是**基督教世界本身**的完备的**实践**。**现代**犹太人的生活不能以他们的宗教（好像宗教就是一种特殊的孤芳自赏的本质）来解释；相反地，犹太教的生命力只能用**虚幻地**反映在犹太教中的市民社会的实际基础来解释。因此，犹太人解放为人，或者人从犹太精神中获得解放，不应像鲍威尔先生那样理解为犹太人的特殊任务，而应理解为彻头彻尾渗透着**犹太精神**的现代世界的普遍的实践任务。已经证明，克服犹太本质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消灭**市民社会中犹太精神**的任务，消灭现代生活实践中的非人性的任务，这种非人性的最高表现就是**货币制度**。

鲍威尔先生这位**名副其实的**神学家，尽管他是**批判的神学家，**或者是**神学的批判家**，也没有能够超乎**宗教的对**立之上。他把犹太人对基督教世界的关系**仅仅**看做**犹太教**对**基督教**的关系。他甚至不得不通过犹太人和基督徒跟**批判的**宗教（**无神论**、**最高**的**有神论**、对神的**否认**）的**对立**，来批判地恢复犹太教和基督之间的宗教对立。最后，他由于自己的**神学狂**，不得不把"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即现代世界"获得自由"的能力，仅仅**局限于**他们理解神学的"批判"和在这种"批判"的圈子之内进行活动的能力。正如正统的神学家所认为的，整个世界都可以归结为"宗教和神学"。（他也可以如法泡制，把世界归结为政治、政治经济学等等，并且可以把**神学**譬如说叫做天上的**政治经济学**，因为，它是一门关于"**精神财富**"和天国财宝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学问！）同样，在激进的批判的神学家看来，世界解放自身的**能力只不过是**把"宗教和神学"当做"宗教和神学"加以批判的抽象能力。他所唯一知道的斗争是反对自我意识的**宗教**局限性的斗争，然而自我意识的批判的"**纯洁**

性”和“**无限性**”也同样是神学的局限性。

可见，鲍威尔先生之所以用**宗教**和**神学的**方式来考察**宗教**和**神学**问题，就是因为他把现代的“宗教”问题看做“**纯宗教的**”问题。他的“问题的**正确提法**”其用意只在于对他“**自己的能力**”——回答来说，问题的提法是“正确的”！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犹太人问题**的政治方面。

在某些国家里，**犹太人**（如同基督徒一样）**在政治上**已经获得了完全的**解放**。但是犹太人和基督徒还远远没有获得**人类**意义上的解放。可见，**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是有**差别**的。所以，必须对**政治**解放的实质，也就是对发达的现代国家的实质进行研究。可是，对那些还不能**在政治上**解放犹太人的国家，也应该根据和完备的政治国家的对比予以估价，而且应该把它们看做不发达的国家。

这就是研究犹太人的“**政治**解放”这一问题所依据的观点，而在“德法年鉴”中也就是根据这一观点来研究这个问题的。

鲍威尔先生为“批判”的“犹太人问题”作了如下的辩护：

“有人向犹太人指出，他们对于他们向之要求自由的那种**制度**存在着妄想。”

事实上，鲍威尔先生已经指出**德国**犹太人的妄想：他们在没有任何社会政治生活的国家里要求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在只有政治特权的地方要求**政治权利**。在这方面已经向鲍威尔先生表明，他自己也沉浸在关于“德国政治制度”的“妄想”之中，而且一点也不亚于犹太人。正因为这样，他以“**基督教国家**”不可能从政治上解放犹太人这一点来说明犹太人在德意志国家的处境。他歪曲了事情的真相，他把**特权**国家、**基督教德意志**国家设想成绝对的基督教国家。与此相反，曾经向他证明：没有任何宗教特权的

政治上完备的现代国家，也就是完备的**基督教**国家；因此，完备的基督教国家不仅**能够**解放犹太人，而且是真正地解放了他们，同时按这种国家的本性来说，也应该解放他们。

“有人向犹太人指出……他们沉湎于关于自身的种种妄想之中，尽管他们以为他们是在要求**自由**和要求承认**自由人性**，其实他们只是力争**特权**，别无他图。”

自由！**承认自由人性**！**特权**！多么动听的字眼。为了进行辩护何不使用这些字眼来规避某些问题！

自由？这里指的是**政治**自由。已经向鲍威尔先生指出，当犹太人要求自由而又不想放弃自己的宗教的时候，他正是在“**从事政治**”，而不是提出任何与**政治**自由相抵触的条件。已经向鲍威尔先生指出，把人**划分**为非宗教的**公民**和宗教的**个人**，这同政治解放毫不矛盾。已经向他指出，当国家摆脱了**国教**并且让宗教在市民社会范围内存在时，国家就从宗教下解放出来了，同样，当单个的人已经不再把宗教当做**公事**而当做自己的**私事**来对待时，他**在政治上**也就从宗教下解放出来了。最后，已经指出，法国**革命**对**宗教**的**恐怖**态度远没有驳倒这种看法，相反地，却证实了这种看法。

鲍威尔先生不去研究**现代**国家对于宗教的真正关系，而认为必须给自己设想出一个**批判的**国家来，这样的国家只不过是在他的幻想中**把自己扩张为国家的神学批判家**。当鲍威尔先生陷入**政治**中的时候，他总是重新把政治当做自己的信仰即**批判的**信仰的俘虏。只要他研究国家，他总是把它变成对付“**敌人**”即**非批判的**宗教和神学的**论据**。在他看来，国家是**批判神学**的心愿的执行者。

当鲍威尔先生第一次摆脱了**正统**的非批判的**神学时**，在他的心目中，**政治的权威**就代替了**宗教的权威**。他对耶和华的信仰一变

而为对普鲁士国家的信仰。布鲁诺·鲍威尔在自己的小册子“**普鲁士福音教**”[50]里面，不仅把普鲁士国家奉为**绝对**，而且做得非常彻底，把普鲁士王室也奉为**绝对**。但在事实上，这个国家并没有唤起鲍威尔先生的**政治**兴趣：相反地，在“批判”看来，这个国家的功绩就是通过教会**合并**来取消宗教信条，利用警察来迫害异教派。

1840年发生的政治运动使鲍威尔先生摆脱了**他的保守派政治**，并且一度使他上升到**自由派**政治的水平。但是，这种政治，老实说，只不过是神学的**借口**而已。在“自由的正义事业和我自己的事业”这一著作中，自由的国家是波恩神学院的批判家，是反对宗教的论据。“犹太人问题”把注意力主要是集中在国家和宗教之间的对立上，以致对政治解放的批判变成了对犹太教的批判。鲍威尔在其最近的政治著作“国家、宗教和政党”里终于暴露了这位把自己扩张为国家的批判家的那种最隐秘的心愿。**宗教为国家牺牲**，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国家仅仅是消灭“**批判**”的敌人即非批判的宗教和神学的**工具**。最后，正像1840年以后的政治运动使**批判**摆脱了自己的保守派政治一样，从1843年以来在德国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使**批判**摆脱了（虽然只是表面地）一切的政治，从此以后，**批判**终于能把自己的反**非批判**的神学的著作说成是社会的作品，而且也可以毫无阻碍地来研究自己的**批判的**神学——使精神和群众对立，——以及宣告批判的恩人和救世主即将降临。

言归正传吧！

承认自由的人性？犹太人不只是想力求承认，而且真的是在力求承认“自由的人性”，这种“自由的人性”就是在所谓普遍**人权**中得到**典型**的承认的那种最“自由的人性”。鲍威尔先生自己则以为，犹太人力图承认自己的自由的人性，正是说明他们力图获

得普遍**人权**。

在“德法年鉴”中已经向鲍威尔先生证明：这种“自由的人性”和对它的“承认”不过是承认**利己的市民个人**，承认构成这种个人的生活内容，即构成**现代**市民生活内容的那些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的**不可抑制**的运动；因此，**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宗教，而只是使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财产，而是使人有**占有财产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放弃追求财富的龌龊行为，而只是使人有**经营的自由**。

已经向他指出，**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的必要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人，即自己营业的**奴隶**，自己以及别人的**私欲**的奴隶。现代国家就是通过**普遍人权**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而它并没有创立这个基础。现代国家既然是由于自身的发展而不得不挣脱旧的政治桎梏的市民社会的产物，所以，它就用**宣布人权**的办法从自己的方面来承认自己的出生地和自己的基础。可见，犹太人的**政治**解放以及赋予犹太人以“**人权**”，这是一种双方面相互制约的行为。当里谢尔先生顺便谈到行动自由、居住自由、迁徙自由、经营自由等等时，就正确地阐明了犹太人力图使自由的人性获得承认的意义。“**自由的人性**”的所有这些表现在法国人权宣言中得到了极其肯定的承认。犹太人就更有权利要求承认自己的“自由的人性”，因为“自由的市民社会”具有纯粹商业的犹太人的性质，而犹太人老早就已经是它的必然成员了。其次，在“德法年鉴”中曾经指出，为什么市民社会的成员叫做 par excellence〔道地的〕

“人”，为什么人权称为“天赋的权利”。

黑格尔曾经说过，“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而“**批判**”关于人权是不可能说出什么比黑格尔更有批判性的言论的。最后，批判断言，犹太人和基督徒为了使别人和自己获得普遍的人权，**应该放弃信仰的特权**（批判的神学家都是从自己的**唯一的**固定观念出发来阐明一切事物的），和它的这种断言特别对立的是出现在一切非批判的人权宣言中的一项事实：信仰任何事物的**权利**，举行任何一种宗教仪式的权利，这些都极其肯定地被认为是**普遍人权**。此外，“**批判**”还应该知道，作为推翻阿贝尔派的借口，主要就是由于它侵犯了**宗教自由**而硬说它是侵犯了人权；同样，在后来恢复宗教仪式的自由时，人们也是以人权为口实的。

“至于谈到**政治的**本质，那末，**批判**已经探溯它的矛盾，一直探溯到五十年前就曾经最彻底地研究过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的地步，——一直探溯到**法国代议制**。在这种代议制之下，理论自由被实践所推翻，而实际生活的自由却又在理论中徒然寻求自己的表现。

“在已经揭发了基本谬误之后，就必须指出，批判所发现的**法国议院辩论中的矛盾**，即**自由的理论**和**特权的实际势力**之间的矛盾，特权的立法效力和**公法状况**（在这种状况下**纯个人的利己主义**力图攫取**特权的闭塞**）之间的矛盾，——这个矛也就是这个范围内的**普遍矛盾**。”

批判在法国议院辩论中所发现的矛盾，不外是**立宪主义**的矛盾。如果批判把它了解为**普遍的**矛盾，那它就算是了解了立宪主义的一般矛盾。如果批判比它认为“应该”看到的还看得远一些，也就是说，如果它想到了必须**消除**这个普遍的矛盾，那末，它就会放弃立宪**君主制**而主张**民主的代议制国家**，主张完备的现代国家了。批判既然远没有对政治解放的本质进行批判的分析，没有揭露这种本质和人类本质的关系，就只能谈到政治解放的**事实**、发

达的现代国家，也就是说，只能谈到这样的地步：现代国家的存在是符合它的本质的，所以可以发现和说明那些构成现代国家本质的相对**缺陷**和绝对**缺陷**。

当**批判**自以为自己是超乎“**政治本质**”之上的时候，它反而大大低于这一本质，它总还要在政治本质中去继续寻求解决**自己的**矛盾的方法，总还要坚持自己对**现代国家的原则**一窍不通的顽固态度。上面引用的那些“批判的”话越是明白地证明这一点，它们就越有价值。

批判把“**特权的实际势力**”和“**自由的理论**”对立起来，把“**公法状况**”和“**特权的立法效力**”对立起来。

为了不至于误解**批判**的意见，我们就得重提一下批判在法国议会辩论中所发现的那一矛盾，也就是“应该理解为”**普遍**的矛盾的那一矛盾。顺便来谈一下每周规定一天作为童工的休息日的问题。有人提议**礼拜日**。有一个议员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建议在法律中不提礼拜日，因为他认为这是违背宪法的。马丁（杜·诺尔）大臣认为这一提案有宣布基督教已经不复存在的企图。克莱米约先生代表法国的犹太人宣称，本着尊重绝大部分法国人的宗教的精神，犹太人并不反对提礼拜日。可见，根据自由的理论，犹太人和基督徒是平等的，但根据实际来看，和犹太人比较，基督徒却享有特权，因为，不然的话，基督教的礼拜日怎么能够在为全体法国人制定的法律中得到反映呢？难道犹太教的安息日就没有同样的权利吗？或者，也有这样的情形，在法国的实际生活中，犹太人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基督教特权之害，然而法律却不敢公开承认这种实际的平等。鲍威尔先生在“犹太人问题”里所举出的政治本质的一切矛盾，**立宪主义**的一切矛盾，就是如此。而立宪主义根本就是现代代议制国

家和旧的特权国家之间的矛盾。

鲍威尔先生犯了一个最根本的错误，他认为，由于把这个矛盾当做“普遍的”矛盾来理解和批判，他便从**政治的**本质上升到了**人类的**本质。对于这个矛盾的这种理解只是说明了从半政治的解放上升到完全政治的解放，从立宪君主制上升到民主代议制国家。

鲍威尔先生认为，他在废除**特权**的同时，也就废除了特权的**对象**。针对马丁（杜·诺尔）先生的声明，他指出：

“如果**不存在特权宗教，也就不会存在任何宗教**。抽掉宗教的排他性，宗教也就不复存在了。”

工业活动并不因**行帮**、行会和同业公会的**特权**的消灭而消灭，相反地，只有消灭了这些特权之后，真正的**工业**才会发展起来。**土地私有制**并不因土地占有**特权**的消灭而消灭；相反地，只有在废除了土地私有制的特权以后，才通过土地的自由分割和自由转让而开始土地私有制的普遍运动。**贸易**并不因**贸易特权**的消灭而消灭；相反地，只有通过自由贸易，它才获得真正的实现。同样地，只有在没有任何**特权**宗教的地方（北美的自由州）宗教才**实际上**普遍地发展起来。

现代的**“公法状况”**的基础、现代发达的国家的基础，并不像**批判**所想的那样是由特权来统治的社会，而是**废除了特权**和**消灭了特权**的社会，是使在政治上仍被特权束缚的生活要素获得自由活动场所的发达的**市民社会**。在这里，**任何“特权的闭塞”**既不和别的闭塞对立，也不和公法状况对立。自由工业和自由贸易消除了特权的闭塞，从而也消除了各种特权的闭塞之间的斗争；相反地，它们却把从特权下解放出来的、已经不和别人联系（即使是**表面上的**一般结合）的人放在特权的地位上（这种特权把人们

和社会整体分离开来，而同时又把他们结合在一个规模很小的、特殊的团体里面)，并且引起了人反对人、个人反对个人的斗争。同样整个的**市民社会**只是由于**个人的特性**而彼此分离的个人之间的相互斗争，是摆脱了特权桎梏的自发的生命力的不可遏止的普遍运动。**民主的代议制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对立是公法**团体**和**奴隶制**的**典型**对立的完成。在现代世界中每一个人都是奴隶制度的成员，**同时**也是公法团体的成员。**市民社会的奴隶制**恰恰在**表面**上看来是最大的**自由**，因为它似乎是个人**独立**的完备形式；这种个人往往把像财产、工业、宗教等这些孤立的生活要素所表现的那种既不再受一般的结合也不再受人所约束的不可遏止的运动，当做**自己的**自由，但是，这样的运动反而成了个人的完备的奴隶制和人性的直接对立物。这里，代替了**特权**的是**法**。

这么说来，在这里，自由的理论和特权的实际势力之间不但不存在任何矛盾，特权的实际消灭、**自由的**工业和**自由的**贸易等反而与“自由的理论”相适应，**任何**特权的闭塞都不与公法状况相对立，批判所发现的矛盾已被**消除**——只有在这里，才**存在着完备的现代国家**。

和马丁（杜·诺尔）先生的意见完全一致的鲍威尔先生就法国议会的辩论所宣布的那一条法律正好同在这里占统治地位的法律**相反**：

“正像马丁（杜·诺尔）先生把**法律**中应该去掉基督教**礼拜日**这项建议解释成宣布基督教不再存在的建议一样，犹太人**安息日的法律**对犹太人不再有效这样的宣言有同样的理由（而这理由是有充分根据的）可以成为**犹太教不再存在的通告**。”

在发达的现代国家里，情形正好**相反**。国家宣布：宗教，正像市

民生活的其他要素一样，只有自国家公布它们是**非政治的**因而让它们自行其事的时候起，才**开始**获得充分的存在。取消这些要素的**政治**存在，譬如说，通过**选举资格**的废除来取消**财产**的政治存在，通过**国教**的废除来从政治上取消**宗教**，——伴随着宣布它们的政治死亡而来的，便是这些要素的生命的蓬勃发展，这个生命从此便顺利无阻地服从于自身的规律并十分广泛地展现出来。

无政府状态是摆脱了使社会解体的那种**特权**的市民社会的规律，而**市民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则是现代**公法状况**的基础，正像公法状况本身也是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保障一样。它们怎样互相对立，也就怎样互相制约。

从上所述，我们就可以看出**批判**对"新东西"领会程度了。如果我们不打算超越"纯批判"的范围，那末我们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批判在法国议会辩论中既然发现了上述矛盾，为什么不想把它了解成**普遍的**矛盾呢？在他看来这是"**应该**"如此的。

"可是，当时要走这一步**是不可能的**……不仅因为……不仅因为……**而且因为**如果没有和自己的对立物发生内在交错的这点**最后残余**，进行批判**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缺少这一点，批判就**不可能达到**只有**一步之差**便可达到的**那个地方**。"

不可能的……因为……是不可能的！**批判**肯定地说，这个决定性的"**一步**"是不可能的，但为了"能够达到只有**一步**之差便可达到的那个地方"，它又是必要的。谁会起来反驳这一点呢？为要达到只有"**一步**"之差便可到达的那个地方，决不可能再走那么"**一步**"，因为这一步必然使我们走过那个地方，结果又多走了"**一步**"。

结局好，一切好！**批判**在它和敌视鲍威尔先生的"犹太人问题"的**群众**进行战斗而近于尾声的时候供认，**它**对"**人权**"的了解，

它对“法国革命时代的宗教的评价”，“**它**有时**在自己的议论终结部分**指出的那种自由的政治本质”，总之，整个“法国革命的时代对于**批判**说来，恰恰是一个象征（因而，从精确的实在的意义上说，这个时代并不是法国人进行革命尝试的时代）也说是说，不过是**批判**最终在自己的面前看到的那些形象的虚幻的表现”。我们并不想使批判扫兴，因为，如果说它在政治上也犯了过失的话，那末这往往只发生在它的著作的“末尾”和“终结”部分。有一个鼎鼎大名的醉鬼在午夜以前从来没有喝醉过酒，他总是以此自慰。

在“犹太人问题”的幅员上，**批判**无疑地从**敌人**手里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地盘。受鲍威尔先生庇护的**批判**的著作，在“犹太人问题”第一号里还是绝对的，而且揭示了“犹太人问题”的“**真正的**”和“**普遍的**”意义。在第二号里，**批判**“不**想**而且也没有**权利**”超出**批判**的范围以外。在第三号里，批判本来**应该**再走“**一步**”，但是走这一步又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不是它的“愿望和权限”，而是它陷入了自己的“对立物”的罗网，阻碍它完成这“**一步**”。它很想跳过最后的一关，然而遗憾的是，它的批判的快靴却被残留的**最后一点点群众**纠缠得寸步难行。

（c）对法国革命的批判的战斗

群众的局限性迫使“**精神**”、**批判**、鲍威尔先生不把**法国革命**当做“**散文**意义上的”法国人的革命实验的时代，而“**只**”当做它自己的批判的幻想的“**象征和虚象**”。**批判**在**自悔**“**失策**”之余，又对**革命**作了**新的探讨**。同时它还惩罚了使它断送清白的诱惑者——“群众”，并且告诉他们这一“新的探讨”的结果。

“**法国革命**是一种还完全属于 18 世纪的实验。”

法国革命这种 18 世纪的实验还完全是 18 世纪的实验，而不是 19 世纪的实验，这种年代学上的真理似乎“还完全”属于那类“一开始就不言而喻的”真理。但是在对“明如白昼”的真理抱有很大成见的**批判**所用的术语中，这种年代学上的真理叫做**“探讨”**，并且自然也就在“对革命的新的探讨”中获得一隅之地。

“但是，法国革命所产生的思想并没有超出革命想用暴力来推翻的那个**秩序**的范围。”

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由此可见，从字面的**意思**看来，上述批判的说法仍然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即仍然是**“探讨”**。

并未被这种探讨所涉及的法国革命产生了超出整个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的思想。1789 年在 Cercle social〔**社会小组**〕[51]中开始、中途以**勒克莱尔克**和**卢**为主要代表、最后以**巴贝夫**密谋的失败而暂时遭到失败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共产主义的**思想。1830 年革命以后，在法国，这种思想又为**巴贝夫**的友人**邦纳罗蒂**所倡导。这种思想经过彻底的研讨，就成为**新世界秩序的思想**。

“在革命由此(!)①而消灭了人民生活中的封建屏障以后，它就不得不满足于民族的纯洁的利己主义，甚至煽起这种利己主义。而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抑制这种利己主义，抑制的办法就是对它加以必要的补充，承认最高的存在物，这样最大限度地确认那应该把单个的利己主义原子连接起来的普遍国家秩序。”

---

① 括弧里的惊叹号是马克思加的。——译者注

民族的利己主义是和封建等级的利己主义相对立的普遍国家秩序的自发的利己主义。最高的存在就是最大限度地确认普遍国家秩序,因而也就是最大限度地确认民族。但是最高的存在必须抑制民族的利己主义,即抑制普遍国家秩序的利己主义!由确认利己主义、而且由**宗教上**确认利己主义(即承认它是超人的,因而是摆脱了人的约束的存在物)来抑制利己主义,这真是批判的任务!最高存在物的创造者对自己这种批判的意图是一无所知的。

认为民族狂热依靠于宗教狂热的**毕舍**先生,是更了解自己的英雄**罗伯斯比尔**的。

民族主义导致了罗马和希腊的灭亡。因此,当**批判**断言民族主义促使法国革命失败的时候,**批判**并没有说出有关法国革命的任何独到见解。同样,它把民族的利己主义规定为**纯洁的**利己主义,这也没有说出有关民族的任何东西。如果把这种纯利己主义和**费希特的"自我"**的纯洁的利己主义加以比较,那末这种利己主义就反而成了非常阴暗的、掺杂着血和肉的、天生的利己主义。如果说这种利己主义的纯洁性只是相对的,即只是针对封建等级的利己主义而言,那末就没有必要对"革命"作"新的探讨",从而揭示出以民族为内容的利己主义较之以某种特殊等级和特殊团体为内容的利己主义更普遍或更纯洁。

批判对普遍国家秩序的阐述并不是教益很少的。这些阐述仅限于断定普遍国家秩序应当把单个的利己主义原子联合起来。

确切地和在散文的意义上说,市民社会的成员根本不是什么**原子**。原子的**特性**就在于它没有**任何**属性,因此也没有任何由它自己的**本性必然**所制约着的、跟身外的其他存在物的关系。原子是**没有需要**的,是**自我满足**的;它身外的世界是绝对的**空虚**,也就是说,

这种世界没有任何内容，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重要性，这乃是因为在原子的自身中已经**万物皆备**的缘故。就让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者在他那非感性的观念和无生命的抽象中把自己设想为**原子**，即把自己设想成和任何东西无关的、自满自足的、没有需要的、**绝对完善的**、极乐世界的存在。非极乐世界的**感性的现实**是不顾他这种想像的。他的每一种感觉都迫使他相信世界和他以外的其他人的存在，甚至他那**世俗**的胃也每天都提醒他在他**以外的**世界并不是**空虚的**，而真正是把他**灌饱**的东西。他的每一种本质活动和特性，他的每一种生活本能都会成为一种**需要**，成为一种把他的**私欲**变为对他身外的其他事物和其他人的癖好的**需要**。因为一个人的需要，对于另一个拥有满足这种需要的资料的利己主义者来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意义，就是说，同这种需要的满足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建立这种联系，这样就相互成为他人的需要和这种需要的对象之间的皮条匠。由此可见，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它们表现为怎样的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他们之间的**现实的**联系不是**政治**生活，而是**市民**生活。因此，把市民社会的**原子**彼此连接起来的不是**国家**，而是如下的事实：他们只是在**观念**中、在自己的**想像**这个**天堂中**才是**原子**，**而在实际上**他们是和原子截然不同的存在物，他们不是**神类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利己主义的人**。在今天，只有**政治上的迷信**才会以为国家应当巩固市民生活，而事实上却相反，正是市民生活巩固国家。

"创造了完全以**正义**和**美德**为生活准则的'**自由人民**'的**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的伟大思想——例如，见圣茹斯特关于丹东罪行的报告及其他有关普遍警察制的报告——完全是由于恐怖政策才能维持一段时间，这种思想是一

种**矛盾，人民本质**的卑劣而自私的分子**对付这种矛盾**都一如预料那样畏怯和阴险。”

把“自由人民”说成“**人民本质**”的分子所必须**对付**的“**矛盾**”，这种绝**对批判的**说法究竟绝对空虚到何种程度，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照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的意思，**自由、正义、美德**反而只能是“**人民**”的必然的表现，只能是“人民本质”的属性。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十分明确地谈到**古代的、“人民本质”**所独有的“自由、正义、美德”。**斯巴达人、雅典人、罗马人**在自己强盛的时代里就是“自由的、正义的、有美德的人民”。

罗伯斯比尔在他论述公共道德的原则的演说中问道（在1794年2月5日召开的公会会议上）：“民主的或人民的政府的**根本原则**是什么？**是美德**。我说的是**公共的**美德，这种美德曾在**希腊**和**罗马**做出了那么伟大的奇迹，并且将在共和的法兰西做出更令人惊异的奇迹来。我们说的美德就是热爱祖国和祖国的法律。”

接着，罗伯斯比尔明确地把**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称做“自由人民”。他不断地要听众回忆古代的“**人民本质**”，并且既提到它的英雄莱喀古士、狄摩西尼、米太雅第、亚立司泰提、布鲁士斯，也提到它的败类卡提利纳、凯撒、克罗狄乌斯、皮索。

圣茹斯特在关于逮捕丹东的报告（批判引用了这一报告）中极为明确地说：

“在**罗马人**以后，世界变得空虚了，只有想起罗马人，世界才充实起来，才能够再预言**自由**。”

他以古代的方式斥**丹东**为**卡提利纳**第二。

在**圣茹斯特**的另一个报告（关于**普遍警察制**的报告）中，**共和主义者**被描写成完全具备了**古代**精神即**刚毅、谦逊、朴质**等品

质的人。**警察局**按其本质来说应当是相当于罗马的**市政检查局**那样的机关。他列举了柯德尔、莱喀古士、凯撒、小卡托、卡提利纳、布鲁士斯、安东尼、卡西乌斯等人的名字。最后，**圣茹斯特用一句话**表明了他所要求的“**自由**、正义、美德”的特征，他说：

“革命者都应当成为**罗马人**。”

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和他们的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混淆了以**真正的奴隶制**为基础的古代**实在论民主共和国**和以**被解放了的奴隶制**即**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现代唯灵论民主代议制国家**。一方面，不得不以**人权的形式**承认和批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即工业的、笼罩着普遍竞争的、以自由追求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无政府的、塞满了自我异化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个性的社会，另一方面又想在事后通过单个的人来取缔这个社会的各种**生命表现**，同时还想仿照**古代的**形式来建立这个社会的**政治首脑**，这是多么巨大的错误！

这种错误是悲剧性的，圣茹斯特在临刑之日指着悬挂在康瑟尔热丽大厅里的那块写着“**人权宣言**”的大牌子，以自傲的口吻说道：“但创造这个的毕竟是我。”就在这块牌子上宣布了**人的权利**，而这种人不会是古代共和国的人，正像他的**经济**状况和**工业**状况不是**古代的**一样。

这里不是替**恐怖主义者**的错误做历史的辩解的地方。

“在罗伯斯比尔倒台以后，**政治的启蒙**和**运动**就迅速向成为**拿破仑**的俘获物这个方向上发展，因此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日之后不久就能够说：‘有了我的地方长官、宪兵和僧侣，我就能够利用法国来做我所愿做的一切。’”

正好相反，**世俗的**历史却告听我们：罗伯斯比尔倒台以后，从前想获得空前成就并耽于**幻想**的**政治**启蒙运动，才初次开始平凡

地实现。尽管**恐怖主义**竭力要使资产阶级社会为古代政治生活制度牺牲，革命还是把资产阶级社会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正式承认了这个社会。在**执政内阁**时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浪潮迅速高涨起来。于是出现了创办商业和工业企业的热潮、发财致富的渴望、新的资产阶级生活的喧嚣忙乱，在这里，这种生活的享受初次表现出自己的放肆、轻佻、无礼和狂乱；法兰西的**土地**得到了**真正的**开发，土地的封建结构已经被革命的巨锤打得粉碎，现在无数新的所有者以第一次出现的狂热对这块土地进行了全面的耕作，解放了的工业也第一次活跃起来；——这就是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的某些表现。**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的**代表是**资产阶级**。于是资产阶级**开始**了自己的统治。**人权**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理论**了。

雾月十八日拿破仑的俘获物决不像**批判**所设想的那样（它竟把什么冯·罗泰克先生和韦尔凯尔的话信以为真）是革命运动；拿破仑的俘获物是**自由资产阶级**。要相信这一点，只要读一读当时的立法者们的演说就行了。读了这些演说，就会得到这样的印象：似乎你被人从国民公会送到了现在的某个众议院。

拿破仑是**革命的恐怖主义**对这次革命所公开宣布的**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政治的最后一次战斗的体现。的确，拿破仑已经了解到**现代国家**的真正本质；他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社会的无阻碍的发展、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等等是这种国家的基础。他决定承认和保护这一基础。他不是一个空想的恐怖主义者。但是，拿破仑还是把**国家**看做**目的本身**，而把市民生活仅仅看做司库和他的不能有**自己的意志**的**下属**。他用**不断的战争**来**代替不断的革命**，从而**完成了恐怖主义**。他充分地满足了法兰西民族的利己主义，但是他也要求资产阶

级在为了达到侵略的政治目的而需要的时候牺牲自己的事业、享乐、财富等等。当他专横地压制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主义(即他的日常实践的政治理想主义)的时候,只要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重要的**物质**利益(即商业和工业)一和他拿破仑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他也同样毫不珍惜它们。他对工业琐事的轻视是他对**思想家**的轻视的补充。而在内政方面,他反对资产阶级社会,把资产阶级社会当做他仍然作为绝对的目的本身来体现的国家的敌人。例如,他曾在极密院宣称,他不容许大土地所有者任意耕种或不耕种自己的土地。他那由国家掌管**马车运输**从而使商业受国家支配的计划也有同样的意义。法国的商人策划了首次动摇拿破仑的实力的事件。巴黎的证券交易者用人工制造饥饿的办法迫使拿破仑把向俄国的进攻几乎推迟了两个月,结果这次进攻不得不拖到过晚的时节。

如果说,自由资产阶级在拿破仑时代再一次遇到了革命的恐怖主义,那末在波旁王朝即复辟时代则再一次遇到了反革命。1830年自由资产阶级终于实现了它在1789年的愿望,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的**政治启蒙运动**现在已经**完成**,他们不再把立宪的代议制国家看做国家的理想,不再认为争得立宪的代议制国家就是致力于挽救世界和达到全人类的目的,相反地,他们把这个国家看做自己的**排他的**权力的**官方**表现,看做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政治上的**确认。

从1789年开始的法国革命的生命史,到1830年这次革命的一个要素获得胜利的时候还没有终止,现在这个要素增添了自己**在社会上**很重要这样一种意识。

(d) 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

"18世纪,**斯宾诺莎主义**不仅在他那以物质为实体的法国后嗣学说中占

统治地位，而且也在予物质以精神名称的自然神论中占统治地位……　**法国的斯宾诺莎学派**和自然神论的信徒只不过是在**斯宾诺莎体系**的真缔这个问题上互相争辩的两个流派……　单纯的命运就注定这种启蒙运动要灭亡，就是说，在它被迫向法国运动时期开始的反动投降之后，它已经淹没在**浪漫主义**里了。”

这是**批判**所说的话。

现在我们就扼要地把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历史跟法国唯物主义的世俗的群众的历史做一个对比。我们将毕恭毕敬地承认，在实际演变的历史与按照“**绝对的批判**”（它既创造新东西，同样也创造旧东西）的命令而演变的历史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最后，我们将遵照**批判**的指示，把批判的历史的“为什么？”，“来自何处？”，“去向何方？”这三个问题作为“顽强地研究的对象”。

“**确切地**和在**散文的意义**上说”，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儿、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而鲜明**的斗争。人们用**哲学**来对抗**形而上学**，这正像**费尔巴哈**在他向**黑格尔**作第一次坚决进攻时以**清醒的哲学**来对抗**醉熏熏的思辨**一样。被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所击败的17世纪的**形而上学**，在**德国哲学**中，特别是在19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中，曾有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在**黑格尔**天才地把17世纪的形而上学同后来的一切形而上学及德国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并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之后，对**思辨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的进攻，就像在18世纪那样，又跟对神学的进攻再次配合起来。这种形而上学将永

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在理论**方面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

"**确切地**和在**散文的意义**上说"，**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儿**，一派起源于**洛克**。后一派**主要**是**法国**有教养的分子，它直接导向**社会主义**。前一派是**机械**唯物主义，它成为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的财产。这两个派别在发展过程中是相互交错的。我们没有必要来详细考察直接起源于**笛卡儿**的法国唯物主义，同样，我们也没有必要来详细考察法国的**牛顿**学派和法国一般自然科学的发展。

因此，我们只指出如下的几点：

笛卡儿在其**物理学**中认为**物质**具有独立的创造力，并把**机械**运动看做是物质生命的表现。他把他的物**理学**和他的**形而上学**完全分开。在他的物理学的**范围**内，**物质**是唯一的**实体**，是存在和认识的唯一根据。

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附和**笛卡儿**的**物理学**而同他的形而上学相对立。他的学生的职业是**反形而上学者**，即**物理学家**。

医师勒卢阿为这一学派奠定了基础，医师**卡巴尼斯**是该学派的极盛时代的代表人物，医师**拉美特利**是该学派的中心人物。当笛卡儿还在世的时候，勒卢阿就已经把笛卡儿关于**动物**结构的学说用到人体上来（18世纪**拉美特利**曾这样做过），并宣称灵魂是**肉体的样态**，**思想**是**机械运动**。勒卢阿甚至还认为笛卡儿隐瞒了自己的真正的见解。笛卡儿提出了抗议。18世纪末，**卡巴尼斯**在他的著作"**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关系**"[52]中完成了笛卡儿的唯物主义。

法国直到现在还存在着**笛卡儿派的**唯物主义。它在**机械的自然科学**方面获得了卓越的成就。而这种自然科学却是最不能——“**确切地**和在**散文的意义**上说”，——被指责有**浪漫主义**色彩的。

在法国以**笛卡儿**为主要代表的17世纪的**形而上学**，从诞生之日起就遇上了**唯物主义这一对抗者**。唯物主义通过**伽桑狄**（他恢复了**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来反对笛卡儿。法国和英国的唯物主义始终同**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笛卡儿的形而上学所遇见的另一个反对者是**英国的**唯物主义者**霍布斯**。伽桑狄和霍布斯正是在他们的敌人已经作为官方势力统治着法国的一切学派的时候战胜这个敌人的，而这已是他们去世以后很久的事了。

伏尔泰指出，18世纪法国人对耶稣会派和扬逊派[53]的争论的漠不关心，与其说是由哲学造成的，还不如说是由罗的财政投机造成的。而实际，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衰败可以说是由18世纪唯物主义理论的影响造成的，这正如同这种理论运动本身是由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所促成的一样。这种生活趋向于直接的现实，趋向于尘世的享乐和尘世的利益，趋向于**尘世的**世界。和它那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实践相适应的，必然是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理论。形而上学**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在这里我们只需要大略地指出这种进化的**理论**过程。

17世纪的形而上学（想想笛卡儿、莱布尼茨等人）还是有**积极的**、世俗的内容的。它在数学、物理学以及与它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精密科学方面都有所发现。但是在18世纪初这种表面现象就已经消失了。实证科学脱离了形而上学，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现在，正当实在的本质和尘世的事物开始把人们的全部

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形而上学的全部财富只剩下想像的本质和神灵的事物了。形而上学变得枯燥乏味了。在 17 世纪最后两个伟大的法国形而上学者马勒伯朗士和阿尔诺逝世的那一年，**爱尔维修**和**孔狄亚克**诞生了。

使 17 世纪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在理论上感信扫地**的人是**比埃尔·培尔**。他的武器是用形而上学本身的符咒锻铸成的**怀疑论**。他本人起初是一个笛卡儿派的形而上学者。反对思辨神学的斗争之所以把**费尔巴哈**推向反对**思辨哲学**的斗争，正是因为他看出思辨是神学的最后支柱，从而不得不迫使神学家从虚幻的科学返回到**粗野的**、可恶的**信仰**；同样，对宗教的怀疑引起了培尔对作为这种信仰的支柱的形而上学的怀疑。因此，他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他为了编纂形而上学的灭亡史而成了形而上学的历史学家。他主要是驳斥了**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

比埃尔·培尔不仅用怀疑论摧毁了形而上学，从而为在法国掌握唯物主义和健全理智的哲学打下了基础，他还**证明**，由清一色的无神论者所组成的社会是**可能**存在的，无神论者**能够**成为可敬的人，玷辱人的尊严的不是无神论，而是迷信和偶像崇拜，并从而宣告了注定要立即开始存在的**无神论社会**的来临。

用一位法国作家的话来说，**比埃尔·培尔"对 17 世纪说来，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者，而对 18 世纪说来，则是第一个哲学家"**。

除了否定神学和 17 世纪的形而上学之外，还需要有**肯定的、反形而上学的**体系。人们感到需要一部能够把当时的生活实践归结为一个体系并从理论上加以论证的书。这时，**洛克**关于人类理性的起源的著作[54]很凑巧地在英吉利海峡那边出现了，它像一位久盼的客人一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试问：**洛克**不是**斯宾诺莎**的学生吗？“尘世的”历史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唯物主义是**大不列颠的天生的**产儿。大不列颠的经院哲学家**邓斯·司各脱**就曾经问过自己：**‘物质能不能思维？’**

为了使这种奇迹能够实现，他求助于上帝的万能，即迫使**神学**本身来宣扬**唯物主义**。此外，他还是一个**唯名论者**。唯名论是**英国**唯物主义者理论的主要成分之一，而且一般说来它是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现**。

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的眼中，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科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是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部分。**阿那克萨哥拉**连同他那**无限数量的原始物质**和**德谟克利特**连同他的**原子**，都常常被他当做权威来引证。按照他的学说，**感觉**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泉源**。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在**物质**的固有的特性中，**运动**是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这里所说的运动不仅是**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更是**趋向**、**生命力**、**紧张**，或者用雅科布·伯麦的话来说，是物质的**痛苦**［Qual］。物质的原始形式是物质内部所固有的、活生生的、**本质的力量**，这些力量使物质获得个性，并造成各种特殊的差异。

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但是，用格言形式表述出来的学说本身却反而还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

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

主义**系统化**了。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为了在自己的领域内克服**敌视人的、毫无血肉的**精神，唯物主义只好抑制自己的情欲，当一个**禁欲主义者**。它变成**理智的东西**，同时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展理智的一切结论。

霍布斯根据培根的观点论断说，如果我们的感觉是我们的一切知识的泉源，那末观念、思想、意念等等，就不外乎是多少摆脱了感性形式的实体世界的幻影。科学只能给这些幻影冠以名称。同一个名称可以适用于许多幻影。甚至还可以有名称的名称。但是，如果一方面认为感性世界是一切观念的泉源，而另一方面又硬说一个词的意义不只是一个词，除了我们想像的永远单一的存在物之外，还有某种普遍的存在物，那就矛盾了。**无形体的实体**也像**无形体的物体**一样，是一个矛盾。**物体、存在、实体**是同一种**实在的**观念。决不可以把思维同那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假如“**无限的**”这个词不表示我们的精神能够无限地添加某一数量，那末这个词就**毫无意义**。既然只有物质的东西才是可以觉察到的，才是可以认识的，那末对神的存在就**丝毫**不能有所知了。只有我自己的存在才是确实可信的。人的一切情欲都是正在结束或正在开始的机械运动。追求的对象就是我们谓之幸福的东西。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霍布斯把培根的学说系统化了，但他没有更详尽地论证培根关于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则。

洛克在他论人类理性的起源的著作中，论证了培根和霍布斯的原则。

霍布斯消灭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的**偏见，而科林斯、多德威尔、考尔德、哈特莱、普利斯特列等人则铲除了洛克感觉论的最后的神学藩篱。自然神论——至少对唯物主义者来说——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

我们已经提到过，洛克的著作的出现对于法国人是多么的凑巧。洛克论证了 bon sens 的哲学，即健全理智的哲学，就是说，他间接地说明了，哲学要是不同于健全人的感觉和以这种感觉为依据的理智，是不可能存在的。

曾经直接受教于洛克和**在法国**解释洛克的**孔狄亚克**立即用洛克的感觉论去反对 17 世纪的**形而上学**。他证明法国人完全有权把这种形而上学当做幻想和神学偏见的不成功的结果而予以抛弃。他公开驳斥了**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马勒伯朗士**等人的体系。

他在他的著作“关于人类知识的起源的经验”[55]中发展了洛克的观点，他证明，**经验**和**习惯**的事情不仅是灵魂，而且是感觉，不仅是创造观念的艺术，而且是感性知觉的艺术。因此，人的全部发展都取决于**教育**和**外部环境**。把孔狄亚克从法国各学派中排挤出去的正是**折衷主义**哲学。

法国唯物主义和**英国**唯物主义的区别是与这两个民族的区别相适应的。法国人赋予英国唯物主义以机智，使它有血有肉，能言善辩。他们给它以它过去所没有的气概和优雅风度。他们使它**文明化**了。

爱尔维修也是以洛克的学说为出发点的，他的唯物主义具有真正法国的性质。爱尔维修也随即把他的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爱尔维修“论人”[56]）。感性的印象和自私的欲望、享乐和

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人类智力的天然平等、理性的进步和工业的进步的一致、人的天性的善良和教育的万能，这就是他的体系中的几个主要因素。

拉美特利的著作是笛卡儿唯物主义和英国唯物主义的结合。拉美特利利用了笛卡儿的物理学，甚至利用了它的每一个细节。他的“人是机器”[57]一书是模仿笛卡儿的动物是机器写成的。在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58]中，论述物理学的那一部分也是法国唯物主义和英国唯物主义的结合，而论述道德的部分实质上则是以爱尔维修的道德论为依据。还和形而上学保持着最密切联系并为此受到黑格尔赞许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罗比耐**（“自然论”[59]），和**莱布尼茨**的学说有非常明显的关系。

我们一方面说明了法国唯物主义的两重起源，即起源于笛卡儿的物理学和英国的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又说明了法国唯物主义同 17 世纪的**形而上学**，即笛卡儿、斯宾诺莎、马勒伯朗士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对立，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来叙述沃尔涅、杜毕伊、狄德罗等人的以及重农学派的观点。德国人只是在他们自己开始同**思辨的形而上学**进行斗争以后，才觉察出这种对立的。

笛卡儿的唯物主义成为**真正的自然科学**的财产，而法国唯物主义的另一派则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财产。

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

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

诸如此类的说法，甚至在最老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中也可以几乎一字不差地找到。在这里没有篇幅来对他们加以评论。对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倾向具有代表性的，是洛克的英国早期学生之一**孟德维尔对恶习的辩护**。他证明，在**现代**社会中恶习是**必然的**和**有益的**。这决不是替现代社会辩护。

傅立叶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出发的。**巴贝夫主义者**是粗鲁的、不文明的唯物主义者，但是成熟的共产主义也是**直接**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的。这种唯物主义正是以**爱尔维修**所赋予的形式回到了它的祖国**英国**。**边沁**根据爱尔维修的道德学建立了他那**正确理解的利益**的体系，而**欧文**则从**边沁**的体系出发去论证英国的共产主义。亡命英国的法国人**卡贝**受到了当地共产主义思想的鼓舞，当他回到法国时，他已经成了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德萨米**、**盖伊**等人，像欧文一样，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

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

鲍威尔先生或**批判**究竟是从什么地方给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历史搜罗材料的呢？

(1)**黑格尔**的"哲学史"[60]把法国唯物主义说成斯宾诺莎的实体的**实现**，这无论如何总比"法国的斯宾诺莎学派"理智得多。

(2)**鲍威尔**先生不知什么时候从黑格尔的"哲学史"中知道，法国唯物主义就是斯宾诺莎**学派**。如果他现在从黑格尔的另一著作里发现，自然神论和唯物主义是对**同一个**基本原则持不同理解的**两个派别**，那末他就会得出结论说，斯宾诺莎有**两个**在其体系的真谛方面互相争辩的学派。鲍威尔先生满可以在黑格尔的"现象学"中找到我们所谈到的这一段说明。现在就把它照抄在下面：

"启蒙运动内部在绝对本质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并分裂成了**两派**……　一派……把没有任何谓语的绝对物称为……**最高的绝对的存在**……另一派却把它叫做为**物质**……　可是，二者都是**同一个**概念，——区别并不在于事物本身，而仅仅在于两种结构的出发点各不相同。"（黑格尔"现象学"第420、421、422页）

(3)最后，鲍威尔先生还可以从黑格尔那里知道：如果实体不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过渡为概念和自我意识，那它就会成为"浪漫主义"的财产。"哈雷年鉴"[61]当时也曾做过类似的论断。

但是，"**精神**"无论如何总得给它的"敌人"**唯物主义**注定一种"**愚钝的命运**"。

——

注释。法国唯物主义同笛卡儿和洛克的联系，以及18世纪的哲学同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对立，在大多数近代**法国**哲学史中都有详尽的阐述。和批判的批判相反，我们在这里只要

重复一下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东西就行了。可是，18 世纪的唯物主义同 19 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共产主义**的联系，则还需要详尽地阐述。我们在这里只引证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边沁的著作中的一些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段落。

(1) 爱尔维修。"人并不邪恶，但却是服从于自己的利益的。因此，应该抱怨的不是人的劣根性，而是那些总是把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对立起来的立法者的无知。"——"道学家们迄今还没有获得任何成就，因为要拔除产生恶行的根子，就必须到立法当中去挖掘。在新奥尔良，只要妻子讨厌丈夫，她就有权离弃自己的丈夫。在这样的地方就没有不贞的妻子，因为妻子没有必要欺骗自己的丈夫。"——"如果不把道德同政治和立法结合起来，那末道德就不过是一门空洞的学问而已。"——"一个人如果一方面对危害国家的恶行无动于中，另一方面却对私生活中的恶行怒不可遏地加以抨击，那就可以看出他是伪善的道学家。"——"人们并不是生而善或生而恶的，但是他们却生而有能力成为善人或恶人，这要看公共利益是把他们结合起来还是把他们分离开。"——"如果公民们不实现公共福利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私人福利，那末除了疯子以外就根本不会有犯罪的人。"（"精神论"1822 年[62]巴黎版第一卷第 117、240、241、249、251、339 和 369 页）——　爱尔维修认为，教育（他所理解的教育不仅是通常所谓的教育，而且是个人的一切生活条件的总和——见上引书第 390 页）能培养人；如果需要进行改革来消除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那末为了进行这种改革，就必须根本改变人的意识："只有当人民对旧的法律和习俗的愚昧的尊敬减弱时，才能实现伟大的改革"（上引书第 260 页），或者，如他在另一个地方所说的，只有消灭了无知，"才能实现伟大的改革"。

(2) **霍尔巴赫**。"人在他所爱的对象中，只爱他自己；人对于和自己同类的其他存在物的依恋只是基于对自己的爱。""人在自己的一生中一刻也不能脱离开自己，因为他不能不顾自己。""不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只是我们的好处、我们的利益……驱使我们去爱或去恨某些东西。"（"社会体系"1822 年巴黎版[63]第一卷第 80、112 页）但是，"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要爱别人，因为别人是他自身的幸福所必需的……　道德向他证明，在一切存

在物中，**人最需要的是人**”（第 76 页）。“真正的道德也像真正的政治一样，其目的是力求使人们能够为相互间的幸福而共同努力工作。凡是把**我们的利益同我们同伴的利益**分开的道德，都是虚伪的、无意义的、反常的道德。”（第 116 页）“爱别人……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同我们同伴的利益融合在一起，以便为共同的利益而**工作…… **美德**不外就是**组成社会的人们的利益**。”（第 77 页）“人若没有情欲或愿望就不成其为人…… 人若是完全撇开自己，那末依恋别人的一切动力就消灭了。人若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毫无情欲，自满自足，就不成其为社会的生物…… 美德不外是**传送幸福**。”（第 118 页）“宗教的道德从来也没有能把世俗的人变成比较有社会性的人。”（第 36 页）

（3）边沁。我们只引证边沁驳斥“政治意义上的普遍利益”的一段话。“个人利益必须服从社会利益。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每个人不都是像其他一切人一样，构成了社会的一部分吗？你们所人格化了的这种社会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 如果承认为了增进他人的幸福而牺牲一个人的幸福是一件好事，那末，为此而牺牲第二个人、第三个人、以至于无数人的幸福，就更是好事了…… 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边沁“惩罚和奖赏的理论”……1826 年巴黎第三版[64]第二卷第 229、230 页）

（e）社会主义的最后的败北

“法国人在应当**如何组织群众**的问题上建立了一系列的**体系**；但是他们不得不耽于**幻想**，因为他们把真正的群众看做可用的材料。”

恰恰相反，法国人和英国人证明了，并且是极其详尽地证明了，现代社会秩序正在组织“**真正的**群众”，因而它是群众的**组织**。**批判**仿效“总汇报”[65]的手法，想用“**幻想**”这个**非同小可的**字眼来铲除所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

批判就这样打死了外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然后它又把火力转向德国：

“当**德国的启蒙者**突然发觉他们的 1842 年的希望落了空并且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关于现代**法国**诸体系的**信息**恰好传到了他们那里。现在他们可

以大谈必须把下层人民阶级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同时他们也想以这种代价来避开他们自己是否不属于那种不仅在下层中可以找到的群众的问题。”

很显然，**批判**在为鲍威尔过去的著作辩护时，把它所有的动听的理由都说尽了，以至于现在除了说 1842 年的启蒙者“茫然”而外，找不出别的理由来解释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幸运的是，关于现代**法国**诸体系的信息传到了他们那里。”为什么传来的不是关于**英国**诸体系的信息呢？其决定性的**批判的**原因在于：**施泰因**的“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66]一书没有给鲍威尔先生带来关于现代英国诸体系的信息。这个决定性的原因也说明为什么在批判关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各种高谈阔论中总是只谈**法国的体系**。

批判继续启示我们说，德国的启蒙者犯下了反对神圣精神的罪过。他们埋头研究早在 1842 年就已存在的“下层人民阶级”，为的是**避开**当时尚**不**存在的问题：在应当于 1843 年建立的**批判的世界秩序**中，他们应获得什么头衔，是绵羊的头衔还是山羊的头衔，是批判的批判家的头衔还是污秽的群众的头衔，是**精神**的头衔还是**物质**的头衔。但是，他们首先应当认真考虑一下他们本身的批判的**灵魂的济度**，因为，如果我损伤了我自己的灵魂，那末包括下层人民阶级在内的整个世界对我有什么帮助呢？

“但是，精神的存在物不改变，它就不能提高到更高的水平；而它若不受到最坚决的抵抗，就决不可能有所改变。”

如果**批判**比较熟悉下层人民阶级的运动，它就会知道，下层阶级从实际生活中所受到的最坚决的抵抗使它们每天都有所改变。出自英法两国下层人民阶级的新的散文和诗作将会向批判表明，即使没有**批判的批判的神圣精神**的直接**庇佑**，下层人民阶级也能把自己提高到精神发展的更高水平。

绝对的批判继续梦呓般地说："那些人，他们的**全部财产**就是'**组织群众**'这句话"，等等。

关于"组织劳动"的问题已经谈得很多了，虽然这个"口号"并不是社会主义者自己提出的，而是力图调和政治和社会主义的法国政治激进派提出的。关于"组织群众"这一正好应当解决的任务，在批判的批判之前没有一个人谈到过。相反，事实已经表明，**资产阶级社会**本身、旧的**封建**社会的解体正是组织群众。

批判把自己的发现加上了引号［Gänsefüsse㈠］。嘎嘎叫着暗示鲍威尔先生去拯救卡皮托里的鹅①，无非就是他**自家的鹅**㈡，即**批判的批判**。批判把群众重新组织起来，把它设计成**精神**的绝对的敌人。精神和群众的对立也就是批判的"社会组织"，在这个社会里，**精神**，或**批判**，是组织**工作**，群众是**原料**，而历史则是**产品**。

试问，在绝对的批判在它的第三次征讨中对革命、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取得一系列的辉煌胜利之后，这些海格立斯②般的战绩的**最后结果**究竟怎样呢？结果不过是所有这些运动都毫无结果地**失败**了，因为这些运动仍然还是**被群众所亵渎的批判**或**被物质所亵渎的精神**。**批判**甚至在鲍威尔先生自己过去的著作中就发现了群众对**批判**的多方面的亵渎。然而，**在这里**代替批判的是辩护；批判不是抛弃过去，而是使过去"**巩固起来**"；它不是把肉体对**精神的亵渎**也看成精神的死亡，相反地，是把**肉体的精神化**甚至也

㈠ 直译："鹅足"。——编者注

① 卡皮托里是罗马的古堡，相传守卫此古堡的卫兵凭鹅的叫声发现了偷袭的敌人。——译者注

㈡ 双关语：德文《Gans》本义为"鹅"，转义为愚蠢的化身。——编者注

② 海格立斯（Hercule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最为大家喜爱的半神半人的英雄。——译者注

看成**鲍威尔的肉体**的生命。然而，只要未完成的、还被群众所亵渎的批判不再是鲍威尔先生的**创造物**，而成为整个的民族和大批世俗的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创造物，只要未完成的批判不再叫做“犹太人问题”、“自由的正义事业”、“国家、宗教和政党”，而叫做革命、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它就会变得愈来愈无情，而且会愈来愈坚决地倾向于**恐怖主义**。这样，**批判**就用怜惜自己的肉体而把别人的肉体送上十字架的办法，消灭了物质对精神的亵渎和群众对批判的亵渎。

不管是用这种手段还是用那种手段，“被肉体所亵渎的精神”和“被群众所亵渎的批判”无论如何总算从绝对批判的道路上清除掉了。精神和肉体、批判和群众的绝对批判的**分离**和纯粹的对立，代替了这种非批判的混合。这种对立在它形成当代的真正的历史利益的**世界历史**形式下，是鲍威尔先生及其伙伴，或**精神**，与作为物质的所有其余人类的对立。

革命、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它们以本身的**灭亡**为批判的**主**开辟了道路。奥莎那[①]！

(f) 绝对批判的思辨循环和自我意识的哲学

批判在**一个**领域内达到了虚假的**完善**和纯洁，**因而**，当它没有在**其他一切**领域内表现出同样的“完善”和“纯洁”的时候，这就只是一种**失策**，“只”是“不彻底”。这“一个”批判的领域就是**神学**的领域。这个领域的**纯洁的**疆土起于布鲁诺·鲍威尔的“**复类福音作者批判**”，迄于布鲁诺·鲍威尔的最后一个边境要塞

① 犹太人颂赞上帝或祈福之词。—— 译者注

——“基督教真相”。

我们在“文学总汇报”上读到：“现代的批判已经和斯宾诺莎主义一刀两断。因此从它这方面来说，如果不加批判地在一个领域内假定有实体，即使是对个别的荒谬的论点而言，也是不彻底的。”

如果说，过去关于**批判**怀有**政治**偏见的供认由于指出这“**在本质上非常微弱**”而马上被冲淡了，那末，现在关于**不彻底性**的供认则由于附带声明这种不彻底性只是对**个别的荒谬的论点**而言而被冲淡了。可见，过错不在鲍威尔先生身上，而在像倔强的劣马把**批判带走**的**荒谬之点**上。

下面的两三段引文将会表明，**批判和斯宾诺莎主义**断绝以后又采取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观点；它从“**实体**”转向了另一个**形而上学的怪物**，即“**主体**”、“**作为过程的实体**”、“**无限的自我意识**”；“完善的”和“纯洁的”批判的最后结果就是以**思辨的黑格尔的形式恢复基督教的创世说**。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复类福音作者批判”：

“施特劳斯仍然忠实于把**实体**视为绝对物的观点。具有这种普遍性形式、具有尚未达到现实的和理性的规定性的这种普遍性形式的宗教传说，不外就是抛弃了自己的逻辑单纯性并采取了**公社力量**的特定存在形式的实体；因为普遍性的这种现实的和理性的规定性只有在**自我意识**中，在自我意识的**单一性**和**无限性**中才能达到。”（“复类福音作者批判”第一卷前言第6—7页）

我们现在不管“达到规定性的普遍性”、“单一性和无限性”（黑格尔的概念）的命运如何。——鲍威尔先生不指出，贯串在**施特劳斯**关于“公社力量”和关于“传说”的理论中的观点在斯宾诺莎关于**实体**的观念中有其抽象的表现，有其逻辑形而上学的**象形文字**；鲍威尔先生不说明这一点，而是强迫“**实体抛弃**自己的

逻辑单纯性并采取公社力量的特定存在形式”。他用**黑格尔**的魔术机来强迫“**形而上学的范畴**”（从**现实**中抽出的抽象概念）跳出使它们溶化于纯思想的“**简单**”因素中的**逻辑**框子，并采取自然存在或人类存在的“特定形式”，也就是说，强迫它们体现出来。**辛利克斯**，来帮帮忙吧！

批判继续驳斥施特劳斯说：“这种观点之所以神秘，是因为每当它要解释和清楚地描述福音历史的起源过程时，它只能提供某种过程的**假象**。‘福音历史的来源和发端是传说’的说法再度肯定了同一个东西——‘传说’和‘福音历史’；的确，这里也指出了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但是这还向我们说明，福音历史的发展和解说起源于什么样的**实体的内部过程**。”

按照**黑格尔**的意见，应当把**实体**理解为**内部过程**。他从实体的观点出发对**发展**做了如下的说明：

“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种扩张的发生不是因为同一个东西具有不同的形式，——不是，这种扩张不过是无定形地**重复**那本身只……包含差异所具有的单调的**假象**的**同一个东西**罢了。”（“**现象学**”序言第 12 页）

辛利克斯，来帮帮忙吧！

鲍威尔先生继续说道：

“因此，批判必须反对它本身……并在**实体本身的发展**驱使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寻求**神秘的实体性**的解答，而这种发展则导向理念的普遍性和规定性及理念的现实存在，导向**无限的自我意识**。”

黑格尔对实体性的观点的批判继续说道：

“实体的闭塞性必须消灭，而且实体必须提升为**自我意识**。”（“现象学”第 7 页）

同样，鲍威尔的**自我意识**也是**提升**为自我意识的**实体**，或作为**实体的自我意识**；于是，自我意识就从**人的属性**变成了**独立的**

主体。这是一幅讽刺人脱离自然的**形而上学的神学**漫画。因此，这种自我意识的**本质**不是**人**，而是**理念**，因为理念的**现实存在**就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人化了**的理念，因而它是**无限的**。**人的**一切属性就这样**神秘地**变成了想像的“**无限的自我意识**”的属性。正因为如此，鲍威尔先生才**十分明确地**谈到这种“无限的自我意识”，他说，**一切事物都起源**于无限的自我意识并在其中找到**解释**，即找到本身**存在**的**根据**。**辛利克斯**，来帮帮忙吧！

鲍威尔先生继续说：

> “**实体性关系**的力量就在于它力图把我们导向概念、理念和自我意识。”

黑格尔说：

> “可见，**概念**是实体的**真理**。”“**实体性关系**的推移是由它本身所固有的内在必然性造成的，它恰恰说明**概念**是实体的真理。”“**理念**是对等的概念。”“达到**自由**存在的……概念……无非就是自我或**纯粹的自我意识**。”（“**逻辑学**”，“黑格尔全集”第二版[67]第五卷第6、9、229、13页）

辛利克斯，来帮帮忙吧！最可笑的是，鲍威尔先生在他的“文学报”上还这样说：

> “**施特劳斯**没有能**完成对黑格尔体系的批判**，尽管他已经以他那不彻底的批判正好证明了完成这一批判的必要性”，等等。

鲍威尔先生本人在他的“复类福音作者批判”一书中并没有打算对黑格尔的体系做**完善的批判**，而至多不过是打算**完成黑格尔的体系**罢了，——至少在把黑格尔体系应用于神学这一方面是这样的。

他把他的批判（“复类福音作者批判”的前言第21页）称为“特定体系的最后业绩”，而这个特定体系正是**黑格尔的**体系。

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争论，是在**黑格尔**

的思辨**范围**之内的争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

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两人十分彻底地把**黑格尔**的体系应用于神学。前者以**斯宾诺莎主义**为**出发点**，后者则以**费希特主义**为**出发点**。他们两人都就上述两个因素之中的每一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由于另一个因素的渗入而**被歪曲**这一点**批判了**黑格尔，可是他们使每一个因素都获得了**片面的**、因而是彻底的发展。因此，他们两人在自己的批判中都超出了黑格尔哲学的**范围**，但同时他们两人都继续停留在黑格尔思辨的**范围内**，而他们之中无论哪一个都只是代表了黑格尔体系的**一个**方面。只有**费尔巴哈**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

在鲍威尔先生那里，虽然已经不是**神圣精神**向福音书作者口授福音书的本文而使之笔录下来，但起这个作用的却是**无限的自我意识**：

> “我们勿须隐讳，对福音历史的正确理解也是有其**哲学基础**的，**就是**说，是以**自我意识的哲学**为根据的。”（**布鲁诺·鲍威尔**“复类福音作者批判”的前言第 15 页）

为了说明**鲍威尔**的这种**自我意识的哲学**以及鲍威尔先生从批

判神学中获得的结果，必须从他的**最后一部**关于宗教哲学的著作**“基督教真相”**中摘引几段出来。

该书在谈到**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时候说：

“如果唯物主义的**真理、自我意识的哲学**已被发现，而**自我意识**又被认为是**一切**，是**斯宾诺莎的实体**这个迷的解答和真正的 causa sui〔**自身原因**〕……那末又何必要**精神**呢？**又何必要自我意识呢？自我意识**建立了**世界**，建立了差别，并且在它自己所创造的东西中创造**它自身**，因为它重新消除了**它的创造物和它本身的差别**，并且只有在创造中和在运动中才是它本身，——好像这种自我意识在这种运动中没有自己的目的似的！可是它本身就是这个运动，并在其中首次掌握了自己。”（“基督真相”第113页）

“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确曾把自我意识的运动看做普遍本质即物质的运动，但是他们**还未**能看出，**宇宙的运动只有作为自我意识的运动**，才能**真正**成为自为的运动，从而达到与本身的统一。”（同书第114—115页）

辛利克斯，来帮帮忙吧！

第一段话清楚地表明：**唯物主义**的真理就是唯物主义的**对立面——绝对的**、即至高无上、无拘无束的**唯心主义**。自我意识即**精神**就是**一切**。在它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自我意识”即**“精神”**是世界、天空和大地的万能的创造者。**世界**是被迫使自己**异化**并采取**奴隶形象**的自我意识的生命表现，但是世界和自我意识之间的差别只是**似是而非的差别**。自我意识不把自己和**任何现实事物**区别开。世界不过是自我意识制造出来的形而上学的**区别**，是它的以太头脑的幻影和它的**臆想**的结果。因此，自我意识又重新消灭了它一度认可的在它之外有某种事物存在的假象，并且不承认它本身的“创造物”是实在的物体、即那种实在有别于自我意识的物体。**自我意识**也通过这种运动首次把自己制造成绝对的东西，因为**绝对的**唯心主义者要想成为绝对的唯心主义者，就必须经常

地完成一种**诡辩的过程**，就是说，他先要把**他身外**的世界变成**幻觉**，变成**自己**头脑的单纯的突发之念，然后再宣布这种**幻影**是真正的幻影—— 是纯粹的幻想，而最后便宣告它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甚至不再为外部世界的假象所限制的存在。

第二段话清楚地表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确曾把物质的运动看做精神化了的运动，但是他们还未能看出，这不是**物质**运动，而是**观念**运动，这是自我意识的运动，即纯思想的运动。他们还未能看出，真正的宇宙运动只有作为独立于**物质**和摆脱了**物质**即独立于**现实**和摆脱了**现实**的、自我意识的**观念**运动，才是真正的和现实的；换句话说，有别于观念的和思想的运动的**物质**运动，只是作为**假象**而存在。**辛利克斯**，来帮帮忙吧！

这种思辨的**创世说**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几乎可以一字不差地找到；我们在他的**第一部**著作"现象学"中就可以看见这种理论：

"**实物性**就是**自我意识的异化**产生的……自我意识在这种异化中把自己假定为**实物**，或者把实物假定为**自身**。另一方面，这个过程同时还包含着另一个因素，即自我意识同时又**扬弃**自己的这种**异化**和**实物性**，并使它们返回到自身…… 这就是**意识的运动**。"（黑格尔"现象学"第 574— 575 页）

"自我意识具有区别于**它本身**的**内容**…… 这种内容在其本身的**差别**中是**自我**，因为它是自我扬弃的**运动**…… 这种内容，要下个比较确切的定义，不外就是**上述运动的过程本身**，因为它是完成自身而且**自为**地作为**精神**来完成自身的**精神**。"（同书第 582— 583 页）

针对黑格尔的这种创世说，**费尔巴哈**指出：

"物质是精神的自我异化。所以物质本身就获得了精神和理性；但同时它又被看做**不实在的、不真实的**本质，因为只有从这种异化中复生的本质，即使自己摆脱了物质、摆脱了感性的本质，才称得上是完善的、具有真正形式的本质。可见，自然的、物质的、感性的世界在这里所遭到的**否定**，就跟**被原罪所败坏的自然**在神学中所遭到的**否定**一样。"（"未来哲学"第 35 页）

这样，鲍威尔先生一方面替反对**非批判的神学**的唯物主义作辩护，另一方面又指责它“还没有成为”**批判的神学、理智的神学、黑格尔的思辨。辛利克斯！辛利克斯！**

既然鲍威尔先生在**一切**领域中都贯彻**自己**跟**实体**的对立，贯彻**他的自我意识的哲学**或**精神的**哲学，那末在一切领域中他就只应该同他自己**臆想**的**幻影**打交道。**批判**是他手中的武器，他用这个武器把在**无限的自我意识之外**还以**有限**的物质存在自居的一切，都变成单纯的**假象**和**纯粹的思想**。在实体中，他驳斥的不是**形而上学的幻觉**，而是世俗的内核——**自然**，他攻击存在于人之**外**的自然，也攻击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本身。在任何领域内都不假定有**实体**（他居然还说这样的话），这就等于不承认任何有别于思维的**存在**、任何有别于**精神的自发性**的**自然力**、任何有别于**理智**的**人的本质力量**、任何有别于**活动**的**苦痛**、任何有别于**本身行动**的**别人对我们的影响**、任何有别于**知识**的**感觉**和**欲望**、任何有别于**头脑**的**心灵**、任何有别于**主体**的**客体**、任何有别于**理论**的**实践**、任何有别于**批判家**的**人**、任何有别于**抽象的普遍性**的**现实的共同性**、任何有别于**我**的**你**。因此，鲍威尔先生进而把**自己**同**无限的自我意识**、同**精神**混为一谈，即用创造者来代替创造者的这些创造物，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同样，他把坚持自己和**他**鲍威尔先生的创造物**有区别**的整个**其余世界**当做**固执的群众**和**物质**予以摈弃，这也是合乎逻辑的。于是他就希望：

> “再隔一些时候，
> 物体界也会永远到达尽头。”[68]

他也合乎逻辑地把他**自己**对他迄今未能征服“这个**愚笨的**世界”一事的不满变为**世界对它自身的不满**，而把批判的批判对人

类发展的激愤变为人类对他的批判，对**精神**、对布鲁诺·鲍威尔先生及其伙伴的**群众的**激愤。

鲍威尔先生最先是一个**神学家**，但并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神学家，而是一个**批判的神学家**或**神学的批判家**。当他还是一个把一切**宗教的**和**神学的蠢事**加以思辨装饰的**老黑格尔**正统派的最极端的代表时，他就不断地宣称**批判**是他的**私人财产**。那时他就已经把施特劳斯的批判看成**人类的**批判，而和这种批判相反，他**十分明确地**维护**神的**批判的权利。后来，他从宗教的外壳下剥出了构成这种神性的内核的极端**自命不凡**或**自我意识**，把它看做独立的存在，把它变成独立的存在物，并在**"无限的自我意识"**的幌子下把它提升为批判的原则。接着，他又在他**本身的**运动中完成了被"自我意识的哲学"描述为绝对的生命行为的那种运动。他重新消除了作为"被创造出来的东西"的**无限的自我意识**与创造东西的主体即**他本身**之间的"差别"，并认识到：**无限的**自我意识在自己运动中**"只是"**鲍威尔**"他自己"**，所以宇宙的运动只有在它本身的观念的自我运动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和**现实的**。

神的批判**在返回自身**以后，以合理的、自觉的、批判的方式复活了：**自在的存在**变成了**自在自为的存在**，而且只有在**最后**才会变成饱满的、实现了的、已揭示出来的**起源**。**神的**批判和**人类的**批判不同，它是作为**批判**、作为**纯粹的批判**、作为**批判的批判**出现于世的。对鲍威尔先生的新旧著作的辩护代替了对新旧约全书的辩护。神与人、精神与肉体、无限性与有限性之间的**神学的**对立，变成了**精神**、**批判**或**鲍威尔**先生与**物质**、**群众**或世俗世界之间的**批判的神学的**对立。信仰与理性之间的神学的对立变成了**正常的人的理智**与纯批判的思维之间的批判的神学的对立。"思辨

神学杂志”[69]变成了批判的“文学报”。最后，**宗教的救世主**终于显化为**批判的救世主鲍威尔**先生了。

鲍威尔先生的最后阶段并不是他发展中的失常：这是他从他的异化**返回**到自身。不言而喻，**神的**批判使自己**异化**并超出自己的范围的那一瞬间，是与它部分地叛离自己而创造某种**人类事物**的那一瞬间相吻合的。

绝对的批判返回到自己的出发点以后，就结束了**思辨的循环**，从而也结束了自己的全部**生涯**。它的往后的运动是纯粹的、超越一切**群众**利益的**自己内部的旋转**，因此，群众对它已丝毫不感兴趣了。

第 七 章
批判的批判的通讯

（1）批判的群众

世上难道还有什么地方能
比家族的怀抱更温暖？[70]

处于**绝对**定在中的、**布鲁诺**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宣称，**群众的**人类，即本身不是批判的批判的全体人类，都是它的**对立面**，是它的**本质的对象**：其所以是**本质的**，是因为群众 ad majorem gloriam dei〔为了上帝的无上光荣〕，为了**批判**和**精神**的无上光荣而存在；其所以是**对象**，是因为群众不过是批判的批判的**材料**，批判的批判宣称，它同群众的关系是现代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关系**。

但是，仅仅宣布自己为全世界的对立面，还不能使自己成为**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对立面**。一个身体不灵活因而处处碰人的人也未尝不可以自命为一切人的绊脚石。要成为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对立面，光由我宣布世界是我的对立面，那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另一方面，即必须**世界**宣布我是它的本质的对立面，把我看成这样并**承认**我是这样。批判的批判借助于**通讯**获得了这种承认，它使通讯向世界**证明**批判的拯救世界的工作以及世界对批判的福音的普遍的**愤懑**。批判的批判作为**全世界的对象**也就是它本

身的对象。通讯应该**表明批判的批判就是批判的批判**，是现代的**世界利益**。

批判的批判认为自己是**绝对的主体**。绝对的主体需要崇拜，而**真正的**崇拜则需要第三者，即信仰绝对主体的个人。因此，**沙洛顿堡的神圣家族**从它的记者们那里受到它所应受的崇拜。记者们告诉它，它是**什么**，它的敌人即群众**不是**什么。

批判用这种方法把自己对自己的意见当做世人的意见，把自己的**概念**变成**现实**，这样它就无疑地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在它自己内部形成**一种**群众**，即批判的群众，他们的单调的使命就是充发批判的名言的永不休止的回音。为了自圆其说，这种自相矛盾是情有可原的。不以罪恶世界为自己的家的批判的批判，必将在自己家里建立起罪恶世界。

批判的批判的记者，即批判的群众的成员所走的道路并不是玫瑰花铺成的道路，而是一条艰苦的、遍地荆棘的、批判的道路。批判的批判是唯灵论的主宰，纯粹的自发性，actus purus〔纯粹的活动〕，它不能容忍任何**外来的**干涉。因此，记者只能是**似是而非的主体**，他对批判的批判只能表现**似是而非的独立性**，只能**似是而非地**希望向它报道一些新奇而独特的**事情**。**实际**上，他不过是它自己的**创作物**，不过是它本身的暂时**对象化了的**和独立化了的知觉而已。

因此，记者们抓住一切机会，喋喋不休地向人们保证，他们**为了应付一下**而向批判的批判报道的消息，都是它早已**知道**、**洞悉**、**认识**、**理解**和**体验**到的。例如，**采尔莱德**就常常说这样的话："您了解这件事吗？您是知道的；您已经第二次、第三次知道这件事了；当然，您已经听得很多，所以一切事情您都非常明白。"

又如，驻布勒斯劳的记者**弗莱什汉默尔**说：“而这件事……对于您我都很难说是一个迷。”驻苏黎世的记者**希采尔**说：“您自己当然是知道的。”批判的记者崇拜**批判的批判的**绝对的理解力，甚至硬说它能理解那些根本无从理解的事情。例如，**弗莱什汉默尔**说：

“只要我告诉您，您要是不想碰见身穿黑色长袍和斗篷的天主教青年牧师，您就别上街，那您就会**完全**（!）①**理解到**（!）②我的意思。”

记者们甚至还**战战兢兢地**倾听批判的批判怎样**说话，回答，呼喊，讥笑**！

例如，**采尔莱德**说：“不过……您**请说吧**。好吧，就请您听一下吧！”**弗莱什汉默尔**说：“可是，我已经听到**您所说的一切**，我想说的**也正是**这些……”希采尔说：“埃德曼，您**呼喊吧**！”驻杜宾根的记者说：“您**可别讥笑**我！”

因此，记者们常常这样说：他们向批判的批判报道**事实**，等待它来做**精神的阐明**；他们向它提供**前提**，让它来做**结论**。他们甚至**抱着歉意**表示，他们是重复它早已知道的消息。

例如，**采尔莱德**说：

“您的记者只能给您提供一幅画面，即描写一些事实。而赋予这些事物以生命的**精神**，**您当然**是知道的。”或者说：“而现在，您**已经**可以**自己**得出**结论**了。”

希采尔说：

“一切创造物皆渊源于其极端对立面这一思辨的原理，我是**不敢**和您谈论的。”

或者也可以说，记者的**阅历**不外是**执行和证实**批判的**预言**。

---

①② 括弧里的惊叹号是马克思加的。——译者注

例如，**弗莱什汉默尔**说：“您的**预言**已经实现了。”**采尔莱德**说：

“我曾经写信告诉过您，在瑞士正日益发展着一种趋向，这种趋向远不是不幸的，实际上倒是**可喜的……倒证实了**您所一再表述的思想……”等等。

批判的批判有时觉得有必要强调一下它那种礼贤下士的精神，它就连通讯也审阅和答复，它之所以这样礼贤下士，是因为记者对交给他的每个**课题**无不感到胜任而愉快。例如布鲁诺先生写信给驻杜宾根的记者说：

“要我来答复你的信，这实在说不过去……　另一方面……你又说得如此**中肯**，我……简直**无法拒绝**你的恳求，只好来阐明一下。”

批判的批判要**外省**给它写通讯。但是这种省不是行政省（大家知道，德国根本没有这种省），而是以柏林为首都的**批判的省，柏林**是批判的家长和批判的神圣家族的所在地，而省里则住着批判的群众。**批判的外省人**只有躬身谢罪之后，才敢斗胆请求**批判的最高当局**予以注意。

例如，一位匿名的记者写信给神圣家族的成员和首脑**埃德加尔**先生说：

“阁下！请允许我**冒昧地**告诉您，志向相同的青年人总是乐于成为知音的（我们俩人的**年龄相差**不过两岁）。”

埃德加尔先生的这位同代人附带地**自称**是**最新哲学的本质**。难道说：“**批判**”同哲学的“**本质**”通信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假如埃德加尔先生的同代人保证说他已经掉了**牙齿**，那也不过是暗示他的**寓意的**本质而已。这个“最新哲学的本质”“从**费尔巴哈**那里学会了把**修养**这个环节归入客观的看法”。它立刻就来试验它的**修养**和**看法**，硬让埃德加尔先生相信它已经有了“对他的小说

（“坚定不移的原则万岁！”[71]）的**全面的看法**”，同时它又公开承认它还很不了解埃德加尔先生的思想，而最后则已经不很相信自己已经有了全面的看法，问道：“难道我**完全误解了**您吗？”在这种试验之后，最新哲学的本质像下面这样谈到群众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它说：

“我们应当本着**礼贤下士的精神**来研究和解开那个阻止**普通人类的理智**进入**思想的无边无际的海洋**的魔术般的纽结，哪怕这样做一次也是好的。”

谁要想全面地了解批判的群众，那就请他读一读**希采尔**先生的苏黎世**通讯**（第5期）。这位不幸的人以确实令人感动的勤勉精神和值得赞颂的记忆力背诵着批判的名言。其中也不乏布鲁诺先生讲到他所参加的战役以及他所策划和领导的征战时惯用的得意之词。特别是当**希采尔**先生痛恨**世俗的群众**及其对**批判的批判**的态度的时候，他更显出他不愧为批判的群众的一员。

他谈到以历史的参加者自居的群众、“纯洁的群众”、“纯洁的批判”，谈到“这个对立面（“纯洁得史无前例的对立面”）的纯洁性”，谈到“**心怀不满**”，谈到“群众较之批判的蠢笨无能、性情鄙劣、懦怯、冷酷、畏缩、狂暴、凶狠”，谈到“本身的存在仅仅是为了通过自己的对抗而使批判变得更尖锐更机警的群众”。他谈到“来自极端对立的创造”，谈到批判摆脱了**憎恨**和类似的世俗的激情。登载在“文学报”上的**希采尔**先生的通讯的全部内容，不外就是这么一套批判的言词。他责备**群众**仅仅满足于“主张”、“善良的愿望”、“言辞”、“信仰”等等，但是他自己身为**批判的群众**的一员却满足于表达他的“批判的主张”、“批判的信仰”、“批判的善良愿望”的言辞，并且让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去“行动、工作、战斗”和“创造”。

尽管“批判的群众”的成员描绘了一幅世俗的世界和“批判的

批判”之间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纷争的可怖景象，但是至少对那些不信仰的人来说，连**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纷争**这个事实本身都还是没有证实的。而记者们殷勤地非批判地重复谈论批判的“幻想”和“奢望”，这只能证明主人的固执的念头也正是奴仆的固执的念头。的确，有一位批判的记者正力图用**事实**来证明。

他写信给神圣家族说：“您可以看到，‘文学报’已达到了目的，就是说，它**丝毫没有**得到人们的**赞同**。只有当它投合没有头脑的人之所好，当您随着流行的扬尼恰尔①军乐队的言语的乐声昂首阔步的时候，它才能得到人们的赞同。”

好一个流行的扬尼恰尔军乐队的言语的乐声！大家知道，批判的记者总想骑在“不流行”的言语上逞英豪。但他对“文学报”丝毫没有得到人们的赞同这个事实所做的解释，必然会像纯粹的**护教论**一样遭到驳斥。这个事实最好还是从相反的方面来解释，那就是说，批判的批判是**投合了**广大**群众之所好**，即**投合了丝毫**得不到人们赞同的广大的下流作家群众**之所好**。

可见，**批判的**记者们光是用批判的言语向神圣家族“祈祷”并同时向群众念“咒语”是不够的。为了证明群众和批判之间有**真正的**纷争，必须要有**非批判的群众的**记者，必须要有**群众**派往批判的批判的**真正的**使节。

因此，批判的批判也为**非批判的群众**留下了一席之地。它让群众的忠厚的**代表们**同它**通信**，承认群众和批判之间的对立是重要的，绝对的，并作乞求摆脱这种对立的**绝望的吼叫**。

① 古代土耳其的近卫军。——译者注

(2)“非批判的群众”和“批判的批判”

(a)“冥顽不灵的群众”和“不知足的群众”

“群众”冷酷无情，冥顽不灵，对一切都盲目不信仰，他们在这些方面有一位相当坚定的代表。这位代表谈到了“柏林学社[72]的纯黑格尔哲学的造诣”。

这位记者说：“只有在认识现实的基础上才能获得真正的进步。但是，我们从柏林学社的社员们那里得知，我们的认识不是对现实的认识，而是对某种非现实的认识。”

记者把“自然科学”称为哲学的基础。

“一个优秀的自然科学家同哲学家的关系，如同哲学家同神学家的关系一样。”

他继续谈论“柏林学社”：

“关于这些先生我不想多说什么，我只打算说明一下，他们的处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虽然完成了精神上的脱换羽毛的过程，但是他们并没有摆脱这种脱换羽毛的产物，所以就不能接受新生和返老还童的因素。”“这些（自然科学的和工业的）①知识我们还必须掌握。”“我们最感需要的、关于世界和人类的知识不是单凭思想的敏锐所能获得的；要获得这种知识，必须使所有的感官都起作用，而且人的一切才能都必须当做必需的和量重要的工具来加以利用；否则，直观和认识是永远不够的……而且还会导致**道德的丧失**。”

但是，这位记者竭力把他赠送给批判的批判的药丸包上糖衣。他“为**鲍威尔的言词**找到了正确运用的方法”。他“注视着**鲍威尔的思想**”，他说“**鲍威尔说得很正确**”，最后，看来他并不是同**批判本**身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论战，而是同某些方面和批判有所区别的“柏林学社”论战。

觉得自己受到了损伤而且在一切**有关信仰的事情**上敏感得像老处女一样的批判的批判，是不会上这种分别和假殷勤的当的。

它回答说：“你想把你来信中一开头就说到的那一派人看做**你的敌人**，那你就**错了**。你不如干脆**承认**（接着就是一道陷人于绝境的破门令）①，你就是**批判本身的敌人**！”

多不幸呵！群众的人！你竟是**批判本身**的敌人！但是，至于说到上述**群众的**论战的内容，批判的批判是**尊敬**它对**自然科学**和**工业**所抱的批判的态度的。

“**衷心地尊敬对自然界的研究！衷心地尊敬**詹姆斯·瓦特而（真是崇高的言辞）②丝毫不尊敬瓦特给自己的亲人带来的百万财富！”

衷心地尊敬批判的批判对别人的尊敬！批判的批判在这封回信中指责上述**柏林学社**的成员不在严肃而重要的著作上下工夫，不去研究它们，指责他们一旦指出某一著作是划时代的等等，便以为评价它的任务**大功告成**了。但是**它自己**在这封回信里对一切自然科学和**工业**只表示了一下尊敬，就算在指出它们的意义方面已经**大功告成**了。而批判的批判在表示它对**自然科学**的尊敬时所做的保留，好像已故的骑士**克鲁克**反对自然哲学时所发出的第一批雷矢②一样。

“自然界并不**因为我们吃的和喝的都是自然界的单个产品**而就是唯一的现实。”

批判的批判关于自然界的**单个的产品**所知道的，只不过是“我们**吃**它们**和喝**它们”而已。衷心尊敬批判的批判的自然科学！

---

①②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② 即闪电，古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的神箭。——译者注

批判合情合理地把研究“自然”和“工业”这种令人不快的强加于人的要求同下面这种妙不可言的修辞学上的感叹对立起来：

“难道（!）①您以为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已经完结了**吗？难道（!）②您能说出一个已经被**真正**认识了的历史时期吗？”

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诚然，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像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

“冥顽不化”和“冷酷无情”的群众的代表因提出过中肯的指责和忠告，而被批判斥为**群众的唯物主义者**。批判对待另一位不太恶毒、不太群众的记者，也不见得好些。这位记者虽然对批判的批判有所期望，但是并不认为它没有辜负这些期望。这种“**不满**”的群众的代表写道：

“不过，我必须承认，贵报第一期**完全不能**使我**感到满意**。我们所期望的确实是另外的东西。”

批判的家长亲自出面回答道：

“说什么本报辜负了期望，这我早已预料到了，因为这些期望对我说来是

①② 括弧里的惊叹号是马克思加的。——译者注

很容易想像到的。人们太倦怠了，竟想要**一下子**就得到**一切**。一切吗？不是！再尽可能得到一切，同时又尽可能什么都不做。就是说要得到那种不费力气就可得到的一切，不经过任何阐释就能理解的一切，总而言之，就是一种用一个字就能概括的一切。”

“群众”要求按原则和本性“**不能提供任何东西**”的批判提供**一些东西**或甚至**一切东西**，于是批判的家长在对“群众”的不正当的要求愤恨之余，以长者的口吻讲述了如下的一段**趣闻**：不久以前，柏林的一位**熟人**大为抱怨他的著作（大家知道，布鲁诺先生根据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幻想而写成了这部臃肿不堪的著作）冗长不堪，废话连篇；鲍威尔先生安慰他，答应为了使他便于理解而赠给他一种印书用的像小圆球一样的油墨。这位家长用油墨的不匀来解释自己的“著作”的冗长，正像他用“世俗的群众”（他们为了充实自己而想要一口吞下一切和无）的空虚来解释他的“文学报”的空虚一样。

虽然我们决不否认上述情节的重要性，但是也很难认为**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对立**就在于：批判的批判的一位群众的熟人说批判很空虚，而批判反过来说他非批判；另一位熟人认为“文学报”辜负了他的期望；最后，**第三位**熟人和挚友认为批判的著作冗长不堪。尽管如此，但是怀抱期望的熟人№2和至少想要摸清批判的批判的秘密的挚友№3，都使得批判与“非批判的群众”之间的关系**更富于内容**和更为紧张。**批判**对待具有“冥顽不灵的心”和“普通人的理智”的群众有多么残酷，它对待苦苦哀求**摆脱**对立的群众就有多么温和。带着破碎的心、忏悔的心情和温顺的精神去接近批判的群众，由于诚心而得到了奖赏，即听到了批判的一些**有分寸的、预言式的、有份量的**话。

(b)“软心肠的”和“求救的”群众

伤感的、诚恳的、求救的群众的代表摇尾乞怜，他披肝沥胆、双膝跪地、两眼望天地祈祷，乞求批判的批判说几句表同情的话。

他说：“我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告诉您呢？我为什么要在您的面前为自己辩白呢？因为我尊敬您，所以我**希望博得**您的**垂青**；因为我万分地**感激**您对我的培育，所以我**爱戴**您。您责备了我，所以**我的良心**驱使我在您面前来**为自己辩白**…… 我**决不**是要向您**强辩**，但是我根据**个人的切身体会**想来，您**本人也会乐于**看到您还不大认识的人证明他对您的**同情**。我**决不妄求**您来答复我这封信。我**既不**想占去您可以用来做更多事情的宝贵时间，**又不**想给您增加麻烦，**更不**想使自己因为希望**不能实现**而苦恼。**您可以**把我对您说的话说成是**伤感、纠缠**或**虚荣**（！）①，或者随您高兴答复或不答复我，这都没有什么关系。我**情不自禁地**要发出这封信，我只希望您能相信我写信的**一片好意**（！！）②。”

正像上帝的慈悲亘古以来就是赐给**可怜人**一样，这个含泪乞求批判发发慈悲的、群众的、但顺从的记者终于**如愿以偿了**。批判的批判善意地答复了他。而且还不止此！它还就他极想知道的问题做了**极其深刻**的阐明。

批判的批判教诲说：“两年前回忆起 18 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是适时的，因为这可以使我们在当时激战的某一地区也投入这批**轻装部队**。但是目前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如今真理变化无常。当时是**适时的**，现在却成了**失误**。”

绝对的批判下诏把这批**轻装部队**称为**“我们的圣徒”**、我们的**“先知”**、**“主教”**等等（见“铁文集”第二卷第 89 页）[73]。这在当时自然也只能是一种**“失误”**，不过是**“适宜的失误”**。谁能够把**轻装部**队

①② 括弧里的惊叹号是马克思加的。—— 译者注

称为"**主教**"的**部队**呢？批判热情地谈论以"毕生的精力来思考、探讨和研究真理"的这批**轻装**部队所表现的自我牺牲精神、道德毅力和热忱，这又是一个"适宜的"失误。它在"基督教真相"一书的序言中声称，这批"**轻装**"部队"是不可战胜的"，"**每一个博学的人**都事先保证说，他们一定会把**整个世界翻转过来**"，"他们似乎是毫无疑问地真正能够赋予**世界以新的面貌**"，这也是一个"失误"。谁能够赋予世界以新的面貌呢？这批**轻装部队**能够吗？

批判的批判继续教诲"**诚恳的**群众"的求知心切的代表说：

"法国人以前虽然因创立社会理论的企图获得了新的历史功绩，但是**现在**他们**毕竟是日暮途穷了**；他们的新理论还不够**纯**，他们的社会幻想、他们的**和平的民主**还远远没有摆脱旧秩序的前提。"

假如批判确有所指的话，那指的就是**傅立叶主义**，特别是"**和平民主日报**"[74]的傅立叶主义。但是后者根本不能说是法国人的"社会理论"。法国人有**好几套社会理论**，而不是仅有**一套**。"和平民主日报"所鼓吹的那种掺了水的傅立叶主义不过是一部分慈悲为怀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而已。人民拥护**共产主义**，同时分裂为许多不同的派别。改造这些各不相同的社会倾向的真正的运动不仅没有**日暮途穷**，而且只是在现在才真正**开始**。同时，这一运动决不会像批判的批判所想的那样完成于纯粹的，即抽象的**理论**中，而必定完成于决不去关心批判的那种无条件的范畴的**实实在在的实践**中。

批判继续滔滔不绝地说："**古往今来**还没有一个民族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假如有一个能够在精神上优越于其他民族的民族，那末这只是那个能够批判自己和其他民族并能认识普遍颓废的原因的民族。"

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如果批判

的预言正确无误，那末任何一个民族都永远不会优越于其他民族，因为所有的欧洲文明民族——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现在都在“**批判**自己和其他民族”并“能认识普遍颓废的原因”。最后，硬说“批判”、“认识”即**精神**的活动能提供**精神的优势**，其实只是一种词句上的**同义反复**；而踌躇满志地把自己摆在各民族之上并期待着各民族匍匐于自己脚下乞求指点迷径的批判，正是通过这种漫画般的、基督教德意志的唯心主义，证明它依然深深地陷在**德国民族性**的泥坑里。

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批判并不是什么在人类之外的、抽象的、彼岸的人格，它是那些作为社会积极成员的**个人**所进行的**真正的人类活动**，这些个人也是人，同样有痛苦，有感情，有思想，有行动。因此，他们的批判同时也贯串着实践，他们的共产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在这里面他们提出了显明的实际措施，这里面不仅体现着他们的思维，并且更主要的是体现着他们的实践活动。因此，他们的批判是对现存社会的生动的现实的批判，是对“颓废”原因的认识。

批判的批判向求知心切的群众成员阐述一番之后，自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这样来谈它的“文学报”：

“这里有一种**纯粹的**、一目了然的、通达事理的、不附加任何东西的批判。”

这里“没有提供**任何独立的东西**”，这里除了**不提供任何东西的批判**，即一种最终达到极端无批判性的批判之外，就根本**没有提供任何东西**。**批判**把加了着重号的词句排印出来，并使它们在**自己的摘录**中大放异彩。**沃尔弗干格·门采尔**和**布鲁诺·鲍威尔**互相伸出了友谊的手，可见批判的批判还停留在**同一哲学**在本世纪最

初几年所处的地方，那时**谢林**否定群众的推测，他力图提供某种东西，甚至提供除了**纯粹的**、**纯哲学的**哲学之外的无论什么东西。

(c) 天恩之降临于群众

刚才当着我们的面被批判教训一顿的软心肠的记者同批判保持着赤诚的关系。**群众**和**批判**的紧张的关系只是以牧歌的形式表现在这位记者的身上。**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对立的双方保持着**善意的**、**客客气气的**、因而也是**普普通通的**关系。

自己对群众的**危害健康的**、令人胆寒的影响，批判的批判首先是从一位一脚踏上了批判的土地而另一脚依然还在尘世的记者身上发现的。这位记者是“群众”在自己的反批判的**内部**斗争中的代表。

他有时觉得“布鲁诺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不了解**人类**”，他们“其实是盲目的”。但是他马上又纠正了自己：

“当然，您是对的，您的思想是真实的，这一点我**看得像白天一样清楚**。但是请您原谅，人民**也不见得**不对……　是呵！人民是对的……　您是对的，这我不能否认……　我真不知道这一切将会有什么后果。您说……好吧，就呆在家里吧……　呵，我不能再……呵……总有一天会**发疯**的……　我希望您能**善意**待人……　请相信我，一个人所获得的知识往往会弄得他**昏头昏脑**，好像磨在脑子里转一样。”

另一位记者也写道，他“**有时**会失去**理解力**”。你看，**批判的天恩**已经**准备宽恕**说上面段话的群众的记者了。好一个可怜虫！罪恶的群众从一方面拉他，批判的批判从另一方面拉他。但是，把批判的批判的准备受坚信礼的徒弟弄得这样糊里糊涂的，并不是所获得的知识，而是**信仰**和良心的问题：是批判的基督还是人民，是上帝还是世界，是布鲁诺·鲍威尔及其朋友们还是世俗的群众！

而正像罪人的灵魂的极端堕落先于**上帝**的天恩的降临一样，在这里，令人诅丧的**糊涂**也是先于**批判**的天恩而出现的。当批判的天恩最后降临于群众的时候，中选者所失去的自然不是自己的愚蠢，而是**自己悬蠢这种意识**。

(3) 非批判的批判的群众或 “批判”和“柏林学社”

批判的批判始终没有能够把自己描绘成**本质的对立面**，同时也就没有能够把自己描绘成群众的人类的**本质的对象**。**冥顽不灵的**群众的代表们指责批判的批判**没有目的性**，并非常恭敬地向它说明，它尚未完成精神上**“脱换羽毛的过程”**，它必须首先取得切实的知识。除这类代表外，还有两位记者。一位是**软心肠的**记者，首先，他不是批判的**对立面**，其次，他渴望靠拢批判的真正原因是纯**个人的**原因。因为把他的信读下去就可以看出，他实际上只是想把他对阿尔诺德·卢格先生的虔敬和他对**布鲁诺·鲍威尔**先生的虔敬调和起来。这种调和的企图给他那颗善良的心增色不少，但是丝毫不能代表**群众的利益**。于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后一位记者已经不是群众的**真正的**成员，而是批判的批判的准备受坚信礼的徒弟。

一般说来，**群众**是**不确定**的对象，因而它不可能完成任何确定的行为，也不可能同任何事物发生确定的关系。作为批判的批判的对象的**群众**同**真正的**群众毫无共同之点。真正的群众自己在内部和相互之间形成最为群众的对立。**批判的批判的**群众是批判的批判本身“制造”出来的，正像博物学家不谈动植物的特定纲目而只是把“一般纲目”当做自己的对立面一样。

因此，为了使自己拥有真正的群众的对立面，除了这种**抽象的**群众，即**批判**本身的想像的产物之外，**批判的批判**还需要有某种**特定的**、可以经验地指出来的、而不只是假想的**群众**。这种群众必须把批判的批判同时看成自己的**本质**和**自己的本质的绝灭**。它必须**力图**成为非群众，即批判的批判，同时又**不能**实现这种企图。上述的“**柏林学社**”正是这种既批判又非批判的群众。慎重其事地研究批判的批判的人类**群众**只不过是这么一个柏林学社而已。

据我们所知，“柏林学社”（即批判的批判的“**本质的对象**”，批判的批判经常在研究它，而它在批判的批判看来也在研究批判的批判）是由为数不多的几个。ci-devant〔从前的〕**青年黑格尔**派组成的。如批判的批判所断定的，它一方面使他们 horror vacui〔惧怕真空〕，一方面又使他们产生**空虚**之感。我们不打算深究实际情况，而相信**批判**的说法。

通讯的使命主要是向公众**详尽地**叙述**批判**对“柏林学社”的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关系，阐明这种关系的深刻意义，证明批判必须残酷地对待这种“群众”，最后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整个世界**屏息注视着这种对立，有时赞成**批判**的行动方针，有时则加以反对。例如，绝对的批判写信给一位拥护“柏林学社”的记者说：

“这一类的事情我**已经不知听过多少次了**，所以我下定决心不闻不问。”

他同**这一类**批判的事情打过多少交道，就连世界也无从推测。

但是我们不妨来听听，**批判的**群众的一位成员是怎样报道柏林学社的：

“他㊀一开始回答就说：‘如果说有人承认**鲍威尔兄弟**（对神圣家族总必

㊀　这是同记者谈话的人，持有柏林学社的观点。——编者注

须 pěle— měle〔不加区别地〕加以承认）①，那就是**我**。但是“文学报”！正义第一！’—— 我很想知道，关于您，这些激进主义者中的一个，即1842年的这些聪明人中的一个是怎样想的……”

记者又继续报道说，一个不幸的人发现“文学报”有各种各样的缺点。

他认为埃德加尔先生的小说“三个正直的人”既粗糙又夸张，他不了解，**书报检查**与其说是人和人的斗争，与其说是一种外部斗争，不如说是一种内部斗争。这些人懒得去看一下自己的内部世界，懒得用**精炼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批判的思想**去代替**书报检查所不能通过的言辞**。他认为埃德加尔先生评论贝罗的那篇文章是肤浅的，而批判的记者则认为这篇文章很有份量。这位记者虽然自己承认：“我**没有**读过贝罗的著作。”但是他**相信**埃德加尔先生写得很**成功**等等，大家知道，虔信则迷。批判的信徒继续说道：“总之，他（柏林学社的人）②对埃德加尔的著作**深为不满**。”他还认为“那里对待**蒲鲁东**的论述也不够**十分**严肃”。记者说到这里时替埃德加尔先生证明说：

“**的确**（!?）②，**我读过**蒲鲁东的著作；我**知道**，埃德加尔在自己的叙述中抄录并以明显的方式比较了蒲鲁东的各种**独特**的论点。”

照这位记者的意见，这些先生之所以不喜欢埃德加尔先生对蒲鲁东所做的**出类拔萃**的批判，唯一的原因就是埃德加尔先生没有**声色俱厉地痛斥**财产。此外，—— 多稀罕呵！—— 敌人还认为埃德加尔先生的关于“工人联合会”的文章**没有意义**。记者安慰埃德加尔先生说：

---

①②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 译者注

② 括弧里的惊叹号和问号是马克思加的。—— 译者注

“当然罗，这篇文章没有贡献出什么**独到的见解**，而实际上，这些先生是退回到他们确实**一贯坚持的格鲁培**的观点上去了。他们认为**批判**必须贡献，贡献，**再贡献**！”

看来批判是没有贡献出语言学、历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法学方面的全新的发现！它简直谦逊极了，甚至容许说它没有贡献出什么**独到的见解**！连我们的批判的记者也把前所未知的东西贡献给现代的力学，强迫人们**退回到**他们一贯**坚持的那种**观点上去。去回忆**格鲁培**的观点，那是不大巧妙的。格鲁培在其大体说来颇为贫乏的、不值一提的小册子里问布鲁诺先生，他打算对**思辨的逻辑学**提出什么样的批判。布鲁诺先生请他去问后代，并且说：

“一个傻瓜等待着回答。”[75]

就像上帝惩罚不信上帝的法老时使他的心冥顽不灵并**认为**他**不配**得到启示一样，记者断言：

“因此，他们**根本不配**看见或认识你们的‘文学报’的内容。”

于是，他不仅不去劝他的朋友埃德加尔设法获得思想和知识，反而给埃德加尔出主意说：

“但愿埃德加尔能弄到**一袋子语汇**，将来写文章时，闭着眼睛从袋子里掏些出来，就会有适合读者口味的风格。”

他一方面断言“某种程度的疯狂，不受欢迎，毫无内容，毫无思想，对自己无法理解的事物游移不定，空虚之感”（这些形容语显然是指柏林学社说的），一方面满口称赞神圣家族：

“处理事情是一贯得心应手，运用范畴是独具匠心，研究问题是融会贯通，一言以蔽之，**完全掌握了对象**。他（柏林学社的一员）①是尽可能减轻自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己的任务，而您则把事情本身变得容易了。”他又说：“您在‘文学报’上实现了一种纯粹的、明显的、切中要害的批判。”

最后，他说：

“我之所以向您这样详细地报道这一切，是因为我知道，把我的朋友的看法告诉您，会使您感到**满意**。您可以由此看到‘文学报’已经达到了它的目的。”

“文学报”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同柏林学社对立起来。我们方才已经看到了**柏林学社**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攻击**，也看到了它因这种攻击而受到的斥责，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柏林学社渴望博得批判的批判的怜悯而做出的两重嘴脸。

一位记者写道：

“我今年年初到柏林时，听那里的熟人说，您厌恶一切人，您对一切人都敬而远之，您简直成了一个隐士，故意避免同其他人接近和交往。当然，我不知道这是哪一方面的过错。”

绝对的批判答道：

“批判**不**组织**党派**，它不想有自己的党派，它是**孤独**的，这就是说，它深入到**自身**（!）①的对象的时候，它是孤独的，它把自己同这种对象对立起来的时候，它是孤独的。它**把自己同一切隔绝开**。”

批判的批判把现实的对立换成了**本身和世界、神圣精神和世俗群众**之间的想像中的对立，以为这样一来就能超越一切教条主义的对立，同样，批判的批判作为**政党**把自己同除它以外的全人类对立起来，把一切心思都集中在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的人格上，于是滚到了**政党观点之下**，但是它仍然想像自己凌驾于**一切党派**

① 括弧里的惊叹号是马克思加的。——译者注

之上。批判高踞于**抽象**的孤独这个宝座上，甚至当它似乎在研究某种**对象**时，它实际上也并未脱离无对象的孤独状态而同某种**现实的对象**发生真正的**社会关系**，因为**它的对象**不过是**它的想像**的对象，是想像中的对象——这种批判的**自白**的真实性已由我们的全部叙述所证明了。从“它把自己同**一切隔绝开**”这一个意义上来说，它同样正确地确定了自己的**抽象**的性质——作为**绝对**抽象的**抽象**的性质；而正是这种同**一切**、**同一切**思维、直观等等相隔绝的无，才是绝对的胡说。然而，这种和**一切**隔绝、和**一切**脱离的孤独并不能摆脱自己从中脱离出来的对象，正像**奥力金**不能摆脱从他身上**脱离**的**生殖器**一样。

另一位记者一开始就描述了一位同他见过面谈过话的“柏林学社”的人，说他“情绪恶劣”，“心境忧郁”，“不能多开口”（其实，他以前总是“**敢说敢做的**”）而且“颓唐沮丧”。这位“柏林学社”的成员向记者谈了一些，而记者又把他说的话报告了批判：

“他不能理解，像您们二位这样一贯尊重人道主义原则的人怎能如此孤僻，如此不讲友情，甚至还很高傲。”他不知道“为什么世上竟有这样显然是故意在制造分裂的人。我们观点相同，我们都**崇拜**极端，即崇拜批判，我们都能够树立极端的思想，至少也能够理解和运用它”。“他认为这种分裂的主导原则不外就是利己主义和傲慢。”

记者接着又竭力为自己的朋友说好话：

“也许，我们的朋友中至少还有一些人不理解**批判**，或者不理解**批判的一片好心**……ut desint vires，tamen est landanda voluntas〔虽然力不从心，但其志可嘉〕。”

批判像下面这样把自己同柏林学社做了**对比**，并以这个对比来作为回答：

“对批判的看法**各有不同**。”这些先生“以为批判就在他们的口袋里”；而**批判**“却知道并且真正在运用批判的威力”，就是说，它并不把它保存在口袋里。在前者看来，批判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在批判看来，却是“**最富有内容的**，更确切些说，是唯一**具有内容**的”。正像绝对的思维认为自己是全部实在性一样，批判的批判也认为自己是全部实在性。因此它认为在**它本身之外**不存在任何内容，因此它不是对那些处于批判的主体之外的现实对象的批判，它本身就**创造**对象，它是绝对的**主客体**。批判继续说：“第一种批判用言辞回避一切，回避对事物的任何研究，第二种批判用言辞把自己**同一切**隔绝开。”第一种“**聪明，但一无所知**”，第二种“在不断地学习”。实际上，第二种并不聪明，它 par çà，par là〔处处〕学习，但只是为了摆样子，只是为了用一知半解来冒充自己特有的大智大慧，把这种一知半解当做“口号”来反对自己曾从之受教的群众本身，并将它变成批判的批判的胡说。

第一种批判认为，“极端”、“走远些”、“走得还不够远”这一类字眼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是最受尊敬的范畴。第二种批判**研究各种观点**，而不在研究中使用上述抽象的范畴的**标准**。

批判№.2大喊大叫，说什么现在已经谈不到政治，哲学已经完蛋；它决心要用“幻想的”、“乌托邦的”之类的言辞来清除社会体系和社会运动，——难道所有这一切不正是上面已经说过的范畴“走远些”、“走得还不够远”等等的**批判的修正**版吗？而它的“标准”，如“**历史**”、“**批判**”、“对象的综合”、“新的和旧的”、“批判和群众”、“观点的研究”，总之，它的一切口号，难道不是**从范畴中**，而且是从抽象范畴即**标准中产生出来的**吗！?

“第一种批判是神学的，不怀好意的，嫉妒的，小气的，傲慢的；第二种

批判则是这一切的**对立面**。”

批判这样一口气对自己吐出一大串赞词，硬说自己具有柏林学社所缺少的一切，正像上帝**能办到人所不能办到**的一切一样。然后**批判**为自己提出了如下的证词：

“它已经明澈如镜，渴求知识，心地平和，因而它是**坚强而又不可战胜的**。”

因此，要对付柏林学社之类的敌人，它无需“任何其他武器，只用**奥林帕斯的嘲笑**[①]就够了”。于是，批判以它独有的彻底性阐明这种**嘲笑**的性质，竭力确定这种嘲笑是什么和不是什么。“这种嘲笑不是高傲。”绝对不是！这是否定的否定。这“**不过是**心情愉快的、心平气和的**批判家**为了对付比它**低下**但**自认为**和它**平等**（多自命不凡呵！）[②]的**观点**而必须使用的**办法**”。所以，每当**批判家**发笑时，他就是在**使用一种办法**。但是他因为“心平气和”，所以**嘲笑这个办法**不是用来对付人，而是用来对付**观点**！**嘲笑**竟成了他所运用的、甚至是他所**必须**运用的一种**范畴**！

世外的批判不是现实的即生活在**现代**社会之中并同这个社会共甘苦的**人类主体**所特有的**活动**。**现实的**个人只是**偶性**，只是**批判的批判**借以表现自己为**永恒实体**的人间的容器。主体不是人类中的个人所实现的批判，而是**批判的非人类的个人**。并非批判是**人的表现**，而是人是**批判的异化**，因此批判家完全生活在社会之外。

“批判家能否生活在他所批判的社会里呢？”

应当反问一下：难道他不是必须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吗？难道

---

① 意指神的嘲笑。—— 译者注

②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 译者注

他自己不是必须成为这个社会的生活的表现吗？为什么批判家要**出卖**自己的精神产物呢？难道他出卖它们就能使现存社会的最糟的法律变成自己专用的法律吗？

"**批判家**甚至不应当企图把**本人**同社会混为一谈。"

因此，他为自己建立起一个**神圣家族**，正像孤独的上帝渴望在神圣**家族**里消除他同整个社会相隔绝这种苦闷一样。既然批判家**希望摆脱糟糕的社会**，那就让他先摆脱**他所独有的社会**。

"这样，批判家就失去了**社会的一切欢乐**，但是也没有**社会的痛苦**了。他既不知道**友谊**（批判的朋友除外）①，也不知道爱（**对自己的爱**除外）②，而且诽谤也对他无能为力；无论什么东西都侮辱不了他；无论憎恨或嫉妒都触动不了他；激愤和忧恨都是和他**毫不相干的情感。**"

总之，批判家摆脱了一切**人间的激情，**他成了一个**神人**，他满可以给自己唱一首修女歌：

"我不思恋爱情，
任何男人我都不需要，
我一心想念上帝，
他是我唯一的依靠。"[76]

批判家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是自相矛盾的。例如，它最后对我们说：

"凡夫俗子为了使**批判家同自己处于平等地位**（这种自命不凡的平等在上面谴责过了！）③，就向他扔石头（依照圣经类推，应当用石头打他一顿）④，不愿意理解他，硬说他动机**不纯**（硬说**纯粹**的批判动机**不纯！**）⑤。这种凡夫俗子**并不会受到**批判家的**嘲笑**，因为他们不值一笑；批判家只是把它的真正的本性揭示出来，心平气和地把它放在和它那微不足道的意义相称的地位上

---

①②③④⑤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去。”

我们从上面知道，批判**必须**使用**嘲笑这个办法**来对付“比它低下但自认为和它平等的观点”。批判的批判自己也不甚明了自己对待不信上帝的“群众”的策略，这几乎已经表明了批判的内心的愤激和暴躁。而愤激和暴躁同“情感”远不是“毫不相干的”。

但是，不能不承认，经过一场海格立斯式的斗争（批判在这场斗争中所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把自己同非批判的“世俗的群众”、甚至同“一切”**隔绝开**），批判终于幸福地达到了它那**孤独的、上帝似的、自足的、绝对的**存在。如果说，当它的这种“新面貌”初次表现出来的时候，**罪恶的情感**的旧世界看来对它还有某些支配力的话，那末我们现在就将在某个**“艺术形象”**中看到它的**美学的渐趋冷静**和**飞升**。它要在“艺术形象”中为自己**赎罪**，以便最后作为第二个胜利的**基督**来完成**批判的末日的审判**，并在战胜龙之后安然地升入天堂。

第 八 章
批判的批判之周游世界和变服微行，或盖罗尔施坦公爵鲁道夫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盖罗尔施坦公爵**鲁道夫**在他**周游世界**期间**赎补**了**双重**的罪行：他**个人的**罪行和**批判的批判**的罪行。他在跟父亲激烈争吵时向父亲挥动了宝剑；批判的批判在同群众激烈争吵时也为罪恶的激情所控制。批判的批判没有揭露**任何一个**秘密。鲁道夫赎补了这个罪过并揭露了**一切**秘密。

按照施里加先生的评定，鲁道夫是人类**国家**的**头等**公仆（施瓦比亚人**埃基迪乌斯**的“**人道国家**”。见卡尔·魏尔博士的“宪法年鉴”1844年第二卷）。

根据施里加先生的论断，为了使**世界免于灭亡**，必须有

“敢于无情地批判的人出台……　鲁道夫就正是**这样的人**……　鲁道夫领会了**纯批判**的思想。而对于他和全人类来说，这个思想比人类在自己的**历史**上所获得的**全部**经验，比鲁道夫即使在良师指导下所能从这一历史中汲取的**一切**知识，都更有益处……　鲁道夫借以使自己的**周游世界**留芳千古的公正裁判，**实际上**正是

对社会秘密的揭露。”

他本人就是“**一切秘密本身的被揭露了的秘密**”。

鲁道夫比批判的批判的其他伟人拥有多得不可胜数的**外部**工具。但批判的批判却聊以自慰地说：

"时运较差的人是无法达到鲁道夫所获得的**成果**的(!)①,可是他却能达到美好的目的 (!)②。"

因此批判就让时运亨通的鲁道夫来**实现**它自己的**思想**。它对他唱道:

"**哈内曼**,走向前,
你有双大的防水靴!"[77]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鲁道夫的批判的周游世界怎样"对于**全人类**来说,比人类在自己的历史上所获得的**全部经验**,比……**一切知识,都更有益处**",等等——我们来看看这个**两次**拯救世界于**灭亡**的鲁道夫吧!

(1) 屠夫批判地变成了狗,或"刺客"②

"**刺客**"的职业本是屠夫。各种各样的经历使这个强悍的自然之子变成了杀人犯。他在凌辱玛丽花④的时候偶然为鲁道夫所见。鲁道夫在这个精明的闹事鬼的头上很内行地着实打了几拳。于是他博得了"刺客"的尊敬。随后,在罪犯麇集的酒吧间里,"刺客"显露了他那善良的性格。鲁道夫对他说:"你还是有心肝和骨气的。"鲁道夫用这句话激起了他的自尊心。"刺客"改邪归正了,或者如施里加先生所说,变成了"**有道德的**生物"。鲁道夫把他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鲁道夫改造"刺客"的过程。

第一个阶段。"刺客"所上的第一课是练习伪善、背信、狡黠和**伪装**。鲁道夫利用为道德所感化的"刺客"同**维多克**利用为道

①② 括弧里的惊叹号是马克思加的。——译者注

②④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

德所感化的罪犯是出于同一目的，这就是说，鲁道夫把“刺客”变成了密探和**奸细**。他教他在“**校长**”[1]面前“**伪装**”放弃了“不偷的信条”，怂恿这个“校长”去干偷盗的勾当，以便把后者诱入鲁道夫所设置的圈套。“刺客”感到有人想利用他来演“滑稽戏”。他对这种要他充当**密探**和**奸细**的计谋表示抗议。靠着批判的批判的“**纯粹**”**诡辩**，鲁道夫没有花多大功夫就说服了这个自然之子，使他相信：下流的勾当如果出于“**善良的、道德的**”动机，就不算是下流的勾当。于是“刺客”就充当了奸细，装着友好和守信的样子，把自己旧时的同伴诱入了致命的陷阱。他在他的一生中**第一次**做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第二个阶段。现在我们看到“刺客”在鲁道夫病中充当他的**看护**，把他从垂危中挽救出来。

“刺客”成了这样**彬彬有礼的有道德的**生物，他为了怕把地毯弄脏，连黑人医生大卫请他坐在地板上他都推辞了。他甚至**胆怯**到不敢在椅子上坐。他先把椅子放倒在地板上，然后坐在椅子的两个前脚上。每当他称呼被他从垂危中挽救出来的鲁道夫为“朋友”或《Monsieur》（“先生”）而没有叫《Monseigneur》（“殿下”）[一]时，他总是忘不了道歉的。

冷酷无情的自然之子驯服得多么惊人呵！“刺客”给我们揭穿了自己的批判转变的最玄奥的秘密，他向鲁道夫表白说，他对他就像**看家狗**对自己的主人一样顺从：《Je me sens pour vous comme qui dirait l' attachement d' un bouledogue pour son maltre》〔“我对您就像**看家狗**对**自己的主人**一样顺从”〕。昔日的屠夫变成了狗。

---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 译者注

㊀ 公爵和主教的称号。—— 编者注

从此,他的一切德行都将是狗的德行,是狗对主人的绝对**“忠顺”**。他的独立性、他的个性完全消失了。但是,和蹩脚的画家不得不在自己的画上题字来说明画的内容一样,欧仁·苏也在“刺客”这头**“看家狗”**的嘴上贴了一张标签,这就是“刺客”时刻诵之于口的一句话:“‘你有心肝和骨气’这几个字使我成了**人**。”一直到咽最后一口气,“刺客”都不是在自己的人类个性中寻求自己的行为的动机,而是到这句标签式的话中去寻找这种动机。他常常想到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的缺点,以证明自己的道德修养的增进;而每当他滔滔不绝地高谈仁义道德的时候,鲁道夫总是对他说:“我喜欢你这样的**谈吐**。”“刺客”成了一头非比寻常的、**有道德的看家狗**。

第三个阶段。“刺客”的虽**粗犷**却**勇敢**的率直已被他那**小市民式的礼仪**所代替,对这种礼仪我们已经称颂过了。现在我们就要看到,同**“有道德的生物”**这种身分相适应,他也学会了**庸人**的举止和风度:

“就他的举止而言,他可以算做世界上最不讨人厌的市民。”

比这外形更可悲的,是鲁道夫给他那批判地改革过的生活所赋予的内容。鲁道夫把他派到非洲,“给不信神的世界提示一个关于悔过的生动而有益的例证”。从此,“刺客”所表现的就不是他自己固有的人性,而是基督教的教义。

第四个阶段。批判的道德上的转变使“刺客”成了一个温顺的、谨小慎微的人,他的所作所为都被恐惧和世故所节制。

穆尔弗——他由于过分单纯,总是泄露家丑——告诉我们:“‘刺客’对惩罚‘校长’这件事闭口不谈,因为他**生怕**连累自己。”

可见,“刺客”知道这种惩罚是违法的行为。他不谈这件事,

是因为他怕受牵连。好一个**聪明的**“刺客”呵！

第五个阶段。“刺客”在自己的道德修养方面已增强到这样一种程度，他甚至以文明的方式来领会他对鲁道夫的那种**狗式的**忠顺。“刺客”搭救了**热尔门**[①]的性命之后，对他说了这样几句话：

“我有一位保护人，他之于我就如**上帝**之于**神甫**；我真愿意对他俯首跪拜。”

而在思想中他也确是跪拜在他的上帝面前了。

他继续对热尔门说道：“鲁道夫先生会保护你的。我说‘**先生**’，虽然我是应该说‘**殿下**’的。可是我已经习惯于称他为鲁道夫**先生**，而他也允许我这样称呼。”

“多么可贵的觉醒和振奋呵！”——施里加在一阵批判的狂喜中叫道。

第六个阶段。“刺客”最后在救他的殿下时被人刺死了，这样他就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他那忠矢不二的有道德的看家狗式的一生。在斯凯莱特[②]正要用刀刺死公爵的那一瞬间，“刺客”抓住了暗杀者的手。斯凯莱特便刺杀了他。而“刺客”在临死时却对鲁道夫说：

“我有理由说，像我这样的**一撮尘土**（这样的看家狗）[②]对于像您这样**伟大的殿下**有时也许是有点用处的。”

这番狗式的自白以警句的形式概括地表明了“刺客”的全部批判的生涯；自白之外，他在嘴上又附了一张标签：

“我们彼此算是了清宿债了，鲁道夫先生。您对我说过我是有心肝和骨气的。”

---

①②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

②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施里加先生竭尽全力地叫道：

"鲁道夫把这个'刺客'还给了**人类**①(?)，这是他的一桩多么大的功绩呵！"

(2)揭露批判的宗教的秘密，或玛丽花㊀

(a)思辨的'雏菊'

我们在谈欧仁·苏的玛丽花以前，还得先谈谈施里加先生的思辨的"雏菊"。

首先，思辨的"雏菊"是一种**修正**。因为施里加先生唯恐读者会从他的设计中得出结论，似乎欧仁·苏

"使客观基础的描述(对"世界秩序"的描述)②脱离了那些唯有联系这个基础才能为人所理解的当事的个人力量的发展。"

除了纠正施里加先生的叙述给读者造成的误解这个任务以外，雏菊在"我们的史诗"即施里加先生的"史诗"中还执行着另一种形而上学的使命。

"**世界秩序**和史诗式的事变如果只是互相交错成一个五光十色的混合体，并变幻神速地时而给我们展现出世界秩序的一鳞牛爪，时而给我们演出一幕戏剧，那末这两者就**还没有**艺术地结合为一个真正**统一的**整体。要形成**真正的统一体**，就必须使两种因素——这个混沌**世界**的秘密同**鲁道夫**借以洞察和揭露秘密的明确、坦率和信心——在**一个**人身上互相冲突……　雏菊也就执行着这个任务。"

---

① 括弧里的问号是马克思加的。——译者注

㊀ 原文是《Fleur de Marie》，直译是"玛丽花"或"花玛丽"；而施里加用来称呼玛丽花的德文字《Marienblume》的含义则是"雏菊"。——编者注

②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施里加先生对雏菊的设计跟**鲍威尔**对**圣母**的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方面是“**神类**”(**鲁道夫**),“各种威力和自由”、唯一的**能动**原则都归之于他。另一方面是消极的“**世界秩序**”和属于它的人。世界秩序构成“现实事物的基础”。为了使这个基础不致“完全被废弃”,或者为了使“自然状态的最后残余不致被消灭”,为了使世界本身还能分享一些集中在鲁道夫(跟世界相反)身上的“发展原则”,为了使“人类的事物不致被描写成绝对不自由的和没有能动性的”——为了这一切,施里加先生就必然要陷入“宗教意识的矛盾”。尽管他把世界秩序同它的活动彼此割裂开,从而造成了僵死的群众和批判(鲁道夫)的二元论,他仍然不得不又承认世界秩序和群众也有几分神类的属性,并在雏菊身上构成鲁道夫和世界这两者的思辨的统一(见“复类福音作者批判”第一卷第39页)。

除了房屋主(当事的“个人力量”)和他的**房屋**(“客观基础”)之间所存在的实际关系以外,神秘的思辨和思辨的美学都还需要第三个因素,需要**具体的、思辨的统一**,即需要把房屋和房屋主集诸**一身**的**主客体**。既然思辨不喜欢仔细地研究天然的中介,那末它就看不出,对于一个人(例如对于房屋主)是“客观基础”的“世界秩序的一鳞半爪”(例如房屋),对于另一个人(例如对于这栋房屋的建造者)则是“史诗式的事变”。批判的批判指责“浪漫主义艺术”的“统一教条”,可是它现在却力求获得“真正统一的整体”、“现实的统一体”,并且抱着这个目的,用虚幻的联系、神秘的主客体来代替世界秩序和世界事件之间的自然的合乎人性的联系,这就像**黑格尔**用那一身兼为整个自然界和全体人类的绝对的主客体——**绝对精神**来代替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现实的联系一样。

在批判的雏菊身上“时代的普遍罪过、秘密本身的罪过”之成为“罪过的秘密”，恰如秘密本身的普遍罪过在债台高筑的小铺老板身上成为**债务的秘密**一样。

根据对圣母的设计，雏菊**本来**应该是救世主**鲁道夫的母亲**。施里加先生也正是这样宣告的：

“按照**逻辑的连贯性**的要求，鲁道夫应该是雏菊的**儿子**。”

但他却不是雏菊的儿子，而是雏菊的父亲，于是施里加先生就在这里面发现了一个“新秘密，即现在所孕育出的常常不是未来，而是早已衰逝的过去”。这还不算，他还发现了另一个更大的、同群众的统计学直接矛盾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一个孩子如果不也成为父亲或母亲，而是保持着童贞进入坟墓……那末他**本质上**……是一个**女儿**。”

施里加先生“根据**逻辑的**连贯性”把女儿看做她父亲的母亲，他的这种思想同黑格尔的思辨是完全一致的。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和在他的自然哲学中一样，也是儿子生出母亲，精神产生自然界，基督教产生非基督教，结果产生起源。

施里加先生证明，“根据**逻辑的**连贯性”，雏菊应该是鲁道夫的母亲，现在他又证明了一个相反的说法：“为了完全符合她在我们的史诗中所体现的**观念**，她**决不应该成为母亲**。”这就至少说明了，我们的史诗的观念同施里加先生的逻辑连贯性是互相矛盾的。

思辨的雏菊无非是“**观念的体现**”而已。但究竟是什么样的观念呢？“她所依然担负着的任务**仿佛**是描绘过去在它自己彻底消逝之前所流出的最后一滴辛酸的眼泪。”她就是比喻的眼泪的绘像；而甚至她在扮演自己的那种渺小角色时，也**依然**只是“**仿佛**”而已。

我们不去追究施里加先生对雏菊的进一步描述。我们让她自

己高高兴兴地遵照施里加先生的指示，“去和**每一个人做最坚决的**对头”——简直就和上帝的特性一样神秘的对头。

我们也不去探究那被“**上帝**埋在人胸中”并为思辨的雏菊所“依然仿佛”指明的“**真正秘密**”的底细。我们暂且撇下施里加先生的雏菊，调过头来看看欧仁·苏的玛丽花和鲁道夫在她身上所创造的那些批判的奇迹。

(b) 玛丽花

我们在罪犯当中看到的玛丽是一个卖淫妇，是那个罪犯麇集的酒吧间老板娘的奴隶。尽管她处在极端屈辱的境遇中，她仍然保持着人类的高尚心灵、人性的落拓不羁和人性的优美。这些品质感动了她周围的人，使她成为罪犯圈子中的一朵含有诗意的花，并获得了玛丽花这个名字。

对玛丽花必须从她初出场起就做细密的观察，这样才能把她的**本来的形象和批判的变态做一个对比**。

玛丽花虽然十分纤弱，但立刻就表现出她是朝气蓬勃、精力充沛、愉快活泼、生性灵活的，只有这些品质才能说明她怎样在非人的境遇中得以合乎人性地成长。

她拿起剪刀来抵抗用拳头打她的“刺客”。这是我们初次遇见她的情景。在这个场面中，她不是一个毫无反抗地屈服于暴力之下的没有防御能力的羔羊，而是一个善于捍卫自己的权利和能够坚持斗争的女郎。

在费维街的罪犯们的酒吧间里，她向“刺客”和鲁道夫叙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在叙述时她用**笑**来回答“刺客”的挖苦。她埋怨自己在出狱以后没有去找工作，而把在狱中赚得的300法郎

统统花在游逛和装饰上，“但是没有人劝告我呀”。回想起自己生活中的灾难——卖身于罪犯酒吧间的老板娘，她感到很悲伤。现在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追怀这一切往事。“真的，我想起过去就伤心……做个诚实的人想必是很好的。”“刺客”嘲笑道：“就让她做个诚实的人好啦！”于是她叫道：“诚实，我的天！你说我有什么办法能够诚实！”她坚决声明，“我决不哭鼻子”（《je ne suis pas pleurni– cheuse》），但她的生活境遇是可悲的——“这是很不愉快的”。最后，跟基督教的忏悔相反，对于自己的过去，她提出了这样一条**斯多葛派的**同时也是**伊壁鸠鲁派的**人性原则，这是自由而坚强的人的原则：

“到头来，做过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现在我们来看看玛丽花和鲁道夫的第一次散步。

“你想到自己那种可怕的处境，恐怕是常常感到痛苦的吧？”——已经非常渴望来一场道德谈话的鲁道夫说。

她回答道：“是的，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透过河岸的栏杆凝视着塞纳河，可是，过后我又转过来看着花，看着太阳，并且自言自语地说：河始终会在这里，可是我还没有满十七岁呵，谁会知道呢？在这一刹那间，我觉得我不应该有这样的命运，我觉得自己身上有某些好的地方。我对自己说：我的苦是受够了，但是至少我从来没有害过什么人。”

玛丽花把她的处境不是看做她自己自由创造的结果，不是看做她自己的表露，而是看做她不应该遭受的命运。这种不幸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她还很年轻。

玛丽所理解的**善**与**恶**不是善与恶的**抽象道德概念**。她之所以**善良**，是因为她不曾害过任何人，她总是**合乎人性地**对待非人的环境。她之所以**善良**，是因为太阳和花给她揭示了她自己的像太阳和

花一样纯洁无瑕的天性。最后，她之所以**善良**，是因为她还**年轻**，还充满着希望和朝气。她的境遇是**不善的**，因为它给她一种反常的强制，因为它不是她的人的本能的表露，不是她的人的愿望的实现，因为它令人痛苦和毫无乐趣。她用来衡量自己的生活境遇的量度不是**善的理想**，而是她**固有的个性**、她**天赋的本质**。

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资产阶级生活的锁链脱去了，玛丽花可以自由地表露自己固有的天性，因此她流露出如此蓬勃的生趣、如此丰富的感受以及对大自然美的如此合乎人性的欣喜若狂，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她在社会中的境遇只不过伤害了她的本质的表皮，这种境遇大不了是一种歹运，而她本人则既不善，也不恶，就只是**有人性**。

"鲁道夫先生，多么幸福呵！……青草、原野！……　要是您允许我下车去就好啦……　这里真好……　我真想在这片草地上跑一下！"

她走下马车，给鲁道夫摘了许多花，"几乎高兴得说不出话来"，等等，等等。

鲁道夫告诉她，他要带她到**若尔日夫人**①**的农场**上去。在那里，她将会看到鸽房、马厩之类的东西；那里有牛奶、乳酪、水果等等。对这个孩子说来，这真是**上天的恩赐**。她会很**痛快**的——这就是她的主要的想法。"您甚至不能想像我是多么想痛快痛快呵！"她非常坦率地向鲁道夫说，她的不幸是她自作自受："过去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我不会节省钱的缘故。"于是她劝他节俭，并劝他把钱存入储蓄银行。她完全浸沉在鲁道夫为她建造的空中楼阁里。她之所以陷于悲哀，只是因为她"忘记了**现在**"，而"这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为鲁道夫管理农场。——译者注

种现在同关于愉快光明的生活的幻想相对照，使她想起了自己的境遇的极端可怕”。

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看到的都是玛丽花本来的、非批判的形象。在这里，欧仁·苏超出了他那狭隘的世界观的界限。他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偏见。现在他把玛丽花交到主人公鲁道夫的手中，以便弥补自己的孟浪无礼，以便博得一切老头子和老太婆、所有的巴黎警察、通行的宗教和“批判的批判”的喝采。

受鲁道夫之托照看玛丽花的若尔日夫人是一个不幸的、患忧郁病的、信教的妇人。她一见到这个年轻的姑娘，就马上说一些非常动听的话，说什么“**上帝**保佑那些又爱他又怕他的人、那些曾经不幸并已经**悔悟**的人”。“纯批判”的伟人鲁道夫唤来了一个可怜的、迷信极深的教士**拉波特**[①]。他指定这个牧师对玛丽花进行批判的改造。

玛丽欢欢喜喜、坦率天真地同这个老教士接近。**欧仁·苏**怀着他所固有的基督教式的粗暴，要“可惊叹的本能”对玛丽耳语：“在开始**忏悔**和**赎罪**的地方要结束**羞惭**”，这就是说，在唯一济度世人的教堂里不要害羞。他忘记了她在乘车遨游时的那种愉快的坦率、那种由大自然的美和鲁道夫的友好同情所引起的兴高采烈；当时她只是由于想起必须回到罪犯酒吧间老板娘的身边，这种兴高采烈的心情才沮丧下来。

拉波特教士立即摆出了**超凡出世的**姿态。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上帝**的仁慈是无穷尽的，我的亲爱的孩子！在你受苦受难的时候上帝都没有弃绝你，这就可以证明边一点……　救你于绝境的这位宽大为怀的人实

---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鲁道夫的农场中的牧师。——译者注

现了**圣经上的话**（注意：不是实现人的目的，而是实现圣经上的话）①：人有呼主之名者，主将庇佑之；人有呼主者，主将成就其心愿；主将闻听其呻吟并拯救之……　主将完成**自己的**事业。”

玛丽还没有明了教士这番说教的**险恶的**用意。她回答说：

“对我仁慈并使我回到了上帝那里去的人，我将为他祈祷。”

她最先想到的**不是**上帝，而是她那**人世的**救星，她想为**他**祈祷，而不是为她**自己的**赦免祈祷。她希望自己的祈祷能使别人得救。此外，她竟天真到以为自己**已经回到**上帝面前了。教士认为自己必须来打破这种有违神道的错觉。

他打断了她的话，说道：“很快，你很快就会得到赦免，赦免你那深重的罪孽……因为，正如先知者所说，主保佑一切行将堕落的人。”

请注意牧师言谈中的违反人性的话。你很快就会得到赦免！你的罪恶**还没有得到宽恕**。

拉波特在同姑娘见面时竭力在她心中唤起**自己有罪这种意识**，而鲁道夫在同姑娘临别时则送了她一个金**十字架**，这是她即将受到**基督教磔刑**的象征。

玛丽在若尔日夫人的农场上已经住了一个时期。我们先来偷听一下老教士拉波特和若尔日夫人的谈话。他认为玛丽是不能“嫁人”的了，“因为，尽管有他拉波特担保，也没有一个男人有勇气忽视那玷污了她的青春的过去”。他接着又补充说，她“必须赎补大的罪恶”，而“如果她有道德感的话，她是不会堕落的”。他证明她有可能像那些下流到极点的小市民一样保持自己的清白：“在巴黎有很多乐善好施的人。”这个伪善的牧师知道得很清楚，这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些乐善好施的巴黎人每时每刻都遇见那些直到半夜还在最热闹的街头叫卖火柴（玛丽也曾经这样做过）的七八岁的小女孩，可是他们总是无动于中地从她们面前走过；而这些小女孩未来的命运也几乎毫无例外地和玛丽的命运一样。

教士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玛丽**赎罪**。他在自己的心中给玛丽**定了罪**。现在我们来看看玛丽花在傍晚送拉波特回家时两人散步的情形。

“你看呵，我的孩子！”——他开始了热烈动人的谈话——“看那一望无涯的天际，这天际的界限现在无法分辨了（这已是黄昏时候了）①。我觉得，万籁俱寂和无边无际几乎能使我们产生一种永恒的观念…… 玛丽，我对你说这些，是因为你易于感受造物之美…… 看到这造物之美在你心中，在你那长久丧失宗教感情的心中激起了宗教崇拜，我常常是深为感动的。”

教士已经成功地把玛丽对于大自然美的纯真的喜爱变成了**宗教**崇拜。对于她，自然已经被贬为适合神意的、**基督教化的**自然，被贬为**造物**。晶莹清澈的太空已经被黜为静止的**永恒性**的暗淡无光的象征。玛丽已经领悟到，她的本质的一切人性表现都是“**罪孽深重**”的，这些表现背弃了宗教，违悖了真正的神恩，这些表现是离经叛道、亵渎神灵的。教士必须使她感到自惭形秽，必须把她的自然的和精神的力量以及各种自然的赋与都化为灰烬，以便使她能够接受他所许给的超自然的赋与，即接受**洗礼**。

当玛丽想要对教士有所告白并祈求他**宽恕**的时候，他回答说：

“**主**已经向你证明他是仁慈的。”

玛丽不应当把她所受到的宽恕看做同一种人类造物对她这同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一种人类造物的自然的、理所当然的关系，而应当把这看做一种无限的、超自然的、超人类的仁慈和宽恕，应当把**人的宽恕**看做**上帝的仁慈**。她必须把一切自然的、人类的关系化为**对上帝的**彼岸**关系**。玛丽花对牧师关于上帝仁慈的空谈所做的回答，表明宗教教义已经把她腐蚀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她说，她一进入新的、良好的环境，就只是感到**新的幸福**：

"我曾经每一分钟都在想念着鲁道夫先生。我时常抬头望着天，但不是在那里找上帝，而是找鲁道夫先生，好向他道谢。是的，**我在这一点上责备了我自己**，我的神甫；**过去我想念他**比想念上帝为**多**；因为他为我做了唯有上帝才能做出的事情…… 我是**幸福**的，幸福得跟永远逃脱了大险的人一样。"

对新的、幸福的生活境遇只是**如实地**感到是一种新的幸福，也就是对这种境遇抱着自然的而不是超自然的态度，这在玛丽花看来已经是不可饶恕的了。她已经谴责自己不该把救她的人**如实地**看做自己的救星，而没有用想像中的救星——**上帝**来代替他。她已经为宗教的伪善所支配，这种伪善把我对别人的感恩拿过来归之于上帝，把人身上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一概看做与人相左的东西，而把人身上一切违反人性的东西一概看做人的**真正的**所有。

玛丽告诉我们，她的思想、她的感情和她对生活的态度的**宗教的转变**，应该归功于若尔日夫人和拉波特的教诲：

"当鲁道夫把我带出巴黎最古老的地方的时候，我已经朦胧地意识到我的地位的卑下，但我从您和若尔日夫人那里所得到的教诲、劝导和榜样，使我能够领悟到……我过去与其说是不幸，还不如说是有罪…… 您和若尔日夫人使我**懂得了我的罪孽是无限深重的**。"

这就是说，她应当感谢拉波特教士和若尔日夫人的，是充满她心中的已经不是自己地位卑下这样一种人的、因而也是可以容

忍的意识，而是自己罪孽无限深重这样一种基督教的、因而也是不可容忍的意识了。这个教士和这个巫婆教会了她从**基督教的观点**来谴责自己。

玛丽感到她所遭到的精神上的不幸是非常巨大的。她说：

“既然善恶意识的觉醒对于我是这样的可怕，那末为什么不让我由不幸的命运去摆布呢？…… 要是听我沦落在过去的火坑中，也许贫困和毒打很快就断送了我的性命，而对于这种无论我怎样渴望也始终得不到的纯洁，我至少是可以毫不知道便了此一生的。”

毫无心肝的教士回答道：

“就是品性最高尚的人，只要他在你被救出的污泥中呆过一天，出来后也会**在额上留下一个洗不掉的污点**。这就是**神的司法不可动摇的法则**。”

玛丽花被**教士**这种巧舌如簧的**诅咒**深深地刺痛了，她叫喊道：

“那末，您看出我是命定该绝望的罗！”

这个宗教的老奴回答说：

“你必须抛弃想从自己的生活中撕掉这可悲的一页的任何希望，但是你应该期望**上帝的无限仁慈**。在这里，**在尘世上**，可怜的孩子，你应得的一份是眼泪、忏悔、赎罪；但有一天在那里，**在天堂中**，你将得到赦免和**永恒的福祐**。”

玛丽还没有痴愚到要到天堂的永恒福祐和赦免中去寻求慰借的地步。

“可怜可怜我吧”，——她叫道，——“可怜可怜我吧，天呀！我还这样年轻……我多么不幸呵！”

这时，牧师的伪善的诡辩达到了极点：

“恰巧相反，这是你的幸福，玛丽，是你的幸福！主使你受到良心的谴责、这种谴责虽然充满了痛苦，但却是与人为善的。它证明你的灵魂有**宗教的**感受性…… 你所受到的每一点苦难都会在天上得到补偿。相信我的话，上帝

一时把你放在邪路上，是为了以后让你能得到**忏悔的荣誉**和**赎罪**所应有的永恒的奖励。”

从这一瞬间起，玛丽便成了**自己有罪这种意识的奴隶**。如果说，以前她在最不幸的环境中还知道在自己身上培养可爱的人类个性，在外表极端屈辱的条件下还能意识到**自己的人的**本质是**自己的真正本质**，那末现在，却是从外面损伤了她的现代社会的污浊在她眼中成了她的内在本质，而因此经常不断地忧郁自责，就成了她的义务，成了上帝亲自为她预定的生活任务，成了她存在的目的本身。如果说以前她还自夸：“我决不哭鼻子”，并且说“做过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那末在现在，对于她，折磨自己就成了**美德**，而忏悔则成了**荣誉**。

后来发现，玛丽花原来是鲁道夫的女儿。我们再看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是盖罗尔施坦郡主了。我们现在偷听一下她同她父亲的谈话：

“我祈求上帝把我从这些迷茫中解脱出来，让充满在我心中的单只是对上帝的虔诚的爱和神圣的希望，最后，我请求上帝完全掌握着我，因为我想全心全意地皈依于他，但是我的这些祈求都落空了…… 他不听取我的祈祷……不用说，这是因为我**对尘世**的眷恋使我不配同上帝交往。”

一个人既然把自己的迷误看做渎犯上帝的**无限**罪行，那末他就只有**完全**皈依上帝，对尘世和世俗的事情**完全**死心，才能确信自己的**得救**和上帝的**仁慈**。玛丽花既然已经领悟到使她解脱非人的境遇是**神的奇迹**，那末她要配得上这种**奇迹**，她**自己**就必须成为**圣徒**。她的人类的爱必须转化为宗教的爱，对幸福的追求必须转化为对永恒福祐的追求，世俗的满足必须转化为神圣的希望，同人的交往必须转化为同神的交注。上帝应当完全掌握住她。她自

己给我们揭穿了为什么上帝不肯把她完全掌握住的秘密。她还没有全心全意地皈依上帝，她的心还困惑于尘世的事情。这是她那健全的天性的最后一次闪光。她终于完全皈依上帝了，因为她完全脱离了尘世，入了**修道院**。

“人若有罪愆，
深重不可赎，
送进修道院，
朝以继暮，
旷日无间，
悔悟乐无穷。”

（歌德）[78]

在修道院中，由于鲁道夫的险谋诡计，玛丽花得到了**女修道院**长的圣职。起初她认为自己不够格，拒绝接受这个职位。旧任女修道院长遂加以劝说：

“我再多两句嘴，我亲爱的女儿，你在进教会以前的生活是十分纯洁可嘉的，但如果说它也充满了迷惘的话，那末，自从你到我们这里以后所表现的福音德行的榜样，在主的眼中已经补救和赎偿了任何罪孽深重的既往。”

我们从女修道院长的话中可以看出，玛丽花的世俗德行已经变成了福音德行，或者更正确地说，她的实际德行必须采取福音的、漫画的形式。

玛丽回答女修道院长的话说：

“圣姑，我认为现在可以同意接受这个职位了。”

修道院的生活不适合于玛丽的个性，结果她死了。基督教的信仰只能在想像中给她慰借，或者说，她的基督教的慰借正是她的现实生活和现实本质的消灭，即她的死。

鲁道夫就这样先把玛丽花变为悔悟的罪女，再把她由悔悟的罪女变为修女，最后把她由修女变为死尸。在埋葬她的时候致悼词的，除了天主教的神甫以外，还有**批判的**神甫施里加。

施里加把她的**“无辜的”**存在称为她的**“短暂的”**存在，并把这种存在同“永恒而难忘的罪愆”相对照。他赞颂她，说她的**“最后一口气”**是“祈求仁慈和宽恕”。新教牧师在先叙说一遍主的恩赐的必然、死者对一般原罪的分担和自认有罪这种意识很强以后，接着就一定要转而对死者的德行来一番**世俗的**赞扬；同样，施里加先生也使用了一套这样的词句：

“而她**本人**还是没有什么需要宽恕的。”

最后，他在玛丽的墓上放了一束教会辞令的最枯萎干瘪的花朵：

“她怀着人所罕有的内心纯洁而与世长辞了。”

阿门！

(3) 揭露法纪的秘密

(a) “校长”，或新的刑罚理论。单人牢房制的被揭露了的秘密。医学的秘密

“校长”是个海格立斯型的、精力充沛的罪犯。按他的教育程度来说，他是个有教养有学识的人。他这个性如烈火的大力士同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律和习惯是相冲突的，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一般标准是平庸无能、温文娇弱和暗中交易。他成了一个杀人犯，像一个秉性强悍而无从找到适当的合乎人性的活动的人那样放荡

不羁、荒淫无度。

鲁道夫捉住了这个罪犯。他想批判地改造他，想用他给**法律**界创造一个范例。他同法律界的争端不是“**刑罚**”本身，而是刑罚的**种类和方式**。用黑人医生大卫的特殊的话来说，鲁道夫发明了这种刑罚理论，他就有资格成为一个“**最伟大的德国刑法学家**”，并且从此以后这种理论甚至有幸获得一个具有德国式的严肃和德国式的彻底的德国刑法学家的拥护。鲁道夫甚至没有想到他可以超出刑法学家**之上**；他的野心是想成为一个 primus intor pates〔庸中佼佼〕的“**最伟大的刑法学家**”。他命令黑人医生大卫**弄瞎了**“校长”的**眼睛**。

起初，鲁道夫重复着反对死刑的种种老生常谈，说什么死刑对罪犯没有任何效用，对人民也没有任何效用，因为人民把杀人只当做一种聊以消遣的把戏来观赏。

此外，鲁道夫又把“校长”和“校长”的**灵魂**加以区别。他所关心的不是拯救**实际的**“校长”这个人，而是**从精神上拯救**他的**灵魂**。

> 他教训说：“拯救灵魂是神圣的事业……　救世主说过，每一件罪行都能够**赎补**，但只有诚心想忏悔和**赎罪**的人才能如此。从法庭到断头台的过渡是太短促了……　·你（“校长”）①曾经滥用自己的**力气**来为非作歹，现在我要叫你**使不出**你的力气……　你将要在最软弱的人面前发抖……对你的惩罚将和你的罪行相等……但这种可怕的惩罚至少还会给你留下**悔改**的无限境界……　我只使你离开外界，目的是要你沉没在漆黑如夜的昏暗中，**单独地**回想自己的恶行……　你将不得不反躬自省……　被你贬得一钱不值的意识将会觉醒并把你引向悔悟。”

鲁道夫认为**灵魂**是**神圣的**，而人的**肉体**则是**非神圣的**，所以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他只把灵魂看做真正的本质，因为——按照施里加先生对人类的批判描述——灵魂是属于天国的；既然如此，所以“校长”的肉体和他的力气就不是属于人类的了，这种力气的生命表现就不应加以合乎人性的改造，不应归还给人类，不应把这种力气当做本质上是人类的东西来处理。“校长”曾经滥用自己的力气，现在鲁道夫则麻痹、摧残、消灭这种力气。要摆脱人类的某种本质力量的变态表现，除了消灭这种本质力量，就没有更**批判的**手段了。这也就是基督教的手段：眼睛作恶就挖掉眼睛，手作恶就砍掉手，总之，肉体作恶就杀害肉体，因为眼睛、手、肉体对于人本来都只是多余的、罪恶的附属品。要治愈人性的疾病，就必须消灭人性。群众的法学在这方面同“批判的”法学不谋而合，也认为**摧残**、麻痹人的力量是对这些力量的有害表现的解毒剂。

在普通的刑法学中使纯批判的伟人鲁道夫感到惶惑不安的，只是从法庭转到断头台的过程太快了。与此相反，他是想把对罪犯的**复仇**同罪犯的**赎罪**及**其对自身罪恶的认识**结合起来，把肉体的惩罚同精神的惩罚、感官的痛苦同忏悔的非感官的痛苦结合起来。世俗的惩罚同时必须是基督教道德教育的手段。

这种把**法学**和**神学**结合在一起的刑罚理论，这种“秘密本身的被揭露了的秘密”，不过是**天主教**教会的刑罚理论而已，这一点**边沁**在他的著作“惩罚和奖赏的理论”中已经详尽地表明了。在这部著作中，边沁还证明了现今的各种刑罚在道德上是毫无效验的。他把法律所规定的种种刑罚称之为“**法庭打油诗**”。

鲁道夫给“校长”的惩罚也就是**奥力**金自己给自己的那种惩罚。鲁道夫**阉割**了“校长”，夺去了他的一个**生殖器官**——眼睛。“眼睛是身体的明灯”。鲁道夫正是采取了**弄瞎眼睛**的手段，这使

他的宗教本能增光不少。这就是过去在纯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所通用的刑罚，这种刑罚在基督教德意志国家英吉利和法兰西的强盛的青年时代也曾经盛极一时。为了要人改邪归正，就使他脱离感性的外部世界，强制他沉没于自己的抽象的内心世界——弄瞎眼睛，这是从基督教的教义中所得出的必然结论；因为根据基督教的教义，充分地实现这种分离，使人完全和世界隔绝并集中精力于自己的唯灵论的“我”，这就是**真正的德行**。如果说鲁道夫没有像在拜占庭和法兰克王国那样把“校长”安置在真正的修道院中，那末他至少也把他禁锢在观念的修道院中了，这是不为外界的光亮所扰的漆黑如夜的修道院，是寂静无为的良心和自认有罪这种意识的修道院，在这种修道院中栖身的只是一些虚幻的回忆的影子。

一种思辨的羞愧之心不允许施里加先生公开承认他的主人公鲁道夫的刑罚理论，即世俗的惩罚同基督教的忏悔和赎罪相结合的理论。他不是这样公开地承认，而是偷偷地塞给鲁道夫——当然也是当做被初次揭露于世的秘密——一种理论，即惩罚应当使罪犯成为制裁他“**本身**”罪行的“**法官**”。

这种被揭露了的秘密本身的秘密是**黑格尔的**刑罚理论。黑格尔认为刑罚是罪犯自己给自己宣布的判决。**甘斯**更详细地发挥了这种理论。黑格尔的这种理论是对古代jus tulionis〔**报复刑**〕[1]的**思辨的掩饰，康德**曾把这种刑罚发展为**法律上唯一**的刑罚理论。黑格尔所谓的罪犯自我定罪只不过是一种“**理念**”，只不过是对**通行的经验刑罚**的一种思辨解释。因此，他还是听凭国家在每一个发展

[1] 按以牙还牙的原则处刑的法律。——编者注

阶段上选择刑罚的形式，也就是说，他听凭刑罚保持它的现状。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比起他的批判的应声虫来更是一个批判家。那种承认即犯也是人的**刑罚**理论，只能在**抽象**中、在想像中做到这一点，这正是因为**刑罚**、**强制**是和**人类的**行为方式相矛盾的。况且，真正实行这种理论会是不可能的。抽象的法律会被纯主观的武断所代替，因为在每一个案件中如何使刑罚符合罪犯的个性，都得由那批“道貌岸然的”官方人士来决定。柏拉图已经懂得**法律**一定是片面的，一定是**不考**虑个性的。相反地，在**合乎人性的**关系中，刑罚将**真正**只是犯了过失的人自己给自己宣布的判决。谁也想不到要去说服他，使他相信别人加在他身上的**外部强力**就是他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强力。相反地，他将看到**别人**是使他免受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刑罚的自然的救星，就是说，关系将恰好颠倒过来。

鲁道夫说出了他那讳莫如深的想法，也就是揭穿了弄瞎眼睛的目的，他对“校长”说：

“你的每一句话都将是祈祷。”

他想教会他**祈祷**。他想把这个海格立斯型的强盗变成一个全部工作只是祈祷的修道士。跟这种基督教的残忍相比较，那种想消灭某人就干脆杀某人的头的普通刑罚理论，显得是多么的人道。最后，很显然，每当真正的群众的立法严肃地提出了感化罪犯的任务的时候，它所采取的行动比这个德国的赫仑·挨·力斯怯得[①]的行为要合理和人道得多。跟弄瞎“校长”的眼睛这回事比起来，四个荷兰农业移民区和亚尔萨斯的奥斯特瓦尔德罪犯移民区才是真正合乎人性的尝试。就跟鲁道夫毁了玛丽花和“刺客”一

① “天方夜谭”中的人物，为一理想化的回教国王。——译者注

样，他也毁了“校长”：他让玛丽花去受教士的折磨，受自己有罪这种意识的折磨；他剥夺了“刺客”的人的独立性并把他贬低到看家狗的卑下地位；他为了使“校长”学会“**祈祷**”，便挖了他的双眼；他就这样把三个人都毁了。

受了“**纯批判**”的“**简单**”改造以后的各种现实就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这种种现实乃是对现实的歪曲和脱离现实的**毫无意义的抽象**。

在施里加先生看来，弄瞎了“校长”的眼睛以后，立即就完成了一个**道德的奇迹**：

“令人生畏的‘校长’”——施里加告诉我们说——“**突然**承认了诚实和正直的力量；他向‘刺客’说：**是的，我相信你，你是从来没有偷过东西的。**”

不幸得很，在欧仁·苏的书中还保留着“校长”对“刺客”的评价，其中正好也承认了这一点，但这决不会是瞎了眼睛的结果，因为这是在瞎眼睛**之前**说的。“校长”曾私下对鲁道夫谈论过“刺客”，他说：

“不过，他是不会出卖朋友的。不会的，他是一个好人……过去他总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这样一来，施里加先生的道德的奇迹就化为乌有了。现在我们来看看鲁道夫的**批判的**治疗所得到的**真正**结果。

首先，我们看到“校长”同“猫头鹰”①一起旅行到布克伐尔农场去，想在那里恶毒地愚弄玛丽花一番。支配着他的当然是向鲁道夫**报仇**的念头，而他也只能形而上学地向鲁道夫报仇，也就是故意跟鲁道夫作对，偏要挖空心思去做“**坏事**”。“他夺去了我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

的视力，但是没有使我丢掉作恶的念头。”“校长”告诉“猫头鹰”，为什么他叫人把她找来：

“我感到很**无聊**，我在这些诚实的人当中完全是孤独的。”

如果说，欧仁·苏由于他对人的**自暴自弃**有僧侣般的、兽性的偏爱，以至于让“校长”跪在老泼妇“猫头鹰”和小恶棍“瘸子”[①]的跟前，哀求他们不要离弃他，那末，这个大道学家是忘记了，这样就会使“猫头鹰”感到恶魔式的自满。鲁道夫本来想要罪犯相信**肉体暴力**是微不足道的，可是他**用暴力弄瞎了**罪犯的**眼睛**，结果向罪犯证明了**肉体暴力**的强大；同样，欧仁·苏也在这里教“校长”恰如其分地承认了**完满的情欲**的有力。他教他懂得，没有这种完满的情欲，人就**不再是男子**，而变成了孩子们肆意嘲笑的对象。他使他相信，世界应该承受他的罪恶，因为他一失掉视力，就受到了这个世界的折磨。欧仁·苏现在剥夺了“校长”的最后一点人的幻想，因为“校长”曾经相信“猫头鹰”对他是忠诚的。他有一次对鲁道夫说：“她可以为我赴汤蹈火。”然而，欧仁·苏为了充分地满足自己的欲望，竟使“校长”在极度绝望之余，脱口喊出了：

“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哟!”

他学会“**祈祷**”啦！于是欧仁·苏先生就在“这种对上帝仁慈的**无意的**祈求中”看到了“某种天意”。

这种**无意的祈祷**是鲁道夫的批判的第一个结果。接踵而来的是在布克伐尔农场上的**非自愿的忏悔**，在那里，“校长”梦见了被他杀害的人的幽灵。

---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

我们暂且放过对这个梦的极其详细的描述，转过来看看“红手”的地窖中的情景，在那里我们会看到被批判地改造过的“校长”，他戴着镣铐，被老鼠咬得遍体鳞伤，饿得半死不活，被“猫头鹰”和“瘸子”折磨得疯疯癫癫，像一头野兽那样嗥叫着。“瘸子”把“猫头鹰”交到他手里。我们且看看“校长”在动手弄死“猫头鹰”时的情形。他不仅在表面上**模仿**主人公**鲁道夫**的样子，挖出了“猫头鹰”的**双眼**，而且也**在精神上**学习鲁道夫的榜样，重复他那伪善的言辞，用假仁假义的词句来掩饰自己的残暴行为。当“猫头鹰”刚刚落入“校长”的掌握中的时候，“校长”表现出“令人恐怖的高兴”，他的声音由于狂怒而发抖。

他说：“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不想马上就结束你的性命……　我要以牙还牙，你折磨了我，我现在也要折磨你……　在杀死你以前，我要跟你长谈一次……　这对于你是可怕的。首先，你看到没有……自从我在布克伐尔农场做了那个梦以来，我有了很惊人的改变……在那个梦里，我们过去的一切罪行都显现在我的眼前，那个梦几乎使我发疯……它将来会使我发疯的……我对自己以往的残暴感到可怕……　我没有容许你虐待夜莺[一]，不过这还是小事……　你把我诱骗到这个地窖里，让我在这里挨饿受冻……　你把我一个人留下，使我产生一些可怕的念头……　呵，你不知道孤独是什么滋味……　孤独洗净了我的灵魂。我不认为这是可能的……　我也许没有以前那样坏了，证据就是，在这里抓住你，……抓住你这个恶魔，我感到无限的快乐……我抓住你不是为了给自己报仇，而是……而是为我们的受害者报仇……　是的，我要履行自己的职责，亲手惩罚自己的谋犯……　现在我对自己以往的行凶杀人感到恐怖，虽然这样，但我还是要毫无恐惧、完全泰然自若地用非常残酷的手段狠狠地把你弄死，对这一点你不会感到奇怪吗？……　你说……你说……你懂得这点吗？”

在这不多的几句话中，“校长”匆匆地弹出了**道德诡辩**的全部

[一] 即玛丽花。——编者注

音阶。

他开头的几句话是复仇心的**公开**表露。他宣称要以牙还牙。他想杀死“猫头鹰”，他想用冗长的说教来延长她死前的痛苦，而他用来折磨她的那一套话（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诡辩！）完全是**道德的说教**。他硬说在布克伐尔的那一场梦感化了他。同时他又给我们揭穿了这个梦的真正的作用，他承认这个梦几乎使他发疯，而且将来也还是会使他发疯的。为了证明自己的改邪归正，他举出了这个事实：他曾经阻止人们虐待玛丽花。欧仁·苏书中的人物（先是“刺客”，在这里是“校长”），必须把他这个作家本人的意图（这种意图决定作家使这些人物这样行动，而不是那样行动）充作**他们自己**思考的结果，充作他们行动的自觉动机。他们必须经常不断地说：我改正了这一点、那一点，以及那一点，等等。因为他们不是过着真正有内容的生活，所以他们就只得在自己的言谈中竭力强调一些微不足道的行为（在这里，保护玛丽花即是一例）的意义。

“校长”既然告诉了我们在布克伐尔的那场梦有着教人**行善积德**的作用，那末他就还应该向我们说明，为什么欧仁·苏把他关在地窖里。他应该表明小说作者的做法是合理的。他应该对“猫头鹰”说，你把我关在地窖里，让老鼠来咬我，害我饱受饥渴之苦，这种种做法促使我完全改邪归正了。孤独**洗净了**我的灵魂。

“校长”对“猫头鹰”发作出来的那种野兽般的嗥叫、那种肝胆欲裂的狂怒、那种极其可怕的复仇心，是对这种道德辞令的辛辣的嘲弄。这种种表现给我们揭穿了“校长”在牢房中所产生的那些念头的性质。

“校长”自己似乎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但是既作为一个**批判的道学家**，他就能够调和这些矛盾。

他正是把由于“猫头鹰”落入自己掌握中而引起的“无限的快乐”宣布为自己改邪归正的标志。他的复仇心不是**自然的**复仇心，而是**道德的**复仇心。他不是想为自己报仇，而是想为他和“猫头鹰”的共同的**受害者**报仇。他杀死“猫头鹰”并不算**杀人**，而是履行**职责**。他不是向她**报仇**，而是以一个公正的法官的身分来**惩罚**自己的同谋犯。他对自己以往的行凶杀人感到恐怖，虽然如此（他自己都对自己的诡辩感到惊奇），但他却问“猫头鹰”：对这一点你不会感到奇怪吗？——我要毫无恐惧、完全泰然自若地杀死你！同时，由于某种未表明的道德原因，他竟然沉醉于他想去干的杀人勾当——“狠狠地弄死”，“用非常残酷的手段弄死”——的情景中了。

“校长”杀害“猫头鹰”这件事完全符合他的性格，特别是在她对他表现得这样残酷以后更是如此。但是，他的杀人之出于道德的动机，他对自己因即将“狠狠地把人弄死”、用“非常残酷的手段”杀人而惨无人性地感到快乐这一层给予道德的解释，他正好是以犯下新的杀人罪行来证明自己对以往的杀人行凶的忏悔，他从一个普通的杀人犯变成一个**暧昧的、有道德的杀人犯**；凡此种种都是鲁道夫的批判的治疗所获得的辉煌成果。

“猫头鹰”想从“校长”的手中挣脱出来。“校长”觉察到了这一点并牢牢地抓住她。

“你还是站着别动的好，‘猫头鹰’！我必须彻底向你说明我是怎样逐渐达到悔悟的……　这种解说你听起来是会不愉快的……它会向你证明，我在为我们的受害者向你报仇的时候必须残忍才行……　我必须赶快讲完……当我想到我把你抓在手中的时候，我就快乐得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我要强迫你听我讲话，这样我就有足够的时间来使你感到死亡临近的恐怖……　我的眼睛瞎了……但我的思想却变成了具体有形的，所以我能够在想像中不断鲜明地、几乎可以感触到地描绘出……我的受害者的轮廓。观念

几乎像物质一样铭刻在我的头脑中。如果在忏悔之余再加上严酷得可怕的赎罪……这赎罪把我们的生活变为漫长的不眠之夜，其中充满了复仇的幻觉和绝望的思念……那末，在受到良心的苛责并终于悔悟以后，也许会得到人们的宽恕。”

“校长”继续滔滔不绝地大谈其虚伪的空话，这种空谈每时每刻都显露出它的伪善。“猫头鹰”必须听他讲他怎样一步一步地达到悔悟。这种解说对于她会是很不愉快的，因为它会证明，“校长”的**职责**就是不为他自己而为他们大家的受害者来无情地向她报仇雪恨。“校长”突然中断了他的训话。如他自己所说，他必须“赶快”结束他的训话，因为他想到他把她抓在手中的时候，就快乐得全身的血液完全沸腾起来，这是缩短训话的道德上的理由。然后他又使自己的血液平静下来。原来他对她说教的这一段长时间，对于他的报仇并不算是损失，因为这段时间“使她感到死亡临近的恐怖”。又是一个继续说教的道德上的理由！正是因为这些道德上的理由，所以“校长”能够泰然自若地又接着他刚才中断片刻的地方继续说起教来。

“校长”正确地描述了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人的情形。一个人，如果对于他**感性世界**变成了**赤裸裸的观念**，那末他就会反过来把赤裸裸的观念变为**感性的实物**。他想像中的幻影成了有形的实体。在他的心灵中形成了一种可以触摸到、可以感觉到的幻影的世界。这就是一切虔诚的梦幻的秘密，也就是疯癫的共同的表现形式。“校长”老是重复着鲁道夫的口头禅，说什么“痛苦异常的忏悔和赎罪是强有力的”云云；他这样反复叨念，所以已经像个半疯半癫的人了；他的这种现身说法，鲜明地证明了，在基督教的自认有罪这种意识和神经错乱之间有真正的联系。同样，“校长”既把

生活之变成充满幻影的**梦夜**看做忏悔和赎罪的真正结果，那末他就给我们揭穿了纯批判和基督教感化的真正的秘密。这种秘密也就正在于人变成幻影，人的生活变成一连串的**梦境**。

欧仁·苏在这里感到，这瞎眼强盗对“猫头鹰”的举动会败坏鲁道夫所启示给他的**拯救灵魂的思想**。所以他就在“校长”的口中塞进了下面这句话：

“这些思想的有益的影响就在于平息了我的狂怒。”

可是，“校长”供认了他的**道德愤懑**不外是**世俗的狂怒**而已。

“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力量……决心来杀死你……不，我不能叫你流血……这会是……**杀人**（他说出了事物的真正的名称）①……也许是情有可原的杀人……但这终究是杀人。”

“猫头鹰”利用适当的时机用匕首刺伤了“校长”。现在欧仁·苏可以让“校长”动手杀死“猫头鹰”，而不再继续道德的诡辩了。

“他痛得大叫起来……　这突如其来的袭击，立刻把他的复仇心、他的暴怒、他那嗜杀成性的本能全都激发起来，像一团烈火那样熊熊地燃烧起来，这一切突然以非常骇人的力量爆发出来。他那先前已被震动的神智现在完全混乱了……　呵，你这条蛇！……　我尝到了你的牙齿的滋味……　你会像我一样的**没有眼睛**……”

他挖掉了她的双眼。

“校长”的天性通过鲁道夫的治疗只是被伪善和诡辩装饰起来，只是被禁欲般地压制下去；现在，当这种天性汹涌澎湃地冲出藩篱，造成**爆发**的时候，这种爆发就显得更有害更可怕。欧仁·苏承认，“校长”的理性已经被鲁道夫所策划的一切事件狠狠地

---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震动了；承认这一点倒是值得感谢的。

“他的理性的最后一点闪光在这惊心动魄的嗥叫中、在这该死的家伙的嗥叫中消失了（他看见了被他杀害的人们的幽灵）①……‘校长’像一头**被激怒了的野兽**那样怒吼着和咆哮着…… 他把‘猫头鹰’活活地折磨死了。”

施里加先生喃喃地叨念着：

“‘校长’不能有‘**刺客**’那样**快的**（!）②和**幸运的**（!）③**转变**（!）④。”

正如鲁道夫使玛丽花成了修道院的住户一样，他也使“校长”成了**毕塞特**神经病院的住户。鲁道夫不仅麻痹了他的肉体力量，而且也麻痹了他的**精神**力量。而这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校长”不仅用他的肉体力量作过孽，而且也用他的精神力量作过孽，而按照鲁道夫的刑罚理论，凡是**有罪的力量**都应当消灭。

但是现在，在欧仁·苏先生那里还没有彻底完成“和恐怖的复仇相结合的赎罪和忏悔”。于是“校长”又恢复了理智，但是由于害怕落入法网，他**假装**疯癫，继续留在毕塞特。欧仁·苏先生忘记了，“他的每一句话都应当是**祈祷**”，然而到最后，他的言辞成了疯人的含糊不清的怒号和呓语。或许是欧仁·苏先生有意讥讽地把这种生命表现跟祈祷混为**一**谈了吧？

在鲁道夫把“校长”的眼睛弄瞎——这也就是把人同外界隔绝，强制他陷于深沉的灵魂孤独之中，把法律的惩罚同神学的折磨结合起来——这种做法中所运用的刑罚观念，最突出地体现在**单人牢房制**之中。因此欧仁·苏先生也就歌颂起单人牢房制来了：

“过了好几百年人们才了解，制止某种威胁社会机体的流行极快的麻疯病（也就是监狱中的道德败坏）⑤，**只有一种**手段，这就是隔离罪犯。”

---

①⑤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②③④ 括弧里的惊叹号是马克思加的。——译者注

欧仁・苏先生赞同那些可尊敬的人们的看法，他们认为犯罪的流行是由于监狱的设立。为了把罪犯救出邪恶的社会，他们竟把罪犯单独一个人留在社会之中。

欧仁・苏先生声称：

“在所有那些理直气壮、不屈不挠地力求**充分**和**绝对地**实施单人牢房制的人们的呼声中，如果我这微弱的呼声也能被人听到，那我就认为自己很幸运了。”

欧仁・苏先生的愿望只实现了**一部分**。在众议院本届会议讨论单人牢房制的问题时，甚至拥护这种制度的官方人士都不得不承认，这种制度迟早会使囚犯发疯的。因此十年以上的徒刑都一律改为流放。

如果托克维尔先生和波蒙先生认真地研读了欧仁・苏的小说，那末他们就毫无疑问地会使单人牢房制得到充分和绝对的实施。

如果说欧仁・苏为了使神智正常的罪犯成为疯人而把他们逐出任何社会之外，那末，为了使疯人恢复理智，他就让他们回到人类社会中来：

“经验表明，孤独对监狱中的罪犯有多少益处，它对疯人就有多少害处。”

如果说，欧仁・苏先生和他那批判的主人公鲁道夫无论是通过**天主教的刑罚理论**还是通过**监理会教派的单人牢房制**，都未能使**法纪**贫乏到只有一个秘密，那末，他们却以许多新的秘密丰富了医学；而归根到底，**发现新**秘密和**揭露旧**秘密都同样是劳苦功高的。对于“校长”的失明，批判的批判说出了和欧仁・苏先生完全一致的意见：

“当人们告诉他说他已经双目失明的时候，他甚至还不相信。”

“校长”不能相信自己的失明，因为他的确还看得见东西。欧仁·苏先生描绘了一种新的白内障，他告诉人们许多对于群众的、非批判的**眼科学**的确是秘密的东西。

瞳孔在动手术以后蒙上了一层**白的**颜色。显然，这是**水晶体白内障**。到现在为止，这种白内障可能的确是由损伤晶体囊所引起的，同时这几乎毫无痛苦，虽然也不是完全没有痛苦。但是，既然医生只是用**自然的**方式，而不是用**批判的**方式获得这种结果，那末，就只有先加以损伤，然后等它发炎并形成纤维素性渗出物，从而使水晶体模糊不清。

在第三卷第三章中，“校长”身上出现了更大的**奇迹**和更大的**秘密**。

盲人又**复明**了：

“‘猫头鹰’、‘校长’和‘瘸子’**看见了**牧师和玛丽花。”

如果我们不想学“复类福音作者批判”的榜样，把这种现象解释为**作家捏造的奇迹**，那末我们就应该假定“校长”又去给自己的白内障动了手术。后来他又成了瞎子。他过早地张开了自己的眼睛，于是光线的刺激引起了发炎，结果损害了**眼网膜**，使他得了无法医治的**盲症**。在这里，这整个过程一共只占了**一**秒钟，这对于非批判的眼科学是一个新的**秘密**。

(b) 奖赏和惩罚。双重裁判（附表）

主人公鲁道夫给我们揭示了一种用**赏善罚恶**的方法来维护社会的新理论。从非批判的观点来看，这种理论无非是现代社会的理论而已。在现代社会中，赏善罚恶的事情难道还少吗？和这种被揭露了的秘密相比，群众的共产主义者**欧文**是多么的非批判呵！

他看出赏罚制度是社会等级差别的神圣化，是奴隶般的屈辱状况的完整表现。

欧仁·苏把颁发奖赏的权柄交给司法部门——刑事裁判的特别补充，并且因不满足于**单一的**裁判而发明一种**双重的**裁判，这可以算是一种新的揭露。可惜的是，这种被揭露了的秘密不过是重复**边沁**在他的上述一书中详尽阐明过的旧学说而已。不过，欧仁·苏先生以较之边沁更批判得无可比拟的方式论证和发展了自己的建议，对于他的这一层荣誉是决不能抹杀的。当这位群众的英国人还完全停留在罪恶的尘世中的时候，欧仁·苏先生的演绎却超升到了批判的天国。欧仁·苏先生的议论如下：

“为了使恶人生畏，人们把他们所预知的天怒物质化了。为什么不把上天对善人的奖赏也同样物质化并使人预先在尘世知道这种奖赏呢？”

按照**非批判的**见解，情形恰恰相反：正如人们在上天奖赏的观念中只是把人间的雇佣仆役理想化了一样，人们在天上的刑罚理论中也只是把尘世的刑罚理论理想化罢了。如果不是一切善人都受到社会的奖赏，那末这也是应该如此，因为这样才能使天上的正义显得比人间的正义到底高出一筹。

欧仁·苏先生在描述批判的奖赏裁判时，给我们提供了“**妇女的**（埃德加尔先生以充分的“认识的宁静”斥责弗洛拉·特莉斯坦的）①**教条主义**的例子，这种教条主义希望有一套公式，并且用**现存事物**的范畴来制定公式”。欧仁·苏先生按照他所完全支持的现行**刑事裁判**的每一个条款，依样画葫芦地详细描绘了他所附加的**奖赏裁判**的摹本。为了使读者能一目了然起见，我们且把他所描写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的原本和摹本放在一起，列为一个对照表。

批判地完成的裁判表

现行的裁判	**批判地补充的裁判**
名称：**刑事**裁判	**名称：善行**裁判
征象：**手中持剑**，旨在斩断恶人之头。	**征象**：手中持冠，旨在给善人加冕。
目的：惩罚恶人，监禁、凌辱、处死。人民当知为恶受罚之可畏。	**目的**：奖赏善人，奖金、尊崇、保障生命之安全。人民当知为善载誉之可歌。
发现恶人的手段：警察密探、特务，以便侦缉恶人。	**发现善人的手段**：道德密探、特务，以便查访善人。
某人是否属于恶人的决定：Les assises du crime，审理罪行的陪审法庭。官府纪录并宣布被告的罪行，给被告以公开的报复。	**某人是否属于善人的决定**：Assises de la vertu，审理善行的陪审法庭。官府纪录并宣布被告的善行，给被告以公开的表彰。
罪犯在判决后的情形：他处于高级警察的监视之下。养活于监狱中，国家担负其费用。	**行善者在判决后的情形**：他处于最高的道德仁爱的监督之下。养活于自己家中，国家担负其费用。
执行判决：罪犯上**断头台**。	执行判决：在处决罪犯的断头台正对面建立一座大善人高踞其上的高台——**善行台**。

欧仁·苏先生为自己想像中的图景所深深激动，于是不禁感叹起来：

“咳，这是乌托邦！不过请想一想，一个社会像这样**组织起来**该多好呵！”

可是，这就是**社会的批判的组织**。欧仁·苏责难说，这种组织，至今仍然不过是乌托邦，然而我们倒不得不来替这种组织辩护一下。欧仁·苏又完全忘记了他自己提及的那些每年在巴黎颁发的“**德行奖**”。这些奖赏甚至是以双重的形式设置的，有奖励男人和女人的高尚行为的物质奖赏，即 Prix Montyon〔**蒙提昂奖金**〕，也有奖励品德完美的处女的 Prix rosière㊀〔罗节奖〕。这里甚至也并不缺乏欧仁·苏所要求的蔷薇**花冠**。

至于谈到道德密探以及最高的道德仁爱的监督，那末凡此种种都是耶稣会派所早已设立过的。此外，“辩论日报”[79]、“世纪报”[80]、“巴黎小广告”[81]等报纸每天都在不惜巨金地纪录和宣扬巴黎的各种证券投机商人的德行、伟绩和功德，更不用说每个政党都各有自己的机关报来纪录和宣扬本党成员的政治上的业绩了。

老福斯就已经指出，荷马比他的众神更好。因此我们可以要“一切秘密本身的被揭露了的秘密”——鲁道夫来对欧仁·苏的观念负责。

除此而外，**施里加**先生还告诉我们：

“此外，在欧仁·苏的小说中常常有一些离开故事的主要脉络的插笔，即各种补叙和插话，而这一切都是一种批判。”

(c) 消除文明中的野蛮和国家中的无法纪

消除犯罪行为及文明中的野蛮的法律**预防手段**，就是“国家对处死的犯人的子弟和判处无期徒刑的犯人加以管制”。欧仁·苏想用比较自由主义的方法来分配犯罪行为。今后，任何一个家庭

㊀ rosière〔罗节〕是一个贞洁的姑娘，曾因品德高尚被奖以蔷薇花冠。——编者注

都不应该再拥有犯罪的世袭特权，罪行的自由竞争应该战胜罪行的垄断。

欧仁·苏消除“国家中的无法纪”的方法是：修改法国刑法典中关于“滥用信任”的那一节，其次，特别是任命**一批领取固定薪俸的律师为穷人办事**。可见，欧仁·苏先生认为，在已经设有为穷人办事的律师的皮蒙特、荷兰及其他国家中是消除了无法纪状态的。按照他的意见，法国的立法只有一个缺点，即没有给那些为穷人服务的律师规定固定的薪俸，没有责成他们专为穷人服务，并且过于缩小了法定的贫穷范围。似乎无法纪并不是正好在审判**程序**中开始的，似乎在法国并不是大家都早就知道：**法纪**本身不提供任何东西，而只是认可现存的关系。看来，**法纪**和**事实**的早已成为老生常谈的区别，对于批判的小说家也许还是“巴黎的秘密”呢！

如果人们看了对法律秘密的批判揭露再看看欧仁·苏想在**司法执行官**方面所进行的那些伟大改革，那就可以理解巴黎的“撒但”报[82]了。在这张报纸上，市内某区的一个居民向这位“大改革家兼速写专家”诉苦说，他们的街道上还没有瓦斯灯。欧仁·苏先生回答说，他将在他那部大作“终身流流的人”的第六卷中想办法消除这种不幸。另一个区又埋怨初等教育的缺点。于是他又答应在他的大作“终身流浪的人”的第十卷中为这个区进行初等教育的改革。

(4) “观点”的被揭露了的秘密

“鲁道夫没有停留在他那高超的（!）①**观点**上…… 他不遗余力地用自

① 括弧里的惊叹号是马克思加的。——译者注

由选择的方式上下左右地来领会各种观点。”（**施里加语**）

批判的批判的主要秘密之一，就是“**观点**”和**用观点来评判观点**。在它的眼中，每一个人跟每一种精神产物一样，都变成了观点。

只要你一旦懂得，批判的批判的总秘密就是使陈旧的思辨的胡说死灰复燃，那末要洞悉观点的秘密就再容易不过了。

首先，**让批判**自己通过族长**布鲁诺·鲍威尔**先生的口来谈谈它那“观点”的理论。

> “科学……**从来不跟某个个人或某种特定的观点**打交道……　当然，它也不会忘记**消除某种观点的界限**，只要值得在这上面花费力量和这些界限真正具有全人类的意义；但它把这些界限看做**纯粹的范畴和自我意识的规定性**，因此它只而向那些有勇气上升到**自我意识的普遍性**的人，即那些决不想停留在这些界限以内的人。”（“铁文集”第二卷第127页）

鲍威尔的这种勇气的**秘密**就在于**黑格尔的“现象学”**。黑格尔在“现象学”中用**自我意识**来代替**人**，因此**最粉繁复杂的**人类现实在这里只是**自我意识的特定的**形式，只是**自我意识的规定性**。但自我意识的赤裸裸的规定性是“**纯粹的范畴**”，是赤裸裸的“思想”，因此，这种“思想”我能够在“纯”思维中加以扬弃并且通过纯思维来加以克服。在黑格尔的“现象学”中，人类自我意识的各种异化形式所具有的**物质的**、**感觉的**、**实物的**基础**被置之不理**，而全部破坏性工作的结果就是**最保守的哲学**，因为这样的观点以为：既然它已经把**实物的**、感性现实的**世界**变成“思维的东西”，变成**自我意识**的纯粹**规定性**，而且它现在又能够把那变成了**以太般的东西**的敌人溶解于“**纯思维的以太**”中，所以它就把这个世界征服了。因此，“现象学”最后完全合乎逻辑地用“**绝对知识**”来代替全部人类现实，——之所以用**知识**来代替，是因为知识是自我意识的唯一存在方式，而

自我意识则被看做人的唯一存在方式；之所以用**绝对**知识来代替，是因为自我意识只知道它**自己**，并且不再受任何实物世界的拘束。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起来**，因此，他也就能够在**头脑**中消灭一切界限；可是，对于**坏的感性**来说，对于**现实的**人来说，这当然丝毫不妨碍这些界限仍然继续存在。此外，凡是表明**普遍自我意识的有限性**的一切东西——人及人类世界的任何感性、现实性、个性，在黑格尔看来都必然是界限。全部"现象学"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我意识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实在**。

近来，鲍威尔先生把绝对知识改名为**批判**，而给自我意识的规定性所换的名字则是一个听起来比较简单的术语——**观点**。在"铁文集"中两个名字仍然并用，而观点也仍然是用自我意识的规定性来作注脚的。

既然"**宗教世界本身**"只是作为**自我意识**的世界而存在，所以批判的批判家——ex professo〔职业的〕神学家——就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竟有**意识**和**存在**互相分别的世界存在；想不到，当我只是扬弃了这个世界的想像存在，即它作为范畴或观点的存在的时候，也就是当我改变了我自己的主观意识而并没有用真正实物的方式改变实物的现实，即并没有改变我自己的**实物**现实和别人的实物现实的时候，这个世界居然还像往昔一样继续存在。因此，**存在**和**思维**的思辨的**神秘同一**，在批判那里以**实践**和**理论**的同样神秘的同一的形式重复着。因此，对于那种仍然想有所区别于理论的实践，对于那种仍然想有所区别于把某一特定**范畴**消融于"**自我意识的无限普遍性**"这种做法的理论，批判便油然生出一股怒气。批判

本身的理论仅限于把一切确定的东西(如国家、私有财产等)宣布为自我意识的无限普遍性的对立物,因而也就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其实,反而应该表明,国家、私有财产等怎样把人化为抽象,或者它们怎样成为**抽象的**人的产物,而不成为单个的、具体的人的现实。

最后,不言而喻,如果说黑格尔的"现象学"尽管有其思辨的原罪,但还是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的因素,那末鲍威尔先生及其伙伴却相反,他们只是提供了一幅毫无内容的漫画,这幅漫画只是满足于从某种精神产物中或从现实的关系和运动中撷取一种规定性,把这种规定性变为想像的规定性、变为**范畴**,并把这个范畴充作产物、关系或运动的**观点**。凡此种种做法,都是为了能够以老成达练的姿态、洋洋得意的神气从抽象的、普遍范畴的、普遍自我意识的观点,高高在上地傲然睨视这种规定性。

在鲁道夫看来,所有的人不是持着善的观点,就是持着恶的观点,并且他就按照这两个不变的范畴来评价一切人;同样,在鲍威尔先生及其伙伴看来,一些人从**批判**的观点出发,另一些人则从**群众**的观点出发。但鲁道夫和鲍威尔等人都是把**现实的人**变成了**抽象的观点**。

(5) 揭露利用人的欲望的秘密,或克雷门斯·达尔维尔

在此以前,鲁道夫仅限于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赏善和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罚恶。现在我们可以从一个事例看出,他怎样利用**恋情**来渔利,怎样"使克雷门斯·达尔维尔的优良的天性得到适当的发展"。

施里加先生说道："鲁道夫给她指出了**慈善事业**的**消遣的**一面，这种思想证明了那经历过深刻考验的鲁道夫的智慧所独有的人类知识。"

鲁道夫在同克雷门斯谈话时所使用的那些词句，如"使之**引人入胜**"，"**利用天生的爱好**"，"**施展巧计**"，"利用狡黠和欺诈的癖性"，"把根深蒂固的横暴的本能改造为高尚的品质"，等等，——所有这些词句，就像这里完全是硬加在女性身上的那些欲望本身一样，**泄露了**鲁道夫的智谋的秘密来源——**傅立叶**的学说。在鲁道夫的手中，傅立叶的学说得到了通俗的阐明。

就跟上面看到的对边沁的理论的运用一样，对这个学说的**运用**又成了鲁道夫的批判的财产。

年轻的侯爵夫人应该不是在慈善事业**本身**中去寻求自己人类本质的满足，她应该不是在慈善事业本身中获得活动的人性内容和目的，从而也得到消遣。不，相反地，慈善事业只是一种外在的理由，只是一种**借口**，只是一种供消遣用的**材料**，这种消遣能够同样得心应手地把其他任何一种材料变成自己的内容。贫穷被有意识地用来使慈善家享受"风流韵事的乐趣，让他满足猎奇、冒险和乔装的欲望，使他陶醉于自己的超群出众，使他感到神经的激动，等等"。

这样一来，鲁道夫无意中说出了早已公开的秘密：人的贫穷、使人不得不接受施舍的那种极度窘迫的境遇，都应供金钱贵族和知识贵族**娱乐**，应当作为满足他们的自私欲、供他们摆架子和消遣的对象。

在德国有许多慈善协会，在法国有不少慈善社团，在英国也举办无数唐·吉诃德式的慈善事业，如为赈济穷人举办的音乐会、舞会、义演、义餐，甚至为遭遇不幸的人募捐，——这一切都没有任何

别的意思。由此可见，慈善事业也早就已经当做消遣来举办了。

侯爵夫人一听到《amusant》〔“消遣的”〕这个词，便突然无缘无故地转变过来，这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她的痊愈是否能持久，或者更正确些说，这种转变只在表面上看来是突然的和无缘无故的，只在表面上看来是由鲁道夫把慈善事业描述为消遣而引起的。侯爵夫人**爱上了**鲁道夫，而鲁道夫也打算**跟她**一块乔装变服，跟她私通，跟她一起搞种种慈善性的猎奇活动。后来，侯爵夫人在对圣拉扎监狱作慈善性的参观时，暴露了她对玛丽花的忌妒，并且由于她对自己的这种忌妒心抱着慈善的态度，所以在鲁道夫面前闭口不谈玛丽的被捕。鲁道夫至多只能教会一个不幸的女人跟不幸的人们演笨拙的笑剧而已。鲁道夫所发明的**慈善事业**的秘密被巴黎的一个纨裤公子泄露了。这位纨裤公子在跳舞之后，邀请自己的舞伴去晚餐，他说：

“呵！夫人。为救济这些穷波兰人，只跳几次舞还不能算尽到心了呀……做善人就做到底吧！……现在我们去**吃一顿为这些穷人义卖的晚餐吧！**”

（6）揭露妇女解放的秘密，或路易莎・莫莱尔

在**路易莎・莫莱尔**被捕时，鲁道夫趁机发表了一通议论，这些议论可以概括如下：

“主人经常用恫吓、平白无故的殴打或**主奴关系**的本性所产生的其他情况来虐待女仆。他陷女仆于不幸，使她遭受羞辱并迫使她去犯罪。**法律不触动**这些关系…… 实际上迫使少女去杀害婴儿的罪犯却并不受到**惩罚**。”

鲁道夫的议论甚至不能扩展到对**主奴关系**本身加以圣明的批判。他虽然是个**小**统治者，但却是这种关系的**大**卫道者。鲁道夫

还未能了解妇女在现代社会中的一般状况的非人性。他完全忠实于他以前的理论，所以，只感到缺少一条**惩办**诱奸者并把忏悔和赎罪跟严厉的惩治结合起来的法律。

鲁道夫要能够去仔细考察一下其他国家的现行立法就好了。**英国的**立法正实现着他的一切愿望。它由于过分周到（**布莱克斯顿**对这一点称颂不止），竟对诱奸娼妓的人也加以**背信弃义**的罪名。

施里加先生奏起了**欢迎曲**：

“**鲁道夫**（!）①**就是这样**（!）②**想的**（!）③。现在把这些**思想**和你关于**妇女解放**的**幻想**比较一下吧。在这些思想中你**几乎**可以用手触摸到解放事业，而你一开始就过于讲求实际，所以你经常因你的努力落空而遭到失败。”

无论如何，我们得感谢施里加先生揭露了一个秘密：某种事业在思想中几乎可以用手触摸得到。至于他非常可笑地把鲁道夫跟那些宣扬妇女解放的人相比这件事，那末让读者来比较一下鲁道夫的**思想**和**傅立叶**的下述（就算是）“幻想”：

“通奸、诱奸给诱奸者带来光荣，并被当做风流韵事……　但可怜的姑娘呵！杀害婴儿，这是怎样的罪行呵！如果她重视自己的名誉，她就必须消灭丑行的痕迹，而如果她因为这个世界的偏见而牺牲自己的婴儿，那末她就会受到更大的羞辱并成为法律偏见的牺牲品……　这就是一切文明的机械论所描绘的**恶性循环**。”

“年轻的姑娘对于任何一个想把她变为自己独占财产的买主来说，难道不是一种商品吗？……　正像在文法中两个否定构成一个肯定一样，在**婚姻交易中**也是**两个卖淫构成一桩德行**。”

“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

---

①　②③　括弧里的惊叹号是马克思加的。——译者注

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

“侮辱女性既是文明的本质特征，也是野蛮的本质特征，区别只在于：野蛮以简单的形式所犯下的罪恶，文明都赋之以复杂的、暧昧的、两面性的、伪善的存在形式…… 对于使妇女陷于奴隶状态这件事，男人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应该受到惩罚。”（**傅立叶**）[83]

把傅立叶关于**婚姻**问题的精辟的评述以及法国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派别的著作拿来同鲁道夫的论断对比，完全是多余的。

小说家从社会主义文献中所挑选出来的这些忧伤的片断，揭露了批判的批判仍然茫无所知的“秘密”。

(7) 揭露政治经济的秘密

(a) 从理论上揭露政治经济的秘密

第一点揭露：富有常常使人挥霍无度，挥霍无度则使人破产。

第二点揭露：刚才所指出的富有的后果是由于富家子弟缺乏教养的缘故。

第三点揭露：**继承权**和**私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也**必须**是这样。

第四点揭露：富豪**在道德上**有责任向工人说明他使用自己财产的理由。大宗财产就是托付给英明、坚定、敏捷而宽厚的人的继承钱财、**封建采邑**；同时也委托这种人卓有成效地处理这宗财产，把它用来影响一切有**幸**受这大宗财产的辉煌的济世灵光所庇祐的事物，使其富有成效、日益兴盛、日臻完善。

第五点揭露：国家应该以**个人节俭的基本原理**来教导阅历不深的富家子弟。国家应该使富有道德化。

第六点揭露：最后，国家应该研究解决**劳动组织**这个重大的问题。它应该提供**资本和劳动联合**的有效例证，并且要是这样的联合：它井井有条、公平合理，它既保证**工人**的福利，又**不**损害**富人的财产**，它用互相倾慕、互相感激的**纽带把**这**两个阶级联系在一起**，从而**永远**保证国家的安宁。

因为国家暂时还没有采用这种理论，所以**鲁道夫**就亲自提供几个实际的范例。这些范例暴露了这样的秘密：最为人所熟悉的**经济关系**对于欧仁·苏先生、鲁道夫先生和批判的批判却还是"秘密"。

(b) "贫民银行"

鲁道夫创立了**贫民银行**。这个**批判的**贫民银行的章程如下：

银行的主旨是对规矩的有家室的工人在失业期间予以救济。它应该代替施舍和当铺。它每年有 12000 法郎的收入，发放 20 到 40 法郎一份的无息救济贷款。在开始的时候，它只在住着大部分工人的巴黎**第七**区展开活动。要求救济的男工或女工必须持有自己的最后一家雇主的证明书，上面确认他（或她）的行为规矩并载明他（或她）被解雇的原因和日期。这笔贷款于债务人重新找到工作的时候开始归还，每月偿还全部贷款的六分之一或十二分之一，听债务人的自便。偿还贷款的保障是具有誓言的借约。此外，还需要另外有两个工人来担保贷款受主的誓言。因为贫民银行的批判的目的是减轻工人生活中的一个最不幸的灾难——**工作中断**，所以根本只有失业者才能受到救济。主管这个机构的热尔门先生所得的年薪是 10000 法郎。

现在我们用群众的眼光来看看批判的政治经济的实践。银行

每年的收入共计 12000 法郎。一个人发给贷款 20 至 40 法郎，因此平均每人 30 法郎。第七区的“贫苦”工人的数目，据官方的承认，至少是 4000 人。这样，每年能救济 400 个工人，即第七区的最贫苦的工人的十分之一。就算失业的**平均时间**是四个月即十六个星期——对于巴黎，这个数字是太小了。要是把 30 法郎分十六个星期去用，那末每个星期的所得就不到 37 个苏零 3 生丁，也就是一天的所得少于 27 个生丁。在法国，**一个囚犯**每天的开支平均是 47 个多生丁，其中仅饮食一项就要用去 30 多个生丁。而且鲁道夫所救济的工人是有家室的。就算除夫妇二人外，一家平均只有两个小孩，那末 27 个生丁就必须分配给四个人用。房租每天至少是 15 个生丁，于是，剩下的就只有 12 个生丁了。**一个**囚犯所吃的**面包**，平均起来大约要花 14 个生丁。可见，工人和他的家庭从批判的银行所得的全部现金，如果撇开其他一切需要不计，只够买不及他本人需要量的四分之一的面包，所以工人就只得饿死，否则他就得采取这家贫民银行所图谋防止的那些手段，即典当、乞讨、偷窃和卖淫。

可是，无情批判的伟人对于银行的经理却是照顾得挺周到的。每年经管的收入总共是 12000 法郎，而经理的年薪却是 10000 法郎。因此，管理费占总金额的 45%，也就是说，比巴黎其他群众的贫民办事机构的管理费几乎多两倍，因为这类机构的管理费用大约只占全部开支的 17%。

就姑且承认贫民银行所给予的救济是真正的救济而不只是虚幻的救济，可是这个由一切秘密本身的被揭露了的秘密所发明的机构，仍然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幻想上：只要改变一下劳动报酬的**分配**办法，就可以使工人生活一整年。

用散文的形式来表达，那就是：750 万个法国工人每人的收入只有 91 个法郎，其他 750 万个法国工人每人的收入只有 120 法郎。可见，已经有 1500 万个工人的收入比维持生活的绝对必需费用为少。

批判的贫民银行的用意，按照合理的解释，就在于从工人在业期间的工资中扣除他在失业期间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费用。是我在他失业期间先给他一笔钱，以便他在开始工作时再还给我呢，还是他在工作期间先给我一笔钱，我在他失业期间再把钱还给他呢，这反正都一样。无论是这样还是那样，都总是他在有工作时把他在失业时从我这里得到的东西交给我。

这样看来，“纯粹的”**贫民银行**所不同于群众的**储蓄银行**的，只是两种非常奇异、非常批判的特点：第一是银行贷款给 à fonds perdus〔**无望的债务人**〕，荒唐地断定：当工人想归还贷款的时候就一定能归还，而当工人能归还的时候就总是想归还的；其次是银行一点也不给工人的存款支付**利息**。只是因为存款在这里是采取预支的形式，所以银行认为它本身不向工人索取利息就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

可见，批判的贫民银行不同于群众的储蓄银行的，就是工人失掉利息，银行失掉资本。

(c) 布克伐尔的模范农场

鲁道夫在**布克伐尔**建立了一所**模范农场**。这个地点选择得非常恰当，因为这里还保留着封建时代的遗迹——封建城堡。

在这个农场作工的六个男工，每人每年可得工资 150 埃巨或 450 法郎，每个女工每年可得工资 60 埃巨或 180 法郎。此外，他

们还有免费的膳食和免费的住房。布克伐尔工人的日常膳食是一“大”份火腿、一份不很少的羊肉和一块不很小的牛肉，此外还有作为副食的两种凉拌菜、两大块干酪、土豆、苹果酒，等等。六个男工每人的工作量比法国的一般雇农多**一倍**。

法国每年的全部收入，按人数平均分配每人只有 93 法郎，法国直接从事农业的人数等于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所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普遍效法这位德国哈利发①的模范农场，那末不仅在国民财富的分配方面，而且在国民财富的生产方面，都要引起一场革命。

从上述种种可以看出，鲁道夫之所以能够把生产这样大大扩充，只是由于他要每个工人比以往多工作一倍，而使每个工人耗费的食物也比以前多五倍。

既然法国的农民已经异常勤勉，那末多工作**一倍**的工人就应当是**超人的大力士**了；“大”量的肉菜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有理由假定，这六个工人每人每天至少要消费一磅肉。

如果把法国生产的全部肉类加以平均分配，那末每一个人每天所得到的肉就不到四分之一磅。由此可见，鲁道夫的范例在这方面也会引起一场怎样的革命。这样，**单只是**农业居民所消费的肉类就会多于全法国的肉类生产量，所以，这种批判的改革最后就会完全消灭法国的畜牧业。

从布克伐尔农场经理沙特林②老爹的眼目看来，鲁道夫除了给工人高额的工资和丰盛的膳食以外，还把农场总收入的五分之一给了工人，这笔钱正是他的**地租**。本来按平均计算，通常除了

① 为穆罕默德继承人的称号，通常用以称呼伊斯兰教的教皇。——译者注
②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布克伐尔农场的管账。——译者注

一切生产费用和耗费于生产中的资本的利润而外，法国的地主一般还剩下五分之一的总收入，或者换句话说，作为地租的份额等于总收入的五分之一。鲁道夫过分增加了用来酬劳工人的费用（根据夏普塔尔的著作“论法国的国民经济”[84]第一卷第 239 页，一个作雇工的法国农民全年收入的平均数是 120 法郎），因而无可争辩地过分减少了他所耗费的资本所应得的利润；其次，他把自己的全部地租都送给了工人；尽管这样，沙特林老爹仍然告诉我们，由于使用这种方法，殿下增加了自己的收入，从而也鼓舞了其他非批判的地主去经营这样的农场。

布克伐尔的模范农场不过是幻想的空中楼阁而已；它的**潜在基金**不是布克伐尔土地的**天然富源**，而是鲁道夫所拥有的神奇的福尔土纳特[85]的钱袋。

于是批判的批判就此喧嚷起来：

“从**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整个计划**不是乌托邦。**”

只有批判的批判才能在第一眼就看出**福尔土纳特的钱袋**不是乌托邦。批判的第一眼乃是“凶恶的一眼”。

(8) 鲁道夫，“一切秘密本身的被揭露了的秘密”

使鲁道夫能够实现其全部救世事业和神奇治疗的万应灵丹不是他的漂亮话，而是他的**现钱**。道学家们就是这样的——傅立叶说。要模仿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就必须是百万富翁。

道德就是“**行动上的软弱无力**”[86]。它一和恶习斗争，就遭到失败。而鲁道夫甚至还没有提高到至少是建立在**人类尊严**这种意

识之上的独立道德的观点。相反地，他的道德是建立在人类软弱无力这种意识之上的。他是**神学**道德的代表。我们已经详细考察了鲁道夫用衡量世界的**基督教的固执**观念（诸如“慈善事业”、“无比忠顺”、“克己”、“忏悔”、“善与恶”、“赏与罚”、“可怕的惩治”、“隐遁”、“拯救灵魂”，等等）所建立的英雄业绩，也表明了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滑稽戏而已。现在我们只要再分析一下鲁道夫这个“一切秘密本身的被揭露了的秘密”或被揭露了的“纯批判”的秘密的**个人**性格就够了。

还在我们这位批判的海格立斯的少年时代，“善”与“恶”的对立就已经以两个化身——鲁道夫的两位教师**穆尔弗**和**波利多里**——出现在他的面前。前者教他行善，而且本人是“**善人**”。后者教他作恶，而且本人是“**恶人**”。为了使这种构思在平庸方面不逊于其他伦理小说的类似构思，“**善人**”穆尔弗必须被描写为不太“有学问”、“在智能方面”不“特别突出”的人。可是他**诚实、单纯、沉默寡言**，常常以高贵的姿态，用**可耻、下流**之类的字眼来痛斥邪恶的事情，对**卑鄙下贱的行为**感到深恶痛绝。如果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可以说他是诚实地把善和真的旋律变成了各种音调的平均化的东西，也就是变成了**一个音符**。

相反地，**波利多里**却是一个聪明绝顶、学识渊博、教养有素的奇材，但同时也是一个“最没有道德”的人，并且满脑子都是“**最可怕的怀疑论**”，作为年轻的虔诚的法国资产阶级的代表，欧仁·苏对此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对于欧仁·苏和他的主人公的精力和教养，可以根据**怀疑论**使他们感到惊惶失措这一点来加以判断。

施里加先生说：“穆尔弗同时就意味着1月13日的永世难忘的罪过和通过无比爱戴鲁道夫这个人物并为他作自我牺牲来永远赎补这个罪过。”

就跟鲁道夫是全世界的 deus ex machina〔从机器里出来的神〕㊀和耶稣基督一样，穆尔弗也是鲁道夫个人的 deus ex machina〔从机器里出来的神〕和耶稣基督。

“鲁道夫和拯救人类、鲁道夫和实现人类本质的完美，这对于穆尔弗来说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他献身于这个统一的整体不是出于那种愚蠢如狗的奴隶般的忠顺，而是有充分的自觉和自主的。”

可见，穆尔弗是一个文明的、自觉的、自主的奴隶。像公爵的每个奴仆一样，他把自己的主人看做人类的救主。**格劳恩**[①]奉承穆尔弗，称他为**“勇敢无畏的护从”**。鲁道夫自己称他为**仆人的模范**，而他也确实是个**模范的仆人**。欧仁·苏告诉我们，他 tête-à-tête〔私下〕总是严格不苟地称鲁道夫为“殿下”。有旁人在场时，为了保守匿名微行的秘密，他口里虽然叫**“先生”**，但心中还是称“殿下”。

“穆尔弗揭开了秘密的秘幕，但这只是为了鲁道夫。他帮助了摧毁秘密本身的实力的工作。”

关于把穆尔弗跟最简单的人世关系隔绝开来的秘幕之严密，可以从他跟格劳恩公使的一席谈话中得出一个印象。穆尔弗以必不得已的情况下的法定自卫权为由，得出结论说，鲁道夫有权以**秘密刑法官**的身分来弄瞎绑得紧紧的和“赤手空拳的”“校长”。他描述鲁道夫将怎样在法庭面前陈述自己的“高尚”行为，将以怎样华丽的词句来炫耀自己，将怎样吐露自己的伟大心思；这种种描述，说明他够得上做一个刚刚读完席勒的“强盗”的文科中学生。穆尔

㊀　在古代的戏院里，扮演神的演员由特殊的机械装置送出舞台；这句话的转义就是指那种突然出现以挽救危局的人。——编者注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鲁道夫的驻法公使。——译者注

弗让世界来解决的唯一秘密，就是这个问题：他在扮演运煤工人的角色时用什么东西涂在自己脸上，是用煤灰呢，还是用黑颜料。

“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四十九节）“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保罗达罗马人书”第二章第九—十节）

鲁道夫自己把自己当做这种**天使**。他降临人世，以便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奖赏善人，惩罚恶人。善恶的观念在他那虚弱的头脑中铭刻极深，以至于他竟相信真有魔鬼，并且像昔日波恩的扎克教授那样，竟想活捉恶魔。相反地，另一方面他又企图把魔与神的对立以缩图的形式复制出来。他爱“起一些天命的作用”。正像在**现实**中**一切**差别日益汇合为**贫富**之间的差别一样，在**观念**中**一切**贵族的差别也在变成**善恶**之间的对立。这种差别是贵族给自己的偏见所赋予的最后形式。鲁道夫把自己归入善人之列，而恶人之存在，是为了使他能因自身的完美而怡然自得。现在我们再进一步观察这个“善人”。

鲁道夫先生的行善和挥霍就跟“一千零一夜”中巴格达的哈利发一模一样。如果他不像吸血鬼一样吸尽他那小小的德意志公国的膏血，他就不能过这样的生活。根据欧仁·苏先生本人的描写，鲁道夫要是没有一个法国侯爵的庇护因而免于被迫退位，那末他已经属于那些沦为附庸的德国公爵[87]之列了。根据这个事实就可以判断他那个公国的大小。其次，鲁道夫对**他自身的地位**的估价**批判**到何种程度，可以从下述事实看出：他这个小小的德国诸侯，竟认为在巴黎必须半匿名微行，以免引起别人对自己的注意。他有意随身携带一名**宰相**同行，其批判的目的就是要这个宰相为他代表“自主权力的戏剧性的和儿戏的一面”；好像一个小小

的诸侯除了自己和自己的镜子以外，还需要第三个什么自主权力的戏剧性的和儿戏的一面的代表似的。鲁道夫也影响了自己的从人们，使他们同样**批判地不了解**自己的作用和意义。例如，仆从**穆尔弗**和公使**格劳恩**就没有发觉，巴黎代办**巴第诺**①先生怎样嘲弄他们，假装把他们的私人委托看做国家大事，并且讥讽地信口开河，大谈其

“在各种非常不同的利益和**国家的命运**之间可能存在的玄妙关系”。“是的”——鲁道夫的公使报告说——“有时他竟厚颜无耻地对我说：‘在管理国家的事业中有多少为人民所不知道的错综复杂的纠葛呵！没有人会说，男爵先生，我呈交给您的报告书对于**欧洲事务**的进程有影响，可是事实的确如此。’”

公使和穆尔弗认为厚颜无耻的事不是有人期望他们去影响欧洲事务，而是巴第诺把自己的卑贱职业理想化到这种程度。

我们先来回忆一下**鲁道夫**的家庭生活中的一个场面。鲁道夫告诉穆尔弗说，他“现在突然间感到很骄傲和快乐”。可是马上他又发起脾气来了，因为穆尔弗不想回答他一个问题。他对穆尔弗喊道：“我命令你说话！”穆尔弗请求他不要命令。鲁道夫对他说：“我不喜欢沉默无言。”他不能自制，竟然有失身分地说起粗话来。他提醒穆尔弗说，对于他的一切效劳他都是**有报酬**的。一直到穆尔弗提醒他1月13日那件事以后，他才平静下来。在这场风波以后，穆尔弗的奴才本性又显露了出来，他只是在一刹那间才让自己忘其所以的。他揪自己的“头发”，不过幸好他没有头发；他感到心灰意懒，因为他曾一度对自己那位显贵的老爷表现得有些粗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

野，而这位老爷是把他称为“仆人的模范”，称为“我的善良、老成、忠实的穆尔弗”的。

鲁道夫并未因他自己有这些邪恶的表现而感到惶惑不安，他随后又重复他那固执的“善”“恶”观念，并且宣扬他在行善中所做出的成绩。他把施舍和怜悯称为他那受到创伤的心灵的纯洁而虔诚的慰借。对于被唾弃的卑贱的众生滥加施舍和怜悯，据说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离经叛道的**亵渎圣物的**行为。道理很清楚，怜悯和施舍是**他的**心灵的慰借，因此玷污它们就是亵渎圣物。这就等于“引起人们对上帝的怀疑；而凡有所施，均应感化人们信仰上帝”。对被唾弃者加以施舍，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呵！

鲁道夫认为自己的心灵的每一个运动都具有无限的重要性。因此，他经常对它们进行观察和评价。例如，在上面提到的那个场面中，狂人对穆尔弗发了一阵脾气，但他却聊以自慰地说，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玛丽花的遭遇使他感到很伤心。“我伤心到流出了眼泪，可是人们还责备我漠不关心、冷酷无情、无动于中！”他这样证明了**自己固有的善良**以后，就对“**邪恶**”、对玛丽的无人知晓的母亲的恶行痛斥了一番，并且尽量装出郑重其事的样子对穆尔弗说：“你知道，我非常重视某种复仇行为，非常珍贵某种痛苦。”同时他还扮出一付恶魔的怪相，吓得这个忠实的奴仆大声惊叫起来：“唉哟，殿下！”这位显贵的老爷很像“**青年英国**”[88]社的活动家，他们也想改革世界，建立丰功伟绩，并且染上了类似的歇斯底里症。

关于鲁道夫进行的种种猎奇和他经历的种种遭遇，我们首先可以在他那**热中于猎奇的天性**中找到缘由。他喜爱“风流韵事、消遣、猎奇、乔装”；他的“好奇心”是“贪得无厌”的；他感到“需要生气蓬勃的、火热的激情”，他“热烈地渴求**强烈的神经激动**”。

他这些天生的癖性，在他那想**起天命的作用**和想按照自己的固执的幻想来改革世界的渴望中获得了支持。

决定他对别人的态度的，不是某种抽象的固执观念，就是一些完全个人的、偶然的动机。

例如，他解救黑人医生大卫及其情妇，不是出于这些人的命运所引起的直接的人类同情心，不是为了解放**他们本身**，而是为了要对奴隶主维里斯起**天命**的作用和惩罚他的**不信上帝**。例如，对他说来，“校长”是他为了**运用**自己早已泡制出来的刑罚理论所欲得之物。另一方面，穆尔弗跟格劳恩公使的一席谈话也使我们有可能更深入地观察那些决定鲁道夫的高尚行为的纯个人动机。

殿下所以关心玛丽花，正如穆尔弗所说，“如果撇开”穷人的命运所引起的怜悯不谈，是因为他的女儿（他因为失去了她而感到十分悲痛）如果还在的话这时也是这么大年龄了。鲁道夫对达尔维尔侯爵夫人的同情，“如果撇开”他那博爱的怪癖不谈，是由于这样一种个人性质的原因：如果没有老达尔维尔侯爵及其和亚历山大皇帝的友谊，鲁道夫的父亲早就被排除于德国君主的行列之外了。

他对若尔日夫人的仁慈和对她儿子热尔门的关心也是由于同一原因。若尔日夫人属于达尔维尔家族。

“可怜的若尔日夫人之不断受到殿下的恩惠，与其说是由于**这种族谊关系**，还不如说是由于她自己的不幸和自己的德行。”

辩护士穆尔弗竭力用“主要是”、“如果撇开不谈”、“还不如说”这样一些词句来掩饰鲁道夫的暧昧的动机。

最后，鲁道夫的整个性格完全表现为一种**“纯粹的”伪善**，正因为这样，所以他竟可以当自己的面和当别人的面，巧妙地把**自己的邪恶的情欲的发泄**描述为**对恶人的情欲的愤怒**。这种手法使

我们想起了批判的批判的类似手法；批判的批判也是把**自身的愚蠢**硬说成**群众的愚蠢**，把自己对世界在它之外的发展所进行的恶毒攻击，硬说成是这个世界对发展所进行的恶毒攻击，最后，把自己的利己主义（它以为自己汲取了、吸收了全部精神）硬说成群众对精神的利己主义式的抵抗。

我们将说明**鲁道夫**的“纯粹的”伪善怎样表现在他对“校长”、对**萨拉·麦克格莱哥尔**伯爵夫人以及对公证人**雅克·弗兰**的行为中。

鲁道夫劝诱“校长”到他的住所去偷盗，以便将他诱入圈套并将他捕获。这时他所考虑的远不是全人类的利益，而是纯个人的利益。“校长”持有**麦克格莱哥尔伯爵夫人的文书夹**，而鲁道夫很想把**这个文书夹**弄到自己手里。关于鲁道夫 tête-à-tête〔私下〕对“校长”的打算，在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明显的描述：

> “鲁道夫感到了难以忍受的忧虑。如果他**放过了这个捕获‘校长’的有利机会**，那末，毫无疑问，这样的机会就决不会再碰到了。而鲁道夫非常想占有的**那一切秘密**，则都会被这个强盗**随身带走**。”

鲁道夫捕获了**“校长”**，也就等于获得了麦克格莱哥尔伯爵夫人的**文书夹**。他**捕获**“校长”是出于个人利益。他**弄瞎**“校长”的**眼睛**也是出于个人的激情。

“刺客”对鲁道夫讲述“校长”同穆尔弗的争斗，并且认为“校长”之所以顽强抵抗是由于他知道什么命运将落到他的头上。这时，鲁道夫回答说：“他不知道。”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神色很忧郁，脸也由于前面谈到的那种近于凶恶的表情而显得变了样”。复仇的念头完全控制了他，他预先尝到了野蛮地惩罚“校长”的那种粗野的乐趣。

于是，当被鲁道夫定为**复仇**工具的黑人医生大卫出现的时候，鲁道夫就高喊：“复仇！……**复仇**！……”鲁道夫是在“**酷烈的盛怒**”之下喊出这几个字的。

他心中充满了酷烈的盛怒。于是他附着医生的耳朵密授他的计谋，当医生因恐怖而战栗的时候，他便马上巧妙地大谈其“纯”理论的动机来掩饰**个人的复仇心**。他说，这只是“**运用**”那早就时常闪现在他的高尚的头脑中的“**观念**”，并且他还没忘记油腔滑调地补充一句：“他将来还是有悔改的无限境界的。”他这是模仿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做法，这类宗教裁判所在把判定有罪的人交给世俗的法庭烧死的同时，总是要来一套虚伪的祈祷，祈求赐予悔过的罪人以仁慈。

自然，当审讯和惩处“校长”的时候，殿下就坐在自己那间异常舒适的私室里，穿一件长长的、黑得异常的袍子，脸色苍白得非常刺目，并且，为了完全和法庭的情景一模一样，他面前还摆着一张长桌，桌上陈列着各种物证。先前当他把弄瞎眼睛的计谋通知“刺客”和医生时所显露出的那种野蛮和复仇的表情，现在当然应该从他脸上消逝得无影无踪。现在他在我们面前必须表现得“沉静、忧愁而审慎”，摆出一付非常可笑的郑重其事的姿态，俨然以世界法官自居。

为了使人们对弄瞎眼睛一事的动机的“纯洁性”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愚钝的**穆尔弗**对格劳恩公使表白了一番：

“严厉惩罚‘校长’的目的**主要是**替我向这个**阴险的杀人犯报仇**。”

当鲁道夫单独跟穆尔弗在一起的时候，他吐露了自己的心思：

“我对恶徒们的憎恨……更加强烈了，我对**萨拉**的厌恶愈来愈增长，当然罗，这是随着我女儿的死所给予我的悲痛的加深而增长的。”

鲁道夫告诉我们,他对恶徒们的憎恨是很强烈的。自然,他的憎恨是批判的、纯粹的、道德的憎恨,是对恶人的憎恨,**因为**他们是邪恶的。因此他把这种憎恨看做他在行善方面的一个进步。

但是马上就暴露出，道德憎恨的这种加深无非是一种**伪善的口实，**他就用这种口实来掩饰他对萨拉的**个人厌恶**的增长。不确定的道德的幻影——对恶人的憎恨的加深，只不过是确定的不道德的事实——对萨拉的厌恶的增长——的掩饰罢了。引起这种厌恶的是一种十分自然、十分个人性质的原因,即他个人的悲痛。这种悲痛也就是他的厌恶的尺度。当然罗!

鲁道夫在跟临终的麦克格莱哥尔伯爵夫人会面时，表现了更加令人憎恶的伪善。

在揭露了玛丽花是鲁道夫和伯爵夫人的女儿这个秘密以后，鲁道夫“做出威胁的、残忍的样子”走近伯爵夫人身边。伯爵夫人祈求他的怜悯。

> 他回答说:“对你没有怜悯,你该死……你这个恶魔,我和我的家族的恶魔!”

这样看来,他是想为“家族”报仇了。接着他告诉伯爵夫人:他为了赎补弑父的罪过,发誓要周游世界,在世界上赏善罚恶。鲁道夫折磨伯爵夫人,他**忿激**如狂,但是在他**自己的**眼中,他只是在执行他在1月13日以后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严究邪恶”。

当他起身走出门的时候，萨拉喊叫起来:“可怜可怜我吧，我快死啦!”

> “‘死就死吧，该死的东西!’曾道夫怒不可遏地说。”

最后这句话——“**怒**不可遏”——给我们揭示了鲁道夫的种

种行为的纯粹的、批判的和道德的动机。正是这种盛怒使他对他那——如施里加先生所说——**已经归天的**父亲挥动过宝剑。作为一个纯粹的批判家，他不同自己身上的这种邪恶作斗争，而是竭力去制服别人身上的邪恶。

最后，鲁道夫自己取消了他的天主教刑罚理论。他想废除死刑，想把惩罚变为忏悔，但这只是在杀人犯杀害别人和不触犯鲁道夫的家属的时候才是如此。只要鲁道夫的亲属中有一个人遭到杀害，他马上便会采用死刑；他需要双重的立法：一种适用于他这个伟人，另一种适用于凡人。

他从萨拉那里知道雅克·弗兰对玛丽花之死负有罪责。他自言自语地说：

> "不，这不够……复仇的火焰在我心中燃烧着！……真是嗜血的欲望！……真是不动声色的深思熟虑的盛怒！……**在我还不知道**这个坏蛋害死的人当中**有一个**是**我的孩子**的时候，我还对自己说，弄死这个人没有好处……生活而没有钱，生活而不能满足他那疯狂的情欲，这将是长久的、加倍的折磨……**但这是我的女儿呀**！……我要**杀死**这个人！"

他冲过去杀害雅克·弗兰，但是他发现雅克·弗兰已处于无需杀害的景况中了。

好一个"善良的"鲁道夫呵！他那狂热的复仇心，他那嗜血的欲望，他那不动声色的深思熟虑的盛怒，他那诡诈地掩饰自己心灵的每一种恶念的伪善，凡此种种，正是他用来作为挖出别人眼睛的罪名的那些**邪恶的**情欲。只是因为幸运、金钱和官衔，这个"**善人**"才得以免受**牢狱之灾**。

为了弥补这位唐·吉诃德在其他各方面的渺小，"**批判的威力**"使他成了"善良的房客"、"善良的邻居"、"善良的朋友"、

“善良的父亲”、“善良的资产者”、“善良的公民”、“善良的君主”；而且，施里加先生的赞歌的这个音阶还在那里回响不已。**这比“人类在其整个历史**上”所获得的**全部成果还要多**。单是这，就足以使**鲁道夫**两次**拯救“世界”**于**“灭亡”**了。

第九章
批判的末日的审判

批判的批判曾两次通过**鲁道夫**拯救世界免于灭亡，但这只是为了现在能够**亲自**宣布**世界的灭亡**。

我们又听见并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希采尔**高踞于苏黎世的上空，并划破空际飞向远方；他手里拿着书卷是展开的，好像是“文学总汇报”第5期；他右脚踏群众，左脚踏沙洛顿堡；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他的每一句话像鸽子一样，卟喳！卟喳！飞上**批判的末日的审判**的感染力和雷鸣般的外貌的境界。

“当**一切**终于汇合起来反对批判的时候（我**确实，确实对你们说过**，㊀这个日子已经不远了），当整个正在崩溃的世界（**命运注定它与圣徒争战**）为了最后的攻击而在它的四周结成集团的时候，**那时**批判的勇敢和作用就会博得最大的承认。我们不必为斗争的结局担忧。一切的结局将会是这样：我们对各个集团分别加以清算（**我们把他们彼此分开，好像牧人把山羊和绵羊分开一样，我们把绵羊赶到右边，把山羊赶到左边**），并给敌对的骑士们拿出有关贫困的全部证据（**这是魔鬼的灵，出去到普天之下，叫大家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争战**），**这样，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将为之一惊。**”[89]

天使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

《Dies irae, dies illa
Solvet saeclum in favilla.

㊀在这段引文里马克思加了一些讽刺性的插语。——编者注

Judex ergo cum sedebit,
Quidquid latet, apparebit,
Nil inultum remanebit.
Quid sum, miser, tunc dicturus?》 ect.[一]

你们可以听到交战时的喧嚣声和士兵的杀喊之声。这一切在开始时都必须经过。因为，接着就会出现冒牌基督和冒牌先知——巴黎的**毕舍**先生和**卢**先生，苏黎世的**弗里德里希·罗默尔**先生和**泰奥多尔·罗默尔**先生，并且他们会说：基督在此！而那时，**鲍威尔**兄弟的标志就会在批判中显现出来，**鲍威尔兄弟的作品**[Bauern-werk][二]的圣语就会灵验：

“犍牛能成双，
田地耕成行。”[90]

——

历史的结语

我们以后知道，灭亡的不是世界，而是批判的“文学报”。

——

[一] “世末之日，主怒可畏，火烧世界，万物成灰。判主开讯，大彰义怒，凡诸隐微，无不显露，无罪不罚，逃避何处。可怜罪人，何言答对？”等等。（引自天主教圣歌“世界末日的审判”）——编者注

[二] 双关语：《Bauernwerk》一字在此既有“鲍威尔兄弟的作品”的意思，又有“乡下人的创作”和“粗糙的作品”的意思。——编者注

弗 · 恩 格 斯

英 国 工 人 阶 级 状 况

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91]

弗 · 恩格斯写于 1844 年 9 月— 1845 年 3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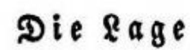
1845 年在莱比锡印行

署名：弗里德里希 · 恩格斯

根据 1845 年德文版
并与 1892 年德文版
核对后刊印

原文是德文

弗·恩格斯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eig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von

Friedrich Engels.

Leipzig,

Druck und Verlag von Otto Wigand.

1845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第一版的扉页

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92]

工人们！

我献给你们一本书。在这本书里，我想把你们的状况、你们的苦难和斗争、你们的希望和要求的真实情况描绘给我的德国同胞们。我曾经在你们当中生活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对你们的状况有足够的了解。我非常认真地研究过你们的状况，研究过我所能弄到的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文件，但是我并不以此为满足。我寻求的并不仅仅是和这个题目有关的**抽象的**知识，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是这样做了。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高兴的是这样一来我在获得实际生活知识的过程中有成效地度过了许多时间，否则这些时间也只是在客厅里的闲谈和讨厌的礼节中消磨掉；骄傲的是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为这个受压迫受诽谤的阶级做一件应该做的事情，这些人尽管有种种缺点并且处于重重不利的地位，但仍然引起每个人的尊敬，也许只有英国的锱铢必较的商人才是例外；还值得骄傲的是这样一来我就能保护英国人民，使他们不致日益受人鄙视。而来自欧洲大陆的这种鄙视，正是你

们国家的当权的资产阶级极端自私自利的政策和全部行为的必然后果。

同时我也有很多的机会来观察你们的敌人——资产阶级，而且很快就确信，你们不希望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任何援助是正确的，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的利益和你们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虽然他们经常在企图证明与此相反的说法，企图使你们相信他们衷心地同情你们的命运。他们所做的驳倒了他们所说的。我希望我收集到的材料用来证明下面这件事是绰绰有余的：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你们的劳动的产品能卖出去的时候就靠你们的劳动发财，而一到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无利可图的时候，就让你们饿死。他们庄严地宣布过对你们的好意，但是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来从实际上加以证明呢？对你们的诉苦他们曾认真地注意过吗？除了负担派来调查你们的状况的五六个委员会的经费，他们还为你们做了些什么呢？而这些委员会的大本大本的报告都永远放在内务部的档案架上的废纸堆里。他们是否打算过从这些日渐腐烂的“蓝皮书”中哪怕编写出一本易读的书，使每一个人都能毫不困难地了解到绝大部分“生而自由的不列颠人”的状况呢？没有，他们当然不这样做；所有这些都是他们不喜欢谈论的事情。他们宁可让一个外国人来把你们所处的屈辱的状况报道给文明世界。

但是我希望，我对**他们**来说才是外国人，而对**你们**来说却不是。我的英语也许不很道地，但是，我希望你们将发现它是**平易近人的**。顺便说一句，无论在英国或是在法国，从来没有一个工人把我当做外国人看待。我极其满意地看到你们已经摆脱了民族偏见和民族优越感。这些极端有害的东西归根到底只是**大规模的**

TO THE WORKING CLASSES

OF

GREAT-BRITAIN.

Working Men!

To you I dedicate a work, in which I have tried to lay before my German Countrymen a faithful picture of your condition, of your sufferings and struggles, of your hopes and prospects. I have lived long enough amidst you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your circumstances; I have devoted to their knowledge my most serious attention, I have studied the various official and non-official documents as far as I was able to get hold of them — I have not been satisfied with this, I wanted more than a mere *abstract* knowledge of my subject, I wanted to see you in your own homes, to observe you in your every-day life, to chat with you on your condition and grievances, to witness your struggles against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power of your oppressors. I have done so: I forsook the company and the dinner-parties, the port-wine and champaign of the middle-classes, and devoted my leisure-hours almost exclusively to the intercourse with plain Working Men; I am both glad and proud of having done so. Glad, because thus I was induced to spend many a happy hour in obtaining a knowledge of the realities of life — many an hour,

弗·恩格斯“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的第一页

利己主义[wholesale selfishness]而已。我看到你们同情每一个为人类的进步而真诚地献出自己力量的人，不管他是不是英国人；我看到你们仰慕一切伟大的美好的事物，不论它是不是在你们祖国的土地上产生的。我确信，你们并不仅仅是普通的**英国人**，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民族的成员；你们是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人**，是一个伟大的大家庭中的成员。正是由于我把你们当做这个“统一而不可分的”人类大家庭中的成员，当做真正符合“人”这个字的含义的人，所以我和大陆上其他许多人一样，祝贺你们在各方面的进步，希望你们很快地获得成功。

继续像以前那样前进吧！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要坚定，要大胆，你们的成功是肯定的，你们前进中的每一步都将有助于我们共同的事业，全人类的事业！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45年3月15日于巴门

（莱茵普鲁士）

序　言

本书中所考察的问题，最初我是打算仅仅作为一本内容比较广泛的关于英国社会史的著作中的一章来论述的，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很快就使我不得不对它进行单独的研究。

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共产主义是它的直接产物，而傅立叶主义和英国社会主义以及德国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则是它的间接产物。所以，为了给社会主义理论，同时给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有权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为了肃清 pro et contra〔赞成和反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切空想和臆造，研究无产阶级的境况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只有在大不列颠，特别是在英国本土，无产阶级的境况才具有完备的**典型的形式**；而且也只有在英国，才能搜集到这样完整的并为官方的调查所证实了的必要材料，这正是对这个问题进行稍微详尽的阐述所必需的。

我有机会在二十一个月内从亲身的观察和亲身的交往中直接研究了英国的无产阶级，研究了他们的要求、他们的痛苦和快乐，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的材料补充了自己的观察。这本书里所叙述的，都是我看到、听到和读到的。我的观点和我所引用的事实都将遭到各方面的攻击和否定，特别是当我的书落到英国人手里的

时候，这一点我是早有准备的。我也知道得很清楚，在这本书里，人们可以给我指出一些无关紧要的不确切的地方。要知道，在研究一个需要全面论证的庞大题目时，这种情况就是英国人也难以避免，更何况像我这样考察**一切**工人的状况的著作，连英国本国也还没有出过一本。但是我要毫不迟疑地向英国资产阶级挑战：让他们根据像我所引用的这样可靠的证据，指出哪怕是一件多少能影响到我的整个观点的不确切的事实吧。

描述不列颠王国无产阶级的境况的典型形式，特别在目前对德国来说是具有极其巨大的意义的。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起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都更加是从理论前提出发的，因为我们，德国的理论家们，对现实世界了解得太少，以致现实的关系还不能直接推动我们去改造这个“丑恶的现实”。在公开拥护这种改造的人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关于无产阶级的真实境况我们知道得这样少，甚至连善意的“劳动阶级状况改进协会”（而我们的资产阶级现在就在这些协会里对社会问题大肆歪曲）都经常把那些关于工人状况的最可笑最庸俗的见解作为根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德国人比任何人都缺乏实际知识。虽然德国无产阶级的境况还没有像英国那样典型，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到底是相同的；而且除非民族的理智及时地采取了为整个社会制度打下新基础的措施，这种社会制度的出现迟早会达到和北海彼岸同样尖锐的地步。在英国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和受压迫的那些根本原因，在德国也同样存在，而且照这样下去也一定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同时，对**英国的**灾难的揭露将推动我们去揭露我们**德国的**灾难，而且还会给我们一个尺度来衡量我们的灾难以及在西里西亚

和波希米亚的骚动[93]中所暴露出来的危险，这种危险从这一方面直接威胁着德国的安宁。

最后，我还要做两点声明。第一，Mittelklasse［**中等阶级**］这个词我经常用来表示英文中的middle-class（或通常所说的middle-classes），它同法文的bourgeoisie（资产阶级）一样是表示有产阶级，即和所谓的贵族有所区别的有产阶级，这个阶级在法国和英国是直接地、而在德国是假借“社会舆论”间接地掌握着国家政权。[一]同样，我也经常把工人（working men）和无产者，把工人阶级、没有财产的阶级和无产阶级当做同义语来使用。第二、我在引用别人的话时，在大多数场合下都指出引文作者所属的党派，因为自由党人几乎总是在竭力强调农业区的贫困，否认工厂区的贫困，而保守党人却刚好相反，他们承认工厂区的贫穷，但不想承认农业区的贫穷。因此，当我描述产业工人的状况而缺少官方文件的时候，我总是宁可利用**自由党人**的证据，以便用自由资产阶级亲口说出来的话来打击自由资产阶级；只有当我亲身观察了真实情况或者引文作者本身或文章的声望使我确信所引用的证据真实无误的时候，我才引用保守党人或宪章派的材料。

弗·恩格斯

1845年3月15日于巴门

[一] 根据恩格斯的这一解释，原作中凡用《Mittelklasse》（“中等阶级”）的地方，在本书中以后均译为“资产阶级”。——编者注

导　言

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 18 世纪后半期，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而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在现在才开始被认识清楚。英国是发生这样一种变革（这种变革愈是无声无息地进行，就愈是强有力）的典型国家，因此，英国也是这种变革的主要结果（无产阶级）发展的典型国家。只有在英国，才能就无产阶级的一切相互关系来全面地研究这个阶级。

我们在这里不谈这个革命的历史，也不谈它对现在和将来的巨大意义。这是将来的一部内容更广的著作的题目。现在，我们只要几点，这几点是弄清以后要讲到的事实和了解英国无产阶级的现状所必需的。

在使用机器以前，纺纱织布都是在工人家里进行的。妻子和女儿纺纱，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把纱织成布；如果他自己不加工，就把纱卖掉。这些织工家庭大部分都住在靠近城市的农村里，靠自己挣的钱也能生活得不错，因为就布匹的需求来说，本地市场还是有决定意义的、甚至几乎是唯一的市场，而竞争（后来由于取得了国外市场和扩大了贸易而替自己开辟了道路）的威力也还没有对工资发生显著的影响。加以本地市场的需求还不断地在扩大，这种扩大和人口的缓慢增长是步调一致的，并且保证了一切

工人都有工作；此外，他们之间还不可能发生激烈的竞争，因为他们散居在农村。所以，大部分织工甚至还能够积蓄一点钱，并且租一小块地在空闲的时候耕种。至于空闲的时间，他们愿意有多少就有多少，因为在什么时候织布和织多少布是随他们便的。的确，他们是蹩脚的庄稼人，他们的耕作是马马虎虎的，也没有很多的收入；但是，至少他们还不是无产者，他们，如英国人所说的，是在故乡的土地上扎下了根的，他们是定居的，在社会上的地位比现在的英国工人要高一等。

工人们就这样过着庸碌而舒适的生活，诚实而安静地、和和气气而又受人尊敬地生活着，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比他们的后代好得多；他们无须乎过度劳动，愿意做多少工作就做多少工作，但是仍然能够挣得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有空到园子里和田地里做些有益于健康的工作，这种工作本身对他们已经是一种休息，此外，他们还有机会参加邻居的娱乐和游戏；而滚木球、打球等等游戏对保持健康和增强体质都是有好处的。他们大部分是些强壮、结实的人，在体格上和邻近的农民很少或者甚至完全没有区别。孩子们生长在农村的新鲜空气中，即使他们有时也帮助父母做些事情，到底还不是经常的，当然更谈不到八小时或十二小时工作日了。

这个阶级的道德水平和智力水平究竟怎样，是不难想像的。他们和城市隔离，从来不进城，因为他们把纱和布交给跑四方的包买商，从他们那里取得工资；他们和城市完全隔离，连紧靠着城市住了一辈子的老年人也从来没有进过城，直到最后机器剥夺了他们的收入，把他们吸引到那里去寻找工作。他们在道德和智力方面和农民一样，由于有一块租来的土地，他们大部分和农民有直接联系。他们把乡绅——当地最大的土地占有者——看做自己“天然的

长上”，向他讨主意，有了小的争吵，就请他当公断人，对他表示这种宗法关系所应有的尊敬。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人，是好的当家人，过着道德的生活，因为他们那里没有那些引人过不道德的生活的邪路——附近没有酒馆和赌场，而他们有时去那里过过瘾的小酒店的掌柜也是值得尊敬的人，这些人大部分是大佃农，有好的啤酒，喜欢严格的生活规律，每天晚上很早就把买卖收了。孩子们成天和父母待在家里，受的教育是服从父母，敬畏上帝。宗法的家庭关系一直保持到孩子们结婚。年轻人是在幽静纯朴的环境中、在和婚前的游伴互相信赖的气氛中长大的，虽然婚前发生性的关系几乎是普通现象，可是这仅仅是在双方都已经把结婚看做道义上的责任时发生的，只要一举行婚礼，就一切都正常了。一句话，当时英国产业工人的生活和思想与现在德国某些地方的工人是一样的，闭关自守，与世隔绝，没有精神活动，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没有激烈的波动。他们当中能读书的很少，能写写东西的就更少了；他们按时上教堂去，不谈政治，不搞阴谋活动，不动脑筋，热中于体育活动，带着从小养成的虔敬的心情听人讲圣经，由于他们为人忠厚温顺，和社会上比较有特权的阶级相处得很和睦。但他们的精神生活是死气沉沉的；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小小的私利、为了自己的织机和小小的园子而活着，对于村子以外席卷了全人类的强大的运动却一无所知。他们在自己的平静、庸碌的生活中感到很舒服，假若没有产业革命，他们是永远不会丢开这种生活方式的。诚然，这种生活很理想，很舒适，但到底不是人应该过的。他们那时也不是人，而只是一架替从前主宰着历史的少数贵族服务的工作机。产业革命只是促使这种情况达到顶点，把工人完全变成了简单的机器，把他们最后剩下的一点独立活动的自由都剥夺了，可是，它却以此迫

使他们思考，迫使他们争取人应有的地位。像法国的政治一样，英国的工业和整个市民社会运动把最后的一些还对人类共同利益漠不关心的阶级卷入了历史的巨流。

使英国工人的状况发生根本变化的第一个发明是**珍妮纺纱机**。这种机器是北郎卡郡布莱克本附近斯坦得希尔的织工**詹姆斯·哈格里沃斯**制造成的（1764 年）。它是后来的骡机的雏形，是用手摇的，可是不像普通的手摇纺车，手摇纺车只有一个锭子，而它有十六个至十八个锭子，只要一个人摇就行，因而能够生产比过去多得多的纱。从前，一个织工需要三个女纺工供给纱，纱还总是不够，织工常常得等着，现在，纱却比现有的织工所能用的多了。新发明的机器使纱的生产费用减少了，布匹的价格也跟着降低，于是，本来就已增长了的对布匹的需求更加增大了。这就需要更多的织工，而他们的工资也就提高了。现在，因为织工在织机旁能赚更多的钱，他们就逐渐抛弃了自己的农业而专门织布了。这时，四个成年人和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用来缠纱）的家庭，一天工作十小时，每星期可赚 4 英镑（合 28 个普鲁士塔勒①），如果事情进行得顺利，又有足够的工作，就常常挣得更多；一个织工在自己的织机上一星期赚两英镑的事，也是常有的。兼营农业的织工阶级就这样逐渐完全消失而变成了一个新兴的织工阶级，他们光靠工资生活，没有丝毫财产，甚至连虚假的财产（例如一小块租来的土地）也没有，这样，他们就变成了**无产者**（working men）。此外，纺工和织工从前的那种关系也完结了。从前，纺纱和织布是尽可能地在一个屋子里进行的。现在，使用珍妮纺纱机像使用织机一样，都需要有气力，

① 德国旧时的银币，1 塔勒合 3 马克。—— 译者注

于是男人也开始做纺纱的工作了，而且这个工作变成了全家生活的唯一来源；可是另外一些家庭却刚刚相反，把过时的、落后的手摇纺车扔在一边，不得不单靠当家人的织机过活（如果他们买不起珍妮纺纱机的话）。后来工业中无止境地发展的分工就是这样从织布和纺纱开始的。

这架最初的很不完善的机器的出现，不仅引起了**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农业无产阶级**的产生。在这以前，有许多小的土地占有者，即所谓自耕农，他们过着平静的、完全不动脑筋的、庸庸碌碌的生活，就像他们中间的兼营农业的织工一样。他们沿用祖传的不完善的老方法耕种一小块土地，他们以那种一切都从习惯而且世世代代都不知道改变的人们所特有的顽强性来反对任何新事物。他们当中也有许多小佃农，可是这不是现代所谓的佃农，而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由于契约上的可以继承的租佃关系或者由于古老的习惯，从父亲和祖父手里继承了小块的土地，一直稳稳当当地坐在上面，就好像这些土地是他们的财产一样。现在，在产业工人放弃了农业以后，许多土地闲起来了，在这些土地的基础上就产生了新的**大佃农**阶级，他们一租就是 50 英亩、100 英亩、200 英亩或者更多的土地，这些人就是所谓的 tenants—at—will（即每年都可以退佃的佃农），他们因为耕作得较好而且经营规模较大，所以能提高土地的收益。他们的产品可以比小自耕农卖得便宜；而小自耕农除了卖掉那块已经不能养活自己的土地去买一部珍妮纺纱机或织机，或者到大佃农那里去做短工即做一个农村无产者以外，就再没有其他任何办法了。小自耕农天生的惰性和无法改进的祖传的粗枝大叶的耕作方法，使得他在和这样一些人竞争时找不到其他出路，这些人用更合理的方法耕种自己的土地，而且具有大

规模经营和投资改良土壤所产生的一切优越性。

可是工业的发展并没有停止在这里。有些资本家开始把珍妮纺纱机安装在大建筑物里面,并且用**水力**来发动;这就使他们有可能减少工人,并且把自己的纱卖得比用手摇机器的个体纺工便宜。由于珍妮纺纱机的构造不断在改进,机器随时都会变成过时的,因此必须把它们加以改造或者换成新的;资本家由于利用水力,即使机器已经过时也还可以维持下去,而对于个体纺工来说,这越往后就越不行了。工厂制度就这样奠定了基础,而由于**水力纺纱机**的出现又获得了进一步的扩展。这种机器是北郎卡郡普累斯顿的一个理发师**理查·阿克莱**在1767年发明的,在德国通常叫做Kettenstuhl(经线织机),它和蒸汽机一样,也是18世纪机械方面最重要的发明。它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是打算用**机械发动**,而且是以全新的原理为根据的。郎卡郡**菲尔伍德**的**赛米尔·克伦普顿**综合了珍妮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的特点,于1785年发明了**骡机**。大约在同一期间,阿克莱又发明了**梳棉**机和**粗纺**机,于是工厂生产方式就成为棉纺业中唯一占统治地位的了。这些机器经过一些不大的改变,逐渐用来纺羊毛,以后(19世纪的头十年)又用来纺麻,这样,就从这两方面排挤了手工劳动。但是事情还没有停止在这里:在18世纪最后几年,一个乡村牧师**卡特赖特**博士发明了**动力织机**,在1804年左右,他把这种机器又改进得足以压倒手工织工;这些机器由于有了**蒸汽机**发动,就加倍重要了,蒸汽机是**詹姆斯·瓦特**在1764年发明的,从1785年起已用来发动纺纱机了。

由于这些发明(这些发明后来年年都有改进),**机器劳动**在英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中**战胜了手工劳动**,而英国工业后来的全部历史所叙述的,只是手工劳动如何把自己的阵地一个跟一个地让

给了机器。结果，一方面是一切纺织品迅速跌价，商业和工业日益繁荣，差不多夺得了一切没有实行保护关税的国外市场，资本和国民财富迅速增长，而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人数更加迅速地增长，工人阶级失去一切财产，失去获得工作的任何信心，道德败坏，政治骚动以及我们将在这里加以研究的对英国有产阶级十分不愉快的一切事实。我们已经看到，甚至仅仅像珍妮纺纱机这样一架很不完善的机器已经使下层阶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因此，从我们这里得到原料而还给我们以布匹的一整套配合得很好、构造得很精密的机器，它所起的作用就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异了。

现在，我们来稍微详细地研究一下英国工业的发展，㊀先从它的主要部门**棉纺织业**开始。在 1771—1775 年输入英国的子棉平均每年不到 500 万磅；1841 年输入 52800 万磅，而 1844 年输入就不下 60000 万磅。1834 年，英国输出 55600 万码棉布，7650 万磅棉纱和价值 120 万英镑的棉针织品。同年，棉纺织业中使用了 800 多万锭子，11 万台动力织机和 25 万台手工织机，水力纺纱机还没有计算在内。根据**麦克库洛赫**的计算，全联合王国直接或间接靠这一工业部门生活的几乎有 150 万人，其中仅仅在工厂里面工作的就有 22 万人；这些工厂所使用的动力，蒸气力是 33000 马力，水力是 11000 马力。现在这些数字已经远远地被超过了；可以大胆地假定，在 1845 年，机器的数量和生产能力，以及工人的数目，都将比

㊀ 根据波特著“国家的进步”一书伦敦版，该书第 1 卷出版于 1836 年，第 2 卷出版于 1838 年，第 3 卷出版于 1843 年（Porter.《Progress of the Nations》.London, 1836—Ⅰ vol., 1838—Ⅱ vol., 1843—Ⅲ vol.）（系根据官方资料写成）；这里还根据其他一些资料，其中大部分也是官方的。——恩格斯原注

这里所描写的产业革命的历史轮廓在某些细节上是不准确的，但是在 1843—1844 年没有更好的资料。——恩格斯在 1892 年德文版上补加的注

1834年增加二分之一。这种工业的中心是郎卡郡，郎卡郡是棉纺织业的摇篮，而棉纺织业又使得郎卡郡完全革命化，把它从一个偏僻的很少开垦的沼泽地变成了热闹的熙熙攘攘的地方；这种工业在八十年内使郎卡郡的人口增加了9倍，并且好像用魔杖一挥，创造了居民共达70万的**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这样的大城市及其附近的城市：**波尔顿**（60000居民）、**罗契得尔**（75000居民）、**奥尔丹**（50000居民）、**普累斯顿**（60000居民）、**埃士顿**和**斯泰里布雷芝**（共40000居民）以及一系列的其他工厂城市。在南郎卡郡的历史上可以看到近代的一些最大的奇迹（虽然这一点从来没有人谈到过），所有这些奇迹都是棉纺织业造成的。此外，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形成了第二棉纺织区（包括**拉纳克郡**和**伦弗鲁郡**）的中心，这个主要城市的人口自兴办这种工业的时候起到现在也从3万增加到30万。**诺定昂**和**得比的织袜业**，由于棉纱价格的降低也获得了新的推动力，而由于针织机的改良（这种改良使人可以在一台机器上同时织两只袜子）又获得了第二个推动力。从1777年发明了网布机那时起，花边的生产也成了重要的工业部门；以后不久**林得里**发明了**花边机**，而后来在1809年**希斯科特**又发明了**络丝机**。这样一来，制造花边的工作无限地简化了，而对花边的需求随着它的跌价而大大增长，以致现在从事于这种生产的已经不下20万人。它的主要中心是**诺定昂**、**莱斯特**和英格兰西部（**威尔特郡**、**戴文郡**等）。和棉纺织业有关的劳动部门，如漂白、染色和印花也得到了同样的发展。由于用氯代替大气中的氧**漂白**，由于对**染色**和**印花**有影响的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由于在机械方面出现了促进印花发展的一连串的极其光辉的发明，这些部门获得了很大的推动力；由于有了这种推动力，又由于棉纺织业的发展引起了需求的增加，这些部门就空

前地繁荣起来。

在**羊毛加工业**中也开始了同样的活动。这种工业过去曾是英国工业的主要部门，可是过去的产量根本不能和现在所生产的相比。在 1782 年，前三年收集的全部羊毛都因为缺少工人而没有加工，假若不是新发明的机器帮助把所有的羊毛都纺出来的话，这些羊毛还得这样搁下去。把那些机器改装得适用于纺羊毛的尝试完全成功了。从这时起，在羊毛加工的区域中开始了我们在棉纺织区中所看到的那样迅速的发展。1738 年，**约克郡西部地区**生产了毛织品 75000 匹，而 1817 年就生产了 490000 匹，并且毛纺织业的发展是以飞快的速度进行的：1834 年输出的毛织品比 1825 年多 450000 匹。—— 1801 年加工的羊毛是 10100 万磅（其中有 700 万磅是输入的），而 1835 年加工的是 18000 万磅（其中有 4200 万磅是输入的）。这种工业的主要中心是约克郡的西部地区，在这里，特别是在**布莱得弗德**，英格兰的长羊毛制成供编织等用的毛线，而在其他城市，例如**里子**、**哈里法克斯**、**哈得兹菲尔德**等地，短羊毛制成合股毛纱，然后再制成呢绒织物；其次，是**郎卡郡**和约克郡接近的那一部分，即**罗契得尔**附近地区，这里除了生产棉纺织品，还生产许多法兰绒；最后，是**英格兰西部**，这里生产最精致的呢子。在这里人口的增加也是值得注意的：

	1801 年	1831 年
布莱得弗德	29000 人	77000 人
哈里法克斯	63000 人	110000 人
哈得兹菲尔德	15000 人	34000 人
里子	53000 人	123000 人
整个约克郡西部地区	564000 人	980000 人

从1831年以来,这些地方的人口至少又增加了20—25%。在1835年,全联合王国从事纺羊毛的工厂是1313个,共有工人71300人,在这个数目中只包括了直接或间接依靠羊毛加工为生的广大群众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几乎完全没有包括织工在内。

麻纺织业中的进步开始得比较晚些,因为原料的天然特性给纺纱机的应用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的确,18世纪最后几年,在苏格兰已经有人做过这种尝试,但是一直到1810年,法国人**日拉**才实际上做到了用机器**纺麻**。而他的机器也只是在英国加以改善,并在**里子**、**丹第**和**拜尔法斯特**普遍应用以后,才在不列颠的土地上得到了它们应有的地位。从这时起,英国的麻纺织业才开始迅速地发展起来。1814年,有3000吨㊀亚麻运入丹第,到1833年就有19000吨亚麻和3400吨大麻了。输入大不列颠的爱尔兰夏布从3200万码(1800年)增加到53000万码(1825年),其中大部分又从大不列颠输出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麻织品的输出从2400万码(1820年)增加到5100万码(1833年)。纺麻工厂的数目在1835年达到了347个,共有工人33000人;其中一半是在苏格兰南部,有六十多个在约克郡西部地区(里子及其附近),二十五个在爱尔兰的拜尔法斯特,而其余的在多尔塞特郡和郎卡郡。麻织品的生产是在苏格兰南部、在英格兰的某些地方,但主要是在爱尔兰。

英国人在**蚕丝加工**方面也获得了同样的成绩。他们从南欧和亚洲取得已经纺好的原料,而主要的工作就是捻成细线。在1824年以前,生丝的高额关税(每磅4先令)大大限制了英国丝纺织业的发展,英国丝纺织业的市场仅仅限于本国及其殖民地(因为那里

㊀ 英国1吨等于2240英镑,约1000公斤。——恩格斯原注

有保护关税)。后来,进口税降低到一个辨士,工厂的数目就立刻大量地增加了。在一年内线锭的数目从 78 万增加到 118 万,虽然 1825 年的商业危机也使这个工业部门的发展停顿了一些时候,但在 1827 年这一部门中所生产的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了,因为英国人在技术方面的技巧和经验保证了他们的捻线机优越于他们的竞争者的拙劣机械。1835 年,大不列颠共有捻丝厂 263 个,工人共计 3 万人,这些工厂大部分集中在**柴郡**(**麦克尔士菲尔德**、**康格尔顿**及其附近地区)、**曼彻斯特**和**索美塞特郡**。此外,还有许多从事于废茧加工的工厂;用废茧制成一种特别的丝(spunsilk〔纺丝〕),英国人甚至用它来供给巴黎和里昂的织绸厂。用这种方法加工的丝主要是在苏格兰(**佩斯里**等地)利伦敦(在**斯比脱菲尔兹**),同时也在**曼彻斯特**和另外一些地方织成绸子。

但是,从 1760 年开始的英国工业的巨大高涨,并不仅仅限于衣料的生产。推动力一旦产生,它就扩展到工业活动的一切部门里去,而许多和前面提到的东西毫无联系的发明,也由于它们正好出现在工业普遍高涨的时候而获得了更大的意义。其次,当工业中机械能的巨大意义在实践上得到证明以后,人们便用一切办法来全面地利用这种能量,使它有利于个别的发明家和厂主;此外,对机器、燃料和原料的需求本身,就直接要求大批的工人和各个工业部门加倍地工作。随着蒸汽机的出现,英国的丰富的**煤藏**第一次成了重要的东西;只是在现在**机器的生产**才开始萌芽,而对**铁矿**的注意也随着加强了,因为**铁矿**是给这种生产提供原料的。羊毛消耗量的增加使英国的饲羊业兴盛起来,而羊毛、亚麻和蚕丝输入的增加又引起了英国商船队的扩大。发展得最快的是**铁的生产**。英国藏铁丰富的矿山过去很少开采;熔解铁矿石的时候总

是用木炭，而由于森林砍伐殆尽和农业发展，木炭的产量愈来愈少，价钱也愈来愈贵。上一世纪才开始使用烧过的煤（焦炭），而在1780年以后又发明了把焦炭所熔解的铁（在此以前，只能从它得到生铁）变成锻铁的新方法。这种把熔铁时掺杂在铁里面的碳素提出的方法，英国人叫做搅炼；它给英国的制铁业开辟了崭新的活动地盘。炼铁炉建造得比过去大50倍，矿石的熔解由于使用热风而简化了，铁的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以致过去用木头或石头制造的大批东西现在都可以用铁制造了。1788年，一个著名的民主派**托马斯·倍恩**在约克郡建成了第一座铁桥，跟着就出现了其他许多铁桥，现在几乎所有的桥，特别是铁路上的桥，都是用生铁造的，而在伦敦甚至用这种材料建造了一座横跨太晤士河的桥（萨得克桥）；铁柱和铁的机座等等成了很常见的东西，而随着瓦斯灯的使用和铁路的修筑，英国的制铁业又获得了新的销售领域。螺丝钉和钉子也逐渐地用机器制造了。设菲尔德人**亨茨曼**在1760年发明了一种铸钢的方法，这种方法节省了许多不必要的劳动，并且使人们能生产出以前完全没有的便宜的物品。由于原料的质量较高，工具经过改进，机器装备比较新，分工比较精密，这时英国的金属制品生产才重要起来。**北明翰**的人口从73000（1801年），增加到200000（1844年），**设菲尔德**的人口从46000（1801年）增加到110000（1844年），仅仅后一城市的煤的消耗量在1836年就达到了515000吨。1805年输出了4300吨铁制品和4600吨生铁，而到1834年就输出了16200吨铁制品和107000吨生铁，铁的全部生产在1740年没有超过17000吨，到1834年就几乎达到了700000吨。光是熔解生铁，每年就要消耗300万吨以上的煤，甚至很难想像，**煤矿**在最近六十年来获得了多么巨大的意义。现

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一切煤藏都正在开采，光是**诺森伯兰**和**德勒穆**的煤矿每年就有 500 万吨以上出口，使用工人四五万。根据“德勒穆纪事报”[94]的报道，上述两个郡开采的煤矿：

在 1753 年是………………14 个，
1800 年是………………40 个，
1836 年是………………76 个，
而在 1843 年是………………130 个。

同时，现在所有煤矿的开采都比过去紧张多了。**锡矿**、**铜矿**和**铅矿**也在同样地加紧开采；和**玻璃生产**发展的同时，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工业部门，即**陶器的生产**，这种生产在 1763 年左右由于**约瑟亚·威季伍德**而获得了特殊的意义。他开始根据科学原则制造陶器，促进了艺术风味的发展，并且在**北斯泰福郡** 8 英里见方的一片地方建立了**陶器厂**(potteries)，这地方从前是一片不毛之地，现在却布满了工厂和住宅，并且养活了 6 万以上的人。

一切都完全卷入了这个总的巨流。**农业**里面也发生了变革。不仅土地的占有和耕种，如我们所看到的，转到了另一些人的手里，而且农业在其他方面也受到了影响。大佃农开始下本钱来改良土壤，拆毁不必要的篱笆，排干积水，施以肥料，使用较好的农具并实行系统的轮作制（cropping by rotation）。科学的进步也帮助了他们：**亨·戴维**爵士把化学应用于农业得到了成功，而技术的发展又给大佃农带来许多好处。此外，由于人口的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也迅速增加起来：尽管从 1760 年到 1834 年有 6840540 英亩荒地变成了耕地，可是英国却由输出粮食的国家变成了输入粮食的国家。

在**交通**建设方面也出现了同样紧张的活动。1818—1829 年，

英格兰和威尔士修筑了1000英里的公路，法定宽度为60英尺，而且几乎所有的旧公路都按照**麦克亚当**制加以改造。在**苏格兰**，公共事业局从1803年起修筑了约900英里公路，并建造了一千多座桥梁，因此，苏格兰山地的居民立刻就接触到了文明。过去大部分山民从事于盗猎和走私；现在他们成了勤劳的庄稼人和手工业者；虽然为了保存盖尔语而开办了专门的学校，可是盖尔—赛尔特的习俗和语言一接触英格兰文明很快就消失了。**爱尔兰**的情形也完全一样。在**科克**、**里美黎克**和**克黎**等郡之间，以前是一片荒地，没有任何车路，这个地方由于很难通行而成了一切罪犯的隐匿处和南爱尔兰地方赛尔特—爱尔兰民族的堡垒；现在这里已经是道路纵横的地方，而这样一来也就给文明开辟了进入这个偏僻地方的道路。整个大不列颠，特别是英格兰，在六十年以前道路还和当时的德国、法国的一样坏，现在却布满了最好的公路网，而所有这些公路，像英格兰的差不多一切东西一样，都是私人企业家一手建立起来的，因为在这些方面国家做的事情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做什么。

1755年以前英国几乎没有**运河**。1755年，郎卡郡开凿了从**桑奇—布鲁克到圣海伦斯**的运河，而在1759年**詹姆斯·布林德利**开凿了第一条大运河，即**布黎纪瓦特公爵**运河，这条运河从**曼彻斯特**及附近的煤矿流到**梅塞**河口，并在**巴顿**附近通过一条导水槽越过**艾尔威尔**河。从这时起英国就开始了运河的建设，布林德利是头一个重视这一建设的人。从那时起，四面八方地开凿了许多运河，许多河流也疏浚得可以通航了。仅仅在**英格兰**就有2200英里运河和1800英里可通航的河流；在**苏格兰**开凿了横贯全境的**凯利多尼亚运河**，在**爱尔兰**也开凿了几条运河。而这些工程，像铁路和公路一样，也几乎全部是私人和私营公司一手建立起来的。

铁路只是在最近才修筑起来的。第一条大铁路是从**利物浦**通到**曼彻斯特**的铁路（1830 年通车）。从那时起，一切大城市彼此都用铁路联系起来了。伦敦和南安普顿、布莱顿、杜弗、科尔彻斯特、剑桥、埃克塞特（经过布利斯托尔）以及北明翰之间有铁路相通；北明翰和格罗斯特、利物浦、郎卡斯特（一线经过牛顿和威根，一线经过曼彻斯特和波尔顿）以及里子（一线经过曼彻斯特、哈里法克斯，一线经过莱斯特、得比及设菲尔德）之间有铁路相通；里子和赫尔以及新堡（经过约克）之间也有铁路相通。此外还有许多正在建设和设计中的支线，因此，不久以后从爱丁堡坐火车到伦敦只要一天的时间便够了。

蒸气不仅在陆路交通工具方面引起了革命，而且使水路交通工具具有了新的面貌。第一艘轮船是 1807 年在北美的哈德逊河下水的，而在大不列颠则是 1811 年在克莱德河下水的。从那时起，英国建造了轮船 600 多艘，而在 1836 年停泊在英国港湾中的轮船总计已在 500 艘以上。

近六十年来英国工业的历史，在人类的编年史中无与伦比的历史，简短地说来就是如此。六十年至八十年前，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城市很小、工业少而不发达、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农业人口。现在它却是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的国家了：有居民达 250 万的首都，有许多巨大的工业城市，有供给全世界产品而且几乎一切东西都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有勤劳而明智的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于工业[一]，完全是由另外的阶级组成的，而且和过去比起来实际上完全是具有另外的习

[一] 1887 年和 1892 年出版的英译本中，在“工业”一词之后还有“和商业”这几个字。—— 编者注

惯和另外的需要的另外一个民族。产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于法国，哲学革命对于德国一样。而且 1760 年的英国和 1844 年的英国之间的差别，至少像 ancien régime〔旧制度〕下的法国和七月革命的法国之间的差别一样大。但这个产业革命的最重要的产物是英国无产阶级。

我们已经看到，机器的使用如何引起了无产阶级的诞生。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人口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增长起来，而且增加的差不多全是工人阶级。此外，爱尔兰只是在 18 世纪初才进入了平静状态，这里的居民过去在发生骚动的时候被英国人残酷地屠杀，减少了十分之一以上，现在也开始迅速地增长起来，特别是从工业繁荣开始吸引了许多爱尔兰人到英格兰去的那个时候起。大不列颠的巨大的工商业城市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些城市中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属于工人阶级，而小资产阶级只是一些小商人和人数很少很少的手工业者。可是新生的工业能够这样成长起来，只是因为它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用工厂代替了作坊，从而把中等阶级中的劳动分子变成工人无产者，把从前的大商人变成了厂主；它排挤了小资产阶级，并把居民间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而在狭义的工业以外，在手工业方面，甚至于在商业方面，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大资本家和没有任何希望上升到更高的阶级地位的工人代替了以前的师傅和帮工；手工业变成了工厂生产，严格地实行了分工，小的师傅由于没有可能和大企业竞争，也被挤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了。但同时，随着从前的手工业生产的被消灭，随着小资产阶级的消失，工人也没有任何可能成为资产者了。从前，他们总有希望自己弄

一个作坊，也许将来还可以雇几个帮工；可是现在，当师傅本人也被厂主排挤的时候，当开办独立的企业必须有大量资本的时候，工人阶级才第一次真正成为居民中的一个稳定的阶级，而在过去，工人的地位往往是走上资产者地位的阶梯。现在，谁要是生而为工人，那末他除了一辈子做工人，就再没有别的前途了。所以，只是在现在无产阶级才能组织自己的独立运动。

这个现在布满了整个大不列颠的广大的工人群众就是这样产生的，他们的社会地位一天天地吸引着文明世界的注意。

工人阶级的状况也就是绝大多数英国人民的状况。这几百万穷困不堪的人，他们昨天挣得的今天就吃光，他们用自己的发明和自己的劳动创造了英国的伟大，他们一天天地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一天天地更加迫切要求取得社会财富中的自己的一份，这些人的命运应该如何，这个问题，从改革法案[95]通过时起已成了全国性的问题。议会中一切稍微重要一点的辩论都可以归结为这个问题，而且，虽然英国的资产阶级到现在还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虽然他们企图对这个大问题保持缄默，并把自己的私利说成真正的民族利益，但是他们是决不会成功的。议会每开一次会，工人阶级的问题都获得更大的重要性，而资产阶级的利益则退居次要的地位，虽然资产阶级是议会中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力量，但是1844年最近的一次会议所讨论的还始终是工人的问题（济贫法案、工厂法案、主仆关系法案）[96]。工人阶级在下院的代表托马斯·邓科布是这次会议的中心人物，而要求废除谷物法的自由资产阶级和提议拒绝纳税的激进资产阶级却充当了很可怜的角色。甚至关于爱尔兰问题的辩论，实质上也只是关于爱尔兰无产阶级状况和帮助他们的办法的辩论。早就是英国资产阶级向工人让步的

时候了，工人们不是在恳求，而是在威胁，在要求；要知道，不久也许就太晚了。

可是英国资产阶级，特别是直接靠工人的贫穷发财的厂主们，却不正视这种贫穷的状况。资产阶级认为自己是最强大的阶级——代表民族的阶级，他们羞于向全世界暴露英国的这个脓疮；他们不愿意承认工人的穷苦状况，因为对这种穷苦状况应负道义上的责任的，正是**他们**，正是有产的工业家阶级。因此，关于工人状况的一切谈论，有教养的英国人（大陆上知道的仅仅是他们，即资产阶级）通常总是报以轻蔑的一笑；因此，整个资产阶级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对有关工人的一切总是一无所知的；因此，他们在议会内外一谈到无产阶级的状况时就说得牛头不对马嘴；因此，虽然土地正从他们脚下逝去并且每天都可能崩溃，而这种很快就会发生的灾祸又像力学和数学的定律所起的作用一样地不可避免，可是他们还是很安然自得；因此，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奇怪的事情：虽然天知道英国人用了多少年来“研究”和“改善”工人的状况，可是他们还没有一本专门阐述这种状况的书。但因此也产生了从格拉斯哥到伦敦的整个工人阶级对富有者的极大的愤怒，这些富有者有系统地剥削他们，然后又冷酷地让命运去任意摆布他们。这种愤怒经过不长的时间（这个时间几乎是可以算出来的）就会爆发为革命，和这个革命比起来，法国第一次革命和1791年简直就是儿戏。

工业无产阶级

研究无产阶级各个部分时所应当遵循的顺序，很自然地决定于上述的无产阶级产生的历史。第一批无产者是出现在工业里面而且是工业的直接产物，因此，我们首先要研究的是**产业工人**，即从事于原料加工的那些人。工业材料即原料和燃料的生产，只是由于产业革命才重要起来，也只是在这个时候，新型的无产阶级，即**煤矿和金属矿的工人**，才能够产生。第三是工业的发展影响了**农业**，第四是工业的发展影响了**爱尔兰**这就决定了我们研究相应的各类无产阶级时所遵循的顺序。我们也会看到各种工人（也许爱尔兰人是例外）的发展水平是直接取决于他们和工业的联系的，所以最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的是产业工人，矿工们已经差一些，而农业工人几乎还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工业无产阶级本身的队伍中也会发现这样的顺序：我们会看到，工厂工人，产业革命的这些初生子，始终是工人运动的核心，而其他工人的参加运动，却要看他们的手工业被产业革命侵害的程度如何而定。这样，以英国为例来观察工人运动和工业发展之间的这种一致的步调，我们就会更好地懂得工业的历史意义。

可是因为目前几乎整个工业无产阶级都已经卷入了运动，而且它的各个部分的状况，正由于他们都从事工业，就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先来考察这些共同点，然后再就各个部分的特

点来更详细地研究这些部分。

——

上面我们已经说明了工业如何把财产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工业需要大量的资本。它用这些资本来建立庞大的企业，从而使从事手工业的小资产阶级破产，它用这些资本来使自然力为自己服务，把个体手工业者从市场上排挤出去。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气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就是从 18 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小工业创造了资产阶级，大工业创造了工人阶级，并把资产阶级队伍中的少数选民拥上宝座，可是，这只是为了后来在某个时候更有把握地推翻他们。目前，无可争辩的和容易解释的事实，是“美好的旧时代”的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已经被工业所消灭，从他们当中一方面分化出富有的资本家；另一方面又分化出贫穷的工人。㊀

但是工业日益集中的趋势并不就止于此。人口也像资本一样地集中起来；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工业中，人——工人，仅仅被看做一种资本，他把自己交给厂主去使用，厂主以工资的名义付给他利息。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他们都有一定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还须有其他的人，于是手工业者、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了。这种村镇里的居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逐渐习惯于工厂工作，逐渐熟悉这种工作；当第一个工厂很自然地已经不能保证

㊀ 参看我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97]。这一著作谈到了“自由竞争”，可是工业只是自由竞争的实践，而自由竞争又只是工业的原则。——恩格斯原注

一切希望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时候，工资就下降，结果就是新的厂主搬到这个地方来。于是村镇就变成尘城市，而小城市又变成大城市。城市愈大，搬到里面来就愈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有运河，有公路；可以挑选的熟练工人愈来愈多；由于建筑业中和机器制造业中的竞争，在这种一切都方便的地方开办新的企业，比起不仅建筑材料和机器要预先从其他地方运来、而且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也要预先从其他地方运来的比较遥远的地方，花费比较少的钱就行了；这里有顾客云集的市场和交易所，这里跟原料市场和成品销售市场有直接的联系。这就决定了大工厂城市惊人迅速地成长。——的确，农村比起城市来也有它的优点，在那里通常可以更廉价地雇到工人。因之，农村和工厂城市就不停地竞争，今天优势是在城市方面，明天农村里的工资降低了又利于在农村中开办新的工厂。但是工业日益集中的趋势仍然全力继续下去，而在农村中建立的每一个新工厂都含有工厂城市的萌芽。假若工业中的这种疯狂的竞赛还能这样继续一百年，那末，英国的每一个工业区都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厂城市，而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也许会在瓦灵顿或牛顿附近的某个地方碰头。人口的这种集中在商业中也沿着同样的道路进行着，因而，如利物浦、布利斯托尔、赫尔和伦敦这样几个大港就几乎垄断了大不列颠的整个海上贸易。

因为这些大城市中的工商业最发达，所以这种发达对无产阶级的后果也在这里表现得最明显。在这里，财产的集中达到极点；在这里，美好的旧时代的习俗和关系已被消灭干净；在这里，时代已经走得这样远，连《Old merry England》〔“美好的老英国”〕这句话也没有人懂得它的意思了，因为关于《Old England》〔“老英国”〕，甚至在老头子们的回忆和故事中也听不到了。在这里，只有

一个富有的阶级和一个贫穷的阶级，因为小资产阶级一天天地消失着。小资产阶级，这个过去曾经是最稳定的阶级，现在变成了最不稳定的阶级；他们是旧时代的少数残余和一些渴望发财的人、十足的冒险家和投机者，其中也许有一个人可以弄到些钱，但九十九个破了产，而这九十九个中一多半都只是靠破产生存的。

但是，这些城市中的绝大多数居民都是无产者，我们现在就来研究一下他们的生活如何，大城市对他们的影响又如何。

大　城　市

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就是逛上几个钟头也看不到它的尽头，而且也遇不到表明快接近开阔的田野的些许征象，——这样的城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他们把伦敦变成了全世界的商业首都，建造了巨大的船坞，并聚集了经常布满太晤士河的成千的船只。从海面向伦敦桥溯流而上时看到的太晤士河的景色，是再动人不过的了。在两边，特别是在乌里治以上的这许多房屋、造船厂，沿着两岸停泊的无数船只，这些船只愈来愈密集，最后只在河当中留下一条狭窄的空间，成百的轮船就在这条狭窄的空间中不断地来来去去，——这一切是这样雄伟，这样壮丽，简直令人陶醉，使人还在踏上英国的土地以前就不能不对英国的伟大感到惊奇㊀。

但是，为这一切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只有在以后才看得清楚。只有在大街上挤了几天，费力地穿过人群，穿过没有尽头的络绎不绝的车辆，只有到过这个世界城市的“贫民窟”，才会开始觉察到，伦敦人为了创造充满他们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不牺牲他们的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才会开始觉察到，潜伏在他们每一个

㊀ 这是差不多五十年前，在美丽如画的帆船时代写的。现在，这样的船如果还出现在伦敦，那就只有停在船坞里面了，而布满太晤士河的已是熏得漆黑的丑陋的轮船。——恩格斯在1892年版上加的注

人身上的几百种力量都没有使用出来，而且是被压制着，为的是让这些力量中的一小部分获得充分的发展，并能够和别人的力量相结合而加倍扩大起来。在这种街头的拥挤中已经包含着某种丑恶的违反人性的东西。难道这些群集在街头的、代表着各个阶级和各个等级的成千上万的人，不都是具有同样的属性和能力、同样渴求幸福的人吗？难道他们不应当通过同样的方法和途径去寻求自己的幸福吗？可是他们彼此从身旁匆匆地走过，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好像他们彼此毫不相干，只在一点上建立了一种默契，就是行人必须在人行道上靠右边走，以免阻碍迎面走过来的人；同时，谁也没有想到要看谁一眼。所有这些人愈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难堪，愈是可恨。虽然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人的这种孤僻、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通的原则，可是，这些特点在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在这里，在这个大城市的纷扰里表现得这样露骨，这样无耻，这样被人们有意识地运用着。人类分散成各个分子，每一个分子都有自己的特殊生活原则，都有自己的特殊目的，这种一盘散沙的世界在这里是发展到顶点了。

这样就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来：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正如好心肠的施蒂纳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做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在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

凡是可以用来形容伦敦的，也可以用来形容曼彻斯特、北明翰和里子，形容所有的大城市。在任何地方，一方面是不近人情的冷

淡和铁石心肠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是无法形容的贫穷；在任何地方，都是社会战争；都是每一个家庭处在被围攻的状态中；在任何地方，都是法律庇护下的互相抢劫，而这一切都做得这样无耻，这样坦然，使人不能不对我们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后果（这些后果在这里表现得多么明显呵！）感到不寒而栗，而且只能对这个如疯似狂的循环中的一切到今天还没有烟消云散表示惊奇。

因为这个社会战争中的武器是资本，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直接或间接的占有，所以很显然，这个战争中的一切不利条件都落在穷人这一方面了。穷人是没有人关心的；他一旦被投入这个陷入的漩涡，就只好尽自己的能力往外挣扎。如果他侥幸找到工作，就是说，如果资产阶级发了慈悲，愿意利用他来发财，那末等待着他的是勉强够维持灵魂不离开躯体的工资；如果他找不到工作，那末他只有去做贼（如果不怕警察的话），或者饿死，而警察所关心的只是他悄悄地死去，不要打扰了资产阶级。在我住在英国的那一个时期，在极端令人愤怒的情景下真正饿死的至少有二三十个人，而很少能碰到一个陪审员有足够的勇气在验尸的时候公开承认这一点。尽管见证人的供词是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可是资产阶级（陪审员都是从他们里面选出来的）总要找出一条后路逃避那个可怕的判断："饥饿致死。"资产阶级在这种场合下**不敢**说出真相，因为这就等于判决他们自己有罪。可是还有更多的人不是直接由于饥饿而是由于它的后果死掉的：经常挨饿引起不可救药的疾病，因而增加了牺牲者的数目；饥饿使身体虚弱，结果在另一种条件下完全可以平平安安地过去的事情，现在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严重的疾病和死亡。英国工人把这叫做社会的谋杀，并且控诉整个社会在不断地犯这种罪。他们难道不对吗？

当然，饿死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仅仅是个别的。但是，有谁能向工人保证明天不轮到他？有谁能保证他经常有工作做？有谁能向他担保，如果明天厂主根据某种理由或者毫无理由地把他解雇，他还可以和他的全家活到另一个厂主同意“给他一片面包”的时候？有谁能使工人相信只要愿意工作就能找到工作，使他相信聪明的资产阶级向他宣传的诚实、勤劳、节俭以及其他一切美德真正会给他带来幸福？谁也不能。工人知道他今天有些什么东西，他也知道明天有没有却由不得他；他知道，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雇主的任何逞性、商业上的任何滞销，都可以重新把他推入那个可怕的漩涡里去，他只是暂时从这个漩涡里面挣扎出来，而在这个漩涡里面是很难而且常常是不可能不沉下去的。他知道，如果他今天还能够生存，那末，他明天是否还有这种可能，就绝对没有把握了。

现在，我们来比较详细地研究一下没有财产的阶级因社会战争而遭遇到的那种状况。让我们看看，社会给工人什么样的住宅、什么样的衣服和食物作为他们工作的报酬，社会让那些对它的生存最有贡献的人如何生活下去。我们从住宅说起。

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阶级的贫民窟。的确，穷人常常是住在紧靠着富人府邸的狭窄的小胡同里。可是通常总给他们划定一块完全孤立的地区，他们必须在比较幸福的阶级所看不到的这个地方尽力挣扎着活下去。英国一切城市中的这些贫民窟大体上都是一样的；这是城市中最糟糕的地区的最糟糕的房屋，最常见的是一排排的两层或一层的砖房，几乎总是排列得乱七八糟，有许多还有住人的地下室。这些房屋每所仅有三四个房间和一个厨房，叫做小宅子，在全英国（除了伦敦的某些地区），这是普通的工人住宅。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

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城市中这些地区的不合理的杂乱无章的建筑形式妨碍了空气的流通，由于很多人住在这一个不大的空间里，所以这些工人区的空气如何，是容易想像的。此外，在天气好的时候街道还用来晒衣服：从一幢房子到另一幢房子，横过街心，拉上绳子，挂满了湿漉漉的破衣服。

现在就从这些贫民窟中挑出几个来研究一下。我们从**伦敦**㊀，从它的著名的“乌鸦窝”（rookery）**圣詹尔士**开始，这个地方现在终于有几条大街穿过，所以是注定要被消灭的。圣詹尔士位于该市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的中心，周围是富丽堂皇的大街，在这些街上闲逛的是伦敦上流社会的人物，这个地方离牛津街和瑞琴特街，离特拉法加方场和斯特伦德都很近。这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三四层的高房子，街道狭窄、弯曲、肮脏，热闹程度不亚于大街，只有一点不同，就是在圣詹尔士可以看到的几乎全是工人。在这里，买卖是在街上做的；一筐筐的蔬菜和水果（所有这些东西不用说都是质量很坏的，而且几乎是不能吃的）把路也堵塞住了，所有这些，像肉店一样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房子从地下室到阁楼都塞满了人，而且里里外外都很脏，看来没有一个人会愿意住在里面。但是这一切同大杂院和小胡同里面的住房比起来还大为逊色。这些大杂院和小胡同只要穿过一些房子之间的过道就能找到，这些地方的肮脏和破旧是难以形容的；这里几乎看不到一扇玻璃完整

㊀ 在这一段已经写成的时候，我在“彩色杂志”（1844年10月）上看到了一篇关于伦敦工人区的文章，这篇文章中许多地方和我的这一段几乎逐字逐句都是一样，而且在本质上是和我这一段通篇完全一致的。这篇文章的标题是：“穷人的住宅。一个医生的笔记”。——恩格斯原注

的窗子，墙快塌了，门框和窗框都损坏了，勉勉强强地支撑着，门是用旧木板钉成的，或者干脆就没有，而在这个小偷很多的区域里，门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因为没有什么可以给小偷去偷。到处是一堆堆的垃圾和煤灰，从门口倒出来的污水就积存在臭水洼里。住在这里的是穷人中最穷的人，是工资最低的工人，掺杂着小偷、骗子和娼妓制度的牺牲者。其中大多数是爱尔兰人或爱尔兰人的后代，甚至那些还没有被卷入他们周围的那个道德堕落的漩涡里面的人，也一天天地堕落，一天天地丧失了力量去抵抗贫穷、肮脏和恶劣的环境所给予他们的足以使德行败坏的影响。

但是，伦敦的贫民窟并不止圣詹尔士一处。在一大片像迷阵一样的街道里隐蔽着成百成千的大大小小的胡同，这些胡同里的房子对于凡有可能稍稍多花一点钱租个比较像人住的地方的人来说，都实在太坏了，这些贫穷到极点的人们的藏身之所是常常可以在富人们的华丽大厦紧邻的地方找到的。例如不久以前，由于检验一个尸体，很体面的人们居住的波特曼方场附近的地方被描写成“一群因肮脏和贫穷而道德堕落的爱尔兰人”的住所。在如同朗—爱克及其他虽然不是贵族式的但也够体面的街上，有许多地下室，这里面常有病弱的小孩和穿得破破烂烂的饥饿的女人爬出来晒太阳。紧靠着伦敦第二个大戏院德留黎棱戏院的是这个城市的一些最坏的街道：**查理街**、**英王街**和**派克街**。这里的房子也是从地下室到阁楼都住满了贫苦的家庭。在韦斯明斯特的**圣约翰**教区和**圣玛格丽特**教区，根据统计学会会刊的材料，在 1840 年，5366 个工人家庭住了 5294 所住宅（如果这还可以叫做“住宅”的话）；男人、女人和小孩，总共 26830 人，不分男女老幼地挤在一起，在这些家庭中有四分之三只有一个房间。在汉诺威方场的贵族教区**圣乔治**，根

据同一材料，有 1465 个工人家庭总共将近 6000 人在同样的条件下居住着；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家庭每一家不超过一个房间。这些不幸的穷人（连小偷也不希望在他们那里找到一点什么）是怎样受着有产阶级的在法律掩护下的剥削呵！上述的德留黎棱戏院附近的这些糟糕透顶的房屋是按照下列标准收房租的：地下室是两个房间每星期 3 先令（1 塔勒），一楼是每个房间 4 先令，二楼是 $4^1/_2$ 先令，三楼是 4 先令，而阁楼每间是 3 先令。这样，仅仅查理街的经常挨饿的住户每年向房主缴纳的贡税就达 2000 英镑（14000 塔勒）之多，而上述的韦斯明斯特的 5366 个家庭一年缴纳的房租则达 40000 英镑（270000 塔勒）。

但是最大的工人区是伦敦塔东边的**怀特柴泊**和**拜特纳— 格林**，伦敦的工人绝大部分都集中在这里。我们听听拜特纳— 格林的圣菲力浦斯教堂的牧师**格·奥尔斯顿**先生是怎样讲自己的教区的吧：

“这里有 1400 幢房子，里面住着 2795 个家庭，共约 12000 人。安插了这么多人口的空间，总共只有不到 400 码（1200 英尺）见方的一片地方，由于这样拥挤，往往是丈夫、妻子、四五个孩子，有时还有祖母和祖父，住在仅有的一间 10—12 英尺见方的屋子里，在这里工作、吃饭、睡觉。我认为在伦敦的主教唤起公众注意这个极端贫穷的教区以前，城市西头的人们知道这个地方并不比知道澳洲和南洋群岛的野人更多一些。只要亲眼看一下这些不幸的人们的苦难，看一看他们吃得多么坏，他们被疾病和失业折磨成什么样子，我们面前就会显现出这样一个无助和贫穷的深渊，仅仅是这个深渊有可能存在，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就应该引以为耻。我在工厂最不景气的三年间在哈得兹菲尔德附近做过牧师，可是，我在那里从来没有遇见过像在拜特纳— 格林看到的这种穷得毫无希望的情形。全区在十个当家人当中，很难找到一个除了工作服外还有其他衣服的人，而且工作服也是破破烂烂的；他们中有许多人，除了这些破烂衣服，晚上就没有什么可以盖的，他们的床铺也只是装着麦秸或刨花的麻袋。”[98]

仅仅从这一段描写里就可以想像出这些住宅一般地是什么样子。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情况，我们再听一听某几个有时候不得不到这些无产阶级住宅去看看的英国官员所说的话吧。

各报在报道萨雷的验尸官卡特先生 1843 年 11 月 14 日检验四十五岁的**安·高尔威**的尸体的情形时曾描写过死者的住所。她和丈夫及十九岁的儿子住在伦敦百蒙得锡街白狮子大院 3 号的一间小屋子里面；里面没有床，没有铺盖，也没有任何家具。死者和她的儿子并排躺在一堆羽毛上（羽毛粘满了死者的差不多赤裸裸的身体），因为他们既没有被子，也没有床单。羽毛牢牢地粘满了整个尸体，不净尸就不能进行检验，在净尸的时候医生发现尸体极其消瘦而且被跳蚤、虱子等咬得遍体鳞伤。屋里的地板被拆掉一块，全家就用这个窟窿做茅坑。

1844 年 1 月 15 日，星期一，两个男孩子被带到伦敦乌尔希浦街警察局的法庭上，罪状是：他们饿得受不住，偷了一家小店里的一只半生不熟的小牛蹄，并且立刻把它吃光了。法官觉得还必须进一步调查，他从警察那里得到了下列的材料：这两个孩子的母亲是一个退伍士兵（后来当了警察）的寡妇，丈夫死后留下了九个孩子，很穷苦。她住在斯比脱菲尔兹地方的奎克街普尔斯—布莱斯 2 号，生活极端贫困。当警察到她那里去的时候，发现她和六个孩子不折不扣地挤在一间不大的杂屋里面，除了两把没有座子的旧藤椅、一张折了两条腿的小桌子、一个缺口的茶杯和一个小小的钵子，就什么家具也没有了。灶里面一点火星也没有，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小堆破布，这堆破布少得用一条女人的围裙包起来就可以拿走，可是这却是全家的床铺。他们盖的是自己的少得可怜的衣服。这个不幸的女人告诉他，去年她被迫卖掉了自己的

床去买食物；她为了得到一些食品，把床单押在食品店里面，总之，她仅仅为了弄到全家吃的面包就把一切都卖光了。——法官从捐来的救济金里面发给这个女人一笔相当大的补助金。

1844 年 2 月有人替一个六十岁的寡妇泰莉莎·比硕普和她的二十六岁的生病的女儿向马尔波罗街警察局的法官申请救济。她们住在格娄弗诺方场布朗街 5 号的一间小小的杂屋里面，这间杂屋的大小和一个柜子差不多，里面没有任何家具。在一个角落里放着一些破布，这两个女人就在上面睡觉；一个木箱又当桌子又当椅子。母亲靠扫地滕一点钱。据房主说，她们从 1843 年 5 月起就变成了这个样子，逐渐把一切都卖光和当光了，同时房租一次也没有付过。——法官从捐来的救济金里面发给她们 1 英镑。

我并不想断定伦敦的**一切**工人都像这三个家庭一样地贫穷。我知道得很清楚，在社会把一个人完全踏在脚底下的地方，会有十个人生活得稍稍好一点。但是我断定，成千的勤劳而诚实的家庭，比伦敦所有一切阔佬都诚实得多、值得尊敬得多的家庭，都过着这种非人的生活，而且每一个无者老都毫无例外地可能遭遇到这种命运，虽然他没有任何罪过，虽然他尽了一切努力来避免这种命运。

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有一个藏身之所的人，比起无家可归的来总算是幸运的。伦敦有 5 万人每天早晨醒来不知道下一夜将在什么地方度过。他们当中最幸运的，能把一两个辨士保存到天黑，就到一个一切大城市里面都很多的所谓夜店（lodging— house）里面去，用这点钱在那里找到一个栖身之所。但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栖身之所呵！房子从地下室到阁楼都摆满了床；每一间屋子有 4 张、5 张、6 张床——能容纳多少就摆多少。每一张床上睡 4 个、5

个、6个人，也是能容纳多少就睡多少——生病的和健康的，年老的和年轻的，男的和女的，喝醉的和清醒的，所有这些人都乱七八糟地躺在一起。然后就开始了各种各样的争论、吵闹、打架，而如果同床铺的人彼此很和睦，那末事情就更糟；他们商量好共同去盗窃或者去干那种不能用我们人类的语言来形容的兽行。而那些没钱住这种夜店的人又怎样呢?哪里可以睡，他们就睡在哪里——在过道里，在拱门下，或者在警察或房主不会去打搅他们的任何角落里。一些人幸而走进私人慈善事业在某些地方办的收容所里面去，另一些人睡在维多利亚女王宿下的公园里面的长凳上。我们看看“泰晤士报”[99]在1843年10月所写的吧：

“从昨天登载的警察局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每夜平均有五十个人左右在公园里面过夜，他们除了树木和堤上的几个洞穴，就没有任何东西来防御坏天气。这大半是年轻的女孩子，她们受了士兵的引诱，被带到首都来，并且被抛弃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去受命运的摆布，去挨饿受穷，她们对年轻人的恶习是毫不在乎的。

“这的确可怕。穷人总是有的。贫穷会在任何地方给自己开辟道路，并且总会以各种丑恶的形式存在于富庶的大城市的心脏里。我们觉得，在这个有数百万人口的首都中，在它的成千的小街和胡同里，总会有许多苦难，许多是很刺眼的，也有许多是永远也不会暴露出来的。

“但是，在集中了财富、欢乐和光彩的、邻近圣詹姆斯王府、紧靠着华丽的贝斯华特宫的地区，在新旧贵族区碰了头而现代精美的建筑艺术消灭了一切穷人的茅屋的地区，在似乎是专门给阔佬们享乐的地方，**在这里**竟存在着贫穷和饥饿、疾病和各种各样的恶习，以及这些东西所产生的一切惨状和一切既摧残身体又摧残灵魂的东西，这确实是骇人听闻的！

“一边是可以增进身体健康的最高尚的享乐，精神活动，无害身心的娱乐，一边却是极端的贫穷！财富，辉煌的客厅，欢乐的笑声，轻率而粗暴的笑声，近旁却是富人不能理解的那种由贫穷造成的苦难！欢乐无意识地但残酷地嘲笑着在底层呻吟的人们的苦难！这里在互相冲突，这里一切矛盾都在斗

争，只除了引诱人的恶习和接受别人引诱的恶习…… 但是让人们记住一点：在世界上最富庶的城市的最华丽的街区，每一年每一个冬天的夜里，都可以发现这样一些年纪很轻但因染上恶习和受过折磨而显得衰老的女人，她们被社会所唾弃，因饥饿、肮脏和疾病而活活地腐烂着。让人们记住这些，并且要学会行动而不是议论。上帝可以做证，这种活动的场所现在是多么广阔！”

我在前面已经谈过供无家可归的人们寄宿的夜店。这些地方是多么拥挤，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表明。在上奥格尔街新开办的能容 300 人过夜的“流浪者收容所”里面，从开始寄宿那天（即 1844 年 1 月 27 日）起到 3 月 17 日止，总共收容了 2740 人，有的住一夜，有的住了几夜；虽然一年中比较舒适的季节已经到来，但是想到那里以及到白十字街和华坪的收容所去投宿的人却大大地增加了，而每天晚上都有许多无家可归的人因为地方不够而被拒绝。在另一个收容所里面，在普雷豪斯广场的中央收容所里面，1844 年的头三个月内平均每夜有 460 人寄宿，总共是 6681 人，分发了面包 96141 份。虽然这样，但根据管理委员会的声明，只有在城市东部也开办了流浪者收容所时，这个收容所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满足投宿者的需要。

现在我们撇开伦敦来一个一个地看看联合王国的其他大城市。先从**都柏林**开始。从海上一进入这个城市就会感到它是那样地柔媚，正如同一进入伦敦就感到它是那样地雄伟一样；都柏林海可算是不列颠诸岛中最美丽的一个海湾，爱尔兰人常常把它比做那不勒斯湾。城市本身也是美丽如画的，那里的贵族区比英国的其他任何城市都更好，更雅致。但同时都柏林的穷人区却可以归人世界上最可怕最丑恶的穷人区之列。诚然，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归咎于爱尔兰人的那种正是在肮脏环境中才觉得舒服的性格。

但是，既然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任何大城市中我们都可以发现成千的爱尔兰人，既然任何穷人都不可避免地要逐渐沉没在这种肮脏的环境中，那末，都柏林的贫穷就不是什么特别的、只有爱尔兰的城市才有的东西，这是世界上一切大城市共同的东西。都柏林的穷人区散布在全城，房屋的肮脏和不适于居住，以及街道的零乱荒芜都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根据习艺所监督的报告㊀，可以想像这些区域的穷人的拥挤：他们说，1817年在军营街，在52幢房子共计390个房间里面住了1318人，而在教堂街及其邻近的街道上，在71幢房子共计393个房间里面住了1997人。

“在这个区域及其邻近的区域里有很多臭气熏天的（foul）小胡同和大杂院，许多地下室光线只能从门口透进去，住的人往往睡在光溜溜的地上，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有床铺。可是，例如尼可尔生大院，在28个狭小而简陋的尼间里住着151个人，穷得在整个大院里只能找到两张床和两条被。”

都柏林的贫穷严重到这样一种程度：仅仅是属于“济贫协会”的一个慈善机关每天就要为2500人，即为全市人口的1%开着大门，——白天给他们吃，晚上让他们走。

关于**爱丁堡**，艾利生博士向我们述说了类似的情形。这个城市由于它的位置优越，不愧有现代雅典之称，但是在这里，新市区

㊀ 皇家医学学会会员、曾任该会主席等职的威·巴·艾利生博士在他的一本书中曾引用过这个报告。这本书就是“关于苏格兰贫民的管理以及这种管理对大城市卫生状况的影响的考察”1840年爱丁堡版（Dr，W.P.Alison.F.R.S.E.，fellow and late President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etc.etc.《Observations on the Management of the Poor in Scotland and its Effects on the Health of Great Towns》.Edinburgh，1840）。作者是有宗教情绪的托利党人，是历史学家阿契波德·艾利生的哥哥。——恩格斯原注

里的贵族区的富丽堂皇和住在旧城的穷人们的肮脏贫穷也成了一个惊人的对比。如艾利生所指出的，这个相当大的城区的肮脏和丑恶并不下于都柏林的最坏的区域，“济贫协会”在爱丁堡也会发现需要救济的人数不下于爱尔兰的首都。艾利生甚至断定，在苏格兰，特别是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穷人的生活比联合王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坏，并且最穷的并不是爱尔兰人，而是苏格兰人。爱丁堡旧教传教士李博士在 1836 年曾向宗教教育委员会做证说：

“我从前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过像这个教区的这种贫穷。人们没有任何家具，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财产；常常是一间屋子里面住着两对夫妇。我在一天之内看过 7 幢房子，里面都没有床，有些房子里面甚至连麦稭也没有；八十岁的老头们都睡在光地板上，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不脱衣服睡的。我在一个地下室里发现两个苏格兰家庭，他们是不久以前才从乡下来的；进城后不久就死了两个孩子，第三个孩子在我去的时候正在咽气；每一个家庭教在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堆肮脏的麦稭；此外，在这个黑得甚至在白天也很难看清人的地下室里还有一头驴子。——看了像苏格兰这个地方的这种贫穷，就是铁石心肠也会不忍的。”

汉能博士在“爱丁堡内外科医学杂志”上也报道了类似的事实。从一个议会报告书㊀中可以看出，爱丁堡穷人的家里是多么肮脏，可是，在这种条件下肮脏也是意料中的。晚上，鸡宿在床柱上，狗，甚至马也和人挤在一间屋子里面，因而这些住房自然极

㊀ ”济贫法委员会就大不列颠劳动阶级卫生状况的调查结果向内务大臣提出的报告”连同附件于 1842 年 7 月向议会提出（3 卷对开本）（《Report to the Home Secretary from the Poor-Law Commissioners, or an Inquiry into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 of Great Britain》. With Appendices.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in July 1842. ——3 vols. in folio）。这些材料是一些医生的报告，由济贫法委员会的秘书爱得文·查得威克收集和整理。——恩格斯原注

其肮脏和恶臭，而且各种各样的虫子都在里面繁殖起来。爱丁堡本身的布局就对住宅的这种恶劣状况起了最大的促进作用。旧城位于一座小山的两个斜坡上，沿山脊是一条大街（high— street）。从这条大街的两边向山下伸出许多弯弯曲曲的小胡同，由于它们是弯弯曲曲的，人们就把它们叫做 wynds〔弯街〕；这些小胡同就构成该城的无产阶级区。在英格兰，每一家人都尽可能地力求住一幢单独的小房子，在苏格兰的城市里却刚刚相反，房子都盖得很高，像巴黎一样地有五六层，里面住了许多家人；因此，人们非常拥挤地塞在一个不大的空间里的情形，就更加严重了。

在英国的一本杂志上有一篇关于城市工人卫生状况的文章㊀，文章中说道："这些街重常常窄得可以从一幢房子的窗子一步就跨进对面房子的窗子；而且房子是这样高，这样一层叠一层，以致光线很难照到院子里和街道上。城市的这一部分没有下水道，房子附近没有渗水井，也没有厕所，因此，每天夜里至少有 5 万人的全部脏东西，即全部垃圾和粪便要倒到沟里面去。因此，街道无论怎么打扫，总是有大量晒干的脏东西发出可怕的臭气，既难看，又难闻，而且严重地损害居民的健康。如果说，在这些地方人们不仅忽视健康和道德，而且也忽视最平常的礼貌，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不但如此，凡是和这个地方的居民比较熟识的人都可以证明，疾病、贫穷和道德堕落在这里达到了什么程度。在这里，社会已经堕落到无法形容的下流和可怜的地步。贫穷阶级的住宅一般都很脏，而且显然是从来没有打扫过。这些住宅大半都只有一个房间，虽然空气很不流通，但是由于玻璃被打破了，窗框又不好，所以屋里还是很冷。屋子是潮湿的，往往位于地平线以下，家具总是少得可怜或者干脆就没有，一捆麦稭常常成为全家的床铺，男人和女人、小孩和老头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水只有到公用的水龙头那里去取；取水的困难自然在各方面都促进了肮脏的传播。"

在其他大海港城市中，情形也并不见得好些。在**利物浦**，尽

㊀ "机工"（月刊）1843 年 10 月号。—— 恩格斯原注

管它的商业发达，很繁华，很富足，可是工人们还是生活在同样野蛮的条件下。全市人口中足有五分之一，即45000人以上，住在狭窄、阴暗、潮湿而空气不流通的地下室里，这种地下室全城共有7862个。此外，还有2270个大杂院（courta）；所谓大杂院，就是一个不大的空间，四面都盖上了房子，只有一个狭窄的、通常是上面有遮盖的入口，因而空气就**完全**不能流通，大部分都很肮脏，住在里面的几乎全是无产者。关于这些大杂院，我们在谈到曼彻斯特的时候再来详细地说。在**布利斯托尔**有一次调查了2800个工人家庭，其中有46%每家只有一间屋子。

在工厂城市中我们也发现完全相同的情形。**诺定昂**总共有11000幢房子，其中有7000—8000幢盖得后墙一堵挨一堵，因而空气就无法流通；此外，大部分是几幢房子只有一个厕所。不久以前做了一次调查，发现一排一排的房子都是建筑在仅仅盖上了一层木板的不深的污水沟上。在莱斯特、得比和设菲尔德，情形也是一样。关于**北明翰**，上述的"机工"杂志上的那篇文章这样说：

"在旧市区有不少地方到处是臭水洼和垃圾堆，肮脏而无人照管。北明翰的大杂院很多，有两千多个，工人大部分都住在这种大杂院里。这种大杂院通常都很狭窄、肮脏、空气不流通，污水沟很坏；每一个大杂院四周有8—20幢房子，这些房子只有一面透空气，因为它们的后墙是和其他的房子共用的，而在院子最里面的地方通常是一个公共垃圾坑或类似的东西，其肮脏是无法形容的。但是必须指出，较新的大杂院是建筑得比较合理，保持得也比较不错的，甚至在旧的大杂院中，小宅子也不像曼彻斯特和利物浦那样密集，因此，在北明翰发生流行病的时期，死亡事件就比起离开它总共只有几英里的乌尔未汉普顿、达德里和比尔斯顿少得多。北明翰也没有住人的地下室，虽然地下室有时不是照它应有的用途来加以使用，而在里面设立了作坊。供无产者寄宿的夜店是很多的（400个以上）；它们大部分是在城市中心的大杂院里面。几乎所有的夜店都脏得令人作呕，发出一股霉臭；这是乞丐、流浪汉

(trampers，这个字的本义下面再谈)①、小偷和妓女的藏身之所。这些人住在这里，根本不讲究什么礼貌，也不要求什么舒适；他们在这种只有这些已经堕落的人才能忍受的氛围中吃饭、喝酒、抽烟和睡觉。”

格拉斯哥在许多方面是和爱丁堡相像的：有同样弯弯曲曲的小胡同〔wynds〕、同样高的房屋。关于这个城市，“机工”杂志曾经这样说：

“工人阶级在这里差不多占总人口 (将近 30 万)②的 78%，他们住在城市的这样一些地方，这些地方在贫穷和肮脏方面超过了圣詹尔士和怀特柴泊的最糟糕的小胡同，超过了都柏林的郊区和爱丁堡的 wynds〔弯街〕。这些地区有许多在市中心——特隆盖特以南、盐市以西、考尔顿、‘大街’后面以及其他地方；这是一片一望无边的像迷阵一样的狭窄的街道和弯弯曲曲的小胡同，在这些地方差不多每走一步都可以遇到破旧的、客气不流通的、好几层的、没有自来水的、半坍塌的房子所形成的大杂院或死胡同。这些房子真正是塞满了人。每一层住着三四家，有时达 20 人之多，有时每一层整个地都当夜店租出去，在一个房间里，不能说安插了，而简直是塞进了 15 个到 20 个人。这些区域是居民中最贫穷、最堕落和道德败坏到极点的一部分人的藏身之所，这些地方应当被看做那些可怕的要命的流行性热病的发源地，这些病就从这里蔓延到整个格拉斯哥。”

让我们看一看，政府的手工织工状况调查委员会的委员**詹·库·昔蒙兹**是怎样描写这个城市的这些部分的㊀：

“我曾经看到过我国和欧洲大陆的最严重的贫穷状况，但是在我看到格拉斯哥的一片片像迷阵一样的小胡同以前，我不相信在一个文明国家里竟有这么多的罪恶、贫穷和疾病。在最下等的夜店里，一间屋子里面有 10 个、12

① ②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㊀ 詹·库·昔蒙兹“国内外的手工业和手工业者”1839 年爱丁堡版(《Arts and Artisans at Home and Abroad》. By J. C. Symons. Edinburgh，1839)。——作者本人看来是个苏格兰人，属于自由党，因而狂热地反对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这里所引证的在该书第 116 页及以下各页。——恩格斯原注

个、乃至 20 个人，有各种年龄的半裸或全裸的男人和女人，杂乱地睡在地板上。这些房子通常（generally）是这样肮脏、潮湿和破烂，甚至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马放在里面。”

在另一个地方，作者写道：

“住在格拉斯哥这些贫民窟里面的经常流动的人口有 15000 到 30000。城市的这一部分全是狭窄的街道和当中一定有一堆垃圾的四四方方的大杂院。不论这些房子的外观是怎样糟糕，但我还是怎么也想不到里面会那样肮脏和贫穷。在我们（警监密勒上尉和昔蒙兹）①在夜间去看过的那几个夜店里面，地板上躺满了人；有男人，有女人，有的穿着衣服，有的半裸着身体，杂乱地躺在一起，有时一间屋子里面有 15 个到 20 个人。他们的床铺是一堆半霉烂的麦稭和一些破布。家具一点也没有或者很少，只有炉子里面的火使这些洞穴有些像住着人的样子。偷窃和卖淫是这些居民的主要的生活来源。看来谁也不想把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②打扫一下，谁也不想消灭这个地狱般的洞穴，消灭这个处在王国第二大城市心脏里面的罪恶、肮脏和传染病的巢穴。在我仔细地调查其他城市最贫穷的地区的时候，无论是在道德和健康的恶化方面，还是在人口的密集方面，我都从来没有发现过类似的情形。地方当局承认这些地区的大部分房屋是破烂和不适于居住的，可是，正是在这些房屋里面人住得最满，因为按照法律这些房屋是不准收房租的。”

英国中部的大工业区，**西约克郡和南郎卡郡**的拥有许多工厂城市的人口密集地区，是丝毫不亚于其他大城市的。约克郡西部的毛纺织业区是一片丘陵绵延、青葱翠绿的美丽的地方，那里的丘陵越向西越陡峭，直到险峻的黑石山脊才达到它的最高点，形成了爱尔兰海和德意志海的分水岭。艾尔河流域和柯尔德河流域是英国最美丽的区域之一，这里密布着许多工厂、村庄和城市。里子在艾

①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 译者注

② 希腊神话中奥吉亚斯王的巨大的极其肮脏的牛圈。这里是指极端肮脏的地方。—— 译者注

尔河畔，连接曼彻斯特和里子的铁路沿着柯尔德河前进。灰色的粗石块砌成的房屋和郎卡郡那些变黑了的砖房比起来是这样美丽，这样整洁，使人看了就觉得愉快。但是，一走到城市里面去，就会发现令人愉快的事情是很少的。如像上述的“机工”杂志在另一个地方所写的（我自己相信这种描写是正确的），**里子**位于

“一个向艾尔河河谷逐渐倾斜下去的斜坡上。这条河约有一英里半长的一段蜿蜒曲折地穿过该城，在解冻或大雨滂沱的时候就猛力地向四面泛滥。城西较高的地区，就这样一个大城市说来，是相当清洁的，但是位于该河及其支流（becks）沿岸的那些地势较低的地区却是肮脏的、拥挤的，它们本身就足以缩短当地居民、特别是小孩子的寿命。此外，我们还可以提一提寇克盖特、马许胡同、十字街和里士满路附近的工人区的令人作呕的情形。这些地方的街道大多数既没有铺砌过，也没有污水沟，房屋盖得杂乱无章，有许多大杂院和死胡同，甚至最起码的保持清洁的设备也没有。所有这一切就完全足以说明这些不幸的、肮脏和贫穷的渊薮中的过高的死亡率。在艾尔河泛滥的时候（顺便说一说，这条河像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入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①]，住房和地下室常常积满了水，不得不把它舀到街上去；在这种时候，甚至在有排水沟的地方，水都会从这些水沟里涌上来流入地下室[㊀]，形成瘴气一样的饱含硫化氧的水蒸气，并留下对健康非常有害的令人作呕的沉淀物。在1839年春汛的时候，由于排水沟沟水外溢竟产生了非常有害的后果：根据出生死亡登记员的报告，本城该区本季度的出生和死亡之比是二比三，而本城其他区域同一季度内的比率却恰好相反，即出生和死亡之比是三比二”。

在这个城市的其他的人口密集地区，根本没有污水沟，或者虽有但是修得很坏，一点用处都没有。在某些街上的房屋的地下室中，很少有干燥的时候；在其他区域的许多街上，铺着厚厚的

---

①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㊀ 必须记住，这些“地下室”不是堆东西的，而是住人的。——恩格斯原注

一层稀泥。居民一次又一次地用煤渣填平坑洼，想把街道修好，但是并没有用，一堆堆的垃圾还是到处堆着，房子里倒出来的污水还是积在水洼里面，直到风把它吹干，太阳把它晒干为止。（参看“统计学会会刊”第二卷第404页市参议会报告书）——在里子，普通小宅子所占的面积不超过5码见方，通常包括1间地下室、1间起居室和1间卧室。这些白天黑夜都塞满了人的房子里的拥挤，不仅对居民的健康而且对他们的道德都又加了一重威胁。这些小宅子是怎样拥挤，可以从上面引用过的关于工人阶级卫生状况的报告中看出：

“在里子，我们看到过兄弟姊妹及男男女女的寄宿者和一家的父亲母亲同宿在一个房间里；由此就发生了许多使人一想到就会发抖的恶果。”

离里子仅7英里的**布莱得弗德**也是如此，该城位于几个河谷的交叉点上，靠近一条黑得像柏油似的发臭的小河。在晴朗的星期天——因为在工作日这城市是被灰色的烟云笼罩着的——从周围的小山上看去，该城呈现出一幅非常美丽的景色；但是城市里面也和里子一样地肮脏和不适于居住。城市的老区位于陡峭的斜坡上，这些区域里的街道条狭窄而不规则的。在胡同、死胡同和大杂院里，堆着垃圾和脏东西；房屋破旧、肮脏、不适于住人，在河的紧旁边，在谷底，我看到过许多房屋，最下一层有一半陷在山坡里，根本不适于住人。在谷底，在工人住宅挤在高耸的厂房当中的地方，是整个城市中最肮脏和建筑得最糟的部分。在布莱得弗德的比较新的区域里，正像在其他任何工厂城市里一样，小宅子比较整齐，排成一列一列的，但是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和传统的安置工人的方法分不开的一切弊病，关于这方面，在讲到曼彻斯特时，我们还要更详细地讲一下。约克郡西部其他城市如**班斯里**、**哈里法克斯**、**哈得**

兹菲尔德的情形也是一样。虽然哈得兹菲尔德由于它那令人神往的自然环境和最新的建筑形式，成为约克郡和郎卡郡一切工厂城市中最美丽的一个，但是它仍然有许多坏的区域。由市民大会选出的城市调查委员会在 1844 年 8 月 5 日的报告中写道：

“大家知道，在哈得兹菲尔德，整条整条的街道和许多胡同及大杂院都既没有铺砌，也没有下水道或其他任何排水沟；这些地方堆积着污泥、垃圾和各种废弃物，这些废物在逐渐腐烂，发酵；几乎到处都有污水洼，因此，这里的住宅都是又脏又坏，以致疾病丛生，威胁着全城的健康。”[100]

如果我们步行或坐火车越过黑石出脊，我们就到了英国工业完成了自己的杰作的典型基地，英国的整个工人运动开始的地方，即以**曼彻斯特**为中心的**南郎卡郡**。现在，我们面前又是一片丘陵绵延的美丽的地区，这地区从分水岭往西向爱尔兰海慢慢倾斜下去，就是里布尔河、艾尔威尔河、梅塞河以及这三条河的支流的令人心旷神怡的碧绿的夹谷。一百年前左右，这地方大部分还是一片居民稀少的沼泽，现在却布满了城市和乡村，成为英国的人烟最稠密的地区了。郎卡郡，特别是曼彻斯特，是英国工业的发源地，也是英国工业的中心。曼彻斯特的交易所是英国工业生活中的一切波动的寒暑表；曼彻斯特的现代化的生产已达到了完善的地步。在南郎卡郡的棉纺织业中，自然力的利用、机器（主要是动力织机和骡机）对手工劳动的排挤以及分工都达到了高度的发展，而如果我们认为这三个要素是现代工业的特征，那末我们必须承认棉花加工业在这方面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是走在其余一切工业部门的前面的。现代工业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在这里一定会达到最充分最完备的发展，工业无产阶级在这里一定会以最典型的形式出现；工人由于蒸气力和机器的应用以及分工而受到的屈辱

在这里一定会达到极点，工人一定会很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屈辱；同时无产阶级摆脱这种屈辱的企图，在这里也一定会达到极点并带有高度的自觉性。因为曼彻斯特是现代工业城市的典型，也因为我对它的了解就像对自己的故乡一样，并且比该城的大多数居民还了解得更清楚，所以这个城市我们要多谈一些。

曼彻斯特周围的城市，就工人区的情况说，和中心城市很少有什么差别，只是这些城市的工人在居民中所占的比例可能比曼彻斯特更大。这是一些纯粹的工业城市，它们的一切商业活动都是在曼彻斯特或通过曼彻斯特进行的；它们在各方面都依赖曼彻斯特，因此，居民只有工人、厂主利小商人，而曼彻斯特还有大批商业人口、许多委托商店和大零售商店。所以，像**波尔顿**、**普累斯顿**、**威根**、**柏立**、**罗契得尔**、**密得尔顿**、**海华德**、**奥尔丹**、**埃士顿**、**斯泰里布雷芝**、**斯托克波尔特**等城市，人口虽然有3万、5万、7万，甚至9万，但是它们几乎都是些大的工人区，只是有一些工厂、几条大街和几条市外公路把它们隔开，大街两旁是商店，公路两旁是厂主的有花园围绕着的别墅似的房子。这些城市本身都建筑得坏而杂乱，有许多肮脏的大杂院、街道和小胡同，到处都弥漫着煤烟，由于它们的建筑物是用鲜红的、但时间一久就会变黑的砖（这里普遍使用的建筑材料）修成的，就给人一种特别阴暗的印象。把地下室当做住宅，在这里是很普通的；凡是可以挖洞的地方，都挖成了这种深入地下的洞，而很大一部分居民就住在这样的洞穴里面。

除普累斯顿和奥尔丹外，位于曼彻斯特西北11英里的**波尔顿**算是这些城市中最坏的了。我到那里去过好多次，就我所看到的来说，这个城市只有一条大街，而且很脏，这就是第恩斯盖特街，这条街同时也是市场；即使在天气最好的时候，这个城市也是

一个阴森森的讨厌的大窟窿，虽然这里除了工厂就只有一些一两层的矮房子。这里也像其他地方一样，城市中较老的一部分是特别荒凉和难看的。一条黑水流过这个城市，很难说这是一条小河还是一长列臭水洼。这条黑水把本来就很不清洁的空气弄得更加污浊不堪。

以下就说**斯托克波尔特**，它虽然位于梅塞河的柴郡那一面的河岸上，但仍属于曼彻斯特工业区。它夹在沿梅塞河的一个狭谷里面，街道在河岸的一边是陡峭地顺山而下，在另一边是同样陡峭地顺山而上。从曼彻斯特到北明翰的铁路就通过高架桥越过这个城市和整个狭谷的上空。斯托克波尔特在全区是以最阴暗和被煤烟熏得最厉害的地方之一出名的，事实上也的确给人一种特别阴沉的印象，从高架桥上看下去的时候更是如此。但那些从谷底到山顶一长条一长条地分布在全城的无产者的小宅子和地下室给人们的印象还更加阴沉。就我的记忆所及，在这个区域的任何一个城市里，我都没有看见过这样多的住人的地下室。

在斯托克波尔特东北数英里，是**埃士顿一安得一莱因**，这是这个区最新的工厂城市之一。它在一个出坡上，运河和泰姆河从山麓流过，一般说来是按照新的比较有规则的体系建筑起来的。五六条平行的长街沿山岗横排着，它们和其他向河谷倾斜下去的街道交叉成直角。在这样一种街道分布体系下，工厂都被排挤到市中心以外去了，何况为了要靠近水源和水路交通线，这些工厂本来就会集中在河谷底部的；在这里，工厂全都挤在一起，从烟囱里喷出浓烟。因此，埃士顿比起大多数其他的工厂城市来，给人的印象要舒服得多：街道比较宽阔、清洁，鲜红色的小宅子看起来比较清新悦目。可是工人小宅子的这种新的建筑体系也有坏的一面，因为在每一条

这样的街道的后面都隐蔽着一条脏得多的后街，由一条狭窄的夹道通到那里去。在埃士顿，除了市郊的几幢房子，我没有看到过一幢可能有五十年以上历史的，但是这里也有一些街道，街上的小宅子又坏又破，砖头摇摇欲坠，墙壁现出裂痕，涂在里面的泥灰也已经脱落了；这些街道被煤灰弄得又脏又黑，它的面貌，无论从哪一点来说，都不比该区其他城市的街道好一些，只是在这里这样的街道并不是一般的现象，而是一种例外。

再往东一英里是**斯泰里布雷芝**，这个城市也在泰姆河畔。如果从埃士顿登山，那末从山顶向左右眺望都会看到许多美丽的大花园，花园里有别墅一样的华丽的住宅，其建筑式样大部分是伊丽莎白式，这种式样和哥德式的关系正像英国国教和罗马天主教的关系一样。再向前走一百步，河谷里的斯泰里布雷芝就出现在眼前。但是和那些华丽的别墅，甚至和埃士顿那些朴素的小宅子比起来这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照呵！斯泰里布雷芝在一个比斯托克波尔特夹谷还要狭窄的弯弯曲曲的狭谷里面，夹谷两边的斜坡上杂乱无章地布满了小宅子、房屋和工厂。在走近城市的时候，看到的第一批小屋就是拥挤的，被煤烟熏得黑黑的，破旧的，而全城的情况也就和这第一批房子一样。只有很少的几条街伸展在狭窄的谷底；大部分街道是纵横交错的，沿着斜坡时起时伏。由于街道分布在这种倾斜的地势上，几乎一切房屋的最下一层都有一半陷到地里面去。在这种紊乱的建筑体系下形成多少堆大杂院、后街和小胡同，从山上朝下看就可以看见。从山上看下去，这个城市的某些地方就像一幅鸟瞰图一样地展现在下面。再加上可怕的肮脏，那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郊区很美丽的城市却给人这样一种可憎的印象。

关于这些较小的城市，我们已经说得不少了。这些城市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一般说来这些城市里的工人的生活是和曼彻斯特一样的。因此，我只描写了每一个城市的建筑形式的特点，但要补充一点，就是对曼彻斯特工人住宅状况的一般特点的一切评论，对它周围的这些城市也是完全适用的。现在我们就来谈这个中心城市吧。

曼彻斯特位于一串小山的南山坡下，这一串小山从奥尔丹起绵延于艾尔威尔河和梅德洛克河的河谷间，到**克萨尔－摩尔**山达到终点，这是曼彻斯特的跑马场和“圣山”[101]。曼彻斯特本城位于艾尔威尔河左岸，在该河及其两条支流——艾尔克河和梅德洛克河之间，这两条小河就在这里流入艾尔威尔河。在艾尔威尔河右岸，在这条河的急转的河曲环抱之处在**索尔福**，再往西是**盆德尔顿**；艾尔威尔河北边是上**布劳顿**和下**布劳顿**；艾尔克河北边是**奇坦希尔**，梅德洛克河南边是**休尔姆**，再往东是**梅德洛克河畔的却尔顿**，再往前，差不多在曼彻斯特以东是**阿德威克**。所有这些房屋的总和，通常就叫做曼彻斯特，这里的人口至少有40万，也许还要多。这个城市建筑得如此特别，人们可以在这里住上多少年，天天上街，可是，如果他只是出去办自己的事或散步，那就一次也不会走进工人区，甚至连工人都接触不到。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无意识的默契，也由于完全明确的有意识的打算，工人区和资产阶级所占的区域是极严格地分开的，而在那些不能公开这样做的地方，这种事情就在慈善的幌子下进行。在曼彻斯特的中心有一个相当广阔的长宽各为半英里的商业区，几乎全区都是营业所和货栈（ware－houses）。这个区域几乎整个都是不住人的，夜里寂静无声，只有值勤的警察提着遮眼灯在狭窄而黑暗的街道上巡逻。这个地区有几条大街穿过，

街上非常热闹，房屋的最下一层都是些辉煌的商店；在这些街上，有些地方楼上也住了人；这里的市面是不到深夜不停止的。除了这个商业区域，整个曼彻斯特本城、索尔福和休尔姆的全部、盆德尔顿和却尔顿的大部分、阿德威克的三分之二以及奇坦希尔和布劳顿的个别地区，——所有这些地方形成了一个纯粹的工人区，像一条平均一英里半宽的带子把商业区围绕起来。在这个带形地区外面，住着高等的和中等的资产阶级。中等的资产阶级住在离工人区不远的整齐的街道上，即在却尔顿和在奇坦希尔的较低的地方，而高等的资产阶级就住得更远，他们住在却尔顿和阿德威克的郊外房屋或别墅里，或者住在奇坦希尔、布劳顿和盆德尔顿的空气流通的高地上，——在新鲜的对健康有益的乡村空气里，在华丽舒适的住宅里，每一刻钟或半点钟都有到城里去的公共马车从这里经过。最妙的是这些富有的金钱贵族为了走近路到城市中心的营业所去，竟可以通过整个工人区而看不到左右两旁的极其肮脏贫困的地方。因为从交易所向四面八方通往城郊的大街都是由两排几乎毫无间断的商店所组成的，而那里住的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是愿意而且也就够保持街道的整洁的。诚然，这些商店和它们背后的那些区域总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在商业区和靠近资产阶级住区的地方，商店就比背后藏着工人们肮脏的小宅子的那些商店更漂亮些。但是，为了不使那些肠胃健壮但神经脆弱的老爷太太们看到这种随着他们的富贵豪华而产生的穷困和肮脏，这些商店总算是够干净的了。例如第恩斯盖特街从老教堂一直向南伸展，在起头的地方是两排货栈和工厂，接着是第二流的商店和几个啤酒店，再往南去，就是商业区的尽头，这里是一些比较难看的商店，愈往南，就愈肮脏，同时酒店和小饭馆也愈来愈多，最

后,在街道的南端,小店的外貌就使人丝毫不会怀疑这些小店的主顾是工人,而且也只是工人。从交易所向东南伸展的市场街,看上去也是一样:最初是些第一流的华丽的商店,楼上是营业所和货栈;接着(在皮卡第莱)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大旅馆和货栈;再往前去(在伦敦路),在梅德洛克河旁,是工厂以及为资产阶级下层和工人开设的小酒店和商店;再往前,在阿德威克— 格林附近,是高等和中等资产阶级的房屋,在它们后面,是那些最富有的厂主和商人的大花园和别墅。这样,了解了曼彻斯特,就可以从几条大街**推出**利它们毗连的地区的情况,但是很少能由此看出工人区的**真正**面貌。我知道得很清楚,这种伪善的建筑体系是或多或少地为一切大城市所具有的;我也知道,零售商因其所经营的商业的性质就必须住在繁华的大街上;我知道,在这种街道上好房子总比坏房子多,这一带的地价也比偏僻的地方高。但是我毕竟还没有看到过一个地方,像曼彻斯特这样有系统地把工人阶级排斥在大街以外,这样费尽心机把一切可能刺激资产阶级的眼睛和神经的东西掩盖起来。然而,曼彻斯特在其他方面比任何一个城市都建筑得更不合警察的规定,更没有一定的计划,而是更偶然地堆积起来的。当我连带考虑到资产阶级那种热心的保证,说什么工人生活得很好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些自由派厂主,曼彻斯特的《big W igs》[①]对该市的这种可耻的建筑体系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的。

还要补充一下的,就是几乎所有的厂房都是沿着贯串全城的三条河流和各种运河建立起来的,现在我就来描述工人区本身的

① 这是一个无法翻译的双关语。英语中《bigW igs》的意思是“要人”或“大亨”,而和它发音相同的《big W higs》的意思却是“辉格党巨头”。—— 译者注

情形。首先要谈的是曼彻斯特旧城，它位于商业区北边和艾尔克河之间。这里的街道，即使像托德街、朗—密尔盖特、威色—格罗弗和修德希尔这些比较好的街道，也都是又狭窄又弯曲的，房屋又肮脏又破旧，胡同里的建筑更是令人作呕。如果从老教堂顺着朗—密尔盖特街走去，就会看到右边有一排老式房屋，这些房屋的门面没有一间不是东倒西歪的，——这是旧曼彻斯特，工业时代以前的曼彻斯特的残迹，以前住在这里的居民和他们的子孙都搬到本城建筑得较好的区域去了，而把这些对他们太不合适的房屋留给包括很多爱尔兰人在内的工人居民。这里才真正是一个几乎毫不掩饰的工人区，甚至大街上的商店和酒馆也没有人想把它们的外表弄得稍微干净一些。但是这一切和后面那些只有经过狭窄得甚至不能同时走两个人的过道才能进去的胡同和大杂院比起来简直就算不了什么。像这样违反合理的建筑术的一切规则而把房子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弄得一所贴着一所地挤作一堆，实在是不能想像的。而且这不能只怪建筑物是旧曼彻斯特时代保存下来的。这种杂乱无章的情形只是在最近才达到顶点，现在，在任何地方，只要那里的建筑方式比较古老因而还保留下那么一点点空隙，人们就在这里补盖起房子，把这个空隙填起来，直到房子和房子之间连一小块可以再建筑一些东西的空地也没有为止。我现在从曼彻斯特的平面图上描下一小块来证实我的话。这远不是最坏的一块地方，而且

占地还不到整个旧城的十分之一。

这张图可以充分地表明全区的、尤其是艾尔克河附近的建筑方式是如何不合理。在这里，河的南岸很陡，有15英尺到30英尺高；在这个陡坡上，大部分的地方都有三排房屋，最下面一排紧靠水边，而最上面一排却已经是屋檐齐及山顶，面临着朗－密尔盖特街。此外，河岸上还有工厂，总之，这里的建筑也和朗－密尔盖特街下段一样密集而杂乱。大街左右有很多有顶的过道通到许多大杂院里面去；一到那里，就陷入一种不能比拟的肮脏而令人作呕的环境里；向艾尔克河倾斜下去的那些大杂院尤其如此，这里的住宅无疑地是我所看到过的最糟糕的房子。在这里的一个大杂院中，正好在入口的地方，即在有顶的过道的尽头，就是一个没有门的厕所，非常脏，住户们出入都只有跨过一片满是大小便的臭气熏天的死水洼才行。这是艾尔克河畔杜西桥以上的第一个大杂院——我指出这一点，是考虑到可能有人要想证实一下我的话，下面紧靠着河的地方有几个制革厂，四周充满了动物腐烂的臭气。要到杜西桥以下的那些大杂院里去，大半要从一条狭窄而肮脏的台阶走下去，而要进入屋内就必须跨过一堆堆的垃圾和脏东西。桥以下的第一个大杂院叫做爱伦大院，在霍乱流行的时候，这里的情况曾使卫生警察不得不命令居民都搬出来，清扫一番，并用氯气把房子熏一遍；凯博士在一本小册子㊀里，对这个大杂院当时的情况曾做过一番

㊀ 医学博士詹·菲·凯“曼彻斯特棉纺织业中的工人在精神和身体方面的状况”1832年第2版（《The Mor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employed in the Cotton Manufacture in Manchester》.By James Ph.Kay, Dr. Med.2nd edit 1832）。作者对一般工人阶级和工厂工人没有加以区别，但是在其他方面，这是一本出色的书。——恩格斯原注

令人惊心动魄的描述。从那时起，这个大杂院显然已经有一部分拆掉重新盖过了；至少从桥上看下去，就马上可以看到一些断垣残壁和高耸着的垃圾堆旁边有几所较新的房屋。从桥上看到的这幅景象—— 一堵一人高的石墙小心翼翼地遮住了这幅景象，使个子不很高的过路人无法看到—— 就是全区的一般面貌。桥底下流着，或者更确切地说，停滞着艾尔克河，这是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里面充满了污泥和废弃物，河水把这些东西冲积在右边的较平坦的河岸上。天气干燥的时候，这个岸上就留下一长串龌龊透顶的暗绿色的淤泥坑，臭气泡经常不断地从坑底冒上来，散布着臭气，甚至在高出水面四五十英尺的桥上也使人感到受不了。此外，河本身每隔几步就被高高的堤堰所隔断，堤堰近旁，淤泥和垃圾积成厚厚的一层并且在腐烂着。桥以上是制革厂；再上去是染坊、骨粉厂和瓦斯厂；这些工厂的脏水在废弃物统统汇集在艾尔克河里，此外，这条小河还要接纳附近污水沟和厕所里的东西。这就容易想像到这条河留下的沉积物是些什么东西。桥以下，可以看到陡峭的左岸上大杂院里的垃圾堆、脏东西、泥土和瓦砾；房屋一所耸立在一所后面，由于坡很陡，每一幢房子都看得见一小块；所有这些房屋都是被烟熏得黑黑的、破旧的，窗玻璃破碎不堪，窗框摇摇欲坠；在后面，是旧的兵营式的工厂厂房。在比较平坦的右岸，是一长排房屋和工厂。靠边的第二所房子是一座没有屋顶的废墟，里面堆满了垃圾，而第三所房子造得这样低，它的最下一层竟不能住人，所以就没有窗子，也没有门。在这后面，是穷人的墓地和利物浦—里子铁路的车站，再往后就是习艺所—— 曼彻斯特的“穷人的巴士底狱”，它像一座城堡，从小山上的锯齿形的高墙后面森严地俯视着对岸的工人区。

杜西桥以上，左岸较平，右岸较陡，但是两岸住房的情况丝毫也不见得好些，而且更坏了。在这里只要从朗－密尔盖特这条大街向左一拐弯，就会迷失方向；走出一个大杂院又走进另一个大杂院，走过一些拐角、一些狭窄而肮脏的胡同和过道，几分钟以后，终于堕入五里雾中，根本不知道天南地北了。到处都是半倒塌或完全倒塌了的房屋，其中有一些事实上已经就有人住了，这种情形是很耐人寻味的；房子里很少有铺上木板或石板的，几乎到处都是破烂的装置得很坏的窗和门，而且是多么肮脏！到处是一堆堆的垃圾、脏东西和废弃物，死水洼代替了水沟，仅仅是臭气就足以使稍微有点文化气息的人无论如何不能在这里住。不久以前，由于里子铁路新修的延长出来的一段要在这里跨过艾尔克河，这些大杂院和胡同的一部分被拆掉了，可是余下的部分却暴露在人们的眼前。例如在铁桥附近就有一个大杂院，它那肮脏的令人作呕的面貌远远地超过其他一切大杂院，这是因为以前它四周都有房子包围着，很难走到里面去；尽管我认为自己很熟悉这一带地方，假若不是建筑铁路桥梁时打开了缺口，我也永远不会发现这个大杂院。沿着坑坑洼洼的河岸，从上面拉着晒衣服的绳子的那些木桩旁边走过去，就走进了这一堆乱七八糟的矮小的平房中，这些房子大多数都是土地，地上没有铺任何东西，每一家都只有一个房间，厨房、起居室、卧室，什么都是那一间唯一的房子。在这样一个长不到6英尺宽不到5英尺的洞穴里，我看到了两张床——这算什么床铺呵！——另外再加上一张梯子和一个炉灶，正好填满了整个房间。在其他许多小屋里，我**根本就什么**也没有看到，虽然门是敞开的，而住的人就站在门口。门前到处是脏东西和垃圾；垃圾下面似乎是铺了石头的，但是看不见，只是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用脚踏下去才感觉得到。这

一整堆住着人的牲畜栏，两面被房屋和工厂包围着，第三面是河。这里，除了一条沿河的狭窄的小路，只有一个狭窄的有顶的过道通到外边去——通到另一片几乎建筑得一样坏和一样不整洁的像迷阵一样的房屋里面去。

这已经够了！整个艾尔克河河岸的房屋都是这样建筑的。这是一些毫无计划地胡乱堆在一起的房屋，全部都已经或多或少地接近于倒塌了；房屋内部的肮脏零乱和周围的肮脏环境完全相配称。住在这里的人怎么能够讲究清洁呢？要知道，他们就连大小便的地方也没有。这里的厕所是这样少，每天都积得满满的；要不就离得太远，大部分居民都无法利用。附近只有艾尔克河的脏水，而自来水和抽水机又只是那些“体面的”市区里才有，人们怎么能够洗澡呢？现代社会中的这些奴隶的住屋并不比杂在他们小屋之间的那些猪圈更干净些，这实在是不能怪他们的！苏格兰桥以下沿岸有六七间地下室，室内的地面和离它不到6英尺远的地方流过的艾尔克河水浅时的水面比起来，至少要低两英尺，对岸桥以上离桥不远的街道拐角上有一幢房屋，最低一层没有门，也没有窗，根本不能住人（而这种情况在这一带并不少见）；还应当指出，由于没有更适当的地方，附近居民经常用这种敞开的最低一层房子做公共厕所，——像这幢房子的上面一层和那六七间地下室，房主们还恬不知耻地把它们出租！

我们撇开艾尔克河，再鑽到朗— 密尔盖特街另一边的工人住宅的中心去，我们就会走进一个稍微新一点的工人区，这个区域从圣迈克尔教堂起一直伸展到威色— 格罗弗和修德希尔。这里至少比较整齐一些。我们在这里看不到紊乱不堪的建筑，至少是可以发现一些长而直的街道和死胡同，以及按照一定计划建筑起来的

通常是四方形的大杂院。但是，如果说前面那些区域里的每一幢房子都是胡乱地建筑起来的，那末，在这里，这种胡乱建筑的做法却表现于整条整条的街道和整个整个的大杂院，在建筑这些街道和大杂院的时候丝毫没有考虑到其他街道和大杂院的地位。街道时而朝这一面转，时而又朝那一面转，每走一步都会闯入死胡同或者碰上死角，使你又回到原来出发的地方；要不在这个迷阵里住上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那就怎样也摸不清这里的方向。这些街道和大杂院的通风（如果这个词还可以用到这里的话）状况和艾尔克河一带一样坏，虽然这个区域在某些方面比艾尔克河流过的那个区域优越一些（这里的房屋比较新，有些街道间或还有污水沟）可是这里几乎每一所房子都有住人的地下室，而这在艾尔克河畔，由于房屋比较阵旧，建筑得也比较马虎，就很少看到了。在其他方面，如脏东西、垃圾堆、灰堆和街道上的死水洼，却是两个地方都有的，而在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个区域里，除了这些东西，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极其有碍居民的清洁的情形，这就是成群的猪在街上到处乱跑，用嘴在垃圾堆里乱拱，或者在大杂院内的小棚子里关着。这里，正像曼彻斯特大多数其他工人区一样，腊肠制造商把院子租下来，在那里盖起猪圈；几乎每一个大杂院里都有一个或几个这样的隔开的角落，院里的居民把一切废弃物和脏东西都往里扔，结果猪是养肥了，而这些四面都有建筑物堵住的大杂院里的本来就不新鲜的空气却由于动植物体的腐烂而完全变坏了。穿过这个区域，修筑了一条相当体面的宽阔的街道——密勒街，这样，这里的后景就相当成功地被隐蔽起来了，但是谁要是为了好奇，走进许多条通向大杂院的过道中的一条去看看，那末每隔20步他就会碰到这样一个不折不扣的猪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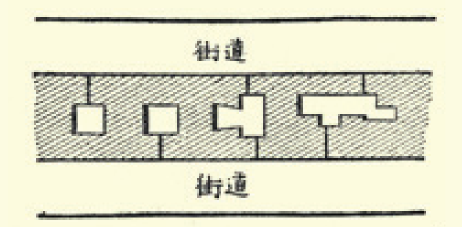
曼彻斯特旧城就是如此。重读了一遍自己对它的描写，我应当说，我不仅丝毫没有夸大，而且正好相反，对这个至少住着两三万居民的区域，我还远没有把它的肮脏、破旧、昏暗和违反清洁、通风、卫生等一切要求的建筑特点十分鲜明地表现出来。而这样一个区域是在英国第二大城，世界第一个工厂城市的中心呀！如果想知道，一个人在不得已的时候有多么小的一点空间就够他活动，有多么少的一点空气（而这是什么样的空气呵！）就够他呼吸，有什么起码的设备就能生存下去，那只要到曼彻斯特去看看就够了。不错，这是**旧**城，——和当地居民谈到这个人间地狱的可憎的状况时，他们就会强调这一点，——但是这能说明什么呢？要知道，一切最使我们厌恶和愤怒的东西在这里都是最近的产物，**工业时代**的产物。属于旧曼彻斯特的那几百所房子老早就被原来的住户遗弃了，只是工业才把大批的工人（就是现在住在那里的工人）赶到里面去；只是工业才在这些老房子之间的每一小片空地上盖起房子，来安置它从农业区和爱尔兰吸引来的大批的人；只是工业才使这些牲畜栏的主人有可能仅仅为了**自己**发财致富，而把它们当做住宅以高价租给人们，剥削贫穷的工人，毁坏成千上万人的健康；只是工业才可能把刚摆脱掉农奴制的劳动者重新当做无生命的物件，当做一件**东西**来使用，才可能把他赶进对其他任何人都是太坏的住所，而这种住所工人得花自己的血汗钱来享用，直到它最后完全倒塌为止；所有这些都只是工业造成的，而如果没有这些工人，没有工人的贫困和被奴役，工业是不可能存在的。固然，这些区域原来的规划就不好，很难从这种规划中弄出什么好东西来。但是在改建时，土地占有者做了些什么，地方当局又做了些什么来加以改善呢？什么都没有做。相反地，只要哪里还空下一

个角落，他们就在那里盖起房子；哪里还有一个多余的出口，他们就在那里盖起房子来把它堵住。地价随着工业的发展而上涨，而地价愈是涨得高，就愈是疯狂地在每一小块土地上乱盖起房子来，一点也不考虑居民的健康和方便，唯一的念头就是尽可能多赚钱，反正**无论多坏的小屋，总会找到租不起好房子的穷人的**。但是这到底是旧城，——资产阶级就是这样安慰自己的。那末我们来看看新城（the New town）是怎样的吧。

新城又叫爱尔兰城（the Irish town），在旧城的那一边，在艾尔克河和圣乔治路之间的粘土小山上。在这里，城市的一切特征都消失了。东一排西一排的房屋或一片片迷阵似的街道，像一些小村庄一样，乱七八糟地散布在寸草不生的光秃秃的粘土地上。房屋，或者不如说是小宅子，情形都很糟，从来不修理，肮脏，有潮湿而龌龊的住人的地下室。街道既没有铺砌，也没有污水沟，可是这里却有无数的猪群，有的在小院子或猪圈里关着，有的自由自在地在山坡上蹓跶。这里街上的污泥竟这样厚，只有在天气很干燥的时候，才能希望走过这里而不致让烂泥掩没了脚背。在圣乔治路附近，一堆一堆的建筑物密密麻麻地集在一起，到处是一条条的街道、胡同、死胡同和大杂院，愈接近市中心，就愈是挤在一起，愈是乱七八糟。固然，这里常常可以看到一些铺砌过的街道，或者至少也可以看到铺砌过的人行道和污水沟，但是肮脏的情形，以及房屋，特别是地下室的恶劣状况还是一样。

在这里，不妨一般地谈谈曼彻斯特流行的工人区的建筑形式。我们已经知道，在旧城，房子的排列大半是纯粹出于偶然的。每一所房子在建筑时都没有考虑到其余的房子，而几所房子中间的一块不规则的空地，由于没有其他名字可用，就称它为大杂院（court）。

在这个区域中的一些稍微新一点的地段和工业繁荣初期形成的其他一些工人区里，房子的分布是比较有计划的。两条街道之间的地方被



划分为较有规则的多半是四方形的大杂院，这些大杂院一开始就是以近似附图所表示的那种样子盖起来的，经过有顶的过道从街上通到里面去。房子的完全没有计划的分布固然很妨碍通风，因而对居住者的健康非常有害，但是这种把工人关在四面都被建筑物围起来的大杂院里的办法就更有害得多了。这里空气根本不能流动；只是在生火的时候，烟囱算是大杂院中闷人的空气的唯一出口㊀。此外，这些大杂院里的房屋大半都是两排盖在一起，两排房子共用一堵后墙，这就足以使那里不可能有任何良好的通风了。又因为街道警察对这些大杂院的情况漠不关心，同时房屋里扔出来的一切东西都是扔在什么地方就留在什么地方，所以，在那里看到脏东西以及一堆堆的煤灰和垃圾，也就用不着惊奇了。我曾经访问过一些大杂院（在密勒街），这些大杂院至少要比大街低半英尺，没有排水沟，下雨时积起来的水一点也流不出去！

后来出现了另一种建筑形式，这种形式现在已普遍地采用了。现在，工人小宅子几乎再也不一所所地盖了，总是一盖就是几十

㊀ 但是，有一位聪明的英国自由党人在“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硬说，这些大杂院是城市建筑艺术的杰作，因为它们像许多露天的小方场一样，可以改善通风状况，促使空气流通！假如每一个大杂院都有两个或四个宽阔的露天的面对面的出口，让空气可以自由流通，那也许真可以改善通风状况，促使空气流通；但是这些大杂院从来也没有两个这样的露天出口，甚至难得有这么一个，几乎一切大杂院都只有一条狭窄的有顶的过道。—— 恩格斯原注

所，甚至几百所；一个业主一下子就盖它一整条或两三条街。这些街道排列如下：第一排是比较高级的小宅子，很幸运，这些小宅子有一个后门和一个小院子，因而房租也最贵。这些小宅子的院子通向一条两端都盖有房子的弄堂（back— street），其中一端有一条窄缝或有顶的过道通到这条弄堂里去。大门开在弄堂里的那些小宅子，房租最便宜，一般也照管得最坏。它们和第三排小宅子共用一堵后墙，第三排小宅子的门开在另一条街上，房租比第一排便宜，但比第二排贵。这样，街道的布置情况就约略如下图：

由于房屋和街道是这样排列的，所以第一排小宅子的通风还相当不错，第三排的通风至少也不比前一种建筑形式中类似的小宅子差；但是中间一排的通风在任何情况下都和大杂院中的小宅子一样坏，而弄堂也并不比大杂院更整洁些。业主们宁愿要这种建筑方式，因为它既节省地面，又使他们能通过第一排和第三排小宅子的较高租金来更顺利地掠夺工资比较多的工人。

这三种小宅子建筑形式不仅在全曼彻斯特，甚至在整个郎卡郡和约克郡都可以看到，它们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但大半都单独存在，所以仅仅从这一特征就可以看出城市各部分的相对年龄。第三种形式，即有弄堂的那一种形式，在圣乔治路以东、奥尔丹路和大安柯茨街两边的广大工人区里占有绝对的优势，在曼彻斯

特的其余工人区和郊区也很常见。

在上面提到的那个叫做安柯茨的广大区域里，沿着两条运河集中了曼彻斯特的大部分最大的工厂——六七层高的大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及其细长的烟囱耸立在低矮的工人小宅子的上空。所以这个区域的居民主要是工厂工人，而住在最坏的街上的则是手工织工。靠近市中心的一些街道是最老的，因而也是最坏的，但是这些街道都铺砌过而且还有污水沟；在这里我是把那几条同奥尔丹路和大安柯茨街靠近而又与之平行的街道算在里面的。再向东北可以看到几条新修建的街道；这里的小宅子看起来漂亮而又清洁，新的门窗刚刷上油漆，室内也粉刷得干干净净；街上空气比较流通，街道之间还没有盖房子的空地比较大，也比较多。但是所有这些都只是少数住宅的情况。此外，还应当补充一点，这就是几乎每一幢小宅子都有住人的地下室；许多街道都没有铺砌，也没有排水沟；而重要的是这个漂亮的外表仅仅是一种伪装，这种伪装过十年就什么也不会留下了。原因是这些小宅子并不比街道建筑得好一些。初看起来，所有这些小宅子都非常漂亮而坚固，外表结实的砖墙骗过了人们的眼睛，如果经过**新建的工人**区而不看一看那些弄堂，也不仔细看一下房屋是如何建筑的，那就会同意那些自由派厂主的说法：任何地方的工人也没有英国这样好的住宅。但是，只要走近细看一下，就会发现，这些小宅子的墙是薄到不能再薄了。支持地下室、房屋底层和屋顶的重量的外墙，最多也不过一块砖那么厚，也就是每一行中，砖的长边是紧靠在一起的（□□□□□）；但是，我也看见过不少同样高的小宅子（其中有些在我看到时还正在建造），它们的外墙只有半块砖那么厚，因为砖不是横排而是直排的，就是说，不是长边靠在一起，而是短边靠

在一起（□□□□）。这样做，一半是为了节省材料，一半是由于盖房子的业主向来不是地基的所有者，按照英国的习惯他们把地基租上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或九十九年；期限一满，地基和它上面的一切建筑物都要毫无代价地归还原主。所以租地的人总是精打细算使自己盖的房子在土地租赁期满时尽可能地变得不值钱；而由于这种小宅子常常是在满期前二三十年才盖起来的，这就容易了解，盖房子的业主是不愿意在这上面多花钱的。此外，这些业主多半是建筑公司老板或厂主，他们很少或根本不愿花钱修缮，这一半是由于他们不愿意减少自己的收入，一半是由于租期短促的缘故；在商业危机来临，大批工人失去工作的时候，往往整条整条的街道空起来，因此，小宅子很快就倒塌毁坏，不能住人了。根据一般的估计，工人住宅平均只能用四十年。当你看到那些新房子的似乎可以维持几个世纪的外表美丽而结实的外墙时，你会觉得这种说法好像是很奇怪的；但实际情形却是这样：建造房屋的时候光打小算盘，以后又丝毫不加修缮，房屋时常空起来，住户经常更动，最后，在能够住人的最终十年里，房客——大部分是爱尔兰人——又大肆破坏，常常把房屋里的木质部分拆下来生火，由于这一切，这些小宅子过了四十年就变成一堆瓦砾了。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实：在工业繁荣时期而且主要是在本世纪才修建起来的安柯茨区，也还是有许多破旧的倒塌的房子，而大部分房子现在甚至已经到了能够住人的最后阶段了。至于这样白白地浪费了多少资本，以及只要在建筑上和以后的修理上怎样稍微多花一点钱，就可以使这个区域在许多年中保持清洁、像个样子和能够住人，这我就不谈了。我在这里要谈的只是房屋的状况和居住者的生活条件，在这一方面我应当说，再也没有比这种安置工人的制度更有害更伤风败

俗的了。工人不得不住在这种恶劣的小宅子里面，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去租较好的房子，或者是因为他们做工的工厂附近没有较好的房子，有时也因为这些小宅子是厂主的，厂主只是在工人租他的小宅子时才给工人工作。自然，这种四十年的期限并不是绝对不变的；如果房屋是在闹市里，那末，即使地租昂贵，但是总有希望找到住户，所以房主就会做一些修缮工作使房子在四十年以后还多少能住人；当然，他们所做的只是最必需的，而且这些修理过的房子正是最坏的。有时，在流行病威胁之下，卫生警察们平时酣睡着的良心惊醒了，于是他们就到工人区来进行突击检查，把整排整排的地下室和小宅子封闭起来，譬如在奥尔丹路附近的许多胡同中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这并不会持续多久，这些被禁止住人的房屋很快又住上了人；而且房主寻找新房客的时候，甚至比以前更占便宜，因为人们知道，卫生警察一时半时是不会再到这里来了！

曼彻斯特的东郊和东北郊是资产阶级唯一没有替自己盖上房子的郊区。原因是这里一年中要刮上十个月到十一个月的西风和西南风，总是把一切工厂的煤烟都吹到这方面来（而这种煤烟确实是不少的！）。光让工人去吸这些煤烟！

在大安柯茨街以南是一个建筑了一半的巨大的工人区——一片光秃秃的丘陵地带，上面零零落落毫无规则地散布着一排排的或排成四方形的房子。房子之间是一片空地，地下是粘土，高低不平，不长草，一下雨就几乎不能通行。这里所有的小宅子都肮脏而破烂，常常是建筑在低洼的大坑里，一般说来很像新城。北明翰铁路穿过的那一片地方，房屋盖得最密，因而也比其余的地方更糟。梅德洛克河在这里蜿蜒曲折地流过一个在某些地方可以和艾尔克河河谷相提并论的河谷。河水也是漆黑的，停滞的，而且发出臭味，

在这条小河两旁，从它流入城市起到它和艾尔威尔河合流为止，是一条宽阔的工厂和工人住宅地带；工人住宅的情况是非常恶劣的。这里的河岸大部分是陡峭的，房屋一直建筑到河边，和我们在艾尔克河沿岸看到的完全一样；房屋和街道的规划无论是在曼彻斯特方面的，或是在阿德威克、却尔顿和休尔姆方面的，都同样糟糕。但是最可怕的地方——假若我对每个地方都仔细地一一加以描绘，那就没有个完了——是在曼彻斯特这边，在牛津路西南，叫做小爱尔兰（Little Ireland）。在梅德洛克河的一个河湾里，有一块相当深的凹地，四周都是很高的工厂、很高的河堤和盖了房子的河岸。在这块凹地里，密集着两片小宅子，共有两百所左右，大部分都是两所共用一堵后墙，一共约有4000人住在这里，几乎全是爱尔兰人。小宅子都很破旧，肮脏，小得不能再小；街道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大部分没有铺砌，也没有污水沟。到处都是死水洼，高高地堆积在这些死水洼之间的一堆堆的垃圾、废弃物和令人作呕的脏东西不断地发散出臭味来染污四周的空气，而这里的空气由于成打的工厂烟囱冒着黑烟，本来就够污浊沉闷的了。妇女和孩子们到处走来走去，穿得破破烂烂，就像在这里的垃圾堆和烂泥坑里打滚的猪一样地肮脏。总之，这个地方看上去是这样讨厌，这样不顺眼，就是艾尔克河沿岸最坏的大杂院也不至于如此。在这种半倒塌的小宅子里，在蒙上一层油布的破窗后面，在门框已经半腐朽了的裂开的门后面或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在这种难以想像的肮脏恶臭的环境中，在这种似乎是被故意毒化了的空气中，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们，的确不能不下降到人类的最低阶段，——任何人只要看一看这个区域的外表，都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做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如果又听说，这些最多包括两间屋子、一间阁

楼有时再加上一间地下室的小破房子，平均每幢要住上20个人；听说在这个区域里，大约每120人才有一个厕所（不用说，这厕所多半也是根本不能使用的）；听说不管医生们如何进行宣传，不管卫生警察在霍乱流行时就小爱尔兰的状况怎样发出警报，现在，在1844年，小爱尔兰的状况还是和1831年完全一样，听到这些话，他会说些什么呢？——凯博士说[一]，在这个区域里，不仅是地下室，甚至所有房屋的第一层也都是潮湿的；过去有许多地下室曾经用泥土填掉，但现在渐渐又被挖开，住上爱尔兰人；在一个地下室里，因为它的地面比河面还低，水经常从一个用粘土封住的窟窿渗入屋内，住在里面的一个手工织工每天清早都必须把水舀出，倒到街上去！

稍稍往下，在梅德洛克河左岸，是休尔姆，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大的工人区，情形和安柯茨几乎毫无区别。在建筑物比较密集的区域，房屋比较坏，而且都快要倒塌了，在居民比较少的地方，建筑物比较新，空气也比较流通，但大部分都淹没在肮脏里面。而且无论在哪里，房屋总是在潮湿的地方，无论在哪里，都有住人的地下室和弄堂。梅德洛克河对岸，曼彻斯特本城，是第二个大的工人区，它沿着第恩斯盖特街两旁一直伸展到商业区域，在许多地方都丝毫不亚于旧城。特别是在紧靠着商业区的地方，在桥街和码头街之间，公主街和彼得街之间，建筑物密集的情况在许多地方都要超过旧城中最狭小的大杂院。这里有许多狭长的胡同，这些胡同之间是狭小的、角落很多的大杂院和过道，它们的出入口是这样紊乱，如果不熟悉这个迷宫中的每一条过道和每一个大杂院，那就每一分

[一] 见前面引用过的凯博士的著作。——恩格斯原注

钟都有走入死胡同或走到完全没有打算去的地方的危险。据凯博士说，住在这个拥挤、破落而肮脏的区域里的，是曼彻斯特居民中最堕落的一部分人，这些人的职业就是盗窃或卖淫；这种说法在今天显然还是正确的。在1831年，卫生警察曾来到这里，发现这里和艾尔克河沿岸或小爱尔兰一样脏（我可以证明，目前的情况并不见得好多少）；此外还发现，在议会街，每380人才有一个厕所，而在议会道，每三十幢住满了人的房子才有一个厕所。

过了艾尔威尔河，在这条河所形成的一个半岛上，我们可以看到有8万居民的索尔福城，这里实质上是一个工人区，只有一条独一无二的大街横贯其中。曾经有一个时候，索尔福比曼彻斯特更为重要，是四周各个区域（Salford Hundred——索尔福群城）的中心，这些区域直到现在还叫这个名字。所以这里也有一个相当古老的、因而直到现在还是肮脏而破落的、非常不卫生的地区；这个地区位于曼彻斯特老教堂对面，情况之糟和艾尔威尔河对岸的旧城完全一样。离河稍远一点的地方是一个比较新的地区，但是也已经超过了四十年，因而也是够破的。整个城市都是由大杂院和狭窄的小胡同所组成的，这些小胡同狭窄的程度，使我想起我过去看到过的最狭窄的街道——热那亚的狭窄的小街。在建筑方式上，索尔福比曼彻斯特还要坏得多，在清洁方面也是这样。在曼彻斯特，警察间或（每隔六年到十年）还到工人区去一次，封闭一些最坏的住宅，强迫人们把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中最脏的地方打扫一下，而在索尔福，警察显然是从来不这样做的。礼拜堂街、格林盖特和砂砾胡同两边的小胡同和大杂院，大概从造好以后一次也没有打扫过。现在，利物浦铁路经由一座高耸着的高架桥通过这些街道的上空，一些最肮脏的角落是消灭掉了，但是这样一来是不

是就好了一些呢?当你乘火车通过这座高架桥的时候,从桥上往下看，还是可以看到相当肮脏相当贫穷的景象；如果不怕麻烦，到这些胡同里逛一下，从洞开的门窗向房屋和地下室里望一下，那就不难相信,索尔福工人住的房屋根本谈不上清洁和舒适。在离索尔福中心较远的地区，在伊斯林顿，在瑞琴特路，在波尔顿铁路后面,都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形。奥尔德菲尔德路和十字胡同之间的雷普街两旁，许多大杂院和小胡同是最糟糕的，这个地区的工人住宅就肮脏和拥挤而论都可以和曼彻斯特的旧城媲美。在这个地方，我遇到一个人，看样子已经六十来岁，住在一个牛棚里；在这个没有窗子、没有地板、甚至地上什么也没有铺砌的方匣子里，他装了一个像烟筒似的东西，放了一张床，就住在里面，一下雨，雨水就从破烂的屋顶往下漏个不停。这个人已经太老，太衰弱，不能做经常性的工作了；他用手推车搬运粪便等等来维持生活；粪坑就紧靠着他住的牛棚。

我在二十个月的时间内有机会亲身观察到的曼彻斯特各工人区就是如此。如果所我们在这些地方游历的结果概括一下,我们应当说,曼彻斯特及其郊区的35万工人几乎全都是住在恶劣、潮湿而肮脏的小宅子里,而这些小宅子所在的街道又多半是极其糟糕极不清洁的,建造时一点也没有考虑到空气是否流通,所考虑的只是业主的巨额利润。总之,在曼彻斯特的工人小宅子里,既不可能保持清洁,也不可能有什么设备,因而也就谈不上家庭乐趣;在这些住宅里,只有那些日益退化的、在肉体上已经堕落的、失去人性的、在智力上和道德上已经沦为禽兽的人们才会感到舒适而有乐趣。并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说;我们已经看到凯博士也做了同样的描述。我再引证一个自由党人,厂主们所公认、所推崇的权威，一切独立

的工人运动的死敌西尼耳　先生的话来做补充。他说：

“当我参观爱尔兰城、安柯茨和小爱尔兰工厂工人的住宅时，使我感到惊奇的只是在这样的住宅里竟能保持一个勉强过得去的健康水平。这些城市——就面积的大小和人口的数目来说，这都是些道地的城市——在建造的时候，除了从事投机的业主的直接利益，就什么也没有考虑到。木作老板和建筑公司老板合买（亦即租若干年）[①]若干地皮，在那上面盖上所谓的房子。在一个地方，我们看到一整条街都是沿着弯弯曲曲的沟建造起来的，因为这样一来，不用另外花钱挖土就可以得到较深的地下室，而这种地下室并不是用来做储藏室或仓库，而是用来给人住的。**这条街上没有一所房子逃过霍乱的肆虐**。这些郊区的街道通常都是没有铺砌过的，街心是一堆一堆的粪便，一滩一滩的死水；房屋是背靠背地建筑起来的，两所房屋共用一堵后墙，没有通风和排水的设备，整家整家的人都挤在地下室或阁楼的一个角落里。”

我在前面已经谈到曼彻斯特闹霍乱时卫生警察所表现的那种异乎寻常的积极性。当这种流行病到来的时候，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全都惊慌起来。他们忽然想起了穷人的那些不卫生的住宅，而且一想到每一个贫民窟都会成为传染病的大本营，瘟疫会从那里向四面八方传播，会侵入有产阶级的住宅，就吓得发起抖来。于是立刻委派了一个卫生委员会来调查这些区域，并且要它就这些区域的情况向市参议会做确切的报告。作为该委员会委员之一并特地调查了每一个警政区（第十一区除外）的凯博士从委员会的报告中摘出了几段。总共检查了6951所房子——当然只是在曼彻斯特**本城**，索尔福及其他郊区都不在内；其中2565所极需在内部加以粉刷，

纳骚·威·西尼耳“就工厂法问题给商业大臣（查理·波立特·汤姆生阁下）的信”1837年伦敦版第24页（Nassau W. Senior.《Letters on the Factory Act to the Rt. Hon. th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Trade（Chas. Pou-lett Thomson Esq.)》. London, 1837, p. 24）。——恩格斯原注

①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960所没有及时地做过必要的修理（were out of repair），939所没有足够的污水沟，1435所是潮湿的，452所通风不良，2221所没有厕所。在经过调查的687条街道中，248条没有铺砌，53条只是部分地铺砌过，112条通风不良，352条街道上都有死水洼、成堆的脏东西、废弃物等等。——不用说，要在霍乱到来以前把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打扫干净，那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只打扫了几个最坏的角落就算了，其余的仍然保持原状。自然，那些清扫过的地方过一两个月就又变得和从前一样脏了，小爱尔兰就是一个例子。至于这些房屋内部的情形，该委员会所报道的，和我们所听到的伦敦、爱丁堡从其他城市的情形是一样的。

“往往是整家的爱尔兰人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往往是一堆肮脏的麦秸和一条用旧麻袋做成的被单就当做全家共用的被褥。这种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都由于贫穷、迟钝和放荡而堕落下去。调查人员常常在一幢只有两间屋子的房子里发现两家人；一间是大家睡觉的，另一间用做公共的饭厅和厨房；常常甚至是几家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地下室里，在这种乌烟瘴气的空气里挤着12—16个人。除了诸如此类的传染病来源，还要加上在屋子里养猪以及其他脏得令人作呕的事情。”㊀

这里还必须补充的，是很多只住着一间屋子的家庭为了收取一定的费用还接纳一些搭伙食的和寄宿的人，这些寄宿者甚至往往不分男女和屋主全家同睡在一张铺上。例如“工人阶级卫生状况报告”就认定丈夫同妻子和成年的小姨子睡在一张床上的事，在曼彻斯特就至少有六起。普通的夜店在这里也很多。据凯博士统计，这种夜店1831年在曼彻斯特本城有267个，从那时起，一定又增加了很多。每一个夜店容纳二三十个人，所以这些夜店每夜总共要住

㊀ 见前面引用过的凯博士的著作第32页。——恩格斯原注

5000人到7000人。这些房屋和它们的老主顾的特点也和其他城市中的一样。每一间屋子里都没有床，只是在地上铺上五张到七张铺，不管投宿的人有多少都统统安插在这上面，大家乱七八糟地睡在一起，在这些罪恶的渊薮里笼罩着什么样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气氛，是用不着我来说的。每一幢这样的房屋都是犯罪的中心，也是干各种令人发指的事情的场所。如果不是这样强制着把各种恶行集中在一起，这些事情也许永远不会发生。——据**盖斯克尔**㊀统计，仅仅曼彻斯特本城就有两万人住在地下室里。而“每周快讯”杂志“根据官方的报告”提出的数字，是全体工人的12%，这和盖斯克尔提出的数字大致相符，——工人的总数是175000，12%就是21000人。在曼彻斯特的郊区，住人的地下室**至少**也和曼彻斯特本城一样多，所以在整个曼彻斯特，连同郊区在内，住地下室的人共有四五万。大城市里的工人住宅就是如此。如何满足住屋的需要，是可以当做一个尺度来衡量工人其余的一切

㊀ 彼·盖斯克尔“英国的工业居民，他们的道德、社会和身体的状况，以及因使用蒸汽机而引起的变化；附童工劳动调查“1833年“正义得伸”出版社版（P.Gas— kell.《The Manufacturing Population of England, its Moral, Soci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 and the Changes, which have arisen from the Use of Steam— Machinery.With an Examination of Infant Labour》.《Fiat Justitia》.—1833）。这一著作主要是描写郎卡郡的工人状况。作者是自由党人，但在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一般还并不认为自由党人必须歌颂工人的“幸福”。因此，他还能公正而清楚地看出现状的、特别是工厂制度的坏的方面。但同时他这本书是在工厂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以前写的，而且从不可靠的材料中引用了一些论断，这些论断是后来被委员会的报告所推翻了的论断。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作者像凯博士一样把一般工人阶级和特殊的工厂工人混淆在一起，所以这一著作整个说来虽然是好的，但在引用时，对于个别的细节还须谨慎。我们在“导言”中所叙述的无产阶级发展史，主要是以这一著作中的材料为根据。——恩格斯原注

需要是如何满足的。不难想像，在这些肮脏的洞穴里只有那些穿得很破、吃得很坏的人才能住下去。而实际情形也正是如此。绝大多数工人都穿得很坏。用来做衣服的料子都是非常不合适的，无论是在女人的衣橱里或男人的衣橱里，都几乎根本没有亚麻布和毛织品，只有棉织品。衬衫是用漂白布或是杂色的印花布做的，女人的衣服大部分也是印花布做的，毛织品的裙子很少能在晒衣服的绳子上看到。男人们大都穿着粗布及其他粗棉织品做的裤子和同样的料子做的上衣或夹克。粗布（fustian）甚至成了工人服装这个名词的同义语，工人被叫做 fustian— jackets〔粗布夹克〕，而工人也这样称呼自己，借以和那些穿呢子（broad— cloth）的老爷们相区别，而呢子也就成了资产者的标志。宪章派的领袖菲格斯·奥康瑙尔在1842年起义时来到曼彻斯特，他穿着一套粗布衣服在工人的热烈欢呼声中出现在他们面前。在英国，即使是工人也都戴礼帽，礼帽有各种样式，有圆形的，有圆锥形的或圆柱形的，有宽边的，有窄边的或根本没有边的，只有工厂城市里的年轻人才戴便帽。没有礼帽的人就用纸做一顶四方形的矮帽子戴在头上。工人的全部服装，即使都是完好的，也很少能适应气候。英国气候潮湿，天气变化无常，这比什么都容易引起感冒，因此，几乎整个有产阶级都穿法兰绒的内衣；法兰绒的护胸、紧身和兜肚很多人都用。工人不仅不可能采取这种预防办法，而且一般都几乎永远做不起一件毛织品的衣服。粗棉织品虽然比毛织品厚、硬而且重，但在御寒和防湿方面是远不及毛织品的，而且由于厚，由于材料本身的特性，一湿就不容易干，而且无论如何没有像呢子之类的毛织品那样密实。如果工人居然有这么一天能够买一件毛织品的上衣预备星期天穿，那只有到“廉价商店”里去买，他在那里买到的是一种很坏的所谓《devil’s dust》[一]，这种料

子制造出来“只是为了出售，而不是为了给人穿的”，只要穿上两个星期就裂了缝或是磨穿了；要不然就是在旧货商那里买一件穿旧了的上衣，这种衣服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再穿上几个星期就完了。但是大多数人的衣服本来就不好，而且还得常常把比较好的衣服送到当铺里去。很多很多工人，特别是爱尔兰人，他们的衣服简直就是一些破布，上面往往连再打一个补丁的地方都没有了，不然就是补丁连补丁，连原来的颜色都认不出来了。英格兰人或英爱混血人居然想出办法来缝补这样的衣服，而且他们在这方面的技巧确实是惊人的：他们毫不费力地把呢子补丁或麻布补丁补在粗布上，或是把粗布补在呢子和麻布上，但是不久以前才迁来的真正的爱尔兰人却几乎从来不缝补他们的衣服，除非是万不得已，即当它有破成几块的危险的时候才缝补一下。衬衣的破布通常总是从上衣或裤子上的窟窿里拖到外面来。正如托马斯·卡莱尔㊁所说的，爱尔兰人穿的是

“一身破烂的衣服，这种衣服脱下和穿上都十分困难，只有在节日或特别隆重的场合才这样做”。

爱尔兰人还带来了英格兰从前所没有的赤脚走路的习惯。现在，在一切工厂城市里都可以看到很多人，特别是妇女和小孩赤着脚走来走去，这种习惯在最贫穷的英格兰人中间也逐渐流行起来了。

㊀ 直译是“魔鬼的灰尘”，这是一种用旧毛织品经过开毛机（这种机器在英语中叫做 devil）加工而制成的料子。——编者注

㊁ 托马斯·卡莱尔“宪章运动”1840年伦敦版第28页（Thomas Carlyle.《Chartism》. London，1840，p. 28）。关于托马斯·卡莱尔下面还要谈到。——恩格斯原注

饮食状况也和衣着一样，工人所得到的都是有产阶级认为太坏的东西。在英国的大城市里，各种最好的东西都可以买到，但是价钱很高；而工人必须用他那不多的几文钱来养家，他们是花不起这样多的钱的。加之工人一般都是在星期六晚间才领到工资，——不错，有些地方星期五就发了，但是这个很好的办法还远没有普遍实行起来。所以工人要到星期六下午四点、五点或七点钟才能上市场去，而资产阶级在上午老早就把最好的东西挑走了。早晨市场上有的是最好的食品，但是等到工人来的时候，最好的东西都卖光了，即使还剩下一些较好的，工人大概也买不起。工人买的土豆多半都是质量很差的，蔬菜也不新鲜，干酪是质量很坏的陈货，猪板油导发臭的，肉又瘦，又陈，又硬，都是老畜的肉，甚至常常是病畜或死畜的肉，往往已经半腐烂了。做工人的生意的多半是些小商贩。他们收买次货，而且正因为是次货，所以才能够卖得这样便宜。最贫穷的工人为了用不多的钱买必需的食品，哪怕是买质量很差的食品，也还不得不采取一种特殊的办法：因为星期六晚上十二点钟所有的商店都要关门，而星期日又完全停市，所以在十点到十二点的时候商店就把那些不能保存到星期一的货物以想像不到的贱价出卖。但是，这些到晚上十点钟还没有卖出去的东西，十分之九到星期日早晨就不能吃了，而最贫穷的阶级星期日的餐桌正是用这些东西点缀起来的。工人们买到的肉常常是不能吃的，但是既然买来了，也就只好把它吃掉。1844年1月6日（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曼彻斯特有十一个肉商因出售不能吃的肉，被地方法庭（court leet）处以罚款。其中一个有一整头牛；一个有一整口猪；一个有几只羊；一个有五六十磅牛肉；所有这些东西都已经根本不能食用了，因而全被没收。在这些肉商里面，有一个被没收了六十四

只肚子里填满了馅的圣诞节吃的鹅，这些鹅没有及时在利物浦卖出去，因此就运到曼彻斯特来，在这里的市场上摆出来的时候已经腐烂了，发散着强烈的臭气。这件事情的全部经过当时曾登载于“曼彻斯特卫报”[102]，而且提到了当事人的姓名和罚款的数目。在7月1日至8月14日这六个星期中，该报还报道了三件类似的案子。据7月3日该报报道，在海华德没收了一只200磅重的猪，肉商发现这只猪已经死掉而且甚至已经腐烂了，可是还把它切成块拿出去卖。据7月31日该报报道，威根有两个肉商因出卖不能吃的肉被分别处以2英镑和4英镑的罚款，而其中的一个已经不是初犯了。最后，据8月10日该报报道，波尔顿的一个小商人有二十六只不能吃的火腿被没收，并且被当众焚毁，这个商人被处以20先令的罚款。但是这里所举出来的还远不是所发生的事情的全部，并且不能把这些事情看做六个星期的平均数，也不能根据这个数字推算出一年的平均数来。有一个时期，这个每周出版两次的“曼彻斯特卫报”每一号都报道了曼彻斯特或邻近的工厂城市中所发生的这类案件。这里应该记住一点：由于市场的范围很大，所有的大街两旁都是市场，并且由于市场监察员监督不严，许多事情都逃过了他们的眼睛，——要不是这样，那又怎样解释肉商肆无忌惮地把已经发臭的整头整头的牲畜拿来出售的事情呢？只要注意一下，在罚款像上面讲的那样微不足道的场合下，这种勾当对小商人的诱惑力是多么大，只要想一下，什么样子的肉才被监察员认为完全不能吃而加以没收，那就决不会相信工人平常所弄到的肉都是质量好的和有营养的。但是资产阶级的贪婪还要使他们在其他方面吃苦头。商人和厂主昧着良心在所有的食品里面掺假，丝毫不顾及消费者的健康。上面我们引证了“曼彻斯特卫报”，现在听一听另外一

家资产阶级报纸，—— 我是喜欢拉反对者来做证人的，—— 听一听“利物浦信使报”是怎样说的吧。

“把咸黄油冒充新鲜的出售，不是在一块块的咸黄油上涂上一层新鲜的黄油，就是把1磅新鲜的黄油放在上面让人先尝一尝，在尝过以后却把咸的卖出去，或者洗掉盐再把黄油当做新鲜的出售。糖里面掺上米粉或其他价钱便宜的东西，照净糖的价钱出卖。制肥皂时剩下的废弃物也掺上别的东西冒充糖卖。咖啡粉里面擦上菊苣及其他价钱便宜的东西；甚至没有磨过的咖啡里也掺假，而且假货还真像咖啡豆。可可里面常掺有捣得很细的褐色粘土，这种粘土是用羊脂油搓过的，掺在真的可可里简直看不出是假的。茶叶里面往往掺上黄荆叶子及其他类似的杂物，或者把泡过的茶叶晒干，放在烧热的铜片上烘烤，使它恢复原来的颜色，然后当做好茶叶出卖。胡椒里掺上豆荚磨成的粉末及其他东西。葡萄牙红葡萄酒干脆就是假造的（用颜料、酒精等制成），因为人家都知道，单是在英国喝掉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就比整个葡萄牙所生产的还要多。在市面上行销的各种各样的烟草里都掺上了各种令人作呕的东西。”

（在这里我还可以补充几句，由于烟草普遍地掺假，去年夏天曼彻斯特某几个最著名的烟草商人曾公开地说，要是不掺假，他们的生意就无法做下去，价钱在3辨士以下的雪茄烟，没有一枝完全是用烟叶制成的。）像这种掺假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出几打来，把石膏粉或白垩掺在面粉里，就是其中常见的一种卑鄙行为。当然，事情并不仅仅限于食品掺假。到处都有骗局：把法兰绒、袜子等等拉长，叫人看起来好像长一些，只要洗一洗马上就缩短；比规格窄1．5英寸或3英寸的呢子被当做宽的卖出去；磁器上的釉薄得一到手就裂开了，这类骗人的事情还可以举出几千件来。—— Tout comme chez nous〔和我们那里完全一样〕。但是吃这些骗局的苦头最深的，除了工人还有谁呢？有钱人不会受骗，因为他可以多花些钱到大商店里去买东西。大商店的老板是珍惜自己的声誉的，假如

他们出售劣等的掺假的货物，最吃亏的还是他们自己。此外，有钱人在吃的上面很讲究，他们的味觉很灵敏，比较容易识破骗局。但是穷人即工人每花一文钱都得盘算一下，必须以不多的钱买很多的东西，他们不能太注意质量，而且也不善于这样做，因为他们没有机会锻炼自己的味觉，结果，所有这些掺假的、甚至常常是有毒的食物都卖给了他们。他们不得不到小商人那里去买，甚至还常常要赊账。而这些小商人由于本钱小，营业费用大，一样的货色却不能橡大零售商卖得那样便宜；而人们要求他们的却是价格低廉，再加上别人的竞争，于是他们就只好有意无意地备办掺假的货物了。此外，大零售商在自己的买卖里投下了大宗资本，骗局一旦被识破，就要丧失信用，遭受破产，可是小店主的营业面不出一条街，如果他的骗人的伎俩被揭穿了，那他会失掉些什么呢?要是他在安柯莰再也得不到信任，他可以搬到却尔顿或休尔姆去，那里谁也不知道他，他又可以重施他的欺骗伎俩了。掺假的行为除非和漏税有关，是很少受到法律追究的。—— 但是，英国工人不仅在物品的质的方面受骗，而且在量的方面也受骗。小商人的尺和秤大部分是不合规定的。在警察局的报告里，因犯了这类罪而被处以罚款的事情，每天都多得难以置信。从下面几段摘自“曼彻斯特卫报”的话就可以看出，这类骗人的事情在工厂区是如何普遍；这里所涉及的只是短短的一段时间，而且我手边就连这一个时期的报纸也不全。

1844年6月16日“卫报”。**罗契得尔**法庭开庭。四个小商人因使用重量不足的砝码被判处5先令到10先令的罚款。——**斯托克波尔特**法庭开庭。两个小商人各被判处罚款1先令。其中一个有重量不足的砝码7枚和不合规定的秤一具；两个人以前都受过

警告。

6月19日 “卫报”。**罗契得尔**法庭开庭。一个小商人被判处罚款5先令；两个农民被判处罚款10先令。

6月22日 “卫报”。**曼彻斯特**治安法官判处十九个小商人$2^1/_2$先令到2英镑的罚款。

6月26日 “卫报”。**埃士顿**法庭开庭。十四个小商人和农民被判处$2^1/_2$先令到1英镑的罚款。——**海德**低级法庭判处九个农民和小商人5先令罚款，并缴纳讼费。

7月9日 “卫报”。**曼彻斯特**有十六个小商人被判决缴纳讼费并且被处以10先令以下的罚款。

7月13日 “卫报”。**曼彻斯特**有九个小商人被处以$2^1/_2$先令到20先令的罚款。

7月24日 “卫报”。**罗契得尔**有四个小商人被处以$2^1/_2$先令到20先令的罚款。

7月27日“卫报”。**波尔顿**有十二个小商人和小饭馆老板被判决缴纳讼费。

8月3日 “卫报”。**波尔顿**有三个小商人被处以$2^1/_2$先令到5先令的罚款。

8月10日 “卫报”。**波尔顿**有一个小商人被处以5先令的罚款。

在物品的质的方面受骗的主要是工人，而由于同样的原因，在量的方面受骗的也是他们。

每个工人平常的饮食当然是随着工资变化的。工资较多的工人，特别是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挣一点钱的那些工厂工人，在大家都有工作的时候，就吃得好：饭桌上每天都有肉，晚上还有猪板油

和干酪。如果挣钱较少，那就只有每逢星期日吃一次肉，或者一星期吃两三次，而面包和土豆就要吃得多些。如果挣钱更少，肉食就减少到只有切成小片夹在土豆里的一点点猪板油；挣钱再少的，那就连这一点点猪板油也没有了，只有干酪、面包、燕麦粥(porridge)和土豆；最后，在工资最低的工人中，即在爱尔兰人中，土豆就成了唯一的食物。此外，一般都喝点淡茶，茶里面有时放一点糖、牛奶或烧酒。在英国，甚至在爱尔兰，茶被看做一种极其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饮料，就像咖啡在我们德国一样。喝不起茶的，总是极端贫苦的人家。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工人得有工作做。如果他没有工作，那就只好碰运气了，别人给他什么，他讨到什么，或者偷得什么，他就吃什么。如果他什么也弄不到，那就只好饿死，就像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不用说，食物的量也和它的质一样，是由工资决定的，工资少的工人，特别是如果他们还有一大家人，那末即使是在有工作的时候，也要常常挨饿。而这些工资少的工人，数目是很大的。特别是在伦敦，工人的竞争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日益剧烈，这一部分工人的数目是很多的，但是在其他一切城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想尽了一切办法，而由于没有别的食物，就吃土豆皮、菜帮和烂水果 ，贪婪地抓起一切即使只含有一丝一毫养料的东西。如果一个星期的工资不到周末就花光了，那末常常就是一家人在一星期的最后几天完全吃不到东西，或者只能吃到为了免于饿死所必需的那一点点。这种生活方式自然会引起很多疾病。只要疾病一发生，特别是家庭的主要供养者男人一病倒(由于他紧张地劳动，需要食物最

“每周快讯”1844年4月号或5月号所登载的萨斯伍德・斯密斯博士关于伦敦贫民状况的报告。—— 恩格斯原注

多,所以第一个病倒的总是他),缺吃少穿的情况就特别严重起来,社会的残酷性也特别鲜明地暴露出来:社会正是在自己的成员最需要它援助的时候抛弃了他们,让他们去受命运的摆布。

最后,我们用不多的几句话把本章中所叙述的事实再概括地说一说。大城市里住的主要是工人,资产者和工人的比例至多是一比二,常常是一比三,有些地方是一比四。这些工人根本没有什么财产,全靠工资过活,工资几乎总是只够勉强糊口。这个一盘散沙的社会根本不关心他们,让他们自己去养家活口,但是又不给他们能够长期维持正常生活的手段。因此,每一个工人,即使是最好的工人,也总有可能失业,因而就有可能饿死,确实也有许多人饿死了。工人住宅到处都规划得不好,建筑得不好,保养得不好,通风也不好,潮湿而对健康有害。住户住得拥挤不堪,在大多数场合下是一间屋子至少住一整家人。至于屋子里有多少家具,那就随贫穷的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最穷的连最必需的家具都没有。工人的衣服一般也是很糟糕的,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些破衣褴衫。食物一般都很坏,往往是几乎不能入口的,在许多场合下,至少是有时候,在量方面也不足,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就会饿死人。—— 这样,大城市里工人阶级的状况就表现为一个逐渐下降的阶梯:最好的情况是生活暂时还过得去,靠紧张的工作而挣得的工资也比较多,住的房子也不错,饮食一般还不算坏—— 说这一切是好的,过得去的,自然是从工人的眼光来看;最坏的情况是极端的贫困,直到无家可归和饿死的地步;但是一般说来,是更多地接近于最坏的情况,而不是接近于最好的情况。同时,并不是某一类工人就固定在这个阶梯的某一级上,不能说这一类工人生活得好,那一类生活得坏,更不能说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还是这样。不,就算有些地方是

这样，就算某些工作部门大体上优越于其他工作部门，但是每一个部门里工人的状况仍然是极不稳定的，每一个工人都有可能通过这一整个阶梯，从相对的舒适转到极端的贫困，甚而至于饿死；几乎每一个英国无产者都能滔滔不绝地叙述他一生所遭受的不幸。我们现在就来更详细地研究一下这方面的原因。

竞　　争

我们在“导言”里已经看到，竞争怎样在工业发展一开始的时候就创造了无产阶级：由于布匹的需求增加，织工的工资提高了，兼做织工的农民抛弃了农业，以便在织机上赚到更多的钱。我们已经看到，竞争怎样以大规模经营方式挤掉了小农，把他们降到无产者的地位，然后把他们一批一批地赶到城市里面去。我们也看到，竞争怎样使相当大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陷于破产，把他们也变为无产阶级；竞争怎样把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怎样把人口集中在大城市里面。在现代工业中获得充分发展并能使自己的一切后果无限加深的竞争，就是通过这些途径和方法创造了无产阶级并扩大了它的队伍。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竞争对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所发生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应当首先考察一下工人彼此间的竞争所产生的后果。

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个战争，这个为了活命、为了生存、为了一切而进行的战争，因而必要时也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仅在社会各个阶级之间进行，而且也在这些阶级的各个成员之间进行；一个人挡着另一个人的路，因而每一个人都力图挤掉其余的人并占有他们的位置。工人彼此竞争，资产者也彼此竞争。机器织工和手工织工竞争；失业的或工资低的手工织工和其他有工作的或工资高的织

工竞争，并力图把他们挤掉。工人彼此间的这种竞争对于工人来说是现代各种关系中最坏的一面；这是资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的最有力的武器。因此，工人竭力利用工会来消灭这种竞争，而资产阶级则疯狂地向这些工会进攻，工会每受到一次打击他们都拍手称快。

无产者是无助的。他们要是只靠自己，那连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垄断了一切生活资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无产者所需要的一切都只能从这个资产阶级（它的垄断是受到国家政权保护的）那里得到。所以，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它给他们生活资料，但是取回“等价物”，即他们的劳动。它甚至使他们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似乎他们是作为一个自主的人自由地、不受任何强制地和资产阶级签订合同的。好一个自由！无产者除了接受资产阶级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或者饿死、冻死、赤身露体地到森林中的野兽那里去找一个藏身之所，就再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好一个“等价物”！它的大小是完全由资产阶级任意规定的。而如果有这么一个无产者，竟愚蠢得宁愿饿死，也不接受资产者——他的**“天然的长上”**㊀——的“公道的”条件，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很容易找到其他的人，因为世界上无产者有的是，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愚蠢得宁愿死而不愿活下去。

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就是如此。要是**所有的**无产者都一致宣布，他们宁肯饿死也不给资产阶级工作，那末资产阶级就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垄断。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事情，而且也未必能有这样的

㊀ 这是英国厂主的惯用语。——恩格斯原注

事情，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事业到底还进行得不坏的原因。工人之间的这种竞争只有一个限度：没有一个工人会为了少于自己生存所必需的工资而工作。如果他非饿死不可，那末他宁愿懒懒散散地死去，也不愿忙忙碌碌地死去。当然，这个限度是相对的，为了生存，有的人需要多一些，有的人需要少一些，有的人比别人更习惯于舒适的生活。在某些方面还算比较有点文化的英格兰人所需要的，就比穿破衣、吃土豆、住猪圈的爱尔兰人多一些。但是这并不妨碍爱尔兰人去和英格兰人竞争，也不妨碍把英格兰工人的工资及其文化程度逐渐降低到爱尔兰工人的水平。做某些工作，几乎包括工业中的一切工作在内，都需要有相当的文化程度。因此，即使为了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工资也必须达到一定的高度，使工人能保持这种水平。刚迁到英格兰来的爱尔兰人在随便哪一个猪圈里都可以住下来，他们每星期都会从稍稍像样一点的住宅里被赶出来，因为他们把什么东西都拿去喝了酒，付不起房租，像这样的人到工厂里做工一定是很蹩脚的。因此，给工厂工人的工钱应该够他们教育自己的子女，使他们的子女习惯于正规的劳动；但是，为了使他们没有孩子的工资就不能过活，使他们只能让自己的孩子成为普通的工人而不成为其他的人，工资也决不能太多。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的最低限度也是相对的：如果家庭中的一切成员都在工作，那末每一个人就可以相应地少领一些工资，于是资产阶级就广泛地利用机器劳动所提供的有利条件（采用了机器劳动，雇用女工和童工进行生产就很合算）来降低工资。当然，有的家庭并不是每个成员都能工作；这样的家庭，如果工作的人只能挣到根据全家都能工作的情况而定出来的最低工资，那日子一定过得很苦。因此，我们就得出了一种平均工资，在这种工资标准下，全家都能工

作的家庭就生活得相当好，而能工作的成员较少的家庭就生活得相当坏。但是，在最坏的情况下每个工人都情愿放弃他已经习惯了的那一点点舒适和文明，只要能勉勉强强地生活下去就行。他住猪圈也可以，只要不住在露天底下；穿得破破烂烂也可以，只要不赤身露体；吃土豆也可以，只要不挨饿。工人情愿只拿一半工资，等待着好日子到来，但是不愿像很多失业者那样饿死在街头。这一点点东西，这一点聊胜于无的东西，就是最低工资。如果工人比资产者所需要的多，因而在竞争斗争结束时还有一些工人找不到工作，那末他们就只好饿死。要知道，资产者要是不能从出卖他们的劳动产品得到利益，当然就不会给他们工作。

从上面所说的一切可以看到什么是最低工资。而最高工资则决定于资产者之间的竞争，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也是在竞争着的。资产者只能靠商业或工业来扩大自己的资本，在这两方面他都需要工人。即使他把自己的资本放出去生利，他也间接地需要工人，因为，假若没有商业和工业，谁也不会付给他利息，谁也不能使用他的资本。可见资产者总是需要无产者的，但是他之需要他们，并不是直接为了生活（要知道，他可以吃光自己的资本），而是为了发财，就像做买卖需要货物，驮东西需要牲口一样。无产者给资产者制造商品，资产者把它卖掉就可以赚钱。因此，当这些商品的需求增加，因而彼此竞争的工人全都有了工作，或许甚至还不大够的时候，工人间的竞争就会停止，资产者之间的竞争就开始了。寻找工人的资本家知道得很清楚，由于需求增加而日益上涨的价格可以使他获得巨大的利润。因此，他宁愿稍稍增加一些工资，也不愿放过全部利润。他为了赢得火腿，可以给工人香肠。这样，资本家互相争夺工人，工资就上升起来。但是它也只能上升到已经增

加的需求所容许的程度。资本家可以牺牲一些非常的利润，但是当他必须牺牲自己的通常的利润即平均利润的时候，他就会想办法不付那超过平均工资的工资了。

从这里就可以确定什么是平均工资。在平常的情况下，即在工人和资本家都没有理由在自己人中间展开特别激烈的竞争的时候，在现有的工人人数和制造社会需要的商品所能用的工人人数**恰好相等**的时候，工资就保持在比最低工资稍稍高一点的水平上。至于比最低工资高多少，那就要看工人的平均需要和文化程度如何了。如果工人习惯于每星期吃几次肉，资本家就只好付给工人足够的工资，使他能吃到肉。这种工资不能再少，因为工人之间没有竞争，他们没有理由满足于较少的工资；这种工资也不会再多，因为在资本家之间没有竞争的时候，他们也没有理由用特殊的恩惠来拉拢工人。

由于现代英国工业很复杂，工人在需要和文化方面的平均水平很难确定，而且我们已经知道，不同种类的工人的平均水平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工业中的大多数工作都需要一定的技能和常规性，而要达到这一点就要求工人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所以平均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能够鼓励工人去获得这种技能并在工作中服从这种常规性。正因为如此，产业工人的工资平均高于普通的搬运工人、短工等等的工资，特别是高于农业工人的工资，而后一种情况当然还说明了城市中食品价格的高昂。

换句话说，工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有产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奴隶。他们竟可以像商品一样地被卖掉，像商品一样地涨价跌价。如果对工人的需求增加，他们的价格也就上涨；如果需求减少，价格也就下跌；如果对工人的需求下降，有一定数目的工人找不到

买主因而“成了存货”，那末他们就只好闲着不做事，而不做事是不能生活下去的，所以他们只好饿死。用政治经济学上的话来说，用来维持他们的生活的费用不会“再生产出来”了，只会白白花掉，所以谁也不会在这上面投下自己的资本。在这一点上马尔萨斯先生及其人口论是完全对的。这种奴隶制和旧式的公开的奴隶制之间的全部差别仅仅在于现代的工人**似乎是**自由的，因为他不是一次就永远卖掉，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按日、按星期、按年卖掉的，因为不是一个主人把他卖给另一个主人，而是他自己不得不这样出卖自己，因为他不是某一个人的奴隶，而是整个有产阶级的奴隶。对于他，事情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这种表面的自由一方面虽然也一定会给他带来某些**真正的**自由，可是另一方面也有它的坏处，即没有人保障他的生计。他的主人（资产阶级）如果对他的工作、对他的生存不再感到兴趣，就随时可以把他赶出去，让他去饿死。可是，对资产阶级来说，现在的情况比起旧的奴隶制来却是无比地有利：他们可以随便在什么时候辞退自己的工人，同时并不因此使投下的资本受到损失，工人劳动的代价无论如何要比奴隶劳动的代价便宜得多，这是亚当·斯密为了安慰他们而给他们算清了的㊀。

㊀ “人们说，奴隶体力的消耗是由他的主人花钱来补偿的，而自由工人体力的消耗则由自己花钱来补偿。实际上自由工人体力的消耗也是由他的主人花钱来补偿的。短工和仆人等等的工资应当保持一定的高度，以便让他们能够按照社会方面日益增长、保持稳定、或不断降低的需求来延续短工和仆人的后代。但是，如果说自由工人体力的消耗也是由他的主人花钱来补偿的，那末这种消耗比起奴隶体力的消耗来要主人花的钱通常到底是少得多的。用来恢复或补偿奴隶体力的消耗的基金通常是由懒散的主人和漫不经心的监工来管理的”，如此等等（A. Smith.《Wealth of Nations》［亚当·斯密“原富”］麦克库洛赫4卷版第1卷第8节第134页）。——恩格斯原注

因此也可以说，亚当·斯密在另外一个地方所做的论断是完全对的，他说：

> “对工人的需求正如对任何**其他商品**的需求一样，它调节工人的生产，调节所生产出来的人的数量，如果生产进行得太慢，需求就会使它加快，如果生产进行得太快，需求就会使它缓慢下来。”

这种情形和任何其他商品的情形完全一样：如果工人不够，他们的价格（即他们的工资）就上涨，他们就生活得比较好些，结婚的人多起来，出生率逐渐提高，养活的孩子也多起来，直到有了足够的工人为止；如果工人太多，价格就下跌，失业、贫困、饥饿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疾病就都出现了，而疾病就会消灭“过剩人口”。发展了亚当·斯密上述论点的马尔萨斯在断定总有“过剩人口”存在，断定世界上的人总是太多的时候，也是能自圆其说的；只是当他断定世界上的人多于现有生活资料所能养活的人的时候，他就错了。“过剩人口”的产生不如说是由于工人彼此间的竞争，由于迫使每个工人每天都竭尽全力去工作的竞争。假定某个厂主每天可以雇十个工人做九小时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工人每天工作十小时，那末他只要雇九个工人就够了，而第十个人就要没饭吃。在对工人的需求不太大的时候，厂主就可以乘机用解雇的威胁来迫使九个工人拿同样的工资而每天多工作一小时，即工作十小时，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把第十个工人解雇，并把他的工资省下来。在这里小规模地发生的事情，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重演着。由于工人彼此竞争而使每一个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达到最大限度，由于分工，由于机器的应用和自然力的利用，许多工人就没有工作做。市场失去了一批顾客，因为这些失业工人已经什么都买不起了。他们过去所需要的那么多的商品已经不再需要，因而也用

不着再制造了。过去制造这些商品的工人也失了业，市场又失去了一批顾客，事情就这样循环不断地继续下去，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假若没有其他情况插进来的话，事情就会这样继续下去。工业中采用了上面说到的那些可以增加生产的手段，这就逐渐使生产出来的商品价格降低，从而使这些商品的消费量增加，因此，相当大的一部分失业工人终于又在新的劳动部门找到了工作，自然这是经过了长期痛苦的。如果这里再加上英国近六十年来对国外市场的侵占，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工业品的需求的不断的和迅速的增加，那末对工人的需求就增加起来，而人口也以同样的比例随之增加起来。这样，大不列颠的人口并没有减少，而是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起来，并且还继续在增加。虽然工业不断在发展，虽然对工人的需求大体上是在增加，但根据官方各政党（托利党、辉格党和激进党）的供认，英国经常有过剩的无用的人口，而且工人**之间**的竞争一般总是胜过**争夺**工人的竞争的。

这个矛盾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工业和竞争的性质本身以及这种性质所造成的商业危机来的。在目前这种不以直接满足需要为目的而以赚钱为目的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混乱制度下，当每一个人自己冒着风险去工作并使自己发财的时候，停滞现象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例如英国供给许多国家各种各样的商品。即使某个厂主知道某种货物在每一个国家里每年要消费多少，但他究竟不知道这种商品在每一个时间内在那里有多少存货，更不知道他的竞争者往那里运去多少。他只能根据经常波动的价格对现有的存货和需要的情况做出不可靠的推测，所以他只能把自己的商品送出去碰运气。一切都是盲目的，是瞎碰，是或多或少地靠机会的。只要好消息从某个市场传来，每个人就把所有能送出去的东

西都送到那里去。不久，这个市场就充满了商品，销售逐渐停止，现金收不回来，价格日益下降，英国的工业也没有什么工作给自己的工人做了。在工业发展的初期，这种停滞现象只限于个别的工业部门或个别的市场。但是，由于竞争的集中作用，在一个工业部门中失去了工作的工人就投入另一些最容易学会工作的部门中去，而在一个市场上卖不出去的商品就转运到其他市场去；结果，个别的小危机一天天地汇合起来，逐渐形成一连串的定期重演的危机。这种危机通常是每隔五年在一个短短的繁荣和普遍兴旺的时期之后发生。国内市场和一切国外市场都充斥着英国货，这些东西又只能慢慢地消费。工业活动几乎在所有的部门中都逐渐停止下来。小的厂主和商人无力克服资本收不回来的困难，破产了，较大的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也停止了营业，把自己的机器停下来，或者只是“短时间地”开工，就是说，大约只做半天工作。工资由于失业者彼此竞争，由于工作时间缩短，由于出售商品不能获利而日益下降。贫穷在工人中到处蔓延开来，如果某个人还有些积蓄的话，这些积蓄也很快就花光了。慈善机关被围得水泄不通，济贫捐增加1倍、2倍，可是仍然不够，挨饿的人不断地增加，数目惊人的“过剩人口”突然出现了。这样继续了一个时候：“多余的人”勉勉强强地挣扎着活下去，或者有些人挣扎不下去，死掉了；慈善事业和济贫法帮助许多人勉勉强强地延长自己的生存；其余的人在那些竞争不大显著、离开大工业较远的劳动部门中找到了工作，苟延残喘地活下去。一个人为了马马虎虎地维持一个时候所需要的东西是多么少呵！——情况又渐渐地好转起来：积存的商品逐渐消费掉，商人和工业家的普遍的颓丧情绪使这些存货不会很快地得到补充，直到最后，高涨的价格和各方面传来的好消息又使他们重新加紧活动起来。但是

市场大部分都在很远的地方。在新的商品到达那里以前，需求总是在增加，价格也随着上涨。第一批运来的货物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购买，第一批成交的买卖使市场更加活跃起来，以后运来的货物还要看涨。人们怀着这种还会涨价的希望把商品买了囤积起来，这样，本来是供消费用的商品却在最需要的时候从流通中被抽出去。投机更加抬高了市价，因为它鼓励其他的人去购买新到的商品，并把刚运到的商品从流通中夺去。这一切渐渐地传到了英国，厂主又重新开始加紧工作，开办新的工厂，尽一切力量来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于是这里也开始了投机，它的后果也和国外市场上完全一样：物价上涨，商品从流通中被抽出去。这两件事情使生产紧张到极点，于是出现了“根基不稳的”投机家，他们运用虚拟资本，靠信贷来维持，而如果他们不能把买进的商品迅速地转卖出去，那就得宣告破产。他们大于这种普遍地漫无秩序地追逐利润的勾当，由于自己的贪得无厌，更加加强了混乱和奔忙，这种贪得无厌使他们发疯似地哄抬物价和扩大生产。一种疯狂的竞赛开始了，连最稳重最有经验的人都给迷住了。铁、纱、布匹开始大量生产，好像要把整个人类重新装备起来，好像在月球上的某个地方发现了有几十亿消费者的新市场。忽然有一天，国外的一些根基不稳的投机家由于要钱用就开始出售货物——自然是低于市场价格，因为他们是迫不及待的。一个人一卖，其他人也跟着卖，物价开始波动起来，大吃一惊的投机家们把自己的货物抛到市场上去。市场混乱起来了，信贷动摇了，商店一家跟着一家停止付款，一家跟着一家宣告破产。原来当地的和运输途中的商品已经比消费所需要的多了2倍。这个消息传到了当时还在开足马力进行生产的英国。这里的人们也惊慌起来，国外的破产引起了英国国内的破产，商业停顿又使许多商店倒

闭了。这里的人们在惊恐之余也把所有的存货都抛到市场上去，这又引起了更大的惊慌。危机就这样开始了，以后它就和前一次危机大致一样地进行下去，过了一些时候又重新被一个繁荣时期所代替。事情就这样不断地继续下去，繁荣之后是危机，危机之后是繁荣，然后又是新的危机。英国工业所处的这个永久的循环，如上面已经说过的，通常是每五六年就重新开始一次。

由此可见，英国工业在任何时候，除短促的最繁荣的时期外，都一定要有失业的工人后备军，以便在最活跃的几个月内有可能生产市场上所需要的大批商品。这种后备军的扩大或缩小，要看市场能使他们中间的小部分还是大部分得到工作而定。虽然在市场最活跃的时候，农业区、爱尔兰以及受普遍繁荣的影响较少的工业部门暂时也能供给工厂一定数量的工人，但是这些工人的数目到底是很少的，而且他们也同样属于后备军之列，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正是迅速的繁荣才暴露了他们是属于这个后备军的。在这些工人转到较活跃的工业部门里面去的时候，他们原来工作的地方没有他们也行。为了稍微补一下空子，就延长工作时间，雇用妇女和少年，而当危机到来，这些工人被解雇了又回来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的位置已经被人占据了，他们自己，至少是他们中的大部分，就成了“多余的人”。这个后备军就构成英国的“过剩人口”，它在危机时期人数激增，而在繁荣和危机之间的时期人数也相当多。这些人靠行乞和偷窃，靠打扫街道、拾马粪、用手推车或毛驴运送东西、摆小摊或者靠各种零碎的偶然的工作来维持自己可怜的生活。在一切大城市中都可以遇到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就靠偶然赚得的一点点钱，如英国人所说的，“不让灵魂和躯体告别”。令人惊异的是这种“过剩人口”还有哪一行不去干！伦敦的清道夫（crossing

sweeps)是世界闻名的。以前,不仅一切大城市的广场,而且一切大城市中的大街都是由济贫所或市政管理机关雇用的失业者来打扫XIV的。现在却用机器来做这种工作了,机器每天隆隆地穿过大街,夺取了失业者的饭碗。在马车往来频繁的通向城市的大路上,可以看到许多人推着小车,时刻冒着被往来奔驰的轿车和公共马车车轮辗死的危险,拾取新鲜的马粪去出卖。为此,他们常常还得每星期向街道清洁管理处缴纳几个先令,而在许多地方这种营生是根本禁止的,因为要不禁止,收集起来的垃圾里面所含的马粪就会太少,不能当做肥料卖出去。这些“多余的人”当中,谁能够弄到一辆手推车去搬运东西,那他要算是幸运的,如果除小车外还弄到钱买一头毛驴,那就更幸运了;毛驴要自己找东西吃,或者只得到一点人们扔掉的东西,但是仍然能够给人增加一些收入。

“多余的人”大多数都去做小贩。特别是在星期六晚上,当所有的工人居民都涌到街头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以此为生的人是如何地多。无数的男人、女人和小孩争先恐后地叫卖鞋带、背带、带子、橘子、饼干以及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在其余的时候,也随时都可以碰到这种叫卖橘子、饼干、姜啤酒和荨麻啤酒㊀的小贩在街上站着或徘徊着。这些人卖的东西也有火柴以及类似的东西,如火漆、有专卖权的引火用的混合剂等等。其他的人,即所谓jobbers〔零工〕则在街头徘徊,找一些偶然的零活;其中有些人能找到一点零活,但是能碰上这种好运气的人并不多。

伦敦东头的牧师威·岑卜尼斯说:“冬天里,在伦敦一切船坞的大门口,

㊀ 工人,特别是不喝酒的人喜欢喝的两种起泡沫的清凉饮料。前一种由水、糖和姜制成,后一种由水、糖和荨麻制成。—— 恩格斯原注

每天早晨还在破晓以前，就已经有成百的穷人等着开门，希望找到一点零活，而当最年经力壮的、和船坞的行政人员最熟识的人们都已经被雇用的时候，其余的成百的人在失望之余便垂头丧气地各自回到自己的破屋子去。”[103]

这些人既然找不到工作，又不愿起来反抗这个社会，那末除了去讨饭，他们还有什么办法呢?因此，看到警察不断加以驱赶的大批乞丐大半都是有工作能力的男人，就不应当感到奇怪了。但是这些人的乞讨方式是特别的。他们通常是全家在街上走来走去，时而停在这里，时而停在那里，唱一支诉苦的歌或者说一段可以唤起过路人同情的话。而奇怪的是，这种乞丐几乎只是在工人区里面才会遇到，并且他们几乎专门靠工人的施舍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有时全家默默地站在某一条热闹的街上，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用自己那种穷苦无告的样子来感动人。在这里也只能指望工人的同情，因为工人根据切身的体验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而且他们自己也随时都会陷入同样的境地。实际上，这种无言的但非常动人的呼吁几乎只是在工人常去的街道上并且是在工人经过的时候才能碰到。在星期六晚上，当工人区的“秘密”完全暴露在大街上，而资产阶级尽量避开这些被玷污的地方的时候，这种情形比什么时候都多。这些“多余的人”当中谁要是有足够的勇气和愤怒来公开反抗这个社会，对资产阶级进行**公开**的战争以回答资产阶级对他们进行的**隐蔽**的战争，那他就去偷窃、抢劫、杀人。

根据济贫法委员会委员们的报告，这种“多余的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平均有150万。在苏格兰，因为没有济贫法，这些人的数目无从确定。至于爱尔兰我们将单独地来谈。而这150万人只是那些真正向济贫所请求过救济的，大批勉勉强强可以活下去而不采取这种最后的非常令人讨厌的办法的人并未包括在内。同时，这

个数字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属于农业区的，因而在这里不能加以考察。在危机时期这个数字自然大大地增加起来，而贫穷也达到最高限度。例如拿1842年的危机来说，这次危机是最近的一次，因而也是最猛烈的一次；要知道，危机每重复一次，其猛烈性就加强一次，也许不迟于1847年就会到来的下一次危机，根据所有的征象来判断，将更加猛烈，更加持久。在1842年的这次危机时期，济贫捐在一切城市中都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例如在**斯托克波尔特**，每收1英镑房租，就要付出8先令济贫捐，因而仅仅是这一项捐税就占了全城房租总额的40%；此外，整条整条的街都空了起来，以致这个城市的居民比平常至少减少了20000人，而在空房子的门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字条：Stockport to let——斯托克波尔特出租。在波尔顿，抽济贫捐的房租平时每年平均是86000英镑，这时降低到36000英镑。可是需要救济的穷人的人数却增加到14000，即达全部人口的20%以上。在里子，济贫所拥有10000英镑的准备金，可是这一笔钱和募集来的7000英镑在危机还没有达到顶点的时候就用光了。到处都是这样。反谷物法同盟的一个委员会根据厂主提供的详细材料于1848年1月写了一份关于1842年工业区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里说：济贫捐比1839年平均高1倍，而需要救济的人数却增加了2倍，甚至4倍；许多申请人是过去从来没有请求过救济的，如此等等。这个报告又说：工人阶级得到的食品比1834—1836年少了$^2/_3$；肉的消费量大为减少——有些地方减少了20%，有些地方减少了60%；甚至那些在最坏的时期还能找到足够的工作的手工业者，即铁匠、泥瓦匠等等，也因为没有工作和工资降低而吃了不少苦头；甚至在现在，在1843年1月，工资还在不断降低。而且所有这些都是厂主们的报告里面所说的呵！

所有的街上都有饥饿的工人站着（由于他们的老板关闭了自己的工厂，不能给他们工作了），一个一个地或一群一群地乞讨，成群结队地守在人行道旁，向过路的人请求帮助，但是他们不是像一般的乞丐那样哀求，而是在要求，在以他们的人数、以他们的态度和言语来威胁人。一切工业区，从莱斯特到里子，从曼彻斯特到北明翰，情形都是这样。骚动时而在这里发生，时而在那里发生，例如7月间就北斯泰福郡的陶器工厂里发生过；工人中弥漫着可怕的愤激心情，终于在8月间爆发了各工厂区的总起义。当我在1842年11月底到达曼彻斯特的时候，在十字街头还到处碰到一群一群的失业者，许多工厂还关着门。在以后几个月里，直到1843年年中，这些不得已而徘徊街头的人才逐渐减少，工厂也重新开了工。

在这种危机时期失业者受了多少窘迫和困苦，就不用说了。济贫捐是不够用的，是远不够用的。阔佬们的慈善救济不过是杯水车薪，它的作用一瞬间就完了，因为在乞丐很多的地方，施舍物只能帮助很少的人。假若在这种时候小商店的老板们不尽可能地赊东西给工人，——自然，他们将来在结算的时候是会因此得到可观的报酬的，假若工人们不尽量互相帮助，那末每一次危机都会使大批“多余的人”饿死。但是，因为最严重的时期究竟不太长——一年，最多是两年或两年半，大部分人到底还能熬过艰难困苦保住生命。至于每一次危机通过疾病等等间接地吞噬了许多人的生命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谈到。暂时我们先来看看使英国工人陷入困苦状况的另一个原因，这个原因现在还使整个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不断降低。

爱尔兰移民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顺便提到迁移到英格兰的爱尔兰人，在本章中就比较仔细地研究一下这种移民的原因和后果。

假若英国没有找到又多又穷的爱尔兰居民作为替工业服务的后备军，英国的工业就不可能发展得这样快。爱尔兰人在家乡没有什么可以丢掉的，而在英格兰却可以得到很多东西。自从爱尔兰人知道，在圣乔治海峡彼岸只要手上有劲就可以找到工资高的工作那时起，每年都有大批大批的爱尔兰人到英格兰来。据估计，到现在为止，这样迁移来的爱尔兰人已经在1000000以上，而且每年还有近5000人迁移过来，他们几乎全都奔向工业区，特别是大城市，并且在那里形成了居民中的最下层。例如伦敦有120000爱尔兰贫民，曼彻斯特有40000，利物浦有34000，布利斯托尔有21000，格拉斯哥有40000，爱丁堡有29000。[㈠]这些人是在几乎一点文明也谈不到的状况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受惯了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粗野，喜欢喝酒，过一天算一天，他们迁移到

㈠ 拉纳克郡郡长阿契波德·艾利生“人口原理及其和人类幸福的关系”两卷本1840年版（Archibald Alison，High Sheriff of Lanarkshire.《The Prin— ciples of Population，and their connection with Human Happiness》. 2vols. 1840）。作者是研究法国革命的历史学家，和他的哥哥威·巴·艾利生博士一样，是有宗教情绪的托利党人。—— 恩格斯原注

英格兰来，把自己的各种粗野的习惯带给英格兰居民中对教育和道德本来就不大感到兴趣的那个阶层。让我们听听托马斯·卡莱尔是怎样说的吧。㊀

“所有的大街小巷都有弥勒斯人㊁的野蛮的面孔向你打招呼，这些面孔流露出假装的纯朴、浮躁、无理、穷困和嘲讽。英格兰马车夫在赶着马车过去的时候用鞭子抽弥勒斯人，而弥勒斯人却用自己的语言咒骂他两句，并脱下帽子向他行乞。这是我们的国家必须消灭的一种最糟糕的祸害。穿得破破烂烂、从来不知道发愁的野蛮的弥勒斯人，随时都在准备着去做那种只要手上有劲、脊梁结实就可以胜任的任何工作，而工资只要够他买土豆就行。调味品他只需要盐；过夜的地方只要随便在哪里碰到一个猪圈或狗窝他就觉得不错了，他住在草棚里面，穿一身破烂的衣服，这种衣服脱下和穿上都十分困难，只有在节日或特别隆重的场合才这样做。英格兰人要是不能在这种条件下工作，那他就找不到工作了。不大文明的爱尔兰人不是凭着自己的长处，而是凭着自己的短处把本地的英格兰人排挤出去，占据了他们的位置。他肮脏而无所用心，耍滑头，发酒疯，他是道德堕落和秩序混乱的祸根。一个还在竭力游泳、在水面上挣扎着的人，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一个不是浮着而是已经沉下去的人怎样才可能生存下去的例子……　大家知道，下层英格兰工人的生活水平愈来愈接近于在一切市场上都和他们竞争的爱尔兰工人的生活水平。凡是不需要什么特殊技能、只要有力气就行的工作，工资都不合于英格兰人的标准，而是接近于爱尔兰人的标准，也就是说，这种工资比‘一年只有三十个星期吃最坏的土豆也只能吃个半饱’所必需的稍稍多一点，——稍稍多一点，但是每从爱尔兰新来一只轮船，就向这个水平靠近一步。”

如果撇开对爱尔兰民族性格的过分的和片面的责备不谈，那末卡莱尔在这里的描写是完全正确的。这些花4辨士（合$3^{1}/_{3}$银格罗申）像牲口一样挤在轮船甲板上迁移到英格兰来的爱尔兰工人，总是随遇而安的。最恶劣的住宅在他们看来也是很好的；他们不大

㊀ “宪章运动”第28、31页及以下各页。——恩格斯原注

㊁ 弥勒斯是爱尔兰古赛尔特国王的名字。——恩格斯原注

讲究衣着，只要能勉勉强强地穿在身上就行；他们不知道什么叫鞋子；他们的食品是土豆，而且仅仅是土豆；他们赚的钱要是超过以上这些需要，就立刻都拿去喝了酒。这样的人要挣很高的工资干什么呢？一切大城市中最坏的地区住的都是爱尔兰人。无论什么地方，只要那里的某个地区特别显得肮脏和破烂，就可以预先猜到，在那里遇到的大部分将是一眼看去就和本地人的盎格鲁撒克逊面貌不同的赛尔特面孔，听到的将是音调和谐的带气音的爱尔兰口音，这是道地的爱尔兰人永远不会失去的口音。有时候我甚至在曼彻斯特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听到爱尔兰人的话。几乎在任何地方，住地下室的那些家庭大部分都是来自爱尔兰的。一句话，如凯博士所说的，爱尔兰人发现了最低的生活需要是什么，现在又把这个教给英格兰工人。他们也带来了肮脏和酗酒。这种不爱清洁的习惯是爱尔兰人的第二天性。它在人口不密的农村中还没有多大害处，可是在这里，在大城市中，因为人口非常密集，就足以使人颤栗并招致各种各样的危险。弥勒斯人按照在家乡时的老习惯，把一切废弃物和脏东西都倒在自己门口，造成了污水坑和垃圾堆，结果把整个工人区都弄脏了，空气也弄得污浊不堪。如同在家乡一样，他紧靠着自己的房子就盖起猪圈来，如果不能这样做，他就干脆把小猪放到自己屋子里。在大城市中饲养牲畜的这种不像话的新方法，完全是爱尔兰人传来的。爱尔兰人爱自己的小猪，就像阿拉伯人爱自己的马一样，所不同的只是在猪长得够肥的时候他就把它卖掉；而在这以前他和猪一起吃，一起睡，孩子们和猪一起玩，骑在猪背上，和猪一起在泥里打滚。这种情形在英国的一切大城市中都可以看到千百次。这些小破屋子里面如何肮脏，如何不舒适，是很难想像的。爱尔兰人不习惯使用家具。一捆麦

秸、几件完全没法子穿的破烂衣服，这就是他的床铺。一个木墩子、一把破椅子、一只当桌子用的旧木箱，再多就不需要了。一把茶壶、几个瓦罐和破土碗，就足够把他那也当做卧室和起居室的厨房陈设起来。如果他没有生炉子的东西，他就把手边可以烧的一切——椅子、门框、飞檐、地板都送到火炉里面去，只要真有这些东西的话。此外，他要很大的地方做什么呢？在爱尔兰，他的土房子一共只有一间屋子，一切东西都摆在里面；来到了英格兰，一家人所需要的也不多于一间屋子。可见现在已成为普遍现象的这种许多人挤在一间屋子里面的办法，主要也是爱尔兰人带来的。因为穷人到底也应当有一点享受，而其余的一切享受社会又不容许他有，所以他就只好到小酒店里面去。烧酒是点缀爱尔兰人生活的唯一的东西，再加上他那种满不在乎的快乐的性格，这就使得他老是喝得酩酊大醉。爱尔兰人具有南方人的轻浮性格，具有几乎可以和野人相提并论的暴躁的性情，他轻视所有那些正是因为他性情粗野而享受不到的人类享乐，他既肮脏，又贫穷，——所有这一切都促成他的喝酒的嗜好。诱惑是太大了，他简直不能抵抗，只要得到一点钱，他就把它喝光了。不这样又能怎样呢？既然社会使他陷入**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个酒徒的那种境地，既然社会丝毫不关心他，注定他要变得粗野，那末，当他真正变成酒徒的时候，这个社会又怎么能够责备他呢？

英格兰工人不得不和这样的竞争者斗争，这个竞争者是处于一个文明国家可能有的最低的发展阶段上的，因而他需要的工资比其他任何人都低。因此，如卡莱尔所说的，在英格兰工人不得不和爱尔兰工人竞争的一切劳动部门里，工资完全不可避免地会一天一天降低。而这样的劳动部门是很多的。所有那些不大需要或者

完全不需要技能的部门都向爱尔兰人开着大门。当然，对于那些必须有多年的训练或者需要持久的、正规的活动的劳动部门，轻浮的、无耐心的、酗酒的爱尔兰人是不适合的。要当个机匠（me-chanic——在英国，凡是在机器制造部门工作的工人都叫做机匠），要当个工厂工人，他就必须先接受英格兰的文化和英格兰的习俗，即在本质上变成英格兰人。但是，凡工作比较简单、比较粗糙、需要体力甚于需要技能的地方，爱尔兰人就一点也不亚于英格兰人。因此，这些劳动部门都首先被爱尔兰人所包围。手工织工、泥瓦匠、搬运工人、小工等等中都有许多爱尔兰人，爱尔兰人的侵入在这里大大地促进了工资的降低和工人阶级状况的恶化。即使那些侵入其他部门的爱尔兰人已经不得不接受一定程度的文化，他们仍然保存了一些旧习惯，这些旧习惯足以使那些在他们影响之下的英国同伴趋于堕落。实际上，如果注意到，几乎每一个大城市中都有1/5或1/4的工人是爱尔兰人或在爱尔兰式的肮脏环境中长大的爱尔兰人的孩子，那就会了解，为什么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他们的习俗、他们的才智和道德的发展、他们的整个性格，都染上了爱尔兰人的许多特征，也就会了解，为什么现代工业及其最直接的后果给英国工人造成的那种令人愤慨的状况还会更加恶化。

结　　果

我们已经相当详细地考察了英国城市工人的生活条件，现在我们可以从这些事实做出结论并且再用这些结论来和实际情况互相印证。我们来看一看，生活在这种条件下的工人本身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在体格方面、智力方面和道德方面的面貌是怎样的。

如果一个人伤害了另一个人的身体，而且这种伤害引起了被害人的死亡，我们就把这叫做杀人；如果杀人者事先知道这种伤害会送人的命，那末我们就把他的行动叫做谋杀。但是，如果社会㊀

㊀ 在这里，也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当我说到社会这样一个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负有责任的整体的时候，我所指的当然是**社会**中拥有**政权**的那一部分，即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目前在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都握有统治权，因而应该对它不允许参加政权的那些人的状况负责。在英国，正像在其他文明国家一样，这个统治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但是社会（特指资产阶级）至少有责任保护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命**，有责任注意，譬如说，不要饿死一个人，这一点是无须乎我来给我的德国读者证明的。如果我是写给英国资产阶级看的话，那当然又当别论了。——恩格斯原注

目前德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在主耶稣的第1886年，我们德国的资本家至少在这方面已经完全达到了英国的水平。——恩格斯在1887年英译本美国版上补加的注

这五十年来一切变得多厉害呵！目前，英国资产者中已经有人承认社会对它的各个成员负有责任；而我们的德国资产者呢？！！？——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补加的注

把成百的无产者置于这样一种境地，即注定他们不可避免地遭到过早的非自然的死亡，遭到如同被刀剑或枪弹所杀死一样的横死，如果社会剥夺了成千人的必需的生活条件，把他们置于**不能**生存的境地，如果社会利用法律的铁腕强制他们处在这种条件之下，直到不可避免的结局——死亡来临为止，如果社会知道，而且知道得很清楚，这成千的人一定会成为这些条件的牺牲品，而它仍然不消除这些条件，那末，这也是一种谋杀，和个人所进行的谋杀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一种隐蔽的阴险的谋杀，没有人能够防御它，它看起来不像是谋杀，因为谁也看不到谋杀者，因为谋杀者是所有的人，同时又谁也不是，因为看起来被杀的人似乎是自然地死去的，因为这与其说是犯罪，不如说是渎职。但这仍然是谋杀。我现在就来证明：英国社会每日每时都在犯这种英国工人报刊有充分理由称之为社会谋杀的罪行；英国社会把工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既不能保持健康，也不能活得长久；它就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毁坏着工人的身体，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我还要证明：社会**知道**这种状况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怎样有害，可是一点也不设法来改善。社会**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因而它的行为不单纯是杀人，而且是谋杀，当我引用官方文献、政府报告书和议会报告书来确定杀人的事实的时候，这一点就得到了证明。

一个生活在上述条件下并且连最必需的生活资料都如此缺乏的阶级，不能够保持健康，不能够活得很长，这是不言而喻的。虽然这样，我们还是再一次地特别从工人的健康状况这一角度来把这些情况一个一个地考察一下。人口向大城市集中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引起了极端不利的后果。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间那样清新而充满氧气。250万人的肺和25万个火炉集中在三四平方德里的地

面上，消耗着极大量的氧气，要补充这些氧气是很困难的，因为城市建筑本身就阻碍着通风。呼吸和燃烧所产生的碳酸气，由于本身比重大，都滞留在房屋之间，而大气的主流只从屋顶掠过。住在这些房子里面的人得不到足够的氧气，结果身体和精神都萎靡不振，生活力减弱。因此，大城市的居民患急病的，特别是患各种炎症的，虽然比生活在清新的空气里的农村居民少得多，但是患慢性病的却多得多。如果说大城市里的生活本身已经对健康有不好的影响，那末工人区里的污浊空气的危害又该多么大呵，我们已经看到，一切能使空气变得更坏的东西都聚集在那里了。在乡间，就是在房子旁边有一个污水坑，也不会那么有害，因为那里空气可以四面八方地自由流通。但是在大城市的中心，在四周全是建筑物、新鲜空气全被隔绝了的街道上和大杂院里，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一切腐烂的肉皮菜帮之类的东西都散发着对健康绝对有害的臭气，而这些臭气又不能自由地散出去，势必要把空气搞坏。这样，大城市工人区里的脏东西和死水洼对公共卫生总要引起最恶劣的后果，因为正是这些东西散发出制造疾病的毒气；被污染了的河流冒出来的水蒸气也是一样。但是还远不止于此。真正令人发指的，是现代社会对待大批穷人的方法。他们被引诱到大城市来，在这里，他们呼吸着比他们的故乡——农村坏得多的空气。他们被赶到城市的这样一些地方去，在那里，由于建筑得杂乱无章，通风情形比其余一切部分都要坏。一切用来保持清洁的东西都被剥夺了，水也被剥夺了，因为自来水管只有出钱才能安装，而河水又弄得很脏，根本不能用来洗东西。他们被迫把所有的废弃物和垃圾、把所有的脏水、甚至还常常把最令人作呕的脏东西倒在街上，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扔掉所有这些东西。他们就这样不得不

弄脏了自己所居住的地区。但是还不止于此。各种各样的灾害都落到穷人头上。城市人口本来就够稠密的了，而穷人还被迫更其拥挤地住在一起。他们除了不得不呼吸街上的坏空气，还成打地被塞在一间屋子里，在夜间呼吸那种简直闷死人的空气。给他们住的是潮湿的房屋，不是下面冒水的地下室，就是上面漏雨的阁楼。给他们盖的房子盖得让坏空气流不出去。给他们穿的衣服是坏的、破烂的或不结实的，给他们吃的食物是坏的、掺假的和难消化的。这个社会使他们的情绪剧烈地波动，使他们忽而感到很恐慌，忽而又觉得有希望，像追逐野兽一样地追逐他们，不让他们安心，不让他们过平静的生活。除了纵欲和酗酒，他们的一切享乐都被剥夺了，可是他们每天都在工作中弄得筋疲力尽，这就经常刺激他们去毫无节制地沉湎于他们唯一能办到的这两种享乐。如果这一切还不足以毁灭他们，如果他们抗住了这一切，那末他们也会在危机时期遭到失业。这时，他们保留下来的不多的一点东西也要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最贫穷的阶级怎么能够健康而长寿呢?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工人的死亡率极高，除了流行病在他们中间不断蔓延，除了他们的体力愈来愈弱，还能指望些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

我们从各方面都可以证明：位于城市中最糟的区域里的工人住宅，和这个阶级的一般生活条件结合起来，就成为百病丛生的根源。前面引证过的“机工”杂志中的那篇文章说得完全正确：肺部的疾病是这种生活条件的必然结果，而这类疾病也确实是在工人中间最常见。伦敦的特别是伦敦工人区的坏空气，最能助长肺结核的发展，在街上可以遇到许多面容憔悴的人，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在

早晨，当大家忙着去上工的时候，如果到街上去蹓跶一下，那就会大吃一惊，怎么竟遇到这许多看上去或轻或重地患有肺结核的人。甚至在曼彻斯特，人们看起来也还不至于这样。这些每走一步都可以碰到的脸色苍白、身形瘦削、胸部窄小、眼睛凹陷的幽灵，这种虚弱无力、萎靡不振、没精打彩的面孔，我只是在伦敦才看到过这许多，虽然肺结核在英国北部的工厂城市里每年也都要夺去不少人的生命。除其他肺部疾病和猩红热外，和肺结核同样厉害的，首先是一种在工人中间有最可怕的破坏力的病疫—— 伤寒。根据官方关于工人阶级卫生状况的报告，这种灾害的到处蔓延，是直接由于工人的住宅很坏、通风不良、潮湿和肮脏而引起的。这个报告（不要忘记，它是由英国第一流的医生们根据其他医生的陈述写成的）断定，只要有一个空气不流通的大杂院，只要有一个没有污水沟的死胡同，就足以引起热病，特别是当居民住得很挤而附近又有腐烂的有机物的时候就更是这样，而且事实也几乎总是这样。这种热病的性质几乎到处都相同，而且几乎在一切场合下都会转为明显的伤寒。这种疾病在一切大城市的工人区里，甚至在较小的地方的某些修筑得坏而保持得又不好的街上都可以发现，而传布得最广的还是在贫民窟中，虽然它在较好的区域里自然也找得到个别的牺牲者。在伦敦，这种疾病已经猖獗好久了。它在1837年闹得特别厉害，这才有了上面提到的那个官方报告。根据**萨斯伍德·斯密斯**博士的关于伦敦热病医院的年报，1843年该院收容的病人有1462人，比过去的任何一年都多418人。在伦敦东区、北区和南区的潮湿而污秽的地方，这种疾病特别猖獗。病人多半是不久以前才从乡下来的工人，他们在路上、甚至到达伦敦以后都受尽了千辛万苦，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地睡在街上，找不到工作，终于得了热病。这些人进入医

院时非常虚弱，必须服用极大量的葡萄酒、白兰地酒，氨制剂以及其他兴奋剂。全部病人中有16.5%死亡。在曼彻斯特也发现这种恶性的热病；在旧城、安柯茨、小爱尔兰等处的较坏的工人区，这种病几乎从来没有绝迹过，但在这些地方，也如同在**英格兰**各城市里一样，这种病还没有蔓延得像预料中的那样厉害。但是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伤寒猖獗的程度却超出一切想像之外。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在1817年物价腾贵期间，在商业危机后的1826年和1837年，伤寒都特别猖獗，而每次都延续了三年左右，才稍微缓和一个时候。在爱丁堡，在1817年流行病猖獗的时候，患热病的将近有6000人，在1837年流行病期间则将近有10000人，而随着流行病的每一次重新来临，不仅患者的人数增加了，而且疾病的严重性和死亡率也增高了㊀。但是这种疾病在以前所有各期的肆虐情形，和1842年危机之后的猖獗比起来，就算不得什么了。整个苏格兰的穷人有1/6患了热病，乞丐般的流浪者以惊人的速度把这种灾害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但是并没有影响到社会的中上等阶级。在两个月中患热病的人比过去十二年还要多。1843年在格拉斯哥患热病的占居民的12%，共达32000人，其中有32%死掉，可是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死亡率通常不超过8%。这种病的危险期是在第七天和第十五天；在第十五天上，病人的皮肤通常现出黄色，我们的权威认为，这种情况证明了，疾病的原因还应当从精神上的不安和忧虑方面去寻找㊁。在爱尔兰，这种流行病也是相当常见的。在1817—1818

㊀ 艾利生博士"苏格兰贫民的管理"。—— 恩格斯原注

㊁ 艾利生博士在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1844年10月于约克举行的会议上所宣读的报告中谈到这一点。—— 恩格斯原注

年的二十一个月中，住过都柏林医院的热病患者有39000名，据艾利生郡长说（“人口原理”第2卷），在后来的某一年中，甚至达60000名。1817—1818年流行病猖獗的时候，在科克住过热病医院的病人占居民的1/7，在同一时期，在里美黎克患热病的达全体居民的1/4，而在瓦特福德的**贫民窟**里竟占$^{19}/_{20}$㊀。

如果回想一下工人是生活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如果考虑一下，他们的住屋是怎样拥挤，每一个角落是怎样塞满了人，有病的和没病的又怎样都睡在一间屋子里，睡在一张床上，那末人们就只能惊奇，这样一种容易传染的热病竟没有蔓延得更广一些。如果注意到病人所得到的医疗极端不够，许多人根本听不到医生的忠告，连饮食方面应注意的最普通的事项也不知道，那末这死亡率就显得太小了。对这种病很有研究的艾利生博士，也和前面引证过的那个报告的作者一样，认为穷人的贫困和悲惨的处境是生病的原因；他说，正是匮乏和生活需要的不能满足，使身体容易感染疾病，并使流行病变得特别危险，使它迅速蔓延。他证明，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在商业危机或歉收所造成的每一个艰难的时期中都有伤寒病流行起来，而且这种病几乎是专在工人阶级中间肆虐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据他说，患伤寒的人多数都是当家人，也就是一家人里面最不能缺少的人；他所提到的爱尔兰医生大部分也证明了这一点。

引起其他许多疾病的直接原因，与其说是在于工人的居住条件，不如说是在于饮食方面。工人吃的食物一般都很不容易消化，对小孩子是完全不合适的；可是工人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给自己

㊀ 艾利生博士“苏格兰贫民的管理”。——恩格斯原注

的孩子弄到比较合适的食物。此外，还有一种很流行的习惯，就是给孩子喝烧酒，甚至食鸦片。由于这一切，再加上其他对孩子的身体发育有害的生活条件，孩子们就患上了遗害终身的各种消化器官病。几乎所有的工人都或多或少地患消化不良症，可是他们以后还是不得不吃那种使他们消化不良的食物。而且他们又哪里能知道这是有害的呢？即使他们知道，在他们的生活条件和习惯没有改变以前，他们又怎么能遵守比较适合的饮食规定呢？——但是，由于消化不良，他们还在童年时代就又染上了其他疾病。几乎所有工人都患着瘰疬，患瘰疬的父母常有患瘰疬的孩子，特别是在带有父母遗传下来的腺病质的孩子们又受到最初引起这种病的原因的影响的时候。婴儿发育期间的营养不良所产生的第二个后果是佝偻病（英吉利病，关节结节性赘瘤），这种病在工人的孩子中也是极常见的。骨头的硬化延缓，骨胳的成长整个地受到阻碍，除佝偻病的普通现象外，还常常可以看到腿和脊柱的弯曲。至于这些疾病在商业停滞、失业以及危机发生时工资低落的时期怎样由于工人生活变化无常而变得更加厉害，那就用不着我来说明了。几乎每一个工人在一生中都至少要过一段吃不饱饭的生活，这使得虽然质量坏但数量毕竟还够的食物所已经引起的后果更加严重起来。正是在最迫切地需要营养的时候只能吃个半饱的孩子们（这样的孩子在每一次危机期间真不知有多少！甚至在工业繁荣时期也是很多的！）是不能不极度衰弱，不能不患瘰疬和佝偻病的。而他们也正是这样，这从他们的外表就可以看出来。大批的工人的孩子所遭遇到的缺乏照顾的命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使整个工人阶级都衰弱了。如果再加上工人的衣服不适用，因而也不能防山伤风，非到病得最后躺倒就不能停止工作，一生病家庭就陷入极度的困境，通

常得不到任何医疗等等情况，那就可以约略地想像到英国工人阶级的健康状况是什么样子了。而个别劳动部门中的工作在目前条件下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我还不打算在这里谈。

此外，还有其他种种因素使相当多的一部分工人的健康恶化。首先是酗酒。各种引诱，各种可能的诱惑都联合在一起，使工人走向酗酒。烧酒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快乐的泉源，而且一切都似乎在促使工人去接近它。工人下工回家时已经筋疲力尽，困倦不堪，而家里又那么不舒适、不亲切、潮湿而且肮脏；他迫切地需要消遣，他必须**有点什么东西**使他感到还值得工作，感到明天的苦日子还能忍受；身体不健康、特别是消化不良所引起的疲惫、烦闷和忧郁的心情，由于其他的生活条件，由于生存没有保障，由于不能摆脱各种偶然事件的支配和无法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状况而达到了无可忍受的地步；他的身体已经被混浊的空气和恶劣的食物弄得很衰弱，迫切地需要某种外来的刺激；他的社交的要求只能在酒馆里得到满足，因为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会见自己的朋友。在这种条件下，工人怎么能不受酒的极强烈的诱惑，怎么能抵抗这种诱惑呢？相反地，由于精神上和肉体上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工人都**不能**不沉溺于酗酒。促使工人酗酒的，除了这些宁可说是肉体上的原因，还有其他许多情况起着作用：多数人这样做，教育又不够，年轻人不可能不受到诱惑，酗酒的父母常常直接影响自己的孩子（他们自己就给孩子们酒喝），人们相信喝醉了至少可以在几小时内忘却生活的困窘和压迫；这一切所起的作用是这样厉害，实在不能责备工人们爱喝酒。在这里，酗酒已不再是一种染上了就要受到责备的恶习。它逐渐成为一种必然现象，成为一定条件作用于没有意志（至少在这方面没有意志）的对象时所必然产生的后果。应该在这

件事情上负责的是那些使工人沦为这种对象的人。但是，正像绝大多数工人必然要沉溺于酗酒一样，酗酒本身也必然要给它的牺牲者的肉体和精神以毁灭性的影响。它日益加强工人的生活条件所引起的容易感染疾病的倾向，它促进肺部疾病和胃病的发展，也极度地助长伤寒的发生和蔓延。

使工人阶级遭受肉体上的痛苦的另一个原因，是生了病不可能有高明的医生来诊治。的确，有许多慈善机关在设法弥补这种缺陷，例如曼彻斯特医院每年医治22000个病人，其中有住院治疗的，也有只接受医生的诊断和药品的。但是，对于一个每年有四分之三的居民需要医疗（根据盖斯克尔的计算㊀）的城市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英国医生索取的诊费很高，工人是出不起的。因此，他们只好根本不看病，或者求助于收费低廉的江湖医生和归根到底是害多利少的假药。在英国的一切城市里这种江湖医生都有好多，他们靠各式各样的广告、招贴及其他诡计在最穷的阶级中招揽顾客。此外，还有极多的包治百病的所谓特许专卖药（patent medicines）出卖，什么莫里逊氏丸、帕尔氏生命丸、曼威灵博士丸以及成千种的其他丸药、香精和香膏等等，所有这些药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医治世界上的一切疾病。这些药品固然很少含有直接有害的东西，但是经常大量服用，对身体到底还是有害的；而因为所有的广告都告诉外行的工人说，这些药品吃得愈多愈好，所以无怪乎工人们不管有没有必要，总是大量吞服这些药品。帕尔氏生命丸的制造者往往在一星期之内就卖出20000——25000盒这种万应灵药，这些丸药有的人用来治大便不通，有的人用来治泻肚子，有

㊀ “英国的工业人口”第8章。——恩格斯原注

的人却用来治热病、虚弱以及各种各样的疾病。正如我们德国的农民喜欢在一定的季节里拔火罐或放血一样，英国工人喜欢吃特许专卖药，结果是戕害了自己，同时却填满了这些药品的制造者的钱袋。这些特许专卖药中最有害的一种，是用鸦片制剂（主要是鸦片的酒精溶液）制成的水药，即市上出售的所谓“高弗莱强身剂”。在家里工作并且要照顾自己的或别人的孩子的妇女们就给孩子们吃这种水药，使他们安睡，或者如她们中的许多人所想的，使他们强壮起来。由于她们不知道这种“强身”剂是如何有害，她们常常几乎是在孩子们一生下来的时候就给他们吃这种药，并且一直用这种药灌他们，直到他们死去为止。孩子的身体对鸦片的作用的感应愈来愈迟钝，服用量就愈来愈增加。如果这种水药不再起什么作用，就给孩子吃纯粹的鸦片酒精溶液，常常是一次15—20滴。诺定昂的验尸官曾向一个政府调查委员会做证说[一]：据一个制药者自供，他在一年内为配制“高弗莱强身剂”就使用了1300磅糖浆。这种治疗对孩子们会引起怎样的后果，那是容易想像的。他们逐渐变得面色苍白，精神萎靡，身体衰弱，大部分不到两岁就死了。这种药剂在英国的一切大城市和工业区里都有很广的销路。

[一] “矿山、煤坑以及雇有大批童工但不受工厂劳动限制法约束的生产部门和工厂中使用童工和未成年工的状况调查委员会报告书”。第一个和第二个报告。第二个报告中的格棱吉报告（《Report of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Employment of Children and Young Persons in Mines and Collieries and in the Trades and Manufactures in which Numbers of them work together, not being includ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Factories' Regu- lation Act》.First and Second Reports.Grainger's Rept., second Rept.）。报告书通常叫做“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这是最好的官方报告之一，其中包含许多最有价值的但也很可怕的事实。第一个报告公布于1841年，第二个报告则晚两年。——恩格斯原注

这一切所引起的后果就是工人的身体普遍衰弱。在他们中间很少看到强壮的、体格好的和健康的人，至少多半在室内工作的产业工人是如此，而我们在这里所谈的也仅仅是他们。他们几乎全都身体衰弱，骨瘦如柴，面色苍白，除了他们在工作时特别用劲的那些肌肉，其他肌肉都是不发达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消化不良，因而都或多或少地患着忧郁病，总是愁眉苦脸，不高兴。他们的衰弱的身体无力抵抗疾病，因而随时会病倒。因此，他们老得快，死得早。死亡统计表就无可反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出生、死亡、婚姻登记处主任詹·格莱安的报告，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死亡率每年稍低于2.25%，即每45人中每年有1人死亡㊀。至少1839—1840年的平均数是这样的；次年死亡率稍稍降低了一点，每46人中才有1人死亡。但在大城市中，死亡率就完全不同了。我手头有几份官方的死亡统计表（公布在1844年7月31日的“曼彻斯特卫报”上），根据这些统计表，下面几个大城市的死亡率是这样：在曼彻斯特，如包括索尔福和却尔顿在内，是1∶32.72，不包括索尔福和却尔顿在内，是1∶30.75；在利物浦，如包括西得比这个郊区在内，是1∶31.90，不包括西得比在内，是1∶29.90；可是，根据柴郡、郎卡郡和约克郡（这一地区包括许多农业区或半农业区以及许多小城市，总人口为2172506人）的综合材料，死亡率是1∶39.80。城市工人的生活条件如何恶劣，从郎卡郡的普莱斯科特的死亡率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煤矿工人聚居的地方，而因为煤矿中的工作对健康的影响并不很好，所以在这方面它还不如农业区。但是这些工

㊀ “出生、死亡、婚姻登记处第五次年报”（《Fifth Annual Report of Reg.Gen.of Births, Deaths and Marriages》）。——恩格斯原注

人是住在乡下的，他们的死亡率是1∶47.54，就是说，比整个英格兰的平均数字约低$2\frac{1}{2}$。所有这些材料都引自1843年的死亡统计表。在苏格兰的各城市里，死亡率还要高：在爱丁堡，1838—1839年是1∶29，而1831年在旧城甚至是1∶22；在格拉斯哥，根据考温博士的统计（“格拉斯哥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统计”）[104]，自1830年以来，平均是1∶30，而有些年份则是1∶22或1∶24。平均寿命大大缩短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工人阶级方面，而各阶级的平均寿命，因为上等阶级和中等阶级的死亡率较低，所以显得比较长，这从各方面都可以得到证明。有一个最新的证明是曼彻斯特的医生普·赫·霍兰德提供的，他受官方委托，调查过曼彻斯特郊区梅德洛克河畔的却尔顿㈠。他把房屋和街道各分为三等，得出如下的死亡率：

一等街，一等房屋：死亡率是1∶51
一等街，二等房屋：死亡率是1∶45
一等街，三等房屋：死亡率是1∶36
二等街，一等房屋：死亡率是1∶55
二等街，二等房屋：死亡率是1∶38
二等街，三等房屋：死亡率是1∶35
三等街，一等房屋：缺
三等街，二等房屋：死亡率是1∶35
三等街，三等房屋：死亡率是1∶25

从霍兰德所提供的其他许多表格里可以看出：二等**街**的死亡率比一等街高18%，三等街比一等街高68%；二等房屋的死亡率比一等房屋高31%，三等房屋比一等房屋高78%；而肮脏的街道

㈠ 参看“大城市及人口密集区情况调查委员会报告者”1844年第一个报告中的附录（《Report of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State of large Towns and populous Districts》，first Report，1844．Appendix）。——恩格斯原注

经过清扫以后，死亡率就降低了25%。他用下面的话结束自己的报告，这些话从一个英国资产者的口里讲出来，要算是很坦白的了：

“既然我们发现某些街上的死亡事比别的街上高3倍，而整个等级的街又比其他等级的街高1倍，既然我们又发现死亡率在糟糕的街上几乎总是高的，而在情况较好的街上几乎总是低的，那末我们就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的大批的同胞，我们的成百的近邻每年都因缺乏最普通的预防措施而被毁灭了（destroyed）。”

关于工人阶级卫生状况的报告中有些资料也证实了同样的事实。1840年，利物浦上等阶级（贵族、自由职业者等等）的平均寿命是三十五岁，商人和光景较好的手工业者是二十二岁，工人、短工和一般雇佣劳动者只有十五岁。在议会报告书里还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事实。

死亡数字之所以这样高，主要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幼儿的死亡率很高。小孩子的娇嫩的身体最不能抵抗恶劣的生活条件的不利的影响。如果父母都工作，或者其中死了一个，孩子就常常没有人照顾，这种情况很快就会造成恶果；因此，像曼彻斯特这个地方，根据我们在前面刚提到过的那个报告，工人的孩子有57%以上不到五岁就死掉，可是，上等阶级的孩子在五岁以前死亡的却只有20%，而农业区各阶级所有的孩子在五岁以前死亡的平均也不到32%㈠，这就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在前面引证过几次的“机工”杂志中的那篇论文里面，我们找到了关于这方面的更精确的材料。该文的作者把城市和农业区里各种小儿病的死亡数字加以比较，证明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流行病所引起的死亡率，一般说

㈠ “工厂调查委员会报告书”第3卷霍金斯博士关于郎卡郡的报告。这里引证的是“曼彻斯特最高统计权威”罗伯顿博士的材料。——恩格斯原注

来比农业区高2倍；城市中患神经系统疾病的比农村中多4倍，而患胃病的则比农村多1倍多，同时，城市中因肺部疾病而死的人数和农村中的比较起来是2．5∶1。在城市里，因天花、麻疹、百日咳和猩红热而死的小孩子比农村中多3倍，因脑水肿而死的多2倍，因痉挛而死的多9倍。为了再引证一个权威的材料，我在这里举出一个表，这个表是威德博士从1832年的议会工厂委员会报告中借用来放在他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版第3版）里面的。

在每10000年死亡人口中	5岁以下	5—19	20—39	40—59	60—69	70—79	80—89	90—99	100岁以下
拉特兰德郡—卫生状况良好的农业区	2865	891	1275	1299	1189	1428	938	112	3
艾塞克斯郡—沼泽地农业区域………	3159	1110	1526	1413	963	1019	630	177	3
工厂出现以前1779—1787年的卡赖尔市…………	4408	911	1006	1201	940	826	533	153	22
	4738	930	1134	1134	677	727	452	80	1
工厂出现以后的卡赖尔市	4974	1136	1114	1114	553	532	298	38	3
工厂城市里子	5286	927	1198	1198	593	512	225	29	2

除了贫穷阶级被压迫及其利益被忽视所必然引起的这一切疾病，还有其他的原因促使幼儿的死亡率上升。在许多家庭里，妻子和丈夫一样地出外工作，结果孩子就完全没有人照顾，他们或者被锁在家里，或者被交给雇来照看他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有成百的孩子死于各种各样的不幸事件，那还有什么奇怪的呢？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英国的大城市有这样多的孩子被车辗死，被马踩死，任何

一个地方也不像这些城市有这样多的孩子摔死、淹死或烧死。孩子们因烧伤或被开水烫伤而致死的特别多。这种事情，在曼彻斯特的冬季数月里几乎每周都要发生一次，在伦敦也一样地多，只是报上很少登出来罢了；我手头只有1844年12月15日“每周快讯”上的一篇报道。根据这篇报道，从12月1日到7日这一星期中就发生了**六起**这样的事件。这些惨遭横死的不幸的孩子们完全是我们的社会混乱以及热中于保持这种混乱状况的有产阶级的牺牲品。但是也很难断定，甚至这种可怕的痛苦的死亡对这些孩子来说是否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种死亡使他们摆脱了充满贫穷和苦难的、痛苦多而欢乐少的、漫长的一生。英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资产阶级也天天在报纸上读到这一切，可是他们却无动于中。然而，如果我根据我所引用的那些**不能**不为他们所熟悉的官方或非官方的证据，控告他们犯了社会谋杀罪，他们是没有权利申辩的。他们应该想办法结束这种可怕的情况，否则就把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移交给工人阶级。对后一种办法，他们丝毫也不感到兴趣；而前一种呢，只要他们还是资产阶级，还不能抛弃资产阶级的偏见，他们就无力做到。事实上，虽然在现在，在几十万牺牲者已经倒下去以后，他们终于采取了一些微小的预防性的措施，公布了一个对住宅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的情形总算稍微限制了一下的首都建筑法案[105]，虽然他们夸耀他们这种不仅没有触动罪恶的根源而且连卫生警察的最平常的要求都不能满足的措施，但是他们还是不能以此来洗清他们的罪名。英国资产阶级现在只有两条路，或者**不顾**这种落到他们身上的无可反驳的谋杀的罪名，继续把统治权握在自己手里，或者就自己引退，把政权让给工人阶级。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宁愿选择第一条道路。

现在让我们从工人的身体状况转到精神状况。既然资产阶级所关心的只是工人的最起码的生活，那我们也就不必奇怪它给工人受的教育只有合乎它本身利益的那一点点。而这一点实在并不怎么多。英国的教育设施和人口数目比起来，少得很不相称。工人阶级可以进的不多的几个日校，只有少数人才能够进去，而且这些学校都是很坏的，教师都是已经失去了工作能力的工人或者是做什么工作都不适合的人，他们只是为了生活才来当教师，大多数连自己也没有具备最必要的基本知识，缺乏教师所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质，并且一点也受不到公众的监督。这里也受着自由竞争的支配，照例也是有钱人在这上面占便宜，而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他们没有相应的知识来做正确的选择。没有一个地方实行义务教育；在工厂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所谓义务教育也只是在名义上存在，当政府在1843年的议会会议上要想真正实施原来只是徒有其名的义务教育的时候，工业资产阶级就倾全力来反对，尽管工人表示坚决**赞成**。此外，有大批的儿童整个星期都在工厂和家里工作，因而不能上学。而为白天做工的人办的**夜校**几乎根本就没有人去，去了也得不到什么好处。青年工人累了十二小时之久，还要叫他们在晚上八点到十点去上学，这也未免太过分了。那些去上学的人多半在上课的时候就睡着了，"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有几百个证据都证实了这一点。固然也开办了主日学，但是那里教师极端缺乏，而且只是对那些已经在日校里学过一点的人，才能有些好处。从一个星期日到下一个星期日相隔的时间太长了，一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很难在下一次上课时不忘记他在上一次，即一星期前上课时学到的东西。关于这一点，"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有成千的证据，委员会本身也坚决认为，无

论是日校或主日学都远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这个报告中举了一些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愚昧无知的例子，这样的愚昧无知甚至在西班牙和意大利那样的国家里也是很少有的。但是事情怎么能不这样呢？工人受教育，对资产阶级好处少，但可怕的地方却很多。政府在5500万英镑的庞大预算中用于国民教育的只是4万英镑这样一个可怜的数目。假若没有各宗教教派的热狂，教育经费也许还要少得可怜，而这种宗教热狂带来的害处至少可以和它在某些方面的好处相抵。但是国教教会成立了自己的National Schools〔国民学校〕，每一个教派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学校，而它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本教教徒的孩子保留在自己的怀抱里，可能的话，还要从别的教派那里把某些不幸的孩子的灵魂抢夺过来。结果是，宗教，而且恰好是宗教的最无聊的一面（即对异教教义的辩驳）成了最主要的课程，孩子们的脑子里塞满了不能理解的教条和各种神学上的奥妙东西，从童年时期起就培养起教派的仇恨和狂热的偏执，而一切智力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发展却被可耻地忽视了。工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议会建立纯世俗的国民教育制度，而把宗教教育交给每一个教派的牧师，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届内阁同意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内阁大臣是资产阶级的驯顺的奴才，资产阶级又分成无数的教派；每个教派都只有在他们能够使工人同时接受这个教派所特有的教条作为抗毒素的时候，才同意工人受教育，因为不这样的话，让工人受教育是危险的。又因为这些教派相互之间直到现在还在为争夺最高的统治权而斗争，所以工人阶级就只好暂时不受教育了。不错，厂主们吹嘘他们已经把大多数工人教得能念书了，但这里所谓能念书是怎么一回事，从“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可以

看出来。只要谁认识了字母，就说他已经能念书，于是厂主们也就心安理得了。但是英文的正字法是很复杂的，因而念书是一种真正的艺术，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才能学会，如果注意到这一点，工人阶级的愚昧无知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完全会写的只是很少的一些人，而要写得合乎正字法，就连许多“有教养的”人都不行。在国教高教会派的、教友会的、以及其他一些教派的主日学里，根本就不教学生写字，“因为这对于礼拜天来说是一种过分世俗的作业”。工人所受的其他各种教育是怎样的，从以下的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来。这些例子都引自“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这个报告可惜没有谈到真正的工厂工业。

该委员会委员格棱吉说：“在北明翰，经我考试过的孩子，一般地连一点勉强可以说是有用的知识都没有。虽然几乎所有的学校里那**只有**宗教教育，但是就在这方面他们一般也都是极端无知的。”该委员会委员霍恩说：“在乌尔未汉普顿，我看到过这样一些例子：一个上过日校和主日学的十一岁的女孩子‘从来没有听说过另一个世界，也没有听说过天堂或阴间的生活’。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子不知道2×2等于多少，说不出两个辨士合多少法寻（1/4辨士），甚至当人们把这些钱放到他手里的时候还是说不出。有几个男孩子从来没有听说过伦敦，甚至连威伦霍尔也没有听说过，虽然这个地方离乌尔未汉普顿只有一点钟的路程，而且两地的交通还是很频繁的。他们当中有几个人从来没有听到过女王的名字或者像纳尔逊、威灵顿、拿破仑这样的人物的名字。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甚至连圣保罗、摩西或所罗门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对大盗狄克·杜平、特别是以越狱闻名的小偷杰克·谢伯的生平、事迹和个性却知道得清清楚楚。”——“一个十六岁的男孩不知道2×2是多少，也不知道4个法寻等于多少；另一个十七岁的男孩说，10个法寻就是10个‘半辨士’，还有一个也是十七岁的男孩子，对几个很简单的问题只简短地回答说，‘什么也不知道’（he was no judge o’ nothin’）。”（霍恩。“报告”附录第2部分 Q 18，№216、217、226、233等）

这些孩子被人们用宗教教条硬灌了四五年，结果并没有比原

来多知道一点什么。

有一个孩子“正规地上了五年主日学，他却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虽然也听到过这个名字；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十二使徒、参孙、摩西、亚伦等”（同上，文件 q39页，I. 33)。另一个孩子“正规地上了六年主日学，他知道耶稣基督是谁，知道他死在十字架上，知道他‘为了替我们的救主赎罪’而流了血；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圣彼得或圣保罗”（同上，q36页，I. 46)。还有一个孩子“在七年之内上过好几个主日学，只能读一些小书和简单的单音节的字；他听说过十二使徒，但不知道圣彼得或圣约翰是不是也在内，以为圣约翰大概就是圣约翰·威斯利”（美以美教派的创始人），如此等等。（同上，q34页，I. 58）对于耶稣基督是谁这一问题，霍恩还得到过这样一些答复：“他是亚当”，“他是一个使徒”，“他是教主的主的儿子（he was the Saviour’s Lord’s Son)”；而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却这样回答：“他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伦敦国王。”—— 在设菲尔德，该委员会委员昔蒙兹要一些主日学的学生念书；他们说不出他们念的是些什么东西，他们刚念到过的使徒是些什么人。关于使徒的问题，在他依次问过一切孩子而得不到正确的回答以后，一个看起来很机灵的小男孩满有把握地喊道：“我知道，先生，这是些害麻疯病的人！”（昔蒙兹。“报告”附录第1部分 E22页及以下各页）

陶业区和郎卡郡的情形也是一样。

这里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和国家在工人阶级的培养和教育方面做了些什么。幸而这个阶级的生活条件本身就给他们一种实际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但代替了学校里的那一套废物，而且还清除了和那一套废物纠缠在一起的乱七八糟的宗教观念的毒素，甚至还把工人置于英国全民族的运动的前列。贫困教人去祈祷，而更重要得多的是教人去思考和行动。英国工人几乎都不会读，更不会写，但是他们自己的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什么，他们却知道得很清楚。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是什么，他们能够从这个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些什么，他们也是知道的。虽然他们不会写，可是他们会说，并且会在大庭广众之中说。虽然他们不会算，可是他们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

理解足以使他们看穿主张取消谷物税的资产者，并且驳倒他们。虽然他们完全不了解教士们费尽心机给他们讲的天国的问题，可是他们很了解人间的即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这在以后我们还要谈到，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英国工人的道德面貌。

在所有的英国学校里，道德教育总是和宗教教育连在一起，这种道德教育所产生的结果显而易见地丝毫不会比宗教教育好些。人们用来调节人对人的关系的简单原则，由于现存的社会条件，由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本来就已经非常紊乱，而当这些原则和不可理解的宗教教条掺杂在一起，并以一种专横而毫无理由的训令的宗教形式出现时，就不能不使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感到非常莫名其妙。正像所有的权威、特别是童工调查委员会所承认的那样，学校对工人阶级的道德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英国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到这样愚蠢、这样鼠目寸光的程度，甚至不肯花一点力量把现代的道德，把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使自身有保障而泡制出来的道德灌输给工人！日益衰老、懒惰的资产阶级连为自己打算都认为是太费力，是多余的了。当然，总有一天他们会后悔的，可是到那时就已经晚了。如果工人不懂得这种道德，不奉行这种道德的话，资产阶级无论如何是不该抱怨的。

可见工人不仅在身体方面和智力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都遭到统治阶级的摈弃和忽视。而资产阶级为工人准备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法律，当工人把它逼得太紧的时候，它就用法律来对付他们；就像工人是无理性的动物一样，对他们的教育工具只有一种：皮鞭——粗暴的、不能服人而只能吓唬人的力量。所以，这些被当做牲口看待的工人，不是真的逐渐变得像牲口一样，就是只有靠着对当权的资产阶级的烈火般的憎恨，靠着不可熄灭的内心激愤才能保

持住人类应有的意识和感情，那是毫不足怪的。只要他们还对统治阶级感到愤怒，他们就仍然是人；但如果他们乖乖地让人把挽轭套在脖子上，只想把挽轭下的生活弄得比较过得去一些，而不想摆脱这个挽轭，那他们就真的变成牲口了。

这就是资产阶级为工人阶级的教育所做的一切。如果我们考虑到工人阶级在其他方面的生活条件，我们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责备他们对统治阶级所抱的那种仇恨了。工人在学校里受不到的道德教育，也不会在其他的生活条件下受到，——至少受不到那种在资产阶级心目中还有某种意义的道德教育。工人的整个状况、他们周围的整个环境都促使他们道德堕落。他们穷，生活对于他们没有任何乐趣，他们几乎一点享受都得不到，法律的惩罚对他们也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为什么一定要让富人去享受他们的财富，而自己不从里面拿一份呢？无产者凭什么理由**不**去偷呢？当人们谈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切都讲得很冠冕堂皇，资产阶级听起来也很入耳。但是对没有任何财产的人来说，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也就自然不存在了。金钱是人间的上帝。资产者从无产者那里把钱抢走，从而真的把他们变成了无神论者。如果无产者成了无神论者，不再尊重这个人间上帝的神圣和威力，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当无产者穷到完全不能满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穷到要饭和饿肚子的时候，蔑视一切社会秩序的倾向也就愈来愈增长了。这一点资产阶级自己大半也是知道的。**昔蒙兹**指出[1]，贫穷对精神所起的毁灭性的影响，正如酗酒之于身体一样。**艾利生**郡长也很详尽地告诉有产阶级，社会压迫对工人会引起

[1] "手工业和手工业者"。——恩格斯原注

压迫对工人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㊀。穷困让工人在几条道路中进行选择：慢慢地饿死，立刻自杀，或者随便在什么地方见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只要可能就拿走，干脆说，就是偷。如果大多数的人宁愿偷东西而不愿饿死或自杀，那我们是不应该奇怪的。当然，工人中间也有许多人很讲道德，即使弄得山穷水尽也不愿去偷，而这些也就是饿死或自杀的人。不久以前自杀还是上等阶级的值得羡慕的特权，现在在英国的无产者中间也时髦起来了，许多穷人都以自杀来摆脱贫困，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出路。

但是生活的毫无保障、挣一天吃一天的日子，一句话，就是把英国工人造成无产者的那种东西，对他们的道德所起的破坏作用比贫穷还要厉害得多。在德国，我们的小农多半也穷，也常常缺这缺那，但是他们受偶然事件支配的程度却比较小，他们至少还有些固定的东西。但是无产者除了自己的两只手就什么也没有，昨天挣的今天就吃掉，受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的支配，没有任何保证使自己能够获得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任何危机，主人的任何逞性都能使他失业，——这个无产者已经被置于人们所能想像的最令人愤怒的非人的地位了。奴隶的生存至少会因为他主人的私利而得到保证，农奴也还有一块用来养活他的土地，二者都至少还有不致于饿死的保障；而无产者却只有指靠自己，同时，人们又不许他把自己的力量变为完全可以指靠的力量。无产者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所能做的一切，在那些支配着他而他丝毫不能控制的偶然事件的长河中，不过是一滴而已。他是一个处在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的没有自由意志的物件，只要能够在若干活下

㊀ “人口原理”第2卷第196、197页。——恩格斯原注

时期内勉强去，就算幸运了。不言而喻，他的性格和生活方式就是由这些偶然情况决定的。他必须尽力设法不陷到这个漩涡底下去，设法挽救自己的人类的尊严（他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起来反抗[一]资产阶级，反抗那个如此无情地剥削他、然后又听凭命运去摆布他并想使他永远处于这种非人地位的阶级），否则他就只好承认自己无法摆脱自己所处的境遇，于是也就不再做这种打算，而只是力图尽可能地利用有利时机去占些便宜就算了。储蓄对他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因为他能够储蓄起来的，最多也只能维持他几个星期的生活，而他一失业，就不会仅仅是几个星期的事。他不能长久地保有财产，假使他可能这样做，他就不再是工人了，另外会有人来补他的缺。这样，在他得到较多的工资的时候，他不好好地生活一下，又要做什么呢?在工资高的时候，工人的生活就“阔绰”起来，这是使英国资产者莫名其妙而且极为恼怒的。要知道，如果储蓄对人们并没有什么好处，而最后还是要成为蠹鱼和铁锈的牺牲品，也就是被资产阶级所吞没，那末，他们在可能享受一下的时候就享受，而不去储蓄，这不仅是十分自然的，甚至也是合理的。但是这种生活方式比别的任何生活都更使人堕落。卡莱尔关于棉纺工人所说的话，也适用于英国的一切产业工人：

“他们的生意永远像赌博一样，今天还很兴隆，明天就完蛋；他们的生活也很像赌徒，今天奢侈豪华，明天就忍饥挨饿。阴郁的反叛的不满情绪（一个人心中所能蕴藏的最痛苦的感情）吞没了他们。英国商业以它那殃及全世界的痉挛般的动荡，以它那无可比拟的普罗特斯[1]—— 蒸气，把他们的一切

[一] 我们以后将看到，在英国，由于有了结社的自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就成为合法的了。—— 恩格斯原注

① 普罗特斯（Proteus）是希腊神话中替普赛顿（Poseidon）服务的海神，有预言力并能变幻种种形态。—— 译者注

生路都弄得很不可靠，使他们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冷静、沉着、长期的安静，人类这些最起码的幸福他们是没有的…… 对于他们，这世界并不是家，而是一个充满了荒唐而无谓的痛苦、充满了愤激、怨恨、对自己和对全人类的仇恨的阴森的监牢。这是上帝所安排、所统治的、青葱翠绿百花盛开的世界呢，还是魔鬼所安排、所统治的弥漫着硫酸铜蒸气、棉絮尘埃、醉后的吵嚷、愤怒和苦役的、阴暗而沸腾的陀斐特[①]呢？”㊀

往下，在第40页中又写道：

“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的罪恶就是不公道和背叛真理、背叛现实、背叛世界秩序，世界上唯一的难于忍受的痛苦就是意识到自己受了不合理不公道的待遇，因此，我们关于工人状况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这一切都是公道的吧？首先是：他们自己对于这种状况的公道与否是怎样想的呢？ ……他们的话就是很明显的回答，他们的行动是更明显的回答…… 愤激，下等阶级反对上等阶级的凶恶的复仇的意向愈来愈厉害了；他们对世俗政权的尊重和对精神主宰者的教训的信仰愈来愈降低了。这种情绪可以加以谴责，可以给予惩罚，但是必须承认它是确实存在的；大家都应该知道这样的现象是可悲的，而如果一切都仍然照旧的话，那将会是致命的。”

在事实方面，卡莱尔讲的完全对，只是在责备工人对上等阶级的炽烈的憎恨的时候，他就错了。这种憎恨、这种愤怒宁可说是一种证明，它证明工人感觉到他们是处在一种怎样非人的状况里，证明他们不愿意被当做牲口来看待，证明他们总有一天要把自己从资产阶级的羁绊下解放出来。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那些没有这种愤怒的工人身上来加以判断：一些人温驯地屈服于自己的命运，老老实实，随波逐流，不关心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帮助资产阶级把束缚工人阶级的锁链锻得更结实，而精神上还是处于工业时代以

---

① 陀斐特（Tophet）是耶路撒冷南部的欣嫩子山谷，为犹太人焚人以供牺牲之处，以后成为焚毁垃圾的地方。参看旧约全书耶利书第19章。—— 译者注

㊀ “宪章运动”第34页及以下各页。—— 恩格斯原注

时代以前的那种停滞状态;另一些人成了命运的玩物,就像已经失去外表的稳定性一样,正在丧失着内心的稳定性,过一天算一天,酗酒,追女人。—— 在这两种情形下,他们都是牲口。后一种人主要是促进了“恶习的迅速传播”,而多愁善感的资产阶级,在他们自己创造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以后,却对这种现象愤慨起来。

使工人道德沦丧的另一个根源就是他们的劳动的强制性。如果说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末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痛苦。还有什么能比必须从早到晚整天地做那种自己讨厌的事情更可怕呢!工人愈是感到自己是人,他就愈是痛恨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感觉到这种工作是被迫的,对他自己说来是没有目的的。他为什么工作呢?是由于喜欢创造吗?是由于本能吗?决不是这样!他是为了钱,为了和工作本身毫无关系的东西而工作。他工作,因为他不得不工作,而且他要一连工作多少个钟头,单调得令人厌烦;如果他还保有些微人的感情的话,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在最初几个星期内使他感到工作是一种痛苦。分工更把强制劳动所具有的使人动物化的这种作用增强了好多倍。在大多数的劳动部门里,工人的活动都被局限在琐碎的纯机械性的操作上,一分钟又一分钟固定不变地重复着,年年都是如此㊀。如果一个人从童年起就每天有十二小时或十二小时以上从事于制针头或锉齿轮,再加上像英国无产者这样的生活条件,那末,当他活到三十岁的时候,也就很难保留下多少人的感情和能力了。这种情形在使用机器和蒸气动力以后也没有改变。工人的劳动减轻了,

---

㊀ 是否在这里也需要引用一下资产阶级权威人士的证明呢?我只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容易地在亚当·斯密的“原富”(前引用版)第3卷第5编第1章第297页上找到。—— 恩格斯原注

肌肉不需要紧张了，工作本身成了一些琐碎的事情，但同时也单调到了极点。这种工作不让工人有精神活动的余地，并且要他付出这样大的注意力，使他除了把工作做好，别的什么东西也不能想。这种强制劳动剥夺了工人除吃饭和睡觉所最必需的时间以外的一切时间，使他没有一点空闲去呼吸些新鲜空气或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更不用说什么精神活动了，这种工作怎么能不使人沦为牲口呢？这样，工人还是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或者屈服于命运，做一个“好工人”，“忠实地”维护资产者的利益（如果这样做，他就势必要变成牲口），或者起来反抗，尽一切力量捍卫自己的人类尊严，而这只有在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做到。

所有这些原因已经在工人阶级中引起了严重的道德堕落的现象，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使这种道德堕落的现象更加扩大，使它达到了极点，这个原因就是人口的集中。英国资产阶级作家们正在因大城市的伤风败俗的影响而大声疾呼，——这些耶利米[①]颠倒黑白地为之哀歌的不是城市的破坏，而是城市的繁荣。**艾利生**郡长几乎把一切都归咎于这个原因；而“大城市的时代”一书的作者**弗安**博士则更是如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他各种对工人的身体和精神起破坏作用的原因，都和有产阶级的利益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假若这些作家承认贫穷、生活无保障、强制的过度劳动是主要的原因，那末所有的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就得对自己说：既然这样，我们就给穷人们财产吧，我们就保障他们的生活吧，我们就颁布法令来禁止过度的工作吧；而资产阶级是不能同意这样做的。然而大城市是自行成长起来的，人们迁居到那里也完全是出

① 耶利米是希伯来的先知。参看旧约全书耶利米哀歌。——译者注

于自愿；同时现在也还不能立刻就得出结论说：创造大城市的只是工业和靠工业发财的资产阶级；于是统治阶级就很便于把一切灾难都归咎于这个从外表上看起来似乎不可排除的原因。实际上，大城市不过是创造了一些条件，促使那些早已存在、至少已处于萌芽状态的罪恶迅速而全面地发展起来而已。艾利生至少还保有相当的人性，他还承认这种罪恶，——他并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工业资产者和自由党人，而只是一个半成熟的资产者和托利党人，所以真正的资产者完全看不见的东西他有时还能看得清楚。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正是在大城市里，恶习和不正当的享乐布下了诱人的天罗地网；正是在这里，犯罪因可望不受惩罚而得到鼓励，懒散因有屡见不鲜的坏榜样而得到助长。一切坏人和浪子避开了淳朴的乡村生活，投向这里，投向这些人类堕落的大中心；在这里，他们可以为自己的恶行找到牺牲品，而他们所冒的危险也因容易发财而得到补偿。美德在这里湮没无闻，罪恶由于不容易识破而繁荣滋长；放荡的生活因为可以给人以眼前的欢乐而为人所喜好。谁要是在夜里走过圣詹尔士区，走过都柏林的狭窄而拥挤的胡同，走过格拉斯哥的贫民区，那他就会找到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些话，并且他不会奇怪世界上的罪恶怎么这样多，反而会奇怪怎么这样少…… 大城市腐化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坏榜样所具有的传染性，在于年轻一代很容易遇到，而且每天都会遇到恶习的引诱，因而很难抵御这种引诱。有钱人 eo ipso〔当然〕并不比穷人好些，他们要是处在同样的情况下也是经不起这种引诱的；穷人们特别不幸的，是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不遇到**恶习的引诱和犯禁的享乐的诱惑…… 在大城市里，要使没有财产的阶级中的年轻一代免受恶习的引诱，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道德堕落的原因。”

在做了一长段有关道德的论述之后，我们的作者继续写道：

“这一切并不是由于穷人的性格中有什么特别堕落的因素，而是由于穷人所受的诱惑本身具有几乎不可抗拒的力量。指责穷人行为的富人自己也会

同样迅速地接受那些原因的影响。有某种程度的贫困，就有某种引人堕落的力量，美德很少能够抵挡得住，特别是年轻人很少能够抵挡得住。在这种情形下，恶习的传播几乎和人体的传染病一样不可避免并且也常常同样地迅速。”

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个作者写道：

“当上等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大批工人塞在一个小小的地方的时候，罪恶的传染就特别迅速而且不可避免。下等阶级，就他们现在的宗教和道德的发展水平而论，往往很难责备他们屈服于周围的诱惑，正如同很难责备他们**成为伤寒的牺牲品**一样。”㈠

够了！尽管半资产者艾利生的见解是有局限性的，但是他却把大城市在工人道德发展方面造成的有害后果暴露出来了。另外还有一个十足的资产者，反谷物法同盟的中心人物安得鲁·**尤尔**博士㈡暴露了这些后果的另一个方面。他告诉我们，大城市的生活助长工人中的阴谋的发生，并给平民以力量。根据他的意见，如果不适当地教育一下工人（就是教育他服从资产阶级），他们就会片面地从狠毒的自私自利观点来看问题，并且容易被狡猾的煽动家所诱惑；他们甚至还会用嫉妒和敌对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最好的恩人**——那些俭朴的富于进取心的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正确地教育他们才行，否则，国家就要破产，其他灾祸就要发生，因为工人的革命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资产者担心得很对。人口的集中固然对有产阶级起了鼓舞的和促进发展的作用，但是它更促进了工人的发展。工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

㈠ “人口原理”第2卷第75页及以下各页、第135页。——恩格斯原注

㈡ “工厂哲学”1835年伦敦版（《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London, 1835）。我们以后还要提到这本恶名昭彰的书。这里所引证的见该书第406页及以下各页。——恩格斯原注

级;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分散时虽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这促进了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分离,促进了工人所特有的、也是在他们的生活条件下所应该有的那些见解和思想的形成,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受压迫的地位,他们开始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影响和作用。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工人第一次开始考虑到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在这里,产生了工会、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机体的病患,在农村中是慢性的,而在大城市中就变成急性的了,从而使人们发现了这种病的真实本质和治疗方法。如果没有大城市,没有它们推动社会意识的发展,工人绝不会像现在进步得这样快。此外,大城市清除了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宗法关系的最后残迹,在这方面,大工业也助了一臂之力,因为它使依附于一个资产者的工人的数目大为增加了。资产阶级对此大为惋惜,而这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在以前的那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是几乎保险不会受到工人的反抗的。资产者随心所欲地剥削自己的工人,支配他们,而且,如果他在工资以外,还对他们表现一点不花一文钱的和蔼可亲的态度,或者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这一切似乎纯粹是出于一种不平常的好意,虽然加起来还不到他所应当做的事情的十分之一),那末还可以获得这些傻子的服从、感激和爱戴。不错,作为被置于并非自己所创造的环境中的个别资产者,他或许已经尽了自己的一部分责任;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这个阶级正由于**它是统治者**,就应当对整个国家的状况负责,应当关心公共的利益,——他就一点也没有做他的地位要求他做的事,而且还为了自己的私利剥削着整个民族。在伪善地掩饰着工人的奴隶地位的宗法关系下,工人不能不仍然是一个精神上已

经死亡的、完全不了解自己的利益的十足的庸人。只有当他和自己的雇主疏远了的时候，当他明显地看出了雇主仅仅是由于私人利益、仅仅由于追求利润才和他发生联系的时候，当那种连最小的考验也经不起的虚伪的善意完全消失了的时候，也只是在这个时候，工人才开始认清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开始独立地发展起来，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不再在思想上、感情上和要求上像奴隶一样地跟着资产阶级走。而在这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大工业和大城市。

对英国工人的性格有重大影响的另一个要素是爱尔兰工人向英格兰移民，这件事在这一点上的意义我们已经谈过了。一方面，如我们所看到的，它固然使英格兰工人的水平下降，使他们和文化隔绝，使他们的状况恶化；但同时，在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的加深，从而加速了即将发生的危机的来临。问题在于，英国所患的社会病的过程和身体生病的过程是一样的；它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它有它的危机，危机中最后和最厉害的一次就决定患者的命运。因为英国这个国家不会在这次最后的危机中灭亡，而相反地一定要从危机中复活更新，所以我们对于使这个病症加剧的一切因素都只能感到高兴。此外，爱尔兰移民之所以在这方面起了促进的作用，还因为这个运动把爱尔兰人的热情而生气勃勃的气质带到了英格兰并灌输给英国工人阶级。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之间的差别，在许多地方都很像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的差别。爱尔兰人比较轻浮、容易激动、热情奔放；英格兰人则沉着、坚毅、富于理智，他们相互来往，归根到底，对两方面都只会有好处。假使没有爱尔兰人那种慷慨到能做自我牺牲的、首先是受感情支配的性格掺合在英格兰工人阶级身上，假

使不是爱尔兰血统的混合以及与爱尔兰人的经常来往使得英格兰人纯理智的冷静的性格变得柔和起来，那末英国资产阶级的冷酷的利己主义就会更加长久地保存在工人阶级中。

懂得了这一切以后，对于英国工人阶级逐渐变成一种和英国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人，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资产阶级和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之间的共同点，比起它和它身边的工人之间的共同点来，都要多得多。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是这样地不相同，就好像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在欧洲大陆上，到现时为止我们还只认得这两种人中的一种，即资产阶级。可是对英国的未来更加重要得多的，恰好是另一种人，即由无产者所组成的那一种人。㊀

英国工人在公共团体中和政治观点上所表现的社会性格，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在这里我们只想谈谈上述各种原因所造成的后果，而且只谈这些后果对工人的个性所起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工人比资产者仁慈得多。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乞丐通常都几乎只向工人求乞，工人在帮助穷人方面无论如何比资产阶级做得多。这个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证实的事实，曼彻斯特的掌教帕金逊先生也证实了。他说：

"穷人给穷人的要比富人给穷人的多。我可以引用我们的最老、最有经验、最善于观察和最仁慈的医生之一巴兹里博士的证言来证实我的话。他公开地说过，每年穷人们互相给予的总数超过了同时期内富人给予穷人的数

㊀ 大家知道，迪斯累里在他的长篇小说"神巫，或两种民族"（《Sybil，or the Two Nations》）中，几乎和我同时说出了大工业把英国人分为两种不同的民族的见解。——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目。”㊀

工人的仁慈也表现在其他各个方面，而且其表现形式也是令人愉快的。他们自己就是命途多舛的，所以他们能同情境况不好的人。在他们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人，而在资产者的眼光中，工人却不完全是人。所以工人是比较和气比较可亲的，虽然他们比有产阶级更迫切地需要钱，但他们并不那样贪财；对他们来说，金钱的价值只在于能用它来买东西，可是对资产者来说，金钱却具有一种为它本身所固有的特殊的价值，即偶像的价值，这样，它就使资产者变成了卑鄙龌龊的“财迷”。完全没有这种金钱崇拜感的工人，并不像资产者那样贪婪，资产者为了多赚钱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装满自己的钱袋。所以工人比资产者偏见少得多，看问题清楚得多，不戴上自私的眼镜来看一切。因为缺少教育；所以他没有宗教偏见。他不懂得这些事情，也不为这些事情伤脑筋，在他身上看不到支配着资产阶级的那种狂热。如果说他也有点宗教信仰的话，那也只是名义上的，甚至连理论上的都谈不到。实际上他只是为今生而活着，并力求在今生生活得更好一些。所有的资产阶级作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工人不信教，也不上教堂。恐怕只有爱尔兰人、一些老年人和半资产者——监工、工头等类的人才是例外。在群众中几乎到处都是完全漠视宗教的，最多也只能看到一些自然神论的迹象，而且非常不明确，以致只表现在一些口头禅或对 infidel（不信教的人）和无神论者这类名词的本能

㊀ 曼彻斯特的帕金逊掌教著的小册子“曼彻斯特等地的穷人劳动者的现状”1841年伦敦和曼彻斯特版第3版（《On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or in Manchester etc.》. By the Rev. Rd. Parkinson, Canon of Man- chester. 3rd. edit. London and Manchester, 1841. Pamphlet)。——恩格斯原注

的恐惧上。一切教派的牧师都很不受工人欢迎，虽然他们在工人中的影响只是在最近才失去的；现在，只要大叫一声《he is a par– son!》（“他是个牧师！”），就常常能够把一个牧师从公共集会的讲坛上赶下来。和生活条件本身一样，缺少宗教教育及其他教育，也使得工人比资产者客观，比资产者容易摆脱传统的陈腐的原则和先人之见的束缚。资产者被自己的阶级偏见，被那些从小就灌输给他的原则一直淹没到耳朵，这种人是无可救药的。他即使在形式上是自由主义的，但实质上还是保守的；他的利益和现存的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在任何前进的运动中都是一具僵尸。他不再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头，工人将要起而代之，——最初只是理应如此，以后就会在实际上做到这一点。

这一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工人的社会活动——这种活动我们在下面再谈——形成了这个阶级的性格的好的一方面；坏的一方面也可以大致说一下，而且它是同样自然地由上述原因造成的。酗酒、纵欲、粗暴以及对私有财产的不尊重，这就是资产者加在工人头上的一些主要罪名。工人酗酒是十分自然的。据艾利生郡长说，在格拉斯哥，每个星期六晚上至少有3万个工人喝得烂醉。这个数字确实没有夸大，在这个城市里，1830年每十二幢房子中有一家酒店，而在1840年每十幢房子中就有一家。在苏格兰，1823年纳消费税的烧酒有2300000加仑，而在1837年就有6620000加仑。在英格兰，1823年有1976000加仑，而在1837年就有7875000加仑。㊀1830年颁布的啤酒法案便利了所谓jerry– shops〔下等啤酒店〕的开设（在这些酒店里许可卖零杯的啤酒），这也助长了酗酒的风

㊀ 引自“人口原理”的几个地方。——恩格斯原注

气，因为几乎每一家的门前都有酒店了。几乎在每一条街上都可以找到几家这样的啤酒店，而在乡下，只要有两三幢房子在一起，其中就必然有一家jerry— shop〔下等啤酒店〕。此外，还有很多 bush — shops〔私酒店〕，即没有获得许可的秘密酒店，在大城市中警察很少到的偏僻地方，有不少秘密酒坊酿造着大量的烧酒。据盖斯克尔在前引书中估计，这种酿酒作坊在曼彻斯特一地就有一百多家，它们的年产量至少达156000加仑。此外，曼彻斯特还有一千家以上的酒店，因之它们在总户数中所占的比例至少也和格拉斯哥一样大。在其他的一切大城市中，情形也完全一样。除酗酒所造成的一般后果外，如果还注意到，在这些地方，和资产阶级政权下堕落最深的牺牲者，和小偷、骗子、妓女混在一起的，有各种年龄的男人和妇女，甚至还有小孩，有时还有抱着小孩的母亲，如果还记起有些母亲给怀抱中的婴儿喝酒，那就未必会有人否认这种场所对它们的顾客所起的伤风败俗的影响了。特别是在星期六晚上，工资发了，散工也比平时略早一些，所有的工人都从自己的贫民窟中涌到大街上去，这时，人们就可以看到酗酒的全部粗野情形。我在这样的夜晚从曼彻斯特走出去的时候，很少不遇到一大批东倒西歪的或躺在水沟里的醉汉。在星期天晚上，这一幕通常还要重演一番，只是吵闹得少一些罢了。而当钱花光了的时候，这些酒徒就跑到最近的一家当铺里去，——这种当铺每个大城市中都有许多，在曼彻斯特有六十家以上，光是索尔福的一条街（礼拜堂街）就有十到十二家，——当掉他们仅有的一切。家具、节日的衣服（如果有的话）、饮食用具在每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大批地从当铺里赎出来，然后在下星期三以前几乎又都回到当铺里去，直到出了件什么事情，结果这些东西无法赎回，一件件都落到高利贷者

的手里，或者是高利贷者再也不愿意为这些破旧不堪、毫无用处的东西付出一个小钱，那才算完。谁要是亲眼看到过酗酒在英国工人中间流行的情形，谁就会欣然相信艾释黎勋爵的话[一]，他说，工人每年花在喝酒上面的钱将近2500万英镑。因此，酗酒如何使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恶化，如何破坏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健康，如何引起家庭纠纷，那是容易想像的。不错，戒酒协会是做了不少事情的，但是几千个《Teatotallers》〔“戒酒主义者”〕对几百万工人说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当爱尔兰的戒酒使徒马太神甫在英国的城市里巡行的时候，往往有3万到6万工人《pledge》（起誓）不再喝酒，但是不出一个月，大多数人就全都忘了。譬如说，要是计算一下过去三四年中在曼彻斯特起过戒酒誓的人究竟有多少，得出的数字一定会比全城居民的总人数还要多，但是仍然看不出酗酒的现象有显著的减少。

除酗酒外，许多英国工人的另一个大毛病就是纵欲。这个阶级既然处于无人照管的情况下，又没有正当地享受他们的自由所必需的手段，那末，这种毛病的产生，就是无可避免的，就是铁的规律。资产阶级只留给他们这两种享乐，同时却把大量的沉重的劳动和苦痛加到他们身上。结果是，工人为了还想从生活中得到点什么，就把全部热情集中在这两种享乐上，过度地极端放纵地沉溺在里面。如果人们被置于只适合于牲口的状况里，那末他们除了起来反抗或者真的沦为牲口，是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更何况资产阶级自己，甚至他们中的一些正派人物都直接助长了卖淫呢？每天晚上充塞于伦敦街头的4万个妓女[二]中有多少是靠道德高尚的资产阶级为生呵！为了不得不向每一个过路人出卖自己的肉体以免饿

[一] 1843年2月28日在下院的演讲。——恩格斯原注

[二] 艾利生郡长“人口原理”第2卷。——恩格斯原注

死，她们当中有多少人应当感谢她们的第一个引诱者——资产者呵！最没有权利责备工人淫荡的就是资产阶级，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加在工人头上的全部罪名就是放纵地追求享乐、没有远见以及不遵守现存的社会秩序，就是不能为了较长远的利益而牺牲眼前的享乐。但是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一个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却只能得到极少的报酬和肉体的享乐的阶级，难道能够不盲目而贪婪地投入这些享乐中去吗？既然谁也不关心这个阶级的教育，既然他们的命运要受各式各样的偶然事件的支配，既然他们的生活朝不保夕，那末他们又有什么理由，又有什么兴趣使自己成为有远见的人，过“踏踏实实的”生活，并为了将来的享乐而牺牲眼前的享乐呢？而这种将来的享乐对于**他们**这些总是处在动荡不定的、毫无保障的状况中的人来说还是很不可靠的。对于一个忍受了现存社会秩序的一切害处却享受不到它的些微好处的阶级，对于一个只能受到现存社会制度敌视的阶级，难道还能要求他们尊重这个社会秩序吗？这未免太过分了！但是只要这个社会秩序存在一天，工人阶级就一天不能避开它，而如果个别的工人要起来反对这个社会秩序，那末最大的灾祸就会落到他的身上。这样，社会秩序就使得工人几乎不可能有家庭生活。在一间零乱肮脏、连做夜店都不够格、家具很坏、往往一下雨就漏水、不生火、空气不流通而且又挤满了人的房子里，是不可能有家庭乐趣的。丈夫整天出去工作，妻子和大一点的孩子也常常是这样，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只有早晨和晚上才能碰到，另外，他们还经常受到烧酒的诱惑，——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生活会成什么样子呢？但是工人还是离不开家庭，他必须在家里生活，这就引起了无休止的家庭纠纷和口角，不

仅对夫妇两人，而且特别是对他们的孩子起着极其不良的影响。忽视一切家庭义务，特别是忽视对孩子的义务，在英国工人中是太平常了，而这主要是现代社会制度促成的。对于在这种伤风败俗的环境中——他们的父母往往就是这环境的一部分——像野草一样成长起来的孩子，还能希望他们以后成为道德高尚的人！踌躇满志的资产者对工人的要求真是太天真了！

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只要那些使工人道德堕落的原因起了比平常更强烈更集中的影响，工人就必然会成为罪犯，正像水在列氏80°时由液态变为气态一样。在资产阶级的粗暴野蛮、摧残人性的待遇的影响之下，工人逐渐变成了像水一样缺乏自己意志的东西，而且也同样必然地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到了某一点他的一切行动就会不由自主。因此，随着无产阶级人数的增长，英国的犯罪的数字也增加了，不列颠民族已成为世界上罪犯最多的民族。从内务部每年公布的“犯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犯罪的数字在英国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增加着。仅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当事人因刑事罪而被捕的事件的数字是：

1805年	4605
1810年	5146
1815年	7898
1820年	13710
1825年	14437
1830年	18107
1835年	20731
1840年	27187
1841年	27760
1842年	31309

换句话说，在三十七年中逮捕事件的数字增加了6倍。在1842年发生的这些逮捕事件中，仅郎卡郡一地就有4497起，即14%强，在密多塞克斯区（包括伦敦在内）有4094起，即13%强。这样，我们就看到，仅仅这两个地区（包括一些无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大城市），就占了全国犯罪数字的$^1/_4$以上，虽然它们的人口远不及全国人口的$^1/_4$。从这些犯罪统计表中还可以明白地看出，绝大部分的罪都是无产阶级犯的，因为在1842年的罪犯中有32．35%完全不会读不会写，有58．32%不完全会读会写，有6．77%读和写都不错，有0．22%受过较高的教育，还有2．34%的教育程度不详。在苏格兰，犯罪的数字增加得更快。在这里，1819年当事人因刑事罪被捕的只有89件，到1837年已经有3176件，到1842年甚至增加到4189件。在艾利生郡长本人做官方报告的拉纳克郡，居民在三十年中增加1倍，而犯罪数字在五年半中就增加了1倍，即比居民的增长快5倍。至于所犯的罪，则和所有的文明国家里一样，大多数是侵犯私有财产，即由于缺少某种东西而发生的犯罪，因为谁也不会去偷窃他自己已经有的东西。侵犯私有财产的罪行和人口数目的比例在荷兰是1∶7140，在法国是1∶1804，在英国，当盖斯克尔写书的时候是1∶799；侵犯人身的罪行和人口数目的比例在荷兰是1∶28904，在法国是1∶17573，在英国是1∶23395。在农业区，一般罪行和人口数目的比例是1∶1043，而在工厂区则是1∶840[㈠]；现在，在全英国这比例**几乎是**1∶660[㈡]，而从盖斯克尔的书出版以来，总共还不到十年呵！

㈠ “英国的工业人口”第10章。——恩格斯原注

㈡ 这是已定罪的犯人人数（22733人）除以居民总数（约15000000人）所得的数字。——恩格斯原注

要使每一个人，甚至使资产者来思考一下这种情况所引起的后果，这些事实真是已经绰绰有余了。如果堕落和犯罪再以同样的比例增长二十年，——要是在这二十年中英国工业不像以前那样走运，这个比例就只会增大，——那结果会怎样呢？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社会正在全面解体，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拿起一张报纸而不看到社会纽带全部松弛的最显著的例子。我从面前的一堆英国报纸中随手拿出一张，这是1844年10月30日的“曼彻斯特卫报”，里面报道了三天的消息。这个报纸已经不再花力气去详细报道曼彻斯特的消息了，它只选择最惹人注意的事实来叙述：在一个工厂里，工人因要求提高工资而罢工，但治安法官强迫他们复了工；在索尔福，几个男孩子偷东西被捉住了，一个破产的商人想欺骗他的债权人。附近城市的消息报道得比较详细些：埃士顿发生了两起偷窃案、一起破门入盗案和一起自杀案；柏立发生一起偷窃案；波尔顿发生两起偷窃案和一起偷漏消费税案；里城发生一起偷窃案；在奥尔丹，发生了一起因工资而引起的罢工、一起偷窃案，几个爱尔兰女人打架，一个不是工会会员的制帽工人被工会会员殴打，一个儿子殴打母亲；罗契得尔发生许多起斗殴案、一起袭击警察案和一起抢劫教堂案；在斯托克波尔特发生了一起工人对工资不满的事件、一起偷窃案、一起欺诈案、一次斗殴，一个男人殴打老婆；瓦灵顿发生一起偷窃案和一次斗殴；威根发生一起偷窃案和一起抢劫教堂案。伦敦的报纸所报道的还要糟得多。在这里各式各样的欺诈、偷窃、抢劫以及家庭纠纷是一件接着一件的。我手边正好有一张1844年9月12日的“泰晤士报”，里面只登载着一天的消息。它报道了一起偷窃案、一起袭击警察案、一项要父亲出钱抚养非婚生子的判决、一起父母遗弃孩子以及一起妻子毒死丈夫的案件。类似的报道在英国

所有的报纸上都可以看到。在这个国家里，社会战争正在炽烈地进行着。每个人都只顾自己，并为了自己而反对其他一切人。他是否要伤害其余所有被他看做死敌的人，那纯粹是由自私自利的打算来决定，就是说，看怎样才对他更有利。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和自己的同伴和睦相处，一切分歧都要用威吓、武力或法庭来解决。一句话，每一个人都把别人看做必须设法除掉的敌人，或者最多也不过把别人看做一种可以供自己利用的工具。而且这个战争，正如犯罪统计表所表明的，是一年比一年激烈、残酷和不可和解了。敌对的各方面已渐渐分成互相斗争的两大阵营：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这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它不过是自由竞争所包含的原则的彻底实现而已。奇怪的倒是，虽然孕育着大雷雨的乌云日益密集在资产阶级头上，但他们却泰然处之，无动于中；虽然他们每天都在报上看到这些事情，但他们别说没有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感到愤怒，甚至也没有对这种社会制度所引起的后果感到恐惧，没有对每一件个别的犯罪行为所预示的总爆发感到恐惧。可是这却正好说明了资产阶级之所以为资产阶级；由于资产阶级的观点，他们甚至连事实都看不清，更不用说这些事实所产生的结果了。简直无法相信，阶级偏见和先入之见竟使得整个阶级这样极端盲目，我还想说，简直盲目到疯狂的程度了。但是民族还是要按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不管资产阶级是否能看到这一点；而且这种发展总有那么一天会发生一种使有产阶级大吃一惊的、连他们的智者也梦想不到的意外事件。

各别的劳动部门

狭义的工厂工人

现在我们来比较详细地研究英国工业无产阶级各个最重要的部分。根据上面(第299页)规定的原则,应当从工厂工人即工厂法所涉及的工人开始。这个法律规定了利用水力或蒸气力来纺织羊毛、蚕丝、棉花成亚麻的一切工厂的工作时间;因而,它的效力及于英国工业各个最主要的部门。在这些生产部门工作的工人是英国工人中资格最老、人数最多、智慧最高、力量最大、因而也最不安分而且是资产阶级最恨的。站在工人运动的最前列的正是这些工人,首先是棉纺织业中的工人,正如领导着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的是他们的主人即厂主,首先是郎卡郡的厂主一样。

我们在"导言"里已经看到,在这些生产部门中工作的人如何因新机器的出现而首先被迫脱离了以前的生活条件。因此,后来陆续发明的新技术也极其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这一部分人,这就毫不足怪了。在尤尔[一]、培恩斯[二]等人写的棉纺织业史中,每一页上都讲到日新月异的改进,其中大部分也已经在纺织工业中的上述

[一] 安·尤尔博士"大不列颠的棉纺织业"1836年版(《The Cotton Manufacture of Great Britain》.By Dr.A.Ure.1836)。——恩格斯原注

[二] 爱·培恩斯"大不列颠棉纺织业史"(《History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e of Great Britain》.By E.Baines,Esq.)。——恩格斯原注

其余部门里被采用了。手工劳动几乎到处都被机器排挤掉，几乎一切操作都用水力或蒸气力，而且每年都有更新的改进。

在一个组织得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所有这些改进都只会受到欢迎；但是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进行得正激烈的地方，个别的人把一切利益都攫为己有，从而剥夺了大多数人的生活资料。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抢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愈大，工人失业的就愈多。因此，每一种改进都像商业危机一样给某一些工人带来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让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由于头一个发明——一个工人摇动的珍妮纺纱机（见前）的生产能力至少比一架普通纺车高5倍，所以每一架新的珍妮纺纱机就要使5个纺工失业。生产力比珍妮纺纱机大得多而且也只需要一个工人操纵的水力纺纱机就剥夺了更多的人的生计。产量不变而需要工人更少的骡机也起着同样的作用，而它的每一次改进，即锭子数目每增加一次，都又一次地减少了所需工人的数目。骡机上的锭子已经大大增加，使许多工人都失业了：以前一个纺工和几个接断头的童工（piecers）管600个锭子，而现在他一个人就能够看两架骡机，总共是1400—2000个锭子，这样，两个成年纺工和他们的一部分助手就得失业。自从许多纺纱工厂使用自动纺机以后，纺工的作用就全部化为乌有而由机器代替了。我手头有一本书㊀，是曼彻斯特一位公认的宪章派领袖詹姆斯·李奇写的。作者曾在不同的工业部门里，在工厂里和煤矿里工作过多年，我个人也许知道他是一

㊀ “一位曼彻斯特工人所揭露的关于工厂的无可否认的事实”，议会议员威·拉释莱出版并献给工人阶级。1844年伦敦奥利维利尔书店版第28页及以下各页（《Stubborn Facts from the Factories》. By a Manchester Operative. Published and dedicated to the Working Classes by Wm. Rashleigh, M.P London, Ollivier, 1844, p.28 ff.）。——恩格斯原注

位诚实、可靠而且能干的人。由于他在党内的地位，他掌握了工人自己搜集起来的、关于各种工厂的许多极为详细的资料。他做了若干统计表，从这些表中可以看出，在1829年，35个工厂总共比1841年多用了1060个纺工，虽然在这个时期内这些工厂里的锭子数目已经增加了99239个。他还举出了5个工厂，在这些工厂里连一个纺工都没有了，因为那里只使用自动纺机。锭子的数目增加了10%，可是纺工的数目却减少了60%多。而从1841年起，——李奇补充道，——通过把锭改子改为双排（double decking）等等办法而实行了许多改进，结果上述工厂中的某几个厂从1841年起又解雇了一半纺工。在一个不久以前还有80个纺工的工厂里，现在只剩下了20个纺工，其余的不是被解雇，就是被迫做童工的工作，拿童工的工资。关于斯托克波尔特，李奇也报道了同样的情况，1835年这里有800个纺工，1843年却只有140个了，虽然这个城市的工业在这八九年中有很大的发展。在梳棉机方面最近也做了类似的改进，这就剥夺了一半工人的生计。一个工厂里安装了改良并纱机，结果八个女孩子中有四个失业，而其余四个的工资也被厂主从8先令减到7先令。织布业方面的情形也是一样。动力织机一个接一个地夺取了手织机在织布业里的一切地盘。因为它生产的要比手织机多得多，而且一个工人能看两架动力织机，所以在这里也有许多工人失业。在所有的工厂生产部门中，在纺麻和纺羊毛方面，在蚕丝的加工方面，情形都是一样；动力织机甚至已开始夺取毛织品和麻织品生产的个别部门。仅仅在罗契得尔一地，在织法兰绒及其他毛织品的部门里用动力织机的就比用手织机的多。对于这一点资产阶级通常总是这样回答：机器一改进，生产费用就减少，结果成品的价格就降低，而价格一降低，消费量就会增加，因而失业的工人很快就能在新建的工厂里

重新找到工作。当然，资产阶级有一点是完全对的，这就是在有利于一般工业发展的一定的条件下，以廉价原料制成的商品的价格每降低一次，都会大大地增加消费量，促成新工厂的创办。但是除了这一点资产阶级的论断就没有一个字是对的。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在价格降低的结果显示出来和新工厂建立起来以前，是要经过许多年的。他们绝口不谈，由于机器方面的各种改进，真正的费力的工作一天天地被机器所代替，从而成年男人的工作就变成了简单的看机器的工作，这是纤弱的妇女甚至小孩子也完全可以做的，而做这个工作所得的工资要少一半，甚至少三分之二；这样一来，尽管生产已经扩大，成年工人却一天天地从工业中被排挤出来，而且**再也找不到**工作；因此，整个整个的劳动部门或者完全取消了，或者改变得很厉害，弄得工人必须从头学起；在禁止童工劳动的问题被提出来时，资产阶级总说，要想获得必要的工厂技能，必须从小即从十岁以前学起（例如见“工厂劳动调查委员会报告”的几个地方），但是在这里他们却竭力避免提到这一点。最后，他们绝口不谈，技术发展的过程在不断地继续着，即使工人真的在新的劳动部门里找到了工作，机器的改进还是要把他从那里排挤出去，使他最后失去对明天的信心。但是资产阶级却获得了机器改进的全部利益。在最初几年，当许多老机器还在工作，改进还没有普遍实行的时候，资产阶级抓到了发财致富的最好的机会，这时要资产阶级看到机器生产发展的坏的一面，那未免对他们要求太高了。

机器一改进，工资就降低，这也是资产阶级激烈地加以反驳的，但工人却再三地坚持这一点。资产阶级要我们相信，虽然**计件工资**随着生产的改进而降低了，但每周的工资一般说来与其说是

降低，不如说是提高了，工人的状况与其说是变坏，不如说是改善了。要彻底搞清楚这个问题是困难的，因为工人所引的多半是**计件工资**下降的例子。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各种不同的劳动部门里每周的工资也毫无疑问地随着机器的采用而降低了。在骡机上纺细纱的所谓精纺工确实拿到较高的工资，每周三四十先令，这是因为他们组成了一个坚强的工会来反对降低工资，同时他们的劳动也需要长期的训练。但是普通的纺工所得的工资就很低了，因为他们不得不和不适于纺细纱的自动纺机（self-actors）竞争，而且这种机器的应用又大大打击了他们的工会。一位这样的纺工告诉我，他一个星期挣的钱不超过14先令，这和李奇的材料是符合的，他说，在各个不同的工厂里普通纺工一星期挣不到16¹/₂先令，三年前一星期挣30先令的纺工，现在勉勉强强才能挣12¹/₂先令，而去年一年的平均工资也没有超过这个数目。的确，女工和童工的工资是下降得少一些，但这只是由于一开始就不高的缘故。我认识许多女工，都是有小孩的寡妇，她们拚了命每星期也只能挣八九个先令，而每一个知道英国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的人都承认，这一点钱是不够养家的。所有的工人都异口同声地断定，工资随着机器的改进而普遍降低了。工业资产阶级说什么工人阶级的状况随着机器的使用而改善了，工人自己却认为这是一个弥天大谎，而要证实这一点只要在工厂区里的每一个工人大会上听听就可以了。但**即使**真的只是相对工资即计件工资降低，而绝对工资即工人一星期挣的总数并没有变动，那又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来呢？这只是说，工人必须心平气和地看着厂主老爷们装满自己的腰包，看着他们从每一种改进中得到好处，却连极小的一份也不分给他们工人。资产阶级在和工人斗争时连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

的原理都忘记了。这个在其他场合下把马尔萨斯当做神的资产阶级惶恐地向工人叫道：假使没有机器，英国人口中增加的那几百万人到哪里去找工作呢[一]？多么地荒谬！似乎资产阶级自己知道得不够清楚，假使没有机器和机器所促成的工业繁荣，这“几百万人”根本就不会出世，也不会长大！如果说机器也给工人带来了某种好处，那就只是它向工人证明了社会必须改造，使机器**不再为害**于工人，而是**造福**于工人。这些聪明的资产者老爷们可以去问问曼彻斯特或其他任何地方的清道夫（现在，这当然已经晚了，因为在这方面也发明了而且使用了机器），去问问那些在街上卖盐、卖火柴、卖橘子、卖鞋带等等或者竟不得不讨饭的人，问问他们过去是干什么的，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会回答道：工厂工人，被机器剥夺了工作的工人。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机器的改进对工人只能产生不利的并且经常是很严重的后果；每一部新机器都会带来失业、匮乏和贫穷，而在英国这样本来就几乎总有“过剩人口”的国家里，在大多数情形下失掉工作就是一个工人可能遭遇到的最倒霉的事情。不用说，技术不断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失业所产生的这种生活无保障的现象，对于一个生活本来就已经十分动摇不定的工人，起着怎样使人泄气，使人沮丧的作用呵！要避免陷入绝望状态，在这里工人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在内心里、在表面上都反抗资产阶级，或者过酗酒和放荡的生活。英国工人有的选择了第一条路，有的选择了第二条路。英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叙述了成百次的破坏机器和反抗资产阶级的骚动，而关于放荡生活，我们已经谈过，这当然只是绝望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而已。

[一] 例如普蒙兹先生在他的“手工业和手工业者”一书中就是这样发问的。——恩格斯原注

最倒霉的是那些不得不和新采用的机器竞争的工人。他们生产的商品的价格是由机器生产的同样商品的价格来决定的，而因为机器生产比手工生产便宜，所以和机器竞争的工人得到的工资是最低的。在旧式机器上工作的工人，如果他不得不和最新式的改良了的机器竞争的话，他的遭遇也是一样。当然，另外还有谁会来担负这种损失呢？厂主既舍不得扔掉旧机器，又不愿意受到损失；对死的机器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于是他就在活的工人身上，在整个社会的替罪羊身上打主意。在这些不得不和机器竞争的工人中间，生活得最坏的是棉纺织业中的手工织工。他们得到的工资最少，甚至在有足够的工作时，一星期所挣的钱也不超过10先令。动力织机一个跟一个地从他们那里夺取了织物业的各个部门；此外，手织业又是在其他劳动部门中失掉工作的一切工人的最后的避难所，因而在这里总是人手过多。所以，一个手工织工平时一星期能挣六七个先令就算是幸运的，甚至要挣这个数目，他每天就得在他的织机上工作十四小时到十八小时。此外，大多数的织品都需要一个潮湿的工作地点，为的使纬纱不致老是断掉，这样，一半由于这个原因，一半也由于工人穷，租不起好房子，手织作坊中地下几乎从来都是既不铺木板，也不铺石板的。我访问过不少手工织工；他们住的房子都是在最破落最肮脏的大杂院和街道里，通常总是在地下室中。往往是五六个织工住在一座只有一两间工作室和一间大的公用卧室的小宅子里，而且他们中还有些是已经结了婚的。他们的食品几乎光是土豆，有时有点燕麦粥，牛奶很少见，肉类就几乎从来看不到。他们中有很多人是爱尔兰人或者祖先是爱尔兰人。这些不幸的手工织工，每次危机都是他们最先受到打击，最后摆脱危机的恶果，而且还要被资产阶级当做一种工具，用来反

击那些攻击工厂制度的人！看吧，资产阶级洋洋得意地叫道，看看这些穷织工生活得多么糟，看看工厂工人生活得多么好，然后再来评判工厂制度吧！[一]似乎手工织工的状况这样坏并不是工厂制度本身和机器的罪过，似乎资产阶级自己对这一点了解得不像我们这样清楚！但是这里接触到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说几句谎，装一装好人，在他们是算不了什么的。

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机器生产的发展日益挤掉成年男工的事实。在机器上工作，无论是纺或者是织，主要就是接断头，而其余的一切都由机器去做了；做这种工作并不需要什么力气，但手指却必须高度地灵活。所以男人对这种工作不仅不必要，而且由于他们手部的肌肉和骨胳比较发达，甚至还不如女人和小孩子适合，因此，他们几乎完全从这个劳动部门中被排挤出去了。这样，随着机器的使用，手的活动和肌肉的紧张逐渐被水力和蒸气力所代替，于是就愈来愈没有必要使用男人了。因为女人和小孩子不仅工资比较低，而且如上面已经说过的，比男人更适合于做这个工作，所以他们就代替了男人。在使用水力纺纱机的纺纱工厂中工作的只有女人和女孩子，在用骡机的纺纱工厂里只有一个成年男纺工（在使用自动纺机时，他就是多余的了）和几个接断头的助手，后者多半是女人或小孩子，有时是十八岁到二十岁的青年男子，间或是失了业的老纺工。[二]在动力织机上工作的多半是十五岁到二十岁及

[一] 例如尤尔博士在他的“工厂哲学”中说的。——恩格斯原注

[二] “郎卡郡某些棉纺织业部门的工资情况变得非常紊乱：几百个二三十岁的青年男工做着接断头的助手的工作或其他某种工作，一星期最多挣八九个先令，但是同一个工厂里的十三岁的童工一星期却挣5个先令，而十六岁到二十岁的青年女工竟挣10—12个先令。”1844年10月工厂视察员莱·霍纳的报告。——恩格斯原注

二十岁以上的女人，有时也有几个男人，但他们很少有二十一岁以后还继续做这种工作的。在粗纺机上工作的也同样只是女人，最多只有几个男人从事磨梳棉机和刷洗梳棉机的工作。此外，一切工厂都还要雇一定数目的小孩子来装卸筒管（doffers），雇几个成年男人做监工，雇一个机匠和一个司机管理蒸汽机，另外还要雇用木匠、看门人等等。但是主要的工作都由女人和小孩子来做。这一情况厂主也是否认的，他们去年还公布了一个详细的统计表，想证明机器决没有排挤成年男人。从这些表中可以看出，在所有的工厂工人中，妇女占一半以上（52%），男人大约占48%，而所有这些工人中有一大半是十八岁以上的。这一切都是事实，但是厂主老爷们很小心地不告诉我们，成年工人中究竟有多少是男工，多少是女工，而问题的关键正是在这里。他们本来就是很明显地把机匠、木匠以及一切多少和工厂有点关系的成年男人，甚至连办事员等等都列在表里面，可是他们没有勇气把事情的全部真相说出来。这些表充满了捏造的、歪曲的、黑白颠倒的材料，以及可以吓唬门外汉但不能向内行人证明任何东西的平均数字；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这些表里面竟一字不提，这只证明了作者即厂主们的盲目的利己主义和不老实。我们可以从艾释黎勋爵于1844年3月15日在下院为辩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而发表的演说中摘引一些关于工人年龄和性别的资料，这些资料并没有受到厂主的反驳，而厂主所发表的材料也只涉及英国工厂工业的一部分。在大不列颠的419560个工厂工人中（1839年）有192887人（即几乎一半）是在十八岁以下；242296人是女性，其中有112192人在十八岁以下。这样，男工中就有80695人在十八岁以下，而成年男工一共只有96569人，占工人总数的23%，就是说，**还不到四分之一**。在棉纺织工厂里，女工占56.25%；在毛纺

织工厂里占69.5%；在丝织工厂里占70.5%；在纺麻工厂里占70.5%。这些数字想来已经足以证明成年男工被排挤的事实；但是要证实这一点，只要随便到一个工厂里去看看就可以了。结果现存的社会秩序必然会颠倒过来，而这种颠倒既强加于工人头上，就要使他们遭到最致命的后果。首先是女人出外工作完全破坏了家庭。如果妻子一天在工厂里工作十二三个小时，而丈夫又在同一个地方或别的地方工作同样长的时间，那末他们的孩子的命运会怎样呢？他们像野草一样完全没有照管地生长起来；或者每星期花1个或$1^{1}/_{2}$先令把他们托付给旁人照管，而那些人会怎样对待他们，那是不难想像的。所以在工厂区，小孩子因缺乏照顾而酿成的不幸事件就惊人地增加起来。根据曼彻斯特的验尸官的记录（根据工厂劳动调查委员会的材料，霍金斯博士报告第3页），在九个月内有69个孩子烧死、烫死，56个淹死，23个摔死，77个因其他不幸事件致死，就是说，一共发生了225起不幸事件㊀，而在非工厂城市的利物浦，十二个月内一共只发生了146起致命的不幸事件。煤矿中的不幸事件都没有包括在这两个城市的这些数字里面，而且更应该注意到，曼彻斯特的验尸官管不了索尔福，所以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可以认为是差不多相等的。几乎每一号“曼彻斯特卫报”都要报道一起或几起严重地烧伤、烫伤人的事件。母亲出外工作也是小孩子死亡率增高的原因之一，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也完全可以由事实证明。女人常常在分娩后三四天就回到工厂去做工，婴孩当然只好丢在家里；休息的时候，她们急忙赶回去给孩子喂奶，自己也随便吃点东

㊀ 1843年由曼彻斯特医院记录下来的不幸事件中有189件——一百八十九件！——是烧伤、烫伤的，其中有多少人死亡却没有说明。——恩格斯原注

西。这奶是怎样喂的，那也可想而知了。艾释黎勋爵引述了几个女工的话：

> “M．H．二十岁，有两个小孩子，小的还是乳儿，由大一点的孩子照顾。她早晨五点钟一过就到工厂里去，晚上要到八点才回来；奶整天从乳房往外流，把衣服全弄湿了。——H．W．有3个小孩子，星期一早晨五点离开家，星期六晚上七点才回来；一回来就要替小孩子做许多事情，忙到早晨三点钟以后才睡觉。她常常被雨淋得浑身透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得去做工。她说：‘我的乳房痛得要命，我浑身都让流出来的奶浸透了。’”

这个可耻的制度只是鼓励了人们采取用麻醉药使孩子保持安静的办法，而事实上这个办法在工厂区已经传布得很广了。根据曼彻斯特区出生、死亡、婚姻登记处主任琼斯博士的意见，这种习惯是常见的痉挛致死事件的主要原因。女人在工厂里做工不可避免地要把家庭整个地拆散，在目前这种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状况下，这种情形无论对夫妇或者对小孩子都会产生最严重的败坏道德的后果。一个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没有时间让孩子在初生的几年中享受最普通的母爱的母亲，一个很少能见到自己的孩子的母亲，是不能成其为孩子的母亲的，她必然会对孩子很冷漠，没有爱，没有丝毫的关怀，完全像对待别人的孩子一样。在这种条件下长大的孩子，以后对家庭是没有丝毫眷恋的，他们在自己创立起来的家庭里也永远不会感到一点家庭味，因为他们太习惯于孤独的生活了，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工人家庭受到更严重的破坏。儿童劳动也是促成家庭离散的一个原因。孩子们一到他们挣的钱多于父母花在他们身上的钱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交给父母一部分钱作为食宿的费用，其余的就自己花掉。这样的事情往往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发生（鲍尔：关于里子城的报告，其中的几个地方；塔夫耐尔：关于曼彻斯特的报告第17页及其他各页；以上均引自“工厂劳动调查

委员会报告”）。一句话，孩子们都逐渐自立起来，把父母的家看做小旅馆，如果他们不满意这个旅馆，他们就常常另外换一个。

在许多情形下，女人在工厂里工作并不完全破坏家庭，但是使它头脚颠倒了。妻子挣钱养活全家，丈夫却坐在家里看孩子，打扫屋子，做饭。这种情形是很多很多的；仅仅在曼彻斯特一地就可以数出几百个这种不得不专搞家务的男人。这种实际上的阉割在工人中激起什么样的正义的愤怒，它在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原封不动的时候会使整个家庭关系发生什么样的根本变化，那是不难想像的。我手边有一封信，是一个名叫罗伯特·朋德的英国工人写给奥斯特勒的，这个工人住在里子城泽边木屋的男爵大厦里（为了资产阶级可以到那里去找他，所以我把详细地址写出来）。这封信的率直精神，我在翻译中未必能表达出一半来；缀字错误在德文中还可以适当地表达出来，但是约克郡方言的特点就完全失去了。他在这封信里说到他认识的一个工人出去找工作，在郎卡郡的圣海伦斯遇到了一位老朋友。

“就在这里，先生，他找到了他，他走近他的小屋的时候，您想，他看到了什么？一间又湿又低的地下室，家具就只有两把旧椅子、一张三条腿的圆桌、一只箱子，没有床，只是墙角有一堆陈麦秸，上面盖着两条脏床单，火炉旁有两个木墩子。我这位可怜的朋友走进去的时候，可怜的杰克坐在火炉旁的一个木墩子上，您想想看，他在干什么呢？他在用缝衣针替老婆补袜子，他一看见老朋友站在门口，就想把针线活藏起来，可是朱（我那个熟人的名字）看到了一切，他说：‘见鬼，杰克，你在干什么呀？老婆呢？你这是干什么活呀？’可怜的杰克很不好意思，他说：‘我知道这不是我干的活，可是我那可怜的老婆在工厂里；她早晨五点半就到那里去，一直要工作到晚上八点钟，回家时已经累得啥也不能干了。所以只要是我能做的，我就得替她做。我没有工作，已经三年多没有工作了，我这一辈子再也找不到事情了。’说着就痛哭起来，他说：‘不错，好心的朱，这地方女人和孩子有的是工作，可是就没有

男人的工作。要找工作真比在街上拾100金镑还要难。但是我从来不愿意相信你或别人会看到我替老婆补袜子，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可是我老婆几乎连站都站不住了，我害怕她会病倒，那样一来我就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了，因为她早就成了家里的男人，我却成为女人了。朱，这工作可糟糕呀。'他接着又伤心地哭着说：'以前可并不是这样。'朱问道：'可是，杰克，告诉我，这些时候没有工作，你是怎么活过来的？'杰克回答道：'我告诉你，朱，凑合着活下来了，可是也真难过呵。你知道，我结婚的时候有的是工作，你也知道，我从来不是懒汉。'朱说：'可不，你哪里是懒汉。'杰克说：'我们的家曾经布置得很好，那时玛丽也用不着工作，我挣的钱足够我们两人用。可是现在什么事情都颠倒过来了；玛丽得出去工作，我只好留在家里看孩子，扫地，洗衣服，做饭，补衣服。我那可怜的女人在晚上回家的时候总是累得动也动不了。你知道，朱，一个过惯了另一种生活的人，这日子真难过呵。'朱回答道：'是呵，真不容易。'杰克又开始哭起来；他说，要是他没有结婚，或者根本就没有生下来，那该多好；但是他和玛丽结婚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弄到这个地步。杰克说：'我为这些事情哭过不知多少次了。'先生，朱后来告诉我，他听了这些话以后，就用他所有从小在工厂里学会的骂人的话咒骂工厂、厂主和政府。"

还能够想像出一件比这封信里所描写的更荒谬更不近情理的事情吗？但是这种使男人不成其为男人、女人不成其为女人、而又既不能使男人真正成为女人、也不能使女人真正成为男人的情况，这种最可耻地侮辱两性和两性都具有的人类尊严的情况，正是我们所赞美的文明的最终结果，正是几百代人为了改善自己和自己子孙的状况而做的一切努力的最终结果！眼看着人们的一切勤劳和努力到头来都成为笑柄，我们只能对人类和人类的命运本身感到失望，或者承认人类社会以前在追求自己的幸福时走错了道路。我们必须承认，两性间的关系之所以这样完全颠倒过来，只是因为这些关系一开头就建立在不合理的基础上。如果说工厂制度所必然造成的女人统治男人的现象是不近人情的，那末原来男人统治

女人的现象也应该认为是不近人情的。如果现在的女人，像过去的男人一样，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她谋得了大部甚至全部家庭公共财产这样一件事实上，那末财产的共有就不是真正的，不是合理的，因为家庭的一员以自己担负了大部分的责任而矜骄自夸。现代社会里的家庭正日益解体这一事实，只不过证明了维系家庭的纽带并不是家庭的爱，而是隐藏在财产共有这一外衣下的私人利益。[一] 当孩子们不像上面所说到的那样只给父母饭费而要赡养他们的失业的父母的时候，也发生同样的相互关系。霍金斯博士在关于工厂劳动的报告里证实了这种关系是很常见的，在曼彻斯特这种事情更是屡见不鲜。正如同在另一种情况下女人是一家之主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就是一家之主。艾释黎勋爵在他的演说（1844年3月15日在下院发表）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人因为他的两个女儿上酒馆而责骂了她们，她们却说她们已经被训得烦死了：去你的吧，我们还得养活你！也应该享受一下自己的劳动果实了。她们丢开父母不管，从父母家里搬了出去。

在工厂里长大的未婚女人并不比已婚的好。一个九岁起就在工厂里做工的女孩子自然是不熟悉家务的，因此，所有的工厂女工在这方面都完全是外行，都不会管理家务。她们不会缝纫，也不会编织，不会做饭，也不会洗衣，她们连最普通的家务都不熟悉；至于怎样照顾孩子，她们更是一无所知。“工厂劳动调查委员会报告”举了几十个例子来证明这个事实，而关于郎卡郡的报告的作者霍金

[一] 有多少已婚妇女在工厂中工作，从厂主自己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在郎卡郡412个工厂里做工的有10721个已婚妇女；她们的丈夫只有5314人也在工厂里做工，3927人做别的工作，821人没有工作，其他659人不详。可见每个工厂都有两三个靠妻子劳动过活的男人。——恩格斯原注

斯博士则发表了以下的意见(“报告”第4页):

“女孩子们没有经过仔细考虑就很早地结了婚;她们没有可能、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去熟悉家庭主妇的最普通的责任,而且即使她们有了这一切,她们在婚后也没有时间来承担这些责任。母亲每天有十二小时看不见自己的孩子:照管孩子的是特地花钱雇来的女孩子或老太婆;此外,工厂工人的住宅又经常不是一个所谓的家(home),而是一间地下室,里面既没有做饭的器具,也没有洗濯、缝纫和补缀衣服所必需的用具,缺少能使他们过愉快而有文化的生活并能使家庭具有吸引力的一切东西。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特别是为了保全孩子们的生命和健康,我只能竭诚希望,总有一天会禁止已婚的妇女在工厂里做工。”

个别的例子和证言见“工厂劳动调查委员会报告”,考威尔文件第37、38、39、72、77、50页。塔夫耐尔文件第9、15、45、54页及其他各页。

但是这一切还不是最大的祸害。妇女在工厂里工作,在道德方面引起了更加严重得多的后果。人们不分男女老少地聚集在一间工作室里,他们不可避免地互相接近,没有受过任何智育和德育的人们挤在一个狭小的地方,——这一切对妇女的性格的发展是不会有什么好影响的。厂主即使注意到这一点,也只是在真正发生了什么丑事的时候才会出来干涉;至于比较放荡的人对比较规矩的人、特别是对年轻人的经常的但不大显著的影响,他就无法知道,因而也无法预防。而正是这种影响害处最大。在“1833年工厂调查委员会报告”中,许多证人都说工厂中的谈话是“猥亵的”、“下流的”、“肮脏的”等等(考威尔文件第35、37页及其他许多页)。我们在大城市里大规模地看到的事情在这里小规模地发生着。人口的集中对人们有同样的后果,不管这种集中是发生在大的城市里还是小的工厂里。工厂愈小,接近的机会就愈多,交往就愈不能避免。后

果是免不了的。莱斯特的一个证人说，他宁愿让他的女儿去讨饭，也不愿送她进工厂，工厂是地狱的真正入口，城市中的大多数妓女都是工厂造成的（鲍尔文件第8页）。曼彻斯特的另一个证人“毫不犹豫地断定，工厂中的十四岁到二十岁的青年女工有四分之三已经丧失了童贞”（考威尔文件第57页）。委员会委员考威尔简直就认为，工厂工人的道德比工人阶级的中等道德水平还要低一些（第82页），霍金斯博士则说（“报告”第4页）：

“道德是不容易用数字表示出来的，但是，如果相信我亲身的观察，相信那些和我谈过话的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并且也相信我得到的一切证言所产生的总印象，那末工厂生活在道德上对青年妇女的影响是非常令人丧气的。”

不言而喻，工厂奴隶制也和任何别的奴隶制一样，甚至还要厉害些，是把 jus primae noctis〔初夜权〕给予主人的。在这方面厂主也是女工的身体和美貌的主宰。解雇的威胁即使不是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至少十回中也有九回足以摧毁女孩子的任何反抗，何况她们本来就不很珍视自己的贞操呢。如果厂主够卑鄙的话（委员会的报告叙述了许多这样的事件），那末他的工厂同时也就是他的后宫；而且，即使不是所有的厂主都利用这个权利，女工们的情况本质上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在工厂工业创始的时期，当大多数厂主都是没有受过教育而且不尊重社会上的伪善习俗的暴发户的时候，他们是泰然自若地利用他们这个“正当地得来的”权利的。

要正确地估计工厂劳动对妇女的身体所产生的后果，必须先考察一下儿童的劳动及劳动本身的特性。现代工业一兴起，工厂就雇用小孩子；最初由于机器小（以后变大了），在机器上工作的几乎完全是小孩，而且他们主要是从孤儿院里领来的，厂主把他们当做

“学徒”成群地长期雇用。他们吃的、住的和穿的都是一样，自然完完全全是雇主的奴隶，受雇主的最残酷和最野蛮的虐待。早在1796年，派西沃博士和罗·皮尔爵士（棉纺织工厂厂主，现任首相的父亲）就那么有力地表现了这个令人发指的制度在社会舆论中所引起的愤怒，竟使得议会在1802年通过了学徒法，制止了最惊人的虐待[106]。自由工人的竞争渐渐地抬起头来，把学徒制挤掉了。工厂愈来愈多地在城市里建立起来，机器变大了，屋子里空气比较流通了，也比较清洁了。同时，成人和青年的工作也逐渐多起来，于是在工厂里工作的儿童的相对数目就减少了一些，他们开始工作的年龄也稍微提高了一些。人们很少雇用八九岁以下的孩子了。以后，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一样，立法机关也一再地出来保护儿童，使他们不会因资产阶级的贪欲而受到残害。

工人的孩子、特别是工厂工人的孩子的死亡率之高，就足以证明他们幼年的生活条件对健康如何有害。这些原因对活着的孩子也有影响，虽然其程度不像对已经死了的孩子那样厉害。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原因也要造成容易感染某种疾病的体质或者使发育受到阻碍，因此，工人的孩子的体力都比一般的孩子差。一个在贫穷和各种各样的困苦中、在潮湿和寒冷的环境里、在穿得不暖住得很坏的情形下生长起来的工厂工人的九岁的孩子，绝对不会像在比较健康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一样地有工作能力。他在九岁时就被送进工厂，每天工作六小时半（以前是八小时，再以前是十二小时到十四小时，甚至十六小时），一直工作到十三岁，而从这时起一直到十八岁每天就要工作十二小时。对他的身体发生不良影响的原因仍然不停地起作用，而工作又愈来愈重了。就假定一个九岁的孩子，甚至是工人的孩子，可以坚持每天六小时半的工

作而不致对他的身体有显而易见的损害，但是待在污浊、潮湿而且经常是闷热的工厂空气里，对健康无论如何是不会有好处的。把孩子们应该专门用在身体和精神的发育上的时间牺牲在冷酷的资产阶级的贪婪上，把孩子们从学校和新鲜空气里拖出来，让厂主老爷们从他们身上榨取利润，这无论如何是不可饶恕的。固然，资产阶级会说：如果我们不雇孩子们到工厂里来工作，他们所处的环境还是一样地不利于他们的发育。一般地说，这是对的，但是，如果好好地考虑一下，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资产阶级先把工人的孩子置于恶劣的条件下，然后再利用这些恶劣的条件为自己谋利益！他们用来替自己辩解的，和整个工厂制度一样，正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他们用昨天犯的罪来替今天犯的罪进行辩解。要不是工厂法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住他们的手脚，这些专门为工人的福利而设立工厂的、“好心的”、“仁慈的”资产者会怎样保护工人的利益呵！让我们来听一听，在工厂视察员没有盯住厂主以前，他们在工厂里的行为是怎样的。让他们自己承认的证据（“1833年工厂调查委员会报告”）来揭露他们。

中央委员会的报告说：孩子们开始在工厂里工作间或是从五岁起，有时是从六岁起，更经常地是从七岁起，而大部分是从八九岁起；工作时间常常是长到每天十四小时到十六小时（吃饭时间除外）；厂主允许管理人殴打孩子，而且常常自己也动手。这个报告甚至还叙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苏格兰厂主骑着马夫把一个十六岁的逃跑的工人追回来，叫他走在马前面，强迫他和马跑得一样快，而且不断地用长鞭子抽他！（斯图亚特文件第35页）在工人的反抗比较强烈的大城市里，这种事情当然发生得少一些。然而就是这样长的工作日也还不能满足资本家的贪欲。他们的目的是

要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使投入建筑物和机器里的资本多生利，使它尽可能地加紧工作。为了这个目的，厂主就实行了可耻的夜工制。有些厂主实行了两班制，每班的人数都足够充分保证工厂工作的进行，一班在白天工作十二小时，一班在夜里工作十二小时。任何白天的睡眠都代替不了的夜间的休息这样经常被剥夺，对于小孩子和年轻人，甚至对于成年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是不难想像的。整个神经系统受刺激，因而身体整个地衰弱下去，这就是这种劳动的必然结果。这种劳动的另一后果便是酗酒和纵欲。一个厂主证明（塔夫耐尔文件第91页），在他的工厂里实行做夜工的两年内，非婚生子的数目增加了1倍，道德水平竟降低到使他不得不停止夜工。别的厂主做得更野蛮，他们强迫许多工人一连工作三四十个小时，而且这样的事情**每星期都有几次**；这是因为厂主没有足够的工人来换班：换班仅仅是为了让一部分工人能替换出来睡上一两个钟头。委员会关于这种野蛮行为和它的后果的报告超过了我在这方面所听到的一切。这里所叙述的那些骇人听闻的事情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可是我们将会看到，资产阶级还经常地引用委员会的证据，把它解释得对**自己有利**。这种制度的后果很快就显露出来了：委员们报告他们遇到过大批的畸形者，而这些人之所以畸形完全是由于工作时间过长。最普通的畸形是脊柱和两腿弯曲。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里子城的弗兰西斯·沙普是这样描述这种畸形的：

“在我到里子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股骨下端这样奇怪地弯曲的情形。起初我以为这是佝偻病，但是到医院里来看这种病的人很多，得这种病的年龄又都是小孩子通常已不会得佝偻病的时候（八岁到十四岁），而且只是在孩子们进工厂工作以后才开始得这种病，这一切迫使我改变了我的看法。到目前

为止我已看见过将近一百个类似的病例，我可以极肯定地说，这些病是劳动过度所引起的；据我所知，所有的病人都是工厂里的孩子，并且他们自己也认为他们生病的原因是劳动过度。”——“显然是因为站得太久而引起的脊柱弯曲的病例，我遇到过不下三百件。”（劳顿博士文件第12、13页）

在医院里工作了十八年的医生，里子的海依博士，也同样证明：

“脊柱弯曲在工厂工人中是很常见的；在某些场合下这只是过度劳动的结果，在某些场合下则是长时间的劳动在生来就弱或由于营养不良而衰弱下去的身体上造成的后果…… 在这里，各种各样的畸形比这些病更常见：膝盖向里弯，关节上的韧带常常松弛而缺少弹力，腿的长骨弯曲了；这些长骨头的粗的一端特别弯曲而且发育过度；这些病人都来自工作时间过长的工厂。”（劳顿博士文件第16页）

布莱得弗德的外科医生波门特和法普也都证实了这一点。在德林瓦特、鲍尔和劳顿博士等三个委员的报告里描述了许多这类畸形的例子；不大注意这种现象的塔夫耐尔和爵士戴维·巴莱博士在他们的报告里也举了个别的例子。（德林瓦特文件第69页上关于两弟兄的例子，第72、80、146、148、150页上关于两弟兄的例子，第155页及其他许多页；鲍尔文件第63、66、67页上的两个例子，第68页上的三个例子，第69页上的两个例子，关于里子的报告第29、31、40、43、53页及以下各页；劳顿博士文件第4、7页上的四个例子，第8页上的几个例子等；戴·巴莱爵士文件第6、8、13、21、22、44页，第55页上的三个例子等；塔夫耐尔文件第5、16页及其他各页）调查过郎卡郡的委员考威尔、塔夫耐尔和霍金斯博士完全忽视了工厂制度所引起的这些医学上的后果，虽然郎卡郡的畸形者在人数上完全可以和约克郡相比。我每次走过曼彻斯特总要碰见三四个畸形者，他们的脊柱和腿弯曲的情形和上面所描述的完全一样，我不止一次地注意到他们，并且也有可能仔

细地观察他们。我自己认识一个畸形者，他的情况和海依博士所描述的完全符合，他是在盆德尔顿城道格拉斯先生的工厂里弄成畸形的。这个工厂由于不久以前还整夜整夜地工作，所以在工人中间至今还是臭名远扬的。一看这些畸形者，立刻就可以猜到使他们畸形的原因是什么，他们的畸形都是一样的：膝盖向里同时又稍微向后凹进去，双脚成为里八字，关节畸形而粗大，脊柱往往向前或向旁边弯曲。但是搞得最残酷的看来还是麦克尔士菲尔德区的那些仁慈的丝织厂主们；其所以如此，是由于这些工厂里有年龄很小的（最小的只有五六岁）孩子在做工。在塔夫耐尔委员引用的补充材料里，我们看到一个叫做莱特的工厂监工的供述（第26页），他的两个姊妹的身体都被工作弄得畸形到非常可怕的地步，他有一次计算过麦克尔士菲尔德好几条街上（其中有几条是那里最干净最漂亮的街道）的畸形者的数目：他在唐利街看到十个畸形者，在乔治街看到五个，在沙洛特街看到四个，在瓦特考茨看到十五个，在班克托普看到三个，在勋爵街看到七个，在磨坊巷看到十二个，在大乔治街看到两个，在习艺所里看到两个，在派克格林看到一个，在皮克福特街看到两个。这些畸形者的家属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的畸形是缫丝工厂的过度劳动造成的。在第27页上讲到一个男孩子，他因身体畸形已不能上楼梯；那里还提到几个女孩子，她们的脊柱和骨盘都是畸形的。

过度的劳动还造成了其他的畸形，特别是扁平足，这是戴·巴莱爵士（譬如在第21页上他就提到两起）和里子的内外科医生们常常遇到的（劳顿文件第13、16页等）。即使年轻人有比较结实的身体，比较好的营养和其他条件，受得住这种野蛮剥削，但是他们也免不了要闹背痛、腰痛、腿痛、关节肿胀、静脉扩张，或大

腿和小腿上生大块的顽固的溃疡。所有这些疾病在工人中几乎是普遍的现象。斯图亚特、马根多士和戴·巴莱爵士在他们的报告里举了几百个例子；他们几乎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不患这些病中的任何一种病的工人；而在其余的报告里，也有许多医生证明这些后果确实是存在的。在关于苏格兰的报告里有无数的例子毫无疑义地表明，每日工作十三小时甚至对十八岁到二十二岁的工人，无论是男工或女工，都至少会引起**这样**的后果，这对丹第和丹弗姆兰的纺麻工厂来说是如此，对格拉斯哥和拉纳克的棉纺织工厂来说也是如此。

所有这些疾病都是从工厂劳动的性质本身产生的，这种工作如厂主们所说的确实是很“轻易的”，但正是这种轻易比任何别的工作更能使身体衰弱。工人并不需要做很多事，但是他们必须老是**站着**，无权坐下。谁要是在窗台上或筐子上坐一会，他就要受罚。这样长久地站着，上身经常机械地压在脊柱上、骨盘上和腿上，这就不能不产生前面所说的那些后果。这样老是站着完全不是工作本身所必需的，诺定昂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在那里，至少在并纱间里已经安上了座位（结果，上面所说的那些疾病都绝了迹，因而女工们也同意延长工作日了）。但是，在工人只是替资产者工作而很少有兴趣把工作做好的工厂里，他利用座位确实很可能利用到超过厂主所同意和对厂主有利的程度，而为了使资产阶级少损失一点原料，就只好让工人牺牲他们的健康了㊀。此外，长时间保持这种站立姿势，加上工厂里的空气大半都很坏，这更使得整个身体显著地衰弱下去，从而又引起其他各种与其说是局部的、

㊀ 里子城一个工厂的纺纱车间里也已经安上座位了（德林瓦特文件第80页）。—— 恩格斯原注

不如说是全身的疾病。工厂里的空气通常都是又潮又暖，而且多半是过分地暖；只要通风的情形不很好，空气就很恶劣，令人窒息，没有足够的氧气，充满尘埃和机器油蒸发的臭气；而机器油几乎总是弄得满地都是，并且还渗到地里。工人们由于热，都穿得很少，因此，室内温度一不平均，就势必要感冒；在这种热地方待久了，他们就害怕新鲜空气；而随着身体各种机能的逐渐衰退，体内发出的热量也减少了，这就要靠外面的热来维持，所以工人在窗子关得紧紧的闷热的工厂空气里反而感到最舒服。此外，从工厂的热空气里走到街上那种刺骨的或潮湿的寒风里的时候温度总是急剧地改变，工人没有足够的防雨器具，淋湿了又不能换上干衣服，这一切加起来就经常引起感冒。如果我们记住，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恐怕除了腿上的肌肉，全身就没有一块肌肉真正紧张起来，真正活动起来，如果我们记住，工人们丝毫不能抵抗上述各种原因所起的使身体衰弱和钝化的作用：他们没有机会锻炼身体，发展肌肉的力量，增进肌肉纤维的弹性和强度，而且从小就被剥夺了在新鲜空气里活动的机会，那末，当医生们在工厂报告中几乎一致肯定，他们发现工厂工人对一切疾病的抵抗力都特别弱，生活力普遍减低，整个智力和体力都不断在衰退，我们就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了。让我们先听听戴·巴莱爵士的话吧：

“工厂劳动对工人有下面几种不利的影响：(1)无条件地必须使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的活动适应于由均匀的无休止的力量来发动的机器的运动；(2)必须在长得不近情理而且每一个间隙都迅速地互相衔接起来的时间内保持站立的姿势；(3)睡眠被剥夺（由于工作时间长、腿痛和全身不舒服）。这里还得加上低矮、拥挤、满是尘土的或潮湿的工作室，肮脏而闷热的空气，以及不断地出汗。因此，特别是男孩子，除了很少的例外，很快就失去儿童的新鲜的玫瑰色的脸色，比其余的男孩子苍白而消瘦。连赤着脚站在织布房的泥地

上的手工织工的学徒都比他们好看些，因为这些学徒总还偶尔到新鲜空气里去走走。但是在工厂里做工的孩子，除了吃饭就没有一分钟的空间，他们也仅仅是在去吃午饭的时候才走到新鲜空气里去。一切成年的男纺工都苍白而消瘦，都有消化不良和胃口时好时坏的毛病；他们从小就在工厂里工作，在他们中间很少有或者简直就没有身材魁梧、体格强壮的人，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做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的职业对男人身体的发育非常有害。女人担负这种劳动比男人容易得多。”（这是非常自然的，但是我们在下面将看到，她们也有她们自己的特殊的疾病。）（戴·巴莱爵士的总报告）

鲍尔也说了同样的话：

“我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布莱得弗德的工厂制度造成了许多畸形者……时间延续得很久的劳动，对身体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各种显著的畸形上，而且还更普遍地表现在发育受阻碍、肌肉松软和体格孱弱上。”（鲍尔报告第74页）

前面已经引证过的里子的外科医生[㈠]弗·沙普写道：

“当我从斯卡博罗搬到里子的时候，我立刻看到，这里的孩子一般都比斯卡博罗及其附近地区的孩子苍白得多，肌肉也远不如他们发达。我还发现，许多孩子就他们的年龄说来是太矮小了……　我诊断过无数的瘰疬病、肺部疾病和胃肠疾病，作为一个医生，我丝毫也不怀疑这些病是由工厂里的工作引起的。我赞同这样的意见：时间延续得很久的劳动削弱了身体的神经力量，造成许多疾病滋生的地盘；假使没有新的力量从农村里源源不绝地流进来，工厂工人这一种人是很快就会完全退化的。”

布莱得弗德的外科医生波门特也这样说：

“在我看来，这里的工厂中所实行的劳动制度引起了整个身体的特别衰弱，因而使小孩子极其容易感染流行病和偶发的疾病……　我坚决认为，工

㈠ 所谓外科医生（surgeons），和有学位的医生（physicians）一样，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医学家，因此，他们不仅从事外科医生的业务，而且也从事一般的医务。由于许多原因，大家宁愿找他们看病，而不找有学位的医生。——恩格斯原注

厂对通风和保持清洁没有任何必要的规定，是特别容易产生或感染我在行医时经常遇到的那些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凯博士也做了同样的证明：

“（1）我有机会观察过工厂制度在最良好的环境中（在布莱得弗德的伍德工厂里，这是这个城市中设备最好的工厂，凯博士在这里当过厂医）①对儿童健康所起的影响；（2）这影响是无可怀疑的，而且甚至在这样好的条件下也为害很大；（3）1842年一年中，在伍德工厂里做工的孩子有五分之三找我看过病；（4）这个制度最有害的后果，与其说是表现在畸形者人数众多上面，不如说是表现在大多数人都虚弱多病上面；（5）自从伍德工厂中儿童的工作日缩短到十小时以来，这一切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引用了所有这些证言的委员劳顿博士自己也说：

“我觉得这已经相当清楚地证明孩子们的工作时间长得不近人情，长到残酷的程度；甚至成年人所必须完成的工作量也未必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胜任的。结果许多人夭亡了，许多人终身带上了残疾。担心那些活下来的人将产生衰弱的后代，从生理学的观点来说，是太有根据了。”

最后，霍金斯博士在谈到曼彻斯特时说道：

“我相信大多数的旅行者都会看到，曼彻斯特的居民，特别是工厂工人，一般都矮小、瘦弱而且脸色苍白。在大不列颠或欧洲的任何一个城市里，我都没有看到过人们在体格和脸色方面这样显著地够不上民族标准。已婚的女人惊人地缺少英国妇女的一切特点……　我必须承认，从曼彻斯特的工厂里领来给我看的一切男孩子和女孩子都是抑郁而苍白的；他们脸上没有一点青年人通常具有的生动、活泼和愉快的表情。他们中有许多人告诉我，在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他们一点也不想在新鲜的空气里跳跳蹦蹦地玩一下，而宁愿静静地待在家里。”

我们再从霍金斯的报告里引证一段话，这段话固然只有一半

①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和这里所谈的有关系，但是在这里也可以像在别的地方一样有效地证明：

“无节制、放荡、不关心将来，这就是工厂居民的主要恶习，这些毛病都很容易从今天的制度所产生的风气上得到解释，而且是**几乎不可避免地从这个制度里产生出来的**。大家都公认，消化不良、忧郁病和全身衰弱在这类工人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十二小时的单调的工作之后，想找点什么东西来刺激一下，那真是大自然了，而当上述疾病终于出现的时候，他们就愈来愈频繁地到烧酒里面去寻求解脱。”

委员会的报告中举出了几百个例子来证实医生和委员们的这些话。关于青年工人的发育因工厂劳动而受到阻碍这一点，也有成百的证据来加以证实；例如考威尔举出了同在一个主日学里读书的46个十七岁的男孩子的体重：其中26人在工厂里面工作，体重平均是104．5磅，其余的20个虽然也属于工人阶级，但不在工厂里面工作，体重平均是117．7磅。曼彻斯特最大的厂主之一，一个鼓动厂主们反对工人的家伙——如果我没有弄错，就是罗伯特·海德·格莱格——自己有一次就说过：这样继续下去，郎卡郡的工厂工人很快就会变成侏儒族。㊀一个管理征兵的军官（塔夫耐尔文件第59页）说，工厂工人适于服兵役的很少，他们又瘦又弱，常常被医生们认为不合格而不得入伍。在曼彻斯特，他很难找到一个5英尺8英寸高的人，大多数的人都只有5英尺6—7英寸高，可是在农业区里大多数的新兵都有5英尺8英寸高（英尺略短于普鲁士尺，大约每5英尺短2英寸）。

在这些条件的影响下，男工们都很快累垮了。大多数人一到四十岁就不能工作，只有一小部分人能支持到四十五岁，能支持到

㊀ 这一句话并不是从工厂报告中引来的。——恩格斯原注

五十岁的就非常少了。失去工作能力的原因，除整个身体衰弱外，还有视力的衰退。这是在骡机上工作的结果，在这种机器上工作时，工人必须经常注视着一长排平行的细线，因而眼睛老是很紧张。在哈帕尔和拉纳克的几个工厂里工作的1600个工人中，只有10个人超过四十五岁；在斯托克波尔特和曼彻斯特各工厂里工作的22094个工人中，只有143人超过四十五岁。在这143人中，有16人是由于特别开恩才留在工厂里面的，其中有一个人做的是小孩子的工作。在一份包括131个男纺工的名单上，只有7个人超过四十五岁，可是这131人向哪一个厂主要求工作都因“年龄太大”而遭拒绝。在波尔顿的50个被当做废物的纺工中，只有两个超过了五十岁，其余的平均还不到四十岁，可是这些人都因为什么年龄太大而失业了！一个叫做艾释华特的大厂主在写给艾释黎勋爵的一封信里自己承认，纺工们一接近四十岁，就不能纺出规定数量的纱了，因此“有时候”就要被开除；四十岁的工人他已经称他们为“老头”了！㊀马根多士委员在1883年的报告中也这样说：

“虽然我知道儿童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工作，从而在思想上对这一点已经有了相当的准备，但是我仍然很难相信那些比较苍老的工人自己所说的岁数，这些人老得多么早呵。”

主要是替工厂工人看病的格拉斯哥的外科医生斯麦里也说，对工人来说，四十岁已经是老年（old age）了（斯图亚特文件第101页）。关于这一点，塔夫耐尔文件第3、9、15页和霍金斯报告第4页、文件第14页等都有证明。在曼彻斯特，工人的这种未老先衰的现象非常普遍，几乎所有的四十岁的男人看起来都比他们的实际

㊀ 所有这些事实都引自艾释黎勋爵的演讲（1844年3月15日在下院发表）。——恩格斯原注

年龄老十岁到十五岁，而在富裕的阶级中，无论是男人或女人，只要他们不狂饮，他们的容貌总是保持得很好的。

工厂劳动对妇女身体的影响也是很特别的。因工作时间过长而引起的畸形在妇女中比男子更为严重；骨盘的变形（一半是骨盘骨本身位置不正常和发育不正常的结果，一半是脊柱下部弯曲的结果）就常常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劳顿博士在他的报告中说："我虽然没有亲自看到过骨盘畸形和其他几种疾病，但是每一个医生毕竟还是应当把这些现象看做很长的工作日在儿童身上引起的可能的后果，这已由医学界有极高声望的人物证实了。"

许多产婆和产科医生都证实了工厂女工分娩比别的妇女困难，同样还证实了她们常常流产（例如见霍金斯博士文件第11页和第13页）。此外，女工们还患一切工厂工人共有的一般衰弱症，她们在怀孕后，**一直到分娩前一瞬间**还要在工厂里工作，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她们如果早停止工作，那她们就得担忧她们的位置会被别人占去而自己会被解雇；此外，她们在这一段时间内也拿不到工资了。女工们头天傍晚还在做工，第二天早上就生了孩子，这是很常见的事情；甚至在工厂里，在机器旁边生下孩子，也一点不稀罕。如果资产者老爷们还觉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末他们的太太大概也会同意我的意见：间接强迫一个怀孕的女人直到她分娩的那一天还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以前还要长），老是站着并且还要常常弯腰，这是残酷的事情，是卑鄙的野蛮行为。但是还不止此。如果女工们被允许在分娩后两星期可以不工作，那她们就会感到高兴，而且认为这是一个很长的期限。许多人在产后一星期甚至三四天就回到工厂里**整**天做工了。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厂主问监工："某某人还没有回来吗？"——"还没有。"——"她生

了多久了?”——“一星期。”——“那她早就该回来了。别人在家里只住了三天。”自然，不管女工们怎样衰弱，怎样痛苦，解雇的恐惧，失业的恐惧还是把她们赶回工厂来了；厂主的利益不允许工人因为生病就留在家里；工人是不应当生病的，女工也不敢在分娩后躺在家里，否则厂主就不得不把机器停下来，或者就要为了考虑临时的解决办法而大伤其高贵的脑筋；为了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就解雇那些竟敢生病的工人。

请听听下面的话（考威尔文件第77页）吧：

“一个女孩子感到很不舒服，简直工作不下去了。——‘你为什么不请假回家呢?——‘唉，先生，“老板”在这方面是很严厉的，我们要是有四分之一天不在工厂里，就有被赶走的危险。’”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证明（戴·巴莱爵士文件第44页）：工人托马斯·麦克杜特有点发烧，

“但是他不敢待在家里，就是待在家里，无论如何也不敢待四天以上，因为要不然他就会丢掉工作”。

几乎一切工厂里的情形都是如此。年轻的女孩子们在发育期间的劳动还引起了很多反常的现象。有些年轻的女工，特别是那些吃得比较好一点的，由于工厂里的温度高，就发育得比平常快，因而有些女孩子在十二岁到十四岁的时候就已经发育完全了。上面已经提到过的、被工厂报告称为“优秀的”曼彻斯特产科医生的罗伯顿在“北英格兰内外科医学杂志”中说，他遇到过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子，她不仅是一个发育完全的妇女，而且甚至已怀了孕；十五岁的女人生孩子，在曼彻斯特是十分平常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工厂中的高温和热带气候的酷热起着同样的作用，而且和这种气候下的情形一样，发育得太早，结果衰老得也早。但是，妇女们性的发

育受到阻碍的事也是常见的：乳房很晚才发育或者根本就不发育，考威尔文件第35页上就有这样的例子；月经常常到十七八岁、有时要到二十岁才开始来，甚至常常根本就不来。（霍金斯博士文件第11页；劳顿博士文件第14页等；戴·巴莱爵士文件第5页等）月经不调而且在月经来时感到剧痛和全身不适的事很平常，妇女贫血症很常见，这是所有的医学报告都一致证明了的。

这样的妇女，特别是在怀了孕还要工作的条件下，是生不出健壮的孩子来的。根据报告，特别是曼彻斯特的报告，她们生的孩子都很弱，只有巴莱一个人认为是健康的，但是他也说，在他所视察的苏格兰，**结了婚的女人几乎没有一个在工厂做工**；并且除格拉斯哥的工厂外，那里的工厂多半都在城外，这对孩子们的健康就有不小的帮助：在曼彻斯特近郊的工人的孩子几乎都是脸色红润而且生气勃勃的，可是城里的看上去都是脸色苍白的、腺病质的。但是一到九岁，乡村孩子就突然失掉了红润的脸色，因为他们被送进了工厂，并且很快就和城市中的孩子分不出来了。

此外，在工厂劳动中还有几个对健康特别有害的部门。例如在纺纱工厂和纺麻工厂里，屋子里都飞舞着浓密的纤维屑，这使得工人，特别是梳棉间和刮麻间的工人容易得肺部疾病。这种纤维屑有些人的身体受得了，有些人就受不了。但是工人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他在哪一部分找到工作，他就得到哪里去，不管这对他的肺部有什么样的影响。把这种纤维屑吸到肺里去，最普通的后果就是吐血、呼吸困难而且发出哨音、胸部作痛、咳嗽、失眠，一句话，就是哮喘病的各种症候，情形最严重的最后就成为肺结核。（参看斯图亚特文件第13、70、101页；马根多士文件第24页等；鲍尔关于诺定昂和里子的报告；考威尔文件第33页等；巴莱文件第12页〔一个工厂

中发生五起〕、第17、44、52、60页等，以及他的报告；劳顿文件第13页等等）但是特别有害的是亚麻的湿纺工作，做这种工作的都是年轻的姑娘和小孩子。水从锭子上溅到他们身上来，所以他们的衣服的前襟总是透湿的，地上经常有积水。纺纱工厂的并纱间的情形也是这样，只是在程度上稍微好一些，而后果也是经常的感冒和肺部疾病。说话时声音嘶哑、刺耳，这是一切工厂工人的特点，而湿纺工和并纱工尤其厉害。斯图亚特、马根多士和戴·巴莱爵士都极其尖锐地抨击过这种工作的害处，也同样抨击过大多数厂主对做这种工作的女孩子们的健康漠不关心。纺麻的另一个后果是肩部的特殊畸形，即由劳动过程的性质本身所引起的右肩胛骨向前突出。纺麻也像在水力纺纱机上纺棉一样，常常引起膝盖骨的疾病，因为在接断头的时候要用膝盖来抵住锭子，使它停止转动。做这两种工作，工人必须时时弯腰，而且机器又安得离地不高，这就引起了身长发育不足的毛病。我曾经在曼彻斯特一家棉纺织工厂里工作过，在这个工厂的水力纺纱机车间里，就我的记忆所及，没有一个长得匀称的高个子的女孩子；她们都矮小，发育不良，胸部狭窄，体形很难看。除了所有这些疾病和畸形，工人还会成为残废。机器上的工作常常酿成许多相当严重的不幸事件，结果还使得工人暂时地或永久地失去工作能力。最常见的是一个手指被压碎了一节，比较少见的是整个手指、半只手或整只手、整条胳膊等等被轮子卡住并且给轧碎了。受了这些伤——甚至只是无关紧要的伤——以后，往往染上破伤风，因而死亡。在曼彻斯特，除了许多畸形者，还可以看到大批的残废者：这个人缺一只或半只胳膊，另一个人缺一只脚，第三个人少半条腿；简直就好像是生活在一批从战争中归来的残废者里面一样。但是机器上最危险的地方是从大轴上给各种机器

传送动力的传动皮带，特别是在这种皮带装有扣子的时候，不过这种情形现在已经很少见了。谁要是被这种传动皮带带住，转眼间就会被卷起来摔到天花板或地板上去，摔得一根完整的骨头都留不下，立刻就死去。从1843年6月12日到8月3日，“曼彻斯特卫报”报道了下面这些**严重**的不幸事件(比较不严重的它甚至连提都没有提一下)：6月12日，曼彻斯特一个男孩子因一只手被机器轧碎而得破伤风死去。6月16日，萨德尔渥斯城一个青年被轮子卷住，轧得粉碎。6月29日，在曼彻斯特附近绿野猎场机器制造厂做工的一个青年跌在一块磨石下面，被磨石弄断了两根肋骨，严重地伤残了身体。7月24日，奥尔丹一个女孩子被传动皮带卷住转了五十转，死后没有一根骨头是完整的。7月27日，曼彻斯特一个女孩子掉到清棉机(最初在子棉上加工的机器)里，结果因伤死去。8月3日，达金菲尔德一个筒管旋工因被传动皮带卷住而死去，所有的肋骨都断了。在1843年一年中因在机器上受伤并弄成残废而到曼彻斯特医院来医治的人就有962个，而这个医院登记下来的其他不幸事件是2426件，这样，由于别的原因引起的不幸事件和机器引起的不幸事件的比例是五比二。这个数字里面还不包括索尔福发生的不幸事件和私人医生所治疗的人。发生这种不幸事件时，即使受伤者因此失去劳动能力，厂主们最多也只付医药费，在治疗期间照付工资的就极其少见了。至于不能再工作的工人以后如何生活，那是和他们不相干的。

关于这种事情，工厂报告写道：在任何情况下责任都应当由厂主来负，因为孩子们还不会遵守预防办法，而成年人当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遵守这些办法的。但是写这个报告的是资产者，所以他们不可避免地要自相矛盾，并且胡诌一大堆关于工人的“犯罪性的

疏忽”(culpable temerity)的废话。这当然改变不了事实。事情的实质是这样:既然孩子们不**会**谨慎小心,那就必须禁止使用童工;既然成年人**常常**不够谨慎,那末他们或者同样是小孩子,就是说,他们还处在不能完全了解这种危险的发展阶段上,而应当在这上面负责的,不是使他们不**能**受教育的资产阶级,还能是谁呢?——或者是机器装置得不好,必须在周围加上隔板或栅栏,这当然也是资产阶级应当关心的;再不然就是有一种比对于危险的恐惧更强烈的动机支配着工人,——他们为了要多挣一些钱,必须赶快工作,没有谨慎从事的时间,如此等等,——在这种场合下应当负咎的也还是资产阶级。譬如说,许多不幸事件是由于工人在机器还在运转时就开始擦洗机器而发生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资产者强迫工人在机器停下来的休息时间内擦洗机器,而工人自然是不愿意随便牺牲他的休息时间的。每一小时的休息时间对他来说都是这样地宝贵,使他宁愿一星期冒两次生命的危险,也不愿把这一小时奉送给资产者。如果叫厂主把擦洗机器所必需的时间包括在工作时间内,那就没有一个工人会想到要去擦洗转动着的机器了。总之,一切不幸事件的罪过归根到底总是在厂主身上,至少至少也应当要求他终生赡养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而在工人死亡时,就应当赡养他的家庭。在工业发展的初期,不幸事件比现在还要多得多,因为那时的机器比较坏,比较小,装置得比较挤,而且几乎完全没有安全设备。但是像前面引证的材料所表明的,不幸事件的数字现在还很大,使人们不得不严肃地考虑下面这件事实,这就是,仅仅为了一个阶级的利益,竟有这么多的人成为畸形者和残废者,竟有这么多的勤劳的工人在替资产阶级服务的时候因资产阶级的过失而遭遇不幸,从而陷入穷困和饥饿的厄运。

资产阶级的这种令人厌恶的贪婪造成了这样一大串疾病!妇女不能生育，孩子畸形发育，男人虚弱无力，四肢残缺不全，整代整代的人都毁灭了，他们疲惫而且衰弱，——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为了要填满资产阶级的钱袋!如果读到一件件的残酷得野蛮的事情，读到孩子们怎样光着身体被监工从床上拖起来，手里拿着衣服就在拳打脚踢下被赶进工厂（例如斯图亚特文件第39页及其他各页），他们的梦魇怎样被拳头所驱散，他们又怎样在工作中呼呼睡去，一个在机器刚停住的时候就睡去的可怜的孩子怎样在监工的吆喝下惊跳起来，闭着眼睛重复平时的操作；如果读到，累得走不回去的孩子怎样藏在干燥室的羊毛堆里睡觉，只有用皮鞭才能把他们赶出工厂；成百的孩子每天晚上回家时怎样疲倦到由于瞌睡和食欲不振而吃不下晚饭，他们的父母发现他们跪在床前，原来他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睡着了；如果读到这一切和几百件其他肮脏卑鄙的事情，而且是在一切证据都有委员会本身认为可靠的许多证人起誓证实的报告中读到的；如果想一想，这是一个“自由党的”报告，是资产阶级的报告，是做出来反驳托利党以前的报告并证明厂主们的心地纯洁的；如果想一想，委员们自己是站在资产阶级一方面，他们记载所有这些证据是违背他们的本意的，那末对这个以慈悲心肠和自我牺牲自诩而实际上却不惜以任何代价来装满自己的钱袋为唯一目的的阶级，难道能不感到愤怒，能不感到憎恨吗?但是现在让我们来听一听资产阶级通过他们挑选出来的奴才尤尔博士的嘴说出来的话吧。

这位先生在他的“工厂哲学”第277页及以下各页中写道，有人告诉工人，他们所得的报酬和他们所做的牺牲是不相称的，这就破坏了老板和工人之间的良好的关系。工人不应当这样想，他们

应当努力表现自己的勤劳和忠诚，并为自己的老板的成功而欢欣鼓舞，这样他们就可以成为监工、经理，最后甚至可以成为股东，从而（多聪明呵，你说得真像鸽子咕咕叫一样！）“市场上对工人的需求立刻就会增加”！！——“要不是工人这样不安静的话，**工厂制度的发展会得到更加有益的结果。**”接着就是一段抱怨工人倔强的冗长的耶利米哀歌，而在讲到工资最高的工人（精纺工）的罢工时，竟说出了下面这些天真的话：

“是的，正是他们的高额工资使他们能够维持一个有薪俸的委员会，并且给他们吃着就这种工作说来是营养过多、刺激性太大的伙食，因而得了神经营养过度的毛病！”（第298页）

让我们听一听，这位资产者是怎样描写童工的劳动的：

“我参观过曼彻斯特及其附近的许多工厂，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孩子受虐待或者受体罚；也没有看到过孩子们情绪不好。他们看上去都**很快活**（cheerful），**很机灵**，对他们的肌肉的轻微活动**感到愉快**（taking plea-sure），**充分地享受着**适合他们的年龄的活动。生产的景象决没有在我的心里引起一点伤感的情绪，相反地，它永远使我**感到振奋**。看一看走车退回的时候他们怎样灵巧地接上断头，看一看他们用自己的纤巧的手指活动了几秒钟之后，怎样在空闲的几分钟内采取各种姿势**玩耍着**，直到把线抽出来又绕上为止，那是非常令人**愉快的**（delightful）。这些**活泼的**（lively）**小鬼**的工作就像是一种**游戏**，因为已经习惯了，做起来非常轻快。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自己的技巧，很愿意把它显示给每一个参观者看。疲劳是连一点影子都没有的，因为他们一走出工厂，就在最近的一个游戏场上跳跳蹦蹦地玩起来，和刚从学校里出来的孩子们一样。”（第310页）

（当然罗，好像活动一下肌肉并不是被工作弄得疲劳僵硬的身体的直接需要似的！但是尤尔应当再看看这一瞬间的兴奋是不是在几分钟以后就消逝了。而且这种情形尤尔也只能在**中午**，即在孩子们工作五六小时以后看到，而不能在**晚上**看到！）至于工人的健

康，这个资产者为了证明情况非常之好，更是恬不知耻地引用我们多次引证并摘录过的1833年的报告。他企图断章取义地摘引几句话来证明工人当中连一点腺病质的迹象都没有，证明工厂制度使工人摆脱了各种急性病的痛苦（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工厂制度同时却给工人们带来了各种慢性病，这一点尤尔当然绝口不谈了）。要了解我们这位可敬的尤尔怎样厚颜无耻地对英国公众撒下弥天大谎，就应当知道，这个报告共有厚厚的对开本三册，一个脑满肠肥的英国资产者根本不会想到要把它好好研究一下的。让我们再听听他对1833年自由资产阶级所颁布的工厂法的意见吧。以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法律只给了厂主们一些最起码的限制。而在尤尔看来，这个法律，特别是义务致育，是一种用来对付厂主的荒谬而专横的措施。这个法律把所有十二岁以下的孩子都抛到了街头，而结果会怎样呢?不能再做轻松而有益的工作的孩子们现在一点教育也受不到了；他们被人**从温暖的纺绩间赶到冰冷的世界里，**只好靠行乞和偷窃为生；在尤尔看来，这种生活同他们在工厂和主日学中的不断改善的情况比起来实在太悲惨了!尤尔抱怨这个法律在慈善的幌子下加深了穷人的痛苦，使得**有良心**的厂主所进行的有益的工作即使不完全停顿，至少也受到了极大的妨碍。（第405、406页及以下各页）

工厂制度的破坏作用早就引起了一般人的注意。1802年的学徒法我们已经在这里提到过了。以后，大约在1817年，新拉纳克（苏格兰）的厂主罗伯特·欧文（后来成为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就开始上请愿书和条陈，劝告政府必须用法律保护工人的健康，特别是小孩子的健康。赞成他的，有已经去世的罗·皮尔爵士及其他慈善家，他们先后使政府通过了1819年、1825年和1831年的工厂法，前

两个法律根本没有人遵守[107]，后一个也只是部分地被人遵守而已。根据约·凯 霍布豪斯爵士的提议而通过的1831年的法律，禁止棉纺织工厂使用二十一岁以下的工人在夜间（晚上七时半到早上五时半）做工；此外，这一法律还规定，在任何工厂里，十八岁以下的工人的工作时间每天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星期六不得超过九小时。但是，工人为了不致遭到解雇的危险，就不能出面做证反对自己的老板，所以这项法律并没有给工人带来多大好处。在工人不那么老实的大城市里，大厂主共同决定遵守这项法律，但是就在这里也有不少厂主和乡下的厂主一样，根本不理睬这个法律。这时工人们已广泛地要求十小时法案，即规定十八岁以下的青年工人的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十小时的法律。工会通过宣传使这个要求变成了所有工厂居民的共同要求，当时以迈克尔 萨德勒为首的托利党博爱派抓住了这个计划并把它提到议会里去讨论。萨德勒达到了组织议会委员会去调查工厂制度的目的，这个委员会在1832年的议会常会上提出了自己的报告。这是工厂制度公开的敌人为了党派的利益而做的十分不公正的报告。高贵的热情使萨德勒做了许多毫无根据的不确实的论断，他提问题的方式使得他从证人那里所得到的回答即使不是虚假的，至少真理也是被歪曲和颠倒了。厂主们慑于这个把他们描写成恶魔的报告，就自动请求官方进行调查。他们懂得，一个真实的报告**现在**对他们只会有利；他们知道，当权的是和他们交情很好的辉格党人，真正的资产者，反对限制工业是这些人的原则。他们果然达到了成立一个完全由自由资产者组成的委员会的目的，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就是我在这里常常引用的那个报告。这个报告比萨德勒委员会的报告稍微接近真实情况一些，但是它却向相反的

方向背离了真实情况。报告的每一页上都流露出对厂主的同情、对萨德勒报告的不信任、对独立行动的工人和十小时法案拥护者的敌视;报告中没有一个地方承认工人有权过人的生活,有权独立活动和自己下判断。报告**责备**工人,说他们鼓吹十小时法案不只是替孩子们着想,而且是替自己着想,它把工人宣传家称为蛊惑者,称为存心不良的阴险的人等等,一句话,它所有的同情都是在资产阶级一面。但是报告仍然不能替厂主洗刷干净,根据它的自供,应当由厂主负责的丑事还是很多,甚至就从这个报告来看,鼓吹十小时法案、工人对厂主的愤恨、萨德勒委员会用来骂厂主的最尖刻的词句,也都应当认为是完全公正的。全部区别只在于,萨德勒的报告责备厂主们那种公开而毫无掩饰的残酷行为,而这个报告却表明这种残酷行为大都是在文明和人道的假面具之下进行的。譬如受委员会之托去郎卡郡进行过调查的医生霍金斯博士在他的报告的开头几行就表示他自己坚决拥护十小时法案!马根多士委员也声明,他的报告并没有包括全部真实情况,因为很难说服工人提出不利于他们的老板的证据,而由于工人的激动本来就被迫做了较大让步的厂主们,往往又对委员会的访问做好了准备,打扫了工厂,减低了机器的转动速度,如此等等。譬如在郎卡郡,他们就使用了这样的诡计:把监工当做“工人”介绍给委员会,这些监工滔滔不绝地述说了厂主如何人道、劳动对工人健康的良好的影响、工人又如何不关心甚至讨厌十小时法案。但是这些监工已经不是真正的工人,他们是本阶级的叛徒,他们为了较高的工资而替资产阶级效劳,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反对工人。他们的利益是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一致的,所以工人恨他们几乎比恨厂主还厉害。尽管如此,这个报告还是充分地表明了工业资产阶级对待工人的态度是如何令人

愤怒和冷酷无情,表明了整个卑鄙的工业剥削制度是怎样毫无人性。在这个报告里可以看到两种情况的对比:一方面是由于工作过度而产生的许多疾病和畸形,另一方面是厂主们冷酷的锱铢必较的政治经济学,他们竟企图用手中的数目字来证明,如果不再允许他们每年使这么多的小孩子变成畸形者,全英国就必然会和他们一起毁灭。还有什么比这种对比更令人愤怒呢?恐怕只有我刚才引用过的尤尔先生那些无耻的胡说八道才能引起更大的愤怒,假使这些胡说八道不是那样可笑的话。

这个报告的结果就是1833年的工厂法。这个法律禁止雇用九岁以下的儿童做工(丝织工厂除外);规定九岁到十三岁的儿童每周的工作时间是四十八小时,或每天不超过九小时,十四岁到十八岁的未成年工人每周的工作时间是六十九小时,或每天不超过十二小时;规定每天至少要有一个半小时的吃饭时间,并再一次禁止所有十八岁以下的男女工人做夜工。同时又规定所有十四岁以下的儿童每天要受两小时的义务教育,厂主如雇用没有厂医的年龄证明书和教师的入学证明书的儿童,就得受罚。为此,厂主有权从孩子们的工资中每周扣下1辨士作为教师的薪金。此外,还任命了厂医和视察员,他们随时可以到工厂中去要求工人宣誓做证,在厂主违法时,负责向治安法官提出控诉。这就是尤尔博士那样不可抑制地破口大骂的法律!

由于实施了这个法律,特别是由于任命了视察员,工作日平均缩短到十二三个小时,童工也尽可能地由成年人来代替了。因此,几种最惊人的祸害几乎完全绝迹了;只有身体极衰弱的人才会弄成畸形,工厂劳动的恶果一般说来表现得不太明显了。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在工厂报告中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就是在那

些按照约·凯·霍布豪斯爵士法律每天工作十二小时至多不超过十三小时的工厂和工人中也经常出现各种不十分严重的疾病，如脚肿，腿、腰和脊柱软弱而且疼痛，静脉扩张，下肢溃疡，全身衰弱，特别是肠胃衰弱，作呕，食欲不振，有时又有不自然的饥饿感，消化不良，忧郁症以及工厂中的灰尘和恶劣空气所引起的各种肺部疾病等等。在这一方面，关于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的工厂的报告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这些疾病在实施1834年的法律后也还没有绝迹，甚至直到今天还在继续破坏着工人阶级的健康。人们所关心的只是使资产阶级的野蛮的利欲蒙上一种伪善的文明的形式，使厂主由于这项法律的限制不再干出太露骨的卑鄙勾当，以便他们有更多的骗人理由来吹嘘他们的虚伪的人道主义——事情不过如此而已。假使今天再派一个工厂调查委员会出去，它就会发现情况多半还是和过去一样。至于事前毫无准备就颁布的实施义务教育的命令，因为政府并没有同时设法建立好的学校，所以也没有起任何作用。厂主们雇了一些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每天把孩子们送到他们那里去待上两小时，这样就算遵守了法律的条文，但是孩子们却什么东西也没有学到。甚至工厂视察员（他们只限于直接履行自己的职责，即检查厂主是否遵守工厂法）的报告也提供了许多材料，证明前面提到的各种祸害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视察员霍纳和桑德斯在他们的1843年10月和12月的报告里说，在那些可以不用童工或者可以用失业的成年工人来代替他们的部门里，许多厂主仍然要他们每天工作十四小时到十六小时，甚至还要多些。在这些地方，刚超过受法律保护的年龄的年轻人特别多。其他的厂主干脆就破坏这个法律，他们缩短休息时间，使孩子们工作的时间超过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受法庭追究的危险并不能制止他

们，因为他们可能受到的处罚和他们因破坏法律而获得的利益比起来实在太微小了。尤其是在现在生意这样好的时候，厂主们所受的诱惑就更大了。

但是，工人中间十小时法案的宣传并没有停止。1839年这种宣传又热烈起来了，已故的萨德勒的地位在下院内由艾释黎勋爵所代替，在院外则由理查·奥斯特勒所代替，——这两个人都是托利党人。奥斯特勒经常在工厂区进行宣传工作，早在萨德勒在世时就在那些地方出了名，现在特别为工人爱戴。他们简直就称他为“善良的老王”，“工厂孩子之王”；在一切工厂区里，没有一个孩子不认识他，不尊敬他，当他到城里来的时候，没有一个孩子不参加到大家的行列里去迎接他。奥斯特勒也竭力反对新济贫法，因而被一个叫做桑希尔的辉格党人送进了债务监狱，因为他在这位先生的庄园里当过管事，欠了这位先生一笔债。辉格党人曾经屡次向奥斯特勒表示，只要他不再抨击济贫法，就替他偿还债务，并且保护他。但是这一切都落空了；他留在监牢里，并且从那里散发他每周的“弗利特寄语”[108]反对工厂制度和济贫法。

1841年上台执政的托利党政府又注意到了工厂法。内务大臣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在1843年向议会提出了一个把童工的工作时间限制为六小时半并加强义务教育的法案；这个法案的要点是要求创办比较好的学校。然而这个法案由于非国教徒的宗教狂热而未获通过，因为义务教育虽然并不要求非国教徒的子女学习宗教课程，但学校要受国教的监督，而圣经又是大家必读的书，宗教也就成了全部教育的基础，所以非国教徒认为这对自己是一种危险。厂主们和自由党人都支持非国教徒；工人们由于宗教的争执而分裂了，所以没有什么活动；这个法案的反对派，虽然没有在索尔福

和斯托克波尔特这样的大的工厂城市里得到支持，虽然在其他像曼彻斯特这样的城市里，由于害怕工人，只敢对这法案的某几点进行攻击，但是，他们仍然为自己的请愿书征集了将近200万人的签名，这就把格莱安吓得撤回了他的整个法案。次年，格莱安删除了法案中有关学校的一切条文，他没有再提过去的条款，只提议把八岁到十三岁的童工的工作时间限制为每天六小时半，并使得整个上午或整个下午成为他们自由支配的时间；把十三岁到十八岁的未成年工人及全体女工的工作时间限制为十二小时；此外，还实行一些限制，使过去那种常常规避法律的行为成为不可能。他刚提出这个法案，争取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宣传就重新高涨起来。奥斯特勒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了；由于朋友们的帮助和工人们的捐款，他还清了债，并全力投身于这个运动。下院中拥护十小时法案的人数增加了，从各方面来的大批请愿书又给这法案带来了新的拥护者。1844年3月19日，艾释黎勋爵以179票对170票的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工厂法案中“夜间”一词应了解为晚上六时到第二天早上六时这一段时间；因此，由于禁止做夜工，连休息时间在内，工作日也不可能超过十二小时，如果不算休息时间，实际上已限制为十小时了。但是内阁不同意这样做。詹姆斯·格莱安爵士以内阁总辞职相威胁，而在第二次表决这个法案中的某一条的时候，下院以微弱的多数把十小时工作日和十二小时工作日一起否决掉了！在这以后，格莱安和皮尔宣布他们将提出一个新法案，如果这个法案通不过，他们就要辞职。这个新法案就是原来那个旧的十二小时法案，只不过变更了一下形式而已，3月间否决了这个法案的主要点的下院，现在在5月间却把它原封不动地通过了！原因是拥护十小时法案的多半是托利党人，他们宁愿法案垮台也不愿内阁垮台；但是不

管这两次前后矛盾、互相排斥的表决的原因如何,下院只是使自己在全体工人的心目中威信扫地,使宪章派认为必须改组下院的意见获得了一个明证。以前投票反对内阁的三个议员,现在投票**拥护**内阁,从而拯救了这个内阁。每次表决时,反对派总是大批地投票拥护内阁,而执政党却大批地投票**反对**内阁㊀。这样,格莱安提出的两类工人各工作六小时半和十二小时的提案便获得了法律上的效力,由于这一点,同时也由于对补足停工(如因机器损坏或因冰冻、旱灾以致水力不足而产生的)时间的限制及其他某些不重要的限制,工作日要超过十二小时几乎是不可能了。毫无疑义,在很短的时期内,十小时法案也会通过的。不用说,厂主们几乎全都反对十小时法案;他们中间未必能找出十个赞成这个法案的人来;他们用尽一切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手段来反对这个为他们所痛恨的法案,但是这对他们没有一点好处,只是日益加深工人对他们的憎恨。不管怎么样,这个法案是会通过的。工人**想要**什么,他们就能争得什么,而在去年春天他们就证明他们的确是要求十小时法案的。厂主们的政治经济学的论据是:十小时法案会增加生产费用,从而使英国工业无力对抗外国的竞争,而因此工资也必然会降低,如此等等。当然,这论据有**一半是对的**,但这只是证明,英国工业的威力仅仅是靠野蛮地对待工人、靠破坏工人的健康、靠忽视整代整代的人在社会关系、肉体和精神方面的发展的办法来维持的。自然,如果问题是以十小时法案为极限,那英国就会毁灭;但是这个法案必然还会带来其他的措施,这些措施一定会使英国走上和它目前所走的截然不同的道路,

---

㊀ 大家知道,在同一次会议中,在讨论糖的问题时,下院又出了一次丑,起先反对内阁,以后由于使用了"政府之鞭",就变为拥护内阁。—— 恩格斯原注

所以这个法案是前进了一步。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工厂制度的另一面，这一面的后果是比这种制度所引起的疾病更难用法律条文来消灭的。我们已经一般地谈到过工厂工作的性质，并且谈得很详细，足以从已经举出的事实中做出进一步的结论。看机器，接断头，这种活动并不需要工人运用思想，但同时又不许工人思考别的事情。我们还看到，这类劳动也不需要肌肉紧张起来，不让身体有活动的余地。因此，这并不是真正的劳动，而是纯粹的无聊，是世界上最折磨人最使人厌倦的无聊。工厂工人被判决在这种无聊中毁掉他的全部体力和智力；他的天职就是从八岁起整天整天地受无聊的折磨。此外，他没有一分钟的空闲时间：蒸汽机整天地转动着，轮子、传动皮带和锭子整天在他耳边轰隆轰隆、轧拉轧拉地响着，只要他喘一口气，拿着罚款簿的监工就会立刻在他背后出现。这样被判决活埋在工厂里，不停地注视着永不疲劳的机器，对工人说来是一种最残酷的苦刑。这种判决最能使工人身体衰弱，精神萎靡不振。真的，要想出一个比工厂劳动更能使人愚昧的办法来的确是很难的，而如果说工厂工人仍然不仅保持了自己的理智，甚至还使它比其他的人更加发展，那只是因为他们起来反抗了自己的命运，反抗了资产阶级；这就是他们在工作时间也没有失掉的唯一的感觉和唯一的思想。如果某一工人对资产阶级的愤怒还没有成为压倒一切的感情，那他就必然要酗酒，要做出通常所谓堕落的事情。根据官方委员会委员霍金斯的意见，仅仅是体力衰退和工厂制度所引起的疾病，就足以使工人不可避免地要堕落。如果再加上精神萎靡不振和前面提到的使**每一个**工人堕落的种种情况，那末堕落就更是不可避免了！因此，正是在工厂城市里，酗酒和纵欲达到了我前面所描写的那种程度，这就

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㊀

其次，资产阶级用来束缚无产阶级的奴隶制的锁链，无论在哪里也不像在工厂制度上这样原形毕露。在这里，法律上和事实上的一切自由都不见了。工人必须在清晨五点半钟到工厂。如果迟到几分钟，那就得受罚；如果他迟到十分钟，在吃完早饭以前干脆就不放他进去，这样，他就要丧失一天工资的四分之一（虽然他在十二小时内只有两小时半没有工作）。无论吃饭、喝水、睡觉，他都得听命令。连大小便的时间也少得不能再少了。工人从他的家里到工厂要走上半小时或一小时，厂主是根本不管的。专制的钟声经常把他从睡梦中唤走，把他从早餐和午餐中唤走。

工厂里的情形又怎样呢？在这里，厂主是绝对的立法者。他随心所欲地颁布工厂规则；他爱怎样就怎样修改和补充自己的法规；即使他在这个法规中加上最荒谬的东西，法官还是对工人说：

“你们是可以自己做主的，如果你们不高兴，就不必订这样的契约；但是

㊀ 我们再听一听一个权威法官的话：“如果我们把爱尔兰人的恶劣影响和全体棉纺织工人群众的无休止的劳动联系起来视察一下，对于他们的可怕的堕落就不会感到怎么惊奇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没有间息的消耗精力的劳动，是不会使人在智力方面和道德方面有所发展的。在这种永无止境的苦役（drud- gery）中，反复不断地完成同一个机械过程；这种苦役单调得令人丧气，就像息息法斯①的苦刑一样：劳动的重压像巨石般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疲惫不堪的工人身上。心灵不可能通过同一块肌肉的无休止的劳动来获得知识和思考能力；悟性日益迟钝，而人性中粗野的一面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判决一个人从事这种劳动就是要在他身上培养兽性。他逐渐变得对什么都不在乎，抛弃了他天生的精神上的渴望。他轻视人生中的舒适和高尚的娱乐，生活在肮脏、穷困和缺乏营养的状况中，并把最后的一点工钱花在各种放荡生活上。”（詹·菲·凯博士，同前书）——恩格斯原注

① 息息法斯（Sisyphus）为希腊神话中哥林多之王，被谪在冥府中推运巨石至山顶，而这巨石每次推上都一定又滚下去。——译者注

现在你们既然自愿地订了这个契约，那你们就得履行它。”

这样，工人还得忍受这个本身就属于资产阶级的治安法官的嘲笑，忍受同一个资产阶级所制定的法律的嘲笑。这样的法庭判决是很常见的。1844年10月，曼彻斯特肯尼第工厂的工人罢了工。厂主就根据贴在厂里的一条规则——在一个车间里不允许有两个以上的工人同时丢开工作——向法庭提出控告！法官承认厂主有理，并用上面所引的那一段话回答工人（10月30日的“曼彻斯特卫报”）。工厂规则通常是怎样的呢，请看吧：（1）工厂的大门在上工十分钟后即行关闭，早餐前任何人不得入厂；在此时缺席者，按其管理的织机数目每台罚3辨士；（2）在其他时间内，织工（动力织机上的织工）如在机器转动时缺席，按其管理的机器数目每台每小时罚3辨士；在工作时间内未得监工允许擅自离开车间者也罚3辨士；（3）没有自带剪子的织工每天罚1辨士；（4）所有梭子、刷子、注油器、轮子、窗户等如有损坏，概由织工赔偿；（5）织工不在**一周前预先通知厂方**不得离职；厂主可以因工作不好或举动失当**不经事先通知**即开除任何一个工人；（6）在工作时和别人说话、**唱歌**或**吹口哨**，即罚6辨士；工作时离开现场者，也罚6辨士[㈠]。我手头另外还有一份工厂规则，根据这份规则，迟到三分钟的扣一刻钟的工资，迟到二十分钟的扣四分之一天的工资；星期一早餐以前缺席的罚1先令，其余的日子罚6辨士，如此等等。这就是曼彻斯特杰西街芬尼克斯工厂的规则。会有人这样说：为了保证一个庞大而有秩序的工厂里各种不同的操作都能很好地配合，这种规则是必要的；他还会这样说：在这里和在军队里一样，这种严格

㈠ “无可否认的事实”第9页及以下各页。——恩格斯原注

的纪律是必要的。就算是这样吧，但是，如果一种社会制度没有这样可耻的暴虐统治就不能存在，这算一种什么社会制度呢？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或者是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凡是当过兵的人都尝过服从军事纪律（即使是短时期的）的滋味；而这些工人却注定了从九岁起无论精神上或肉体上都要在棍子下面生活一直到死。他们比美国的黑人更像奴隶，因为他们处在更严格的监视之下。尽管这样，人们还要求他们像人一样地生活、思考和感觉！的确，他们要能做到这样，那就只有切齿痛恨他们的压迫者，痛恨那种使他们陷入这种境地并把他们变成机器的制度！但是还有更可耻的事情：根据工人的**普遍的**陈述，许多厂主用最残酷的严厉办法向工人榨取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罚款，从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身上搜刮一文半文的小钱来增加自己的利润。李奇也说，工人在早晨到工厂的时候，常常发现工厂的钟快了一刻钟，因而大门已经关了，而拿着罚款簿的办事员却在车间里乱转，把大批没有到的工人记下来。有一次，李奇就亲眼看到95个工人这样被关在工厂的大门外面；这个工厂的钟比城市里一般的钟晚上**慢**一刻钟，早上**快**一刻钟。在工厂报告中也叙述了类似的事情。有的工厂上班时把时钟的针拨回去，因而工作时间就比规定的时间长，但工人并没有因此多得到一点工资。有的工厂干脆就要工人多工作一刻钟。又有的工厂有一只普通的钟和一只表示机器主轴转动次数的机器钟；如果机器转动得慢，那就按照机器钟工作，直到十二小时中应该转动的次数转足时为止；如果工作做得很好，规定的转数不到时间就转足了，那末工人还是要做满十二小时的工作。有一个证人补充说，他认识几个女孩子，她们都挣钱不少，并且还有加班工作，

但她们还是宁愿去做娼妓也不愿忍受这种暴虐的统治（引自德林瓦特文件第80页）。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罚款的情形。李奇说，他曾经不止一次地看到，怀孕后期的女工们在工作时间坐下来休息一会，就被罚款6辨士。因为工作不好而处以罚款的事完全是随便乱来的。商品到了仓库才进行检查，而仓库管理人甚至不把工人叫去就开了罚款单；工人直到监工付给他工资的时候才知道他已经受罚，而那时商品可能已经卖掉，至少已经拿走了。李奇有一张长达10英尺的罚款单，罚款总数达35英镑17先令10辨士。他说，在开这张罚款单的工厂里，一个新的仓库管理人被解雇了，因为他罚得太少，使厂主的收入每星期少了5英镑（34塔勒）。（“无可否认的事实”第13—17页）我再重复一遍，我认为李奇是一个完全可以信任的不会说谎的人。

在其他方面，工人也是老板的奴隶。如果有钱的老板看上了工人的妻子或女儿，那他只要吩咐一下或暗示一下，她就无法抗拒。如果厂主为了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要人在请愿书上签名，那他只要把请愿书送到自己的工厂里去就行了。如果他想把某一个人弄到议会里去，他就叫自己的所有有选举权的工人去投票，而不管工人愿意或不愿意，他们都必须投资产者的票。如果他想在公共集会中取得多数，他就比平时早放工半小时，并替工人找好靠近讲台的位子，以便很好地加以监视。

还有两种办法特别加强了厂主对工人的奴役，这就是 truck— system（实物工资制）和 cottage— system（小宅子制）。工人们把用商品支付工资叫做 truck，这种支付办法以前曾通行于全英国。“为了使工人方便起见，使他们不受小商人的高价的剥削”，厂主就开一个商店，出卖各种各样的商品。而为了使工人不到别的

价钱比较便宜的商店里去（因为 tommy—shop〔工厂商店〕中的价格通常都比别的地方贵25—30%），支付工资时不用现款，而用工厂商店的购买券。这种可耻的制度引起了公愤，因此1831年公布了Truck Act〔实物工资法〕，根据这个法律，对大多数工人采用的以商品支付工资的办法被宣布为无效的、非法的，谁要这样做就处以罚款。但是这个法律也像大多数的英国法律一样，只是在个别地方具有实际效力。当然，在城市里这个法律是执行得相当认真的，但是在乡间，旧制度仍被直接间接地充分采用着。在莱斯特城里，这种制度也是很流行的。我手边就有十几份对违反这个法律的案件的判决书，这些判决书都是1843年11月到1844年6月间做出的，其中一部分登在“曼彻斯特卫报”上，一部分发表在“北极星报”[109]上。自然，这种制度现在是不那样明目张胆地实行了；工人们多半都能领到现钱，但是，厂主们还是有足够的办法强迫工人到工厂商店里而不到旁的地方去买东西。这样就很难揭穿这类厂主；现在，只要他们的确把钱交到工人手里，他们就可以在法律的保护下干自己的罪恶勾当了。1844年4月27日的“北极星报”刊登了约克郡哈得兹菲尔德附近霍姆菲特的一个工人的一封信。这封信里面谈到一个叫鲍威斯的厂主：

“这个该死的用实物支付工资的办法竟能够像在霍姆菲特这样大规模地存在，而且谁也不敢制止厂主这样胡来，真是叫人奇怪。这里，有许许多多老实的手工织工为这个该死的制度受罪。这里就是一个宽宏大量的自由贸易派㈠分子的例子，这不过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这里有一个厂主，因为他对待可怜的织工们实在太可恶，附近的街坊没有不诅咒他的。一匹价值34—36先令的料子，他只给20先令的现钱，其余的就只发给呢子或衣服，定价要比其

㈠ 自由贸易派是反谷物法同盟的拥护者。——恩格斯原注

他商人贵40—50%，而且这些东西还常常是已经霉烂的。但是自由贸易派的'信使报'㊀却说：他们并不是非要货物不可呀，这是完全随他们便的。呵，不错，可是他们要是不想饿死，就得要这些东西。要是他们要的现钱超过20先令，在领经纱时他们就得等上八天到十四天；要是他们20先令再加货物，那经纱总是够他们用的。这就是他们的自由贸易。布鲁姆勋爵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应该积存一些东西，免得到老年的时候去请求救济。好呵，我们是不是就积存这些霉烂的东西呢？这话要不是一位勋爵说的，那就只能认为这个人的脑袋也像用来偿付我们的劳动的那些货物一样地霉烂了。当没有缴纳登记费的报纸非法出现的时候，还有许多人向霍姆菲特的警察局告密，还有像布莱斯和依斯特伍德等那样的人，但是现在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现在情况当然不同了，我们的厂主已经成了虔诚的自由贸易派，他每个星期日上两次教堂，还诚心诚意地跟着牧师念道：'我们应该做的，我们都没有做，我们不应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我们是不能得救的，但是慈悲的主呵，饶恕我们吧。'（英国国教的祷词）①是的，饶恕我们到明天吧，好让我们再把霉烂的货物付给我们的织工。"

小宅子制初看起来害处要小得多，它的产生更是无可非难的，虽然这种制度对工人的奴役并不下于实物工资制。在乡间，工厂附近常常缺少工人住的房子。因此，厂主就常常得造这种住房，而他也是很乐意这样做的，因为这些房子会给他投下的资本带来极大的利润。如果工人住宅的房东一般能从他的资本中获得年利6%的话，那就可以认为这种小宅子会给厂主带来双倍的利润；因为只要他的工厂不关门，他就总有房客，而且是按时付房租的房客。这样，他保险不会受到其他房东可能受到的两种主要的损失：他的小宅子永远不会空闲着，他也没有收不到房租的危险。但是房租通常是把这两种可能的损失都算进去的，因此，如果厂主收的房租和其他

㊀ "里子信使报"，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报纸。——恩格斯原注

①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房东收的一样多，他就可以在工人身上做一笔获利12—14%的好买卖。厂主把房子租给工人，从而比他的竞争者获得更多的利益，甚至双倍的利益，同时又使他们根本不可能和他竞争，这当然是不公平的。然而更不公平的是，他的这些利益是从必须珍惜每一个小钱的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口袋中取得的；但是这种事情**对厂主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他的全部财富本来就都是靠牺牲工人而获得的。既然厂主用解雇的威胁来**强迫**工人住他的房子，要他们缴纳比平常高的房租，甚至缴纳他们根本不住的房子的房租（这是常有的事），这已经不是不公平，而是无耻了。自由党的“太阳报”㈠引了“哈里法克斯卫报”上的一段话：在埃士顿—安得—莱因、奥尔丹和罗契得尔等地，有许多厂主强迫他们的几百个工人缴纳小宅子的房租，不管他们住不住这房屋。小宅子制在乡间的工厂区是很盛行的；这种制度产生了大批的村镇，并且在大多数的场合下都因为厂主很少有或者根本就没有竞争者，所以他完全用不着根据一般的标准来规定房租，他想要多少就要多少。在和工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小宅子制又给了厂主多么大的权力呵！工人一罢工，厂主就赶他们搬家，而且只给他们一星期的限期；限期一过，工人不但没有吃的，而且也没有住的，只好成为流浪汉了，而根据法律，流浪汉是毫不容情地要被送到监狱里去关一个月的。

这就是工厂制度！我已经在本书篇幅容许的范围内尽量详细地叙述了这种制度，并且在叙述资产阶级和手无寸铁的工人作斗争的英雄事迹时，尽可能地做到大公无私——谈到这种英雄事迹时是不能无动于中的，因为无动于中就等于犯罪。让我们再把18

㈠ 1844年11月底的“太阳报”（在伦敦出版的日报）。——恩格斯原注

45年自由的英国人的状况和1145年诺曼贵族压迫下的撒克逊农奴的状况比较一下吧。农奴是 glebae adscriptus（束缚在土地上的），自由工人也被小宅子制束缚在土地上。农奴必须把 jus primae noctis（初夜权）献给主人；自由工人必须献给老板的，不但是初夜权，而且是**每**夜权。农奴没有权利弄到一份财产，他所有的一切，地主都可以拿走；自由工人也没有财产，而且由于竞争也不可能弄到一份财产。甚至连诺曼人也做不出的事情，厂主都做了：厂主通过实物工资制每天都在侵占工人直接用来维持生活的东西。农奴和地主的关系由大家都遵守的符合习俗的法律来调整，同时也由习俗本身来调整；自由工人和老板的关系也由法律来调整，但是这种法律**没有**被遵守，因为它既不符合习俗，也不符合老板的利益。地主不能使农奴离开土地，不能只出卖农奴而不出卖土地，而因为所有的土地几乎都不能转让，加之当时又没有资本，所以地主是根本不能出卖农奴的；现代资产阶级却强迫工人出卖自己。农奴是他出生的那一块土地的奴隶；工人是生活必需品和他用来买这些必需品的金钱的奴隶—— 他们都是**物件**的奴隶。农奴的生存有封建的社会制度来保障，在那种社会制度下每个人都有他一定的位置；自由工人却一点保障都没有，因为他只是在资产阶级需要他的时候才在社会上有一定的位置，否则就没有人理会，似乎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农奴在战争时期为自己的主人卖命；工厂工人在和平时期为老板卖命。农奴的主人是野蛮人，他把农奴看做牲口；工人的老板是文明人，他把工人看做机器。总之，这两种人的情况大体上是一样的，如果说哪一种人的情况更坏一些的话，那自然就是自由的工人。两种人都是奴隶，对前一种人的奴役不是伪善的，是明显的，公开的，而对后一种人的奴役却是伪善的，狡猾地

蒙蔽着被奴役者本人和所有其他的人，这是比旧的农奴制更坏的神学的[①]奴隶制。托利党人慈善家们称工厂工人为 white slaves（白奴），那是正确的。但是这种伪善的隐蔽的奴隶制至少在口头上是承认自由权的；它在爱好自由的舆论面前是要低头的；而比起旧的奴隶制来，这就是历史性的进步，至少是自由的原则已被承认了，而被压迫者自己也关心如何使这个原则实现。

最后，我从一首表现工人自己对工厂制度的看法的诗中摘引几节来作为结束。这首诗是北明翰的爱德华·波·米德写的，它正确地表达了工人中的普遍的情绪。[110]

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国王，——
不像故事里的那样和善，
他是个专杀白奴的魔王，
大家叫他蒸气，非常凶残。

虽然暴君的手只有一只，
但他气力大，谁都比不上，
像是一只烧红了的铁手，
他能使人民成群地灭亡。

他像他祖先摩洛赫一样，
宰割人民，制造无穷灾殃，
他的心里有烈火在燃烧，
他拿儿童当果腹的食粮。

他的祭司像他一样凶狠，
用铁腕操纵人们的命运，
贪得无厌地给他找牺牲，
用人们的鲜血铸造金银。

---

① 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译本中是“伪善的”（hypocritical）。——译者注

这些奸贼是无耻的恶魔，
把人权的基础践踏净尽，
耻笑父亲们痛哭的眼泪，
取笑母亲们垂死的呻吟。

饥啼寒号欣慰他们心窍，
悲叹哭泣是悦耳的音乐，
老人儿童的尸骨堆成山，
堆满了他们宫殿的地窖。

没有心肝的凶恶的国王，
在邪恶的王国布满死亡，
他用劳动折磨人的肉体，
他把人们活的灵魂杀光。

快打倒国王，刽子手国王！
千百万的工人，起来，前进！
我们把他的手紧紧捆绑，
趁他还没吞灭全国人民。

你们的愤怒就快要觉醒，
你们就要张口高声呼喊。
那伙镀金的寄生虫一定
会和暴君一起跌入深渊㈠！

㈠ 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篇幅来详细谈论厂主们对最近十二年来所受到的控诉的答辩。这些人是无可理喻的，因为他们已被他们心目中的利益弄瞎了眼睛。他们的某些答辩我已经在前面顺便答复过，所以在这里我只消再说几句就够了。

你们来到了曼彻斯特，并且想考察一下英国的生活条件。自然，你们会很好地被介绍给一些“可敬的”人物。你们会提出一些有关工人状况的意见。你们会认识几个最大的自由党厂主，例如罗伯特·海德·格莱格、艾德蒙·艾释华特、托马斯·埃士顿等等。你们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他们。厂主是了解你们的，他知道他应该怎么做。他领你们到他的乡下的工厂去；格莱格先生领你们到柴郡的石矿坡去，艾释华特先生领你们到波尔顿附近的塔尔顿夫，埃士顿

① 先生领你们到海德去。他领你们到设备很好甚至还可能有通风设备的建筑物中去，他使你们注意那高大的空气流通的厂房，漂亮的机器和几个看起来很健康的工人。他招待你们一顿丰富的早餐，然后向你们提议去参观工人住宅。他领你们到一些看起来是新的、干净而且舒适的小宅子里面去，他自己也和你们一起走进这一家或那一家。他当然只领你们到监工、机匠等人那里去，好让你们"看看**专**靠工厂过活的家庭"。在别的小宅子里，你们就会发现只有妻子和小孩在工厂里工作，而丈夫却在补袜子。因为厂主在场，你们不便提出太轻率的问题；于是你们以为工人的工资都很高，生活都很舒适，而由于乡间空气新鲜，脸色也比较健康。于是你们就开始放弃英国到处都是贫穷和饥饿的想法，发现这是过分的夸张。但是小宅子制如何使工人变成奴隶，也许附近就有一个工厂商店，这你们却一点也不会知道；工人不会向你们表示他们如何憎恨厂主，因为厂主就在你们身边。厂主甚至还建立了学校、教堂和阅览室等等。他利用学校来养成孩子们的服从的习惯，他放在阅览室中的书籍都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他把那些阅读宪章派或社会主义书报的工人解雇，这一切都是瞒着你们的。你们看到愉快的宗法关系，你们看到监工们的生活，你们看到工人同意在精神上也成为资产阶级的奴隶时资产阶级**许给**他们的东西。很久以来厂主们就特别喜欢"乡村制造业"，因为在这里，工厂制度的害处，特别是在卫生方面的害处，部分地由于空气新鲜和四周的环境比较好而抵销了，同时也因为在这里对工人的宗法制的奴役保持得最长久。尤尔博士对此歌颂备至。但是倒霉的是那些想独立思考并成为宪章主义者的工人：对于他们，厂主们的慈父般的爱护和关怀一下子就消失了。你们如果想到曼彻斯特的工人区去看看工厂制度在工厂**城市**中的影响，那末在有钱的资产者给你们协助以前，你们是得好好地等一个时候的！这些老爷们不知道工人想要什么，他们所处的情况怎样。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知道这些，因为他们害怕那些会使他们不安甚至会迫使他们违背自己的利益的事情。但是这丝毫没有关系，工人要做的事情，他们是能用自己的力量做到的。——恩格斯原注

其他劳动部门

我们在工厂制度这方面谈得多一些，因为它是工业时代的一种全新的产物。而其余工业部门的工人状况我们谈的就少多了，因为一般的工业无产阶级的情况或特别是工厂制度的情况，全部或部分是和这些部门的情况相同的。因此，剩下的问题就只是考察工厂制度在各个劳动部门中已深入到什么程度，以及这些部门中每一个部门有什么特点。

适用工厂法的四个劳动部门都是生产衣料的。我们现在最好是从那些向这类工厂领取原料的工人谈起；先谈诺定昂、得比、莱斯特的**针织工人**。"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谈到这些工人时说，工作时间长（由于工资低，不得不这样），再加上整天坐着，眼睛因工作本身的性质经常保持紧张状态，这就使他们的整个身体都衰弱下去，特别是影响了视力。晚上没有很强的灯光就不能工作，因此，工人通常都利用玻璃球来聚光，这对眼睛的害处很大。几乎所有的工人到了四十岁就得戴上眼镜。在这种生产中从事缠线和缝纫（缝合）的儿童，通常都不健康而且发育得不好。他们从六七岁或七八岁起就在狭小得令人窒息的屋子里每天工作十小时到十二小时。许多儿童被工作弄得疲惫不堪，逐渐虚弱下去，连最普通的家务事都干不了，眼睛很早就近视了，因此不得不在童年就戴上眼镜。委员们发现许多儿童都患有瘰疬症，厂主们大都拒绝雇用做过这种

工作的女孩子在自己的工厂里工作，说她们的身体太弱了。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把这些童工的状况叫做“基督教国家的耻辱”，希望他们的工作受到法律的保护(格棱吉。“报告”附录第1部分F15页第132—142节)。报告还说，莱斯特的针织工人的待遇在当地所有的工人中是最坏的；他们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到十八小时，每星期挣6先令，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挣7先令。过去他们挣过20—21先令，但是大型织机的使用降低了他们的工资；大多数工人还在旧的简单的织机上工作，和改良了的机器进行着筋疲力尽的竞争。可见技术的发展每前进一步，工人的状况就倒退一步！但是不管怎么样，鲍尔委员说，针织工人却以他们的**自由**、以他们吃饭、睡觉或工作都**不受工厂钟声的支配**而感到骄傲。在工资方面，这些工人现在的情况并不比1833年工厂委员会写报告的时候好些；这是由于过着半饥半饱生活的萨克森针织工人的竞争造成的。这种竞争不仅在所有国外市场上击败了英国人，而且(在劣等货物方面)在英国市场上也击败了他们。德国的爱国针织工人，由于自己的挨饿而剥夺了英国针织工人的面包，他们该多么心满意足呵！如果德国的荣誉要求他们的肚子老是空着一半，难道他们就不再为德国工业的光荣而骄傲地愉快地继续挨饿吗？呵，竞争和“国家竞赛”是多么了不起的东西！“晨报”(也是自由党的报纸，par ex— cellence〔道地的〕资产阶级报纸)在1843年12月发表了亨克莱的一个针织工人描写他的同伴的状况的几封信。他附带报道了50个家庭的情况，这些家庭共有321人，依靠109台织机为生；每台织机平均每星期收入$5^1/_6$先令，每个家庭平均每星期挣11先令4辨士。在这里面，房钱、针织机租费、煤炭、灯火、肥皂和织针总共要用掉5先令10辨士，每人每天只剩下$1^1/_2$辨士(15个普鲁士分尼)做伙食费，至于做衣服就一

个钱也没有了。

这个针织工人写道:“从来没有一个人看到过,没有一个人听到过,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这些可怜的人们所忍受的苦难的一半。”

他们根本没有床铺,即使有,也只够一半人睡,孩子们穿得破破烂烂,赤着脚跑来跑去。男人们含着眼泪说:我们很久很久没有吃肉了,我们几乎忘记了肉的味道。终于有些人星期日也工作,虽然社会舆论从来也不原谅他们这样做,而且织机的轧轧声四邻都可以听见。

其中有一个人说:“看看我的孩子你们就全明白了。贫穷逼着我这样干,我不能老是看着自己的孩子饿得直叫,却不去用最后的办法清清白白地赚些面包。上星期一我早上两点钟就起来,差不多干到半夜,其余的几天从早上六点钟一直干到深夜十一二点钟;但是我吃不消,我不愿意把自己送进棺材里去。现在我每天晚上干到十点钟,损失的时间在星期天补上。”

无论在莱斯特,在得比,或在诺定昂,工资从1833年起就没有增加过,而最坏的是莱斯特还普遍实行实物工资制,这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了。因此,这个地方的针织工人在每次工人骚动时都非常积极地参加,那是毫不足怪的;因为针织工人多半是**男人**,所以他们参加运动,就显得更主动和更有力量。

针织工人居住的地方也是生产**花边**的主要中心。在上面提到的三个郡里面共有2760台花边机,在英国其余的部分却一共只有786台。由于严格的分工,生产花边的过程变得非常复杂,分成了许多部门。首先是把棉线缠到筒管上,这工作由十四岁或更大一些的女孩子(winders〔络线工〕)来做;然后把这些筒管装在机器上,把线从小孔中穿过去(这种小孔每台机器平均约有1800个),并把它引到规定的地方,这工作由八岁或更大一些的男孩子(thread— ers

〔穿线工〕)来做;然后才是工人织制花边;花边从机器上取下来时是宽宽的长条形的,由很小的孩子把连接每块花边的线挑出来,把它们一块一块地分开;这个工序叫做 running〔挑〕或 drawing lace〔抽花边〕,这些小孩子就叫做 lace— runners〔挑花边工〕。在这以后,花边就完全制好,可以拿去出卖了。无论是络线工或穿线工,都没有一定的工作时间,机器筒管上的线一用完,就需要他们;因为工作在夜间还继续进行,所以任何时间都可能需要他们到工厂或花边工人的工作间去。工作没有规律、常常做夜工以及由此产生的不正常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些都在许多方面损害了身体,败坏了道德,特别是像大家一致指出的,引起了混乱而过早的性关系。工作本身对眼睛的害处是很大的;虽然没有发现穿线工有一般的慢性病,但在他们中间眼炎是很流行的,而穿线的工作本身就会引起眼痛、流泪、视力一时模糊等等。至于络线工,那末已经查明,她们的工作严重地损害视力,除了引起经常性的角膜炎,还常常引起白内障和黑内障。花边工的工作是很辛苦的;机器造得愈来愈宽,现在使用的几乎全是需要三个男工操纵的机器;这三个人依次每隔四小时换一次班,所以他们合起来每昼夜工作二十四小时,每一个人每天工作八小时。这就可以了解,络线工和穿线工所以常常不得不在夜间工作,是为了不让机器停得太久。为了把线穿过1800个小孔,需要三个孩子工作两小时。有些机器已经用蒸气力来发动,因而男人的劳动就被挤掉了。在"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屡次提到有小孩子工作的"花边工厂",由此显然可以推断,目前的情况不是花边工已移到巨大的工厂厂房中去工作,就是蒸气力已被普遍地用来制造花边。而两种情况都表示工厂制度获得了进一步的推广。但是对健康最有害的是挑花边的工作,做这种工作的多半是

七岁、甚至是五岁或四岁的孩子。格菱吉委员甚至碰到过一个两岁的孩子在做这种工作。经常在复杂的花边纹路中注视着需要用针挑出来的那根线，是非常伤眼睛的，特别是这种工作通常都得继续十四小时或十六小时之久。这样，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的眼睛也会变得非常近视，而在最坏的情况下（这是很常见的）就会因黑内障而永远失明。此外，孩子们因为经常弯着腰工作，所以长大时身体很弱，胸部狭窄，并因消化不良而患瘰疬；子宫机能破坏的现象在女孩子中几乎是很普遍的，脊柱弯曲也一样地普遍，所以“从这些孩子走路的姿势上就可以认出他们是挑花边工”。绣花边无论对眼睛，或对整个身体，也都有同样的后果。做证的医生一致说，所有从事花边生产的孩子的健康，都因他们的工作而受到极大的损害，这些孩子脸色苍白，虚弱无力，他们的身体与年龄比起来都显得太矮小；对疾病的抵抗力也比别的孩子差得多。他们通常的疾病是：全身虚弱、常常昏倒、头痛、两胁痛、背痛、腰痛、心跳、恶心、呕吐、食欲不振、脊柱弯曲、瘰疬和肺结核。这种工作时刻都在极其严重地破坏妇女的健康，患妇女贫血症、难产和流产的到处都是（格棱吉在“报告”中的许多地方都提到这一点）。这个下级官员向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说，孩子们经常穿得很坏，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吃也吃得很不好，多半只有面包和茶，常常好几个月看不到肉。至于他们的道德状况，他说：

“诺定昂的全体居民，警察、牧师、厂主、工人以及这些孩子的父母，都一致肯定，目前的劳动制度是产生道德堕落现象的最肥沃的土壤。穿线工（多半是男孩子）和络线工（多半是女孩子）常常在半夜里同时被叫到工厂里去，又因为他们的父母不可能知道他们需要在那里待多久，所以他们有充分的机会在一块胡搞，工作完了就一块去游荡。这种情况大大助长了道德败坏现象。大

家都承认，在诺定昂道德败坏已达到可怕的程度。至于这种极端反常的情况对这些孩子和年轻人的家庭安宁和乐趣的严重破坏，那就不用说了。”

花边生产的另一部门即花边的编结，已扩展到农业地区——北安普顿郡、牛津郡、培德福德郡和巴金汉鄂。从事这一工作的大都是儿童和少年，他们都抱怨吃得不好，很少吃到肉。他们的劳动对健康是极端有害的。孩子们在狭小的、不通风的和令人窒息的屋子里工作，老是坐着，弯着腰拨动编针。为了使身体勉强保持这种吃力的姿势，女孩子们都穿上带有木板条的紧身，由于这些女孩子大半都是很小就开始工作，那时骨头还很软，因此，这种紧身使胸腔和肋骨完全移动了位置，使胸部普遍狭窄。由于工作地点的空气不好，工作时又整天坐着不动，这些女孩子大多数患了消化不良症；她们在受到这种病的残酷（severest）折磨之后，就得肺结核死去。她们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道德方面的教育受得更少，又都喜欢打扮，因此她们的道德水平低得可怜，卖淫在她们当中几乎成了流行病。（“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白恩士的报告）

这就是社会为了使漂亮的资产阶级太太们能享受戴花边的快乐而付出的代价！这难道不是很便宜的代价吗？总共只有几千个工人弄瞎了眼睛，只是一些无产阶级的女儿得了肺结核，只是一代平民弄得孱弱不堪，而这种孱弱的体质还是遗传给这些平民的同样是平民的子孙，——这算得了什么呢？算不了什么，根本算不了什么！我们的英国资产阶级若无其事地把政府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放在一边，照旧用花边来装饰自己的太太和女儿。英国资产者的泰然自若确实是很了不起的！

郎卡郡、得比郡和苏格兰西部有大批的工人在印花工厂中工作。在英国工业中，没有一个部门像这个部门一样在机械的发展方

面获得这样辉煌的成果，但是也没有一个部门的机械的发展使工人的状况恶劣到这种地步。应用蒸气力推动雕花滚筒，又发明了用这种滚筒同时印四种到六种颜色的方法，这就完全排挤掉了手工劳动，正像机器的使用把手工劳动从棉纺织业中排挤出去一样。但是这些新发明在印花工厂中挤掉的工人比在棉纺织工厂中还要多得多。在这里，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做助手的小孩用机器做的工作抵得上过去200个工人用手做的工作。一台机器每分钟出28码（80普鲁士尺）印花布。结果印花工的处境就很糟糕；在他们向下院提出的请愿书中说，郎卡郡、得比郡和柴郡在1842年共印出1100万匹印花布；其中有10万匹是完全用手工印的，90万匹是部分用机器、部分用手工印的，1000万匹是完全用机器印的，印上的颜色少则一种，多则六种。因为机器大部分是新近才使用的，而且不断地在改良，所以手工印花工的数目总是比生产所需要的多；其中有许多（请愿书中说明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自然就完全没有工作了，而其余的平均每星期也只有一两天、最多是三天的工作，得到的是最低的工资。李奇在谈到一个印花工厂（郎卡郡柏立附近的第普里一戴尔）的时候说，那里的手工印花工平均最多只挣5个先令（“无可否认的事实”第47页），同时他也很清楚地知道，机器印花工的报酬却相当高。这样，印花业完全实行了工厂制度，但不受法律对工厂制度的限制。这一行业所生产的是时髦的商品，所以没有规定的工作时间。定货少的时候，他们就只有一半时间工作；如果某一个图案受到欢迎，生意很好，工厂就工作到夜间十点、十二点，甚至通宵工作。在曼彻斯特，我的住宅附近就有一家印花工厂。我不止一次地在深夜回家时看到工厂中还是灯火通明，我常常听说，在那里，孩子们的工作时间往往很长，他们总想找个机会

在石阶上或穿堂屋的墙角旁休息一会，打一会盹。至于这种情况是否真实，我没有**确切**的证据，否则我就把这个公司的名字指出来了。“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只是大致地提了一下这一工业部门中的工人的状况。报告只谈到，在英国，至少这些孩子大部分还穿得相当好，吃得相当好（这是相对的，当然要看他们的父母挣钱多少而定），他们没有受任何教育，在道德方面还有很多缺陷。由于上面已经谈过工厂制度的情形，这里我们只指出这些孩子是处在这个制度的统治之下就够了，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接下去谈别的。

现在我们再稍微谈谈衣料生产部门中其余的工人。**漂白工**的工作对健康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们不得不经常把氯气这种对肺部极有害的物质吸进去。**染色工**的工作害处比较少一些，在许多场合下甚至还对工人有益，因为这工作需要全身使劲。关于这两类工人所得的报酬很少有人谈到，这就证明它并不低于一般的水平，否则他们是会抱怨的。由于棉质天鹅绒的销路广，所以**剪绒工**的人数相当多，共达三四千人。他们间接地因工厂制度而大遭其殃。过去用手工织机生产的商品织得不十分均匀，所以需要一个能手把线头一行一行地剪平。自从使用动力织机以来，每一行线都排得很均匀，每根线都和上一根平行，所以剪平绒毛的工作就不需要多大技巧。被机器剥夺了固定生计的工人迅速地投入了这种比较简单的工作，由于他们的竞争，工资降低了。厂主发现这种工作完全可以交给女人和小孩去做，于是工资就降低到女工和童工的水平，成百的男人就完全被挤掉。其次，厂主还发现，让工人在工厂中工作比在工人的作坊中工作要便宜得多，因为他们反正要间接地替工人付这个作坊的房租。从那时起，过去用做剪绒作坊的许多

小宅子的阁楼不是空起来，就是作为住房租出去，同时剪绒工失掉了自由支配时间的权利，要听从工厂里的钟声的指挥了。一个看上去不到四十五岁的剪绒工告诉我，他还记得那样的时代，那时每剪一码挣8辨士，现在每码只挣1辨士；当然，现在因为织出来的东西比较均匀，他可以剪得快些，但是现在每小时所剪的远不能超过以前一倍；这样，他的工资就减少了四分之三以上。李奇把1827年和1843年各种纺织品的工资列成了一个对照表（“无可否认的事实”第35页）。从表中可以看到，1827年剪绒工每码所得工资是4辨士、$2^{1}/_{4}$辨士、$2^{3}/_{4}$辨士、1辨士，而1843年每码仅得$1^{1}/_{2}$辨士、$^{3}/_{4}$辨士、1辨士和$^{3}/_{8}$辨士。据李奇说，每星期的平均工资，在1827年是1英镑6先令6辨士、1英镑2先令6辨士、1英镑、1英镑6先令6辨士，而在1843年，同一种商品的工资是10先令6辨士、7先令6辨士、6先令8辨士、10先令，同时还有成百的工人连这样的工资也得不到。关于棉纺织业中的**手工织工**，上面我们已经谈过了。其余的纺织品几乎完全是手工织工生产的，这些工人也像剪绒工一样，由于从其他工业部门中被机器排挤出来的工人的竞争而遭了殃，此外，像工厂工人一样，工作不好就要无情地被处以罚款。拿**丝织工**来说吧。全英国最大的丝织工厂厂主之一布罗克赫斯特从自己的账本中拿出一些统计表交给议会委员会，从这些统计表中可以看出，1821年他对各种工作付出的工资是30先令、14先令、$3^{1}/_{2}$先令、$^{3}/_{4}$先令、$1^{1}/_{2}$先令、10先令，1831年他只付出9先令、$7^{1}/_{2}$先令、$2^{1}/_{4}$先令、$^{1}/_{3}$先令、$^{1}/_{2}$先令、$6^{1}/_{4}$先令，虽然在**这个部门**中机器并没有任何改良。但是布罗克赫斯特先生在他的工厂里所做的，完全可以当做全英国的标准。从这些统计表中可以看到，这个工厂中织工的平均工资，除去一切克扣，在1821年是

每周$16^1/_2$先令，而1831年每周仅仅是6先令。以后工资又降低了很多；在1831年每码付工资$^1/_3$先令或4辨士的纺织品（所谓 single sarsnets——一种做衣里用的绸缎），在1843年只付$2^1/_2$辨士。而许多住在农村的织工，只有接受每码$1^1/_2$—2个辨士的工资，才能找到工作。此外还有任意克扣工资的情形。每一个领到经纱的织工都同时领到一张卡片，上面通常写着：某日某时缴回成品，如因病不能工作，必须在三天内通知办事处，否则即使有病也不能得到原谅；等待纬纱也不能成为获得原谅的充分理由；工作中如发生某些过失（例如在一定长度的织物上使用的纬纱超出规定等）应扣去**不少于**一半的工资；如果不能按期交活，每码扣1辨士。卡片上规定的所有这些克扣使工资大大地减少了，例如有一个收货人到郎卡郡的里城去收回成品，每星期去两次，每次给厂主带回的罚款都不下15英镑（100个普鲁士塔勒）。这是他自己说的，而他还算是一个最厚道的收货人。在过去，这类问题是由仲裁法庭来解决的，但因为坚持到这种法庭去解决的工人大部分要被解雇，以后这一惯例就逐渐消失了，如今厂主完全可以为所欲为：他又是原告，又是证人，又是法官，又是立法者，又是执行者——什么都由他一手包办。当工人告到治安法官那里去的时候，他得到的回答是：你们接受了卡片，就是签订了契约，你们现在就得履行它。这和工厂工人的处境是一模一样的。此外，厂主每次都强迫工人在一个文件上签字，说明他"同意扣工资"。如果他想抗拒，那末全城的厂主立刻都会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人，用李奇的话说，他

"不愿服从卡片上规定的秩序和法律，并且胆敢怀疑那些社会地位比他高（这是他应当知道的）的人的智慧"（"无可否认的事实"第37—40页）。

自然，织工是**完全**自由的，厂主毫不强迫他们到他那里领取经纱和卡片，按照李奇的绝妙的说法，他只是对他们说：

"如果你们不愿意在我的油锅里受煎熬，那你们可以到火里去散步。"（《If you don't like to be frizzled in my frying—pan，you can take a walk into the fire.》）

伦敦的、特别是斯比脱菲尔兹的丝织工，很久以来就陷入周期性的极端贫困之中，而他们非常积极地参加英国的、特别是伦敦的一切工人运动这一事实，就证明他们现在也还没有理由满意自己的状况。压在他们头上的贫困引起了热病，这种病蔓延到伦敦的东部，并且促成了工人阶级卫生状况调查委员会的成立。但是，从伦敦热病医院最近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这种热病还是很猖獗的。

除纺织业外，英国工业第二个重要的部门是**金属制品**的生产。这种生产的中心是制造各种精细金属制品的**北明翰**、生产各种刀的**设菲尔德**以及生产锁、钉子等等比较简单的商品的**斯泰福郡**，特别是乌尔未汉普顿。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工业部门中工人的状况，先从北明翰说起。在**北明翰**，和生产金属制品的大多数地方一样，生产组织还保留着旧时手工业制度的某些特点。小师傅还存在，他们和自己的学徒或者在自己家里的作坊中工作，或者——当他们需要蒸汽发动机时——在巨大的工厂厂房中工作，这些厂房被划分成许多小作坊，租给个别的师傅；在每个作坊中都装有由蒸汽发动机带动的传动带，再由传动带转动机器。莱昂·福适（"两大陆评论"[111]上关于英国工人状况的一系列论文的作者，这些论文表明作者至少研究过这一问题，而且无论如何要比英国人和德国人一向在这方面所写的东西都更有价值）把这种和郎卡

郡、约克郡的大生产相对立的生产组织叫做 démocratie industrielle〔民主工业〕。他并且指出，这种生产组织对师傅和帮工的状况都不是很有利的。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在其他场合下由一个大厂主独吞的利润，现在由竞争加以调整，被分配到许多小师傅手里，所以这些小师傅是不会生活得很好的。资本集中的趋势经常影响着他们；只要一个人发财，便会有十个人破产，另外还有一百个人因受到某一暴发户的廉价竞争的压力而生活得比以前更坏了。不言而喻，当小师傅不得不和大资本家竞争时，他们要花很大的力量才能勉强应付过去。下面我们将看到，学徒在小师傅那里过的生活至少也像在厂主那里一样坏，只有一个差别，就是将来他们自己也会变成师傅，因而他们就获得某种程度的独立性；换句话说，他们也受资产阶级剥削，但是不像在工厂中那样直接。所以这些小师傅不是真正的无产者，因为他们部分地依靠学徒的劳动生活，而且出卖的不是劳动本身，而是成品，但他们也不是真正的资产者，因为他们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的。北明翰工人的这种独特的中间地位，说明他们为什么很少完全地和公开地参加英国工人运动。在政治上北明翰是一个激进的城市，但不是纯粹宪章主义的城市。北明翰也有许多资本家开设的较大的工厂，在这些工厂中工厂制度占绝对的统治地位：这里所实行的极精密的分工（例如在制造针的部门里）和蒸气力的应用，使厂主们可能雇用很多妇女和儿童。因此，这里也可以看到（根据“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的材料）我们已经从工厂报告中熟悉了的那些特点：孕妇一直要工作到分娩，妇女不会料理家务，家庭和孩子无人照管，不关心甚至讨厌家庭生活，道德败坏，其次，男人从这一劳动部门中被排挤出来，机器不断改良，儿童过早地自立，男人靠老婆

和孩子养活，如此等等。据报告所说，孩子们总是半饥半饱，穿得破破烂烂。**他们有一半人不知道什么叫吃饱，**许多孩子一天只吃1个辨士（10个普鲁士分尼）的面包，或者在午饭以前一点东西也不吃；甚至还有一些小孩子从早晨八点到晚上七点连一点东西都吃不到。他们常常衣不蔽体；许多孩子甚至在冬天还赤着脚。因此，所有的儿童，就他们的年龄来说，身体都很矮小，很孱弱，并且很少有发育正常的。他们用来恢复体力的东西是这样贫乏，但是还得在令人窒息的屋子里做长时间的繁重的工作，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点，那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北明翰能服兵役的男人是这样少了。

一个检查新兵体格的医生说："工人都很矮小、瘦弱而且体力很差；此外，许多人的胸部或脊柱都是畸形的。"

据一个征兵的下级军官证明，北明翰的男人比任何地方的都矮小：他们大部分身长都不超过5英尺4—5英寸，在征来的613个新兵中只有238个合格。至于说到教育，那末我在前面（第396—397页）讲到金属加工区的生活的时候已经举出了许多证言和例子，读者可以再看一下；同时，从"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也可以看到，在北明翰，五岁到十五岁的儿童有一半以上根本没有进过学校；学生经常你来我去，所以要使他们好好地受点教育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儿童很早就离开学校去做工。从这个报告中还可以看出，在那里教书的都是些什么样的教员。一个女教员在回答她是否进行道德教育的问题时说："没有，一星期3辨士的学费哪能这样要求。"有些女教员连这个问题都不懂，而其他一些则认为，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根本不是她们分内的事。一个女教员回答说，她不进行道德教育，但是她尽力向儿童灌输一些好的原则，她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就

犯了一个严重的语法上的错误。据一个委员说，学校里经常吵吵闹闹，乱成一团。因此，儿童的道德水平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所有的罪犯有一半是十五岁以下的；仅仅在一年内就有90个十岁的罪犯被判了刑，其中有44人是刑事犯。照委员们的意见，混乱的性关系看来几乎是普遍现象，而且这种关系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格棱吉。“报告”和文件）

斯泰福郡铁业区的情况更糟糕。这里主要是生产简单的铁器，在这个劳动部门中既不可能进行特别细致的分工（也有一些例外），又不可能使用蒸汽力和机器。所以这里（在乌尔未汉普顿、威伦霍尔、比尔斯顿、塞治里、温斯菲尔德、达拉斯顿、达德里、窝尔索尔、温斯柏利及其他等地）的工厂较少，但是小铁铺却很多，这里的小师傅带着一个或几个学徒工作，这些学徒要一直替师傅工作到二十一岁。小师傅的状况和北明翰的差不多完全一样，但是学徒的生活多半还坏得多。给他们吃的几乎全是病畜和死畜的肉、腐烂了的肉和鱼、流产的牛犊或者在火车里闷死的猪的肉。不但小师傅这样做，有三四十个学徒的比较大的厂主也这样做。在乌尔未汉普顿，这种现象似乎是普遍的。这种饮食造成的自然结果就是经常闹肠胃病及其他疾病。此外，这些孩子多半吃不饱；除了工作服就没有别的衣服，仅仅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就不能上主日学。住宅又坏又脏，常常成为疾病的发源地，因此，虽然工作本身一般都无害于健康，可是孩子们仍然长得很矮小，发育得不好，孱弱不堪，而且常常被工作弄成严重的残废。例如，威伦霍尔城有许多人因经常在制造螺丝的车床上工作而成了驼背，并别弯了一条腿——即所谓“后弯腿”（hind— leg），这样，两条腿就呈K字形；此外，这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工人都患疝气。这里也和乌尔未汉普顿一样，女孩子——女孩子也在铁铺里工作！——和男孩子的

性成熟期往往很晚，有时要到十九岁。在几乎是专门生产钉子的塞治里城及其近郊，人们就在肮脏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牲畜栏似的简陋的棚舍里居住和工作。女孩子和男孩子们从十岁到十二岁起就开始拿起铁锤来工作，只有到他们每天能生产1000个钉子时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工人。他们制造1200个钉子，所得的工资是$5^{3}/_{4}$辨士，或者还不到5个银格罗申。每一个钉子要打十二锤，因为铁锤重$1^{1}/_{4}$磅，所以工人要举重18000磅才能挣到这点可怜的工资。在这种劳动繁重而营养又不足的情况下，儿童身体必然发育得不好，矮小而且孱弱，委员会的材料也证实了这一点。关于这个地区的教育状况，我们在上面已经提供了一些资料。这里的教育水平实在低得令人难以置信：有一半儿童甚至连主日学都不上，其余的虽然去上了，但也很不经常；和别的地区比起来，只有极少数的儿童识字，会写字的就更少了。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在七岁和十岁之间，即**恰恰是**适于上学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做工了，而主日学的教员——铁匠或矿工——常常自己也几乎认不得多少字，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来。道德水平和这种教育状况是完全符合的。霍恩委员引了许多例子证明说，在威伦霍尔城，工人完全失去了道德感。他发现做子女的没有意识到对父母的义务，根本感觉不到对父母有什么依恋。他们缺乏思考能力，连自己该说些什么都不知道，他们笨头笨脑，愚昧得无可救药，以致他们常说，他们的待遇很好，他们的生活好极了，而事实上他们一天要工作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穿得破破烂烂，吃也吃不饱，还常常挨打，往往挨打后好几天还感到疼痛。他们一天到晚工作，直到发出下工信号为止，除此以外，他们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懂得自己累不累，——这个问题从来也没有人问过他们。（霍恩。"报告"和文件）

在**设菲尔德**工资较高，所以工人的状况从表面上看起来也好一些。但是这里也必须指出几个对工人健康极端有害的劳动部门。在某些操作过程中，工人必须经常用胸部顶住工具，这就常常引起肺结核。另一些操作过程，例如制锉子，则阻碍整个身体的发育并引起肠胃病。切削骨头（作刀柄用）的工作引起头痛、黄疸病，而做这种工作的许多女孩子会得妇女贫血症。但是对健康最有害并引起工人早死的，是磨刀叉的工作，特别是在干石头上磨的时候。这种工作之所以有害，一半是由于必须弯着腰工作，因而胸部和胃部经常受到压迫，但主要是由于在磨刀叉时有大量灰尘状的、极细微的、有尖锐棱角的金属屑飞出来，弥漫在空气中，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吸到肺里去。干磨工平均很难活到三十五岁，湿磨工也很少能活到四十五岁。设菲尔德的奈特医生说：

"要比较明白地说明这种工作所带来的害处，应当说，磨工中活得最长的是那些酗酒最厉害的人，因为他们工作的时间比其他人都少。设菲尔德总共将近有2500个磨工。其中约有150个（80个成年男人和70个男孩）是磨叉的；他们总是在二十八岁到三十二岁之间就死掉。磨刮脸刀的工人，无论是干磨的或是湿磨的，都在四十岁到四十五岁之间就死掉，而使用湿磨石的磨餐刀的工人则在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死掉。"

这位医生把他们的病即所谓磨工哮喘病的经过描述如下：

"他们通常是十四岁开始工作，如果他们的身体很好，在二十岁以前还感觉不到特别不舒适；再下去，这种特有的疾病的征候就显现出来了。他们在爬山或上楼梯时稍微用点力就喘不过气来；为了减轻经常不断的愈来愈厉害的呼吸困难，他们把两肩高高地耸起；他们的身体老是向前弯着，好像只有保持工作时那种弯腰的姿势才觉得最舒服；他们的脸色渐渐变成泥黄色，面部显露出忧郁的表情，常常诉说胸部有受到压迫的感觉。嗓子变得粗糙而嘶哑，他们高声地咳嗽，声音就像从空木桶里发出来似的。他们时常咳出大量的灰

尘，这些灰尘或者混在痰里，或者团成球形或圆柱形，表面复着一层薄薄的粘液。再过一些时候就出现吐血、不能躺卧、盗汗、水泻、极度消瘦以及肺结核的一切普通征候。他们这样被折磨几个月，甚至几年，既不能养活自己，也不能养活家庭，最后终于死去。我必须补充几句，到现在为止，一切预防和医疗磨工哮喘病的尝试都完全失败了。”

这是奈特在十年前写的。从那以后，磨工的人数增加了，疾病蔓延得更厉害了，人们也试验过把磨石遮起来并利用气流把灰尘吹走以预防疾病的办法。这种试验至少是部分地成功了，但是磨工自己却不愿意使用这类设备，在某些地方甚至于把它打碎了，因为他们害怕这样一来将会吸引更多的工人来干这种行业，并使他们的工资降低；他们宁愿“活不长，但要活得痛快”。奈特医生常常对那些有了哮喘病的初期征候到他那里去看病的磨工说：要是你们回到磨石边去，那就是去战死。但是从来没有人听他的话：谁要是当了磨工，谁就逐渐成为完全绝望的人，仿佛已经把灵魂卖给魔鬼了。设菲尔德的教育水平是很低的。一个长期做教育统计工作的牧师认为，在工人阶级的16500个能够上学的孩子中，识字的不超过6500人。原因是孩子们到七岁，最迟到十二岁，就从学校中被弄走，教员又都是毫无用处的废物（其中有一个是罪证确凿的小偷，他从监狱里出来以后，除了教书就找不到别的糊口的办法！）。设菲尔德青年中间的不道德的情形似乎也比任何地方都严重（可是，很难说哪一个城市在这方面数第一；当你读报告的时候，你会认为每一个城市都应该数第一）。年轻人一到星期日就整天待在街上，掷钱赌博或嗾使狗打架；他们常跑小酒馆，在那里和情人消磨时间，一直坐到深更半夜，然后双双对对地到僻静的地方去蹓跶。有一个委员在一家小酒馆里看到四五十个青年男女；

他们几乎都在十七岁以下，每一个青年都带着自己的女朋友。有些人在玩牌，有些人在唱歌和跳舞，所有的人都在喝酒。一些公开的职业妓女也坐在那里。所以，无怪乎所有的证人都说，早期的紊乱的性关系和卖淫（这些事情常常发生在十四岁到十五岁的少年身上）在设菲尔德是极常见的现象。极端野蛮的不顾死活的犯罪行为是很平常的。在委员会委员到来的前一年，这里逮捕了一伙图谋纵火烧城的人，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他们准备了大量的引火物和长矛。下面我们还会看到，设菲尔德的工人运动也带有同样放任的性质。（昔蒙兹。“报告”和文件）

除了这些金属工业的主要中心，在瓦灵顿（郎卡郡）还有一些别针工厂（这里的工人，特别是童工同样是极端贫困、道德败坏和愚昧无知），在威根（郎卡郡）近郊和苏格兰东部还有几个钉子工厂。关于这几个地方的报告几乎和关于斯泰福郡的报告完全相同。

在金属工业里只有一个部门我们还没有谈到，那就是**机器制造业**。这个生产部门主要分布在工厂区，特别是在郎卡郡，它的特点是用机器制造机器，这样，从其他劳动部门中被排挤出来的工人就失去了最后的藏身之所——制造那些使他们失业的机器的工作。在这里，刨和钻的机器，制螺旋、齿轮、螺丝帽等等的机器以及机械旋床都在排挤着大批的工人，以前他们都拿高工资而且经常有工作，现在却失业了；这样的失业者在曼彻斯特可以看到许许多多。

现在我们来看看斯泰福郡铁业区北面的一个工业区。这里**陶器生产**（potteries）很发达；它的中心是斯托克自治市（borough），包括亨莱、柏斯勒姆、莱因恩得、莱因德尔夫、厄特鲁里亚、柯尔利治、郎坡尔特、坦斯托尔和金山等地，一共有居民6万人。“童工调查

委员会报告”这样告诉我们：在陶器制造业的某些部门中，孩子们在温暖而宽敞的房子里做着轻便的工作，但是在另外一些部门里他们都既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也穿不上好的衣服，却要从事繁重而紧张的劳动。有许多儿童抱怨道：“我老是吃不饱，多半只能吃到带盐的土豆，从来没有肉和面包；我不能去上学，我没有换洗的衣服。”——“今天中午一点东西也没有吃，我们家里从来就不吃午饭，吃的多半只是带盐的土豆，偶尔才吃到点面包。”——“我身上穿的就是我所有的一切；我没有节日穿的衣服。”mould- runners〔送模型工〕的工作也是特别损害健康的，孩子们把制成的坯子和模子一起送到干燥房里，等到坯子干燥到一定程度以后，再把空模子送回去。他们这样整天沿着楼梯跑上跑下，搬运着不适合于他们年龄的过分沉重的东西，而且还得在高温下进行工作，这就使他们更加疲劳。这些孩子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消瘦、苍白、孱弱、矮小而且发育不良；他们差不多都患胃病，经常呕吐，食欲不振，其中有许多人由于虚弱而死掉。那些因转动辘轳（jigger）而被称为 jiggers〔辘轳工〕的男孩，几乎也是同样地孱弱。但是最有害的工作是把成品浸到一种含有大量的铅而且常常含有许多砷的液体里，并且要把刚刚在这种液体里浸过的制品用手拿出来。这些工人——成年男人和儿童——的手和衣服总是被这种液体浸得湿漉漉的，他们的皮肤渐渐变松，在经常和物体的粗糙而接触时就容易脱落，所以手指常常受伤出血，这样一来，有害的东西就非常容易侵入身体。结果引起剧烈的腹痛和严重的肠胃病、经常的便秘、疝气痛，有时还会引起肺结核，而在小孩子身上**更常常引起羊痫疯**。在成年男人中常见的现象是手上的肌肉部分麻痹——colica pictorum〔染色工的职业病〕和四肢全部麻痹。有一个证人说，和他在一起工作的两个

男孩在工作时抽风死掉。另一个证人在他还是小孩的时候曾经在上釉的大桶旁当过两年助手。他说，最初他患剧烈的腹痛，后来就抽风，在床上躺了两个月，从那以后，抽风的次数就愈来愈多，现在每天都要发作，**并且常常在一天内要发十次到二十次羊痫疯**。他身体的右半部已经麻痹，医生告诉他说，他再也不能支配右手和右腿了。某一个工厂的上釉房里有4个成年男工和11个男孩，4个成年男工都患羊痫疯和剧烈的疝气痛，11个男孩当中也有几个已经成为羊痫疯患者。总之，这一可怕的疾病是这种工作的极平常的后果，当然它也给资产阶级带来了很大的利润！在磨光陶器的工房里，空气中充满了微细的矽土尘埃，把这种尘埃吸到肺里并不比设菲尔德的磨工把钢屑吸进去的害处小些。工人们患着喘病，要静静地躺一回都不可能，喉咙溃烂，咳嗽得很厉害，说话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他们也都是得肺结核死掉的。陶业区里的学校比较多，孩子们按理是能够上学的，但是因为他们年纪这样小就到工厂去做工而且工作日又这样长（多半是十二小时，有时还要多），所以他们就不能上这些学校去念书了。在委员会的委员询问过的儿童中，有四分之三既不能读，也不能写。全区都处于极端愚昧的状况中。上过几年主日学的孩子连字母都分不清。全区中不仅知识教育的水平很低，而且道德和宗教的教育也都是一样。（斯克里文。“报告”和文件）

在**玻璃制品的生产**中，工作对成年男人似乎并没有多大害处，但是小孩子却受不了。工作繁重，工作时间没有一定，常常在夜里工作，特别是工房里的温度高（华氏100°—130°），这一切就引起了孩子们的全身衰弱和疾病、发育不良、特别是眼病、胃病、支气管炎和风湿病。许多小孩都是脸色苍白、两眼发红，往往几个星期看不

见东西，严重地恶心、呕吐、咳嗽、经常感冒和患风湿病。当成品从炉子里取出来的时候，孩子们经常不得不在高到使他们脚下的木板都燃烧起来的高温下工作。吹玻璃的工人大多数都因虚弱和肺结核而死得很早。（莱夫查尔德。“报告”附录第2部分L2页第11、12节；弗兰克斯。“报告”附录第2部分K7页第48节；唐克莱德。文件附录第2部分I76页等；均见“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

报告大体上证明了工厂制度是在逐渐地不断地渗进一切工业部门里去，这特别表现在吸收妇女和儿童来工作这一点上。我认为没有必要到处把技术进步和成年男人被排挤的情形都叙述出来。只要稍稍熟悉工业的人就能毫不费力地把我所没有谈到的补充起来；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不可能在现代的生产方式这方面做详细的探讨，关于这方面的结果，我在谈工厂制度的时候已经谈过了。到处都在采用机器，这就消灭了工人独立性的最后一点痕迹。到处都因为妻子和小孩在工厂工作，结果家庭遭到破坏，或者因为男人失业在家，结果家庭关系被弄得头足倒置。到处都因为不得不采用机器，结果大资本家掌握了企业，同时也掌握了工人。财富不可遏制地日益集中，社会划分为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工人的情形日益明显。国家的整个工业的发展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不可避免的危机。

我在前面已经谈过，在**手工业**方面，资本的威力排挤掉了小资产阶级，使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工人代之而起，而有时分工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关于这些手工业者，可以谈的实际上是很少的，因为和他们有关的一切，在一般地谈工业无产阶级的时候我已经谈过了；此外，这个部门从产业革命开始以来，在工作方式和工作对工人健康的影响上都很少变化。但是，和真正的产业工人的接

触、大资本家的压迫(这比小师傅的压迫厉害得多,因为帮工和师傅还维持着私人的关系)、大城市的影响以及工资的降低,这一切使得几乎所有的手工业者都积极地起来参加工人运动。这一点我们下面就要谈到。现在我们还要来谈谈伦敦的一部分工人居民,由于这些人受着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的极端残酷的剥削,所以特别值得注意。我在这里指的是女时装工和女缝工。

值得惊奇的是,正是为**资产阶级太太们**制造装饰品的工作,给这些工人的健康带来了极其悲惨的后果。在谈花边生产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过这种情形,现在我们再拿伦敦时装商店的例子来做证明。这些商店雇用了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共达15000人;这些女孩子大部分来自农村,她们食宿都在老板那里,因而成了老板的十足的奴隶。在一年内约有四个月之久的时装季节里,即使是在最好的商店中工作时间每天也达十五小时,在定货急迫的时候每天达十八小时。但是大多数商店在这个期间的工作时间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因而女孩子们休息和睡眠的时间一昼夜从来不会超过六小时,常常只有三四个小时,有时甚至只有两小时。这样,她们即使不是通宵工作(事实上她们也常常通宵工作),一昼夜也得工作十九小时到二十二小时!一直到疲惫得实在连针都拿不住的时候,她们的漫长的工作才算到了尽头。还有这样的事情:这些可怜的人一连九天都没有脱过衣服,只是抽空在垫子上躺一下;给她们的食物都切成小块,好让她们尽快地吞下去。一句话,这些不幸的女孩子是在精神上的鞭子——解雇的威胁——的驱策下无可奈何地去做那种持久而不间断的工作,这种工作连身强力壮的男人也吃不消,何况是十四岁到二十岁的柔弱的女孩子呢。此外,由于工房和卧室里的空气郁闷,经常保持弯腰曲背的姿势,吃恶劣的难消化的食物,但

主要是由于劳动时间太长和缺乏新鲜空气，结果女孩子们的健康受到致命的摧残。她们很快就感到疲倦、困顿、衰弱、食欲不振、肩痛、背痛、腰酸，特别是头痛；以后就是脊柱弯曲、两肩畸形地高耸、消瘦、眼肿、流泪、眼痛、近视、咳嗽、鸡胸、气喘以及各种妇科病。在许多情况下，眼睛受到严重的损害，以致完全失明，视力完全被破坏，而如果目力还保持得不错，可以继续工作下去，那末肺结核便会结束这些女时装工的短促而悲惨的一生。甚至那些相当早就脱离这种工作的人，也常常不能完全恢复被损害了的健康。她们老是生病，特别是在婚后；她们生的孩子也是衰弱的。童工调查委员会询问过的所有医生都一致断定，很难想像还有什么生活方式能像女时装工的生活那样损害健康，那样使人早死。

伦敦的**女缝工**一般也受到同样残酷的剥削，只是稍微间接一些。做紧身的女孩子们的劳动是繁重的，是容易使人疲劳和对眼睛有害的。她们得到的工资究竟怎样，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承包人要对发下的料子负责，并把工作分配给女缝工，而他每件得到$1^1/_2$辨士（合15个普鲁士分尼），在这里面他还要扣下一部分（至少是$^1/_2$辨士），因此，落到这些可怜的女孩子手里的最多也不过是一个辨士。做领带的女孩子们每天必须工作十六小时，一星期只得到$4^1/_2$先令（即$1^1/_2$普鲁士塔勒），但是她们用这些钱能买到的东西并不比用二十个银格罗申在德国物价最贵的城市里所买到的东西多一些。[一]可是生活最坏的还是那些做衬衫的。她们做一件普通衬衫得到$1^1/_2$辨士。以前她们可以得到2—3辨士，但是自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官吏们所办的圣潘克拉斯的习艺所以$1^1/_2$辨士一件承做

[一] 参看1844年3月16日的“每周快讯”。——恩格斯原注

以来，这些可怜的女人也就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工资了。每天要工作十八小时才能做成一件的绣花薄料衬衫的工资是6个辨士（即5个银格罗申）。这样，根据这里所谈的及女工和承包人的许多陈述看来，这些女缝工虽然每天很紧张地一直工作到深夜，可是一星期的工资也不过2 1/2—3先令！但是最可耻的野蛮行为则是强迫女缝工拿出一部分钱作为发给她的料子的押金。因此，她们当然只好把一部分料子拿去当掉（这一点物主也知道得很清楚），以后自己吃些亏把它赎回来，如果无力赎回，那她们就得去见治安法官了。1843年11月就有一个女缝工遭遇到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个不幸的女孩子遭遇到了同样的事情后不知道怎样办才好，在1844年8月投河自杀了。女缝工们通常都像叫化子一样居住在狭小的阁楼里，而且每间屋子都是能塞多少人就塞多少人，冬天，住在这里的人身上散发出来的热几乎是取暖的唯一的来源。她们在这里弯着腰工作，从早上四五点钟一直缝到半夜，几年内便把身体彻底弄垮，年纪轻轻就进了坟墓，连最迫切的生活需要都得不到满足㊀；而楼下街道上却飞驰着大资产阶级的富丽堂皇的马车，也许附近某个可鄙的花花公子玩法罗纸牌一晚上输掉的钱，就比她们在一整年中所能挣得的还要多。

———

㊀ 托马斯·胡德，所有现代英国幽默作家中最有才能的一个，像所有的幽默作家一样，他富于同情心，但没有一点精神力量。1844年初，当描写女缝工惨状的文章载满了各家报纸的时候，他发表了一首优秀的诗“衬衫之歌”（《The Song of the Shirt》）。这首诗使资产阶级女郎们流了不少怜悯的但毫无用处的眼泪。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不能把它重抄在这里。它最初登载在“笨拙”上，后来又转载在所有的报纸上。当时各报都在讨论女缝工的状况，所以也不必专门引证。——恩格斯原注

英国工业无产阶级的状况就是如此。我们随便把目光投到什么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经常的或暂时的贫困，看到因生活条件或劳动本身的性质所引起的疾病以及道德的败坏；到处都可以看到人的精神和肉体在逐渐地无休止地受到摧残。难道这种状况能够长久地继续下去吗？

不，这种状况不能也不会长久地继续下去。工人，人民中的大多数，是不愿意这样的。我们来听听**他们自己**关于这种状况说了些什么吧。

工 人 运 动

即使我举的例子再少一些，大家还是会同意我的意见：英国工人在他们所处的那种状况下是不会感到幸福的；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是个人或是整个阶级都不可能像人一样地生活、感觉和思想。显然，工人应该设法摆脱这种非人的状况，应该争取良好的比较合乎人的身分的状况。如果他们不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剥削工人——作斗争，他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资产阶级却用他们的财产和他们掌握的国家政权所能提供的一切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工人一旦表明要摆脱现状，资产者就立刻成为他们的公开敌人。

此外，工人处处发觉资产阶级把他当做物件、当做自己的财产来看待，只凭这一点，工人也要成为资产阶级的敌人。我已经举了上百的例子，而且还能举出同样多的例子来说明：在目前情况下，工人只有仇恨资产阶级和反抗资产阶级，才能获得自己的人的尊严。而英国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如此强烈地反抗有产者的暴政，应当归功于他们所受的教育，或者更确切地说，应当归功于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同样也应当归功于英国工人阶级的血液中掺有大量的爱尔兰人的热血。

英国工人，这已经不是普通说的英国人，不是像他的有钱的同胞那样的专会打算盘的大腹贾；他的感情丰富得多，他那北方

人天生的冷漠被奔放的热情所抵销，这种热情已经控制了他。理智已经如此有力地促进了英国资产者利己主义天性的发展，使他所有的热情都受利己心的支配，并把他的情感的全部力量集中在追求金钱这一点上。而工人却没有这种理智，因此，工人的热情和外国人的一样强烈而不可抑制。英国的民族特征在工人身上消失了。

既然如我们所看到的，工人除了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进行反抗，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表现自己的人的感情的余地，那末工人自然就一定要在这种反抗中显出自己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情的特性了。我们将看到，工人的全部力量、全部活动都正好是倾注于这方面的，甚至他们为了要获得普通教育而做的一切努力也都是与此有直接联系的。固然，我们不得不报道一些个别的粗暴行为，甚至暴力行为，但同时永远不应当忘记，英国正进行着公开的社会战争；如果说，资产阶级所关心的是伪善地打着和平的幌子甚至打着博爱的幌子来进行这个战争，那末，相反地，只有揭露事实的真相，只有撕破这个伪善的假面具才能对工人有利；所以，甚至工人对资产阶级及其奴仆所采取的最强暴的敌对行动，也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暗中对付工人的种种手段的公开的毫不掩饰的表现而已。

工人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在工业发展开始后不久就已经表现出来，并经过了各种不同的阶段。这里不能详细论述这些阶段对英国人民发展的历史意义；这是另一种著作的题目，在这里我只能叙述那些为说明英国无产阶级的状况所必需的事实。

这种反抗心情的最早、最原始和最没有效果的形式就是犯罪。工人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同时看到别人的生活比他好。他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他这个比有钱的懒虫们为社会付出更多劳动的

人该受这些苦难。而且穷困战胜了他生来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于是他偷窃了。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工业的发展，犯罪事件也在增加，每年被捕的人数和加工的棉花的包数经常成正比。

但是工人很快就发觉这样做是没有什么好处的。罪犯只能一个人单枪匹马地以盗窃来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社会却能以全部权力来猛袭一个人并以占绝对优势的力量压倒他。加之，盗窃只是一种最原始的最不自觉的反抗形式，因此，它不能普遍地表现工人的舆论，虽然工人内心里也赞许它。工人**阶级**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是在产业革命初期，即工人用暴力来反对使用机器的时候。最初的一批发明家阿克莱等人就受过这种暴力的害，他们的机器被砸碎了；后来又接连发生了许多因使用机器而引起的起义，这些起义的经过情形和1844年6月波希米亚印花布工骚动的情形几乎完全一样：工人砸碎了机器，捣毁了工厂。

但是这种反抗形式也是孤立的，它局限于个别地区，并且只是针对着现存制度的一个方面。而且只要工人一获得转瞬即逝的胜利，社会权力就以自己的全部压力来袭击这些再度变得手无寸铁的犯罪者，给他们各种各样的惩罚，而机器还是使用起来了。工人们必须找出一种新的反抗形式。

这时，一个由旧的、改革前的、托利党人的寡头议会所颁布的法律帮了他们的忙，要是再晚一些，在改革法案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用法律固定下来并使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之后，这个法律就永远不会被下院通过了。这个法律是在1824年通过的，它废除了以前禁止工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联合起来的一切法令。工人得到了过去只是贵族和资产阶级才有的**结社的权利**。诚然，在工人中间过去一直就有秘密的工会存在，但是它们从来没

有做出显著的成绩来。例如，据昔蒙兹说（“手工业和手工业者”第137页及以下各页），在苏格兰，还在1812年就发生了由秘密的团体所组织的格拉斯哥织工的总罢工。1822年又发生了罢工，有两个工人因不愿加入工会而被宣布为本阶级的叛徒，有人把硫酸泼在他们的脸上，结果这两个人都成了瞎子。1818年，苏格兰矿工的团体也已经强大到能进行总罢工的程度。这种团体都要每一个成员立誓效忠和保守秘密，有会员名册、基金会、簿记和地方分会。但是，全部活动的秘密性阻碍了这些团体的发展。当1824年工人得到自由结社的权利时，这些工会就很快地布满了全英国并获得了巨大的意义。所有的劳动部门中都成立了这样的工会（trades－unions〔工联〕），它们公开宣称要竭力保护各个工人不受资产阶级的横行霸道和冷酷待遇之害。它们的目的是：规定工资，作为**一个力量**，集体地和雇主进行谈判，按雇主所获利润的多少来调整工资，在适当的时候提高工资，并使每一种职业的工资保持同一水平。因此，这些工会总是向资本家力争一个大家都得遵守的工资标准，谁拒绝接受这种工资标准，就向他宣布罢工。其次，工会还竭力用限制招收学徒的方法来维持资本家对工人的需求，从而使工资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它们尽可能地竭力反对厂主靠采用新的机器和工具等欺诈手段来降低工资的企图。最后，它们还用金钱来帮助失业工人。这件事或者直接由工会的基金会来做，或者利用证明工人身分的卡片来进行。工人带着卡片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同行就资助他并告诉他什么地方容易找到工作。这种走四方的生活，工人们叫做 the tramp〔流浪〕，而这种走四方的人就叫做 tramper〔流浪汉〕。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工会委任了一个支薪的主席兼秘书，——可想而知，因为没有一个厂主会雇用这

样的人，——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收每周的会费和监督这些会费的开支，使其合乎工会的利益，个别地区的工会在可能和有利的时候就合并为一个工会联合会，并定期举行代表大会。在个别情况下，曾有人试图把全英国同一行业中所有的工人结合成一个大的工会，并且不止一次地——第一次是在1830年——试图建立一个全英工会联合会，同时每一个行业都保有自己的特有的组织。但是这种联合会是维持不了很久的，甚至也很少能成立起来；只有特别普遍的高潮才能使这样的联合会诞生并使它具有行动的能力。

这些工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通常使用如下的手段。如果有一个或几个业主拒绝承认工会所规定的工资，那就派一个代表团去见他们，或者向他们送上一份请愿书（看吧，工人是能够承认专制的厂主在他那小王国里的权力的）。如果这样做仍没有结果，工会就下令停工，所有的工人都散伙回家。如果一个或几个厂主拒绝承认工会所规定的工资，这种罢工（turn—out 或 strike）就是局部性的；如果某一个劳动部门所有的厂主都拒绝承认，那末罢工就会成为总罢工。这就是工会的合法手段——所谓合法就是在宣布罢工前要预先提出警告，实际上却并不都是这样。但是，只要有些工人还没有加入工会，有些人为了厂主所许给的眼前利益准备退出工会，这种合法手段就很少发生什么效力。特别是在局部罢工时，厂主很容易从这些“害群之马”（所谓 knobsticks〔工贼〕）中招雇工人，从而使联合起来的工人的努力毫无结果。工会会员通常企图用威胁、辱骂、殴打和暴力来对付这些工贼，总之，用一切方法来恐吓他们。于是这些工贼就向法庭控告，而由于法律的守护者资产阶级还掌握着政权，所以只要一发生违法的行为，只要

有人向法庭控告一个工会会员，工会的力量几乎总要受到损害。

这些工会的历史充满了工人的一连串的失败，只是间或才有几次个别的胜利。自然，工会的一切努力都不能改变工资决定于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这一经济规律。因此，工会是无力消除影响这种关系的**重大**原因的。在商业危机期间，工会或者不得不自动降低工资标准，或者就完全解散，而在大量需求劳动的时候，它们也不可能把工资提得高于因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而自然规定的水平。但是对个别的局部的次要原因，工会是能起作用的。假使厂主不是面对着集中起来的、准备反抗的工人群众，他就会为了发财而逐渐地把工资愈降愈低；此外，他不得不和其他厂主进行的竞争也迫使他这样做，于是工资就会很快降到最低限度。但是厂主**相互间**的这种竞争**在正常情况下**是会被工人的反抗抑制下去的。每个厂主都知道，每一次降低工资，如果不是由他和他的竞争者所共有的条件决定的，结果都会引起罢工，而罢工无疑地会给他带来损失，因为在罢工期间他投下的资本不能周转，机器也要生锈。同时，在这种情况下他到底是否能降低工资也还不知道，但是他很清楚地知道，只要他一成功，竞争者就会跟他学，他们的产品的价格也会降低，他所希望的利润又得从他的手中溜走。其次，在危机完结时，工会当然会使工资更快地（比它们不加过问时）提高。厂主所关心的，是在其他企禁主的竞争还没有迫使他提高工资以前尽可能地不这样做；可是，由于工会的存在，市场上的情况一好转，工人自己就会要求提高工资，并且他们往往会利用大量需要工人的情况，以罢工来迫使厂主提高工资。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工会对左右着劳动市场的较重大的原因是无能为力的。在这种情况下，饥饿逐渐迫使工人在任何条件下复工，而只要有几个人这

样做，工会的力量就会被摧毁，因为在市场上有一定数量的存货的时候，资产阶级有了这几个工贼就能够消除生产中断所引起的最严重的后果。由于需要援助的人很多，工会的基金很快就用完；最后连小铺老板也拒绝高利的赊欠了，穷困迫使工人重新戴上资产阶级的枷锁。但是厂主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这只是由于工人的反抗才成为他们的利益——也要避免任何不必要的降低工资，而工人自身更是把每次工资降低（即使是由于市场状况所引起的工资降低）看做他们的处境的进一步恶化（他们想尽力抵抗这种恶化）；因此，大多数的罢工都是以工人吃亏而告终。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工人明明知道宣布罢工没有用，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办法呢？问题很简单，因为工人**必须**反对降低工资，甚至要反抗这种降低的必然性本身；因为工人一定要宣布，他作为一个人，不能去迁就环境，相反地应该让环境来适应**自己**，适应人；因为工人的沉默就表示同这种环境妥协，承认资产阶级在商业繁荣时期有权剥削工人，而在萧条时期又有权把工人饿死。只要工人还保存有一点点人的尊严，他们就不能不对此表示抗议，而他们之所以**这样**抗议，而不用别的方式来抗议，就因为他们是英国人，是**用行动**来表示自己的抗议的讲求实际的人，而不是像德国理论家们那样，只要把他们的抗议书登记下来，ad acta〔归入卷宗〕，就回去安安静静地睡大觉，让抗议书也像抗议者本人一样地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睡觉。相反地，英国人的积极抗议是不会不发生影响的：它把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工人对有产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万能权力的反抗不致消沉下去。它同时也向工人证明，要粉碎资产阶级的势力，除了工会和罢工，还需要更多的东西。但是这些工会及其所组织的罢工，其意义首先

在于：它们是工人想**消灭竞争**的第一次尝试。它们存在的前提就是工人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的统治正是建筑在工人彼此间的竞争上，即建筑在无产阶级的不团结上，建筑在一些工人和另一些工人的对立上。而正因为工会努力反对竞争，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生命攸关的神经（虽然这种努力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所以这个社会制度才把它看得这样地危险。在进攻资产阶级和整个现存社会制度的时候，工人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容易攻破的地方了。当工人之间的竞争停止的时候，当所有的工人都下了决心，再也不让资产阶级来剥削自己的时候，私有制王国的末日就来临了。工资之所以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由劳动市场上的偶然发生的情况来决定，仅仅是由于直到现在工人还让别人把自己当做可以买卖的物品来看待。当工人下定决心不再让别人买卖他们的时候，当工人弄清了劳动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工人不再作为物件而作为一个不仅具有劳动力并且具有意志的人出现的时候，到那时，全部现代政治经济学在工资规律就完蛋了。当然，假使工人在达到消灭彼此之间的竞争后就停止前进，工资规律归根到底还会重新发生效力。但是，如果工人不想放弃他们以前的运动，不想重新恢复彼此间的这种竞争，那末他们就不能停止前进，换句话说，他们是根本不能这样做的。有一种必然性在迫使他们根本消灭竞争，而不是消灭**一部分**竞争，而且他们是会这样做的。现在工人已经一天比一天懂得竞争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害处，他们比资产阶级更懂得，有产者之间的竞争会引起商业危机，因而对工人也有影响，所以也必须消灭这种竞争。很快他们就会懂得，他们应当**怎样**去做这件事情。

工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加强了工人对有产阶级的仇恨和愤怒，这是无须加以证明的。因此，特别激动的时期，这些工会中就产生

了—— 不论是否得到领导者的同意—— 一些只能用达到绝望地步的仇恨和冲破一切藩篱的狂野的激情来解释的个别行动。属于这一类行动的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用硫酸来灼伤人的事件，以及一系列其他的事件。现在我就举出几件来。在1831年的激烈的工潮时期，曼彻斯特附近海德地方的厂主，年轻的埃士顿，一天晚上在田野里被人枪杀了，凶手没有找到。毫无疑问，这是工人的报复行为。纵火和企图进行爆炸的事件也经常发生。1843年9月29日，星期五，有人企图炸毁**设菲尔德**霍华德街厂主派金的制锯工场。用来进行爆炸的是一根装满了炸药而且两端堵死了的铁管；损失是相当重大的。第二天，即9月30日，在**设菲尔德**附近**设尔斯— 摩尔**的伊毕岑刀锉工厂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件。伊毕岑先生积极参加资产阶级的组织，压低工资，专门雇用工贼，还利用济贫法来攫取私利（在1842年的危机时期，他强迫工人接受低工资，把那些拒绝接受的人的名字通知济贫所，说他们能够得到工作，但不愿工作，因而不应当得到救济），所以激起了工人的仇恨。爆炸使他受到相当大的损失，而所有来到出事地点的工人，都只恨“没有把工厂全部炸毁”。1843年10月6日，星期五，在**波尔顿**有人企图纵火焚烧爱恩司华斯— 克伦普顿工厂，但没有成功。在短短的时期内这已经是第三次或第四次企图焚烧这家工厂了。1844年1月10日，星期三，在**设菲尔德**市参议会会议上警官给大家看一个专门用来爆破的生铁炸弹，装有4磅炸药，有一根烧焦了但已熄灭的引线，这个炸弹是在**设菲尔德市**伯爵街基钦先生的工厂里发现的。1844年1月20日，星期日，在郎卡郡柏立地方的本特立—怀特锯木厂里发生了爆炸，爆炸是由扔到工厂里面来的一包火药引起的，损失重大。1844年2月1日，星期四，设**菲尔德**的索赫车轮工厂被人放一把火

烧得精光。四个月内就发生了六起这样的事件，所有这些事件的爆发，都是由于工人对雇主的切齿痛恨所引起的。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才**可能**发生这类事情，那是用不着说的。这些事实十分明白地表明，在英国，甚至在1843年年底那样的商业情况很好的时期，社会战争就已经爆发并公开地进行了。然而英国资产阶级依然执迷不悟！但是最突出的事件是1838年1月3日至11日格拉斯哥陪审法庭审理的所谓**格拉斯哥的萨格**㊀案件。从审讯中人们可以看到，1816年即已成立的棉纺工人工会的团结和力量是少有的。它的会员必须宣誓服从多数的决定。罢工时有一个秘密的委员会在活动，这个委员会是大多数会员所不知道的，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支配工会的款项。委员会规定了刺杀工贼和可恶的厂主以及放火焚烧工厂的奖金。例如，有一家工厂由于雇用没有加入工会的女工来代替男纺工而被工人放火烧掉；其中有一个少女的母亲，叫做麦克弗尔逊太太的被杀死，两个凶手由工会出钱送到美国去了。1820年有一个叫麦克奎利的工贼被枪伤，工会付给开枪者15英镑。以后又有一个叫做格莱安的也被枪伤了；开枪者得到20英镑，但被捕获并被判处终身流放。最后，在1837年5月，在欧特班克和迈尔－恩得的一些工厂里，由于罢工而发生了骚动，大约有十个工贼遭到痛殴；同年7月，骚动还没有平静下来，有一个叫斯密斯的工贼被打死。这时委员会的成员才被逮捕和审讯。委员会的主席和主要委员被控参加非法社团、对工贼使用暴力和纵火焚烧詹姆斯—弗兰西斯·伍德工厂，他们被认为犯了罪，并被判流放七年。对这件事情

㊀ 这些工人们被称为萨格［thugs］；按萨格是东印度一个著名的种族，他们以杀害一切落到手中的外人为生。——恩格斯原注

我们的善良的德国人会说些什么呢?㈠

有产阶级,特别是从事于工业的那一部分,由于直接和工人接触,反对这些工会最为激烈,并且不断地设法用许多论据来向工人证明工会是无用的,这些论据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在一定的关系上就是错误的,而且不可能对工人的思想发生任何影响。资产阶级所表现的热心已证明这件事是和他们的利益有关的;撇开罢工所引起的直接损失不谈,实际情况也是:落到厂主腰包里去的一切都必定是从工人的口袋里掏出来的。即使工人不十分了解工会能把互相竞争的雇主降低工资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但他们也会因为保存工会就能使自己的敌人即厂主受到损失这一点而不致放弃工会。在战争中,一方遭受损失自然对另一方有利,而由于工人和厂主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工人在这种场合下所做的也不过是和那些至尊的君主们在彼此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所干的一样。在所有的资产者中,工会最疯狂的敌人就是我们的那位朋友尤尔博士。他一谈到最强大的工人队伍——棉纺工人的"秘密法庭",一谈到这些自称能够叫任何不听话的厂主束手无策"并从而使养活他们多年的人破产"

㈠ "怎样一种'原始的司法'(wild-justice)感在支配这些人呵!他们在密室中集会,以冷静的理性宣布自己的工人伙伴为自己阶级的逃兵和自己事业的叛徒:判他死刑,由秘密的刽子手来执行,因为国家的法庭和刽子手是不干这种事的。所有这些都很像古代的'菲默法庭'①或骑士时代的秘密法庭,好像这些法庭突然复活并呈现在人们的惊愕的目光之下,只是现在的这些法官穿的不是铠甲,而是粗布夹克,法庭不是设在威斯特伐里亚的森林里,而是设在格拉斯哥建筑得很好的盖罗盖特大街上!——虽然把自己的感情用如此尖锐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只是**少数人**,但这种情感在**群众**中传播很广,并且是非常**强有力的**!"——卡莱尔"宪章运动"第40页。——恩格斯原注

① 菲默法庭是中古时代盛行于德国西部威斯特伐里亚的秘密法庭。——译者注

的法庭时，就气得语不成声。他还说到这样一个时候，“那时发明家的头和活跃的工业心脏竟被不安分的下肢所奴役”，——呵，好一个现代的梅涅尼·阿格利巴[112]！英国工人竟不像罗马平民那样容易被你的寓言所安抚，真遗憾呀！最后，尤尔还说了下面这样一个美丽的故事。操纵骡机的粗纺工有一个时候也是随随便便滥用自己的力量。很高的工资并没有引起他们感激厂主的心情和发展智力（自然是在对资产阶级无害或甚至还有益的科学方面）的意向，反而常常使他们变得傲慢，使他们有钱来支援罢工时的那种倔强精神，而厂主们却接二连三地平白无故地因这种罢工而遭殃。在海德、达金菲尔德和附近地区发生这类不幸事件的时候，这一带的厂主们担心法国人、比利时人和美国人的竞争，就向沙普—罗伯茨公司的机器制造厂请求沙普先生发挥他的发明才能，设计一台自动骡机，以便“把生产从苦痛的奴役和毁灭的威胁中拯救出来”。

“几个月以后，一架机器造好了，它好像具备了一个熟练工人所具有的智慧、感觉和手指。**这个铁人**（工人是这样叫这架机器的）就这样**按照密纳发**①**的命令从现代的普罗米修斯**②**的手中跳了出来**。它是这样一个创造物，它的使命就是恢复各个工业阶级间的秩序并保证英国人在工业中的统治权。关于这个新的海格立斯式的功绩的消息在工会中引起了恐慌，**这个奇妙的创造物还没有走出自己的摇篮就把无法无天的海德拉**③**扼杀了**。”

---

① 密纳发（Minerva）是古希腊神话中司智慧、学术、工艺和战争的女神，也是雅典的守护神。——译者注

② 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神。他从天上盗走了火，并把使用火的方法告诉了人们。他因此被宙斯用铁链缚在高加索山之巅，每天有一只鹰去啄食他的肝脏。后来海格立斯释放了他。古希腊人把普罗米修斯看做人类文化的奠基者。——译者注

③ 海德拉（Hydra）是希腊神话中的一条非常凶猛的九头巨蛇。它的八个头可以杀伤，第九个头是不能杀伤的，斩去一个头立刻就生出两个头。后为海格立斯所杀。——译者注

接着尤尔又证明：能同时印四五种颜色的机器的发明，是印花布工人骚动的结果；织布厂中浆经纱的工人的反抗行动促成了新的完善的浆纱机的诞生。另外他还提到一些类似的事情[一]。这位尤尔不久前还竭尽全力用许多篇幅来证明：使用机器对工人是有利的！但是尤尔并不是孤独的；在工厂报告中，厂主艾释华特和其他许多人也没有放过把自己的满腔愤怒向工会发泄的机会。这些大智大慧的资产者，正像某些政府一样，把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一切运动都归罪于恶意的煽动者、阴谋家、蛊惑者、吹牛家和青年人的影响。他们硬说，这些工会的代理人从工会领薪俸，所以对鼓动工人罢工很感兴趣；好像迫使工会发给这些代理人工资的并不是剥夺了他们工作的资产阶级本身似的！

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罢工再好不过他证明了英国的社会战争已经蔓延到什么程度。没有一个星期，甚至几乎没有一天不在这里或那里发生罢工，原因有时是厂主降低工资，有时是厂主拒绝提高工资，有时是工厂雇用工贼，有时是厂主拒绝废除打骂或恶劣的制度；有时是工厂采用新机器或无数其他的原因。当然，这些罢工还只是前哨的小接触，只是间或才转变为较严重的战斗；它们还决定不了什么，但它们确凿地证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决战已经迫近了。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练，准备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中去；罢工是工人阶级各个队伍宣告自己参加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如果翻阅一下报道无产阶级一切运动的唯一报纸“北极星报”全年的合订本，就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工业区所有的工人都已经结成了工会，并且常

[一] 尤尔“工厂哲学”第366页及以下各页。——恩格斯原注

常用总罢工来表示自己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抗议。作为斗争的学校来说，罢工是不可缺少的。在罢工中表现了英国人的独特的勇敢。大陆上的人认为，英国人，特别是英国工人，都是些懦夫，似乎他们不能干革命，这种见解的根据就是他们不像法国人那样随时都在准备骚动，他们好像安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这种见解是完全错误的。英国工人在勇敢方面并不比任何国家的工人差些，他们并不比法国人更安分守己些，但是他们是用另外的方式来进行斗争的。法国人是彻头彻尾政治性的，他们是在政治舞台上和社会上的坏事作斗争的。而英国人呢，他们认为，政治只是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私利服务，所以他们不和政府而直接和资产阶级作斗争，同时这一斗争暂时还只有用和平方式进行才能生效。由于工业停滞和随之而来的穷困，1834年在里昂发生了要求建立共和国的起义，1842年在曼彻斯特爆发了要求制定人民宪章和提高工资的总罢工。而罢工也需要有勇气，甚至比暴动需要更大或大得多的勇气，需要更大的勇敢和更坚定的决心，这是很明显的。真的，对一个亲身体验到穷困是什么的工人说来，勇敢地带着妻子儿女去迎接穷困，成年累月地挨饿受苦，而依然坚定不移，这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英国工人为了挣脱有产阶级的压迫而忍受着一切，他们在慢慢地饿死，他们每天得看着家里的人挨饿，他们知道资产阶级总有一天要报仇；这一切难道还比不过威胁着法国革命者的死刑和苦役吗?我们从下面的例子中，就会看到英国工人只有在任何反抗都已无济于事并已失去意义的时候才向暴力让步的那种顽强的、不可战胜的英雄气概。正是在这种镇静的坚忍精神中，在这种每天都得经受上百次考验的不可动摇的决心中，英国工人显示出自己性格的最值得尊敬的一面。为了制服一个资产者的反抗而

忍受着这些苦难的人们是能够摧毁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的。同时，英国工人也不止一次地显示了足够的勇气。1842年的罢工之所以没有获得进一步的结果，部分地由于工人是被资产阶级逼着罢工的，部分地也由于工人本身对罢工的目的不明确而且他们之间的意见也不一致。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在有了明确的**社会**目的的时候，英国工人已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自己是有勇气的。1839年威尔士的起义不用说了，当我居住在曼彻斯特的时候（1843年5月间），那里就发生了一次真正的战斗。有一家制砖厂（保林—亨弗莱）加大了砖模的尺寸，但是没有提高工资，虽然尺寸较大的砖必然会卖得贵些。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被拒绝了，于是他们就停了工，同时工会也向公司宣布抵制。可是公司费了很大的力气在附近地区从工贼中招到了工人。最初工会企图恫吓他们。公司为了保护工厂，雇了十二个当过兵或警察的人并给他们配备了枪枝。由于恐吓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一天晚上将近十点钟的时候，一支以步枪为前锋的制砖工人的战斗队伍袭击了工厂，工厂离驻扎步兵部队的军营[1]总共不过四百步左右。工人冲进了工厂地区，发现警卫后就向他们开枪，踏坏了摆在地上晒的砖坯，抛散了垒成堆的干砖，毁坏了他们所碰到的一切东西，并且冲到一幢房子里面去，砸坏了所有的家具，痛殴了住在那里的一个监工的妻子。那时，警卫躲在一道篱笆后面，在篱笆掩护下他们可以毫无阻碍地射击。袭击工厂的人却站在一座火光熊熊的砖窑前，火光照亮了他们，使他们成为敌人最好的枪靶子，而他们自己只好毫无目的地射击一阵。可是射击仍然继续了半小时多，直到他们所有的枪弹都已经用光并达到了袭击的目的——把工厂里一切可以破坏的东

① ㊀ 在十字胡同和瑞琴特路拐角上，见曼彻斯特平面图。——恩格斯原注

西都破坏了为止。那时军队开来了，工人向爱克尔斯（距曼彻斯特3英里）撤退。快到爱克尔斯时，他们按每人编组的号码点了一次名，然后才散开，这些人当然只会落到那些从四面八方逼近的警察的手中。受伤的显然很多，但是人家知道的只是那些落到警察手里的人。有一个工人的大腿、小腿和肩上共中了三枪，他还是一颠一蹶地跟着走了4英里多路。这些人充分地表明了他们同样具有革命的勇气，是不怕枪弹的。1842年，一群连自己究竟要干什么都不知道的手无寸铁的群众被包围在市场广场上，几个把住所有出口的龙骑兵和警察便把他们镇压下去了，这种情况决不能证明这些群众缺乏勇气；因为即使那时这些国家当局（即资产阶级）的奴仆们不在场，这些群众也不会干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来。可是，只要人民自己心目中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他们就会显示出足够的勇气，例如对柏里工厂的袭击就是一个证明，这个工厂后来竟不得不用大炮防守起来。

趁这个机会来谈谈在英国是怎样神圣地看待法律的。对资产者说来，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本来就是资产者创造的，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资产者懂得，即使个别的法律条文对他不方便，但是整个立法毕竟是用来保护他的利益的，而主要的是：法律的神圣性，由社会上一部分人积极地按自己的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极地接受下来的秩序的不可侵犯性，是他的社会地位的最可靠的支柱。英国资产者认为自己就是法律，正如他认为自己就是上帝一样，所以法律对他是神圣的，所以警察手中的棍子（其实就是他自己手中的棍子）在他的心目中具有极大的安抚力。但是在工人看来当然就不是这样。工人有足够的体验知道得十分清楚，法律对他说来是资产阶

级给他准备的鞭子，因此，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工人才诉诸法律。可笑的是有人硬说英国工人怕警察，要知道，曼彻斯特每星期都有警察挨打的事情发生，去年甚至还出了这种事情：有人企图冲击一个有铁门和厚厚的百叶窗做防护的派出所。1842年罢工时，警察之所以显得威风，如前面已经说过的，不过是由于工人自身犹豫不决而已。

因为工人并不尊重法律，而只是在无力改变它的时候才屈服于它，所以，他们至少也要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议，他们力求以无产阶级的法律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法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这种法律就是**人民宪章**（People' s Charter），这一文件在形式上纯粹是政治性的，它要求按照民主的原则改组下院。**宪章主义**是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的集中表现。在工会的活动和罢工中，这种反抗总是分散的；总是个别的工人或部分的工人同个别的资产者作斗争。即使斗争有时普遍化了，这多半也不是出于工人的自觉；当工人自觉地这样做的时候，这种自觉的基础就是宪章主义。在宪章主义旗帜下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是整个工人阶级，他们首先向资产阶级的政权进攻，向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这道法律围墙进攻。宪章派是从民**主党**中产生出来的。民主党是在18世纪80年代**和无产阶级同时并在无产阶级内部**发展起来，在法国革命时期强大起来并且在缔结和约后成为“**激进的**”政党。那时，它的主要中心在北明翰和曼彻斯特，以前是在伦敦。它曾经和自由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迫使旧议会的寡头政客通过了改革法案，从那时起，它已是一个愈来愈巩固的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工人政党了。1835年以威廉·洛维特为首的伦敦工人协会（W orking M en' s A ssocia— tion）委员会，草拟了人民宪章，里面包括下列“六条”：（1）精神正常并且

没有犯过罪的一切成年男子都有普选权；(2)议会每年改选一次；(3)议会议员支薪，使没有财产的人也能够当代表；(4)为了消除资产阶级方面的贿买和恐吓，选举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5)设立平等的选区以保证平等的代表权；(6)取消纯属形式的300英镑地产的代表资格限制，使每个选民都同样有被选举权。这六条只涉及下院的组织，初看起来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却足以把英国的宪法连同女王和上院彻底毁掉。宪法中的所谓君主和贵族的成分之所以能够存在下来，无非因为资产阶级乐于留着它们**摆摆样子**；这两种成分在今天本来也只是摆摆样子罢了。但是，如果下院拥有全国舆论的支持，如果它不只是表现资产阶级的意志，而且表现全民族的意志，那它就会把一切权力完全攫为己有，使君主和贵族失掉他们头上最后的一丝圣光。英国工人既不尊敬那些勋爵，也不尊敬女王，可是，资产阶级虽然事实上也很少考虑勋爵和女王的意见，但对他们个人却敬之如神。英国的宪章主义者在政治上是共和主义者，虽然他们从来不用或极少用这个字眼；他们同情各国的共和党，但更喜欢称自己为民主主义者。他们并不仅仅是普通的共和主义者；他们的民主主义也不仅仅限于政治方面。

诚然，宪章主义从1835年一产生的时候起，主要就是在工人中传播，但那时它还没有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工人的激进主义是和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携手并进的。宪章曾是他们的共同的口号，他们每年共同举行“国民公会”，看起来就好像组成了一个党。那时，小资产阶级正对改革法案的结果和1837—1839年的商业停滞感到失望，好战和好杀的情绪高涨，所以宪章主义者的激烈鼓动很合他们的心意。这种鼓动激烈到什么程度，在德国是无论如何想像不出来的。宪章主义者号召人民武装起来，甚至号召他

们起义。人们制造了长矛，就像从前法国革命时代一样。1838年，一个叫做斯提芬斯的美以美教派的传教士参加了这一运动，他对曼彻斯特的居民讲了这样的话：

“不要害怕政府的势力，不要害怕你们的压迫者所掌握的士兵、刺刀和大炮；你们手里的工具比这一切都更有力量，这是刺刀和大炮所不能对付的一种武器。这种武器是十岁的孩子也会用的。只要拿几根火柴和一把浇上松香的干草就够了！我倒要看看，如果人们勇敢地用起这种武器来，政府和它的几十万士兵对它究竟有什么办法！”㊀

但同时，工人的宪章主义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在那时就已经显露出来了。这位斯提芬斯在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曼彻斯特的“圣山”克萨尔—摩尔举行的20万人的大会上又讲了下面的话：

“朋友们，宪章主义并不是为你们争得选举权等等的政治问题，宪章主义是**饭碗问题**；宪章的意思就是住得好，吃得好，工资高，工作日短。”

因此，反对新的济贫法和争取十小时法案的运动在那时已经和宪章运动有了极其密切的联系。那时每次的群众大会上都有**托利党人**奥斯特勒发表演说，而且除了在北明翰通过的要求实现人民宪章的国民请愿书，还提出了几百份关于改善工人的社会状况的请愿书。1839年，鼓动还是和以前一样活跃地继续下去，在年底鼓动开始松懈下去的时候，巴赛、泰勒和弗罗斯特就急忙同时在英国北部、约克郡和威尔士组织一次起义。由于弗罗斯特的计划被人告密，他不得不过早地发动起义，结果就遭到了失败。北方的起义组织者知道了弗罗斯特的企图已经失败，就及时地退却了。两个月以后，在1840年1月，约克郡发生了几次所谓警察叛情绪就渐渐平

㊀ 我们已经看到，这些话对工人起了什么影响。——恩格斯原注

乱(spy— outbreaks)[113]——例如在设菲尔德和布莱得弗德,——后来,激昂的息下去。这时,资产阶级急忙抓住一个更实际的对自己更有利的计划,这就是废除谷物法。在曼彻斯特成立了反谷物法协会,协会的产生削弱了激进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工人很快就明白,废除谷物法**对他们**好处很少,而对资产阶级却很有利,所以资产阶级的这一计划没有得到工人的支持。1842年的危机爆发了。鼓动又像1839年那样活跃起来。但是这一次富有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参加了鼓动,因为他们在这次危机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由曼彻斯特厂主所组成的、现在叫做反谷物法同盟的团体具有一种非常激进的战斗的性质。这个同盟的报刊和宣传员开始用毫不掩饰的革命的语言说话,其原因之一就是保守党从1841年起掌握了政权。像过去的宪章主义者一样,同盟现在也开始公开地号召起义,而在危机中受苦最深的工人也不是没有行动的,这一年的国民请愿书上有350万人签名就证明了这一点。总之,如果说这两个激进的政党过去曾经有些疏远;那末它们现在又重新联合起来了。1842年2月15日,自由党人和宪章主义者在曼彻斯特举行的联席会议上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废除谷物法和实施宪章;第二天两个党都通过了这份请愿书。春天和夏天是在热烈的鼓动和日益严重的贫困中过去的。资产阶级决心利用危机及其所引起的贫困和普遍的激愤情绪来达到废除谷物法的目的。由于这一次执政的是托利党人,资产阶级就几乎抛弃了他们所珍惜的守法的习惯;他们要革命,但是要假手于工人。资产阶级想叫工人为他们火中取栗,让工人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烧坏自己的手指。到处都重新谈起早在1839年就由宪章主义者提出的“**神圣月**”,即工人总罢工的口号;但是这一次不是工人要罢工,而是厂主想关闭自己的工厂,把工人送

到乡下，送到贵族的领地上去，他们想用这种方法迫使托利党的议会和政府取消谷物税。这自然要引起起义，但是资产阶级却站在幕后，可以安安稳稳地坐享其成，万一失败了也不会危及自己。7月底，市场情况开始有些好转；事情不能再拖延了，为了不错过时机，**在市面日渐好转的时候**（参看7月底和8月初曼彻斯特和里子的商业报告）斯泰里布雷芝有三家公司突然降低了工资；至于是它们自己要这样做，还是和其他厂主，特别是和同盟议定要这样做，我不能断定。但是，两家公司不久就让步了，而第三家即威廉·贝利兄弟公司却坚持下去；它向诉苦的工人说，如果他们不喜欢这种办法，那末也许他们最好是去溜跶一个时期。这种讥讽的口吻使得工人大哗，纷纷离开工厂，他们跑遍全城，号召所有的工人罢工。过了几小时，所有的工厂都停工了，工人结队到莫特兰－摩尔去举行群众大会。这是8月5日的事。8月8日，他们有5000人出发到埃士顿和海德去，使所有的工厂和煤矿都停了工，并且在各处举行了群众大会，但是大会上谈的不是资产阶级所希望的废除谷物法，而是“做够一天工，给够一天钱”（《a fair day’s wages for a fair day’s work》）。8月9日，他们向曼彻斯特进发，由于地方当局都是自由党人，他们**没有遇到当局的任何阻碍**就进了城，并且使那里的一切工厂都停了工。8月11日，他们抵达斯托克波尔特，在这里，当他们袭击资产阶级的宠儿——习艺所时，才第一次遇到了抵抗。同一天，在波尔顿发生了总罢工和骚动，当局同样没有阻拦；不久起义就扩展到所有的工业区，除了收割庄稼和制作食物，一切工作都停下来了。但是起义的工人也很镇静。他们并不是自己愿意起义，而是被别人拖进去的；除了曼彻斯特的**托利党人**柏里一个人，厂主们都**一反自己的惯例**，没有反对罢工。事情开始了，但是工人自己并

没有明确的目的。固然，在不愿意为了厂主要达到废除谷物法的目的而去吃枪弹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其他方面，一些人要求实施人民宪章，另一些人却认为这未免为时过早，只要求恢复1840年的工资标准。整个起义就由于这些原因而失败了。假如它一开始就是自觉的有组织的工人起义，那末它无疑地是会获得胜利的。但是，不是自愿而是被雇主赶到街上来的群众，既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就什么事也做不出来。同时，在履行2月15日的盟约方面连手指都没有动一下的资产阶级很快就明白了，工人并不愿意充当他们手中的工具，他们离开"合法"途径后的矛盾行为对他们本身是一种危险；明白了这一点以后，资产阶级又回到守法的立场，跑到政府方面去反对那些由他们煽动起来又被他们逼着起义的工人。资产阶级和自己的奴仆一起当了特别警察——在曼彻斯特，德国商人也参加进来，他们手里拿着粗棍子，嘴里衔着雪茄烟，完全多余地在全市的街道上耀武扬威地踱来踱去；在普累斯顿，资产阶级曾下令向人民开枪，于是这个自发的人民起义就突然既面对着政府的武装力量，又面对着整个有产阶级。本来就没有任何明确目的的工人就逐渐散去，起义结束了，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此后，资产阶级还干了许多别的卑鄙勾当；他们表示厌恶人民的暴力行动，企图这样来为自己辩护。这和他们在春天所说的革命的话是很不协调的。他们把全部的罪过都推给宪章派的"煽动者"等等，虽然他们在挑起起义方面所做的事情要比宪章派多得多。他们极端厚颜无耻地重新站到承认法律神圣的先前的立场上去了。宪章派几乎完全没有参加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们只是做了资产阶级准备要做的事情，即利用已形成的局势罢了，可是他们却受到法庭审判，并被判

了罪，而资产阶级却一无所失，在停工时期他们倒卖掉了存货，获得了利益。

这次起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断然决裂。宪章主义者在过去也根本没有隐瞒他们要用一切手段来实施他们的宪章：甚至不惜采取革命手段。资产阶级现在忽然明白，任何使用暴力的变革对他们都是多么地危险，他们不愿意再听到什么“物质力量”，他们所希望的只是用“精神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好像这和物质力量的直接或间接的威胁是两回事似的）。这是一个争论点，但是后来这个争论点由宪章派（他们和自由资产阶级一样地值得信任）所说的话消除了，他们说他们也不诉诸物质力量了。第二个争论点，也是最重要的并且是使宪章主义恰好成为真正的宪章主义的争论点，就是谷物法问题。关心废除谷物法的是激进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因此，以前的宪章派就分裂成两派，两派的政治原则在口头上是完全一致的，事实上却根本不同甚至互不相容。在1843年1月的北明翰国民公会上，激进资产阶级的代表**斯特治**提议把宪章这一**名称**从宪章协会的章程中删去，理由是在起义后这一名称使人联想到暴力革命行动。但是这一联系已经存在了好几年，而斯特治先生过去并没有认为必须加以反对。工人们不愿放弃这个名称，在表决这个问题时斯特治失败了。这时，这位忽然变为忠臣良民的教友派信徒就带了少数人退出会场，组织了一个由激进资产阶级组成的“争取完全选举权协会”。这个资产者，不久前的雅各宾党人，忽然对这种联想感到如此讨厌，甚至连普选权（universal suffrage）这个名称也用另一个令人发笑的名称——完全选举权（complete suffrega）来代替了！工人们嘲笑了他，仍然沉着地继续走自己的路。

从这时起，宪章主义就成为没有任何资产阶级分子参加的纯粹的工人运动了。曾经要求过“完全”选举权的“每周快讯”、“每周纪事报”、“观察家”等等报刊都逐渐陷入一种和其他自由派报纸同样无精打彩的状况，它们拥护贸易自由，攻击十小时法案和工人的一切特殊要求，一般说来，它们很少有什么激进主义的表现了。激进资产阶级在一切冲突中都站在自由党人方面反对宪章派，把自己的注意力的中心放在谷物法问题上，而这个问题对英国人说来不过是自由竞争的问题而已。因此，激进资产阶级已完全处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他们现在所扮演的是一个极其可怜的角色。

但是宪章派的工人却加倍积极地参加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切战斗。自由竞争已经把工人弄得痛苦不堪，引起他们的痛恨；自由竞争的拥护者资产者就是工人的死敌。完全的竞争自由只会使工人遭殃。工人以往所提出来的一切要求——十小时法案、保护工人不受资本家的迫害、工资要合理、地位要有保证、废除新的济贫法，所有这些要求至少和“六条”一样，都是宪章主义不可缺少的部分，是直接反对自由竞争和贸易自由的。所以，工人根本不想知道什么是自由竞争、贸易自由、废除谷物法；他们对废除谷物法这个要求至少是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而且对它的拥护者却极端愤恨，这是毫不足怪的，但是整个英国资产阶级却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这一点。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宪章主义和激进主义发生了分歧，而资产者的理智却不能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不能了解无产阶级。

宪章主义的民主和过去一切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民主的区别也就在这里。**宪章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的现象**。最多只能促使宪

法做某些修改的“六条”，在激进资产者看来已经是万事俱备，但它对无产者来说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政治权力是我们的手段，社会幸福是我们的目的”，这就是宪章主义者现在明确地喊出的口号。传教士斯提芬斯所说的关于“饭碗问题”的话，在1838年只是对一部分宪章主义者才是真理，但是在1845年对一切宪章主义者都是真理了。宪章主义者中间再也没有纯粹的政客了。诚然，他们的社会主义还处在萌芽状态中，直到现在他们还认为，因工业发展而已经过时的那种把土地分为小块份地的办法（即 allotment-system，关于此种办法请参看“导言”）是消灭贫穷的主要方法，他们在实践方面的大多数建议（保护工人利益的措施等等）就外表看来一般地都带有反动性质。但是，一方面，他们所提出来的措施本身不是受不住竞争的打击（这样，以前的情况就会恢复起来），就是要消灭竞争本身；另一方面，宪章主义目前的暧昧状况和它脱离纯粹政治党派的倾向，必然会使它那些由其社会本质所决定的**特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接近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下一次危机到来的时候。这次危机必然紧跟在目前工业和商业中的繁荣后面，最晚在1847年爆发㈠，但是也许会在明年爆发。这次危机将比过去历次危机剧烈和尖锐得多，它将迫使工人更多地从社会方面而不是从政治方面去寻找摆脱穷困的出路。工人要争取实施自己的宪章，这是用不着说的，但是到那时他们将要弄清楚许多事情，这些事情是他们通过宪章就能做到而他们现在还不很清楚的。

同时，社会主义的宣传也在继续进行。在这里，我们谈英国

㈠ 预言准确地实现了。——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的**社会主义**只是就它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如何而言。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要求以建立两三千人（这些人都从事工业和农业，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接受同样的教育）的“国内移民区”的方法来逐渐实行财产公有。英国社会主义者要求：为离婚提供便利条件；建立合理的政府，使人们有充分发表意见的自由；取消刑罚，给犯人以合理的待遇。这就是他们**在实践方面**的建议；他们的理论原则并不使我们感到兴趣。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者是厂主**欧文**。所以他的社会主义虽然在实质上要超越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在形式上仍然以极宽容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同时在许多方面都对无产阶级很不公道。社会主义者十分驯顺温和；不管现存的制度如何坏，他们还是承认它，因为他们除争取社会舆论外，对改变现存制度的其他一切途径是一概否定的。然而他们的原则又这么抽象，如果他们的原则保持现在的形式，他们是永远也不能争得社会舆论的。此外，社会主义者还经常抱怨下层阶级道德堕落，他们看不见社会制度的这种瓦解中的进步成分，看不见只会追求私利的伪善的有产阶级更严重的道德堕落。他们不承认历史的发展，所以他们打算一下子就把国家置于共产主义的境界，而不是进一步开展政治斗争以达到国家自行消灭［sich selbst auflöst］的目的㊀。他们固然了解工人为什么痛恨资产者，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唯一能够引导工人前进的愤怒并没有什么用处，并宣扬对英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更加没有什么用处的慈善和博爱。他们只承认心理的发展，只承认和过去毫无联系的抽象的人的发展。可是整个世界，包括

㊀ 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译本中，这句话的后半句改为：“而不是通过国家的合乎规律的进一步的政治发展，直到这一过渡成为可能的和必然的。”——编者注

每一个单独的人在内，都是从过去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太学究气、太形而上学了，他们是做不出什么大事来的。他们之中一部分人是来自工人阶级的，但是工人阶级中倾向于他们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虽然这一部分人是最有教养的和最坚强的。社会主义在其现有的形式下决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公共财产，因此，它必须降低自己的水平，暂时回到宪章主义的观点上来。但是，经过宪章运动的考验并清除了资产阶级成分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宪章运动的领袖（他们几乎全是社会主义者㈠）那里形成起来，它很快就会在英国人民的历史发展中起突出的作用。比法国共产主义的基础宽广得多、但是在发展㈡方面却落后于法国共产主义的英国社会主义，应当暂时回到法国的观点上来，以便将来再超过它。固然，到那时法国人也会更加向前发展了。社会主义同时又是工人不信仰宗教的坚定不移的表现，这种表现是这样地坚决，使那些**不自觉地**纯粹为了实际原因而不信仰宗教的工人也往往被这种尖锐性所吓退。但是在这里，也是穷困将迫使工人抛弃信仰，他们会愈来愈相信，这种信仰只能使他们俯首帖耳地听从自己命运的支配，顺从地听任有产阶级榨取他们的脂膏。

这样，我们看到工人运动分裂为两个派别，一派是宪章主义者，一派是社会主义者。宪章主义者比较落后，比较不开展，但他们是真正的道地的无产者，是无产阶级的代表。社会主义者看得远得

㈠　自然是广义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狭义的欧文主义者。——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㈡　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译本中，“发展”一词前有“理论上的”字样。——编者注

多，提出消灭穷困的实际办法，但他们来自资产阶级，因此不能和工人阶级融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和宪章主义的合流，法国共产主义在英国条件下的重现，——这必然是最近的将来就要发生的，而且已经部分地发生了。只有在实现了这一点以后，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那时，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也将向前推进，这种发展将有利于这个新生的政党，促使宪章主义的继续发展。

这些时合时分的不同的工人派别——工会会员、宪章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自己出经费创办了许多学校和阅览室来提高工人的知识水平。这些设施在每个社会主义的组织里和几乎每个宪章主义的组织里都有，而且在许多单个的工会里也有。在这里，孩子们受到纯粹无产阶级的教育，摆脱了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阅览室里也只有或几乎只有无产阶级的书刊。资产阶级认为这种设施是很危险的，他们已经在某些设施中，即在“技术学校”（《Mechan-ics' Institutions》）[114]里面消除了无产阶级的影响，并把它们变成在工人中间传播对资产阶级有利的科学知识的机构。在这里讲授着自然科学，而这些研究能使工人脱离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或许还能促使他们中的某一个人去从事增加资产阶级收入的发明。可是研究自然界**目前**对于工人本身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在他居住的大城市里，在工作日很长的情况下，他是永远看不到大自然的。这里还进行以自由竞争为偶像的政治经济学的说教；工人从这门科学中只能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对他说来，最明智之举莫过于默默地驯服地饿死。这里的一切都是教人俯首帖耳地顺从统治阶级的政治和宗教，所以工人在这里听到的只是劝他唯唯诺诺、任人摆布和听天由命的说教。工人群众自然不愿意和这些学校打交道，他们都到无产阶级的阅览室里去阅读，并讨论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有直

接关系的问题。于是自满自足的资产阶级就说他们的Dixi et salvavi㊀,并且轻蔑地把头一扭,避开了这个“宁愿听恶意的煽动者狂暴的叫喊而不愿接受踏踏实实的教育”的阶级。但是工人也是重视“踏踏实实的教育”的,只要它里面不掺杂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智谋。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在无产阶级的、特别是社会主义者的学校或阅览室里经常举行关于自然科学、美学和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讲演会,而且听众往往很多。我常常碰到一些穿着褴褛不堪的粗布夹克的工人,他们显示出自己对地质学、天文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识比某些有教养的德国资产者还要多。阅读最新的哲学、政治和诗歌方面最杰出的著作的几乎完全是工人,这一事实特别表明了英国无产阶级在取得独立的教育方面已经有了多么大的成就。资产者是现存的社会制度以及和这个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偏见的奴隶;他胆怯地避开和千方百计地排斥真正标志着进步的一切;无产者却眼睛雪亮地正视这一切,高高兴兴地而且很有成效地研究它们。在这方面,社会主义者为了教育无产阶级曾经做过不少事情,他们翻译了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狄德罗**等人的著作,并且用普及本把这些翻译作品和英国作家最优秀的著作一道加以传播。**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和**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也仅仅是在无产者中间流行[115]。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工人;资产者所读的只是经过阉割并使之适合于今天的伪善道德的版本即所谓“家庭版”。当代最大的两个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和**葛德文**的著作,特别是后者的著作,也几乎只是无产阶级的财富。即

㊀ Dixi et salvavi animam mean—— 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编者注

使激进资产阶级中有**边沁**的信徒，那也只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才能越过边沁，迈步前进。无产阶级在这个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书刊，这多半是一些期刊和小册子，就内容来说，远胜于资产阶级的一切书刊。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谈。

还必须指出一点。构成工人运动的核心的是工厂工人，其中主要是棉纺织工人。郎卡郡，特别是曼彻斯特，是最坚强的工会的所在地，是宪章运动的中心，是社会主义者最多的地方。工厂制度渗入某个劳动部门愈深，这个部门的工人卷到运动中去的也愈多；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愈尖锐，工人中的无产阶级意识也愈发展，愈明朗化。北明翰的小师傅虽然也吃够危机的苦头，但他们还是处于无产阶级的宪章主义和小商人的激进主义之间的不幸的中间地位。一般说来，所有的产业工人都被卷到反对资本和资产阶级的各种斗争中去了。他们都一致同意，他们是《working men》〔“工人”〕——这是他们引以自豪的并且是宪章主义者各种会议上的普通的称呼，——他们是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是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阶级，同时也是国家力量所系并能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阶级。

矿业无产阶级

对于像英国的那样规模巨大的工业说来，开采原料和燃料同样需要数目很大的一批工人。但是在工业所必需的各种原料中，除农业区供给的羊毛外，英国本地只出产矿物，即金属和煤。**康瓦尔**有丰富的铜矿、锡矿、锌矿和铅矿，斯泰福郡、北威尔士及其他地区出产大量的铁，几乎整个英格兰北部和西部、苏格兰中部及爱尔兰某些地区都出产丰富的煤㊀。

康瓦尔的矿山雇用了将近19000个男人、11000个妇女和儿童，这些人一部分在地下做工，一部分在地面上做工。在矿井内做工的几乎全是男人和十二岁以上的男孩子。据“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

㊀ 据1841年调查，大不列颠（爱尔兰除外）在矿上工作的工人数目如下：

	男人		女人		总数
	20岁以上	20岁以下	20岁以上	20岁以下	
煤矿 ……………………	83408	32475	1185	1165	118233
铜矿 ……………………	9866	3428	913	1200	15407
铅矿 ……………………	9427	1932	40	20	11419
铁矿 ……………………	7773	2679	424	73	10949
锡矿 ……………………	4602	1349	68	82	6101
其他（包括那些未指出名称的矿）	24162	6591	472	491	31716
总计	139238	48454	3102	3031	193825

因为在煤矿中工作的多半就是在铁矿中工作的工人，所以算在煤矿工人中的一部分工人以及列在最后一项内的很大一部分工人都应该列入铁矿工人中去。——恩格斯原注

”看来，这些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似乎是相当不错的，英国人也常常夸耀他们这些强壮而勇敢的、甚至到海底下去开发矿脉的唐瓦尔矿工。但是，委员会的报告对这些人的力量的估计却有些不同。**巴朗**博士那个考虑得很周到的报告表明：矿井深处的空气含氧很少，并且混杂着尘土和炸药爆炸时的烟，这种空气对肺部很有害，妨碍心脏的活动，削弱消化器官的机能；紧张的工作，特别是每天上工前和下工后在梯子上爬上爬下（在某些矿井中，甚至年轻力壮的男子也要在这上面花费一小时以上），也大大助长了上述疾病的发展，所以从小就下矿的男子的体力竟远不如在地面上做工的妇女；许多人年纪轻轻地就死于急性肺结核，而大多数人都在壮年时得慢性肺结核死去；工人们都未老先衰，在三十五岁到四十五岁之间就失去了工作能力；很多人由于爬梯子吃力，弄得满身大汗，从温暖的矿井里出来后突然遇到地面上的冷空气，本来就有病的呼吸器官感染上急性炎症，他们常常因此送命。地面上碎矿和选矿的工作，是由少女和儿童来做的，这种工作被认为对健康很有益处，因为它是在新鲜的空气中进行的。

在英格兰北部诺森伯兰和德勒穆交界的地方，是蕴藏丰富的奥尔斯顿－摩尔铅矿所在地。关于这个地区的材料——“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密契尔委员的报告——和关于康瓦尔的材料几乎完全一致。这个材料也指出，矿井坑道内氧气不足，空气中充满尘土、炸药烟、碳酸气和含硫的瓦斯。因此，这里的矿工和康瓦尔的矿工一样，也是身材矮小，从三十岁起就几乎都患肺部疾病，如果患者继续工作下去的话（他们几乎总是继续工作下去的），这种病最后就转成真正的肺结核，大大缩短这些人的平均寿命。如果说这个地区的矿工比康瓦尔的矿工活得稍微久些，这是由于他们从

十九岁起才开始下矿井，至于康瓦尔的矿工，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从十二岁起就开始做这种工作了。但是在这里，据医生证明，大多数人也在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就死去了。在这一地区的官方登记册上记载的79个死亡的矿工中，37人死于肺结核，6人死于哮喘病，他们的平均寿命是四十五岁。在附近的几个居民点——爱伦达尔、斯坦霍普和密得尔顿，矿工的平均寿命各为四十九岁、四十八岁和四十七岁，因肺部疾病而死的各占死亡总数的48%、54%和56%。在这里必须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数字都仅仅是指**满了十九岁**才下矿的矿工说的。让我们把这些数字和所谓瑞典统计表——关于所有瑞典居民死亡情形的详细统计表——比较一下，这些统计表在英国直到现在还被人看做衡量不列颠工人阶级平均寿命的最正确的标准。根据这些统计表，十九岁以上的男人的平均寿命是五十七岁半，这样看来，英格兰北部矿工的寿命由于他们的劳动平均缩短了十年。但是不要忘记，瑞典统计表是**工人**的平均寿命的标准，所以它们所表示的，是无产阶级在不利的生存条件下可能活到的岁数，就是说，它们是低于普通人的寿命标准的。在这一地区里，我们也发现了我们在研究大城市时已经熟悉了的夜店和栖身之所，那里肮脏、发臭和拥挤的情形也并不亚于大城市。密契尔曾参观过一间18英尺长15英尺宽的屋子，里面有七张像船上那样的双层床，住了42个成年男人和14个男孩，一共56个人。屋子没有任何通气孔；虽然最近三夜都没有一个人在这间屋子里睡过，但是里面仍然又臭又闷，竟使密契尔一分钟也待不住。如果在炎热的夏夜往里边塞进56个人，那又将成什么样子呢！这并不是美国运奴隶的船只的统舱，而是“生而自由的不列颠人”的住所呵！

现在我们来谈谈英国矿业最重要的部门——铁矿和煤矿。“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是把它们放在一起考察的，而且正如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所要求的那样，考察得非常详细。报告的第一部分所谈的差不多都是这两个部门中的工人的状况。我在前面已经详细地描述了产业工人的状况，所以在这里就可以按照本书的篇幅所要求的那样，尽量写得简短些。

在开采方法大致相同的煤矿和铁矿里做工的，有四岁、五岁、七岁的儿童，但大多数都在八岁以上。他们的工作是把开采出来的矿石或煤从开采地运到马车道上或主要的矿井里去，以及把从矿井的一部分通往另一部分的门打开让工人和矿石通过，然后再关上它。看这些门的多半是最小的孩子，他们就这样被迫每天在黑暗、狭窄、多半是潮湿的巷道里孤独地坐上十二小时，由于没有足够的工作，他们不能不闲得发呆。可是搬运煤和铁矿石却是很繁重的劳动：必须在高低不平的坑道里把装满了煤或铁矿石的相当大的没有轮子的运矿桶拖着走，常常要涉过稀泥或水，爬上陡坡和通过低得有时必须爬着走的巷道。因此，这个吃力的工作就由年龄较大的男孩子和快成年的女孩子来做。随着情况的不同，每一个运矿桶或由一个成年工人拖着走，或由两个孩子，一个在前面拉，另一个在后面推着走。成年男子和十六岁以上的比较结实的青年所做的挖矿工作也是非常累人的。工作日通常长到十一小时至十二小时，往往还要长些，在苏格兰竟长到十四小时。把工作的时间延长一倍的事情是极常见的，因此，所有的工人都要在地下连续工作二十四小时，也往往达三十六小时。在大多数矿里都没有固定的吃饭时间，所以工人们都是在肚子饿了而且又能够抽出一点点时间来的时候吃些东西。

矿工的表面状况一般被描写得相当不错，他们的工资甚至比周围的农业工人高（农业工人简直是吃不饱的），只有苏格兰的某些地区和爱尔兰煤矿区例外，那里是极其贫穷的。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回头来谈谈对于矿工状况的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只是在和全英国最贫穷的阶级的状况相比较时才得出来的。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目前这种采矿方式所造成的恶果，并让读者来判断：究竟有什么样的金钱报酬能够补偿工人所受的这种痛苦。

运铁矿石和煤的儿童和少年都因工作太累而叫苦不已。就是在那些剥削工人最残酷的工厂里，我们也没有看到过这样普遍和这样极度的筋疲力尽的情形。报告的每一页上都有这方面的许多例子。下面这样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孩子们一回到家，就倒在灶旁的石板地上睡着了，甚至什么东西都不能吃，父母得把睡着的孩子洗干净，抱上床去。孩子们常常疲倦得倒在路上睡着了，于是父母必须在深更半夜去寻找他们，把他们在睡梦中带回家去。通常，每逢星期日，这些孩子为了稍微恢复一下一星期的疲劳，竟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睡觉上；上教堂和学校去的只是少数孩子，而且教员还常常埋怨说，虽然他们的求知欲很强，但他们总是打瞌睡而且很愚笨。女孩子和妇女的情形也是一样。人们极残酷地迫使她们去做力不胜任的工作。自然，这种几乎总是把人弄得极端虚弱的疲劳现象，是不会不影响工人的身体的。这样的过度劳动所产生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肌肉的发展不平衡，也就是说，在拉东西和推东西时特别用力的胳膊、腿、背、肩和胸部的肌肉过分发达，而身体的其他部分却因缺乏营养而发育不良。这首先是阻碍了身体的成长和发育。几乎所有矿工的个子都很矮小，只有瓦瑞克郡和莱斯特郡的矿工是例外，因为他们是在特殊的、比较有利的条件下工作的。其次是

延缓了男孩子和女孩子的性的成熟期，男孩子的性的成熟期常常要晚到十八岁。昔蒙兹委员遇到过一个十九岁的少年，除牙齿外，他身体各部分的发育竟和一个十一岁到十二岁的孩子差不多。这种儿童期的延长实质上也不过是发育受到阻碍的结果，其影响是必然要在以后表现出来的。在这种条件下和体质这样孱弱的情况下，两腿弯曲、两膝向里弯、两足形成外八字、脊柱弯曲等等畸形状态，是工作时姿势一直不自然所造成的最普遍的后果；这些畸形是这样常见，以致无论在约克郡和郎卡郡，或者在诺森伯兰和德勒穆，许多人（包括医生在内）都一致认为，单从体格上就可以在100个普通工人中认出哪一个是矿工来。妇女显然受这种工作的危害更深；她们的体格很少有完全正常的，更正确地说，几乎从来没有完全正常的。在报告中也举出了许多事实，证明矿井里的工作使得妇女的骨盘结构不正常，因而引起难产，甚至常常造成死亡。除这类畸形外，煤矿工人还患一大串特殊的病，这些病也是其他矿工所患的，其原因很容易从他们的劳动的特点中得到解释。首先，他们都患胃病；食欲消失，多数都腹痛、恶心和呕吐，同时口渴得厉害，但只能用矿井里肮脏的、常常是微温的水来解渴。消化器官的活动受到了破坏，这又促成了其他疾病的产生。根据许多人的证明，煤矿工人们也常常患心脏病，如心脏肥大，心脏炎和心包炎，心脏的血管硬化和主动脉口狭窄等。这些疾病的原因就是劳动过度。疝气也几乎是普遍的现象，这也是肌肉过度紧张的直接后果。在许多矿井里，由于肌肉过度紧张，又由于空气里充满了尘土、碳酸气和矿坑瓦斯（这本来是容易避免的），产生了许多痛苦而危险的肺部疾病，特别是哮喘病，这种疾病在某些地区的大多数煤矿工人中是在四十岁上出现，而在另一些地区甚至在三十岁上就出现，并且很快

就使患者失去工作能力。那些在潮湿的矿井中工作的人当中，喘息的现象自然要开始得早得多；在苏格兰的某些地方，工人们在二三十岁之间，即在有病的肺部特别容易感染各种炎症和热病的年龄，就有了喘息的毛病。这种工人所特有的一种病是所谓黑痰病（black spittle），它是由细微的煤屑侵入肺的各个部分所引起的；这种病的征候是全身衰弱、头痛、呼吸困难、吐黑色的浓痰。在某些地方这种病比较轻微，而在另一些地方，特别是在苏格兰，却是不治之症；在这里，这种病除上述各种征候表现得特别明显外，还有呼吸短促而带有哨音、脉搏很快（每分钟一百多次）、时断时续的咳嗽等现象；病人愈来愈瘦，愈来愈弱，很快就失去工作能力。在苏格兰，这种病总是致命的。据东洛蒂昂的倍开特兰这个地方的麦克凯拉博士说，在一切通风设备好的矿井里，这种病根本看不到，可是从通风设备好的矿井转到通风设备坏的矿井去工作的工人却经常害这种病。这样看来，这种病之所以普遍存在，应当归罪于不安装良好通风设备的唯利是图的矿主。风湿病也是一切煤矿工人共同的疾病（只有瓦瑞克郡和莱斯特郡的煤矿工人是例外），这种疾病大部分是由于经常待在潮湿的矿井中引起的。所有这些疾病的结果就是各个地区（毫无例外）的煤矿工人都衰老得早，四十岁以后——在一些地区稍稍早一些，在另一些地区稍稍迟一些——就已经不能工作了。到四十五岁或五十岁还能继续工作的煤矿工人是极其少见的。根据所有的材料证明，这一劳动部门中的工人到四十岁就衰老了。上面所说的是挖煤的工人；至于经常把沉重的煤块举起来放到运矿桶里去的装煤工人，那他们在二十八岁到三十岁之间就已经衰老了，所以在煤矿区里甚至有这样一句谚语："装煤工人，未少先老。"煤矿工人老得这样早，自然也就死得早，所以在他

们中间很少能遇见六十岁的老人；甚至在矿井的设备好得多的南斯泰福郡也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能活到五十岁以上。由于工人这样过早地衰老，所以这里很自然地也像工厂里一样，失业的父母经常靠他们的孩子来养活，有时还靠非常年幼的孩子来养活。如果把煤矿中的工作所引起的后果再简单地总结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正如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萨斯伍德·斯密斯博士所说的，由于童年时期的延长和未老先衰，一个人精力最充沛的生活时期就大大缩短了，而且寿命也因为早死而普遍地缩短了。所有这些都必须记在资产阶级的帐上！

上面谈到的一切只是英国矿井的一般情形。但是有不少矿井的工作条件还要坏得多，这就是那些开采薄煤层的矿井。假如掘煤时把和煤层连在一起的砂和粘土带出一部分来，煤价就会太贵；所以矿主只让掘煤，不许动砂和粘土。这样一来，通常有四五英尺或者还要高一些的巷道在这里就低得连站都站不起来。工人只好侧卧着，把肘支在地上，用铁镐把煤掘下来。这种姿势就引起肘关节炎，而在工人必须跪着工作的情况下，就会引起膝关节炎。拖煤的妇女和儿童用挽具和链子拖着运矿桶在低矮的水平坑道里爬着走，链子往往从胯下穿过去，同时另外一个人在后面用头顶和用手推。用头顶运矿桶引起局部刺激、肿胀和疮疖。此外，许多水平坑道都是潮湿的，因此，工人必须在几英寸深的脏水或咸水中爬行，这样也使皮肤受到刺激。不难想像，这种可怕的奴隶劳动是怎样助长了煤矿工人本来就有的各种疾病的发展。

但落在煤矿工人头上的灾难还不止这些。在整个不列颠王国里，再没有一个劳动部门中的工人的生命像在这里这样经常发生危险。煤矿是许许多多骇人听闻的不幸事件产生的场所，而所有这

些不幸事件都应当直接归咎于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矿井中常常产生的矿坑瓦斯和空气混合起来，就成为一种爆炸性瓦斯，这种瓦斯一碰到火就爆炸，就会把附近的人都炸死。这样的爆炸时而在这里发生，时而在那里发生，几乎每天都有。1844年9月28日，在德勒穆的哈斯威尔矿井中发生了一次这样的爆炸，结果死了96个人。同样在矿井中大量形成的碳酸气沉积在比较低的地方，常常积到一人多深，人一陷到里面就会闷死。按理说，把矿井隔成各个部分的门是会防止爆炸的蔓延和瓦斯的流动的，但是因为看门的都是小孩子，他们常常睡着了，或者是疏忽了，所以这不过是有名无实的预防而已。要是利用通风井来使矿井中的空气畅通，就完全可以消除这两种瓦斯的危害性，但资产者不肯出钱来办这件事。他要工人只使用戴维灯；但这种灯的光线很微弱，对工人毫无用处，所以工人宁愿改用普通的蜡烛。可是一旦发生爆炸，那当然就要归咎于工人的疏忽；但是只要资产者把通风设备搞好，爆炸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其次，随时都有水平坑道整个地或部分地崩塌下来的事故发生，把工人活埋或者把他们弄成残废；资产者所关心的是尽可能地把煤从水平煤层中掘干净，这就是造成这类不幸事件的原因。再其次，工人下矿井时攀缘的绳索的质量往往很坏，绳索一断，不幸的工人就坠到井底，跌得粉身碎骨。所有这些不幸事件（因为篇幅有限，我不能一一列举），根据“矿业杂志”[116]的统计，每年大约要夺去1400个人的生命。仅仅就郎卡郡一地而言，“曼彻斯特卫报”每周至少要报道两三起不幸事件。几乎在所有的地区，验尸陪审员都是受矿主左右的，而在情况不是这样的地方，判断照例是这样的：“**因不幸事故致死**。”此外，陪审员很少考虑到矿井的状况，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是一窍不通的。但是“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却毫不犹豫地把

大多数这种不幸事件的责任归之于矿主。

至于矿业工人的教育和道德，据“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康瓦尔在这两方面的情况都还不错，奥尔斯顿—摩尔甚至很不错；但是在煤矿区，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一般是很低的。工人住在乡村里，住在偏僻的地方。只要他们在做那种繁重的工作，除警察外，谁也不关心他们。同时，由于孩子们很小就开始工作，所以他们的智力发展的水平是很低的。普通的学校他们进不去，在夜校和主日学里又什么也学不到，因为教师都是些废物。因此，只有少数人识字，能写的就更少了。据委员们证明，他们唯一懂得的，就是靠自己的繁重而又危险的劳动所换得的工资实在是少得太可怜了。他们从来不或者几乎从来不上教堂；所有的牧师都抱怨他们异常缺乏宗教感。的确，这些人在宗教的和世俗的问题上显得这样愚昧无知，连我们在前面许多例子中所谈的产业工人都为之逊色。他们只是从骂人的话里才有了宗教的概念。他们的道德被他们的劳动条件破坏了。一切煤矿工人的过度疲劳必然会促使他们酗酒。至于说到性道德，那只要谈一点就够了，这就是由于矿井里温度很高，男人、女人和孩子往往都是赤身裸体地工作，而在大多数场合差不多是一丝不挂的。这在黑暗而僻静的矿井过道中会引起什么结果，那是每一个人都想像得到的。私生子非常之多，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在这些半野蛮的人们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这也证明，非婚的性关系在这里还没有达到城市里那种卖淫的地步。妇女的劳动在这里也产生了和工厂里一样的后果；它破坏了家庭，使妇女完全失去了履行母亲的义务和料理家务的可能。

当“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在议会中提出时，**艾释黎**勋爵急忙提出了一个法律草案，绝对禁止妇女在矿井里工作并严格限制雇

用儿童。这个法案通过了[117]，但在大多数地区都成为一纸空文，因为连视察法律执行情况的矿山视察员都没有任命。何况在矿场所在地的乡间，规避这个法律本来就是很容易的。因此，当去年煤矿工会正式通知内务大臣，苏格兰汉密尔顿公爵的矿里面有六十多个妇女工作的时候，当"曼彻斯特卫报"报道在威根附近（我记得是这样）的矿坑爆炸，一个女孩子被炸死的时候，竟没有人注意到这已经暴露了违法的事实，那是毫不足怪的。在某些个别的情况下这个法律也许有人遵守，但总的说来还是一切照旧。

可是煤矿工人的苦难还不止这些。资产阶级破坏了这些人的健康，使他们每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并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任何机会，但它还不满足，它还用最无耻的方式来剥削他们。实物工资制在这里不是例外，而是常规，并且是明目张胆地实行的。这里普遍采用而且多半是由于必要才采用的小宅子制也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此外，资产阶级还用其他的方法欺骗工人：煤是按重量出卖的，但工人的工资多半都是按容积支付，如果他的运矿桶没有完全装满，他就**一点工资**也拿不到，可是装多了又一文钱也不能多得。如果运矿桶里的砂子超过了定量，那工人就不仅完全得不到工资，而且还要罚款，但砂子的多少与其说是决定于工人，不如说是决定于煤层的性质。罚款制度在煤矿里一般都是极其厉害的，有时候一个穷人做完了整整一星期的工去领工资的时候，才从监工——他高兴罚就罚，甚至不预先告知工人——那里知道不仅一个钱也领不到，甚至还必须缴多少多少罚款！监工处理工资通常都是独断独行的；他把工人做的工作登记下来，可以随意付给工人一些工资，而工人还必须相信他的话。在某些按重量计算工资的矿里，使用砝码与物重为一比十的不准确的台秤，秤上的砝码是没有经过当局

检验过的；有一个矿里甚至有这样一条规则：工人要控告台秤不正确，**必须在三个星期前预先告诉监工**！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在英格兰北部，还有以一年为期的雇工，工人在这一年内除了自己的雇主外不能给任何人做工，但主人却根本不负责给他们工作。这样一来，他们就常常整月地没有工做，而如果他们想要到其他的地方去找工作，那就会得到一个擅离职守的罪名，被送到监牢里去待六个星期。另外一些合同保证他们每两个星期有26先令的工资，但是诺言并不兑现。在某些地区，矿主借给工人一笔不大的款子，让他们以后用劳力来偿还，这样就把他们紧紧地束缚在自己身边了。在北方还有一种惯例，就是经常扣压一个星期的工资不发，以便把矿工束缚在矿上。下面这一情况把这些被束缚的工人完全降到奴隶的地位：几乎煤矿区里所有的治安法官本身不是矿主，就是矿主的亲戚朋友。他们在这些贫穷的落后地区，在这些报纸很少，——而报纸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政治宣传工作很不开展的地区，享有几乎无限的权力。甚至很难想像，这些为自己的利益执掌着司法大权的治安法官会怎样剥削和折磨不幸的煤矿工人。

这种情形维持了一个很长的时期。矿工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他们活在世界上决不是仅仅为了供人榨取血汗。但是在他们中间，首先是在和觉悟较高的工厂工人相接触而不能不受他们影响的工厂区里面，也渐渐出现了对“**煤炭大王**”的无耻压迫的反抗精神。煤矿工人开始组织工会，时常举行罢工。在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里，他们甚至全心全意地拥护宪章派。但是完全和工业生活隔绝的英格兰北部大煤矿区，并没有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只是由于宪章派和觉悟较高的煤矿工人本身的多次努力，到1843年，反抗精神才在这里普遍地觉醒起来。诺森伯兰和德勒穆的工人完全投入了运

动，他们成了全大不列颠煤矿总工会的首领，并聘请了布利斯托尔的律师，宪章主义者**威·普·罗伯茨**做他们的“总代理人”，他是在宪章派过去的多次诉讼中就已经出了名的。这个工会很快就扩展到大部分地区里；到处都任命了召开大会和征求会员的代理人。到1844年1月在曼彻斯特开第一次代表会议的时候，工会已拥有会员6万人以上，半年后，到了在格拉斯哥举行第二次代表会议的时候，会员已经超过10万人。在这两次代表会议上讨论了煤矿工人的一切问题，并就比较大规模的罢工的问题做出了决定。为了维护煤矿工人的权利，创办了好几种新的期刊，特别是泰纳河上的新堡创办的“矿工的律师”月刊。

1844年3月31日，诺森伯兰和德勒穆所有煤矿工人的受雇合同已经到期。他们委托罗伯茨草拟了一个新合同，提出了以下的要求：（1）不按容积而按重量计算工资；（2）过秤时要用普通的经政府检查官检验过的秤和砝码；（3）受雇期限为半年；（4）废除罚款制度，按实际做的工作付给工资；（5）矿主有义务保证专门替他工作的工人每星期至少有四天工作，或保证他们每星期领到四天的工资。他们把这个合同送给了煤炭大王们，并选出了一个代表团去谈判。但是矿主们的回答是：矿工工会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他们只和个别的工人打交道，而工会他们是永远不会承认的。矿主们也提出了一个合同草案，这个草案中连上述几点的影子都没有，工人当然拒绝了。这样双方就宣了战。1844年3月31日，4万煤矿工人放下了自己的铁镐，于是这两个郡里所有的矿井都空无一人了。工会的财力是这样雄厚，好几个月里每个家庭每星期都可以领到时个半先令的补助金。当工人用这种方法来考验他们雇主的耐性的时候，罗伯茨不辞劳苦地组织罢工，进行鼓动；他召开

各种会议，东奔西走地跑遍了全英国，为罢工者募集捐款，劝告他们要沉着和守法，同时又向横行霸道的治安法官和实行实物工资制的业主展开了英国空前未有的斗争。早在年初他就展开了这一斗争。只要某一个治安法官判决煤矿工人有罪，罗伯茨立刻就到皇家法庭[118]去弄一个 Habeas Corpus [119]来，把他的被保护人带到伦敦去，结果总能替他辩明无罪。例如威廉斯法官于1月13日在皇家法庭中宣布3个已被比尔斯顿（南斯泰福郡）的治安法官判了罪的煤矿工人无罪；这几个煤矿工人原来的罪名是：他们拒绝在一个有崩塌危险而且当他们刚离开那里就真的崩塌了的地方工作！更早一些时候，帕特逊法官曾宣布6个工人无罪，所以罗伯茨这个名字渐渐地使那些拥有矿井的治安法官们闻风丧胆。普累斯顿也有受罗伯茨保护的4个人被关在监牢里；2月初，罗伯茨到那里去就地调查这件事，但是当他到那里的时候，发现这些被判刑的人在刑期未满以前已经释放了。曼彻斯特监禁了7个人；罗伯茨弄到了一个人身保护状，使得法官怀特曼把被告全释放了。普莱斯科特有9个煤矿工人被控破坏了圣海伦斯（南郎卡郡）的安宁而被关在监牢里，听候宣判；罗伯茨一到那里，他们就马上被释放了。这一切都是2月上半月的事情。在4月间，罗伯茨用这种方法从得比监狱中释放出1个煤矿工人，从威克菲尔德（约克郡）监狱中释放出4个，从莱斯特监狱中释放出4个。这种情况继续了一些时候，直到这些《Dogberries》〔“道勃雷”〕——人们用莎士比亚的戏剧“无事烦恼”中的有名人物的名字来这样称呼治安法官——变得老实一些为止。罗伯茨也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实物工资制。他把这些恬不知耻的矿主一个又一个地拖到法庭上，迫使治安法官违背自己的心愿来判决他们有罪。矿主们在这个行动

迅速、事事出头的总代理人面前感到十分恐怖，例如在得比附近的拜尔帕地方，一家实行实物工资制的公司在罗伯茨刚到那里的时候就贴出下面这个布告：

“通告

为了避免一切误会，哈斯兰家认为有必要做如下声明：他们矿上所有矿工的工资，将全数以现金支付，矿工们愿意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使用这些钱，悉听自便，如矿工在哈斯兰家的铺子里买东西，他们将和过去一样照批发价格买得。但是并不要求他们一定在那里买，不管他们是在这个铺子里或其他任何的铺子里买，他们的工作和工资仍照旧。

本特里克煤矿”

这些胜利在整个英国工人阶级中引起了热烈的欢呼并为工会吸引来了大批新会员。那时北方仍在继续罢工。没有一个人工作，在输出煤炭的主要港口新堡，煤荒竟严重到必须从苏格兰运进煤来，虽然英国人的谚语《to carry coal to Newcastle》〔“把煤运到新堡去”〕和希腊人所说的“把猫头鹰带到雅典去”一样，意思就是“完全多此一举”。起初，当工会的经费还没有用光时，一切都很好，但是快到夏天的时候，工人就很难进行斗争了。他们穷困不堪；他们没有钱，因为英国所有工业部门工人的捐款和罢工的人数比起来是太微不足道了；他们不得不接受苛刻的条件向小铺老板赊欠；整个报界，除不多的几家无产阶级报刊外，都反对他们；资产阶级，就是其中少数很有正义感并想支援罢工者的人物，也只是从卖淫式的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报纸上读到些关于罢工情况的骗人的报道；被派到伦敦去的由12个煤矿工人组成的代表团向伦敦的无产阶级募集了一些款子，但是因为需要救济的人很多，所以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尽管如此，矿工们仍然坚定不移，而更重要的是，虽然矿主及其奴才们采取狂暴的敌对态度并进行各种挑衅，但是他们仍然保

持安静和沉着。没有采取过一次报复的行动，没有殴打过一个叛徒，也没有发生过一次盗窃。罢工就这样继续了四个月之久，矿主们仍然没有一点占上风的希望。但他们面前还有一条道路。他们想起了小宅子制；他们想起了倔强的工人的住宅是**老板**所有的。7月，他们叫工人腾出房子，一个星期以后，4万人全都被赶到街上去了。他们的残酷的手段是令人发指的。有病的和身体衰弱的，老年人和婴儿，甚至产妇都被他们毫不留情地从床上拖下来，推到公路旁边的沟里去。有一个走狗亲手抓住一个快分娩的女人的头发，把她从床上拖下来扔到街上，这样来寻开心。大批军队和警察站在那里，只要有人抵抗或只要指挥这种暴行的治安法官一示意，就立刻动武。但工人们连这也忍住了，没有作任何反抗。矿主们希望工人使用暴力，并竭力用一切手段来引起他们反抗，以便找到借口用军队来结束罢工；但是被赶到街上来的矿工们记住了他们的总代理人的劝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不声不响地把他们的家具搬到多沼泽的草地上或收完庄稼的田里，继续耐心地等候着。其中有些人因为找不着更好的地方，就露宿在公路两旁的沟里；另一些露宿在别人的地段上的，因为“他们造成了半辨士的损失”而受到法庭的追究，被处以1英镑的罚款，他们当然交不出这笔罚款，就只好坐监牢。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庭就这样在去年(1844年)多雨的深夏在露天里度过了八个多星期。除了床上的印花布帐子，他们和婴儿就再没有其他可以遮蔽的东西；除了工会的微薄的补助和小铺老板的愈来愈少的赊欠，他们就再得不到其他的帮助。那时，德勒穆的一个拥有很多煤矿的伦敦德雷勋爵曾以他的高贵的愤怒来威吓“**他的城市**”西恩的小铺老板们，不准他们再赊东西给“**他的**”倔强的工人。这位“高贵的”勋爵在整个罢工期间

成了一个道地的小丑，因为他老是对工人发布一些傲慢得可笑而文理不通的“命令”，这些“命令”除了成为全国的笑料，就再也达不到别的目的[①]。矿主们看到无论什么办法都无济于事，就花了很多钱从工人运动还没有发芽的爱尔兰和威尔士的偏僻地方，雇人到他们的矿上来工作；这样一来，工人彼此之间的竞争又恢复了，罢工工人的力量被摧毁了。矿主们强迫工人脱离工会，和罗伯茨断绝关系，并接受矿主所提出的条件。煤矿工人对雇主的历时五个月的伟大斗争，被剥削者以值得我们极力称颂的毅力、勇敢、觉悟和理智进行的斗争，就这样在9月初结束了。这样一个4万人的群众斗争，需要多么高度的真正人类的文化、热忱和坚强的意志呵！我们知道，1840年“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还把这些人描写成极其粗野的和毫无道德的人。而这种压迫是多么残酷呵！它把这4万人逼得像一个人一样地站了起来，好像一支军队，不仅有纪律而且为一个愿望、一个意志所鼓舞，用最大限度的冷静和镇定把斗争一直进行到再反抗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的时候；而且这是什么样的斗争呵，这不是在和看得见的可以击败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在和饥饿与匮乏、贫穷与露宿作斗争，和自己的、由于富人的残酷而达到疯狂地步的激情作斗争。假如工人使用了暴力，那末他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就会遭到枪杀，几天之后矿主就会得到胜利。他们守法并不是由于害怕警察的棍子，而是事先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是工人的觉悟和自制力的最好证明。

就这样，工人虽然无比地坚强，这一次还是被资本家打败了。

---

① ㊀ 天下本无新奇之事，至少在德国是如此。我们的“施杜姆大王”也不过是英国模型的翻版而已，这一模型在它的本国早已被人遗忘，而且不可能存在了。——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但是斗争并不是没有结果的。首先，持续了十九个星期之久的这次罢工使英格兰北部的煤矿工人永远脱离了以前所处的精神睡眠的状态。他们苏醒过来了，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利益，参加了文明的运动，首先是工人运动。把矿主对工人的一切暴行揭露无遗的这一次罢工，最终唤起了这些工人中间的反抗精神，至少把他们当中的四分之三的人变成了宪章主义者，而3万个这样坚忍不拔和经得起考验的人，对宪章派确实是一笔宝贵的财产。其次，在合法的范围内延续了这样久的罢工和伴随着罢工的积极的宣传，毕竟引起了社会舆论对煤矿工人状况的注意。利用对煤炭出口税问题辩论的机会，下院中唯一坚决拥护宪章主义的议员托马斯·邓科布在议会中提出了煤矿工人状况的问题，争得了在下院讲坛上宣读他们的请愿书的机会，并且发表了演说，迫使资产阶级的报刊至少在报道议会的辩论时把全部事情做了正确的描述。这次罢工以后不久，哈斯威尔发生了一次爆炸。罗伯茨来到了伦敦，要求谒见皮尔，并以煤矿工人代表的身分坚决要求彻底调查这次爆炸事件。他终于达到了委派英国地质学界和化学界的第一流权威赖尔教授和法拉第教授去肇事地点进行调查的目的。由于这次爆炸以后不久又发生了好几次爆炸，而且罗伯茨又把关于这些爆炸的记录送给了首相，所以首相答应在最近的一次议会会议（也就是今年—— 1845年—— 这一次）中，如果可能的话，提出一个为保护工人所必需的各种措施的法案。如果煤矿工人不在这次罢工中表明自己是爱好自由的值得尊敬的人，如果他们不委托罗伯茨来管理他们的事务，那末这一切成就都是不会有的。

北方的煤矿工人被迫解散自己的工会和被迫解聘罗伯茨的消息刚一传出，郎卡郡的煤矿工人就组织了一个约有1万工人的工

会，并保证给他们的总代理人1200英镑的年薪。去年秋天，工会每月收入的款项都在700英镑以上，其中约有200英镑用做薪俸、讼费等等，其余的大部分是用来补助失业工人或者由于和雇主冲突而罢工的工人。工人就这样愈来愈觉悟到，他们团结起来就会成为一个相当巨大的力量，在最必要的时候是能够向资产阶级挑战的。这种觉悟是一切工人运动的重大成果，它由于工会的建立和1844年的罢工，才出现在英国煤矿工人中。再稍微过一些时候，在觉悟和毅力方面至今还落后于产业工人的煤矿工人，就能够和产业工人相比，并且在各方面都将会同他们齐头并进。资产阶级脚下的地基就这样逐渐地动摇起来，总有一天，资产阶级的整个国家的和社会的建筑物将连同它的基础一同倾复。

但是资产阶级是不听警告的。煤矿工人的反抗只是使他们更加残酷；他们并不认为这应该使他们更加理智，不认为这是整个工人运动前进的一步，而认为这只是一个机会，可以用来对这些竟愚蠢到不同意继续忍受从前的待遇的人群发泄怒气。资产阶级认为没有财产的人们的正义要求只不过是死不知足，是对“上帝和人们安排好的秩序”的疯狂的反抗，至多也只是“以鼓动为生的、懒惰得不愿意工作的、恶意的煽动家”的成功，这是必须用一切手段镇压下去的。资产阶级企图——自然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企图——在工人面前把不得不靠工会来养活的罗伯茨和工会的许多代理人说成是**从他们**这些穷工人口袋里骗去最后一文钱的狡猾的骗子。当你看到有产阶级这样疯狂的时候，当你看到他们被眼前的利益迷惑得连时代的最明显的标志都看不出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放弃和平解决英国社会问题的任何希望。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暴力革命，毫无疑问，这个革命是不会让人们长久等待的。

农业无产阶级

我们在“导言”里已经看到，由于以前存在过的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结合已经解体，空出来的小块土地集中到大佃农手里，小农被占优势的大农的竞争所排挤，他们和小资产阶级及以前过着小康生活的工人一起破产了。小农不再像过去那样自己就是土地所有者或佃农，他们被迫抛弃了自己的耕作，到大佃农和大地主那里去当雇农。有一个时期，他们的新的状况虽然比过去坏，但是还算过得去。当时人口的增长和工业的发展是步调一致的，但后来工业发展有些缓慢了，机器的不断改进已经不容许工业全部吸收来自农业区的过剩的劳动人口。从这时起，从前只是在工厂区才看得到而且也只是偶尔才看得到的贫困现象，也在农业区出现了。此外，历时二十五年的对法战争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结束了。在战争期间，战区生产缩减、输入停止以及必须用粮食供应在西班牙的不列颠军队，引起了英国农业的人为的繁荣，此外，大批劳动力还脱离了和平的劳动。而现在，输入的阻碍、输出的必要和工人的缺乏一下子都不存在了，其结果就是英国人所说的 agricultural distress，即农业灾难。农场主不得不以很低廉的价格出售自己的粮食，因而他们也只能支付很低的工资。为了提高粮价，议会在1815年通过了谷物法，在小麦价格每夸特低于80先令时，禁止粮食输入。后来，这个自然是无济于事的法律经过了多次的改变，但是这并没有减轻农业区的贫困。唯一的结果就是，这个在外国的

自由竞争存在时已经危在旦夕的急病现在变成了慢性病，它均衡地但更严重地危害着农业工人。

在农业无产阶级出现后的初期，在这里曾建立了类似工业中刚被摧毁了的宗法关系，即目前在德国几乎到处都存在着的雇主和雇农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存在的时候，工人的贫困还不这么严重，也没有这样普遍；雇农和农场主共甘苦，雇主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解雇他们。但是现在完全变了。雇农几乎全成了短工，农场主只是在需要他们时才雇用他们，因此，他们整星期整星期地完全没有工作，特别是在冬天。在宗法关系下，雇农和他们的家属一起住在农场主的庄园里，他们的孩子在那里长大，农场主当然也竭力在自己的庄园里给这一代找点活干，当时打短工只是例外而不是常规，那时每一个农场里的工人，严格地说，都比所需要的多些。所以农场主也乐于摧毁这种宗法关系，把雇农从农场主的庄园里赶出去，使他们变成短工。在19世纪20年代末，这种情况几乎到处都有。结果，用物理学的术语说，从前处于潜伏状态的“过剩”人口，现在释放出来了，工资降低了，济贫捐也大大地增加了。从这时起，农业区成了**慢性贫穷**的发源地，而工厂区则成了**周期贫穷**的发源地，修改济贫法是政府对乡村日益贫困化所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此外，由于大农场制度的不断发展引起了脱谷机和其他机器的应用，由于田间工作中采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这种情形现在已经十分普遍，它的后果不久前甚至已成为官方一个特别委员会的调查对象），所以这个部门里也出现了大批的失业工人。这样，我们便看到，工业生产的制度也侵入到这里了：建立了大农场，摧毁了宗法关系（这种关系正是在这里才具有巨大的意义），采用了机器、蒸汽发动机以及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把劳动人民中这个还没有被触动的最保守的部分也卷到革命运动中来

了。但是农业中的停滞现象维持得愈长久，工人现在身受的打击就愈沉重，旧的社会结构的解体在这里也表现得愈明显。“过剩人口”是一下子出现的，而且不能像在工业区里面那样用扩大生产的办法来吸收他们。只要产品有人要，新的工厂随时都可以建立，但是新的土地是创造不出来的，而耕种公共的荒地又是冒险的投资，所以战后开垦荒地的投资很少。这些变化所引起的必然的结果，就是工人彼此间的竞争达到了最高峰，而工资则降到最低限度。当旧的济贫法存在的时候，工人们还可以从济贫金中得到一点救济；因此，工资就更加下降，因为农场主尽可能把更多的开支转移到济贫金上面去了。这使得随着过剩人口的出现本来已经大为增加的济贫捐更加增多，并促使新济贫法的出现，这点我们以后将要谈到。但是情况并没有因为有了新的济贫法而有所改善。工资没有提高，“多余的”人口没有消失，新法律的残酷只是激起了人民的极端愤怒。甚至最初已经缩减了的济贫捐几年后又回升到原来的水平。新法律的唯一结果就是：以前总共有300—400万半赤贫者，现在却有100万完全的赤贫者，其余的仍然是半赤贫者，但已经得不到任何救济了。农业区的贫困每年都在加剧。人们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整家整户的人每星期就靠六七个或七八个先令过活，有时候连这一点钱也没有。有一个自由党的议会议员在1830年已经描述了这部分居民的状况，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英国农民（即农业短工）①和英国贫民这两个词是同义语。他父亲是贫民，他母亲的奶没有养分；他从小就吃得很坏，从来没有吃饱过，直到现在，只要没有睡着，就几乎老是感到无可满足的饥饿的痛苦。他衣不蔽体，燃料勉

①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强够做一顿简单的饭，因此，寒冷和潮湿是他的不速之客，和坏天气一起来到，也和坏天气一起告别。他结了婚，但是，他不知道做父亲和丈夫的乐趣。他的妻子和儿女都受冻挨饿，经常害病，无依无靠，像他自己一样老是忧虑、沮丧，自然出就贪婪、自私，并且令人讨厌。因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看到他们就一肚子气（hates the sight of them），他之所以回到自己的茅屋里去，只是因为它比起一道篱笆来总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躲避风雨的地方。他要养家，但是又办不到；于是他就只好去要饭，干各种各样的丢人的勾当，直到公然进行欺诈。即使他很想学他那个阶级中较强悍的人，去当一个真正的盗猎者或走私者，但他没有勇气；可是他一有机会就偷窃，并且教自己的孩子撒谎和偷东西。他对较富有的邻居唯命是听、卑躬屈膝，这说明这些邻居对他的态度是粗暴的、怀疑的；因此，他惧怕他们，憎恨他们，但从不敢用暴力去对付他们。他彻头彻尾地堕落了，屈辱得连失望的劲头也没有了。他的不幸的生命是短促的，风湿病和哮喘病把他带到习艺所去，在这里，他对过去没有任何愉快的回忆就吐出了他最后的一口气，把位置让给另一个也将和他一样生活、一样死去的不幸的人。”

我们的作者补充道，除这类农业短工外，还有另一类较强悍的而且在体力、智力和道德方面都比较发展的人；这些人虽然也过着同样穷困的生活，但他们不是在这种环境里出生的。他们比较关心家庭，但他们是走私者和盗猎者，常常同森林看守者和海岸警备队发生流血冲突，由于常常坐牢，他们更加残酷无情地反对社会，他们对有产者的仇恨也不亚于第一类人。我们的作者最后说：

“由于礼貌的关系（by courtesy），人们就用莎士比亚的话称这类人为‘勇敢的英国农民’（《bold peasantry of England》）。”㈠

㈠ 议会议员爱·吉·威克菲尔德“被揭露了的斯温，或农村中纵火的原因”，1831年在伦敦出版的小册子（E. G. Wakefield, M. P.《Swing unmasked, or the Gause of Rural Incendiarism》. London, 1831. Pamphlet.）。上面引证的几段话见该书第9—13页；在翻译的时候，我们略去了原文中有关当时还存在的旧济贫法的地方。——恩格斯原注

到目前为止，对于英国农业区的大部分短工来说，这个描述也还是正确的。1844年6月，“泰晤士报”派了一个记者到这些地方去调查这类人的状况，他的报告完全和这个描述相符合。某些地区每星期的工资不超过6先令，即不比德国许多地区的工资高，然而英国的食品价格却至少比德国高1倍。这些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那是不难想像的。他们的食物又坏又少，衣服破破烂烂，住所狭窄简陋，只是一间没有任何设备的可怜的小茅屋；年轻人住的是夜店，在这里男人和女人几乎一点也不隔离，这就引起了混乱的性关系。一个月中只要有几天没有工作，这些人就会陷到贫穷的深渊里去。而且由于他们住得分散，所以不能联合起来成立工会争取提高工资；如果有一个人因为工资过低而拒绝工作，那就会有几十个失业者和习艺所里出来的人来填补他的位置，即使是最微薄的工资，这些人也是乐于接受的，而拒绝工作的人就被认为是懒汉、二流子，他除了被送到那个可恨的习艺所去，不会从济贫所得到任何救济。要知道，掌管济贫所的人就是那些农场主，而这个拒绝工作的人又只有从他们或他们的邻居和熟人那里才能得到工作。这并不是关于英国的某一个农业区的偶然的报道；不，无论在南部或北部，东部或西部，贫穷都同样地严重。萨福克和诺福克的工人状况同戴文郡、汉普郡和萨塞克斯的工人状况没有丝毫差别；无论在多尔塞特郡、牛津郡或在肯特、萨雷、巴金汉郡和剑桥郡，工资都是一样地低。

对付农业无产阶级的一种特别残酷的办法是狩猎法，这种法律在任何地方也不像在英国这样严厉，虽然英国的飞禽走兽要多少有多少。按照英国农民由来已久的习惯和传统，盗猎是勇敢无畏的一种十分自然而高尚的表现，加之农民一贫如洗，而贵族们则

恣意在林园里养了很多兔子和野禽供自己娱乐，这两方面的对比更加推动农民踏上这条道路。农民布下套索，有时候也用枪打死只把飞禽走兽，这对贵族根本不会有什么损失，因为飞禽走兽很多，但**农民**却给他的挨饿的一家人弄到了一顿烤肉吃。他要是被抓住，就得坐牢，如果再犯，就至少要被流放七年。由于惩罚这样严厉，就常常发生盗猎者和森林看守者的流血冲突，结果每年都发生许多起杀人事件。因此，森林看守者的职务不但危险，而且还是不名誉的和受人鄙视的。去年有两个看守者宁愿让枪弹穿过自己的脑袋，也不愿再干这一行。这就是土地贵族们为了狩猎这种高尚的娱乐要人们付出的“低廉的”代价！但是这同高贵的《lord of the soil》〔“领主们”〕又有什么相干呢？过剩人口多几个或少几个不是完全一样吗？即使这种“多余的”人口有一半由于狩猎法而送了命，那末对剩下的一半不是更好吗？这就是英国有产阶级的博爱主义的论调。

但是，尽管农村的生活条件——住处分散、环境安定、职业固定，因而思想也就保守——对任何发展都很不利，贫穷和匮乏还是在这里产生了自己的结果。工厂工人和矿业工人很快就越过了反抗社会秩序的第一个阶段，即个别的人用犯法行为来表示直接反抗的阶段；而农民直到现在还停留在这个阶段上。他们进行社会战争的惯用的手段就是纵火。七月革命后，即1830—1831年的冬季，纵火第一次成为普遍的现象。还在10月初，在萨塞克斯及其邻近的几个郡里，由于海岸警备队的加强（这样一来，走私就困难了，从而，用一个农场主的话说，使整个海岸区都破产了），由于新的济贫法的通过，由于工资低和使用机器，就已经发生了骚动并且扩展到全区。冬天，农场主场地上的粮食堆、干草堆，甚至他们住宅近旁的

谷仓和畜圈都被烧毁了。几乎每夜都有几次这样的大火，这使得农场主和土地占有者皇皇不安。可是罪犯几乎从来没有抓到过，于是人民就把这些放火事件都推到一个被叫做“斯温”〔《Swing》〕的神秘人物身上。人们绞尽脑汁地去想这个**“斯温”**究竟是谁，究竟是什么引起了农村贫民的这种叛逆精神；至于那种伟大的动力——**贫困**、压迫，却很少有人想到，而在农业区确实没有一个人想到。从那时起，每年一到冬天，即短工失业的季节，都一再发生纵火事件。1843—1844年的冬天，纵火事件异常频繁。我手头有几号这个时期的“北极星报”，每一号都报道了好几起纵火事件，并说明了消息的来源。下面没有提到的那几号“北极星报”都是我手头没有的，但是在那几号里面一定也有不少关于纵火事件的报道。何况这样的报纸自然也不可能把所有这类事情都报道出来。1843年11月25日，“北极星报”报道了两起纵火事件，并引证了不少以前报道过的这类事件。12月16日“北极星报”报道：在培德福德郡，两星期来每夜都发生几次纵火事件，因此人心普遍不安。在最近几天有**两处**大农场被烧毁。在剑桥郡有**四处**大农场被烧毁，在哈特福郡有**一处**农场被烧毁；此外，在几个地方还发生了**十五起**纵火事件。12月30日，诺福克发生**一起**纵火事件，萨福克发生**二起**，艾塞克斯发生**二起**，哈特福郡发生**三起**，柴郡发生**一起**，郎卡郡发生**一起**，在得比、林肯和南部共发生**十二起**。1844年1月6日一共发生纵火事件十起，1月13日发生七起，1月20日发生四起。从这以后，该报每周平均报道三四起纵火事件，而且这种事情并不像往年那样只继续到春天，而是一直继续到七八月。我从收到的英国报纸和德国报刊的报道中看到，1844—1845年的冬天来临时，这种犯罪行为更加普遍起来了。

关于英国的纯朴宁静的农业区中的这种情况，读者们会说些什么呢?这难道不是社会战争吗?这种情况难道是自然的和可以持久的吗?但是这里的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非常愚蠢而保守，正像工业区的厂主和一般资产者一样，他们看不到不能给自己带来现金的一切东西。资产者向自己的工人说，如果废除谷物法，他将给他们各种好处，而土地所有者和大部分农场主则向工人们说，如果保存这些法律，他将使他们得到人间天堂。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有产者都无法争取工人来支持他们一心想实现的幻想。无论工厂工人或农业工人对谷物法的废除或保存都是漠不关心的，然而这个问题对于他们都很重要。谷物法一旦被废除，自由竞争，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就会发展到极端；谷物法废除后，在现存关系的范围内，进一步发展的任何可能性都将消失，而唯一可能的进步就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对于农业工人来说，下述的理由使这个问题显得更为重要。粮食的自由输入决定了——至于怎样决定，我**在这里**不可能谈到——农场主不再依赖于土地占有者，换句话说，就是托利党的农场主变成了自由党的农场主。在这方面反谷物法同盟已经做了不少工作，而这就是它唯一的功绩。但是，如果农场主变为自由党人，即自觉的资产者，那末他们的工人就会变为宪章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即自觉的无产者。有其因必有其果。目前在农业无产者中已开始出现了新的运动。**自由党的**土地占有者**赖德诺**伯爵为了通过反对谷物法的决议于1844年10月在他的领地所在地**海华斯**附近举行的会议就证明了这一点。工人对这些法律非常冷淡，但是他们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譬如说要求以低廉的租金出租小块土地，而且他们当面向赖德诺伯爵说出了不少辛辣的真理。这样，工人阶级的运动就深入到偏僻、保守、精神上陷入酣睡状态的农业区去了，而且由于这些地

方普遍穷困，运动就像在工厂区那样，很快扎下了根并且活跃起来。

至于农业工人的宗教感，那当然比产业工人要强些，但他们和教会的关系还是很紧张，因为在这些地区里几乎所有居民都是信仰英国国教的。“晨报”的一个记者以**“一个跟在犁后面吆喝的人”**㊀做笔名报道了他在农业区的旅行，就中叙述了他和几个短工在教堂门口的谈话：

“我问他们中的一个人，今天的传教士是不是他们自己的牧师。‘是呀，去他的吧（Yes，blast him），他是我们自己的教士；他老是在乞讨，从我认识他那天起，他一直就在乞讨’（传教士呼吁大家捐钱，用来使异教徒改宗）。另一个人补充说：‘从我认识他那天起，我还没有见过一个教士不老是为这为那向人乞讨的。’一个刚从教堂里出来的女人说：‘是呵，工人的工资老是下降，可是看看那些有钱的懒汉吧，教士们就是和这些家伙一起吃、一起喝、一起打猎的。天哪，我们宁愿到习艺所去，宁愿饿死，也不愿替那些到异教徒那里去的教士出钱。’另外一个女人说：‘干吗他们不把每天老在萨里斯柏雷大教堂里哼哼唧唧的那些教士搞到那里去？在那个教堂里，除了石头，谁也不听他们的。为什么**这些家伙**不到异教徒那里去？’最初和我谈话的那个老头说：‘**这些家伙**是不会到那里去的，他们有钱，他们的土地多得不得了，但是为了摆脱那些穷教士，他们就向人捐钱；我很清楚他们要的是什么；我早就把他们看透了。’我问：‘这是怎么回事呀，我的朋友们，难道你们老是怀着这种痛恨牧师的心情走出教堂吗？你们为什么老到教堂里去呢？’一个女人回答道：‘我们为什么去？只要我们不想丢掉一切，不想丢掉工作和一切，我们就得去；当然我们只好去。’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他们到教堂去的话**，他们就可以得到燃料供给方面的一些小小的优先权和一小块种土豆的地，当然这块地是要他们付租金的。”

我们的记者在描述了这种贫困和愚昧以后，就用以下的话作

㊀ 亚历山大·索麦维尔的笔名。——编者注

为结束：

“现在我敢断言，这些人的状况、他们的穷困、他们对教堂的仇恨、他们对教会的显贵们的外表上的顺从和内心里的怨恨，**在英国所有的农村教区里都是常例**，相反的情形倒只是例外而已。”

英格兰的农民向我们表明大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人数众多的农业无产阶级在农业区里引起的后果，而在**威尔士**我们却看到了小佃农的破产。在英格兰的农村教区里重演着无产者和大资本家之间的对抗，而威尔士农民的遭遇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不断破产相类似。威尔士的农民多半只是小佃农，他们不能像条件比较好的英格兰大农场主那样合算而便宜地出卖自己的农产品，但是他们却不得不在同一市场上和这些大农场主竞争。同时也应该注意到，许多地方的土壤只适宜于收入很少的畜牧业，而威尔士的农民由于眷恋自己民族的孤独性，就比英格兰的农场主要保守得多。但是，首先是他们相互间的竞争、他们和英格兰邻居的竞争以及这个竞争所引起的地租的提高，使他们破产到几乎不能维持生活的程度，而由于他们看不出自己的状况恶劣的真正原因，他们就把这种原因归之于各种各样的小事情，例如高额的通行税等等。当然，高额的通行税也妨碍农业和贸易的发展，但是由于每一个承租土地的人都把这些税算到固定的开支里面去，所以归根到底这些税还是由土地占有者负担的。此外，佃农们也都极端憎恨新的济贫法，因为他们本身经常有受它支配的危险。1843年2月，威尔士农民日积月累的不满情绪在有名的“利碧嘉骚动”中爆发出来了。许多男人穿上女人的衣服，涂黑了脸，结成几个武装大队，袭击了那些在英国用来代替关卡拦路杆的大门，在响亮的欢呼声和射击声中捣毁了这些大门，还打坏了通行税征收入的小房子，以神秘的“利碧

嘉”的名义写恐吓信，有一次甚至还袭击了卡马登的习艺所。后来，当调来了军队并且加强了警察时，农民们便异常巧妙地把他们引入迷途，当军队被四面山岗上传来的号角声引诱着向相反的方向推进的时候，农民们便打坏了这里的大门。当军队增加得太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放火，甚至杀死个别的人。像往常一样，这些较大的犯法行为就是运动的尾声。一些人由于不同意这种斗争方式，另一些人由于害怕，他们都脱离了运动，结果自然而然地又平静了下来。政府派了一个委员会去调查事变的经过和原因，事件就这样结束了。然而农民的贫困还是没有终止，而且，因为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下这种贫困只会加剧，不会减弱，总有一天会引起比这个幽默的利碧嘉化装跳舞会更加严重的事件。

我们在英格兰看到了大农场制度的结果，在威尔士看到了小租佃制的结果，而在**爱尔兰**我们就会看到土地分散的后果。爱尔兰的居民极大多数是小佃农，他们租了一间孤零零的简陋不堪的小土房和一小块种土豆的地，这块地也只能勉强保证他们在冬季里有最必需的食物。由于这些小佃农之间存在着剧烈的竞争，地租达到了闻所未闻的高度，竟比英格兰的高1—2倍甚至3倍。每一个打短工的农业工人都想成为佃农，因此，尽管土地本来已经分散得很厉害，却仍然有很多短工想租到一小块土地。虽然大不列颠的耕地有3200万英亩，而爱尔兰只有1400万英亩，虽然大不列颠每年出产15000万英镑的农产品，而爱尔兰只出产3600万英镑的农产品，但是，爱尔兰的农业工人却比大不列颠**多**75000人[一]。这一极不相称的情况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在爱尔兰为了土地而进行的竞

[一] 济贫法委员会在1837年的议会会议上所提出的关于爱尔兰的报告。——恩格斯原注

争是多么剧烈，而当我们注意到英格兰农业工人的生活已经极端穷困的时候，这一点就特别清楚了。竞争的后果自然是地租提高，使佃农的生活并不比短工的生活好多少。这样，爱尔兰人民就被束缚在令人难以忍受的贫困中，这种贫困在目前的社会关系下他们是摆脱不了的。这些人住在连用来关牲畜都不太适合的简陋的小土屋里，只有勉强能够维持一个冬天的食粮；正如上面引用过的报告里所说的那样，他们一年里有三十个星期可以靠土豆吃个半饱，而在其余的二十二个星期中就什么也没有了。到了春天，当储存的土豆已经吃完或者发了芽不能再吃的时候，妻子就带着孩子，提着小锅出门讨饭；家里的男人把土豆种下以后，就到附近的地方或英格兰去找工作，到收获的时候才又回来和家庭相聚。十分之九的爱尔兰乡村居民就是这样过日子的。这些人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一样，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停留在只有半文明的国家里才可能有的最低的发展水平上。根据上面引用过的报告，在8500000居民中，有585000个当家人过着极端贫困（destitution）的生活，根据艾利生郡长所引用的其他资料㊀，爱尔兰有2300000人没有社会的或私人的救济就无法生活，换句话说，有27%的居民是贫民！

这种贫穷的原因就在于现代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竞争，只是竞争在这里采取了另一种形式，即土地分散的**形式**而已。有人曾企图找出别的原因来，他们断定贫穷的原因是佃农和土地占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土地占有者把大块的土地租给大佃农，大佃农把这些土地分成小块租给其他的佃农，这些佃农再把这些土

㊀ “人口原理”第2卷。——恩格斯原注

地出租给第三者，如此等等，这样一来，在土地占有者和那些实际耕种土地的人之间，有时候甚至有十层中间人夹在里面。有人认为贫穷的原因是那个实在可耻的法律，根据这个法律，直接向土地占有者租地的人不缴地租时，土地占有者有权把实际的耕种者从土地上赶走，即使他已经把地租缴给了那个和他订合同的中间人。但是这一切都只决定贫穷表现的形式而已。假定小佃农本身变成了土地占有者，结果又会怎样呢？即使大多数的小佃农都不用缴地租，他们也不能够靠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过活；即使情况有所改善，但人口不断迅速的增加也会在几年内就使一切都回到原来的水平上去。那些情况好转的人养活的孩子，现在由于贫穷和苦难，在幼年时就夭折了。也有人说，这种贫穷应归咎于英格兰人对爱尔兰人民的无耻的压迫。固然这种压迫能**加速**贫穷的到来，但它并不是贫穷到来的原因。还有人指出，贫穷的原因是强加于一个天主教民族的属于新教的国教教会，但是，如果把国教教会取之于爱尔兰人的一切分摊一下，每人还摊不到两个塔勒；此外，什一税税款虽然由佃农缴纳，但这种税并不是向佃农征收的，而是向**土地占有者**征收的。现在，在1838年的折现法案通过以后，什一税是由土地占有者自己缴纳的，但是他相应地提高了地租，佃农的状况也就没有得到改善。类似这些很少能说明问题的解释，还可以举出几百种来。贫穷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离开这一点，只能找到贫穷的某种表现形式的原因，但是找不到贫穷本身的原因。在爱尔兰，贫穷以现在这种形式而不以某种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原因就在于人民的民族性格及其历史的发展。爱尔兰人按其整个民族性格来说是和拉丁民族，和法国人，特别是和意大利人相似的。这个民族的缺点，我们已经用卡莱尔的话描述过了。现在让我们来听听爱尔兰

人讲的话，他说的毕竟比那位特别偏爱日耳曼性格特点的卡莱尔所说的更接近于真理：

“他们不安静，但同时也懒惰（indolent），他们机警而又轻率、急躁，没有耐性而又缺乏远见；他们生来就勇敢，落落大方；受到侮辱就马上报复或立即宽恕，交朋友快，绝交也快；他们天才四溢，但是判断力却差得可怜。[一]”

在爱尔兰人身上，感情和热情无疑地是占优势的，理性必须服从它们。爱尔兰人这种重感情的容易激动的性格使他们不能深思熟虑，妨害他们从事冷静的坚忍的活动。这种人是根本不适宜于从事目前那样的工业劳动的。所以他们还继续从事农业，而且还是在最低的水平上从事农业。因为这里的小块土地并不像在法国和莱茵河地区那样人为地由大领地分割而成[二]，而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所以用投资的办法来改良土壤是不可想像的。据艾利生计算，要投资12000万英镑，才能使爱尔兰的土壤达到英格兰那样本来就不算高的生产率水平。英格兰移民本来有充分的可能来提高爱尔兰人民的文化水平，但他们只是极端残酷地剥削爱尔兰人民，而爱尔兰移民却给英国民族带来了一种酵素，这酵素将来是会产生结果的；爱尔兰对英格兰移民是没有什么可以感谢的。

爱尔兰人民试图摆脱无法生活的现状的尝试，一方面表现为恐怖行动，这种行动在爱尔兰的农业区里，特别是在南部和西部，现在已成为日常现象：大多数场合是杀害直接的敌人——土地占

[一] “爱尔兰的状况”1807年伦敦版，1821年第2版，小册子（《The State of Ireland》. London，1807，2nd edition，1821. Pamphlet.）。——恩格斯原注

[二] 这是一个错误。小经济从中世纪起一直是农业中占优势的经济形式。因此，小农经济在革命前就已经存在了。革命只是改变了土地的所有权：它从封建主手里夺取了土地所有权，直接或间接地把这所有权交给农民。——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有者的代理人和忠实的奴才、新教徒移民、大佃农（他们的田地是由成百个被赶走的人家的小块土豆地拼凑起来的）等等；另一方面表现在为取消和大不列颠合并[120]而进行的鼓动上。总观上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没有受过教育的爱尔兰人不能不把英格兰人看做自己的直接的敌人，对他们说来，前进的第一步就是争取民族独立。但是同样也很清楚，取消合并决不能消灭贫困，而只能表明，爱尔兰贫困的原因应当在国内寻找，而不应当像现在那样认为要到国外去找。但是，是否真正需要实现爱尔兰分离才能使爱尔兰人明白这一事实，这个问题我不打算在这里加以分析。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宪章主义或社会主义，在爱尔兰都没有获得特别的成就。

我就在这里结束有关爱尔兰的论述，因为1843年为取消合并而进行的鼓动和奥康奈尔审判案，已经使德国的人们日益了解到爱尔兰的贫困状况了。

这样，我们已经通过不列颠岛屿上无产阶级活动的各个部门，观察了他们的状况，并到处发现贫穷、困苦和完全不是人所应有的生活条件。我们看到，不满情绪如何随着无产阶级本身的成长而产生和增长，看到这种不满情绪如何扩大起来并具有了组织形式；我们也看到无产阶级为了反对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公开斗争。我们研究了决定无产者的命运、希望和忧虑的根源，并且发现他们的状况没有任何改善的希望。我们有机会在许多实例中观察了资产阶级对待无产阶级的态度，并确信资产阶级所关心的只是自己，只是自己的私利。但是为了不至于对资产阶级不公平，我们应当比较仔细地研究一下他们的行动。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态度

我在这一章里所谈的资产阶级，也包括所谓的贵族阶级在内，因为说它是贵族阶级，说它享有特权，这只是对资产阶级而言，并不是对无产阶级而言。无产者把它们二者都仅仅看做有产阶级，即资产者。在财产特权面前，其他一切特权都算不了什么。区别只在于狭义的资产者是和工厂无产者、部分地和矿业无产者打交道，作为**农场主**的资产者是和农业工人打交道，而所谓贵族只是和一部分矿业无产阶级以及农业无产阶级相接触。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阶级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堕落，那样自私自利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那样腐朽，那样无力再前进一步。在这里我指的首先是狭义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反对谷物法的自由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㊀。

在这种贪得无厌和利欲熏心的情况下，人的心灵的任何活动都不可能是清白的。当然，这些英国资产者都是很好的丈夫和父亲

㊀ 卡莱尔在他的1843年出版于伦敦的“过去和现在”（《Past and Present》，London，1843）一书中绝妙地描述了英国资产阶级及其令人作呕的贪欲；该书的一部分我已经译出，登在“德法年鉴”上，希读者参阅121。—— 恩格斯原注

，他们都具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私德，在日常的交往中，和其他一切资产者一样，也是一些可敬的和体面的人物；在商业关系上，他们甚至比德国人好些，他们不像我们的小商人那样讨价还价，斤斤较量，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归根到底，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还是个人的利益，特别是发财的渴望。有一次我和这样一个资产者在曼彻斯特街上走，和他谈到工人区的恶劣的不合卫生的建筑体系，谈到这些地区的可怕的居住条件，我说我还没有看到过比曼彻斯特建筑得更坏的城市。他静静地听完这一切，在走到拐角上和我告别的时候，他说："and yet,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money made here（但是在这里到底可以赚很多钱）。再见，先生！"英国资产者对自己的工人是否挨饿，是毫不在乎的，只要他自己能赚钱就行。一切生活关系都以能否赚钱来衡量，凡是不赚钱的都是蠢事，都不切实际，都是幻想。所以政治经济学这门专讲赚钱方法的科学就成为这些人所喜爱的科学。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政治经济学家。厂主对工人的关系并不是人和人的关系，而是纯粹的经济关系。厂主是"资本"，工人是"劳动"。而当工人不愿意让别人把自己当做这样一种抽象的东西的时候，当他肯定自己不是"劳动"而是人（的确，这个人除具有其他特点外，也还具有劳动的能力）的时候，当他认为自己决不能被当做"劳动"、当做商品在市场上买卖的时候，资产者就想不通了。他不能了解他和工人之间除了买卖关系还有别的关系存在；他不把工人看做人，而仅仅看做"**手**"（hands），他经常就这样当面称呼工人；正如卡莱尔所说的，除**现钱交易**外，他不承认人和人之间还有其他任何联系。甚至他和自己的老婆之间的联系百分之九十九也是表现在同样的"现钱交易"上。由于资产者的统治，金钱使资产阶级所处的那种可耻的奴隶状态甚至在语言上都留下了它的

痕迹。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值一万英镑（he is worth ten thousand pounds），就是说，他拥有这样一笔钱。谁有钱，谁就“值得尊敬”，就属于“上等人”（the better sort of peo— ple），就“有势力”（influential），而且在他那个圈子里在各方面都是领头的。小商人的气质渗透了全部语言，一切关系都用商业术语、经济概念来表现。供应和需求（supply and demand），这就是英国人用来判断整个人生的逻辑公式。因此，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自由竞争，因此，laissez faire，laissez aller[122]的制度支配着行政、医务、教育，或许不久在宗教方面也会这样，因为国教教会的统治已日渐趋于崩溃。自由竞争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任何国家监督，整个国家对自由竞争是一种累赘，对它来说，最好是没有任何国家制度存在，使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削他人，譬如说，就像在可爱的施蒂纳所鼓吹的“联合会”里那样。但是，资产阶级为了使自己必不可少的无产者就范，就不能不要国家，所以他们利用国家来对付无产者，同时尽量使国家离自己远些。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有教养的”英国人会公开承认这种自私自利。相反地，他用最可耻的伪善的假面具把它遮盖起来。怎么，难道英国的财主就不关心穷人？他们不是已经创办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慈善机关吗？呵，不错，慈善机关！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其实你们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好像这就对无产者有了什么好处似的！这种布施使施者比受者更加人格扫地；这种布施使得本来就被侮辱的人遭到更大的侮辱，要求那些被社会排挤并已失掉人的面貌的贱民放弃他最后的一点东西——人的称号；这种布施

在用施舍物给不幸的人打上被唾弃的烙印以前，还要不幸的人**卑躬屈膝地去乞求**！但是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英国资产阶级自己说的话吧。大半年以前，我在“曼彻斯特卫报”上读到一封给编辑部的信，编辑部把这封信当做极为自然的和合乎情理的东西，不加任何按语就登了出来。下面就是这封信：

“编辑先生！

近来在我们城里的大街上出现了大批乞丐，他们时常企图用他们那褴褛的衣服和生病的样子，或者用令人作呕的化脓的伤口和残废的肢体，以极端无耻的和令人讨厌的方式来唤起过路人的注意和怜悯。我认为，一个不仅已经付过济贫捐而且还给慈善机关捐过不少钱的人，应该说已经有充分的权利要求不再碰到这种不愉快的和无耻的纠缠了。如果城市的警察连保证我们安安静静地在城里来往都做不到，那我们究竟为什么要付出那样多的捐税来供养他们呢？我希望这封信在你们这个拥有广大读者的报纸上发表以后，能促使当局设法消除这种恶劣现象（nuisance）。

永远忠实于您的**一位太太**”

看吧！英国资产阶级行善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会白白地施舍，他们把自己的施舍看做一笔买卖。他们和穷人做**买卖**，对穷人说：我为慈善事业花了这么多钱，**我就买得了**不再受你们搅扰的**权利**，而你们就得待在自己的阴暗的狗窝里，不要用你们的那副穷相来刺激我的敏感的神经！你们不妨继续悲观失望，但是要做得让人觉察不到。这就是我提出的条件，这就是我捐给医院20英镑所换取的东西！呵，基督徒资产者的这种慈善是多么叫人恶心！“**一位太太**”就是这样写的！是的，一位太太！她这样署名是很恰当的。幸亏她没有足够的勇气称自己为**一个女人**！既然“太太们”是这个样子，那末“老爷们”又该怎样呢？人们会说，这封信所说的只是个别情形。不，它正好表现了绝大多数英国资产阶级的

想法，否则编辑部就不会把它登出来，否则一登出来就会引起某种异议，我留意了以后几天的报纸，没有找到这种异议。至于这些慈善行为的效果，**帕金逊**掌教就亲口说过，穷人从他们的穷弟兄那里得到的帮助，比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要多得多。淳朴的无产者深知饥饿的苦楚，所以他们虽然自己也不够吃，还是乐意舍己救人。他们这种援助的意义是与穷奢极欲的资产者所扔出来的那点布施迥然不同的。

在其他方面，资产阶级也装出一副大慈大悲的样子，——但也只是在他们自己的利益需要这样做的时候才如此。他们在政治和政治经济方面便是这样做的。五年来资产阶级一直在竭力向工人表明，他们只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才希望废除谷物法。但事情的真相却是这样：谷物法使英国的粮价保持在高于其他国家的水平上，因而抬高了工资，使厂主难以和其他粮价较低因而工资也较低的国家的厂主竞争。如果废除了谷物法，粮价就会下跌，工资就会接近于欧洲其他文明国家的水平。这一切分明都是从上述的调整工资的原则中产生的。这样就会更便于厂主竞争，对英国商品的需求就会增加，从而对人手的需求也会跟着增加。由于这种需求的增加，固然工资也会重新稍稍提高一点，失业工人也会找到工作，但是这能维持多久呢？英国的特别是爱尔兰的“过剩人口”是足够满足英国工业对工人的需要的，即使它的规模扩大一倍也没有问题；而且从废除谷物法得到的一点点好处过几年就会重新消失，新的危机会跟着到来，我们又得回到原来的处境，因为对工业的第一个刺激也会加速人口的增长。这一切无产者都看得很清楚，并且对资产者直截了当地说过好多次了。可是，厂主们只看到废除谷物法给他们带来的**直接**利益，而且由于目光短浅，甚至不

懂得，从这种措施得来的利益对他们说来也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厂主彼此间的竞争很快就会把他们每个人的利润降低到从前的水平；而他们却不停地向工人大吹大擂地说，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工人，只是为了千百万挨饿的人，自由党的阔佬们才把成百成千的英镑投到反谷物法同盟的金库里去。可是谁不知道，他们不过是想抛出香肠换回火腿，他们打算在谷物法废除后的最初几年内就能十倍百倍地捞回来。但是工人不再上资产阶级的当了，特别是在1842年的起义以后。谁说自己关心工人的幸福，工人就要求他宣布赞成人民宪章来证明自己的诚意。因此，工人反对一切不相干的帮助，因为在宪章里他们所要求的只是赋予他们以**权力**，以便他们能够**自己**帮助**自己**。谁不同意这样，工人便有充分的理由向他宣战，无论他是公开的敌人，还是伪装的朋友。此外，为了把工人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反谷物法同盟采用了最卑鄙的谎言和诡计。它企图使工人相信，劳动的价格和粮食的价格成反比，粮价低，工资就高，反过来也是一样。它企图用最荒唐的论据来证明这个论断；而这个论断本身就比出自任何经济学家之口的任何主张都要荒唐。当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的时候，他们就答应工人说，对人手的需求增加，就会带来最大的幸福。他们甚至无耻地抬着两个大面包模型在街上走，在大的一个上写着：**8辨士一个的美国面包，工资一天4先令**，而在另一个小得多的上面写着：**8辨士一个的英国面包，工资一天2先令**。但是工人并没有上当，他们对自己的老板认识得太清楚了。

要彻底认清这些漂亮诺言的虚伪性，只要考察一下实际生活就够了。上面我们已经看到，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如何千方百计地剥削无产阶级。但是，我们以前看到的只是各个资产者如何各

自冒着风险来剥削工人的情形。现在我们来看看资产阶级如何以政党、甚至以国家政权出面来反对无产阶级。整个立法首先就是为了保护有产者反对无产者，这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因为有了无产者，所以才必须有法律。这一点虽然只是在少数法律条文里直接表现出来，——例如取缔流浪汉和露宿者的法律便宣布无产阶级不受法律的保护，——但是敌视无产阶级却是法律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因此法官，特别是本身就是资产者并且和无产阶级接触最多的治安法官，不用思考就会看出法律本身所包含的这种意图。如果阔佬被传到，或者更正确些说，被请到法庭上来，法官便会因为打搅了他而向他深致歉意，并且尽力使诉讼变得对他有利；如果不得不给他判罪，那末法官又要对此表示极大的歉意，如此等等，结果是罚他一笔微不足道的罚款，资产者轻蔑地把钱往桌上一扔，就扬长而去。但是，如果是一个穷鬼被传到治安法官那里去，那末他几乎总是先被扣押起来，和其他许多像他一样的人一起过一夜；他一开始就被看做罪犯，受人叱骂，他的一切辩护只得到一个轻蔑的回答："呵，我们懂得这些借口！"最后是被处以罚款，可是他付不出这一笔钱，于是只好在监狱里做一个月或几个月的苦工来抵罪。即使不能给他加上任何罪名，他还是会被当做流氓和游民（a rogue and a vagabond——这两个词几乎总是连在一起用的）送进监牢。治安法官的偏袒行为，特别在乡间，实在是想像不到的，而且这种行为已司空见惯，以致所有不大光彩的事件都常常被报纸毫不在乎地而且不加任何评论地登了出来。但是也不可能希望有别的做法。一方面，这些"道勃雷"只是按照法律的原意来解释法律，而另一方面，他们本身就是资产者，他们首先认为本阶级的利益是一切真正的秩序的主要基础。治安法官是这样，警察也是这样。无论资产者

做什么，警察对他总是客客气气，并且严格地依法办事，但是对无产者却粗暴而又残酷；贫穷本身就已经使得无产者有各种罪行的**嫌疑**，同时也剥夺了他对付当局专横行为的法律手段。因此，对无产者来说，法律的保护作用是不存在的，警察可以随便闯进他家里，随便逮捕他，随便殴打他。只是在工会聘请了辩护人，例如煤矿工人聘请了罗伯茨以后，大家才知道，法律的保护作用对无产者说来是多么微小，无产者经常被迫肩负法律的全部重担而享受不到法律的一点好处。

为了加紧奴役无产阶级，有产阶级现在还在议会里不断地向那些还没有完全沉溺于利己主义的议员的较善良的情感进行斗争。公地一块接一块地被掠夺并且被改成耕地，这固然会提高农业生产，但是使无产阶级受到很大的损失。在有公地的地方，穷人可以在那里放驴、放猪或放鹅，孩子们和年轻人也可以随意在那儿游玩和欢跳。现在这种事情愈来愈少了，穷人的收入日益减少，年轻人失掉了游玩的地方，只好上小酒馆去。议会每次开会都要通过一系列开垦公地的条例。1844年的议会会议上政府曾决定要那些垄断一切交通工具的铁路公司适当地降低车费（降到1辨士1英里，约合5银格罗申1德里），使工人也能乘火车旅行，并为此建议各铁路线上每天加开一班三等廉价列车，这时，“可敬的教父”伦敦主教却建议把星期日，把在业工人通常**可以**旅行的唯一的一天作为例外；这样一来，星期日就只许阔人旅行，不许穷人旅行了。但这个建议太露骨太公开：实在无法通过，因此才被否决。可是采取隐蔽方式侵犯无产阶级权利的行为太多了，就是在一次议会会议期间所发生的，我也不可能一一列举出来。我只举出1844年那次会议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个没有名声的议员迈尔斯先生提出了一

个调整主仆关系的法案,这个法案看来完全是无可非议的。政府赞同这一法案,而且把它提交给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去审理。那时英格兰北部发生了煤矿工人的罢工,罗伯茨正带着那些因他的努力而被宣判无罪的工人胜利地遍走全国。后来这个法案由委员会交回来,但里面加了几项专横到极点的条文,特别是这样一条:凡口头上或书面上同意替雇主做某种工作(即使是临时工作)的工人,如果拒绝工作或者有**其他任何不良行为**(misbehaviour),雇主有权把他送到任何一个(any)治安法官那里去;法官根据雇主或他的代理人和监工在宣誓后所提出的证词——即根据原告的证词——可以判处工人两个月以下的徒刑或劳役。这一法案在工人中激起了无比的愤怒,特别是因为这时议会正在讨论十小时法案,而各地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宣传鼓动工作。工人们开了几百次会,给无产阶级在伦敦议会里的辩护人托马斯·**邓科**布送去了成百份的请愿书。除"青年英国"的代表弗兰德外,邓科布是唯一极力反对这个法案的议会议员。当其他的激进派看到人民反对这个法案的时候,他们便开始一个跟一个地悄悄向邓科布靠拢,自由资产阶级看到工人的激愤,不敢坚持这个法案,在人民的激愤面前,根本也没有一个人特别热中于坚持这个法案,于是这个法案便可耻地破产了。

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由此产生的**新济贫法**。关于马尔萨斯的理论我们已经谈过好几次了。现在我们再来简略地重述一下这一理论的主要结论:地球上永远有过剩人口,所以永远充满着穷困、匮乏和不道德;世界上的人数过多,这是人类的宿命,是人类的永恒的命运,因此,人们就分为不同的阶级,有些比较富裕、受过教育和有道德,而另

一些则比较穷困、不幸、愚昧和不道德。由此就得出下面这个实践上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是马尔萨斯本人做出来的）：慈善事业和济贫金实在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只会维持“过剩人口”的存在，并鼓励他们繁殖，而其余的人的工资也因他们的竞争而降低了。济贫所给穷人工作也同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既然只有一定数量的劳动产品能够找到销路，一个失业的工人找到了工作，就必然要使另一个现在有工作的工人失业，换句话说，济贫所这种事业是在损害私人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问题决不在于去养活“过剩人口”，而在于采用某种办法尽可能地缩减过剩人口的数目。马尔萨斯干脆宣布，以往公认的每个生在世界上的人都有权获得生活资料的说法是完全荒谬的。他引用了一个诗人的话：穷人来赴大自然的宴会，但是找不到空着的餐具，马尔萨斯自己又添上了一句：于是大自然就命令他滚蛋（she bids him to be gone），“因为他在出生以前没有事先问一下社会是否愿意接受他”。这一理论现在已成为英国一切真正的资产者心爱的理论，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这种理论对他们是很方便的，而且在现存关系下它在许多方面是符合实际的。既然问题不在于利用“过剩人口”，不在于把“过剩人口”变为**有用的**人口，而只在于用尽可能简便的方法使这些人饿死，并同时阻止他们生出过多的孩子，那末事情自然就很简单了，不过还得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必须使“过剩人口”承认自己是过剩的，并且心甘情愿饿死。但是，尽管仁慈的资产阶级已经费尽心机，使工人们相信自己没有用处，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的希望。相反地，无产者却坚决相信，他们有勤劳的双手，他们正是必不可少的人，而无所事事的有钱的资本家先生们，才真正是多余的。

但是，政权还在富人手里，所以无产者不得不听凭法律宣布他们是真正“多余的”，即使他们自己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新济贫法所做的正是这件事。以1601年的法案(伊丽莎白女王第四十三年的法案）为基础的旧济贫法还天真地从这样的原则出发：照顾穷人的生活是教区的责任。谁没有工作，谁就得到救济，久而久之，穷人就十分自然地认为教区有责任不让他们饿死。他们把每周的救济当做权利而不当做恩惠，资产阶级对此终于感到厌烦了。1833年，当资产阶级由于选举改革取得政权而农业区的贫困又达到顶点的时候，他们就立刻着手以自己的观点来修改济贫法。他们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济贫所的工作，这个委员会揭露了很多惊人的事实。它发现农业区的整个工人阶级都变成了贫民，他们全部或部分地靠济贫金过活，或在工资低的时候领到一点补助金。委员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制度养活了失业工人，帮助了工资低和孩子多的人，使私生子的父亲抚养自己的孩子，并一般地承认穷人有被保护的权利；这个制度使国家破产。

“它阻碍工业发展，鼓励人轻率结婚，促使人口增长，抵销人口增长对工资的影响；这个制度是一种全国性的制度，它使勤劳而诚实的人不愿意工作，使懒惰、放荡和轻佻的人得到鼓励；它破坏家庭的联系，经常阻碍资本的积累，耗费现存的资本，并使纳税人破产；此外，它还给私生子发抚育费，这简直是在发私生子的奖金”（摘自济贫法委员会的报告）㊀。

这一段对旧济贫法的作用的描述大体上是正确的：救济金鼓励懒惰，促进“多余的”人口的增长。在当前的社会关系下，穷人自

㊀ “济贫法委员会所获得的情报资料的摘要”1833年伦敦官方版(《Extracts from Information received by the Poor— Law— Commissioners》.Pub— lished by Authority.London，1833)。——恩格斯原注

然不能不成为自私自利的人，如果工作或不工作生活条件都一样，那末他在二者之中当然要选择后者。但是从这里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前的社会关系是糟透了的；而决不能得出像马尔萨斯派的委员们那样的结论：贫穷就是犯罪，应当用威胁的手段来对付它。

但是这些聪明的马尔萨斯信徒们却那样相信自己的观点绝对正确，以致毫不犹豫地把穷人放到他们那套理论的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上去[1]，并极其残酷地把这种理论应用在穷人身上。他们和马尔萨斯及其他拥护自由竞争的人们都深信，最好是让每个人自己替自己打算，彻底实行听之任之的原则，所以他们很想把济贫法全部废除。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胆量和权威来这样做，他们就提出一个尽可能适合马尔萨斯观点的济贫法。这个法律比简单地应用听之任之的原则还要残忍，因为在这个原则消极地起作用的地方，济贫法进行积极的干涉。我们已经看到，马尔萨斯把穷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失业的人叫做“多余的人”，宣布他们是罪犯，社会应当用饿死来惩罚他们。诚然，济贫法委员会的委员们还没有野蛮到这种程度，因为让人们活活地饿死就在他们眼睛里也还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们说：好吧，你们穷人有生存的权利，但是也仅仅只有生存的权利；你们没有繁殖的权利，更没有**像人一样**生存的权利。你们是国家的祸害，即使我们不能像消灭其他任何祸害一样立刻把你们消灭掉，至少你们自己也应当感觉到自己是祸害；必须把你们控制起来，使你们不可能直接生产出其他的“多余的人”，或者以自己的坏榜样引诱人们走上懒惰和失业的道路，间接地生产出“多余的人”。你们不妨活着，但是，你们活着只是用来警戒所有那

---

[1] 普罗克拉斯提斯（Procrustes）是古希腊的强盗，他把俘虏绑在铁床上，身体比床长的，把足切断，比床短的，就用力拉得和床一样长。——译者注

些也有可能成为“多余者”的人。

于是他们就提出了新的济贫法，1834年议会通过了这个法律，它一直到今天还有效。一切金钱的或实物的救济都取消了；只承认一种救济方式——把穷人收容到已经在各处迅速建立起来的习艺所里去。这些习艺所（workhouses），或者如人民所称呼的“穷人的巴士底狱”（poor-law-bastilles）的规则，足以吓退每一个还有一点希望可以不靠这种社会慈善事业过活的人。为了使穷人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去请求救济，为了使他在请求以前想尽一切办法，马尔萨斯的信徒们挖空心思地把习艺所变成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那里的伙食比最穷的工人吃的还要坏，而工作却更繁重；否则工人就情愿住习艺所，而不愿在外面过那种可怜的生活了。住习艺所的人很少见到肉，特别是鲜肉；吃的多半是土豆、最坏的面包和燕麦粥，啤酒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甚至监狱里一般的伙食也比这里好，因此，住习艺所的人为了能够进监狱，就常常故意犯一点罪。而实际上习艺所也就是监狱。不做完分内的工作就不能吃饭；想进城得事先请假，但准与不准要看他的品行或者管理人对他的意见；抽烟是禁止的；即使在所外也不准接受亲戚朋友馈送的东西。这些穷人穿着习艺所的制服，完全听管理人的摆布。为了使他们的劳动不致同私人工业竞争，分配给他们的工作多半是没有用处的；男人砸石子，并要砸得像“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紧张地工作一天所能砸的一样多”；女人、小孩和老头拆开旧船索，这是干什么用的，我已经忘记了。为了使“多余的人”不能繁殖，为了使“德行败坏的”父母不致影响自己的孩子，家庭被拆散了：丈夫、妻子、孩子分别被安置在各幢房子里。他们很少能够见面，只有当主管人认为他们很规矩的时候，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见见面。为了使这些巴

士底狱中的贫穷传染病完全和外界隔绝，住在里面的人只有得到主管人的许可才能在特别的会客室里会客，总之，只有在主管人的监视或许可下才能和外面的人接触。

按法律规定，食物应当是卫生的，待遇应当是人道的。但是法律的精神太明显了，以致要实现这种要求是根本不可能的。济贫法委员会的委员们和整个英国资产阶级如果认为可以只实行原则而避免其必然的后果，那就错了。法律条文对住在习艺所里的人的待遇所做的规定，是和它的全部精神相抵触的。既然法律在实质上是把穷人当做犯人，把习艺所当做惩治犯人的监狱，把住习艺所的人当做法律以外的人，当做人类以外的人，当做一切丑恶的化身，那末，任何与此相反的命令都无济于事。实际上官吏们对付穷人时不是按照法律的条文而是按照法律的精神。我在这里举几个例子。

1843年夏天，在**格林威治**的习艺所里有一个五岁的男孩由于某种过失而被关在停尸房中，整整关了三夜，晚上他只好睡在棺材盖上。在**海恩**的习艺所里，有一个小女孩因为夜里尿床也受到同样的惩罚。这种惩罚方法在这里显然是经常采用的。这个习艺所位于肯特的一个最美丽的地区，但是有一个特点，所里所有的窗子都向院内开，直到不久前才开了两个向外的窗子，使所里的人也可以看一下外面的世界。有一个记者在“彩色杂志”上描述了这件事，他的文章是用下面的几句话结束的：

“如果上帝惩罚人的罪过，就像人们惩罚人的贫穷一样，那末，亚当的子孙们该是多么可怜呵！”

1843年11月，莱斯特有一个人刚从**考文垂**的习艺所里放出来两天就死掉了。这个习艺所对待穷人的情况是令人气愤的。上面谈到的这个人叫做乔治·罗伯逊，他的肩部受了伤，但根本没有得到

治疗。习艺所要他去压抽水机,他只好用那只健康的手来压。他吃的是习艺所里的普通伙食,由于伤口得不到护理而引起身体虚弱,所以他根本消化不了这种食物。他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但是他愈诉苦,受到的待遇就愈坏。罗伯逊的妻子也住在习艺所里,她想把自己的一小份啤酒让给丈夫,竟挨了一顿骂,并且被迫当着女管理人的面把它喝光。罗伯逊病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对他的待遇也没有好一些。最后,根据他的请求,他们夫妇俩一起被放出来了,他离开习艺所时还挨了一顿臭骂。过了两天,罗伯逊就在莱斯特死掉了。据验尸的医生证明,他是因伤口未得到护理和身体衰弱无法消化食物而致死的。当他离开习艺所的时候,才交给他几封附有汇款的信,这些信已在习艺所的办公室中压了六个星期,并且按照这个习艺所的规矩,都已被主管人拆开看过了!在**北明翰**的习艺所中发生了一些非常可耻的事情,所以1843年12月不得不派出一个官员去调查。他查明,有4个流浪汉(trampers——我们在上面已经解释过这个名词)[一]被剥光了衣服关在楼梯下面的禁闭室(blackhole)里;他们在这里已经被拘留了八天到十天,他们常常挨饿,每天在午前吃不到一点东西,而且又是在最冷的季节里。有一个小男孩坐过这个习艺所里的各种各样的禁闭:先是被关在一间又潮湿又狭小的拱形的储藏室里,后来有两次被关在禁闭室里,第二次被关了三天三夜;以后又在更糟糕的旧禁闭室里关了同样长的时间,最后竟被送到流浪的失业者特别禁闭室去,这是一个放着木板床的、又脏又臭的洞穴,这位官员去调查的时候,还发现两个穿得破破烂烂、冻得缩成一团的男孩子,他们在那里已经有四天了。坐禁闭室的人数

[一] 见本卷第503页。——编者注

常常多到7个，而关在流浪的失业者禁闭室里的则往往有20人之多。女人也经常因拒绝上教堂而被罚坐禁闭室。有一个女人甚至在流浪的失业者禁闭室中被关了四天，当然，只有天晓得她在那里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人！而这一切都是在她生病吃药的时候发生的！还有一个女人虽然神志很清醒，却受到了送进疯人院的惩罚。1844年1月在萨福克的拜克顿的习艺所里也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一个白痴似的女人在这里当看护，她对待病人的手段是极其荒唐的；为了省得看护们在夜里值班，就用绳子把那些不安静的或夜里常常起来的病人捆在床上；曾有一个病人就是这样捆着死掉的。在伦敦的**圣潘克拉斯**的缝制廉价衬衣的习艺所里，一个患羊痫疯的男人在发病的时候闷死在床上，谁也没有去搭救他。在这个习艺所里，一张床上睡四五个、五六个、有时甚至八个小孩子。在伦敦的**邵尔底治**的习艺所里，曾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发高烧的病人挤在一张爬满了虫子的床上睡了一夜。在伦敦的**拜特纳一格林**的习艺所里，所方不让一个怀孕六个月的女人到习艺所的房子里去住，从1844年2月28日到3月20日一直把她和她的不满两岁的孩子锁在会客室里，里面既没有床，也没有地方大小便。她的丈夫也被带进了习艺所，当他请求把他妻子释放出来时，所方便认为他行为卤莽而把他关了二十四小时禁闭，吃的只有水和面包。1844年9月，在温莎附近的**斯劳**的习艺所里有一个人快要死了，病人的妻子得信后马上到斯劳去探望，她在夜里十二点到达目的地后，急忙赶到了习艺所，但是所方竟不让她进去。直到第二天早上她才被允许和自己的丈夫见面，时间只有半小时，而且还有女管理人在场；以后几次会面时这个女管理人也都在场，一到时间就催她走。在郎卡郡的**密得尔顿**的习艺

所里，一间屋子睡12个人，有时甚至睡18个人，男女都有。这个机构不受新济贫法的约束，而受较早的专门的法律（吉伯特法律）的约束。管理人在这个习艺所里私人开设了一个啤酒厂。1844年7月31日，在**斯托克波尔特**有一个七十二岁的老头被人从习艺所拖到治安法官那里去，原因是他拒绝砸石子，说自己年纪太大，膝也弯不过来，实在干不了这种工作。他请求给他一种比较适合于他的体力的工作，但是白费，他被判处在监狱里做两个星期的苦工。1844年2月，在**巴斯弗德**的习艺所里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床单已有十三个星期没有换，衬衣有四个星期没有换，袜子则有两个月到十个月没有换了，因而45个男孩子中只有3个还穿着袜子，所有的人的衬衣都是破破烂烂的。床铺上爬满了虫子，食具在脏水桶中洗涤。**伦敦**西区的习艺所有一个有梅毒的看门人，他把病传染给了4个女孩子，但是并没有被开除。另一个看门的从一个分所里带出一个又聋又哑的女孩子，把她藏在自己的床上和她睡了四天，也没有被开除。

对待死人也并不比对待活人好些。穷人死了就像埋死牲畜一样草草了事。在伦敦，埋葬穷人的**圣布莱德斯**公墓是一块光秃秃的泥泞地，它从查理二世以来就被用做墓地，里面到处是一堆堆的白骨。每到星期三，一星期内死掉的穷人都被抛到一个14英尺深的坑里，神甫匆忙地祈祷，人们在坑上松松地盖上一层土，以便下星期三重新挖开，再往里面扔新的尸体，一直到坑满得不能再填的时候为止。因此，尸体腐烂的气味把附近的整个地区都熏臭了。在**曼彻斯特**，贫民公墓在艾尔克河畔，和旧城正好相对；这也是一个高低不平的荒凉的地方。大约两年以前有一条新修的铁路经过这里。假如这是可敬的人们的墓地，那末，资产阶级和牧师们会

怎样哀号，他们对这种亵渎行为会怎样大嚷大叫呵！但这是贫民公墓，是贫民和“多余的人”最后安息的地方，所以人们就毫不介意了。人们甚至不肯费点力气把没有完全烂掉的尸体移到墓地的另一部分去。哪里修路方便，哪里的坟就被掘开，木桩打入新坟里，充满了腐败物的水从烂泥中冒出来，使附近一带弥漫着令人作呕的和非常有害的臭气。当时所发生的那种可恶的粗暴行为，我不准备在这里详细描述了。

穷人们拒绝在这样的条件下接受社会救济，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到这些巴士底狱里去，这还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我听到过五件真正饿死人的事情，在死者死去的前几天，济贫所除了让他们进习艺所就不给任何救济，而他们宁愿挨饿，也不愿到这个地狱里去。从这方面说来，济贫法委员会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同时，习艺所的建立比执政党的任何措施都更激起了无产阶级对有产阶级的强烈的仇恨，大部分的有产者都因新济贫法而欣喜若狂。从新堡到杜弗，这个法律引起了工人们一致的愤怒的呼声。在这个法律中，资产阶级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是怎样理解对无产阶级的义务的，这一点连最愚蠢的人也看得很清楚了。过去从来没有人这样露骨、这样恬不知耻地宣布过：没有财产的人活在世上只是为了供有产者剥削，并在有产者不需要他们的时候便去饿死。正因为如此，新济贫法大大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宪章运动的扩展；而且因为这个法律在农村中应用得最广，所以它又将便利无产阶级运动在农村地区的发展。

我再补充一点，**爱尔兰**从1838年起也有一个类似的济贫法，它替8万贫民设立了同样的藏身之所。在那里，这个法律也是为人所憎恨的，假如它在爱尔兰能够获得像在英格兰同样的意义，它也

会引起穷人的更大的反对。但是，在一个拥有250万无产者的国家里有8万无产者受到恶劣的待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苏格兰除了某些个别地方，都没有济贫法这种措施。

我希望在谈过新济贫法及其后果以后，谁也不会认为我对英国资产阶级的批评过于苛刻。在国家的这个措施中，英国资产阶级是 in corpore〔作为一个整体〕，作为当权者出现的，在这里他们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真正愿望，表明了他们那种使无产者处处遭殃但又把这归之于个别人的罪过的恶劣行为的真正含义。这个措施不是出自资产阶级某一集团之手，而是得到了整个阶级的赞许的，1844年议会的辩论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新济贫法是自由党颁布的；以首相皮尔为首的保守党为这一法案辩护，只是在1844年通过的 Poor-Law-Amendment-Bill〔济贫法修正案〕中对它做了几处无关紧要的修改。自由党的多数颁布了这一法律，保守党的多数批准了它，而高贵的贵族们则两次对它表示“同意”。这样就宣布了无产阶级是不受国家和社会保护的；这样就公开地宣布了无产者不是人，不值得把他当人看待。但是我们确信，不列颠王国的无产者是会争回自己的人权的㊀。

———

㊀ 为了避免一切误会和可能由此产生的异议，我还要指出，我是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谈的，我谈个别人的行为，只是为了说明这个阶级的思想和行动的方式。因此，我也不准备分析资产阶级各个集团间和各个党派间的差别，因为这些集团和派别只具有历史上的和理论上的意义。因此，我也只能顺便提到几个例外的、值得尊敬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这些人有的是比较坚决的激进党人，他们差不多就是宪章主义者，例如，下院议员埃士顿的亨得利厂主和托德摩尔登（郎卡郡）的菲尔登厂主，此外还有托利党人慈善家，他们不久以前组织了一个叫做**“青年英国”**社的团体，这些人中有议会议员迪

这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种状况是我在二十一个月的时间内通过亲身观察并根据官方的和其他可靠的报告加以研究过的。如果我肯定（如我在本书中已经不止一次地肯定过那样）这种状况恶劣得不能忍受，那末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1833年盖斯克尔就宣称他对和平的结局已经绝望，革命未必能够避免。1838年卡莱尔已经用工人的贫困的生活条件来解释宪章主义和工人的革命情绪，但他感到惊奇的是，工人们竟然安安静静地在巴尔米开特的餐桌[123]旁边坐了八年之久，让自由资产阶级用空洞的诺言来喂养自己。1844年卡莱尔宣称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①

“如果不想把欧洲，或者至少是把英国变为荒无人烟的沙漠的话”。

“欧洲第一大报”“泰晤士报”在1844年6月直截了当地说道：

“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这是一个采取恐怖行动的号召，它可能再一次地也响彻我们全国。当心点吧，有钱的人们！”

但是，让我们再看一看英国资产阶级的前途吧。在最坏的情况

①斯累里、波尔斯威克、弗兰德、约翰一 曼诺斯勋爵等等。艾释黎勋爵和他们也有密切的关系。“青年英国”的目的是恢复旧时的《merry England》（“美好的英国”）以及它的光辉方面和浪漫的封建主义；这个目的自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是可笑的，这是对整个历史发展的嘲笑。但是这些人怀着善良的心愿起来反对现存的制度，反对流行的种种偏见，他们有勇气承认现在制度下的一切卑鄙行为，这毕竟是难能可贵的。半德国人半英国人的**托马斯·卡莱尔**是十分独特的，他最初是托利党人，后来就比上面谈到的所有那些人都进步得多。他比所有的英国资产者都更深刻地了解到社会混乱的原因并且要求把劳动组织起来。我希望已经摸索到正确道路的卡莱尔还能够沿着这条道路走去。我以自己和其他许多德国人的名义对他寄以最美好的愿望。——恩格斯原注

但是二月革命使卡莱尔成了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他不再向庸人们发出正义的愤怒，却对那把他抛到岸上的历史巨浪发出狠毒的庸俗的怨言。——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补加的注

下，即使废除了谷物法（几年后必然会废除的），外国的工业，首先是美国的工业，也能够经得住英国的竞争。目前德国的工业正在加紧发展，美国的工业已经大规模地发展起来。美国有取之不尽的资源，有巨量的煤铁蕴藏，有无比丰富的水力和通航的河流，特别是有坚毅而活跃的居民，和他们比起来，英国人就是一群昏睡的粘液质的人；美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建立了工业，目前在粗棉纺织品（英国工业的主要产品）方面已经开始和英国竞争，它已经把英国人从北美和南美的市场上排挤出去，在中国，美国货也和英国货一样地销行了。其他工业部门里的情形也是一样。如果要找一个能够把工业垄断权夺到自己手中的国家，那末这就是美国。如果英国工业就这样被打垮（如果当前的社会条件不改变，这种事情必然要在最近二十年内发生），那末无产阶级大多数都将永远成为“多余的人”。他们可以走的路只有两条：或者饿死，或者革命。英国资产阶级看到了这种前途吗？刚刚相反，他们最宠爱的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从书房里教导他们说，根本不用考虑美国这样一个年轻的甚至连人口也没有达到应有数字的国家也能够顺利地从事工业活动，尤其是能和英国这样的老牌工业国竞争。如果美国人想这样尝试的话，那他们简直就是发疯，因为这样做只会赔钱。最好还是让他们去从事农业吧，到全部土地都耕种起来的时候，他们顺利地从事工业的日子或许就会到来。聪明的经济学家这样说，整个资产阶级随声附和，可是美国人却把市场一个一个地抢走，而且不久以前一个美国投机分子甚至大胆地把一批美国货运到**英国**来，在这里又顺顺当当地作为出口货抛售出去！

　　但是，就假定英国人保持住工业的垄断权，假定他们的工厂的数目会继续增加，结果又将怎样呢？商业危机不会消失，它将随

着工业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而日益尖锐、可怕。随着小资产阶级的不断破产，随着资本迅速地向少数人的手里集中，无产阶级的人数将按照几何级数增加起来，使整个民族，除少数百万富翁外，很快都成为无产阶级。但是，在这种发展的进程中必将有这样一个时机到来，那时无产阶级将看到，他们要推翻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多么容易，于是革命就跟着到来了。

然而事变很可能不沿着这两条道路发展。商业危机（它是促进无产阶级独立发展的最强有力的因素）加上外国的竞争和中等阶级的日益破产将加速整个进程。我不相信人民会安然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危机。1846年或1847年行将到来的危机，想必会促成谷物法的废除和宪章的通过。宪章将引起什么样的革命运动，现在还很难说。但是在这次危机之后和下一次危机之前（按过去的危机类推，下一次危机应当在1852年或1853年到来，虽然它的到来可能因谷物法的废除而推迟，或因外国的竞争等其他原因而加速），英国人民大概会对顺从地忍受资本家的剥削或在资本家不需要他们的时候就去饿死这样的事情感到厌恶。如果到那时英国资产阶级不变得聪明些（按所有的迹象来判断，这是不可能的），那末革命就会到来，这次革命将是过去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相比的。被逼到绝望地步的无产者将要像斯提芬斯向他们宣传过的那样去放火；人民复仇的怒火将迸发出来，来势之猛就连1793年也不能与之相比。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是人们之间进行过的一切战争中流血最多的一次战争。即使资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即使资产阶级的习气普遍地改好了，也都无济于事。要知道，整个资产阶级的观点的改变至多也只能达到不彻底的juste— milieu〔中庸〕的程度；那些较坚决地归附于工人的资产者会形成新的吉伦特派，

这一派别将在暴力行动扩展的过程中灭亡。一个阶级的偏见是不可能像旧衣服一样扔掉的，保守、狭隘而自私的英国资产阶级尤其不会这样做。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做出所有这些结论，因为这些结论所依据的一方面是历史发展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另一方面是人类的本性。在英国做一个预言家比在任何地方都容易，因为构成社会的一切因素在这里都获得了这样明确的发展。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要从既成的形势中找到和平的出路已经太晚了；但是革命可以进行得比我在这里所描述的温和些。这与其说将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发展，倒不如说将取决于无产阶级的发展。无产阶级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愈多，革命中的流血、报复和残酷性将愈少。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共产主义只承认这种敌对在目前的历史意义，但是否认它在将来还有存在的必要；共产主义正是以消除这种敌对为目的的。所以，只要这种敌对还存在，共产主义就认为，无产阶级对他们的奴役者时愤怒是必然的，是**正在开始的**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杠杆；但是共产主义比这种愤怒更进了一步，因为它并不仅仅是工人的事业，而是全人类的事业。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想到要向个别的人复仇，或者认为某个资产者在现存的条件下能够有不同于现在的行动。英国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正是从不归咎于个别人的原则出发的。因此，英国工人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愈多，他们现在的愤怒就愈快地成为多余的（如果这种愤怒今后仍然表现在以前的那种暴力行动中，那它无论怎样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在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发动中粗暴行为和野蛮行为也就愈少。假如能够在斗争展开以前使全体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化，那末斗争就会很和平地进行。但是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太晚了！然而我认为

在英国现在已无法避免的穷人反对富人的**完全**公开的、直接的战争爆发以前，至少也能使无产阶级对社会问题有个清楚的了解，使共产党能够在有利的情况下逐渐克服革命中的野蛮成分并预防热月九日的重演。此外，法国的经验并不是没有用的，而且现在宪章运动的多数领袖都已经成了共产主义者。而因为共产主义**超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所以它和纯粹无产阶级的宪章主义比起来，更容易为资产阶级的优秀的代表人物（但是这种人是极少的，而且只能从正在成长的一代中去寻找）所赞同。

如果这些结论在这里还显得根据不够充分，那末我希望在别的地方有机会来证明，这些结论是从英国历史发展中必然得出的。我坚决认为：现在已经间接地以个别小冲突的形式进行着的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在英国成为全面的和公开的战争。要想和平解决已经太晚了。阶级的分化日益尖锐，反抗的精神日益深入工人的心中，愤怒在加剧，个别的游击式的小冲突在扩展成较大的战斗和示威，不久的将来，一个小小的推动力就足以掀起翻天复地的浪涛。那时全国都将真正响彻战斗的号召：“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那时富人们再想采取预防措施就已经晚了。

——

弗·恩格斯

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

一

现在给贵报[124]寄上短文一篇，想来贵国同胞听到我们的共同事业在海峡这边进展的消息一定会感到高兴。同时我也高兴我能够指出，虽然德国人通常在讨论社会改革问题方面总是相当落后，但是他们现在正在努力弥补自己虚度了的时间。的确，社会主义在我国传播之快简直是一个奇迹。四年前这里总共只有两个人对社会问题感兴趣，一年前才出版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刊物[125]。在国外，德国共产主义者确实有几百人，但是他们都是工人，他们的影响不大，不可能在“上层阶级”中推广他们的刊物。此外，社会主义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还遇到重重的障碍：政府实行书报检查，集会和结社没有自由，政府颁布专制法令，设置秘密法庭，雇佣法官惩办一切胆敢用任何方式促使群众思考问题的人。尽管障碍这样多，但是德国现在的情况怎样呢？过去只有两个人为那些完全不了解社会主义或者对这个问题毫无兴趣的群众写文章介绍社会

主义，现在我们已经有几十个有才干的作家向成千个渴望知道有关这方面的一切的人宣传新的学说。我们有几家激进（在书报检查制度所容许的范围内是最激进的）社会主义的报纸，其中首推“特利尔日报”[126]和威塞尔的“发言人报”[127]；在巴黎，我们在出版自由的情况下发行了一张报纸[128]。除了直接受政府影响的期刊外，没有一个刊物不是每天都在颂扬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我们的死敌没有勇气公开反对我们，甚至政府也不得不客客气气地对待一切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运动，只要这些运动在形式上是**合法的**就行。到处都出现了改善劳动者的处境以及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教育的协会，并且还有些普鲁士政府的高级官员也积极地参加了这些协会的活动。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在德国已经是一个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了。一年来已经有一大批社会主义者成长起来；各个政党都对他们表示尊敬，我国的自由主义者尤其在他们面前讨好卖乖。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力量仍然靠中等阶级，——这一事实或许会使英国读者大为吃惊，假使他们不明了德国的中等阶级远没有英国中等阶级那么自私、偏颇和愚笨（这只是因为他们不那么富有）的话。但是我们希望很快就在工人阶级中找到支柱；显然不论何时何地工人阶级都应当是社会主义政党所依靠的堡垒和力量，而且工人阶级已经被穷困、压迫、失业以及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工业区的起义所惊醒，他们不再那样昏睡不醒了。因此请允许我提一下优秀的德国画家许布纳尔的一幅画；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它画的是一群向厂主交亚麻布的西里西亚织工，画面异常有力地把冷酷的富有和绝望的穷困作了鲜明的对比。厂主胖得像一只猪，红铜色的脸上露出一付冷酷相，他轻蔑地把一个妇人的一块麻布抛在一边，那妇人

眼看出售无望，便昏倒了；她旁边图着两个小孩，一个老头吃力地扶着她；管事的在检验另外一块麻布，这块布的主人正在焦灼地等候检验的结果；一个青年正在把自己的劳动换来的可怜的收入给失望的母亲看；在石头的长凳上坐着一个老头、一个姑娘和一个男孩，他们在等着轮到自己；两个男人，一个人背着一块没有验上的麻布，正从房子里出来，其中一个怒气冲冲地摇晃着拳头，另一个把手搁在他的同伴的肩上，指着天，好像在说：别生气，自有老天爷来惩罚他。所有这些情景都出现在一间冷冷清清的、像是没有人住的外厅中，外厅的地面是石头铺的，只有厂主一个人是站在一块小毡垫上。在画面的远处，在柜台后面展现出来的是一个陈设极其讲究的账房，华丽的窗帘，明亮的镜子；几个办事员正在那里写什么，丝毫没有注意他们背后所发生的事情；老板的儿子，一个年轻的花花公子斜倚着柜台，手里拿着马鞭，嘴里刁着雪茄，冷眉冷眼地瞧着这些不幸的织工。这幅画在德国好几个城市里展览过，当然给不少人灌输了社会的思想。同时我们也非常满意地看到，我国优秀的历史画画家卡尔·莱辛已经站到社会主义方面来了。事实上社会主义今天在德国所占的地位已经比它在英国所占的地位优越十倍。就是今天早晨，我在一张自由派的报纸（“科伦日报”[129]）上读到一篇文章，该文作者由于某种原因遭到了社会主义者的攻击，作者就在这篇文章中为自己辩护。但是他怎样辩护呢？他说他是社会主义者，就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他希望从政治改革着手，而我们却希望立刻取得一切。但是要知道，“科伦日报”就其影响和发行面来说是德国第二大报。奇怪的是（至少在德国北部是如此）无论在轮船上、火车车厢里或是邮车中都会碰到这样的人：他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社会的思想，同意必

须采取某种措施来改造社会。我刚从附近的几个城市旅行归来，没有一个地方我没有碰到五个以至十个彻底的社会主义者。在我自己的家——这是一个真正虔诚而善良的家庭——中，我就可以数出六个甚至更多的社会主义者，而且每一个都不是因为受其余的人的影响而转变的。我们在各种人当中，在商人、厂主、律师、官吏、军官、医生、编辑、土地承租人等等当中都有我们的支持者；我们的大量的刊物正在印刷中，虽然暂时还只出了三四种。如果我们能在最近四五年内取得像这一年当中所取得的那样的成就，那末我们就能够迅速地建立共产主义的移民区。你知道，我们这些德国理论家都正在成为实践的事业家。事实上我们当中已经有一个人受托参照欧文、傅立叶等人的计划并利用美洲各移民区及你们的“和谐”移民区[130]（我希望它繁荣壮大）的经验来拟定一个组织及管理共产主义移民区的具体计划。这个计划将发到各地去讨论，并将和各地提出的修正意见一起发表。德国社会主义者当中最积极的作家有：巴黎的卡尔·马克思博士，现在在科伦的莫·赫斯博士，巴黎的卡·格律恩博士，巴门（在莱茵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里达（在威斯特伐里亚）的奥·吕宁博士，科伦的海·皮特曼博士等等。此外，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亨利希·海涅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他出版了一本政治诗集，其中也收集了几篇宣传社会主义的诗作。他是著名的“西里西亚织工之歌”的作者；我把这首歌译成散文寄给你，但是我担心它在英国会被认为是侮辱宗教的。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引证它，我只指出一点，那就是这首歌暗中针对着1813年普鲁士人的战斗叫嚣：“国王和祖国与上帝同在！”，这种叫嚣从那时起就是保皇党人心爱的口号。下面就是这首歌[131]：

在他们悲愤的眼里不见一滴泪珠，
他们坐在织机旁，绝望的愤怒呈现在脸上。
“我们已饱经折磨和冻饿；
古老的德意志呵！我们正为你织着寿衣，
把三个诅咒织在寿衣上。
我们织呵，织呵！
“一是诅咒上帝，那耳聋眼瞎的上帝。
我们信赖他，像孩子信赖他们的父亲，
我们对他满怀着希望和信任，
可是他却嘲笑我们，欺骗我们。
我们织呵，织呵！
“二是诅咒那富人的国王，
我们的苦楚丝毫不能打动他那铁石心肠。
他抢走了我们的最后一文钱，
还要派兵来把我们当狗一样枪杀。
我们织呵，织呵！
“还要诅咒那虚伪的祖国，
它给我们的只是痛苦和耻辱，
我们在它那里饱经饥饿和困苦，
古老的德意志呵！我们正为你织着寿衣。
我们织呵，织呵！”

这首歌的德文原文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这次我也就此和你告别；希望不久我就能告诉你有关我们的进展和社会著作的消息。

您的诚挚的德国老朋友

弗·恩格斯写于1844年11月9日左右
载于1844年12月13日
“新道德世界”第25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
原文是英文

二

1845年2月2日于巴门

自从上次给你去信后，共产主义的事业仍然在迅速进展，就像在1884年最后的几个月里一样。不久以前我访问了莱茵河上的几个城市，到处我都看到，从我上次访问以来，我们的思想又占据了一些阵地，并且每天都在占领更多的阵地。到处我都碰到一些新近改变信仰的人，他们都在无比热情地讨论和传播共产主义的思想。普鲁士的一切城市都举行了许多公开的集会，目的是要成立协会来制止贫困、愚昧和犯罪的现象在广大居民中滋长。政府起初是支持这些集会的，可是当这些集会显得过于独立不羁时，它就立刻开始和它们为难。但是不管怎样，这些集会已经使大家注意社会问题，并且已经为传播我们的原则做了很多工作。在科伦举行的大会上，几位知名的共产主义者的演说激起了极为热烈的情绪，当场就选举了一个委员会来起草协会的章程，而且在选出的委员会中彻底的共产主义者占了一大半。章程的基础当然是共产主义的原则——组织劳动，保护劳动，使它不为资本的势力所侵害，如此等等，而且这个章程几乎是大会一致通过的。政府自然没有批准这件事（在我国成立任何协会都得经政府批准），但是此后关于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的问题在科伦就到处都在讨论了。在爱北斐特宣布的协会的基本原则是：**一切人都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都应该分享科学的成果。**但是协会的章程还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很

可能也会遭到科伦章程的命运，因为牧师们想使协会从属于市内布道区的计划被大会否决后，他们就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政府是会查禁自由派的协会，支持牧师们的组织的。但是这并不要紧，因为已经提出来的问题现在正在全市范围内展开讨论。在闵斯德、克列维、杜塞尔多夫等城市中也建立了协会；未来的结果如何，让我们等着瞧吧。至于共产主义的书刊，科伦的海·皮特曼出版了一个集子[132]，其中除了其他一些论文之外，都是描写美洲共产主义移民区和你们在汉普郡的移民区的文章，这对于消除那种认为我们的思想无法实现的偏见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皮特曼先生还刊登了一个季刊[133]的出版计划的广告，创刊号预计在今年五月里出版；它将全部用来宣传我们的思想。科伦的赫斯先生和巴门的恩格斯先生准备另外再出版一个月刊[134]，创刊号将在四月一日出版；这个刊物将全部用来刊载那些表明现代文明社会处于什么样的状况的**事实**，利用雄辩的事实来宣传彻底改造的必要性。马克思博士在短期内将出版一部新著，内容是对政治经济学原理和整个政治的批判[135]。法国的保守政府已迫使马克思博士离开巴黎。他打算迁往比利时，如果普鲁士政府（就是它促使法国政府驱逐马克思的）还要跟踪追到那里报复他，那他就只好到英国去了。但是从我上次给你去信以来，我所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德国当代最杰出的天才的哲学家费尔巴哈博士宣布他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不久以前我们的一个朋友到他隐居的乡村——巴伐利亚一个偏僻的角落去拜访他，费尔巴哈告诉他说：他深信共产主义不过是他所宣布的原则的必然结果，而且实质上不过是他很久以前在理论上所宣布的东西的**实践**。费尔巴哈说，没有一本书像魏特林的“保证”[136]第一卷那样使他感到欣慰。他说他从来不把自己的书献给任何人，但是他很

想把他的下一部著作献给魏特林。这样，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是他们的最杰出的代表）和德国工人（以魏特林为代表）的联盟，即马克思博士一年前所预言的联盟[137]，就快要实现了。如果我们有哲学家和我们一起思考，有工人和我们一起为我们的事业奋斗，那末世界上还有什么力量能阻挡我们前进呢？

您的德国老朋友

弗·恩格斯写于1845年2月2日　　按报纸原文刊印

载于1845年3月8日　　原文是英文

“新道德世界”第37号

三

亲爱的先生！

前一个时候，由于某种原因，我无法写信告诉你关于德国的情况；现在我来继续我的报道，希望这些报道能引起贵报读者的兴趣，并且希望连续写下去，避免过去那样长时间的中断。我能够告诉你们，我们取得了像我上次给你们去信时那样的十分迅速而踏实的进展，非常高兴。自从我上次给你们去信以后，普鲁士政府就认为继续支持“劳动阶级状况改进协会”是一种危险的事情。它发现各地的这些协会都被一种类似共产主义的东西感染了，因此它用它所能做到的一切办法来镇压它们，或者至少是阻止它们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协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资产者；一谈到他们在改善劳动者的状况方面所能采取的步骤，他们就茫然了。他们提出来的办法，例如成立储蓄银行、给优秀工人颁发奖金和奖品等，很快就被共产主义者证明是毫无用处的，并且遭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公开的嘲笑。这样，资产阶级想用伪善和假慈悲来欺骗工人的企图就丝毫没有得逞，反而给我们造成了一些在家长式的警察统治的国家里很难得到的机会，结果是政府和资本家奔忙而我们却得到了好处。

但是还不仅是这些集会被用来宣传共产主义而已，在莱茵普鲁士的工业区中心爱北斐特，还定期举行共产主义的集会。这个城市的共产主义者被一些最有身分的人物请去和他们讨论共产主义

的原则。首次会议是在二月里举行的，私人的性质比较多一些。到会的人有四五十个，其中包括总检察长、法院的其他人员以及几乎所有的大工厂和大商号的代表。赫斯博士（他的名字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在贵报上提到过）宣布开会，建议选举共产主义者克特根先生做主席；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个提议。接着就是赫斯博士发表演说，他讲的是社会的现状和抛弃旧的竞争制度的必要性，他认为竞争制度就是公开抢劫的制度。他的演说引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在座的人中共产主义者占了一大半）。接着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不久以前他在贵报发表过几篇有关共产主义在大陆上的情况的文章[138]）相当详细地论述了共产主义制度的现实性和优越性㊀。他举了有关美洲共产主义移民区和你们的“和谐”移民区的一系列事实来证实自己的论断。接着就展开了极其热烈的辩论，在辩论中站在共产主义者方面的有上述的两个发言人和其他几个人，站在反对方面的有总检察长和文学家贝奈狄克斯博士等人。会议从晚上九点开始一直开到深夜一点钟才散。

第二次会议是一星期以后在该市最好的一个旅馆的大厅中举行的。大厅里挤满了当地的“有身分的”人物。上次会议的主席克特根先生讲了一下共产主义者心目中的未来的社会制度及其远景；接着是恩格斯先生发表演说㊁，他在演说中证明了（从没有任何反对意见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出）德国的现状不能不在短时间内引起一次社会革命；这种无法避免的革命用任何发展工商业的办法都防止不了，防止这种革命（它比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振荡都更加猛烈）的唯一办法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制度并为这种制度的实现

㊀ 见本卷第602页。——编者注
㊁ 见本卷第617页。——编者注

做准备。在这次辩论会上站在共产主义者方面的有几个律师，他们是从科伦和杜塞尔多夫赶来参加的。这次辩论会仍然开得很热烈，一直开到半夜。会上还朗诵了杜塞尔多夫的弥勒博士写的几首歌颂共产主义的诗，弥勒博士当时也出席了大会。

一星期后举行了第三次会议，会上赫斯博士又发表了演说，另外还宣议了几篇从一个集子里选出来的报道美洲共产主义移民区的文章。闭会前仍然展开了讨论。

几天后城里谣传警察将要解散下次会议，逮捕会上的发言人。爱北斐特市市长真的跑到旅馆老板那里去，威胁他说，如果他再允许在他的旅馆里举行这类集会，就要撤销他的营业执照。共产主义者立刻就此事询问市长，可是就在应该举行下次会议的前一天得到了通知，通知是给赫斯先生、恩格斯先生和克特根先生的；地方当局在通知书里引证了一大堆习惯法和成文法，宣布这类集会是违法的，并且威胁说，如果不停止，他们就要用武力来解散它。会议在下一个星期六举行了；市长和总检察长（从第一次会议后他就不在这些会上露面了）都出席了会议，陪同他们来的是一队从杜塞尔多夫用火车运来的武装警察。在这种场合下当然没有人发表演说，到会者都只管喝酒、吃牛排，没有给警察任何干涉的借口。

这样的措施只会有助于我们的事业，因为政府那样的重视，使那些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问题的人都对这个问题发生了兴趣。那些参加了辩论会但是根本不了解我们的观点或者甚至对它抱嘲讽态度的人，大多数都对共产主义怀着尊敬的心情回家。这种尊敬部分地也是由于我们这一群人在会上显得很有身分而引起的，因为该市所有的名门富家几乎都有自己家里的人或亲戚出席，和共产主义者同坐在一个大餐桌上。总而言之，这几次集会对整个工业区

的舆论所起的影响确实是惊人的；几天以后就有人向那些发言赞成我们的事业的人索取书报，以便从中了解整个共产主义的制度。据我们了解，会议的全部文件不久就会出版。

至于共产主义的书刊，在这方面已经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活动。群众确实渴望得到消息；他们正在吞食有关这一问题的一切新书。皮特曼博士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其中收有：赫斯博士论现代社会的贫困现象及消除此种现象的办法的精彩著作、一篇详细描写西里西亚工人的贫困状况的文章（文中还概述了去年春天该地发生的起义）、其他几篇描写德国社会状况的论文以及报道美洲共产主义移民区和“和谐”移民区的通讯（这篇通讯是弗·恩格斯根据芬奇先生的书信和一篇署名为“一个跟在犁后面吆喝的人”①的文章编写的）。这本集子虽然遭到普鲁士政府的追究，但是各地却很快就销售一空。另外还创办了一些月刊，这就是“威斯特伐里亚汽船”[139]（在比雷菲尔德出版，吕宁发行，载有论社会主义的通俗论文和报道劳动者的状况的文章）、“人民报”[140]（在科伦出版，具有较明确的社会主义倾向）和“社会明镜”（在爱北斐特出版，赫斯博士发行，专门揭发有关现代社会状况的事实和保卫劳动阶级的权利）。此外，皮特曼博士还创办了一个季刊，叫做“莱茵年鉴”，该刊的创刊号正在印刷中，很快就要出版。

另一方面，德国有一些哲学家不愿从他们的纯粹理论中做出实际的结论，硬说人只应该玄想形而上学的问题，现在我们向这些人宣战了。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出版了一本著作，详细地驳斥了布鲁诺·鲍威尔所坚持的原则㈠，赫斯先生和毕尔格尔斯先生

① 见本卷第557页的编者注。—— 译者注

㈠ 见本卷第7—268页。—— 编者注

现在正在着手驳斥施蒂纳的理论。鲍威尔和施蒂纳是德国**抽象**哲学的最终结论的代表人物，因而也是在哲学上反对社会主义或者宁可说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头等重要的人物；因为社会主义一词在德国指的就是这样一些人所具有的各种不明确而且也无法明确的模模糊糊的幻想；这些人认为需要采取某种措施，但是不能决定是否就采取共产主义的整套制度。

马克思博士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先生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㈠、一本论共产主义的论文集——“铁文集”[141]也已经在印刷中；另外，最近我们将着手翻译英法两国的论社会改造问题的优秀著作。

由于德国的政治情况很恶劣，由于它的家长式的政府可以为所欲为，在各地的共产主义者中间，除文字上的联系外，要建立任何联系都几乎不可能。一些斯刊，主要是“莱茵年鉴”，就成了那些在报刊上坚持共产主义的人的中心。通过来往的旅客还维持着某种联系，但是也就止于此了。结社是违法的，甚至通信也不安全，因为近来“秘密机关”的活动特别频繁。因此，我们只是从报上知道在波兹南和西里西亚的山中有两个共产主义的组织存在。据说，在普属波兰的首府波兹南，有一群青年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准备占据该城；后来密谋被发觉，因此计划没有实现。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有关这件事的全部情况。但是不管怎样，下面的事实却是可靠的，这就是：有一大批出身于波兰的贵族和富豪家庭的青年被捕了，此后（两个多月）所有的岗哨都加强了一倍并荷枪实弹地守护，两个青年（一个十二岁，一个十九岁）即雷马尔凯维

㈠ 见本卷第269—587页。——编者注

奇弟兄已经潜逃并且直到现在还没有被当局拿获。被捕的人中大部分是十二岁到二十岁的青年。另外一个所谓的密谋是在西里西亚山中，据说规模很大，也是以共产主义为目的；密谋者似乎打算夺取施魏德尼茨的堡垒，占据整条山脉，从那里来号召整个德国的受苦受难的劳动者。至于这些消息究竟真实到什么程度，没有人能下判断，不过就在这个倒霉的地区也有根据警探告密逮捕人的事情发生；富有的厂主施略费尔先生已经被押解到柏林，现在正在那里受审，因为他被认为是上述密谋的主使人。

在瑞士、法国和英国的德国工人中的共产主义者的协会仍然很活跃，虽然他俩在法国和瑞士的一些地方受到了警察的迫害。据报载，日内瓦共产主义协会的会员约有60个被驱逐出该市和该州。一位最有天赋的瑞士共产主义者奥·贝克尔出版了他在洛桑发表的演说；演说的标题是“共产主义者要求什么？[142]；这篇演说可以列为我们所知道的这类著作中最优秀、最有力的著作。我敢说这篇演说是值得译成英文的；如果贵报读者中有通晓德语的人来从事这一工作，那我就太高兴了。当然这只是一本小册子。

我希望能经常不断地给你们报道消息。

您的德国老朋友

弗·恩格斯写于1845年4月5日左右　　按报纸原文刊印

载于1845年5月　　原文是英文

10日“新道德世界”第46号

弗·恩 格 斯
在爱北斐特的演说

1845年2月8日的演说

诸位先生！

正如你们刚才听到的，我想，本来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竞争的世界里。现在让我们稍微详细地研究一下这种自由竞争和它所造成的社会秩序。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在单枪匹马地冒着风险工作，每一个人都在竭力使自己发财致富，根本不理会别人在干些什么。这样就谈不上合理的组织，谈不上分工。相反，每一个人都想超过别人，都想寻找一个好的机会来谋取私利，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致去想一想，他自己的利益和其他一切人的利益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各个资本家同其他一切资本家进行斗争，各个工人同其他一切工人进行斗争；所有的资本家反对所有的工人，而工人群众也必然要反对资本家集团。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到处都很混乱、到处都在剥削的现象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但是这种混乱的经营方式最后必定使社会得到最悲惨的结局；作为社会基础的无组织状态和卑视真正的公共福利的态度，迟早总会最明显地暴露出来。这一斗争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小资产阶级即在前一世纪构成国家

的主要基础的等级破产了。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资本的势力如何在摧毁社会的这一个阶级。就拿独立的裁缝和制造家具的木匠来说,由于服装店和家具店拉走了他们的最好的顾客,于是他们就逐渐从小资本家,从**有产**阶级的一员变成依靠别人、为别人工作的无产者,变成**无产**阶级的一员。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就是人们赞扬备至的工业自由所引起的悲惨的后果;这是大资本家对实力较差的竞争者保持的优势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这是资本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趋势的最明显的表现。资本的这种趋势已经为许多人所承认;到处都在抱怨财产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而大多数的人民却愈来愈贫困。这样,在一小撮富翁和无数的穷人之间,就产生了尖锐的敌对现象。这种敌对现象,在英法两国已经尖锐到惊人的地步,在我们这里也愈来愈尖锐了。只要目前的社会基础保存一天,这种少数人发财,广大群众贫困的进程就无法制止;只要社会还没有最后被迫根据较为合理的原则进行改组,这种敌对现象就会愈来愈尖锐。

但是,诸位先生,自由竞争的全部后果还远不止这些。既然每一个人都单枪匹马地冒着风险在那里生产和消费,根本不理会别人在生产什么,消费什么,那末生产和消费必然很快就会完全脱节。既然现代社会把分配产品的工作委托给商人、投机者和店主去做,而这些人又都只顾自己的私利,那末在分配产品时,也就会产生同样的脱节现象,更不用说没有财产的人无法取得他们所必需的那一份了。厂主怎么能够确定他的产品在某一个市场上需要多少呢?姑且假定他能够确定这个数字,但是他又怎么能知道他的竞争者送了多少产品到每一个这样的市场上去呢?一个很可能连自己刚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去路都全然不知的厂主,又怎么能够知

道他的外国竞争者有多少商品送到每一个这样的市场上去呢?关于这一切，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像自己的竞争者一样，凭猜测进行生产,用别人也必定这样行事的话来安慰自己。除了永远在波动的价格水平，他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遵循的。在他发货的时候，商品价格已经完全不同于人家先前用信告诉他的远方市场上的价格了。而当商品将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商品的价格又和启运的时候不同了。在生产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商业中时时产生不景气的现象,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一个国家的工商业愈发达,这种不景气的现象自然也就愈严重。因此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英国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了最明显的例子。由于商业发达,由于在进行生产的厂主和真正的消费者中间插入了许多投机者和经纪人，所以英国的厂主要比德国的厂主更难于知道现有存货和生产同消费之间的相互关系；何况英国的厂主几乎向全世界的一切市场供应商品，他几乎从来不知道他的商品的去路如何，而且英国工业的生产力又非常巨大，所以经常发生各市场转瞬之间即为商品所充斥的现象。商业停顿，工厂开工半天，甚至完全停工，许多人破产了，存货不得不以低得荒唐的价格出售，过去处心积虑地积累起来的资本大部分因为这种商业危机而又重新化为乌有。从本世纪初起，在英国就可以看到一系列这样的商业危机，而最近二十年来，危机每隔五年或六年就重复一次。诸位先生，你们大部分人大概还清楚地记得1837年1842年这两次最近发生的危机吧。要是我国的工业也像英国的工业那样发达，我国的市场也像英国的市场那样遍布各地,那末我们也会遭受同样的后果。现在我们这里的竞争对工商业的影响,表现为工业各部门的普遍的长期萧条,表现为介于一定的繁荣和完全低落之间的悲惨处境，表现为某种

停滞即不活跃的现象。

这种困难处境的真正原因究竟在哪里呢?小资产阶级的破产、贫富之间的鲜明的对照、商业的不景气和由此而产生的资本浪费的现象是由什么引起的呢?就是人们的利益彼此背离。我们大家辛勤劳动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一己之利,根本不关心别人的福利。可是,每一个人的利益、福利和幸福同其他人的福利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事实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不言而喻的真理。虽然我们大家都应该承认,没有自己的伙伴我们就寸步难行,应该承认仅仅是利益把我们大家联系起来,但是我们却以我们的行动来践踏这一真理,我们把我们的社会安排得好像我们的利益不但不能一致,而且还是直接对立的。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严重的错误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要消除这种悲惨的后果,就必须消灭这种错误。而共产主义就抱着这样的目的。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和人的利益并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因而竞争就消失了。当然也就谈不到个别阶级的破产,更谈不到像现在那样的富人和穷人的阶级了。在生产和分配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时候,就不会再发生私人占有的情形,每一个人都不必再单枪匹马地冒着风险企求发财致富,同样也就自然而然地不会再有商业危机了。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无论生产和消费都很容易估计。既然知道每一个人平均需要多少物品,那就容易算出一定数量的人需要多少物品;既然那时生产已经不掌握在个别私人企业主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公社及其管理机构的手里,那也就不难按照需求来调节生产了。

这样,我们看到,在共产主义的组织里,现代社会制度的主要缺陷就会消除。但是,如果我们再稍稍地多从细节方面来考察问

题，我们就会看到，这种组织的优点还不止此。这些优点还表现在消灭其他许多缺点上，今天我只举几个经济方面的例子。在经济方面，当前的社会结构无疑是难以想像地不合理和不切实际的。由于人们的利益彼此对立，大量劳动力就白白地消耗掉了，社会没有从里面得到任何好处，相当多的资本完全浪费掉了，并且没有再生产出来。在发生商业危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种情形。我们看到，人们怎样不顾血本地抛售自己辛辛苦苦地生产出来的大批产品；我们看到，处心积虑地积累起来的大批资本怎样由于所有主的破产而从他们手中飞掉了。现在让我们来稍微详细地考察一下现代的商业。请你们想一想，每一个产品必须经过多少人的手，才能到达真正的消费者的手里！诸位先生，请你们想一想，现在有多少投机倒把的多余的中间人插足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举一包北美产的棉花为例。棉花从种植场主之手转到密士失必河某个码头上的一个经纪人手里，然后顺流而下运到新奥尔良。在这里棉花又卖出去（这是第二次出售，因为经纪人已经从种植场主那里买过一次了），假定是卖给一个投机商，而投机商又转卖给出口商。后来这包棉花，比如说，运到了利物浦，在那里，另一个投机商又伸出了贪婪的手，抓住了这包棉花。这个投机商再把它卖给一个经纪人，而这个经纪人，比如说，又是受德国某公司的委托而买的。这样，这包棉花就运往鹿特丹，再溯莱茵河而上，经过十来个转运商之手，而且还要经过十来次装卸，这时它才到达厂主之手，但是还没有到达消费者的手里。厂主首先将棉花加工，使它适于使用，然后把纺成的棉纱交给织布的人，织布的人将布交给印花的人，然后布匹才到达批发商之手，批发商再把布转给零售商，最后，零售商才把商品送到消费者的手里。所有这些成千上万的中间

人，即投机商、代理人、出口商、经纪人、转运商、批发商和零售商都没有参加商品的生产，但是他们全都要生活，全都想在上面取得利润，而且通常也的确都得到了利润，否则他们就无法生存下去。诸位先生，难道除了这条必须经过十来次出卖、上百次装卸、上百次地从一个仓库运到另一个仓库的漫长的道路之外，就没有更简单更便宜的道路把棉花从美洲运到德国、把棉纺织品送到真正的消费者的手里吗？难道这不是清楚地证明了人们的利益的背离引起了劳动力的巨大的浪费吗？在合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中，就不会有这样繁杂的运输方法。现在我们继续谈这个例子。正如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知道某个移民区消费多少棉花或多少棉纺织品一样，中央管理机构也可以同样容易地知道全国各地和各公社的消费量。只要这种统计工作组织就绪，这种工作在一两年内就可以很容易地完成，每年的平均消费量就只会同人口的增长成比例地变化；因此就容易适时地预先确定，每一种商品要有多少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所需的这些商品也可以按批购的方式直接在产地订购，并且可以直接取得，不必经过中间人，不需要任何停顿和装卸，除了运输条件确实要求这样做而外，这样就大大节省了劳动力，而且不必付给投机商、大小商人以利润。还不仅如此，这样一来，所有这些中间人非但不再为害社会，而且甚至会对社会有利。他们现在干的是对其余的人有害的事情，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些多余的事情，但是他们还是取得了足够的生活资料，而在很多场合下，他们甚至还大发其财；因此，他们现在是在直接损害公共福利，而将来他们的双手就会解放出来参加有益的活动；他们一定可以找到一种职业，这种职业能使他们不是作为表面上的、假的社会成员而出现，而是作为人

类社会的真正的成员、人类社会的共同活动的参加者而出现。

现代社会促使个人敌视其他一切人，这样就引起了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社会战争，这个战争在某些人那里，尤其是在文化水平低的人那里不可避免地会采取粗暴的野蛮的暴力形式，即犯罪的形式。为了使自己不受犯罪行为即公开的暴力行为的侵害，社会就需要有庞大而复杂的、耗费无数人力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这些机关也将无限地加以简化，而这正是因为（不管看起来是多么奇怪）在这种社会里，管理机构必须管理的不仅是社会生活的个别方面，而且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切表现、一切方面。我们消灭个人和其他一切人之间的敌对现象，我们用社会和平来反对社会战争，我们彻底铲除犯罪的**根源**，因而就使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目前的大部分工作、甚至是很大一部分工作成为多余的了。现在因情欲而犯罪的现象已经愈来愈多地让位于因利害得失而犯罪的现象，就是说，侵犯**人身**的犯罪次数愈来愈少，而侵犯**财产**的犯罪次数却不断增加。在处于战争状态下的现代社会里，文明的增进已经可以减少情欲上的强暴表现，要是在共产主义的、和平的社会里，情况还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呵！在每一个人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需求都得到满足的地方，在没有什么社会隔阂和社会差别的地方，侵犯财产的犯罪行为自然而然地就不会再发生了。刑法会自行消失，民法（它几乎只是专门处理财产关系或者至多是专门处理那些以社会的战争状态为前提的关系）也会不再存在。现在的各种争端是人们互相敌对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到那时就只是罕有的例外，并且很容易通过仲裁法庭来调解。现在，行政机关的工作也是针对经常的战争状态的，就是说，警察机构和整个行政机关都专心致力于使战争保持隐蔽的和间接的形式，使战争不致变为公

开的暴力行为，变为犯罪。如果说，维护和平要比在一定地区内进行战争容易得多，那末，管理共产主义社会，就不知要比管理笼罩着竞争的社会容易多少倍。如果说，文明甚至在现在就已经教人们懂得，只有维护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利益，才能有自己的利益，从而尽可能地使警察机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变成多余的东西，那末，在利益的共同已经成为基本原则、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的社会里，情况还不知要好多少倍呵！现在是违反社会制度而实现的东西，在社会制度不再阻碍、反而予以促进的时候，将不知要传播得多广呵！因此，即使从这一方面来看，我们也有理由预期，由于当前的社会制度从社会那里夺走人手的事情不再发生，劳动力将会增加很多。

常备军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耗费最大的设施之一，它夺走了一个国家中最强壮、最必需的那部分居民，使这部分居民不能从事生产，使国家不得不供养他们。从我们的国家预算中可以看出，我们为常备军花费了多少：每年花钱2400万，从生产中夺走20万双最结实的手。而在共产主义的社会里，谁也不会想到什么常备军。要常备军来做什么呢？为了维持国内的安宁吗？我们已经知道，谁也不会想到去破坏国内的安宁。对革命的恐惧只是人们的利益互相对立的结果，只要大家的利益一致，就不会有这样的恐惧。是为了进行侵略战争吗？共产主义社会十分明白，战争只会使它损失人员和资本，而它取得的至多只能是几个怨声载道、因而也只会破坏社会秩序的省份，它又怎么会进行侵略战争！是为了自卫吗？自卫也不需要常备军，因为要使每一个适于作战的社会成员，为了保卫国家而不是为了参加检阅，在自己的本行职业之外学会掌握武器，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时请你们注意一下，一旦发生战

争（当然这种战争**只能是对付那些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的），这个社会的成员一定会保卫**真正**的祖国、**真正**的家园，因此他们将精神焕发、坚毅勇敢地作战，使受过机械化训练的现代军队也要望风披靡。你们想一想，在1792年到1799年这个时期革命军队，即仅仅为了一种**幻想**、为了**想像的祖国**而战的军队因情绪激昂而作出了怎样的奇迹，你们就会明白，不是为了幻想、而是为了一个实在的可以捉摸的目标而战的军队将具有什么样的力量。这样，在共产主义的组织中，现在由于维持军队而从文明的人民那里夺走的无数的人力就将重返劳动岗位，他们不仅会生产出自己所消费的产品，而且还能生产出比供养他们自己、比补充社会储备所必需的还多得多的产品。

在现在的社会里，人力的更大浪费表现在有钱人滥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上。我根本不打算在这里谈那种仅仅为了炫耀自己而占用了许多劳动力的、无益的、简直是荒唐的浪费现象。但是请你们去看一下富翁的公馆、富翁的内室，然后告诉我，许多人服侍一个人，因而弄得无事可干，或者至多也只做些由于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中而必须做的工作，这难道不是劳动力的荒唐的浪费。所有这些女仆、厨子、听差、车夫、家人、园丁等等到底干些什么呢？一天只有**那么少的几分钟**他们是**真正**用来使他们的主人生活得愉快，使他们的主人易于自由地发挥和利用自己的人的特性和才能；一天又有**多少钟点**他们是用来做下面这些仅仅由于我们的社会关系安排得不好而产生的事情，这就是站在马车的侍从座上，满足主人的癖好，牵着只小狗跟在主人后面，以及其他各种可笑的事情。在合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能够生活，他们不再成为老爷们的癖好的奴隶，而且也想不到这些癖好。在这样

的社会里，目前浪费在服侍人们过奢侈生活的劳动力自然就转而为大家造福，为劳动者自己造福。

此外，在今天的社会里，直接由于竞争的影响，产生了浪费劳动力的现象，因为竞争使大批的人失了业；他们**很想**工作，但是却**得不到**工作。既然社会根本不是从考虑劳动力的真正使用上建立起来的，既然每一个人都得自己去寻找生活，那末，在分配真正有益的工作或者似乎有益的工作时，很大一部分工人很自然地就没有工作做了。这由于下面这种情况而表现得更加严重，这种情况就是：竞争迫使每一个人鼓起全部力量，利用自己的一切可能，以廉价的劳动力来代替高价的劳动力，而文明的日益增进也为此创造了更多的条件，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去抢夺别人的饭碗，用一切办法挤掉别人的工作。因此，在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里，都有大批很想工作但是却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而且这个失业人数比人们通常想像的要大。我们看到，人们用一定的方式出卖自己：他们求乞；打扫街道；站在街道拐角处等候某种工作；替别人做些偶然得到的零活以求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拿着各色各样的零星杂货叫卖；或者像我们在今天晚上所看到的一些穷人家的姑娘一样，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弹着吉他卖唱，仅仅为了赚几个小钱而不得不听各种无礼的和侮辱人的话。而终于**真正**不得不去卖淫的人们又不知有多少呵！这些不得不采取某种方式出卖自己的失业者数量是很大的，我们的慈善机关可以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同时也不应该忘记，虽然这些人对社会毫无益处，社会还是要通过某种方式来养活他们。既然社会要负担养活这些人的费用，那末社会也就应该关心这些失业者，使他们能**正大光明地**谋生。但是在竞争统治着一切的现代社会里，这是**无法**办到的。

诸位先生，你们想一想上面所谈的一切（我还可以举出许多别的例子来说明现代社会如何浪费劳动力），你们就会发现人类社会拥有极其丰富的生产力，这些生产力只要合理地组织起来，妥善地加以调配，就可以给一切人带来最大的利益。根据这一切，你们就可以断定，担心公正地分担社会活动以后每个人的劳动负担就会大得使他不可能去做别的事情，那是多么没有根据。其实我们可以设想，在这样的组织下，由于利用了现在完全没有利用的或者利用得不够恰当的劳动力，每个人的一般工作时间就会比现在缩短一半。

但是共产主义的组织因**利用目前被浪费的劳动力**而表现出的优越性**还不是最重要的**。把**个别的力量**联合成社会的集体力量，以从前彼此对立的力量的这种集中为基础来安排一切，才是劳动力的最大的节省。在这里，我赞成英国的社会主义老**罗伯特·欧文**的一些主张，因为这些主张最实际、最完善。欧文提议建造一些大公寓来代替现在那些房屋分散而且彼此妨碍的城市和村庄。每一公寓占地长宽各约1650英尺，附有大花园，可以舒适地居住两三千人。显而易见，建造这种能使住户享受现代最好的住宅设备的房屋，比起为同样多的人建造单独的、多半没有那么舒适的现有式样的住宅来，要便宜得多和容易得多。现在几乎每幢大厦都存在的许多房间常年空着或者每年只使用一两次的现象就可以消灭，而且不会有任何不方便；储藏室和地下室等等的用地也同样可以大大节省。要是深入地看一下家务琐事，那末公共经济的优越性就表现得特别明显。现在的分散经济，就拿取暖来说，不知浪费了多少劳动和物资！每一个房间必须有一个火炉，每一个火炉必须分别生火、添煤和照顾；必须把燃料送到每一个房间，而炉灰还得加以

清除。可是像目前的一些大的公共建筑物，如工厂、教堂等，装置一个巨大的总的取暖设备，比如说，用一个发热中心和一些蒸气管子来代替这些单独的火炉，是多么简单和便宜。其次，瓦斯灯目前费用还很贵，因为连最细的管子也得敷设在地下，而管子又因为我们城市里需要照明的面积很大，必须敷设到很远的地方。可是，如果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来安排这一切，所有一切就都集中在1650英尺见方的地面上，而瓦斯灯的数目并不会减少，结果，这种照明的费用无论怎样也不会比一个中等城市所花的费用更多。再其次，我们拿做饭来说，在现在这种分散经济的情况下，每一个家庭都单独准备一份自己所必需的、分量又不多的饭菜，单独备有餐具，单独雇佣厨子，单独在市场上、在菜场里向肉商和面包商购买食品，这白白占据了多少地方、浪费了多少物品和劳动力！可以大胆地假设，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务所，从事这一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会很容易地解放出来，而其余的三分之一也能够比现在更好、更专心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最后，看看收拾房屋的工作吧！要是这些工作也组织起来和正确地加以分配(在那种条件下这是完全可能实现的)，那末打扫和收拾这种建筑物难道不比打扫和收拾两三百幢单独的房屋容易万倍吗？而像现在这样安排，两三百幢房屋中住的人也就不过两三千人呵。

这不过是从人类社会的共产主义组织在经济方面的无数优点中举出来的几个例子而已。我们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用不多的几句话向你们阐明我们的原则，适当地、全面地论证我们的原则。我们根本没有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我们只能够，而且也只希望阐明几点，促使那些还不熟悉这个问题的人去研究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希望今天晚上至少已经向你们阐明了一点，那就是共产

主义不仅不同人的本性、理智、良心相矛盾，而且也不是脱离现实的、只是由幻想产生的理论。

也许有人要问：如何实现这种理论，我们能够采取一些什么措施来实现这种理论?达到这个目的有各种不同的方法。英国人大概会从建立一些单独的移民区开始，然后让每一个人去决定自己是否参加移民区!法国人却刚刚相反，他们也许会在全国范围内准备和实行共产主义。至于德国人从什么地方着手还很难说，因为社会运动在德国还是一种新的现象。我现在只从能够实现共产主义的许多办法中间提一下近来谈得很多的一种办法，这就是采取三个必然会促使共产主义实现的措施。

第一个措施是由国家出资对一切儿童毫无例外地实行**普遍教育**，这种教育对任何人都是一样，一直进行到能够作为社会的独立成员的年龄为止。这个措施对我们的穷弟兄来说，只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都无可争辩地有权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而且当社会使愚昧成为贫穷的必然结果的时候，它就对人犯下了双重的罪过。显而易见，社会成员中受过教育的人会比愚昧无知的没有文化的人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好处。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受了教育之后必然不愿再忍受现代无产阶级所受的那种压迫，那末从另一方面来看，和平改造社会时所必需的那种冷静和慎重只有**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才能具有。但是现在连**没有受过教育的**无产阶级也不愿意继续处于目前的状况了。甚至在德国我们也能够找到证明，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骚动就是例子。至于别的国家就更不必说了。

第二个措施是全面**改组济贫所**，把所有失业公民都安置在移民区内，让他们在里面从事工农业劳动，并把他们的劳动组织起

来为全移民区造福。到目前为止，济贫所还把它掌管的资本用来放债生息，这就为有钱人剥削穷人创造了更多的机会。现在毕竟应该是把这些资本真正用来为穷人造福的时候了，应该是把这些资本的全部收益，而不仅仅是其中的百分之三给穷人的时候了，应该是作出资本和劳动的联合的卓越榜样来的时候了！一切失业者的劳动力都应当像这样用来为社会谋福利，而这些被迫堕落的受尽压迫的赤贫汉将会转变为文明的、自食其力的、勤勉的人；他们所处的环境，很快就会使没有联合起来的工人感到羡慕，并且为彻底改组社会开辟道路。

要贯彻这两个措施就需要钱。为了取得这些钱，同时为了改变到现在为止一切分担得不公平的赋税，在现在提出的改革计划中就应该建议采取普遍的资本累进税，其税率随资本额的增大而递增。这样，每一个人就按照自己的能力来负担社会的管理费用，这些费用的重担就不会像一切国家中以往的情形那样，主要落在那些最没有力量负担的人们的肩上。纳税原则本质上是纯共产主义的原则，因为一切国家的征税的权利都是从所谓国家所有制来的。的确，或者是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这样就没有什么国家所有制，而国家也就无权征税；或者是国家有这种权利，这样私有制就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所有制就高于私有制，而国家也就成了真正的主人。后面这个原则是大家公认的。好吧，诸位先生，我们现在就只要求大家遵守这个原则，要求国家宣布自己是全国的主人，从而用社会财产来为全社会谋福利；我们要求国家实行一种只考虑每一个人的纳税能力和全社会的真正福利的征税办法，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第一步。

这样，诸位先生，你们就看到，我们谈的不是不顾民族的意志

立即实行财产共有，而是首先要确定**目标**和保证我们能够向这个目标迈进的**办法**和**途径**。至于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将来的原则这一点，一切文明国家的发展进程可以证明，迄今存在的一切社会制度的迅速瓦解可以证明，人的良知、首先是人的良心可以证明。

这篇演说是弗·恩格斯1845年2月8日在爱北斐特的集会上发表的
演说全文第一次刊载于1845年“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1卷

按杂志原文刊印
原文是德文

1845年2月15日的演说

诸位先生！

在上次会上有人责备我，说我所举的例子和证据几乎都是其他国家的，特别是英国的。有人说，法国和英国跟我们无关，我们生活在德国，我们的任务是证明共产主义在德国有其必然性和优越性。有人还责备我们，说我们根本没有充分证明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完全正确，而且也不能不是这样。证明历史必然性不可能像证明两个三角形全等那样快；历史必然性只有经过研究和全面的论证才能得到证明。尽管这样，今天我还是要竭力消除引起这些责备的原因，竭力证明共产主义对**德国**说来即使没有历史的必然性，至少也有**经济上的必然性**。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德国目前的社会状况。我国有大量的贫民，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事件本身就说明了这些地方的状况。摩塞尔和埃斐尔两地区的贫困状况，“莱茵报”已经详细地报道过了[143]。厄尔士山区自古以来就被可怕的贫困笼罩着。在捷涅和威斯特伐利亚的麻纺业区情况也不见得好些。德国各地都怨声载道，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的无产阶级人数众多，这也不能不是这样，即使我们极其肤浅地考察一下我们的社会状况，我们也一定会相信这一点。**工业区**一定有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工业要是没有大批全力为它效劳、为它工作而且不再从事其他任何行业的工人，就不可能存在。只要竞争存在一

天，工业劳动就使工人不可能从事其他任何行业。所以在所有的工业区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他们这样多，这样引人注目，要否认他们的存在是不可能的。许多人断言：**农业区**刚刚相反，那里一定不会有无产阶级。但是，这是否可能呢？在大土地所有制占优势的地方，农业无产阶级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农场需要男女雇农，没有无产者，大农场就不可能存在。在土地分散的地方，同样也无法避免产生一无所有的阶级，因为土地分散有一定的限度，它不可能超过这个限度再分下去，而且因为那时土地只为家庭的一个成员所有，所以其余的成员就不得不变为无产者，变为一无所有的工人。同时，土地的分散通常总是要分到土地小得不能养活一家人为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像城市小资产阶级一样，形成了由有产阶级过渡到一无所有的阶级的阶梯。土地不让这些人去另谋生计，但同时又不能供给他们足够的生活资料。这个阶级也是极端贫困的。

这个无产阶级的人数必然会不断增加，这个结论，我们可以从小资产阶级的不断贫困化（这一点我在上星期已经详细谈过了）和资本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趋势得出来。今天我也许没有必要再来谈这些问题，我只想指出，这些不断产生无产阶级并日益扩大其队伍的原因，仍然起着作用，而且只要竞争不停止，它们就会引起同样的后果。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仍然单枪匹马地进行生产，并把自己和其余的一切人对立起来，那末无产阶级就不但会存在下去，而且它还会不断扩大，会成为现代社会中愈来愈吓人的力量。但是总有一天无产阶级的力量会强大起来，觉悟会提高起来，他们再也不愿载负着一直压在他们肩上的整个社会大厦的重担，他们会要求更公平地分配社会的负担和权利。那时，如果人的

本性还不改变的话，社会革命就不可避免了。

这个问题我们的经济学家直到现在还丝毫没有加以研究。他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国民财富的分配，而仅仅是国民财富的创造。但是，我们暂且不谈我们刚才指出的那个论点，即竞争本身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社会革命；我们来研究一下竞争所表现的几个形式，研究一下德国在经济上可能走的几条道路，并且看看它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德国，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德意志关税同盟目前实行着 juste — milieu〔中庸之道的〕关税制度。对真正的保护关税来说，我们的关税太低，对自由贸易来说，我们的关税又太高。因此有三种可能：或者是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或者是以高额的关税来保护自己的工业，或者是维持目前的制度不变。现在我们来分别研究一下每种情况。

如果我们宣布**贸易自由**并取消我们的关税，那末我们的全部工业，除去少数几个部门，都会垮台。那时，棉纺业、机织业、棉纺织业和毛纺织业中的大多数部门、丝纺织业中的主要部门以及几乎整个采铁业和制铁业都谈不上了。所有这些工业部门的工人都会突然失业，他们将像潮水般地涌入农村和余下的幸免于难的工业部门。贫穷的现象开始到处迅速地扩大，财产向少数人手里的集中将因这种危机而加速，根据西里西亚事件就可以判断，社会革命就是这种危机的必然结果。

现在假定我们实行**保护关税**。这种关税制度近来已成了我国大多数工业家的宠儿，因此应当更仔细地加以研究。**李斯特**先生已经使我们的资本家的愿望成了一个体系[144]，我也想来谈谈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作自己的信条的这个体系。李斯特先生主张实行逐渐

提高的保护关税，这种关税最后要提高到足以保证厂主们把持国内市场的水平；在一定时期内关税应该保持在这个高的水平上，然后才开始逐渐降低，经过若干年后就最后取消保护关税制度。我们假定这个计划实行起来了，逐渐提高的保护关税制度也明令公布了。工业发达起来，游资投入了工业企业，对工人的需求增长起来，工资也跟着提高，济贫所空闲起来，从表面现象看，全盛时期来到了。这种情况将会继续下去，一直到我们的工业发达得足以满足国内市场为止。工业要进一步扩展是不可能了，因为它既然没有关税的保护就不能保住**国内**的市场，那末在中立的市场上它就更经不起外国的竞争了。李斯特先生认为到那时我国的工业已经非常巩固，因而就不大需要关税的保护，并且可以开始降低关税。我们暂且假定事情果然是这样。关税不断在降低。它不在第一次降低税率时，就得在第二次或第三次降低时，不可避免地要降到使外国工业，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使英国工业能够在德国市场上和我们自己的工业竞争。这正是李斯特先生所希望的。但是这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呢？从这时起，德国的工业就得和英国的工业一起经受一切波动和一切危机的考验。一当英国商品塞满海外市场，英国人就会像他们现在那样干起来，正如李斯特先生动人地描绘的那样，他们会把自己的全部储存都抛到他们所能达到的最近一个市场——德国市场上来，这样他们就重新把关税同盟变成自己的“旧货店”。接着英国工业很快又恢复元气，因为全世界都是它的市场，因为全世界没有它就不成，然而没有德国的工业就连德国自己的国内市场也可以过得去，而且德国工业就是在自己国内也得担心英国的竞争，深受在危机时期供应它的顾客的英国商品过多之害。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工业就必然会尝尽英国

工业在困难时期所尝的痛苦，而得到的却仅仅是繁荣时期所带来的那些利益中极微小的一部分。一句话，那时我们的处境就和现在一样。如果我们推论到底，那时就会呈现出半受关税保护的工业部门目前所处的那种被压抑的状况；那时企业就会一个跟一个地倒闭，而新的企业又建立不起来；那时我们的机器会变成陈旧过时的东西，而我们又没有能力用新的完善的机器来代替它们；那时停滞就会变为倒退，而且照李斯特先生的判断，工业就会一个部门跟一个部门地萎缩下去，并最终关门大吉。但是，那时我们就会有一个由工业产生出来的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他们既没有生活资料，又没有工作。诸位先生，那时这个无产阶级就会向有产阶级索取工作和面包。

这样的事情是在降低关税的情况下发生的。现在我们假定不降低关税，而使它保持在高的水平上，直到我国厂主之间的竞争使它成为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因而可以降低的时候再降低。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德国的工业刚刚发展到能够充分供应国内市场的时候，就停滞不前了。新的企业是不需要的，因为现有的企业就已经足够满足市场的需要了，而新的市场，正如上面已经谈到的，在工业还不能不需要关税保护的时候，就更不要妄想了。但是，工业如果得不到扩展，那也就不可能得到改善。无论工业的外部或内部都是一片停滞的景象。对工业来说，改善机器是不可能的，因为旧的机器不能抛弃，而新的机器又没有新的企业来使用。可是别的国家却在前进，只是我们的工业从停滞变为倒退。经过一段不长的时间，英国人由于有了新的成就，就可能生产出很便宜的商品来和我们的落后的工业竞争，而且尽管我们有保护关税，还是可以在我们的国内市场上竞争。因为在竞争的搏斗中，也像在任何其他的斗争

中一样，总是力量最强的取得胜利，所以我们最终失败是没有疑问的。那时我在上面谈到过的那种情况就会重演；人为地创造出来的无产阶级就会向有产阶级索取他们要保持特殊的有产者的地位就不能给予的东西，那时社会革命就会爆发。

也可能产生这样一种令人非常难以置信的情况：我们德国人依靠保护关税大大地发展了我们的工业，从而没有保护关税它也能和英国的工业竞争。假定情况果然是这样，那末结果会怎样呢？我们在国外的中立市场上一开始和英国人竞争，在我们的工业和英国的工业之间就会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英国人会尽一切力量不让我们进入一直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市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生存的泉源，他们的要害受到了威胁。他们使出自己所有的一切手段，利用百年来的工业的一切优越性就能把我们打垮。他们会把我们的工业限制在我们自己的市场范围内，这样也就阻止了我国工业的发展；那时就会造成像我们在前面谈过的那种情况——我们停滞不前，英国人却在前进；我们的工业既然不可避免地要衰败下去，也就无力养活那人为地创造出来的无产阶级，于是社会革命就要爆发。

即使假定我们能够在中立的市场上打败英国人，把他们的销售市场一个一个地夺过来，但是我们在这种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会赢得些什么呢?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只会重复英国人在我们之前就走过的那条工业发展的老路，而且我们迟早会面临英国人目前所处的那种境地，就是说，我们将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夕。但是从各种可能性看来，这种情况是不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就会到来的。德国工业的不断胜利必然要破坏英国的工业，并且只会加速英国人本来就已经面临着的无产阶级反对有产阶级的群众性起义。迅

速增长的失业现象会促使英国工人起来革命，而在目前的形势下，这种社会革命将会给大陆上的国家，特别是给法国和德国以巨大的影响。由于工业加速发展而人为地造成的德国无产阶级的人数愈多，这个影响也就愈大。这种革命立刻就会成为全欧洲的革命，并且毫不客气地粉碎我们的厂主对德国的工业垄断所抱的幻想。英国工业和德国工业和平共处是不能设想的，竞争已经使这样的事情成为不可能了。我再说一遍，工业必须不断地发展才不致于落后和灭亡；它必须扩展，必须获得新的市场，不断增加新企业，否则它就不可能前进。但是，自从中国的港口开放以后[145]，夺取新市场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而只能加紧压榨现有的市场，加之将来工业的扩展要比现在缓慢得多，所以英国现在比以前更不能容忍竞争者了。为了保护本国的工业，使它不致灭亡，英国必须使其他国家的工业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对它来说，保持工业的垄断已经不纯粹是一个获利多少的问题，而变成**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了。不用说，各国之间的竞争比个人之间的竞争要激烈得多，要尖锐得多，因为这是一个集中的、大规模的斗争，这个斗争只能以一方的决定性胜利和他方的决定性失败而告终。因此，我们和英国人之间的这种斗争，不管结果如何，既不会给我们的工业家，也不会给英国的工业家带来好处，它只能引起社会革命，正如我刚才所证明的那样。

诸位先生，我们已经考察了德国在一切可能条件下能够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制度中得到的东西。我们还得考察一种经济上的可能性，这就是保持目前所实行的juste— milieu〔中庸之道的〕关税制度。但是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们的工业一定会一个部门跟一个部门地倒闭，产业工人

会没有饭吃，而失业的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反对有产阶级的革命就会爆发。

可见，详细考察的结果完全证实了我在最初根据竞争所做的概括性的说明，即**社会革命**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关系在任何条件和任何情况下必然引起的后果。正如我们可以有把握地从已知的数学公理中得出新的定理一样，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从现存的经济关系和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中得出社会革命即将到来的结论。但是，让我们比较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革命。它将以什么形式出现呢?它的结果会怎样呢?它和以往一切暴力革命有什么区别呢?社会革命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政治革命，它的矛头不是对着垄断权的所有，而是对着所有权的垄断；社会革命是**穷人反对富人的公开的战争**。所有那些过去在历史上的冲突事件中表现得不显著的隐蔽的动力和原因，都会在这个斗争中明显而公开地显示出来，所以这个斗争无论如何要比以往的一切斗争更尖锐、更残酷。斗争的结果可能有两个。或者是起义者只打击了表面现象而没有打击本质的东西，只打击了形式而没有打击事物的实质；或者是他们找到了事物的本质，抓住了祸根。在前一种情况下私有财产将被保存下来，而只是重新加以分配，结果，造成目前这种情况的原因仍将继续起作用，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些原因又会造成同样的情况，引起新的革命。但是这是否可能呢?我们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样一种确实没有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的革命呢?英国的革命既实现了宗教原则，又实现了政治原则，这次革命是由于查理一世反对这些原则而引起的；法国资产阶级在反对贵族和旧的君主制的斗争中赢得了他们所追求的一切，消灭了激起他们起义的一切流弊。难道穷人的起义会在贫困和贫困的根源消灭以前停

止吗?这是不可能的。承认这种事情就等于否认全部历史经验。就从工人的发展水平，特别是从英法两国工人的发展水平来看，我们也已经有理由认为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后一种假设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不会不触动匮乏和穷困、愚昧和罪恶的真正根源，因而它一定会实现真正的社会改革。而这就只有靠宣布共产主义的原则才能实现。请你们想想那些激动着连工人也在思考的国家里的工人的思想；请你们看看法国工人运动的各个派别，难道这一切都不是共产主义的吗?请你们到英国去听听，那里向工人提出了什么样的改善工人状况的计划，难道所有这些计划都不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原则上吗?请你们研究一下各种不同的社会改革方案，难道你们能够从里面找出许多非共产主义的东西来吗?到现在还有意义的一切方案中，唯一非共产主义的是傅立叶的方案，因为他更多地注意人类活动的社会组织，而较少地注意人类所生产的产品的分配。所有这些事实都证实了这个结论：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将以共产主义原则的实现而告终；别的可能性是不会有的。

如果这些结论是正确的，如果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实现是我们的现存关系的必然结果，那末我们首先就得采取措施，使我们能够在实现社会关系的变革的时候避免使用暴力和流血。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和平实现共产主义，或者至少是和平准备共产主义。所以，如果我们不愿意用**流血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如果我们不愿意使我们的无产者的智力水平和生活状况之间的日益加深的矛盾尖锐到像我们对人性的理解所启示的那样，必须要用暴力来解决，要在绝望和强烈的复仇心中来解决，那末，诸位先生，我们就应当认真地和公正地处理社会问题，就应当尽

一切努力使现代的奴隶得到与人相称的地位。或许你们当中有人觉得，要提高以前被轻视的阶级的地位，就不能不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就应当记住，我们谈的是为**所有的人**创造生活条件，以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的本性，按照人的关系和他的邻居相处，不必担心别人会用暴力来破坏他的幸福；而且也应当记住，个人不得不牺牲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人生乐趣，而仅仅是我们的丑恶的制度所引起的表面上的享乐，它是和目前享受这些虚伪的特权的人们的理智和良心相矛盾的。我们决不想破坏那种能满足一切生活条件和生活需要的真正的人的生活；相反地，我们尽一切力量创造这种生活。即使把这点撇开不谈，如果你们认真地考虑一下，我们现代的制度一定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这种制度会把我们引入什么样的矛盾的迷宫，什么样的混乱状态，那末，诸位先生，你们也肯定地会得出结论说，社会问题是值得认真而彻底地加以研究的。如果我能促使你们这样做，那末我的演说的目的也就完全达到了。

这篇演说是弗·恩格斯1845年2月15日在爱北斐特的集会上发表的

演说全文第一次刊载于1845年“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1卷

按杂志原文刊印

原文是德文

弗·恩格斯

最近发生的莱比锡大屠杀。——德国工人运动

莱比锡大屠杀[146]您在贵报最近一号上曾经评论过，而且在几星期前曾做过比较详细的报道。这场大屠杀现在还继续为德国各报所注意。它的卑鄙程度只有彼得卢事件[147]才能超过。它是德国军事专制制度所策划的暴行中最卑鄙的一个。当人民高呼"隆格万岁！"、"打倒罗马教！"的时候，萨克森亲王约翰（顺便谈一下，他是我们的许多写诗著书的王公大人中的一个，曾发表过意大利诗人但丁的作品"地狱"的拙劣译文），这位"地狱"的译者就想在他的文学声誉上添上军事荣誉，因而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发起了狡诈卑鄙的进攻。他命令当局调来的步兵营分为几队，封锁通往爱好文学的"王储殿下"的官邸的各条道路。兵士接受了命令，把群众包围起来，迫使他们聚集在一起，然后把他们赶向官邸的大门；正是群众被按照约翰亲王的命令行动的兵士们逼近了官邸的神圣大门成了向群众开火的口实，而政府的报纸也正是企图拿这一点来为枪杀事件辩护！但是，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几队兵士把群众包围起来以后，就按照王储殿下的诡计向这些赤手空拳的群众交叉扫射。群

众不管往哪里走，都遭到像雨点一般的枪弹的射击。要不是比约翰亲王人道一些的兵士多半都对空射击，那末，这场屠杀就会成为一场极其骇人听闻的屠杀。这种卑鄙的暴行引起了普遍的愤怒；就是现存制度的最忠良的臣民、最热烈的拥护者也都感到愤怒，并对这种行为表示极端厌恶。不过这一事件倒会给萨克森带来不少好处，因为这里是德国最爱空谈最缺乏行动的地方。萨克森人有一个小小的立宪政府，有自己的议会清谈馆、自己的自由主义的议员和自由主义的开明的牧师等等，在德国北部算是温和的自由主义即德国的辉格主义的代表；虽然这样，但是和普鲁士人比较起来，他们更是普鲁士国王的奴隶。不管普鲁士政府通过什么决议，萨克森内阁都得执行；而且近来普鲁士政府甚至懒得和萨克森内阁打交道，而直接向萨克森的下级官吏发号施令，就好像他们不是为萨克森服务而是为普鲁士服务似的！萨克森听命于柏林，而不是听命于德累斯顿；可是，尽管萨克森人喜欢空谈和吹嘘，他们还是清楚地知道普鲁士的铁掌紧压在他们的身上。莱比锡的这场大屠杀会结束萨克森人的这种空谈和吹嘘，自傲和自满，——正是这些东西使萨克森人感到自己是一个和普鲁士人及其他德国人迥然不同的特殊的民族。萨克森人现在一定会知道，他们也像其他一切德国人一样处在军阀统治之下；他们一定会知道，尽管他们有宪法、自由主义的法律、自由主义的警报检查制度和国王的自由主义言论，但是在他们这个小国家中实际存在的不过是军法而已。另外也还有一个因素有助于莱比锡事件在萨克森传播这种反抗情绪。不管萨克森的自由派怎样吹嘘，但是大多数的萨克森人只是在现在才开始说话。萨克森是一个工业国，那里的麻纺织工人、针织工人、棉纺工人、花边工人、煤矿工人和采矿工人自古以来一直就是极端穷困

的。从西里西亚起义（即通常所谓的1844年6月的织工斗争）开始的无产阶级运动已经蔓延到整个德国，当然也触及了萨克森。不久以前，在许多地方的铁路建筑工人中和印花工人中都发生了骚动；这里也和其他地方一样，共产主义很可能正在工人中传播开来，虽然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材料可以拿来做证明。如果萨克森工人登上斗争的舞台，他们肯定地不会像他们的雇主自由资产者那样空谈一下就完事。

另外我还请您注意一下德国工人阶级的运动。您上星期在贵报上预言我国将发生光荣革命——不是1688年那样的革命[148]。在这一点上您完全对。不过我只希望修正一点，或者更确切地说，只希望把您所说的说得更明确些，那就是：实现这一变革的将是德国的青年。但是这种青年不应该在资产阶级中去寻找。德国的革命行动将从我们的工人当中开始。的确，在我们的资产阶级当中也有不少的共和主义者以至共产主义者，而且也有不少这样的青年，如果现在爆发革命，他们在运动中就会非常有用；但是这些人是资产者，是追求利润和经营企业的人。谁能向我们担保，这些人不会因他们的职业，不会因他们的社会地位而堕落腐化？就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才靠他人的繁重的劳动来生活，靠吮吸工人阶级的血、榨取工人阶级的脂膏来养肥自己。即使他们仅仅在职业上是资产者而在思想感情上是无产者，但是和那些因本身利益而死抓住现存秩序不放并一心只想塞满自己钱袋的资产者相比，他们在人数上实在太少了。所幸的是我们根本没有指靠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展开了，一两年后，我们就可以检阅光荣的工人队伍，即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队伍，因为在我国对工人阶级来说，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个东西。1844年西里西亚

的织工发出了信号，波希米亚和萨克森的印花工人和铁路建筑工人、柏林的印花工人以及几乎整个德国的产业工人都纷纷举行罢工和局部的起义来响应；这些起义几乎都是由于法律禁止结社而引起的。现在运动差不多扩展到了全国，并且还在继续平稳地发展，可是资产阶级却只是在鼓吹“宪法”、“出版自由”、“保护关税”、“德国天主教”和“新教改革”。虽然所有这些资产阶级运动都有它们的作用，但是根本不能影响工人阶级，因为工人阶级有自己的运动，即饭碗问题的运动。

在下一封信中我将详细地谈这个问题。

弗·恩格斯写于1845年9月8日至11日
载于1845年9月13日“北极星报”第409号
并在标题下附有编者注：本报通讯员来稿

按报纸原文刊印
原文是英文

弗·恩格斯
德　国　状　况

给“北极星报”编辑的第一封信

亲爱的先生！

遵照您的愿望，我从这封信起，开始有系统地撰写几篇文章，阐述我的祖国的现状。为了使大家能完全理解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并且证明这些意见都有充分根据，我必须简短地叙述一下那件震撼现代社会基础的事件（我指的是法国革命）以后的德国历史。

古老的德国当时叫做**神圣罗马帝国**，它由无数的小邦，即无数的王国、选帝侯国、公国、大公国和最大公国、侯国、伯爵领地、男爵领地和帝国自由市所组成，它们彼此独立，只服从皇帝和联邦议会的权力（假使有这样的权力的话，但是事实上几百年来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权力）。这些小邦独立自主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每当和“最大的敌人”（当然是法国）交战时，总有某些小邦和法国国王转成同盟，公开地对自己的皇帝作战。联邦议会由所有这些小邦的代表团组成并由帝国的代表主持，它的使命是限制皇帝的权力。它经常召集会议，但是从来没有任何结果，哪怕是最微小的结果也没有。代表们把时间都浪费在讨论最无谓的礼节问题上，例如说，某某男爵使团（可能是由他的儿子的家庭教师和一

个着制服的老仆人或年迈的森林看守者组成）的地位是否应该比某某男爵使团的地位高些，或者一个帝国自由市的代表是否不必等待另一城市的代表表示欢迎便先行向他致敬等等。此外，他们还为了许多微不足道的特权争吵不休，其实这些特权大部分都是特权享有者本身的累赘，但是他们认为事关荣誉，因此在这些问题上争吵得特别厉害。诸如此类的重大事情占去了英明的联邦议会这样多的时间，当然这个可敬的会议就没有任何时间来讨论帝国的问题了。因此，到处都是一片混乱。无论在战时或平时都被内部纷争弄得四分五裂的帝国，从宗教改革到1789年经历了一系列的内战，并且在每次战争中法国总是和强的方面结成同盟来反对帝国中力量薄弱的易于征服的方面，当然它攫得的东西也最多。最初是勃艮第，接着是三个主教管区——麦茨、土尔和凡尔登，其次是洛林的残留部分，再其次是弗兰德斯的一部和亚尔萨斯全部就这样脱离了神圣罗马帝国而归并于法国。于是瑞士也脱离帝国而独立，比利时则依照查理五世的遗嘱让给了西班牙。所有这些国家在脱离德国之后情况都好转了。除了帝国外部逐渐崩溃而外，帝国内部也极度混乱。每个小王公对其臣民说来都是专横残忍的暴君。帝国除了设立一个法院（维茨拉尔帝国法院）来审理臣民控告官吏的案件，就从不过问各邦的内政。而且这个宝贝的法庭实在太会审理案件了，从来也没有人听说过有什么案件得到了解决。狂妄自大的王公对其臣民之专横残忍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些只知寻欢作乐、骄奢淫佚的王公们，授与其大臣和官吏无限的权力，使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压迫不幸的人民，只要他们能装满主子的金库，供给主子足够的娇妻美妾就行。那些没有独立、仍受某一个国王、主教或者王公管辖的贵族，通常也把人民看得连狗都不如，他们

尽量从自己的农奴的劳动中榨取金钱，因为农奴的从属关系当时在德国是十分普遍的。即使在那些郑重其事地被命名为帝国“自由”市的地方也丝毫没有自由，因为这里的市长和自选的参议员——这些职位几世纪以来已经像王位那样成为世袭的了——在处理政事中表现得更为专横。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和这种城市小资产阶级贵族的卑鄙行为相比的了。要是这些情况没有留在许多还能回忆起这个时代的人的记忆之中，要是这些情况没有得到为数甚多的权威人士的证实，那末，的确谁也不会相信这就是五十年前的德国的情况。可是人民呵！他们对这种情况说了些什么呢？他们做了些什么呢？至于中等阶级，即贪财的资产者，则在这种长期的混乱状态中找到了致富的泉源，资产者懂得混水摸鱼是最不费力的事情。他们忍受着压迫和侮辱，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能够用自己的办法来复仇：**欺骗压迫者，从而为自己所受的委屈雪耻**。如果他们和人民团结起来，他们就能够推翻旧的政权，重建帝国，正如英国资产阶级从1640年到1688年部分地完成了的那样，也如同一时期法国资产阶级准备去完成的那样。但是德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这样做，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毅力，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有这样的勇气。德国的资产者知道，德国只不过是一个粪堆。但是他们处在这个粪堆中却很舒服，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粪，周围的粪使他们感到很温暖。劳动者的生活也不比现在坏，但农民是例外，他们大部分是农奴，没有城市人民的支援就任何事情都做不了，因为雇佣军队经常驻扎在他们那里，只要他们企图起事，他们就有淹没在血泊中的危险。

　　这就是前一世纪末叶的德国状况。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

和农业极端雕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的日益庞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影响群众意识的工具，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甚至连比较大宗的对外贸易也没有，除了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种卑鄙的、奴颜婢膝的、可怜的商人习气渗透了全体人民。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

只有在我国的文学中才能看出美好的未来。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1750年左右，德国所有的伟大思想家——诗人歌德和席勒、哲学家康德和费希特都诞生了，过了不到二十年，最近的一个伟大的德国形而上学家[一]黑格尔诞生了。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歌德写了“葛兹·冯·柏里欣根”，他在这本书里通过戏剧的形式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敬意。席勒写了“强盗”一书，他在这本书中歌颂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但是，这些都是他们青年时代的作品。他们年纪一大，便丧失了一切希望。歌德只写些极其辛辣的讽刺作品，而席勒假如没有在科学中，特别是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伟大历史中找到慰借，那他一定会陷入悲观失望的深渊。用这两个人作例子便可以推断其他一切人。甚至连德国最优秀最坚强的思想家都对自己祖国的前途不抱任何希望。

[一] 形而上学一词在这里是指研究经验以外的问题的哲学。——编者注

突然，法国革命像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做德国的混乱世界。它的影响非常大。极其无知的、长期习惯于受虐待的人民仍然无动于中。但是整个资产阶级和贵族中的优秀人物都为法国国民议会和法国人民齐声欢呼。成千上万的德国诗人没有一个不歌颂光荣的法国人民。但是这种热情是德国式的，它带有纯粹形而上学的性质，而且只是对法国革命者的理论表示的。但是，一俟无可辩驳的事实把理论排挤到次要的地位，一俟法国宫廷和法国人民在实践上不可能再协调下去（虽然他们在理论上的联合已为1791年理论上的宪法所确定），一俟人民通过“八月十日”事件**实际上**确立了自己的主权[149]，尤其是当1793年5月31日吉伦特派的复亡弄得理论完全哑口无言的时候，这种德国式的热情就一变而为对革命的疯狂的憎恨了。当然，这种热情只是对1789年8月4日晚上贵族阶级放弃其特权这样的事件表示的，但是善良的德国人从来也没有料到，这种行动实际上产生的后果绝不同于好心的理论家可能做出的结论。德国人从来也没有想到要称赞这些后果，大家都知道，这些后果对于许多有关的人来说，是相当严重、相当不愉快的。所以，所有这些当初为革命欢欣鼓舞的朋友现在都变成了革命的最疯狂的敌人。他们从奴颜婢膝的德国人报刊上得到有关巴黎的、显然全被歪曲了的消息后，便宁肯保持自己那古老的安宁的神圣罗马粪堆，而不要人民那种勇敢地摆脱奴隶制的锁链并向一切暴君、贵族和僧侣挑战的令人颤栗的行动了。

但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末日到来了。法国的革命军队进入了德国的心脏地带，把法国的国境线移到了莱茵河上，并且到处宣传自由平等。他们赶走了成群的贵族、主教和修道院长，也赶走了在这样漫长的时期中在历史上只起了傀儡作用的全部小王公。他们像

进入美国西部边疆原始森林的移民一样廓清了大地；这个“基督教德意志”社会的原始森林，在法国军队的胜利进军中像旭日东升时的云雾一样消失了。当果断的拿破仑把革命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当他认为自己就是革命（即1794年热月9日后被贪婪的资产阶级所扼杀的那次革命），当他这个“寡头的”民主（一个法国作家就是这样称呼他的）接二连三地派遣军队袭击德国的时候，“基督教德意志”社会就最终地被消灭了。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像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诚然，他的行动表现出来是暴虐的，但是他的暴虐甚至不及公会的代表们可能表现出来并且实际上已经到处表现出来的一半，不及被他打倒的王公贵族们所惯于表现出来的一半。在法国已完成其任务的**恐怖统治**，拿破仑**以战争的形式**把它搬到了**其他国家**，这种“恐怖统治”德国是十分需要的。拿破仑摧毁了神圣罗马帝国，并以并小邦为大邦的办法减少了德国的小邦的数目。他把他的法典带到被他征服的国家里，这个法典比历来的法典都优越得多；它在原则上承认平等。拿破仑强迫一向只为**私人利益**而生活的德国人去努力实现伟大的理想，为更崇高的公共利益服务。但是，正是这一点弄得德国人都起来反对他。正是由于他采取了把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措施，所以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因为他触犯了他们的偏见和他们的古老的习俗。正是由于他采取办法替德国的工厂工业打下基础，所以引起了资产阶级的不满，因为禁售一切英国商品、和英国进行战争虽然促使德国建立自己的工业，但是同时也引起了咖啡、食糖、烟草和鼻烟价格暴涨，当然这就足以引起爱国的德国店铺老板们愤怒了。此外，他们都是些不能领会拿破仑的伟大计划的人。他们诅

咒他，因为他把他们的子弟抓去打仗；而这些战争都是用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钱搞起来的。但是他们却把这类英国人当做朋友加以颂扬，虽然这些人正是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这些人靠这些战争**大发横财**，他们不但在战时，而且在战后都欺骗德国人，把德国人当做自己的工具。德国人咒骂拿破仑，因为他们想继续过苟且偷安的生活，保留自己原来那种可怜的生活方式，只关心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利益，因为他们根本不想过问任何伟大的理想和公共的利益。而最后，当拿破仑的军队被俄国击溃的时候，他们便乘机摆脱掉这位伟大征服者的铁链。

被称为“德国历史上最光荣的时期”等等的1813—1814年和1815年的“光荣的解放战争”，是一种疯狂的表现，每一个正直的和有理智的德国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会为它感到惭愧[150]。的确，当时表现了激昂的情绪，但是，是谁表现的呢？首先是农民，世界上最愚昧无知的一部分人，他们死抱住封建成见，蜂涌而起，宁死也不背叛他们和他们的先辈称之为老爷的人，不背叛管辖他们、蹂躏他们和鞭打他们的人。其次是大学生和一般的年轻人，他们认为这次战争是捍卫原则的战争，甚至是宗教战争，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使命不仅是为了捍卫他们称之为民族特征的正统主义原则，而且也是为了捍卫神圣的三位一体和上帝的存在。当时的一切诗歌、论著和讲演都把法国人描写成无神论的代表，没有信仰、没有道德的典型，而把德国人则说成维护宗教、虔敬神明、主持正义的代表人物。再其次是一些比较有知识的人，他们把关于“自由”、“宪法”和“出版自由”的某些概念和这些思想混在一起，但是这种人为数极少。最后是企业主、商人、投机家等等的子弟，他们要争取在最便宜的市场上购买货物的权利，要争取喝不掺菊苣的咖啡。当然他

们都是拿“自由”、“伟大的德国人民”、“民族独立”这类当时流行的热烈的字眼来掩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那些在俄国人、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帮助下打败了拿破仑的人。

在下一封信中我准备谈拿破仑垮台后的德国历史。对这个非凡的人物的评价，除去上面所说的，我还补充一点，那就是他统治得愈久，他就愈应该遭到他最终的命运。在他做皇帝这件事情上我并不准备责备他。在资产阶级已在法国确立了统治而人民又漠不关心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别的出路，因为资产阶级从不关心公共利益，只要他们私人的事情进行得顺利就行，而人民又看不到革命对自己有根本的好处，他们只具有战争的热情。但是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他降低到了其他帝王的水平，他力图得到和他们同样的荣誉，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因此很自然，正统的帝王们便把篡夺者踢出了自己的圈子。

亲爱的先生，向您表示敬意。

您的德国通讯员

1845年10月15日

弗·恩格斯写

载于1845年10月25日
“北极星报”第415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

原文是英文

给“北极星报”编辑的第二封信

亲爱的先生！

我在第一封信里描写了法国革命前、革命时以及拿破仑统治期间的德国状况，指出了这个伟大的征服者是怎样被打倒和被哪些反对者打倒的。现在我继续来谈经过这次民族独立的“光荣复兴”之后，德国的情况起了怎样的变化。

我对所有这些事件的看法和一般的见解完全相反。但是我的看法丝毫不差地为德国历史上的下一时期发生的事件所证实。要是反对拿破仑的战争确实是争取自由、反对暴政的战争，那末结果就应该是所有被拿破仑征服了的国家，在拿破仑垮台之后，都宣布平等的原则，享受到平等原则带来的幸福。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就英国方面来说，战争是由惊惶失措的贵族发动的，并且得到了财阀的支持。这些财阀找到了取之不尽的利润泉源：接二连三的借款；国债的增长；以及他们有可能渗入南美市场，在那里倾销自己的工业品，夺取他们认为能使自己的腰包塞得更满的、原属于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的殖民地。他们力图使不列颠威镇四海㊀，以便能够打垮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贸易，如果这个国家的竞争能够成为他们发财致富的障碍的话。最后，他们竭力维护自己从供应欧洲市场取得巨额利润的权利，和拿破仑的大陆体系分庭抗礼。这就是当时英

㊀　原文为《Britannia rule the waves》，即“不列颠威镇四海”（摘自英国国歌）。——编者注

国统治阶级进行这次长期战争的**真正**原因。至于说法国革命威胁着英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这种口实，也只不过表明这种“人类理性的完美创造”无比优越而已。从西班牙方面来说，发动战争是为了保卫正统的王位世袭和僧侣专制裁判的原则。1812年的宪法的原则是为了鼓舞人民继续作战在较晚的时候提出来的，而**这些原则本身**也是来自法国。意大利从来不敌视拿破仑，因为拿破仑只给它带来了好处；单就意大利能够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这件事来说，就得感谢拿破仑。波兰的情况也是如此。至于德国应该感谢拿破仑的地方，我已经在第一封信里谈过了。

所有一切战胜国都把拿破仑的垮台看做**法国革命的复灭**和正统主义原则的胜利。结果它们当然都在自己的国家里恢复了这种原则，它们恢复这种原则，起初还用“神圣同盟”、“永久和平”、“公共福利”、“君民互相信任”等等动人心弦的词句加以掩饰，后来就抛弃了任何遮盖，而借助于刺刀和牢狱了。征服者的无能在下面这个事实中就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最后战败的法国人民，即使人家强加给他们一个他们恨之入骨的、靠15万支外国毛瑟枪支持的王朝，然而仍然使战胜了的敌人胆颤心惊，以致于不得不给他们一个自由主义色彩相当浓厚的宪法；而别的国家，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虽然吹嘘自由，然而除了漂亮的言辞和随之而来的铅弹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在法国南部屠杀共和主义者，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宗教裁判所把人活活烧死，本国的专制制度又恢复起来，在英国颁布了禁口法令，发生了“彼得卢事件”，这就是对法国革命被镇压下去的庆祝。现在我们就会看到，德国也走着同样的道路。

在德意志各邦中间，普鲁士王国首先向拿破仑宣战。当时统治普鲁士的是外号“公正大王”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他是迄今

作过王位装饰品的最大的傻瓜之一。他生来只配做一个伍长，只配检查兵士的钮扣是否整齐。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淫荡之徒，但同时却在那里宣传道德。他除了会用不定式外，就不会用别的什么式说话，在草拟命令方面只有他的儿子比得过他。他只有两种感觉，恐惧和伍长式的狂妄自大。在他统治的前半期，他的主要情绪是恐惧拿破仑。拿破仑对他表示了一种轻蔑的慷慨，把半个王国还给了他，因为拿破仑认为这个国家不值得加以控制。由于这种恐惧，他就准许一些不彻底的改革家哈登堡、施泰因、雪恩、夏恩霍斯特等等来代替自己管理国事。这些改革家开始采用较为自由的市政组织，废除农奴制，把封建劳役改为地租或必须在二十五年内付清的一笔固定的款项。但是最主要的是他们奠定了给人民以巨大力量和迟早会用来反对政府的军事组织的基础。他们也“制订”了一个宪法，但是迄今尚未问世。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在法国革命失败后，普鲁士的情况起了什么样的变化。

当“科西嘉怪物”最后被牢牢地禁闭起来之后，大大小小的帝王们立刻在维也纳开了一次大会，以便分配赃物和奖金，并商讨能把革命前的形势恢复到什么程度。民族被买进和卖出，被分割和合并，只要完全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就行。在出席会议的国家里面，只有三个国家知道它们要些什么。英国想保持并扩大自己的商业霸权，想保留掠夺殖民地所得的最大部分，并削弱其他各国。法国想尽量减轻自己的不幸，并削弱其他各国。俄国想增强自己的实力，扩张自己的领土，并削弱其他各国。其余的一切国家都多情善感，想得些小利，而有几个国家甚至还想表现一种可笑的大公无私。

结果法国打乱了德意志各大邦的计划；俄国获得了波兰的最

好的一部分。英国用签订和约的方式比用战争的方式更加扩大了它的海上霸权，并在所有的大陆市场上占了优势，——这对英国人民来说毫无利益可言，但是对英国资产阶级来说却是大发横财的泉源。除了自己心爱的正统主义原则就不关心任何东西的德意志各邦又一次受骗了，在签订和约时，丧失了它们在战争中所取得的一切。德国还是分裂为三十八个邦；这种四分五裂的状况，阻碍着内部的一切进步，使德国大大弱于法国，使它仍然保持英国工业品最好的市场的地位，只是有利于英国资产阶级大发其财。英国人中的这一阶层以慷慨自夸，说什么由于慷慨，他们拿出了大宗款项来援助别国同拿破仑继续作战。但是，即使假定，这些援助款项确实是资产阶级拿出来的，而不是劳动人民拿出来的，那末资产阶级之所以慷慨，也只是为了重新给自己打开大陆市场。而这方面他们也进行得很顺利；他们从签订和约之日起，仅仅从一个德国所得到的利润，就不少于援助支出的6倍。资产阶级的慷慨就是如此，它起初以援助的形式给你一个礼物，而后来却以利润的形式从你那里拿走比礼物大6倍的东西。要是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情况刚刚相反，是德国的商品充斥于英国市场，而不是德国在工业上依附少数英国资本家，那末英国资产阶级会这样热心地解囊相助吗？

无论如何，德国完全被欺骗了，首先是被它那些所谓的朋友和盟邦欺骗了。这倒并不使我特别感到难受，我很明白，我们即将改组欧洲社会，因而类似的下流勾当，类似的愚蠢失策，将来就不可能再发生了。但是我要指出，第一，无论是英国人民或者是其他各国的人民，都没有从德意志各邦君主的受骗中得到什么好处，得到好处的或者是别的君主，或者是本身的利益同人民的利益相对立的某个阶级；第二，重掌政权的德意志各邦君主的第一步措

施就已经证明他们是完全无能的。

现在我来谈德国国内的情况。

我们已经知道，在英国的金钱和俄国的野蛮支持下把法国革命镇压下去的力量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这种力量分成两类：第一类是旧“基督教德意志”社会的热烈维护者，即受农奴制、民族主义、正统主义和宗教的狂热所驱使的农民和热心的青年；第二类是一些较为温和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希望“安静地生活”，希望能够发财和挥霍，而没有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找上门来打扰他们。后一种人只要得到和平，只要有权在价格最低的市场上购买东西、喝没有掺杂菊苣的咖啡和不问政治，就感到心满意足了。但是“基督教德意志”的信徒都成了复辟政府的积极支持者，他们尽一切可能把历史拉回到1789年去。至于那些希望人民享受他们努力的某些成果的人，他们有足够的力量使自己的口号成为1813年的战斗呼声，但是不成为1815年的实践。他们得到了一些极其动听的诺言，如颁布宪法、允许出版自由等等，然而仅仅是诺言而已。实际上一切都照旧。德国境内几个法国化了的地方已经尽量扫除了一切“外国专制制度”的遗迹，只有莱茵河左岸的几省还保留了法国的制度。黑森选帝侯做得更干脆，他甚至把**自己士兵头上**的从前被不信神的法国人剪掉的**辫子**恢复起来了。总之，和其他一切国家一样，德国出现了一幅无耻的反动的图画，这种反动特别的地方，只在于它有些犹疑和软弱，它甚至还没有表现出像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英国反对革命原则的那种毅力。

在维也纳会议上使德国深受其害的欺骗方法，现在在德意志各邦之间也用起来了。普鲁士和奥地利为了削弱德意志其他各邦，就迫使它们制订某种不伦不类的宪法，这种宪法削弱了政府，但

是没有赋予人民，甚至也没有赋予资产阶级以任何权力。既然宪法规定德国是一个联邦，各邦政府各自指派代表组成联邦议会，那末就可以不必担心人民会获得过大的力量，因为每一个邦都得受联邦议会决议的约束；这些决议对整个德国来说就是法律，而不管各邦议会是否赞同。当然，这个联邦议会完全由普鲁士和奥地利控制着；只要它们威胁一下小邦诸侯，说不支持他们同本邦议会的斗争，就足以把后者吓得百依百顺了。这样一来，由于它们的势力压倒一切，由于它们是德意志各邦诸侯权力所依据的原则的真正代表者，它们就成了德国的绝对统治者。不管各个小邦做了些什么事情，实际上都不起任何作用。在德国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斗争还只限于南部几个小邦的时候，这种斗争是不会有什么成果的。只有普鲁士资产阶级从昏睡中苏醒过来，这种斗争才能起作用。因为奥地利人未必能够列入文明世界，他们驯顺地服从统治者的家长式的专制统治，所以普鲁士就成了德国现代历史的中心，社会舆论变化的晴雨表。

拿破仑垮台之后，普鲁士国王过了几年最幸福的生活。的确，他受了各方面的欺骗。英国欺骗他，法国欺骗他，他自己的亲爱的朋友奥国皇帝和俄国皇帝也一次又一次地欺骗他。但是由于他满腔热情，他甚至没有发现这一点；他没有想像到，世界上会有一些坏蛋胆敢欺骗“公正大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他很高兴，因为拿破仑被打倒了，他**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了**。他坚持德意志联邦条例的第十三条，即允许德意志各邦制订宪法[151]。他还坚持另外一条，即有关出版自由的一条。此外，他还在1815年5月22日下了一道诏书，诏书是用“**人民代议制一定实现**”这几个字开始的，这几个字表现了他那沾沾自喜的快意和伍长式的傲慢的绝妙的结合。不久

他就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为他的人民制定宪法。甚至在1819年，当普鲁士显示了革命的征兆，当反动气氛笼罩了整个欧洲，维也纳会议的美好的成果正是光辉灿烂的时候，他还宣称，今后如果没有征得即将成立的王国议会的同意，不借任何国债。

可惜好景不长。国王**对革命的恐惧**很快就代替了对拿破仑的恐惧。关于这一点，我在下一封信里再谈。

我还得补充几句话。每当英国的民主集会通过“向各国爱国志士”致敬时，在这些爱国者中间肯定地有安得列阿斯·霍弗的名字。但是从我所谈到的拿破仑在德国的敌人的情况看来，霍弗的名字是否值得民主主义者尊敬呢?霍弗是一个守旧的、愚昧无知的、具有宗教狂热的农民，他的狂热是万德人的狂热，是“教会和皇帝”的狂热。他勇敢地撕杀着，但是万德人是为了反对共和主义者才这样撕杀的。他是为了维护维也纳和罗马的家长式的专制统治而撕杀。英国的民主主义者，为了德国人民的荣誉，请你们不要再提这个狂热者吧!德国有比他更优秀的爱国志士。为什么不提就当时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1525年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托马斯·闵采尔的名字呢?为什么不歌颂那不同于自己所有的同胞而在巴黎支持法国革命到底、最后牺牲在断头台上的德国的托马斯·倍恩——格奥尔格·福斯特呢?为什么不歌颂其他许多为了现实而不是为了幻想而撕杀的人们呢?

亲爱的先生，向您表示敬意。

您的德国通讯员

弗·恩格斯写于1845年10月底　　按报纸原文刊印

载于1845年11月8日　　原文是英文

“北极星报”第417号

给“北极星报”编辑的第三封信

亲爱的先生！

我得请求您和贵报的读者原谅，因为从表面看来我有些漫不经心，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给贵报继续撰写关于德国状况的文章了。但是，您可以相信，只是由于我必须花费整整几星期的时间去致力于德国的运动，我才放下了我所承担的给英国民众介绍我国状况的愉快工作。

贵报读者大概还记得我在第一封和第二封信里所谈的事情。我在那两封信里谈到了1792年至1813年德国的陈腐的制度怎样被法国军队所摧毁，拿破仑怎样被欧洲的封**建主**（即贵族）和**资产者**（即工商业中等阶级）的同盟所打倒，德意志各邦诸侯怎样在后来的和平谈判中被自己的盟邦所欺骗，甚至被战败的法国所欺骗，德国怎样拟定了联邦条例，它现在的政治制度是怎样确立的，以及普鲁士和奥地利怎样用促使各小邦立宪的办法使自己成了德国的至高无上的主宰。如果我们把奥地利这个半野蛮的国家撇开不谈，那末我们就可以做出结论说，普鲁士是决定德国未来命运的战场。

我们在前一封信里已经指出，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摆脱了对拿破仑的恐惧之后，过了几年幸福安宁的生活，后来又遇到了新的魔鬼——“革命”。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革命”是怎样进入德国的。

1815年拿破仑垮台——我再重复一下，当时各国的君主和贵族都把这件事完全当做法国革命的失败，或者甚至像他们所说的革命的失败——之后，各国的反革命都掌握了政权。从伦敦到那不勒斯，从里斯本到圣彼得堡，各国的内阁都由封建贵族统治着。但是，曾经为这件事花过钱、出过力的资产阶级也想取得自己的一分权力。复辟政府绝没有把资产阶级的利益放到首要的地位。相反，它们不但处处忽视资产阶级的利益，甚至公然不理会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欧洲各地都可以看到的现象中，1815年英国通过谷物法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但是，当时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大了。商业和工业已经扩展到每一个角落，并使大腹便便的资产者财富巨增；资产阶级财富的增长表现在投机倒把的活跃上，表现在对舒适品和奢侈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上。他们不能再忍气吞声地服从这样一个阶级的统治，这个阶级几世纪来就日趋没落，这个阶级的利益是和他们的利益相对立的，这个阶级暂时重掌政权是他们一手造成的。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斗争已不可避免，这个斗争几乎在和约缔结后就开始了。

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权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他们一定得把历代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断权。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之所以具有**自由主义的**外貌，原因就在于此。资产阶级消灭了国内各个现存等级之间一切旧的差别，取消了一切依靠专横而取得的特权和豁免权。他们不得不把选举原则当做统治的基础，也就是说在原则上承认平等；他们不得不解除君主制度下书报检查对报刊的束缚；他们为了摆脱在国内形成独立王国的特殊的法官阶层的束缚，不得不实行陪审制。就这一切而

言，资产者真像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但是资产阶级实行这一切改良，只是为了用金钱的特权代替已往的一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这样，他们通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的限制，使选举原则成为本阶级独有的财产。平等原则又由于被限制为仅仅在"法律上的平等"而一笔勾消了，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简括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这样，出版自由就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出版需要**钱**，需要购买出版物的人，而购买出版物的人也得要有**钱**。陪审制也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他们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只选"有身分的人"做陪审员。

我认为，为了说明以下两个事实，这样稍微谈一下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必要的。第一，从1815年到1830年，各国工人阶级的、实质上是民主主义性质的运动都或多或少地从属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运动。虽然工人比资产阶级先进，但是他们还看不出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即资产阶级的解放和工人阶级的解放之间的根本区别；当**金钱**还没有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当资产阶级还没有成为唯一的统治阶级的时候，工人们是不能识别**金钱**的自由和**人**的自由之间的区别的。因此，在彼得卢事件发生的那一天民主主义者打算呈递请愿书，并不仅仅是为了要求普选权，而且同时是为了要求废除谷物法；因此，1830年巴黎无产者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进行了战斗，1831年英国无产者准备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而投入战斗。从1815年到1830年，在一切国家里，资产阶级都是革命派中间的最有力的组成部分，因而也是革命派的领袖。只要资产阶级**本身**还在**革命**，还在进步，工人阶级就不可避免地要充当资产阶级手里的工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单独的运动

始终只起着次要的作用。但是，从资产阶级取得了全部政权、**金钱**的势力消灭了一切封建的和贵族的特权、资产阶级**不再**进步和**不再**革命并且本身已经裹足不前的那一天起，工人阶级的运动就开始领先，并且成了**全民的运动。如果今天废除谷物法，明天宪章就会成为英国的中心问题，宪章运动就会表现出保证自己取得胜利的力量、毅力、热忱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第二个事实（为了说明这个事实，我稍微谈了一下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专门和德国有关的。德国人是一个从事理论的民族，但是缺少实践，因此他们把英法两国资产阶级的谬论当做神圣的真理。德国的资产阶级都满足于能够安安静静地经营自己的规模不大的私人事业。在他们争得了宪法的地方，他们就吹嘘自己的自由，但是却很少过问国家大事；在没有宪法的地方，他们则觉得轻松愉快，因为他们可以摆脱选举代表和阅读代表们的长篇大论的麻烦。工人阶级缺少使英法两国工人从酣睡中苏醒过来的那种强大的杠杆，就是说，缺少发达的工业和以发达的工业为前提的资产阶级的统治。所以工人还没有什么动静。在德国，在那些从前的封建制度又重新代替了现代的法国制度的地方，农民感到了压迫，但是这种不满情绪还需要新的刺激才会爆发为公开的反抗。所以，从1815年到1830年，德国的革命派只是由**一些理论家**组成。它的成员都是从大学里招收来的，他们都是一些大学生。

要在德国恢复1789年以前的旧制度显然是不可能的。情况的变化迫使政府想出了一种新的、德国特有的制度。贵族想执掌政权，但是太软弱无力；资产阶级既没有这个愿望，又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执掌政权。但是两者凑在一起，就有足够的力量迫使政府做某些让步。于是，一种不伦不类的君主政体就成了统治的形式。在

某些邦里，宪法在表面上使贵族和资产阶级得到了保障；在其余各邦却存在着官僚政府，也就是存在着这样一种君主政体，这种君主政体好像是通过优良的行政机关来关心资产阶级的利益似的，但是这种行政机关是由贵族领导的，而贵族则尽量使这个机关的活动避开社会的耳目。结果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行政官吏的阶级；他们掌握着大权，他们和其他一切阶级处于对立的地位。这就是野蛮的资产阶级统治形式。

但是这种统治形式既不能使“贵族”、“基督教德意志人”、“浪漫主义者”、“反动派”满意，也不能使“自由主义者”满意。因此，他们就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并且组织秘密的学生团体。从这两个派别（因为它们不能够称为党派）的联合中产生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自由主义者的派别；这些人在自己的秘密团体里梦想德国有这样一个皇帝，他头戴皇冠，身着紫袍，手执权杖和其他类似的东西，颔下是花白的或棕黄色的长髯，周围是各等级——僧侣、贵族、市民和农民分别议事的等级会议。这是封建的暴虐和现代资产阶级的骗局所合成的最荒谬的混合物，我们想像它多荒谬，它就有多荒谬。但是对那些不管目的、不惜代价而只求热烈的大学生来说，这是最适当不过的事情。可是这种荒唐可笑的特殊混合物加上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革命152、法国的烧炭党运动[153]和英国的改革运动[154]，已经吓得君主们几乎失去了理智。对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说来，“革命”（指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和有局部冲突的运动）已经成了妖魔。

大量的逮捕和大规模的迫害把德国的这个“革命”镇压下去了；法国的刺刀在西班牙，奥地利的刺刀在意大利，都暂时保证了正统国王重登王位，重掌神权，甚至土耳其皇帝对他统治下的希腊

臣民施行绞杀和分尸的神权也暂时得到了神圣同盟的支持，但是他做得太露骨了，于是希腊人得到允许，脱离了土耳其的羁绊。

最后，巴黎的三日革命[155]发出了全欧资产阶级、贵族和人民的愤怒总爆发的信号。波兰的贵族革命被镇压下去了；法国和比利时的资产阶级顺利地取得了政权。英国的资产阶级利用改革法案达到了同样的目的。在意大利，兼有人民的、资产阶级的和民族的性质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而在德国，不可胜数的起义和骚动，证明人民和资产阶级的运动的新纪元已经来到。

1830年到1834年的德国自由主义运动具有新的、汹涌澎湃的性质，这表明资产阶级本身已经在着手解决问题。但是由于德国分为许多小邦，而且几乎每个邦都有自己的关卡和税率，所以没有共同的利益把这些运动联合起来。德国资产阶级之所以要争取政治自由，并不是为了要使公共事业适应于他们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在法国人和英国人的面前为自己的奴隶地位感到羞耻。他们的运动缺少自由主义据以在法国和英国取得胜利的现实基础；他们对理论问题的兴趣要比对实际问题的兴趣大得多。德国的资产阶级一般说来是所谓不大关心自己私利的人。但是1830年的法国资产者却不是这样。在革命后的第一天拉菲特就说："现在该我们这些银行家来执政了。"而且到今天他们还在统治着。英国的资产阶级也很了解他们把财产资格规定为10英镑[156]的目的；但是德国的资产者，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是一些目光短浅的人，他们只是"出版自由"、"陪审制"、"宪法对人民的保障"、"人民的权利"、"人民代议制"等等的热烈崇拜者，而且他们不是把这一切当做手段，而是当做目的。他们把影子当本质，因而一无所得。但是，资产阶级的这个运动已足以掀起几十次革命（其中有两三次已获得了某些成就），

引起无数次的群众集会，造成众口纷纭和报纸大吹大擂的情况，使民主运动在大学生、工人和农民中间有了一点萌芽。

这里用不着来说明这个声势汹涌但最终失利的运动的冗长细节。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人们争得了某种重大的成果，例如巴登争得了出版自由，德意志联邦议会就会进行干涉并加以制止。这出滑稽剧以1819年和1823年大规模逮捕的重演，以德意志各邦诸侯为了阻止自由主义进一步扩展而在1834年的维也纳代表会议上缔结秘密同盟而告终。这次会议的决议在前几年已经公布了[157]。

从1834年到1840年，德国的一切社会运动都沉寂下去了。1830年和1834年的活动家不是在狱中，就是亡命国外。在运动高涨时期保持了资产阶级所固有的谨慎态度的人，继续和愈来愈严的书报检查制度、和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冷漠进行斗争。虽然议会反对派的首领还继续在议会里发表演说，但是政府却有办法保证自己获得多数票。看来，要在德国掀起一个社会运动的新高潮是绝不可能的；政府可以做它认为应该做的一切事情。

所有这些运动**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几乎都**没有参加**。全国的工人都表示不满，他们进行了无数次的骚动，但是这些骚动都没有明确的目标，因而毫无结果。普鲁士人的冷淡就是德意志联邦的主要力量。它表明德国资产阶级运动全面展开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只要我能够收集到必要的材料，用德意志各邦政府自己的一些行为（同这些行为相比，贵国内务大臣的所作所为看来就完全无可厚非了）[158]来说明这些政府的实质，我就将在下一封信里㊀谈

㊀ 恩格斯应允写的信未见于该报以下各号。——编者注

谈近六年来运动的情况。

亲爱的先生，向您表示敬意。

您的德国通讯员

1846年2月20日

弗·恩格斯写 按报纸原文刊印

载于1846年4月4日 原文是英文
“北极星报” 第438号

弗·恩格斯
“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
前言和结束语[159]

德国人逐渐把共产主义运动也弄得庸俗起来了。在这里，那些后生之辈和庸庸碌碌的人总认为自己能够用轻视前辈和空谈哲理的办法来掩饰自己的落后。共产主义刚在德国出现，它就被一批投机分子用来作为资本。这些人把在法英两国已经陈腐了的论点翻译成黑格尔逻辑的语言，就以为自己创造了奇迹；而现在他们就把这种新的智慧当做某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当做“真正的德国的理论”献之于世，以便将来可以尽情地诬蔑目光短浅的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拙劣的实践”和“可笑的”社会体系。这种永远完备的德国理论极其幸运地稍许嗅到了一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气息，被柏林的某一个干瘪的教授列入了永恒的范畴，后来也许还参考过费尔巴哈的著作和几篇关于德国共产主义的文章以及施泰因先生的关于法国社会主义的大作160。这种劣等的德国理论，按照施泰因先生的观点，毫无困难地给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做了适当的解释，使它处于从属的地位，**“制服了”**它，把它**“提高”**到永远完备的“德国理论”的“更高的发展阶段”。当然，这种理论不会想到去稍许熟悉一下要提高到更高阶段的对象，去看一下

傅立叶、圣西门、欧文以及法国共产主义者的著作；对这种理论来说，要宣告德国的理论光辉地战胜了外国人的可怜的挣扎，有了施泰因先生的贫乏的摘录就足够了。

为了反对不朽的德国理论所表现的那种滑稽可笑的高傲态度，完全有必要向德国人指出他们在研究社会问题这方面应该感谢外国人的地方。现在，在德国人的著作中有些夸张的词句被吹嘘为真正的、纯粹的、德国的、理论上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在所有这些夸张的词句中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种思想是从德国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法国人或英国人在十年、二十年、甚至四十年前就说过的话——他们说得很好、很清楚、很动听——德国人仅仅在最近一年来才偶尔知道一些，并把这些话黑格尔化了，或者至多也只是落在人家后面做了再一次的发明，并把它当做崭新的发明，用坏得多、抽象得多的形式公诸于世。我自己的作品也不例外。要是说，德国人也有些自己的东西，那末这只能是他们用来表达这种思想的那种讨厌的、抽象的、难以理解的、拙劣的形式。他们俨然是真正的理论家，认为法国人（对英国人他们还几乎一无所知）那里值得注意的东西，除**最一般的**原则外，只是最坏、最抽象的东西，也就是未来社会的规划，即**社会制度**。而最好的一面，即**对现存社会的批评**——对社会问题作任何研究的现实基础与主要任务，他们却泰然自若地抛弃了。不用说，关于唯一**真正**做了些事情的德国人魏特林，这些聪明的理论家通常也用轻蔑的口吻评论一番，或者干脆连提都不提一下。

我想建议这些聪明的先生读一读傅立叶的著作中不很长的一章，因为这一章可以给他们做个榜样。的确，傅立叶没有从黑格尔的理论出发，因此——可惜！——他不能认识绝对真理，甚至也不

能得出绝对的社会主义。的确，可惜正由于这个缺点，傅立叶走入了歧途，采用了分类的方法来代替绝对的方法，产生了海水变柠檬汁、couronnos boréale和australe〔北极和南极发出灵光〕、狮子改变兽性[161]、行星交配这些想法。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宁愿同乐观的傅立叶一起相信所有这些奇迹，而不相信那根本没有任何柠檬汁的绝对的精神王国，不相信有和无的同一以及永恒范畴的交配。法国人的无稽之谈至少是令人高兴的，而德国人的无稽之谈却令人丧气和抑郁。此外，傅立叶对现存的社会关系作了非常尖锐、非常生动和非常明睿的批评，人们会乐意原谅他那也是建立在天才的宇宙观之上的关于宇宙的幻想的。

这里发表的片断是从傅立叶的遗著中找出来的，曾刊载于傅立叶派在1845年初开始发行的“法郎吉”①杂志第1期上。我删去了其中属于傅立叶正面提出来的体系的那一部分和根本不会引起任何兴趣的那一部分。总之，我不受原文的拘束，而要使外国社会主义者为了一定目的而写的著作能被不知道这种目的的读者所理解，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这个片断绝对不是傅立叶的著作中最有天才的作品，甚至也不是他论商业的最好的文章，但是，除魏特林外，德国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写出一篇能稍微和这篇草稿相比的文章。

为了使德国读者不浪费精力去阅读“法郎吉”杂志的原文起

① ㊀ “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1845年巴黎“法郎吉”出版社出版，创刊第14年第1辑，八开本。傅立叶的手稿论三个外在统一的大纲发表在该杂志第1—2月号第1—42页上：（《La Phalange》. Revue de la science sociale, XⅣ. année, 1— re série in 8°, Paris, aux Bureaux de la Phalange. 1845—Publication des Manuscrits de Fourier, section ébauchée des trois unités externes, p. 1—42 des Januar— und Februarheftes）。

见，我必须指出，该杂志纯粹是傅立叶派的投机把戏，杂志里所登载的傅立叶的手稿，价值大小极不一致。发行这一刊物的傅立叶派的先生们已经成了像德国人那样的妄自尊大的理论家，他们用神圣不可侵犯的、庄重的、不实际的、晦涩的说教来代替他们的老师在揭露资本主义世界时所用的幽默。这使他们在法国受到应有的嘲笑，而在德国却得到尊重。他们在“法郎吉”的第1期中所描绘的傅立叶主义的想像中的胜利会使运用绝对方法的教授们欣喜若狂。

我现在从已经在“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一书中发表过的一个题目开始本文。本片断的很大一部分也在该书中发表过。这里我只引述其中最重要的部分[162]。

———

傅立叶就是这样写的。“法郎吉”第2期中刊载的这篇文章的续文包括证券交易、囤积居奇（accaparement）和寄生现象三章，这几章大部分都已经发表在“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一书中。由于这个原因，同时也由于上面所录的片断已经完全足以达到我的目的，所以我就在这里做一个结束。

让那些热中于在无底的㊀理论的“茫茫大海”中乘风破浪并竭力钓取“社会主义”的“原则”的德国学者先生们学学 commis mar— chand〔店伙计〕傅立叶的榜样吧！傅立叶不是一个哲学家，他对哲学是深恶痛绝的。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对它百般嘲笑，而且说出了许多理由，这些理由是值得我们德国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家们”注意的。不错，他们会反驳我，说傅立叶也一样地“抽

㊀ 双关语：德文《grundlos》，既有“无底的”意思，又有“没有根基的”、“空无一物的”意思。——编者注

象”，他靠自己的分类法想出了神和世界，而且并不逊于黑格尔，但是这救不了他们。不管傅立叶有怎样独特的怪癖，这也不能为干巴巴的德国理论的乏味的所谓发展辩护。傅立叶是在正确地认识了过去和现在之后才按照自己的看法想像未来的，德国的理论却是首先随意地清算一下过去的历史，然后又随意地给未来加上一个方向。譬如请把傅立叶所提出的社会发展的几个时期（蒙昧时期、宗法时期、野蛮时期、文明时期）及其特征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比较一下吧！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历尽千辛万苦才为自己开辟了一条穿过历史迷宫的道路，并终于不顾实际上有**四**大世界帝国这一事实而勉强建立起一个三分法的外貌。至于黑格尔之后的那些结构，就更不必谈了；因为黑格尔的结构毕竟还有某种内容，虽然是歪曲了的内容，而黑格尔之后的一些体系的发明家的结构却已经没有任何内容了。

最后，现在已经是德国人停止这样夸耀自己做事切实认真的时候了。他们非但可以从最无谓的材料中给你作出随便什么样的结论，而且还可以把这种结论和世界史联系起来。他们可以根据初次碰到的第三手的材料给你证明，事情**必定**是这样，而不会是别的，虽然就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事情是否是这样。难道德国还有写社会问题文章的人没有说过傅立叶一句确实有辱于德国人做事切实认真的话吗？这些人中间就有一个凯泽尔先生[163]，他立刻利用“罗·施泰因的杰作”创立一个世界史的结构，这个结构只有一点令人感到遗憾，那就是它所根据的事实全是杜撰的。至于傅立叶，德国的理论至少已经有二十次给他确定了他在“绝对理念发展中的地位”，可是每次的地位都不相同，而且每一次德国的理论基本上都是以施泰因先生或其他同样不甚可靠的文件为根据。因此，德

国的“绝对的社会主义”真是可怜得怕人。稍微谈谈现在大家都乐于挂在嘴上的“人性”，稍微谈谈这种人性或者宁可说是兽性的“实现”，按照蒲鲁东那样（而这还是经过了第三手或第四手呢！）稍微谈一下财产，稍微为无产阶级悲叹几声，稍微谈一下劳动组织；多少组织几个改善下层阶级人民状况的可怜团体，而实际上对于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的社会状况却茫然无知，这种“社会主义”整个就归结为这几点。而这种社会主义，由于自己在理论领域中没有党性，由于自己的“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可是人们却想用这些空话使德国革命，去推动无产阶级并促使群众去思考和行动！

要是我们德国的那些半边的和十足的共产主义教授们花些力量去看一下傅立叶的主要著作（这些著作对他们来说并不比任何一本德国书难懂），他们将会在这里找到多么丰富的材料来进行推断和达到其他的目的！他们将会在这里找到多少新的（对德国来说目前还是新的）思想！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些好好先生除了对无产阶级的处境外，还未能对现代社会提出任何责难，而且即使在无产阶级的处境这方面，他们能够说的也不太多。当然，无产阶级的处境是一个主要问题，但是对现代社会的批评难道就仅限于此吗？傅立叶（除了他后期的著作外，他几乎没有接触到这一问题）就证明了，一个人即使不接触这个问题，也可以承认当前的社会完全不中用，而且仅仅根据对资产阶级的批评，也就是对资产阶级内部的相互关系的批评而不涉及它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得出必须改造社会的结论。到目前为止，能够进行这种批评的只有傅立叶一人。傅立叶毫不容情地揭穿有身分的人士的虚伪，揭穿他们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以及他们整个生活方式的空虚；他嘲笑他们的哲

学,嘲笑他们想使 perfection de la perfectibilité perfecti-bilisante〔日趋完善的完善能力臻于完善〕,嘲笑他们想追求 au-guste verité〔最高真理〕。傅立叶嘲笑这些人的"纯洁的道德",嘲笑他们的划一的社会制度;他把他们的实践,把受到他的精辟批评的 doux commerce〔和气的商业〕,把不能提供享乐的放纵的享乐,把婚姻制度所容许的通奸以及普遍的混乱和这种社会制度作了对比。这就是在德国还完全没有谈论过的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的确,曾经有人谈论过恋爱自由、妇女地位、妇女解放,但是有什么结果呢?说几句杂乱无章的话,捧出几个女学者,表现出一些歇斯底里,对德国人的乱伦抱怨几句——全是虎头蛇尾!

德国人首先必须熟悉一下(哪怕是稍微熟悉一下)国外的社会运动,熟悉一下国外的社会运动的实践和文献,——近八十年来英法两国的全部历史即英国的工业和法国的革命就是实际运动的例子,——然后他们必须在实践方面和文献方面做出像他们的邻居所做的那么多的事情,**只有在这以后**,才可以提出像各民族的功绩大小这类无关痛痒的问题。但是到那时,这种诡辩式的争论已经没有听众了。

而现在对德国人来说,最好是首先了解一下国外所获得的成就。所有以前出版的有关这方面的书,毫无例外地都**很拙劣**。这样简短的叙述至多只能评论一些著作,根本无法介绍这些著作本身。这些著作有一部分已成了稀有的珍本,在德国很难获得,有一部分篇幅过于庞大,有一部分杂有许多仅仅具有历史的和文献的意义并且在1845年已经引不起德国读者的兴趣的材料。为了使这些对德国尚属新鲜的具有宝贵内容的著作容易理解起见,我们必须进行编选,正像法国人对待来自国外的材料一样。法国人在这方面

要比我们实际得多。经过这样编选的外国社会主义文献中的重要著作，最近即将开始出版。一些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包括能够同样轻而易举地写出具有独到见解的作品的最优秀的活动家，也参加了这一工作。可以希望，这一工作会给高明的德国理论家指出，他们的一切高见都已经陈旧了，在莱茵河和英吉利海峡的彼岸，这些问题早已争出一个 pro et contra〔孰是孰非〕来了。只有他们知道了在他们**之前**已经做了些什么以后，他们才能表明**他们自己**能够做些什么。

布鲁塞尔

写于1845年底

第一次刊载于1846年的“德国公民手册”年鉴上

署名：弗·恩格斯

按年鉴原文刊印

原文是德文

弗·恩格斯
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
（庆祝1792年9月22日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164]

“我们和各个民族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和法兰西共和国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是老早就很了解各个民族了吗？我们不是已经给每一个民族指出了适当的地位了吗？我们不是已经把理论领域划给德国人，把政治领域划给法国人，把市民社会的领域划给英国人了吗？干吗突然又把法兰西共和国搬出来！为什么要庆祝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的事情呢？这个阶段老早就被超过了，被它自身的后果取消了。如果你想告诉我们一些英国的事情，那你最好是谈谈社会主义原则最近所达到的阶段，请你告诉我们，片面的英国社会主义是不是还不知道它远远低于我们的原则高度，是不是还不知道它只能算是一个阶段，而且只是发展中的一个被超过了的阶段！”

亲爱的德意志，请你冷静些！无论是哪个民族或是法兰西共和国都和我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正在各地提倡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用以对抗旧的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伪善的自私自利的世界主义；这种兄弟友爱比德国的一切“真正社会主义”的

理论都要宝贵得多。

现代民主（它从法国革命中产生，后来发展成法国的共产主义和英国的宪章主义）旗帜下的各民族的兄弟友爱向我们表明，群众和他俩的代表比德国的理论家更懂得时代的要求。

“但是谈论的问题不是这个呵！谁在谈论**这种**兄弟友爱，谁在谈论**这种**民主呢？我们谈论的是各民族的兄弟友爱，而且就只是各民族兄弟友爱，我们谈论的是民主，而且就只是民主，只是民主**本身**。难道你们把自己的黑格尔全都忘掉了？”

“我们不是罗马人，我们都抽烟。”[165]我们谈论的不是**现在在世界上**发生的反民族主义的运动，而是靠纯粹思考即靠毫无根据的幻想在我们的**头脑**中消除民族的特点。我们谈论的不是全欧洲所向往的**现实**的民主，即不同于从前的一切民主的完全特殊的民主；我们谈论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民主，即希腊、罗马、美国和法国的民主的一种平均物，简而言之，即民主这个**概念**。我们谈论的不是属于19世纪的、丑恶的、暂时的**东西**；我们谈论的是永恒的、“早在山岳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范畴。总而言之，我们谈论的不是大家所谈论的东西，而是完全另外一种东西。

简单地说，当英国人、法国人以及那些参加实际运动而不空谈理论的德国人现在谈论民主和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的时候，绝不应该只就其政治意义来理解。目前，只有德国的理论家和我们现在没有加以考虑的少数外国人还有这类荒诞的想法。实际上，这些言论现在已经具有社会意义，而且它们的政治意义已经溶于社会意义之中。这个革命已经不是一个仅仅争取某种国家形式的斗争，如像目前在德国还经常描绘的那样。即使对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从当时大多数的起义和饥荒的联系、从首都粮食供应和储备

物资的分配（1789年开始的）的意义、从最高限价令和对付粮食囤积商的法律、从革命军队的战斗口号“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从共和主义者唱的要du fer〔武器〕、要du coeur〔勇气〕、还要du pain〔面包〕的“卡马尼奥拉”歌[166]以及成百件的其他极为明显的事实都可以看出当时的民主和纯政治的组织完全是两回事。此外，大家知道，1793年宪法[167]是由依靠起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制定的，恐怖统治是由这个政党实行的，罗伯斯比尔的复亡表明资产阶级战胜了无产阶级，巴贝夫和他的同谋者从1793年的民主思想中给平等作出了当时最进步的结论。法国革命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社会运动，在它之后，纯粹政治上的民主已经变为毫无意义的东西了。

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任何其他的民主都只能存在于那些跟实际毫无联系、认为原则不是靠人和环境发展起来而是靠它本身发展起来的、好空谈的梦幻家的头脑中。民主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即使群众并不总是很清楚地懂得民主的这个唯一正确的意义，但是他们全都认为民主这个概念中包含着社会平等的要求，虽然这种要求还是模糊的。我们在估计共产主义的战斗力量的时候，可以放心地把这些具有民主思想的群众估计在内。而且，当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政党彼此联合起来的时候，它们完全有权把“民主”一词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因为除了我们现在没有加以考虑的那些民主主义者之外，1846年欧洲所有的民主主义者都是或多或少地有些觉悟的共产主义者。

尽管法兰西共和国已经“被超过”，但是各国的共产主义者仍然有充分的理由参加它的庆祝会。第一，所有因愚蠢而被人利用来镇压革命的人民，在他们终于明白了自己由于忠君爱国的情绪干

了什么样的蠢事之后，就应该公开地向法国人道歉；第二，现在欧洲的整个社会运动只不过是革命的第二幕，只不过是为结束1789年在巴黎揭幕而现在已经以整个欧洲作为舞台的那出戏作准备而已；第三，在我们这个充满胆怯、自私和吝啬的资产阶级时代，回忆一下那个伟大的年代是完全适时的；那时全体人民曾经一度抛弃了一切胆怯、自私和吝啬，那时他们是敢于反抗法律的、在任何东西面前都不退缩的人，是具有坚强毅力的人，曾经在1793年5月31日到1794年7月26日使得一切胆怯鬼、一切小商人、一切投机者，总之，使得一切资产者都不敢抬头。在一个叫做路特希尔德的人掌握着欧洲和平的命运，克希林叫嚷着要实行保护关税，科布顿叫嚷着要实行贸易自由，迪加尔特在鼓吹利用改善劳动阶级状况的协会来拯救罪孽深重的人类的时候，我们确实必须提起马拉和丹东、圣茹斯特和巴贝夫，以及在热马普和弗略留斯两地所取得的光荣胜利[168]。如果这个坚强有力的时代和这些刚毅果敢的人物对我们这个小商人的世界不再有影响，那末，人类的确就会堕入失望的深渊，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克希林、科布顿和迪加尔特这些人去随意支配。

最后，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有纯粹的社会意义。幼想成立欧洲共和国和利用适当的政治组织来保障永久和平，就像空谈靠普遍的贸易自由来保护各族人民的团结一样荒唐可笑；当所有这类多情善感的幻想完全不中用的时候，各国的无产者就开始不声不响地在共产主义民主的旗帜下**真正地结成兄弟**。也只有无产者才能够真正做到这点，因为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有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且由于他们认为这些利益高于一切，他们无法越出民族的范围。他们的少数几个理论家即使把他

们所有那些美妙的“原则”都搬出来也顶不了什么事，因为他们根本不触犯这些互相矛盾的利益和整个现存制度，他们只会说空话。可是全世界的无产者却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敌人，面临着同样的斗争，所有的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的偏见，所有他们的修养和举动实质上都是人道主义的和反民族主义的。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

下面的事实可以证明我刚才所说的一切。

还在1845年8月10日，在伦敦就差不多同样隆重地庆祝过三个事件：1792年的革命、1793年宪法的颁布和“民主协会”的成立。“民主协会”是由参加1838—1839年运动的英国党中最激进的一派建立起来的。

这个最激进的派别自然是由宪章主义者和无产者组成，不过这些无产者对宪章运动的目的都有明确的认识并且竭力促其实现。当时大多数的宪章主义者都还只想到把政权转入工人阶级手中，只有少数人才想到如何使用这个政权的问题，可是在当时的运动高潮中起重要作用的这个协会的成员却一致认为，他们首先都是共和主义者，而且正是宣布1793年的宪法为自己的信仰的标志、断然拒绝和资产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联合、始终认为被压迫者在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中有权使用压迫者用来反对他们的一切手段的共和主义者。他们还不止于此；他们不但是共和主义者，而且是共产主义者，并且还是不信宗教的共产主义者。到1838—1839年的革命高潮衰退时，协会瓦解了，但是它的活动并没有落空，而是大大地加强了宪章运动的积极性，促进了宪章运动中的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在上述的8月10日的庆祝会上已经提

出了共产主义和世界主义的㊀原则，除了政治平等的要求，还提出了**社会**平等的要求，并且会上大家都热情地向各国民主主义者祝贺。

以前在伦敦也做过团结各国激进派的尝试，但是这些尝试都失败了；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英国民主主义者内部的分歧和外国人对此不了解，部分地是由于各国党的领袖之间有原则上的分歧。民族差别严重地妨碍团结，甚至很早就住在伦敦的外国人都几乎一点也不了解在他们眼前所发生的运动和事物的真相（虽然他们对英国的民主寄以莫大的同情），分不清激进的资产者和激进的无产者，并且企图把臭名昭彰的敌人当做朋友聚集在同一个会上。由于这些原因，同时还由于不信任其他的民族，英国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又因为这种谈判成功与否必然取决于各委员会的几个领导人（他们大多是彼此不认识的）意见是否一致，所以更是容易犯这种错误。在过去那些尝试中，由于这些人选择得极不恰当，所以事情每次都很快就陷入了僵局。但是这种兄弟友爱是迫切需要的。每一次尝试的失败都只是激发大家再去努力。当伦敦的一些民主主义的领导人对这种事情感到厌倦的时候，就有其他的人来代替他们，1845年8月又做了一次彼此接近的尝试，这次尝试就不再是毫无结果了。[169]住在伦敦的各国民主主义者利用别人早已宣布要召开的9月22日的庆祝会公开地宣告他们联合起来了。

出席这个会的有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西

㊀ "世界主义"一词在这里和在第668页里都不应当理解为恩格斯在本篇里所批判的资产阶级世界主义，而应当理解为它的第二个意义，即"没有民族局限性和民族偏见"。——编者注

班牙人、波兰人和瑞士人。匈牙利和土耳其也各有一个代表参加。文明的欧洲的三个大民族——英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在会上起了主导的作用，并且看来很值得人尊敬。大会的主席当然是英国人，是一位叫做**托马斯·库伯**的“宪章主义者”；他参加过1842年的起义，因而差不多坐了整整两年的监牢。在狱中他模仿“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写了一首叙事诗，博得了英国文学批评家的极大的好评。170作为英国人的主要发言人在晚上发言的是**乔治·朱利安·哈尼**。他担任“北极星报”的编辑已经两年。“北极星报”是奥康瑙尔在1837年创办的，它是宪章派的机关报；自从乔·霍布逊和哈尼共同编辑这个报纸以来，该报在各方面都成了欧洲最优秀的报纸之一。我只能提出几家小型的巴黎工人报刊如“同盟月刊”171和它相比。哈尼本人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了运动。他是上述1838—1839年的“民主协会”的主要成员之一（8月10日举行的庆祝会就是他担任主席），而且除了霍布逊，他就是最优秀的英国作家，——这一点有机会我就会设法向德国人证明。虽然哈尼对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的理论一点也不了解，但是他对欧洲运动的目的却了解得非常清楚，而且完全站 à la hauteur des principes〔在原则的高度上〕。在筹备这个世界主义的[①]庆祝会方面，主要的功绩是他的。他不遗余力地促使各民族彼此接近，消除彼此的误会，克服彼此间的个人的分歧。

哈尼在献词时说道：

“1792年的正直而勇敢的法国共和主义者永垂不朽！愿他们曾经取得的终生为之奋斗的平等很快重现于法国，并且传遍全欧洲。”

---

① 见本卷第667页的编者注。——译者注

到会的人向哈尼反复地欢呼了两三次，他接着说道：

“在过去，我们如果举行像今天这样隆重的集会，不仅会遭到特权阶级的蔑视、讥笑、嘲弄和迫害，而且还会遭到受人欺骗的、愚昧无知的群众的殴打；这些群众被神甫和当权者所愚弄，认为法国革命是可怕的妖魔鬼怪，是想起来就令人毛骨悚然、谈起来就令人讨厌的东西。你们也许记得，至少是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会记得，就是不久以前，在我们的祖国这里，每当人们要求废除坏的法律、颁布好的法律的时候，立刻就会有人狂叫‘雅各宾派’。要是有人要求实行议会改革，降低税收，实行国民教育，或采取任何稍带进步性的措施，那末，我们可以预料得到，立刻就会有人拿‘法国革命’、‘恐怖统治’以及其他嗜血成性的魔鬼来吓唬那些已经胡子满腮但是还没有学会独立思考的大孩子。（笑声，鼓掌）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要说我们已经学会正确地理解这次伟大革命的历史，那我还是不相信。我要是打算借这个机会说一些耸人听闻的话，吹嘘一下自由、平等、人权、欧洲君主的同盟以及皮特和布朗施威克公爵的所作所为，那是很容易的。我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发表长篇大论，也许还会受到人们的赞扬，认为我的演说带有浓厚的自由思想的色彩，然而这样却丝毫没有接触到真正的问题。法国革命所面临的真正的大问题是**消灭不平等**，建立能够保障法国人民过幸福生活的制度，人民大众是从来没有过这种幸福生活的。如果我们用这块试金石来考验革命活动家，我们就会很容易给他们作出正确的评价。例如拉斐德，作为宪政主义的代表他也许是他那个集团内最正直最优秀的人：以声望而论很少有人赶得过他。他在青年时代曾经去过美国，并且参加了美国反对英国暴政的斗争。美国人获得独立后，他回到了法国，以后不久我们就看到他出现在自己祖国当前革命的最前列。在他年迈的时候我们又遇到了他，这时他在法国已经是声望最高的人物；‘三日’革命后，他成了法国真正的独裁者，他一句话就可以废立国王。拉斐德在欧洲和美洲也许比他的任何一个同时代人都享有更高的声誉。假如他在后来的行动中仍然忠实于他最初的革命言论，那末这种声誉他是应该享有的。但是拉斐德从来不赞成平等。（喊声：“注意，注意！”）的确，最初他抛弃了自己的头衔，放弃了封建特权，这是好的。当他是国民自卫军的首脑，是资产阶级崇拜的偶像，而且甚至还得到工人阶级的同情的时候，他曾经一度被认为是先进的革命战士。可是，他正需要前进的时候，却裹足不前

了。人民很快就看出，摧毁巴士底狱，废除封建特权、镇压国王和贵族的结果只不过**加强了资产阶级的政权**。可是人民对这一点是不满的。（鼓掌）他们要求自由和权利，**他们要求我们现在要求的东西——真正的、完全的平等。**（热烈鼓掌）当拉斐德看出了这一点以后，他变成了保守主义者，他不再做革命家了。正是他，为了在万一发生骚乱的时候可以合法地枪杀和拷打人民而建议实施戒严令，而且他提出这个建议正是在人民遭到极端严重的饥馑的时候。在国王逃往发棱后，人民于1791年7月17日聚集在马尔斯校场，要向国民议会呈递请愿书，反对这个卖国的国王重登王位，就在这个时候，拉斐德便根据这个法令亲自下令屠杀人民。后来他甚至敢于用屠刀来威胁巴黎，用武力查封来威胁民众俱乐部。8月10日革命后，他企图率领他的士兵袭击巴黎，但是这些士兵比他爱国，都不服从他的命令，于是他逃跑了，背弃了革命。不过拉斐德也许还是所有宪政主义者中的最好的一个，但是，我们的庆祝无论是对于他，或是对于他那个集团都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他们甚至在名义上也不是共和主义者。他们虚伪地承认人民有主权，但是又把人民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只允许他们称为积极公民的纳税人享有选举权。总而言之，拉斐德和宪政主义者都只不过是些辉格党人，和那些用改革法案来欺骗我们的人相差无几。（鼓掌）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吉伦特派；正是这些人通常被当做'真诚而忠实的共和主义者'。但是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对他们的才干和口才我们当然不能不钦佩，在才干和口才方面这一派的领导人都很出众，在一些领导人身上，除了这些而外，还有其他优点，例如罗兰坚贞正直，罗兰夫人舍己忘我，巴巴鲁热情奔放。当我们读罗兰夫人或哲学家孔多塞过早地惨死这段历史时，我们都不能不（至少我不能不）深深地感到激动。但是，无论如何吉伦特派不是人民能指靠的人，人民不能指望他们把自己从社会奴役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我们从不怀疑他们当中有许多有勇气的人；我们承认他们忠实于自己的信仰。我们也许还可以相信，他们当中许多人多半是无知，并没有什么罪过——当然，这只是就那些已经牺牲了的人而言，因为要是我们根据他们中间曾经在所谓恐怖统治下活过来的人来看这一派人，那末我们就必然会得出结论说，他们是有史以来最卑鄙的一群暴徒。这些活下来的吉伦特派分子帮忙撕毁1793年的宪法，实行了1795年的贵族宪法。他们伙同其他贵族奸党策划杀绝真正的共和主义者的阴谋，并且最后在法国造成了篡夺者拿破仑的军事专制。（喊声："注意，注意！"）吉伦特派的口才是备受赞扬的，但是，

我们这些坚定不移的民主主义者绝不能仅仅因为他们能说会道就拜倒在他们面前；否则我们就应当向卖身求荣的贵族米拉波表示最高的敬意了。当起来争取自由的人民粉碎了14世纪的奴隶制锁链，离乡背井前去抗击国内的叛逆和国境线上的外国军队的时候，他们为了抵抗敌人，需要的就不是吉伦特派的娓娓动听的长篇大论和冠冕堂皇的理论，而是更重要的东西。'面包、武器和平等'——这就是人民所需要的东西。（鼓掌）面包给挨饿的家庭；武器拿来反对专制制度的军队；平等是奋斗的目标和牺牲的代价。（掌声大作）用托马斯·卡莱尔的话来说，吉伦特派只不过把人民当做'一包可以用来炸毁巴士底狱的炸药'，可以当做工具使用，可以当做奴隶看待。吉伦特派动摇在王权和民主政治之间；他们徒劳无功地想用妥协的办法来逃避永恒的正义。他们失败了，他们的失败是理所当然的。坚毅刚强的人们把他们击溃了，人民把他们从自己的道路上清扫出去。在山岳党的各派中，我觉得值得提起的只有罗伯斯比尔和他的朋友。（热烈鼓掌）山岳党中大部分人是强盗，他们想的只是把革命果实攫为己有，根本不关心历尽千辛万苦勇敢地实现了这个革命的人民。这些坏蛋曾经一度和拥护平等的人使用过同一种语言，和他们一起跟宪政主义者和吉伦特派进行过斗争，但是，一当他们掌握了政权，他们就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他们是死心塌地地反对平等的人。他们推翻了罗伯斯比尔，杀害了他，并且还处死了圣茹斯特、库通和这位廉洁的立法者的其他朋友。这些叛徒和谋杀者杀害了平等的支持者还不满足，他们还大肆诬蔑受害者，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所犯的罪行栽诬在这些受害者的身上。我知道，流行的看法是把罗伯斯比尔仅仅看做怪物，但是我想，人们对这个非凡人物的品质完全改变看法的日子已为时不远了。我绝没有想把罗伯斯比尔当做神来崇拜，把他描绘成完人；但是我认为，他毕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革命领袖，懂得并且使用了正确的方法去根除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不合理的现象。（热烈鼓掌）我没有时间来谈论不屈不挠的马拉的品德，来谈论圣茹斯特这位卓越地体现了共和主义豪侠精神的人物；我也没有时间来列举那些法律上的英明措施，这些措施都是罗伯斯比尔在治国方面坚决果断的标志。我再说一遍，现在离开人们公正地评价罗伯斯比尔的一天已经不远了。（鼓掌），在我看来，最能证明罗伯斯比尔的真正品质的是他的死亡引起了死在他后面的那些真诚的民主主义者的普遍惋惜，在这些民主主义者里面还包括那些不了解他的心意因而误入迷途并促成了他的失败的人；后来这些人痛悔自己一

时糊涂，可是已经晚了。巴贝夫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个著名的密谋的组织者。这个密谋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不容许有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的行为**（鼓掌），**不存在私有财产、货币和一切穷困的根源**（鼓掌），大家的幸福应当建立**在大家共同劳动和平等享受福利的基础上。**（热烈鼓掌）这些无上光荣的伟大人物至死都在追求无上光荣的目的。巴贝夫和达尔特用自己的鲜血表明了自己的信仰，邦纳罗蒂坐穿了牢狱，饱尝了穷困，度过了暮年，仍然忠实于我们今天晚上大胆宣布的伟大原则。我还应当提一下英勇的代表罗姆、苏布拉尼、杜鲁阿、杜肯努阿和他们的同志，他们被国民公会中的贵族叛徒判处死刑后，还当面同凶手挑战，把一把匕首依次传递下去，用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要讲的第一部分就到此为止。第二部分我只说几句话就可以了，因为在座的法国民主主义者在这方面会谈得更好些。平等的原则将会恢复和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其实这些原则已经恢复了，它们不仅是以共和主义纲领的形式出现，而且是以共产主义的形式出现，因为据我所知，目前在法国到处都有共产主义的组织。但是，这一点我留给我的朋友封丹博士和他的同胞来作更详细的叙述。我非常高兴，这些可敬的民主主义者现在都在场。今晚他们就可以亲自看到法国主战派所散播的反对英国人民的言论是荒谬的。（鼓掌）我们要坚决消除这种民族纠纷；我们鄙视和憎恶像‘天生的敌人’、‘生来的仇人’和‘民族的光荣’这类野蛮人的诱饵和圈套。（掌声大作）我们憎恨一切战争，只有人民被迫起来反对国内压迫和外国侵略的战争才是例外。（鼓掌）此外，**我们反对‘外国人’这个字眼，今后应当把它从我们的民主字典中清除出去。**（热烈鼓掌）尽管我们可以属于欧洲大家庭的任何一个支脉，英国也好，法国也好，意大利也好，德国也好，但是我们总的名称是‘青年欧洲’，我们都在这面旗帜下一起反对暴政和不平等。”（热烈鼓掌多时）

在一个德国共产主义者[一]唱完“马赛曲”以后，**威廉·魏特林**接着宣读第二篇祝词，他说：

[一] 约瑟夫·莫尔。——编者注

“让我们为青年欧洲干杯!愿各国民主主义者抛弃以往的猜忌和民族纠纷,团结为兄弟般的集体,一起来消灭暴政,争取平等的完全胜利。”

魏特林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由于他的英语说得不流利,他朗读了下面的一篇讲稿:

“朋友们!今天这个聚会证明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燃烧着一种感情,普遍的兄弟友爱的感情。尽管由于我们各人所受的教育不同,我们无法使用同一种语言来表达我们的这种共同的感情,尽管语言的不同妨碍着我们体会这种感情,尽管我们共同的敌人抓住并且利用一千种偏见来阻挠我们加强相互了解和发展普遍的兄弟友爱,尽管存在着所有这些障碍,但是这种强烈的友爱感仍然是根除不了的。(鼓掌)这种感情会使受苦的人成为患难与共的同志,会使争取美好生活的斗士成为战友。(鼓掌)参加今晚我们所庆祝的革命的人也是我们的战友;他们也是受了现在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奋斗目标的鼓舞;这些目标可能也会使我们去迎接同样的、希望是更加顺利的战斗。(掌声大作)在发生人民运动的时期,在我们国内的敌人的特权遭到严重的威胁的时候,这些敌人竭力把我们的偏见引到我们祖国的边疆以外去,并且要我们相信,国境那边的人威胁着我们共同的利益。真是骗人的把戏!如果我们冷静地考虑一下,我们很快就会看出,离我们最近的敌人就在我们中间,就在我们自己的同胞中间。(喊声:“注意,注意!”接着鼓掌。)我们应当害怕的不是国外的敌人,因为这些可怜的敌人的境遇和我们是一样的。和我们一样,他们也是被迫为成千的毫无用处的游手好闲之徒做工;和我们一样,他们拿起武器反对别人也是迫于饥饿和法律,也是为盲目的热情所驱使。掌权的人们对我们说,我们的弟兄残忍而且掳掠成性。但是,难道还有谁比那些统治我们、教我们使用武器、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而唆使我们互相厮杀并把我们拖入战争漩涡的人们更加掳掠成性吗?(鼓掌)真的是我们共同的利益非要战争不可吗?一群羊由狼率领着去攻击另一群也是由这些狼领来的羊,难道是为了羊的利益吗?(掌声大作)我们的最凶恶的敌人正是这些人;他们抢走了我们的一切,把我们的这些东西挥霍在吃喝玩乐之中。(鼓掌)他们从我们这里抢走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因为他们所挥霍的一切都是我们生产出来的,这些东西应该归我们这些生产者,归我们的妻子和儿女,归我们的老人

和病人。（掌声大作）但是，请看，他们怎样用阴谋诡计抢走了我们的一切，把我们的财产交给了一帮好吃懒做的寄生虫。（鼓掌）说国外的敌人抢劫我们比我们本国的敌人抢得多，这是可能的吗?说外国人杀害我们的人民比我们的那些冷酷的富豪杀害得多，这也是可能的吗?这些富豪利用证券交易、重利盘剥和投机倒把，利用货币制度和宣告破产，利用垄断、教会捐税和地租，利用所有这些手段从我们手里夺去了生活必需品，把我们的千百万劳动弟兄置于死亡的边缘，甚至不给他们留下足够的土豆来活命。（热烈鼓掌）所以，各国工人的真正敌人正是那些有钱就无所不能而无钱就什么也不成的人，而且除了工人的敌人之外，在人们当中就没有其他的人类敌人，这难道还不够明显吗？（鼓掌）说我们在各国间发生战争的时候会遭到比现在这个所谓承平时期更厉害的掠夺和残杀，这难道可能吗?难我我们仅仅为了军事上的光荣就要提倡民族偏见、流血和掠夺吗?我们会从这种愚蠢的光荣中赢得什么呢？（鼓掌）既然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高尚的感情都和这种光荣不相容，那末我们要它干什么呢？（鼓掌）难道我们非为它付出代价不可吗？（鼓掌）难道我们非为它辛苦劳动、流血牺牲不可吗？（再次鼓掌）除了利用时机掉转枪口来反对掠夺者和刽子手——各国的贵族——之外，所有这些攻城略地、流血牺牲难道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吗？（热烈鼓掌）这些贵族，也只有这些贵族才是一贯地靠掠夺和杀人为生。穷人只是由于被迫和无知才成为贵族的工具；这些人是从各民族中网罗来的，本身都具有最浓厚的民族偏见并且希望看到所有其他民族都被本民族踩在脚下。但是，如果把这些人引到这里来，引到我们这个会上来，那末，他们也会互相了解，互相伸出手来。假如在一场战斗之前自由的捍卫者们能够向自己的弟兄发表演说，那末这场战斗就不会发生，也许反而会开一个像我们这样的联欢会。要是我们能够在战场上召开哪怕是一个这样的会，那末我们就会多么迅速地战胜所有现在压迫我们、抢劫我们的贪婪的吸血鬼呵！（掌声大作）朋友们，这就是整个人类感情的流露，它发的热都集中在普遍的兄弟友爱上，并且燃起了热情的烈焰；它很快就会把所有耸立在道路上的长期使我们弟兄分隔开的冰山融化掉。”（魏特林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回到他的座位上。）

在魏特林之后致词的是一位老共和主义者**贝利耶－封丹**博士。他早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初期就在巴黎的人权协会中起过显著

的作用。1834年，他牵连在四月审判案172中，可是翌年就和其余的被告一起从圣珀拉葸监狱里逃跑了（见路易·勃朗的“十年历史”173一书）；后来他和法国的革命政党一起前进并且和Père〔慈父〕卡贝保持着友谊的联系。与会者向贝利耶—封丹博士热烈地欢呼；他接着说道：

“公民们！我的发言不得不简短些，因为我的英语说得不太好。我看到英国的民主主义者庆祝法兰西共和国，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从心底里体会到朱利安·哈尼先生所表示的崇高的感情。我向你们保证，法国人民从来没有想到要把英国人民当做自己的敌人。有些法国记者写文章反对英国政府，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写文章反对英国人民。英国政府之所以为全欧洲所深恶痛绝，因为它不是英国人民的政府，而是英国贵族的政府。（鼓掌）法国民主主义者绝没有对英国人民抱敌视态度，相反地，他们希望和英国人民结为兄弟。（掌声大作）法国的共和主义者并不是仅仅为了法国而战斗，而是为了全人类而战斗；他们力图建立平等，并把它的幸福的果实传遍世界。（热烈鼓掌）他们宣布全人类都是自己的兄弟，他们所反对的只是其他国家的贵族。（鼓掌）公民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平等的原则已经复活了。共产主义正以巨人的步伐在全法国迈进。共产主义的协会已经遍布全国。我希望，我们很快就看到各国民主主义者结成伟大的联盟，这个联盟将是共和主义的共产主义在全欧洲取得胜利的保证。”（封丹博士在再次的掌声中回到他的座位上。）

随后全体为“青年欧洲”举杯，接着是三次高声的“欢呼”和“再次的欢呼”，以后就为托马斯·倍恩和各国牺牲了的民主主义者默哀，接着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牺牲了的民主主义者默哀，向被放逐的宪章主义者弗罗斯特、威廉斯、琼斯和爱里斯致敬，向奥康瑙尔、邓科布和其他宣传宪章的人致敬，最后是三次为“北极星报”欢呼。然后用各种语言（我发现只是没有提到用德语）唱民主歌曲。于是庆祝会在极其亲切友爱的气氛中结束。

这样就举行了一个包括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一千多个民主主

义者的大会。他们齐聚一堂来庆祝一个似乎和共产主义完全不相干的事件，即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大会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吸引某个集团；会上除了谈论伦敦的宪章主义者所了解的民主主义之外，也看不出还谈论过什么别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到会的大多数人总的说来都正确地代表了伦敦的宪章派无产者群众。而且这个会一致热烈欢迎共产主义的原则和共产主义一词本身。宪章主义者的集会是共产主义的庆祝会，并且如英国人自己所承认的，"像那天晚上的那种热情在伦敦已经有好多年没有看到了"。

所以我断言，现代的民主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难道不对吗？

弗·恩格斯写于1845年年底 按杂志原文刊印
载于1846年"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2卷 原文是德文
署书：弗·恩格斯

声　　明

据1月18日（第18号）“莱茵观察家”174报道，“特利尔日报”编辑部曾发表声明说，在为该报撰稿的各式各样的作家中也有“马克思”。为了避免任何误会起见，特声明如下：我**从来**没有为该报写过**片纸只字**，因为该报那种资产阶级的慈悲的、十足非共产主义的倾向是同我毫不相容的。

卡尔·马克思

1846年1月18日于布鲁塞尔

载于1846年1月26日
“特利尔日报”第26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
原文是德文

注　　释

注　释

注　释

1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一书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该书写于1844年9月至11月间，并于1845年2月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问世。

“神圣家族”是对鲍威尔兄弟及其鸠集在“文学总汇报”周围的追随者们的一种诙谐的称呼。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书中驳斥了鲍威尔及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或黑格尔左派），同时也批判了黑格尔本人的唯心主义哲学。

早在1842年夏季柏林成立所谓“自由人”小组时，马克思就已同青年黑格尔派发生了严重的分歧。1842年10月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编辑，当时参加报纸工作的还有一些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反对在报上发表脱离实际生活和沉醉于抽象的哲学争论的“自由人”小组所撰写的又空泛又浮夸的文章。马克思和“自由人”决裂后的两年当中，马克思、恩格斯同青年黑格尔派之间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分歧达到了极其深刻而又不可调和的程度。这不仅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从唯心主义转变到了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到了共产主义，而且还说明鲍威尔兄弟及其同道们当时已经蜕化。鲍威尔及其小集团在“文学总汇报”上背弃了“1842年的激进主义”以及明显表现出这种激进主义的“莱茵报”；他们堕落到陈腐的、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地步，鼓吹一种“理论”：认为只有杰出的人物，即“精神”的、“纯粹的批判”的体现者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群众、人民似乎只是毫无生气的东西，是历史发展的障碍。

为了揭露这种有害的反动的思想，捍卫自己的新的唯物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首次合写这一部著作。

在恩格斯逗留巴黎的十天中，他们就已拟定了全书的大纲，分好了章节，并合写了“序言”。该书书名最初是叫“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恩格斯在离开巴黎之前就写完了他所分担的几十章节。马克思负担了全书的绝大部分，直到1844年11月底他才写完，同时，为了写作分担的几个章节他利用了自己在1844年春夏所写的一部分经济哲学手稿，以及对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的心得和其他许多笔记、摘要，于是大大超过了本书预定的篇幅。在本书排印过程中，马克思在标题上又加了“神圣家族”这几个字。本书的目录标明了哪些章节是马克思写的，哪些章节是恩格斯写的(见本卷目录Ⅰ—Ⅳ页)。本卷开本小，篇幅已超过20印张，因此，根据德意志某些邦当时的规章，它没有遭到书报检查机关的预查。—— 第3—4页。

2 “文学总汇报”（《Allgemeine Literatur- Zeitung》）是青年黑格尔派布·鲍威尔主编的德文月刊，于1843年12月—1844年10月在沙洛顿堡发行。—— 第7页。

3 指卡·赖哈特在“文学总汇报”第1、2两期（1843年12月和1844年1月）上发表的文章“关于赤贫化的论文”。—— 第9页。

4 《Mühleigner》（直译是“磨坊主”），德语里没有这个字，它是由英语的 mill- owner（工厂所有者、厂主）译过来的。恩格斯在这里嘲笑“文学总汇报”的撰稿人茹·法赫尔在自己的文章里使用了他按英国字的形式生造的字。—— 第13页。

5 恩格斯指的是茹·法赫尔在“文学总汇报”第7、8两期（1844年6月和7月）上发表的“英国的迫切问题”一文。—— 第13页。

6 反谷物法同盟是曼彻斯特的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旨在限制甚至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所谓谷物法，是为英国大地主的利益实行的。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有着自己政治见解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

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在谷物法问题上的斗争，由于1846年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的通过而告结束。—— 第15页。

7 在英国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立法限制的斗争早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3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这一斗争席卷了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由于土地贵族的代表力求在反对工业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利用这一深得人心的口号，他们在议会里维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从1833年起，在议会里拥护这一法案的首要人物是“托利党人慈善家”艾释黎勋爵。—— 第15页。

8 这是布·鲍威尔的话，引自他的“自由的正义事业和我自己的事业”一书，1842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Die gute Sache der Freiheit und meine eigene Angelegenheit》. Zürich und Winterthur，1842）。—— 第18页。

9 这里指的是“瑙威尔克先生和哲学系”一文，这篇文章载于“文学总汇报”第6期（1844年5月），署名《J.》，是荣格尼茨（Jungnitz）这个姓的第一个字母。—— 第19页。

10 指免除布·鲍威尔的职务。因为他发表了批判圣经的著作，普鲁士政府于1841年10月暂时剥夺、而在1842年3月永久剥夺了他在波恩大学讲学的权利。—— 第19页。

11 恩格斯在这一节里分析并引用了埃·鲍威尔在“文学总汇报”第5期（1844年4月）上发表的对弗洛拉·特莉斯坦的“工人联合会”（Flora Tristan.《L' Union ouvrière》）一书（1843年巴黎版）的评论。—— 第21页。

12 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G.W.F.Hegel.《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该书第一版于1807年问世。马克思在写“神圣家族”时所使用的版本是“黑格尔全集”第二版第2卷（Hegel.Werke.2-te Aufl.，Bd. Ⅱ. Berlin，1841)。—— 第24页。

13 摘自席勒的诗篇“来自异乡的少女”。—— 第26页。

14 这里指的是比·约·蒲鲁东的著作“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P.J.Proudhon.《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ou Recherches sur le principe du droit et du gouverne-

ment》。该书第一版于1840年在巴黎问世。马克思所引用的是1841年的巴黎版本。

“什么是财产?”一书是用矛盾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写成的，由于它对私有制进行了尖锐的攻击，出版后曾经轰动一时。马克思在他的“论蒲鲁东”一文中曾对该书做了全面的批判的评价，这篇文章是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Social-Demokrat》)主编的书信的形式于1865年发表的。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的这一节中所批判的埃·鲍威尔的文章“蒲鲁东”，刊载于“文学总汇报”第5期(1844年4月)上。——第27页。

15 马克思所指的是团结在巴黎“改良报”(《La Réforme》)周围的一个政治集团，参加这个集团的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第29页。

16 “德法年签”(《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卡·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卡·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弗·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19—451、452—467、596—625、626—65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地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第39页。

17 “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8卷第256页，“法哲学原理”第190节(G. W. F. Hegel. Werke. Bd. Ⅷ, S. 256, Berlin, 1833. 《Grund-lin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 190)。这部著作的第一版于1821年在柏林问世。——第49页。

18 J. B. Say.《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该书于1803年在巴黎出第一版，马克思所引用的是该书的第三版(1817年)。——第53页。

19 这段话出自沙·孔德的著作“论财产”1834年巴黎版第1卷第52页上

（《Traité de la propriété》. T. I. p. 52, Paris, 1834)；蒲鲁东在“什么是财产？”一书（1841年版）第93页上引用了这段话。——第55页。

20 A.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本书第一版于1776年在伦敦问世。——第61页。

21 这里指的是“文学总汇报”第7期（1844年6月）上所刊载的施里加对法国作家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的评论。这部小说用感伤庸俗的笔调写成，书中充满了社会幻想，于1842—1843年在巴黎出版后，不仅在法国国内大负盛名，而且在国外也享有声誉。——第67页。

22 莫里哀“醉心贵族的小市民”第二幕第四场（见1956年北京作家出版社版第31页。——译者注）。——第68页。

23 指1830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所通过的立宪宪章（Charte constitutionnelle），它是七月王朝的根本法。“宪章真理”是讽刺的话，隐指路易·菲力浦在1830年7月31日发表的宣言结束话：“今后宪章就是真理。”——第70页。

24 马克思用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第六场（“魔女之厨”）中的对句改写的。——第78页。

25 引自沙·傅立叶的“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Théorie de l'unité universelle》）一书第3卷第2篇第3章。该书初版于1822年问世，名为“论家庭农业协会”（《Traité de l'association domestique-agricole》）。——第83页。

26 阿·阿·蒙泰“法兰西各等级近五百年的历史”1828—1844年巴黎版第1—10卷（A. A. Monteil.《Histoire des français des divers états aux cinq derniers siècles》. T. I—X, Paris, 1828—1844）。——第89页。

27 莎士比亚“终成眷属”第一幕第三场。——第89页。

28 Polydori Vergilii liber de rerum inventoribus. Lugduni, 1706. ——第90页。

29 弗罗芒“自复辟时代以来，特别在弗朗舍和德拉沃年代的警察内幕”1829年巴黎版第1—3卷（Froment.《La Police dévoilée depuis la Restauration et notamment sous M.M.Franchet et De-lavau》T.Ⅰ—Ⅲ，Paris，1829)。——第94页。

30 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G.W.F.Hegel.《Encyclo-pädic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全书第一版于1817年问世。马克思参考了1830年的第三版。——第100页。

31 此处和以后的引证都出自在“文学总汇报”第1期（1843年12月）上发表的布·鲍威尔的文章“犹太人问题的最新论文”；这篇文章是鲍威尔针对在报刊上对他的“犹太人问题”一书的批评所做的回答。——第100页。

32 布·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B.Bauer.《Die Judenfrage》）是一本增订本，其中补充了布·鲍威尔曾用同一题目发表在1842年11月的“德国年鉴”上几篇论文。该书于1842年在布朗施威克出版。——第100页。

33 这里指的是“巴黎革命”（《Révolutions de Paris》）周报，该报于1789年7月—1794年2月在巴黎发行。在1790年9月以前，革命政论家、民主主义者埃利塞·路斯达洛任该报编辑。——第104页。

34 即路·费尔巴哈的“哲学改革的预拟提纲”，写于1842年1月，被书报检查机关禁止在德国出版，于1843年，发表在瑞士出版的“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Anekdota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cistik》）第2卷。在这两卷集里也编入了卡·马克思、布·鲍威尔、弗·科本、阿·卢格等人的论文。——第105页。

35 空论派 是复辟时期（1815—1830）法国资产阶级政客集团；空论派是立宪君主主义者、民主和革命运动的凶恶敌人，所以他们极欲在法国建

立英国式的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同盟；空论派最有名的人物是历史学家弗·基佐和哲学家保·鲁瓦埃－科拉尔。后者的观点在哲学方面是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思想的反动——第108页。

36 马克思指的是布·鲍威尔在“文学总汇报”（1843年12月）第1期发表的文章“犹太人问题的最新论文”。——第110页。

37 “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8卷第12页，“法哲学原理”序言（G．W．F．Hegel．Werke．Bd．Ⅷ，S．12，Berlin，1833．《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Vorrede）。——第111页。

38 这里指的是卡·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19—451页。——第111页。

39 这里指的是布·鲍威尔对黑格尔右派分子辛利克斯的讲义第1卷的评论。这份讲义用“政治讲义两卷集”（《Politische Vorlesungen》.Bd．Ⅰ—Ⅱ）的名称于1843年在哈雷出版。鲍威尔的这篇评论载于“文学总汇报”第1期（1843年12月）。下面的一篇即“辛利克斯，第二号”，指的是布·鲍威尔在“文学总汇报”第5期（1844年4月）上对该讲义第2卷的评论。——第115页。

40 布·鲍威尔的“国家、宗教和政党”（《Staat，Religion und Parthei》．Leipzig，1843）一书是匿名出版的。——第115页。

41 路·费尔巴哈“未来哲学的基本原理”1843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L．Feuerbach．《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Zürich und Winterthur，1843）。——第117页。

42 这一段及以下的引文都出自布·鲍威尔为反驳他的“犹太人问题”一书的批评者而写的第二篇文章。鲍威尔的这第二篇文章和第一篇的标题一样，即“犹太人问题的最新论文”，发表在“文学总汇报”第4期（1844年3月）。——第120页。

43 这是布·鲍威尔在“文学总汇报”第8期（1844年7月）上发表的一篇文

章的标题。马克思在“绝对批判的第三次征讨”这一节中所引用的“文学总汇报”上的全部引文几乎都是摘自这篇文章。——第127页。

44 “德国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文艺哲学杂志“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的简称。该杂志自1841年7月由阿·卢格主编，在莱比锡出版。1838—1841年该杂志曾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的名称出版。由于“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在普鲁士受到禁止刊行的威胁，编辑部从普鲁士的哈雷城迁移到萨克森，并更改了杂志的名称。但是，用了新的名称，杂志也没有出版多久。1843年1月萨克森政府查封了“德国年鉴”，同时联邦议会决定禁止它在全德境内出版。——第128页。

45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自1842年1月1日—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该报系莱茵资产阶级代表创立，对普鲁士专制政体抱有对立情绪。该报曾吸收几个青年黑格尔派撰稿。1842年4月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报”也发表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当局对“莱茵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闭了。——第128页。

46 B. Bauer.《Das entdeckte Christenthum》. Zürich und Win-terthur，1843. ——第129页。

47 布·鲍威尔“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1841年莱比锡版第1—2卷；1842年布朗施威克版第3卷（B. Bauer.《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Bd. 1—2，Leipzig，1841；Bd. 3，Braunschweig，1842）。在宗教史的著述中，把前三篇福音（即马太、马可、路加三福音，因它们的内容类似，故统称复类福音。——译者注）的编者称为复类福音作者。——第134页。

48 指卡·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

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19—451页。——第136页。

49　指收集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张”（《Einundzwanzig Bogen aus der Schweiz》）这本文集里的布·鲍威尔的“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一文。这本文集是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诗人格·海尔维格于1843年在苏黎世和温特图尔出版的。——第137页。

50　“普鲁士福音教和科学”1840年莱比锡版（《Die evangelische Landeskirche Preussens und die Wissenschaft》. Leipzig，1840）。布·鲍威尔的这本书是匿名出版的。——第144页。

51　Gercle social（社会小组）是民主知识分子的代表所建立的组织，于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初年代在巴黎进行活动。Gercle social在共产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社会小组的思想家克·福适主张平均分配土地，限制过多的财产，并主张对凡有劳动能力的公民都给予工作。克·福适对法国革命文献中所宣布的形式上的平等所作的批判，促使“疯人派”的领导者雅克·卢对这一问题发表了大胆得多的言论。——第152页。

52　比·让·若·卡巴尼斯“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关系”（P. J. G. Cabanis.《Rapports du physique et du moral de l’homme》）。第一版于1802年在巴黎出版。这部著作的很大一部分曾于1798—1799年间在法国科学院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第160页。

53　扬逊派（由荷兰神学家扬逊的名字而来）是17世纪和18世纪初法国天主教徒中的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反映了一部分法国资产阶级对正统天主教的封建思想的不满情结。——第161页。

54　约·洛克“关于人类理性的经验”（J. Locke.《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第一版于1690年在伦敦出版。——第162页。

55　“关于人类知识的起源的经验”（《Essai sur l’origine des connaissances humaines》）。孔狄亚克这本书的第一版是1746年在阿姆斯特丹匿名出版的。——第165页。

56 爱尔维修“论人及其智力和教育”(Helvétius.《De l’homme, de ses facultés intellectuelles et de son éducation》)。作者逝世以后，这部著作在俄国驻荷兰大使德·阿·哥利岑的协助下第一次于1773年在海牙出版。——第165页。

57 “人是机器”1748年来顿版（《L’homme machine》. Leyden, 1748)。拉美特利匿名在来顿出版的这本书曾被焚毁，而作者本人则被驱逐出荷兰。他是在1745年从法国亡命到荷兰的。——第166页。

58 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或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规律”(《Système de la Nature, ou Des Lois du Monde Physique et du Monde Moral》)一书的第一版于1770年出版；为了免于暴露，作者的名字用了1760年逝世的法国科学院秘书日·勃·米拉波的名字。——第166页。

59 让·巴·罗比耐“自然论”(J. B. Robinet.《De la Nature》)。第一版(四卷集)于1763—1766年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第166页。

60 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史讲义”(G.W.F.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ie》)；这部著作第一次发表于“黑格尔全集”第一版中(Hegel. Werke. Bd. XIII—XV. Berlin, 1833—1836)。——第168页。

61 关于“哈雷年鉴”杂志，见本卷注44。——第168页。

62 爱尔维修“精神论”1822年巴黎版第1—2卷(Helvétius.《De l’Es- prit》. T. I—II, Paris, 1822)。爱尔维修这本书的第一版是在1758年在巴黎匿名出版的，后来在1759年被刽子手所焚毁。——第169页。

63 指霍尔巴赫的著作“社会体系，或道德和政治的自然原则”1822年巴黎版第1—2卷(《Système social, ou Principes naturels de la morale et de la politique》. T. I—II, Paris, 1822)。霍尔巴赫这部三卷集著作的第一版是在1773年匿名出版的。——第169页。

64 “惩罚和奖赏的理论”。耶利米·边沁先生的手稿摘要。1825—1826年巴

黎第三版第1—2卷（《Théorie des peines et des récom-penses》. Ouvrage extrait des manuscrits de M. Jérémie Bentham. T. Ⅰ—Ⅱ，3-me éd.，Paris，1825—1826）。第一版于1811年出版。——第170页。

65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反动的日报，1798年创刊，1810—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第170页。

66 罗·施泰因“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842年莱比锡版（L. Stein.《Der Socialismus und Communismus des heutigen Frankreichs》. Leipzig，1842）。后来查明，本书的作者是普鲁士政府的暗探。——第171页。

67 指“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马克思所引用的是“黑格尔全集”第二版（G. W. F. Hegel. Werke. 2-te Aufl.，Bd. V. Berlin，1841）。黑格尔的这部著作最初是以三卷集的形式于1812—1816年出版的。——第176页。

68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第180页。

69 “思辨神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spekulative Theologie》），1836—1838年间在柏林出版，编辑是当时属于黑格尔右派集团的布·鲍威尔。——第182页。

70 引自法国作家让·弗·马蒙台尔的独幕喜剧“吕锡尔”第四场。——第183页。

71 埃·鲍威尔的小说“坚定不移的原则万岁！”收在1843年在柏林出版的阿·魏尔和埃·鲍威尔的“柏林小说集”（A. Weill und E. Bauer.《Berliner Novellen》. Berlin，1843）。——第187页。

72 “柏林学社”（《Berliner Couleur》）是“文学总汇报”的记者对一些不属于布·鲍威尔集团并在若干枝节问题上批评“文学总汇报”的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称呼；其中有麦克斯·施蒂纳。——第189页。

73 马克思指的是布·鲍威尔著的文章“神学意识的痛苦和快乐”，此文发表

在“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第2卷。——第193页。

74 “和平民主日报”（《La Démocratie pacifique》）是傅立叶派主办的日报；1843—1851年间于巴黎出版，该报主编是维·孔西得朗。——第194页。

75 引自海涅的“北海集”（诗集第二集，“问海”）。——第200页。

76 引自德国民歌“修女”。——第205页。

77 引自德国民间滑稽故事“七个施瓦比亚人”。——第208页。

78 引自歌德所著的“温和的讽刺诗”。——第224页。

79 “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的简称，1789年于巴黎创刊。在七月王朝时期是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242页。

80 “世纪报”（《Le Siècle》）是1836至1939年在巴黎出版的一种日报。在19世纪40年代中，该报反映了那一部分只要求温和的宪法改良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第242页。

81 指的是报纸“小广告”（《Petites affiches》），这是法国最老的一种期刊，1612年创办于巴黎；它是一种刊载各种广告和通知的新闻小报。——第242页。

82 “撒但”（《Satan》）是资产阶级的小型讽刺报，1840—1844年在巴黎发行。——第243页。

83 这里马克思引用的是沙·傅立叶的下述几部著作：“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第一版于1808年问世），“经济的和公有的新世界”（《Le nouveau monde industriel et sociétaire》——第一版于1829年问世），以及“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见本卷注25）。——第250页。

84 Chaptal.《De l' Industrie fran oise》.T.Ⅰ—Ⅱ.Paris.1819.——第255页。

85 福尔土纳特是德国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他有一个神奇的用之不竭的钱袋和一顶魔帽。——第255页。

86 引自沙·傅立叶的著作“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第二部的跋。——第255页。

87 这里指的是那些丧失了自己权力的德国小公爵，在拿破仑战争和维也纳会议期间（1814—1815年）由于重新划分德国的政治地图，他们的领地被并入较大的德意志各邦的领土之内。——第258页。

88 “青年英国”是属于托利党的一些英国政治家和文学家的集团，组成于19世纪40年代初。“青年英国”社的活动家们流露了土地贵族对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实力的增强的不满情绪，并采取了蛊惑性的手法，企图把工人阶级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利用他们来反对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宣言”中，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把他们的观点确定为“封建的社会主义”。——第260页。

89 马克思加了讽刺性的插话的这段引文，是引自希采尔的苏黎世的通讯，此通讯登载在“文学总汇报”第5期上（1844年4月）。——第267页。

90 引自法国的席间小调。——第268页。

91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是弗·恩格斯1844年9月—1845年3月在巴门写成的。恩格斯在英国居住期间（1842年11月—1844年8月）研究了英国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他本来打算在他计划写的英国社会史中分出一章来说明这个问题，但是恩格斯为了要说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特殊作用，便决定专门写一本书来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本书的德文第一版在1845年在莱比锡出版，德文第二版在1892年出版。那时经作者同意的本书英译本已出过两版（1887年纽约版和1892年伦敦版）。恩格斯在准备出本书的新版时，并没有做任何重大的修改。但是在1887年“美国版附录”（这篇附录的内容后来几乎完全包括在1892

年的英文版和德文版的序言中）中，恩格斯认为必须告诉读者：不应当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当做一本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这样写道：“……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大力强调：共产主义不纯粹是工人阶级的党的学说，而且是一种理论，其最终目的就是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窄的范围中解放出来。这个论断在抽象的意义下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无益的，甚至多半是有害的。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以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那末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进行社会革命。”接着，恩格斯就解释，为什么他在1845年所做的“英国将在最近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没有证实。他认为，1848年以后宪章运动的低潮和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暂时胜利是与英国工业垄断世界市场有直接联系的，并且他确信，一旦英国丧失了垄断地位，“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第269页。

92 “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这一篇文章是恩格斯用英文写的，他本打算以单行本出版并分发给英国各政党的某些领袖、著作家和议会议员们。1845年和1892年德文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转载了这篇文章，1887年的美国版和1892年的英国版并没有把这篇文章收在里面。——第273页。

93 指1844年6月4—6日西里西亚织工的起义（这是德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搏斗）及1844年夏天发生的包括布拉格近郊织工在内的捷克工人的骚动。——第280页。

94 “德勒穆纪事报”（《Durham Chronicle》）——周刊，从1820年起在英格兰的德勒穆出版。该报在19世纪40年代的时候倾向于资产阶级自由派。——第293页。

95 这里指1832年6月英国议会所进行的选举法的改革。这次改革是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并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打开了进入议会的方便之门。在争取改革的斗争中成为主要力量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被自由资产阶级所欺骗，没有获得选举权。——第297页。

96　指1844年的议会会议。并见本卷第460—462、571和581页。——第297页。

9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596—625页。——第300页。

98　恩格斯引自奥尔斯顿牧师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起初载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机关报"第周快讯"，尼来又转载于1844年5月4日的宪章派报纸"北极星报"第338号。——第309页。

99　"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的报纸，1785年创办于伦敦。——第312页。

100　哈得兹菲尔德居民于1844年7月19日选出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本城的卫生状况。恩格斯在这里引证了该委员会的报告。这篇报告载于1844年8月10日"北极星报"第352号。——第322页。

101　克萨尔-摩尔　是曼彻斯特附近的一座小山，工人们常在那里举行集会。恩格斯把它比为古罗马的圣山，也就称它为"圣山"。根据传说，公元前494年，古罗马的平民曾起义反抗贵族，后来退往圣山。——第326页。

102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是英国资产阶级报纸，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后来成为自由党的机关报。该报从1821年起在曼彻斯特出版。——第352页。

103　恩格斯引自威·岑卜尼斯牧师关于伦敦码头工人状况的报道。这篇报道起初载于"每周快讯"，后来又转载于1844年5月4日"北极星报"第338号。——第371页。

104　考温所写的"从格拉斯哥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统计看居民的卫生状况"，这篇文章载于1840年10月号"伦敦统计学会会刊"。——第391页。

105　首都建筑法案（Metropolitan Buildings Act）于1844年在英国议会通过。——第394页。

106 1802年的学徒法把儿童学徒的工作时间限制在十二小时以内，并禁止让他们做夜工。此项法律只是在棉纺织业和毛纺织业中实行，并且没有规定工厂视察制来加以监督，而事实上厂主们也不遵守它。—— 第436页。

107 1819年的法律禁止棉纺织工厂雇用九岁以下的儿童，禁止儿童和十六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做夜工，并规定他们的工作时间每天不超过十二小时，其中不包括吃饭时间，由于这段时间厂主可以任意加以安排，因此实际上工人每日工作时间达十四小时或十四小时以上。

1825年的法律规定每天吃饭时间总共不得超过一小时半，以便每个工作日的总时间不致超过十三小时半。正像1819年的法律一样，1825年的法律没有规定工厂视察制来加以监督，而厂主们也不遵守它。—— 第456页。

108 “弗利特寄语”（《The Fleet papers》）是1841—1844年间奥斯特勒在弗利特债务监狱中用书信集的形式出版的周刊。—— 第460页。

109 “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是英国的一种周报，宪章派的中央机关报；1837年创刊，1852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从1844年11月起在伦敦出版。该报的创办人和主编为菲·奥康瑙尔，40年代乔·哈尼也曾任该报主编。1845年9月至1848年3月间弗·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 第468页。

110 爱·米德的“蒸气王”（《The Steam—King》）一诗是由弗·恩格斯译成德文的。该诗原文登载于1843年2月11日“北极星报”第274号上，比德译文多两节。该诗的俄译者为萨·马尔夏克。—— 第472页。

111 “两大陆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政论性的双周刊，1829年起在巴黎出版。—— 第485页。

112 据传说，罗马贵族梅涅尼·阿格利巴向公元前494年起义的平民讲了一则人体各部反抗胃部的寓言，因而把他们说得服服贴贴。—— 第511页。

113 指设菲尔德、布莱得弗德及其他城市中由奸细所挑起的宪章派和

警察的冲突。这些冲突使这一运动的许多领袖和参加者被捕。——第519页。

114 Mechanics' Institutions是一种夜校，工人们在那里可以学到一些普通科目和技术科目的知识；在英国，这种学校最初在格拉斯哥（1823年）和伦敦（1824年）出现。19世纪40年代初，这种学校有二百多个，大都在郎卡郡和约克郡的工厂城市中。资产阶级利用这些学校来训练工业所必需的熟练工人，并使这些工人受他们支配。——第527页。

115 戴·弗·施特劳斯“耶稣传”1835—1836年杜宾根版第1—2卷（D．F．Strauβ．《Das Leben Jesu》．Bd．1—2，Tübingen，1835—1836)。关于蒲鲁东的著作见本卷注14。——第528页。

116 “矿业杂志”（《The Mining Journal》）是1835年起在伦敦出版的经济技术周刊。——第538页。

117 禁止在地下劳动中雇用妇女和十岁以下儿童的法案，1842年8月10日在议会通过。——第540页。

118 皇家法庭是英国最古老的法庭之一，在19世纪（1873年以前）是一个审理刑事和民事案件的独立的高等法庭，它有权重新审理下级法院的判决。——第543页。

119 Writ of Habeas Corpus（人身保护状）是英国的审判实践中通用的一种文件的名称，它责成相当的审级根据当事人的要求将被捕者提交法庭，以便审查逮捕是否合法。根据对逮捕原因的审查，法庭或释放被捕者，或将其押回监狱，或取保释放。1679年法案所规定的这个程序不适用于叛国罪而经议会议决后也可以停止其效力。——第543页。

120 英爱合并是英国政府镇压1798年爱尔兰起义后强迫爱尔兰接受的。合并自1801年1月1日起生效，它把爱尔兰的最后一点自治权也给剥夺了，并解散了爱尔兰的议会。从19世纪20年代起，取消合并（Repeal of Union）的要求成为爱尔兰最得人心的口号；在1840年成立了“合并取消派协会”。——第563页。

12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626—655页。——第564页。

122 《Laissez faire, laissez aller》——“听之任之”是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经济学家的信条，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主张国家不干涉经济范围内的任何事务。——第566页。

123 “巴尔米开特的餐桌（或宴会）”这一成语引自神话“一千零一夜”，在这个宴会上给饥饿者端来的是一个个的空菜盘。——第583页。

124 指“新道德世界”（《The New Moral World》）——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周报，1834年由罗·欧文创办，一直出版到1846年；最初在里子出版，从1841年10月起改在伦敦出版；1843年11月至1845年5月弗·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588页。

125 指卡·马克思和阿·卢格所办的“德法年鉴”——见本卷注16。——第588页。

126 “特利尔日报”（《Trier'sche Zeitung》），1757年在特利尔创刊，1851年起以这个名称出版；从19世纪40年代初起成为激进的资产阶级报纸；到40年代中叶开始刊载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其中包括它的固定撰稿人卡·格律恩的文章。格律恩很快就成了“真正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之一。——第589页。

127 “发言人报，或莱茵－威斯特伐里亚通报”（《Sprecher oder: Rheinisch－Westphälischer Anzeiger》），1798年在多特蒙德创刊，19世纪40年代在威塞尔出版；从1842—1844年11月卡·格律恩参加了该报的编辑工作。——第589页。

128 指德国的报纸“前进报”（《Vorwärts!》）；该报于1844年1月至12月在巴黎出版，每周出两次。马克思从1844年夏天起密切地参与该报的编辑工作，该报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该报对普鲁士反动制度展开了尖锐的批评。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都曾在该报发表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68—489、656—705页）。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基佐内阁于1845年

1月下令把马克思及该报其他一些工作人员驱逐出法国；“前进报”因而停刊。——第589页。

129 指1844年11月9日“科伦日报”第314号副页上所刊载的一篇未署名的文章“‘社会主义的’魔影”。——第590页。

130 “和谐”（《Harmony》）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的信徒们——于1841年在英国汉普郡所创办的共产主义移民区的名称。该移民区一直存在到1846年初。——第591页。

131 译文是恩格斯根据海涅原诗的较早的稿子翻译的，它和首次发表在1844年7月10日“前进报”第55号上的原文不同，这篇译文的第一小节中多一个第三行。——第591页。

132 指1845年的“德国公民手册”（《Deutsches Bürgerbuch》）年鉴，该年鉴是海·皮特曼于1844年12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的。年鉴除载有大量的“真正社会主义者”的文章外，还有威·沃尔弗、诗人格·维尔特这类革命民主运动活动家的著作，同时还有关于美洲共产主义移民区和欧文主义者在英国的“和谐”移民区的报道。这些报道是弗·恩格斯编辑的，取材于“新道德世界”、“北极星报”和“晨报”，并译成了德文。1846年夏天在曼海姆出版的1846年“德国公民手册”年鉴中载有弗·恩格斯的一篇译文“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并附有他所写的前言和结束语（见本卷第654—661页）。——第594页。

133 指“莱茵社会改革年鉴”（《Rheinische Jahrbücher zur gesell-schaftlichen Reform》）杂志，这个杂志是激进政论家海·皮特曼办的；共出版过两卷，第1卷于1845年8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第2卷于1846年年底在德国和瑞士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别列坞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取得在德国宣传共产主义观点的阵地，就必须利用杂志。在该杂志第1卷中载有弗·恩格斯于1845年2月8日和15日在爱北斐特的集会上所发表的演说全文（“在爱北斐特的演说”），在第2卷中载有他的“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一文（见本卷第602—626页和662—676页）。但是年鉴的总的方向已为“真正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所左右，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德意志思想体系”（1845—1846）中对该

杂志进行了尖锐的抨击。—— 第594页。

134 指“社会明镜”（《Gesellschaftsspiegel》）月刊。恩格斯在最初一个时候曾参与了该杂志的组织工作，但是并没有参加编辑工作；杂志由莫·赫斯任编辑，在爱北斐特出版，刊载了一些“真正社会主义者”的文章。在1845—1846年间总共出版了12期。—— 第594页。

135 恩格斯在这里指的是卡·马克思曾经打算要写的一本著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45年2月1日，马克思和出版商列斯凯签订了该书两卷本的出版合同。马克思从1843年年底起开始钻研政治经济学，在1844年春天已经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就是要在报刊上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他当时所写的手稿只保存下来一部分，即所谓“1844年的经济哲学手稿”。由于要写“神圣家族”，马克思暂时推迟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直到1844年12月才又回来从事这一工作。马克思在1845—1846年研究英法经济学家时所做的大量的大纲、摘要和札记现在还保存着。可是就是这一次马克思也没有实现他的计划。关于促使马克思再度延期实现他的计划的原因，他自己在1846年8月1日给列斯凯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我正面地阐述问题之前写一本论战性的著作来反对德国的哲学和从那时起就存在着的德国的社会主义。要使群众接受那种和德国过去的科学刚好相反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这样做是必要的。”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论战性的著作”就是指他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思想体系”（1845—1846）。1847年2月出版商取消了“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出版合同。—— 第594页。

136 威·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斐维版（W. Weitling.《Garantien der Harmonie und Freiheit》. Vivis，1842）。—— 第594页。

137 指刊载在“德法年鉴”上的卡·马克思写的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52—467页。—— 第595页。

13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575—593、594—595页。——第597页。

139 “威斯特伐里亚汽船”（《Das Westphälische Dampfboot》）是“真正社会主义者”奥·吕宁创办的月刊。1845年1月—1846年12月在比雷菲尔德出版，1847年1月—1848年3月在帕德波恩出版。——第599页。

140 指“人民总汇报。当代重大问题每月通俗评论”（《Allgemeines Volksblatt. Populärer Monatsbericht über die wichtigsten Zeitfragen》），1845年1月—1846年初在民主主义活动家德斯特尔的参与下在科伦出版。德斯特尔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联系。——第599页。

141 指的是“新轶文集”（《Neue Anekdota》）；这个集子是1845年5月底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的。集子中载有莫·赫斯、卡·格律恩、奥·吕宁等人给报纸撰写但是被书报检查机关所禁止的文章，大半均写于1844年上半年。从格律恩致赫斯的信中可以看出，集子出版后不久，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针对它的内容发表了许多尖锐的批评性的意见。——第600页。

142 A. Becker.《Was wollen die Kommunisten?》. 1844年在洛桑出版的一个小册子。——第601页。

143 指卡·马克思发表在1843年1月的“莱茵报”上的一篇文章“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210—243页）。——第617页。

144 德国经济学家弗·李斯特在其1841年于斯图加特和杜宾根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Stuttgart und Thübingen，1841）一书中阐述了他的保护关税的观点。——第619页。

145 1842年，英国殖民者对中国发动的所谓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该条约中有一条规定中国开放广州、上海、厦门、宁波和福州五个港口同英国通商。——第623页。

146 莱比锡大屠杀是指萨克森军队枪杀1845年8月12日在莱比锡举行游行示威的群众这件事。游行示威是为了反对萨克森政府镇压“德国天主教徒”的运动和迫害其领袖之一的约·隆格牧师；它的导火线是为迎接亲王约翰而举行的阅兵典礼。1844年德国许多邦里都发生了“德国天主教徒”的运动，这一运动席卷了大部分中小资产者。“德国天主教徒”推翻了罗马教皇的权力和天主教的许多教条与仪式后，便竭力使天主教适应于上升的德国资产阶级的需要。—— 第627页。

147 1819年8月16日，为争取选举改革在曼彻斯特近郊圣彼得广场举行群众大会的手无寸铁的群众遭到英国军队的血腥屠杀。由于这一事件和滑铁卢战役相类似，所以现在的人都把它叫做彼得卢事件。—— 第627页。

148 1688年的政变在英国资产阶级的历史书上称为“光荣革命”。这次政变后，英国确立了以土地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的妥协为基础的君主立宪政体。—— 第629页。

149 1791年资产阶级的制宪会议通过了宪法，确立了法国的君主立宪政体，这个宪法被1792年8月10日的人民起义所废除，结果君权被推翻了。—— 第635页。

150 弗·恩格斯写“德国状况”这一系列文章的目的，是反对用反动的民族主义观点来叙述德国的历史，特别是叙述1813—1815年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的历史。恩格斯批判了民族主义的观点，同时也对这个战争作了片面的估价。在这次战争中，人民群众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掠夺政策的民族解放斗争，被统治阶级和当权的王朝利用来恢复欧洲的封建秩序。后来，弗·恩格斯在他的著作“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1888年）中重新评价这个历史时期时写道：“各民族反对拿破仑的全民战争，是遭拿破仑蹂躏的各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反映。”—— 第637页。

151 使德国继续保持分裂的联邦条例于1815年6月8日在维也纳会议上通过。这个文件的第十三条对加入德意志联邦的各邦许下了制订宪法的诺言，但诺言未曾实现。—— 第644页。

152 指1820年1月在西班牙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1820年7月在那不勒斯和巴勒摩、1820年8月在葡萄牙以及1821年3月在皮蒙特等地的革命发动。由于神圣同盟派遣法国军队入西班牙，奥地利军队入意大利进行干涉，革命运动被镇压下去了。—— 第650页。

153 法国烧炭党人的密谋组织成立于1820年底—1821年初，它是仿意大利的同一名称的组织建立的。法国烧炭党人把各种政治派别的代表人物团结在自己的队伍里，目的是要推翻波旁王朝。1822年他们密谋在许多城市（伯尔福、罗舍尔等城市）的卫戍部队中同时举行起义。在密谋失败和某些领袖惨遭杀戮后，烧炭党人的组织实际上停止了活动。—— 第650页。

154 指1816—1819年英国群众性的民主运动的高涨；运动是在为改革选举法而斗争的口号下进行的。—— 第650页。

155 指1830年法国资产阶级的七月革命。—— 第651页。

156 按照英国1832年的选举法，在城市里，每年租金不少于10英镑的房东和承租人获得了选举权。—— 第651页。

157 载于德意志各邦维也纳代表会议的最后（1834年6月12日）记录上的决议规定，各邦君主必须在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运动的斗争中互相支持。该文件由自由派政论家韦尔凯尔发表在1844年在曼海姆出版的“关于德意志国民的法律状况的重要文件”（《Wichtige Urkunde für den Rechtszustand der deutschen Nation》）一书上。—— 第652页。

158 英国内务大臣詹·罗·乔·格莱安为了讨好奥地利政府，于1844年命令邮政管理局允许警察秘密检查意大利流亡革命家的信件。这一行动引起了民主团体的愤怒。—— 第652页。

159 “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Ein Fragment Fourier’s über den denHandel》）一文的翻译工作，是包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在德国传播英法两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优秀著作而草拟的一个比较大的出版计划之内的。弗·恩格斯在“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前言和结束语中第一次

公开地批评了“真正社会主义者”。“真正社会主义者”对待英法两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卓越代表者的那种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的态度，以及他们想颂扬“真正的德国的社会主义”的企图，特别明显地表现在1845年8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的卡·格律恩所著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Die soziale Bewegung in Frankreich und Belgien》）一书中。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德意志思想体系”（1845—1846）一书中对“真正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之一卡·格律恩进行了全面的批评。—— 第654页。

160 恩格斯指的是罗·施泰因所著的“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 第654页。

161 这里指的是傅立叶在他的著作中对自然界将来要发生的变化所作的近于幻想的描写：海水的怪味将会改变，南北极上空将会出现放热的灵光，野兽将会变成有利于人类的牲畜，等等。—— 第656页。

162 接下去就是弗·恩格斯所译的傅立叶的作品。译文在本版中没有列入。恩格斯所选的片断包括沙·傅立叶未完成的著作“论三种外在统一”的前七章。傅立叶的这个著作在他死后发表在1845年出版的傅立叶派的杂志“法郎吉”（《La Phalange》）中（见“傅立叶选集”俄译本，1951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1卷第228—318页）。这几章给商业下了一般的定义，并叙述了各种类型的破产。其中某些地方同沙·傅立叶的“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一书中“论商业的无限自由”一篇完全相同。在“法郎吉”上发表手稿的时候，这几个地方都代以删节号。恩格斯在自己的译文中按照傅立叶原著的相应页次恢复了这些地方，略去了傅立叶对未来所作的近于幻想的离题较远的描写、某些没有现实意义的暗示以及由于傅立叶运用了特别的术语而难于理解的地方。恩格斯翻译的部分见上面提到的俄译本第228—232、237、240—244、249—252、253—260、261、262—263、265、266—269、271、272—313、314、315、316—318页。—— 第657页。

163 恩格斯指的是1843年不来梅出版的赫·沃·凯泽尔所著的“财产的个性”（H. W. Kaiser. 《Die Persönlichkeit des Eigenthums》. Bremen,

1843）一书。—— 第658页。

164 “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一文是弗·恩格斯在1845年年底写的，发表在1846年年底出版的“莱茵年鉴”（《Rheinische Jahrbücher》）第2卷上。在本文中，恩格斯根据1845年9月27日“北极星报”第411号的报道，描写了1845年9月22日在伦敦举行大会的经过情况并转述了会上的发言。这个大会实际上奠定了国际民主主义协会——“民主派兄弟协会”的基础。参加该协会的有宪章派左翼、德国的工人——正义者同盟盟员和侨居在伦敦的其他各国的革命流亡者。恩格斯非常重视这个大会（他和马克思都参加了它的筹备工作），并特地为它写了这篇文章。文章的第一段恩格斯以讽刺的口吻重述了一些“真正社会主义者”（格律恩、吕宁等）的典型的论调。这些人一方面对其他的民族抱虚无主义的态度，一方面却以民族主义的态度吹嘘德国民族的优越性。恩格斯批判了这些观点，他提出各国无产者利害一致的思想来和它们相对抗。—— 第662页。

165 引自海涅的诗“安心”。海涅在这首诗里抨击德国小市民的市侩作风和因循习惯，并拿古罗马的共和主义者来和他们相比照。—— 第663页。

166 “卡马尼奥拉”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形成的一首革命歌曲。它的歌词联系着当前的政治事件而有所修改和补充。——第664页。

167 1793年宪法是法国雅各宾派专政的头几个月中所拟定的宪法，它属于资产阶级宪法中最民主的宪法。这个宪法开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宣布主权属于人民，人民有权起来革命，反对篡夺他们政权的政府；这个宣言还承认社会有义务保证无产者有工作做和关心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宪法取消了财产资格的限制，实行了普选权，同时却宣布私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1793年的宪法由于内战和反革命干涉未能付诸实行，1794年热月9日后该宪法被取得了政权的反革命大资产阶级所撕毁。—— 第664页。

168 指法国革命军队于1792年11月6日在热马普和1794年6月26日在弗略留斯同欧洲各反革命君主第一次联盟的军队作战时所取得的胜利。——

第665页。

169 1845年8月下半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直接促进了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和政治流亡者的代表人物的接近。他们出席了宪章主义者和正义者同盟伦敦组织的领导者同各国民主革命运动的活动家所举行的协商会议。据1845年8月23日“北极星报”报道，会议在恩格斯的支持下通过了如下的决议：“召开居住在伦敦的各国民主主义者的公开会议，讨论建立一个协会，以期彼此了解（通过定期的联席会议）各国争取共同事业的运动进行的情况。”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参加9月22日的会议，因为他们当时已经离开伦敦。—— 第667页。

170 托·库伯的诗“自杀者的涤罪所。狱中诗稿十篇”是模仿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写成的；于1845年在伦敦出版。—— 第668页。

171 “同盟月刊。工人自己编辑和发行的通报”（《L' Union. Bulle- tin des ouvriers rédigé et publié par eux- mêmes》），是1843年12月至1846年9月在巴黎出版的月刊；由一批受圣西门思想影响的工人出版。—— 第668页。

172 四月审判案是审讯法国工人共和主义运动的167名活动家的事件。他们因1834年4月的里昂起义以及巴黎和其他城市的革命发动被控叛国。被告中也有秘密的、共和主义的人权和公民权协会的领袖。在1835年的审判中，大多数被告被残酷地判决流放到殖民地或长期监禁。一部分被告，其中包括在审判期间逃走掉的28个人，受到了缺席判决。—— 第675页。

173 咯·勃朗“1830—1840年的十年历史”第1—5卷（L. Blanc.《Histoire de dix nas. 1830—1840》. T. Ⅰ—Ⅴ.）。第一版于1841—1844年在巴黎出版。恩格斯引证的是本书的德译本，这个译本于1844—1845年在柏林出版。—— 第675页。

174 “莱茵观察家”（《Rheinischer Beobachter》）是一种保守的日报；于1844—1848年初在科伦出版。—— 第677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44年8月—1846年4月）

1844

8月底—9月初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巴黎会见；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给他们创造性的合作、他们共同的学术工作以及他们为无产阶级事业进行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

当两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了解了他们“在一切理论方面”（恩格斯）都是完全一致的以后，他们便着手合写他们的第一部作品；这部作品他们打算题名为“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恩格斯在巴黎逗留的十天中间，为本书个别章节写了七篇文章。

马克思邀请恩格斯为“前进报”撰稿，他自己则亲身参加该报的编辑工作。

恩格斯直接去了解法国的工人运动，参加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集会，也会见了俄国的政治活动家米·巴枯宁和格·托尔斯泰。

8月31日—10月19日

“前进报”刊载了弗·恩格斯的两篇论文“英国状况。十八世纪”和“英国状况。英国宪法”；这两篇文章是他在1844年2月—3月在英国写的，当时准备在“德法年鉴”上发表。

9月6日左右

恩格斯离巴黎回德国、回巴门市。

9月— 11月	马克思在巴黎继续写“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他大大地扩充了他和恩格斯最初拟定的计划，在这部著作中利用了他的一部分经济哲学手稿，也利用了有关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的笔记和摘录。
1844年9月— 1845年1月	马克思和法国的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保持着联系，和德国人的秘密组织巴黎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保持着联系，也和大多数法国工人秘密组织的领袖保持着联系；他经常出席德法两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集会。
1844年9月下半月—1845年3月	恩格斯在巴门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恩格斯在莱茵省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宣传工作和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的组织工作。他和巴门、爱北斐特、科伦、杜塞尔多夫、波恩等城市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在集会上宣传共产主义的思想，参加出版社会主义刊物的工作。
10月初	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报道社会主义宣传工作在德国进行的情况，并且谈到迫切需要写两三本书去阐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原理，以便为社会主义运动奠定理论的基础。
10月 18日以后	马克思收到威·魏特林从伦敦的来信；该信是对马克思的“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的评论。
10月	恩格斯编辑“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述描”一文，这是一篇把英国报刊上的材料译成德文的文章；这篇报道于1844年12月发表在1845年的“德国公民手册”上。
1844年 10月— 1845年4月初	恩格斯继续为英国欧文派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新道德世界”撰稿，在该报上报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在德国传播的情况。

11月19日	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批判青年黑格尔派麦·施蒂纳的著作“唯一者及其财产”。
11月下半月	马克思结束了“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一书的工作，将手稿送交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的出版商。在排印过程中马克思在本书的标题上又加了“神圣家族”这几个字。
12月	马克思读了麦·施蒂纳的著作“唯一者及其财产”后，打算在“前进报”上写文章批判该书。
1844年底—1845年1月	马克思在巴黎继续研究18世纪和19世纪头几十年的英法两国经济学家的著作。

1845

1月16日	法国政府在普鲁士的压力下下令驱逐卡·马克思和“前进报”的几个撰稿人出法国。
2月1日	马克思和在巴黎的出版商列斯凯（来自达姆斯塔德）签订合同，出版两卷集的经济著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2月2日左右	马克思在巴黎会见法国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埃·卡贝。
2月3日	马克思因在巴黎被逐迁往比利时的京城布鲁塞尔。
2月—7月	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继续写他的经济著作。
2月—12月	马克思和在巴黎的德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活动家以及正义者同盟巴黎组织的领导人通信来往。
2月8、15、22日	恩格斯参加在爱北斐特组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讨论会的工作。恩格斯在2月8日和15日的大会上的演说，发表在1845年8月的“莱茵年鉴”第1卷上。

2月24日左右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一书问世。
2月25日	恩格斯接到地方当局的正式通知，禁止在爱北斐特举行任何讨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集会。
3月15日	弗·恩格斯结束了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工作，将手稿送交莱比锡的出版商。
春天	卡·马克思写“费尔巴哈论提纲”，这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恩格斯）。
3月—5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交涉在德国出版“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
4月5日左右	恩格斯给“新道德世界”写了一篇报道爱北斐特集会的文章；该文于1845年5月10日发表。恩格斯也就此停止为英国欧文派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撰稿。
4月5日以后	恩格斯迁往布鲁塞尔马克思处。
4月—12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与比利时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活动家以及波兰革命流亡者的代表建立了联系。
5月底	弗·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在莱比锡出版。
7月12日左右	马克思和恩格斯到伦敦和曼彻斯特旅行，目的是研究英国的经济文献，同时也是为了更进一步熟悉英国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以及英国的工人运动。
7月下半月—8月上半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曼彻斯特逗留期间一直在公共图书馆里研究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
8月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会见了宪章派报纸“北极星报”的一位编辑乔·哈尼；也会见了正义者同盟伦敦组织的领导人卡·沙佩尔、约·莫尔等。

8月20日左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参加了宪章派、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和各国的一些革命民主主义运动活动家的集会。会议在恩格斯的赞助下通过了如下的决议：必须在伦敦建立各国民主主义者的协会，以便相互交换各国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情报。
8月24日左右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英国回布鲁塞尔。
9月8日到11日之间	弗·恩格斯写“最近发生的莱比锡大屠杀。——德国工人运动”一文。这篇文章于9月13日发表；从此，他开始为“北极星报”撰稿。
9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接着开始写“德意志思想体系”一书；该书在制定共产党的理论的哲学的原理方面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因此马克思就停止了整理“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手稿的工作。
10月15日	弗·恩格斯写“德国状况”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刊登在10月25日的“北极星报”上。
11月8日	“北极星报”发表弗·恩格斯的“德国状况”的第二篇文章。
12月1日	马克思得知普鲁士政府通过比利时政府将其逐出比利时的消息后，放弃了普鲁士的国籍。
1845年底	恩格斯鉴于出版“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的计划因找不到出版商无法实现，他就把他翻译的傅立叶著作的片断（“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发表在1846年的“德国公民手册”上，并且给它写了前言和结束语。恩格斯这次发表文章的目的在于第一次公开地反对“真正社会主义”。 恩格斯写“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一文，该文到1846年底才刊登在“莱茵年鉴”第2卷上。

1846

1846年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立共产主义联络委员会，目的在于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各国社会主义者和先进的工人。他们设法在伦敦、巴黎和德国建立联络委员会，为创立国际无产阶级的政党准备基础。

1月18日　马克思因1846年1月18日“莱茵观察家”第18号说他是“特利尔日报”的撰稿人，特为此辟谣。

2月20日　恩格斯为“北极星报”写“德国状况”的第三篇文章。

3月30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联络委员会的会议（魏特林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上，尖锐地批评了威·魏特林的“真正社会主义”和粗糙的平均共产主义。

4月4日　“北极星报”刊载了弗·恩格斯的“德国状况”的第三篇文章。

4月底　马克思和恩格斯结识了从德国流亡来的威·沃尔弗；他被吸收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联络委员会，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忠实的学生与战友。

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写作“德意志思想体系”。

人名索引

三　画

四　画

五　画

六　　画

七　画

八　画

九 画

十 画

十一画

十二画

十三画

十四画

十 五 画

十 六 画

十七画

十八画

期刊索引

二　画

三　画

四　画

五　画

六　画

七　画

八　画

九 画

十 画

十 一 画

十 二 画

十三画

十五画

译 后 记

本卷所载“神圣家族”一书第五和第八两章，郭沫若同志曾经译出；先后以“艺术作品的真实性”（1936年11月）和“艺术的真实”（1949年7月）为名，作为单行本出版。我们在翻译这一部分时参考了他的译文。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我局曾译出，于1956年5月出版。过去在翻译此书时，曾参考了季羡林同志的译稿；并承李必新、张仲实两同志根据俄文本、胡雄定同志根据英文本提出过不少意见。这次收入全集时，我们又对译文作了若干修改。

我们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并参照有关的原文翻译的。其中“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还参考了英译本。前后参加翻译的有王治平、胡尧之、张奇方、周裕昶、易克信、钱文干、孙开焕、伍瑞麟、孙传己、孙魁、沈渊等同志。全卷译文最后经谢宁同志校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Ein König lebt, ein zorniger Fürst,
Nicht des Dichters geträumtes Königsbild,
Ein Tyrann, den der weiße Sklave kennt,
Und der Dampf ist der König wild.

Er hat einen Arm, einen eisernen Arm,
Und obgleich er nur Einen trägt;
In dem Arme schafft eine Zauberkraft,
Die Millionen schlägt.

Wie der Moloch grimm, sein Ahn, der einst
Im Thale Hinnom saß,
Ist Feuersgluth sein Eingeweid',
Und Kinder sind sein Fraß.

Seine Priesterschaar, der Menschheit baar,
Voll Blutdurst, Stolz und Wuth,
Sie lenken — o Schand'! — seine Riesenhand
Und zaubern Gold aus Blut.

Sie treten in Staub das Menschenrecht
Für das schnöde Gold, ihren Gott,
Des Weibes Schmerz ist ihnen Scherz,
Des Mannes Thrän' ihr Spott.

Musik ist ihrem Ohr das Schrei'n
Des Armen im Todeskampf;
Skelette von Jungfrau'n und Knaben füll'n
Die Höllen des König Dampf.

Die Höll'n auf Erd'! sie verbreiten Tod,
Seit der Dampf herrscht, rings im Reich,
Denn des Menschen Leib und Seele wird
Gemordet d'rin zuglei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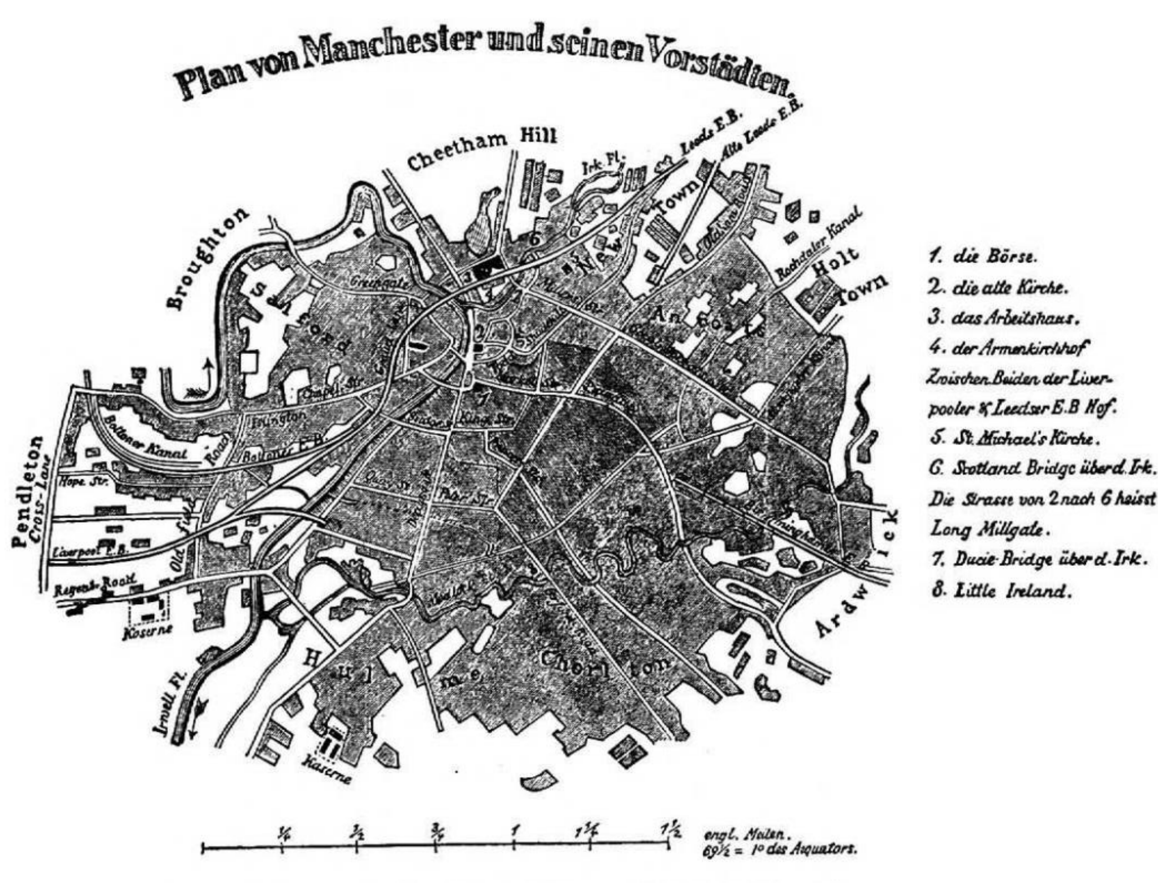
Drum nieder den Dampf, den Moloch wild,
Arbeitende Tausende, all',
Bind't ihm die Hand, oder unser Land
Bringt er über Nacht zu Fall!

Und seine Vögte grimm, die Mill-Lords stolz
Goldstrotzend und blutigroth,
Stürzen muß sie des Volkes Zorn,
Wie das Scheusal, ihren Gott*)!

*) Ich habe weder Zeit noch Raum, mich weitläufig auf die Entgegnungen der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一书载有弗·恩格斯翻译的

爱·米德“蒸气王”一诗的一页



1. die Börse.
2. die alte Kirche.
3. das Arbeitshaus.
4. der Armenkirchhof
Zwischen Beiden der Liverpooler & Leedser E.B Hof.
5. St. Michael's Kirche.
6. Scotland Bridge über d. Irk.
Die Strasse von 2 nach 6 heisst
Long Millgate.
7. Ducie Bridge über d. Irk.
8. Little Ireland.

Das commerzielle Viertel ist zur Unterscheidung von der linken zur rechten Hand abwärts schattirt

Plan von Manchester und seinen Vorstädten 曼徹斯特及其郊区平面圖

Cheetham Hill	奇坦希尔	Oxford-Road	牛津路
Irk Fl.	艾尔克河	Chorlton	却尔頓
Leeds E. B.	里子鉄路	Broughton	布劳頓
New Town	新城	Salford	索尔福
Alte Leeds E. B.	老里子鉄路	Chapel Str.	礼拜堂街
Oldham. Road	奥尔丹路	Quay Str.	碼头街
Rochdaler Kanal	罗契得尔运河	Deansgate	第恩斯蓋特街
Holt Town	霍尔特鎮	Peter Str.	彼得街
Millers Str.	密勒街	Medlock El.	梅德洛克河
Ancoats	安柯茨	Islington	伊斯林頓
Great Ancoats Str.	大安柯茨街	Boltoner E. B.	波尔頓鉄路
Stockporter Kanal	斯托克波尔特运河	Boltoner Kanal	波尔頓运河
Todd Str.	托德街	Hope Str.	霍普街
Shudehill	修德希尔	Liverpool E. B.	利物浦鉄路
Piccadilly	皮卡第萊	Regent-Road	瑞琴特路
Birminghamer E. B.	北明翰鉄路	Kaserne	兵营
Ardwick	阿德威克	Irwell Fl.	艾尔威尔河
Market Str.	市場街	Hulme	休尔姆
Greengate	格林蓋特	Kaserne	兵营
Gravel Lane	砂礫胡同	Pendleton	盆德尔頓
Bridge Str.	桥街	Cross-Lane	十字胡同
King Str.	英王街	Oldfield-Road	奥尔德菲尔德路
Princess Str	公主街		

1. die Börse. 交易所
2. die alte Kirche. 老教堂
3. das Arbeitshaus. 習艺所
4. der Armenkirchhof Zwischen Beiden der Liverpooler & Leedser E. B. Hof. 利物浦鉄路車站和里子鉄路車站之間的貧民公墓
5. St. Michael's Kirche. 聖邁克尔教堂
6. Scotland Bridge über d. Irk. Die Strasse von 2 nach 6 heisst Long Millgate. 艾尔克河上的苏格兰桥。从 2 到 6 的这条街叫朗-密尔蓋特
7. Ducie Bridge über d. Irk. 艾尔克河上的杜西桥
8. Little Ireland. 小爱尔兰

engl. Meilen
$69^1/_2 = 1°$ des Aequators $69^1/_2$ 英里＝1 緯度

Das commerzielle Viertel ist zur Unterscheidung von der linken zur rechten Hand abwärts schattirt
商業区用自左至右自上而下的投影表出

several others. Besides those, Henry Heine, the most eminent of all living German poets, has joined our ranks, and published a volume of political poetry, which contains also some pieces preaching Socialism. He is the author of the celebrated *Song of the Silesian Weavers*, of which I give you a prosaic translation, but which, I am afraid, will be considered blasphemy in England. At any rate, I will give it you, and only remark, that it refers to the battle-cry of the Prussians in 1813:—"With God for King and fatherland!" which has been ever since a favourite saying of the loyal party. But for the song, here it is:—

Without a tear in their grim eyes,
They sit at the loom, the rage of despair in their faces;
"We have suffered and hunger'd long enough;
Old Germany, we are weaving a shroud for thee
And weaving it with a triple curse.
"We are weaving, weaving!

"The first curse to the God, the blind and deaf god,
Upon whom we relied, as children on their father;
In whom we hoped and trusted withal,
He has mocked us, he has cheated us nevertheless.
"We are weaving, weaving!

"The second curse for the King of the rich,
Whom our distress could not soften nor touch;
The King, who extorts the last penny from us,
And sends his soldiers, to shoot us like dogs.
"We are weaving, weaving!

"A curse to the false fatherland,
That has nothing for us but distress and shame,
Where we suffered hunger and misery—
We are weaving thy shroud, Old Germany!
We are weaving, weaving!

With this song, which in its German original i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poems I know of, I take leave from you for this time, hoping soon to be able to report on our further progress and social literature.—Yours sincerely,

AN OLD FRIEND OF YOURS IN GERMANY.

"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一文的最后一页，上面载有弗·恩格斯翻译的亨·海涅的"西里西亚织工之歌"